「『我們接到軍令是：他們（難民）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Andrew Jacobs 《紐約時報》 2009年10月1日

長春餓殍戰

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
1947.11.4~1948.10.19

杜斌

白象文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2015年中元節（俗稱鬼節），於原洪熙街卡子放行難民出口處，一名餓殍的後人在焚燒紙錢祭祀先人的灰燼中寫下祝願之語：「幸福快樂。」

獻給
長春餓殍戰中的數十萬亡靈
以及掙扎存活於世的倖存者

請原諒一個無能後輩無法描述您們所遭受的人間悲苦之萬一

「你們斷絕敵人從地面取得糧食的來源是很必要的，你們必須做到這一點。……直至完全勝利。」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1948年6月7日致林彪等人的電文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

——林彪、羅榮桓和譚政在1948年9月9日致毛澤東《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中說



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

1945年9月9日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舉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向同盟國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何應欽在受降儀式後發表講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的結果。中國將走上和平建設大道，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繪畫／陳堅）



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與中共爭奪長春時，鑒於長春的重要戰略地位，指令鄭洞國率 10 萬國軍在長春固守待援，後來這直接導致了共軍採取殘酷的餓殍戰術。



長春餓殍戰的遙控總指揮：毛澤東和朱德

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都沒有公開留下過任何關於長春餓殍戰中對餓斃數十萬人的言論文字。（左：朱德總司令宣傳畫／漳南縣漳高工藝社，下：繪畫／陳丹青）





十萬共軍開赴東北

中共新四軍某部經冀東冷口出關向東北秘密開進。當日本宣佈投降後，中共先後從河北、山東和蘇北調集 11 萬兵力和 2 萬名幹部進入東北。勢單力薄的中共軍隊進入東北後，開始四處招兵買馬。林彪一進東北，即多次發出「擴軍指示」，強調「找群眾領袖或用新兵去擴兵」，擴來一個連就編一個連，擴來一個營就編一個營，誰擴一個連就當連長，誰擴一個營就當營長，「人多就能成『王』」。

蔣毛的重慶會談

1945 年 8 月 29 日，毛澤東受蔣中正邀請到重慶開展和平建國的談判。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歷時 43 天，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雙方簽署了《雙十協定》。毛澤東在 10 月 11 日回到延安後，就將《雙十協定》視為廢紙，迫不及待地發動長達三年的國內戰爭。一名歷史學者稱：「從那一天開始，中國的八年抗戰，中國從辛亥革命以來的北伐、東征以致抗戰的全部成就，開始付之東流，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國內戰爭席捲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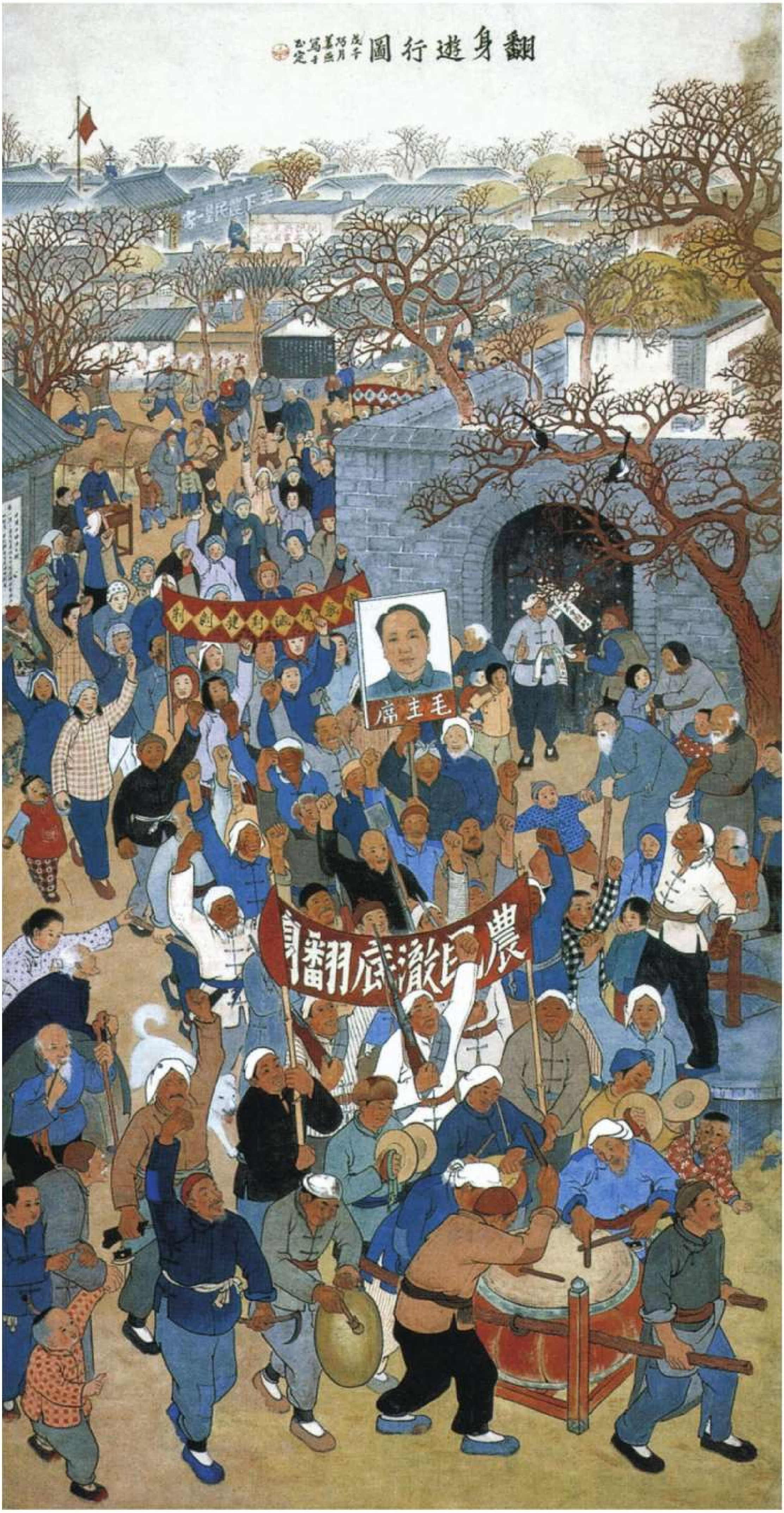
滿洲國的長春

1934 年 3 月 1 日，在日軍的策劃下，溥儀在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市）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溥儀稱帝，改年號為康德元年。中國國共雙方均對滿洲國不承認，通稱偽滿洲國。圖為溥儀與長春滿洲國執政政府官員合影。



四平爭奪戰

1947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1 日，共軍圍攻四平。圖為共軍士兵向國軍堡壘發動攻擊。這是東北民主聯軍總指揮林彪和羅榮桓指揮的第一次大城市攻堅戰，最終共軍以傷亡數萬餘人慘敗，這是國共爭奪四平的四次戰役中的第三次。四平既是東北的米倉，也是連接瀋陽、長春、吉林間的交通樞紐，全市八萬餘人。1946 年 3 月 15 日，共軍六千余人從國軍手中奪取四平，這是第一次戰役；1946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國軍攻打四平，林彪部隊十萬餘人敗退，這是第二次戰役；林彪部隊經過擴充整編兵力達到 70 萬人，在 1948 年 3 月 12 日發動對四平的攻擊，3 月 13 日殲俘國軍一萬四千餘人。在四平慘烈的爭奪戰中，林彪部隊被打得狼狽不堪。與此同時，戰爭給四平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前往探訪戰場的一名記者稱：「四平比人間地獄還不如。」



翻身遊行圖

農村是戰時糧食、資金和人力的主要來源。中共軍隊和幹部深入東北後，號召全員沉潛到偏遠農村和小城鎮進行土地改革，亮出最美的身段取悅農民，這為中共佔領東北、奪取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繪畫／姜燕）



長春餓殍戰的策動、部署、指揮者：林彪和羅榮桓

作為中共東北局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東北分會主席、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上圖）和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下圖），至死都沒有公開表達過對餓斃數十萬人的歉疚和悔罪。





長春餓殍戰的具體實施者：肖勁光和肖華

作為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上左），在回憶錄和軍事文選中對餓殍問題隻字不提。他認為中共奪取長春要「歸功於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而作為肖勁光的軍事搭檔、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肖華，在公開的文字中同樣回避餓殍問題，他說長春是「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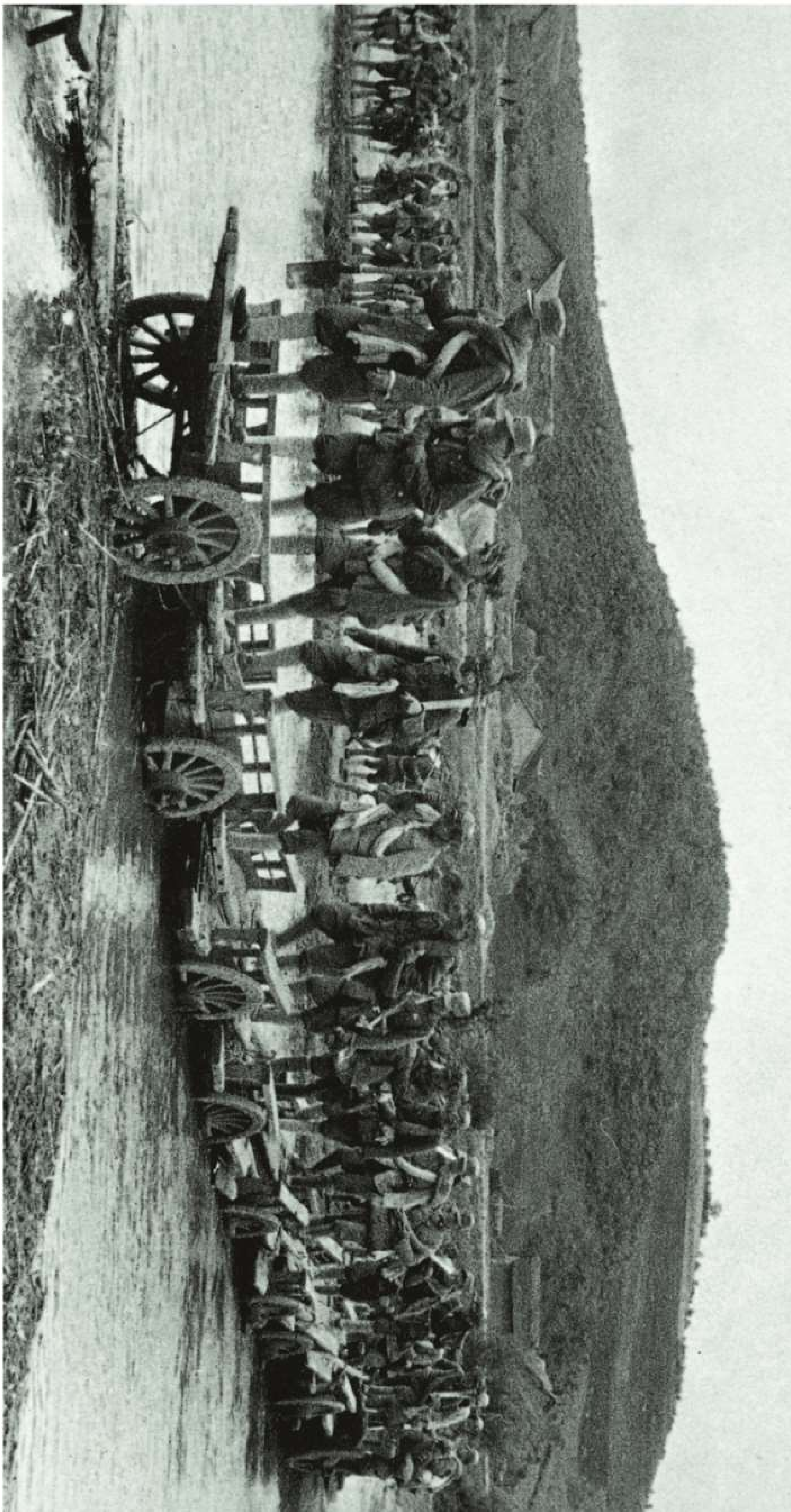
1945 年 12 月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東北分行開始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至 1948 年，流通券面額已是逐月升高，導致經濟通貨膨脹。長春行政當局利用增發貨幣間接來掠奪城內民眾手中僅有的一點存糧，而中共軍隊則在長春城外採取堅壁清野、糧禁入且人禁出的滅絕方式來直接困餓民眾。國共雙方的自我殘殺，致使數十萬平民無辜喪生。



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的鄭洞國將軍，投降中共後，終生未再踏足過長春城。他在撰文反思長春餓殍戰時，將餓斃數十萬人的問題歸罪於蔣中正和民國政府當局。鄭在文章中稱，長春的「屍橫遍地」，令他「心驚肉跳」，每每追憶時都「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



一名國軍軍人和一名年輕女子的訂婚紀念照。饑餓吞噬了長春城，每個人都在想果腹的辦法。許多女學生掀起了給國軍軍官做新娘的熱潮，只求糊口活命。一名新七軍軍人在家信中寫道：「在兵荒馬亂的東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結婚是特別的容易，尤其是學校的女學生，你可以任意選擇，並且她們也無任何選擇，條件主要是問問你每月的收入和多少高粱米而已。」



1948年6月，共軍渡過遼河，浩浩蕩蕩威逼長春，實行久困重圍。



居住在長春城內的難民紛紛出逃。永遠都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餓斃在國共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



倖存者遠藤譽 5 歲時的照片。她在 1953 年隨家人回歸日本，現在為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她的一生幾乎都活在圍餓長春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該書已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和英文版。（照片／遠藤譽）



倖存者沙秀傑年齡不詳的照片。她在 15 歲時與寡母、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在洪熙街卡子內困守了 14 天，一個弟弟餓死。她後來在長春市傳染病醫院從事護理工作，1989 年從護師長的職務上退休。



1994 年 4 月 1 日，58 歲的范傳華探訪圍餓長春時居住過的房子時拍下的照片。他的爸爸、媽媽和弟弟都是在這個房間活活餓死的。1948 年 10 月 19 日中午時分，他的鄰居劉大娘拼命敲著他身後的那個圓窗戶，告訴他長春解放了。後來，他中學畢業考上軍校成為火炮技師。再後來，他轉業到遼寧省外貿工作，從副處長的職務上退休。（照片／范傳華）



共軍士兵給長春難民發放救濟糧。



從長春逃出來的難民說：「到了解放區，吃到了飽飯。」



1948 年 6 月，共軍從其統治區運來糧食準備救濟長春難民。



共軍女兵登記從長春逃出來的難民，準備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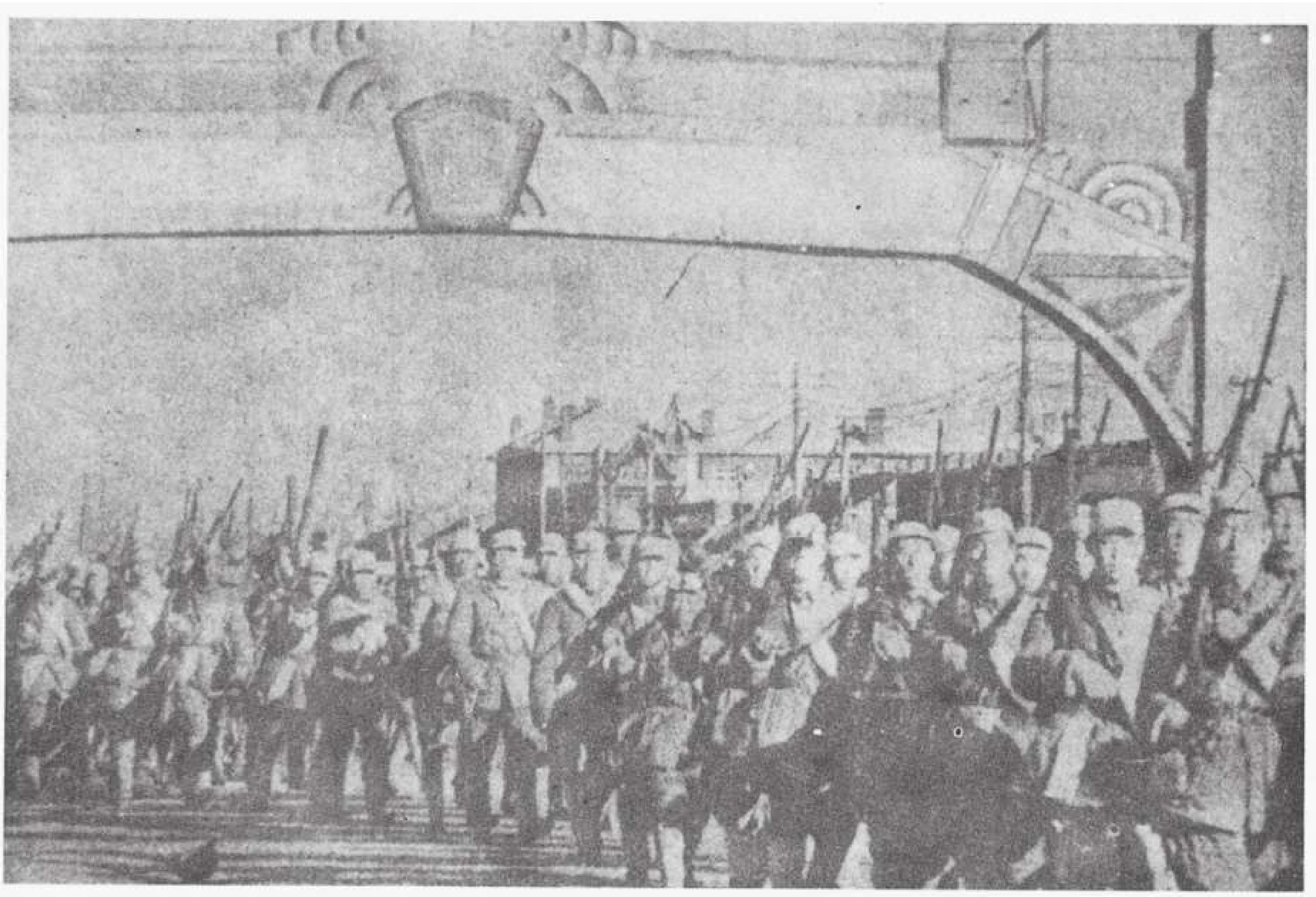
共軍圍城部隊第一兵團司令肖勁光（中）和政治委員肖華（左）會見率領國軍第六十軍全軍起義的曾澤生將軍。



1948 年 10 月 21 日，中華民國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將軍和新七軍軍長李鴻等被迫率四萬七千余名官兵全部投降。這是鄭洞國（左三）被遣送到哈爾濱時的照片。



1948 年 11 月 2 日，中共佔領瀋陽。至此，中共奪取東北全境。中共組織工人、學生和市民慶祝東北解放。



1948 年 11 月 11 日，在長春城內，中共舉行盛大的圍城部隊入城儀式和慶祝長春解放暨東北全境解放大會。八萬群眾高聲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在鳴禮炮二十響後，全體肅立向革命領袖致敬，向前線陣亡將士及長春死難同胞致哀。中共《長春新報》稱：「遊行行列所經之處，皆人山人海萬人空巷，鑼鼓喧天，歡聲雷動……」



國軍新七軍官兵在長春大同廣場舉行繳槍儀式後，由共軍監視著從蔣中正的畫像下出城集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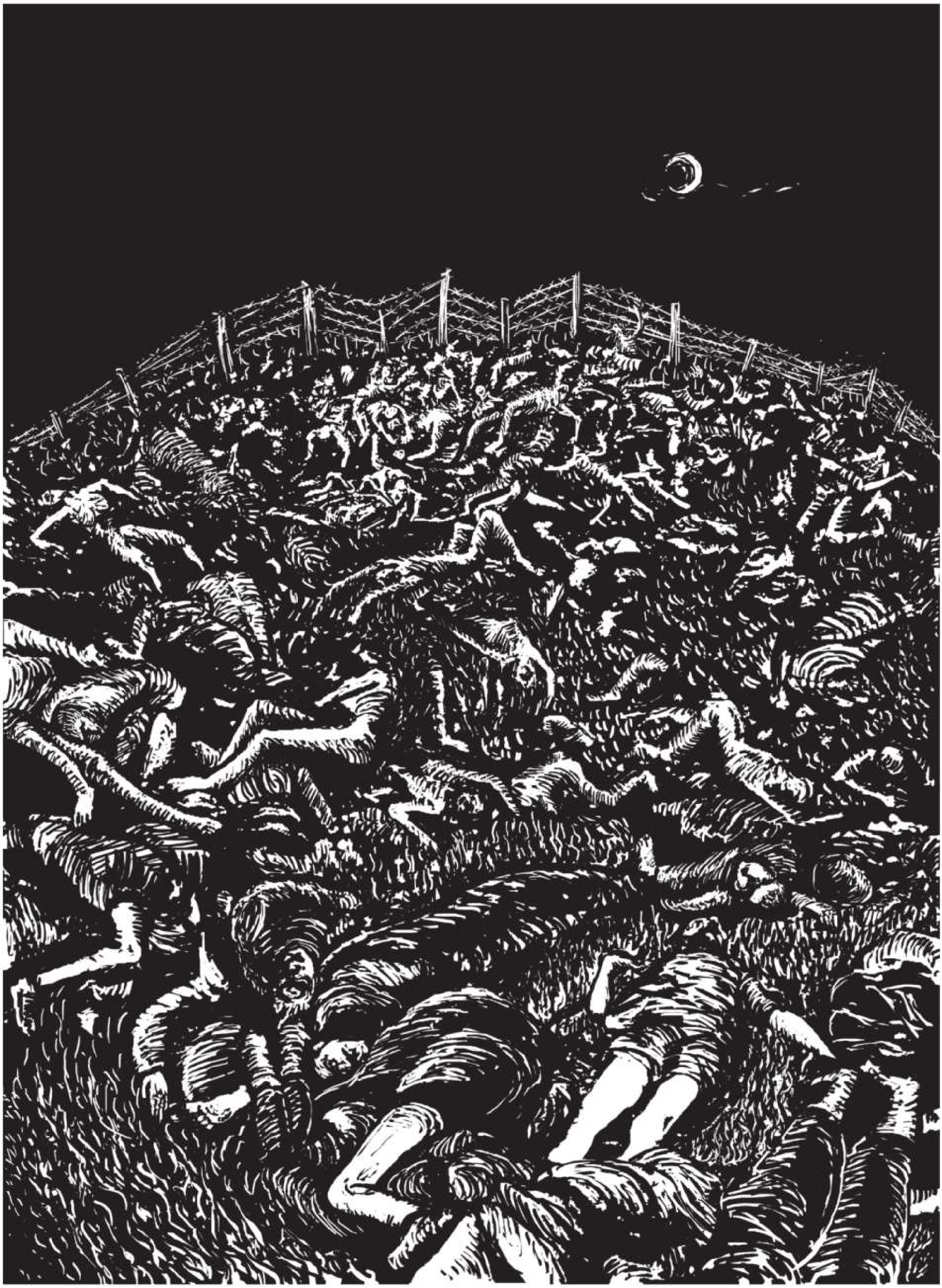
共軍佔領長春後，司號員吹響了勝利的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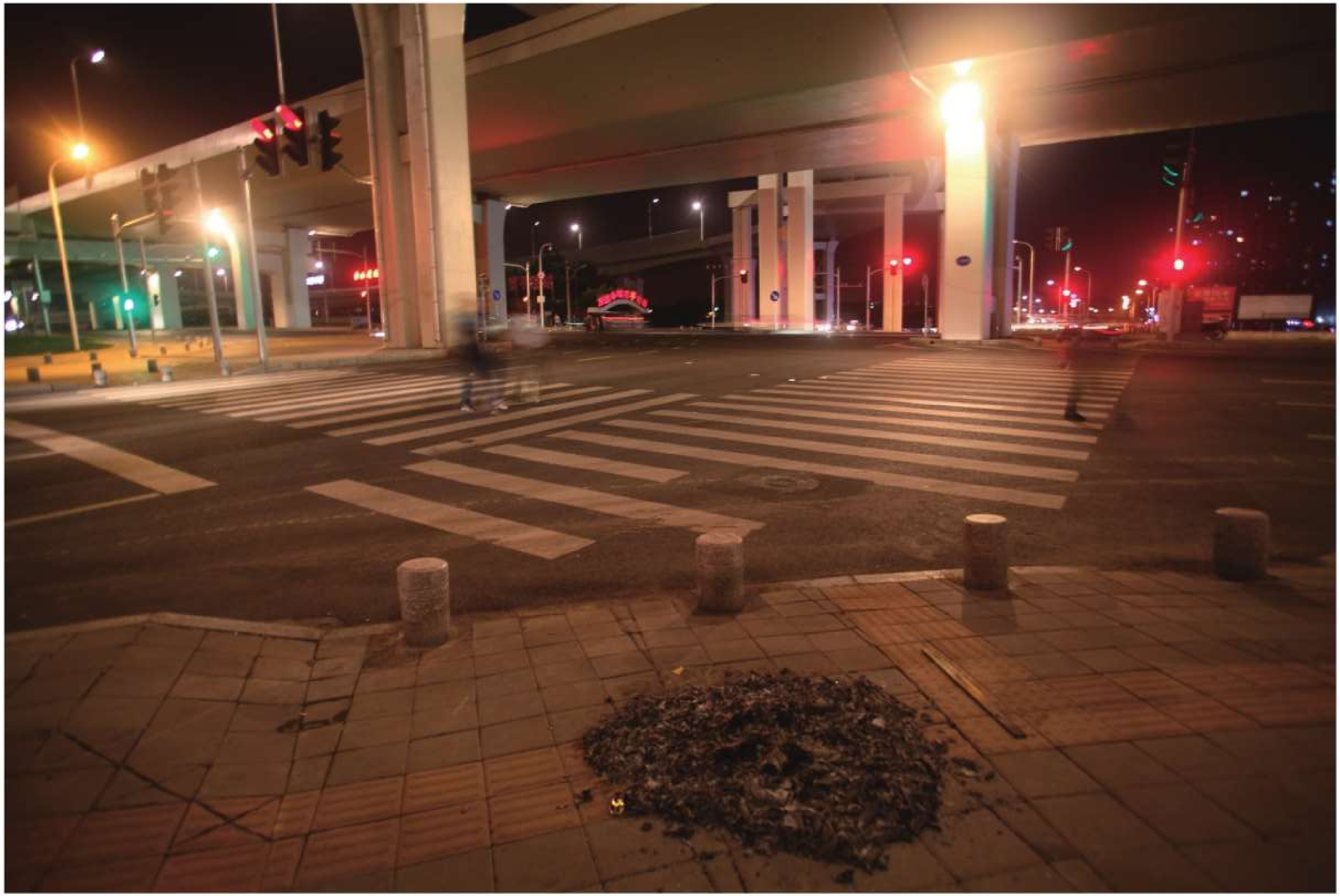


這口水井曾經拯救了困餓在洪熙街卡子內成千上萬的難民。這是日本的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 1990 年代探訪長春時拍下的照片。（照片／遠藤譽）



1948 年洪熙街卡子內餓死者屍體最多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露天廁所所在地。這是日本的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在 1990 年代探訪長春時拍下的照片。（照片／遠藤譽）


餓殍遍野（插畫／巴丟草）



2015 年 8 月 24 日，吉林省長春市寬平大路是洪熙街卡子出口原址處，一位餓殍的後人在長春餓殍戰 67 周年時焚燒紙錢祭奠先人後的灰燼。一位燒紙的女人稱：「政府不讓我們燒紙，說這會污染環境。」



1947 年 1 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遣送日本人歸國行動後，中央銀行留用的日本人的合影。左一為武田英克，左七為梅震，他們在洪熙街卡子目擊了眾多的死亡與難忍的饑餓，在返回日本後，分別撰寫了自己死裡逃生的回憶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從此，一個狂暴而又血腥的共產革命來臨了。（版畫／古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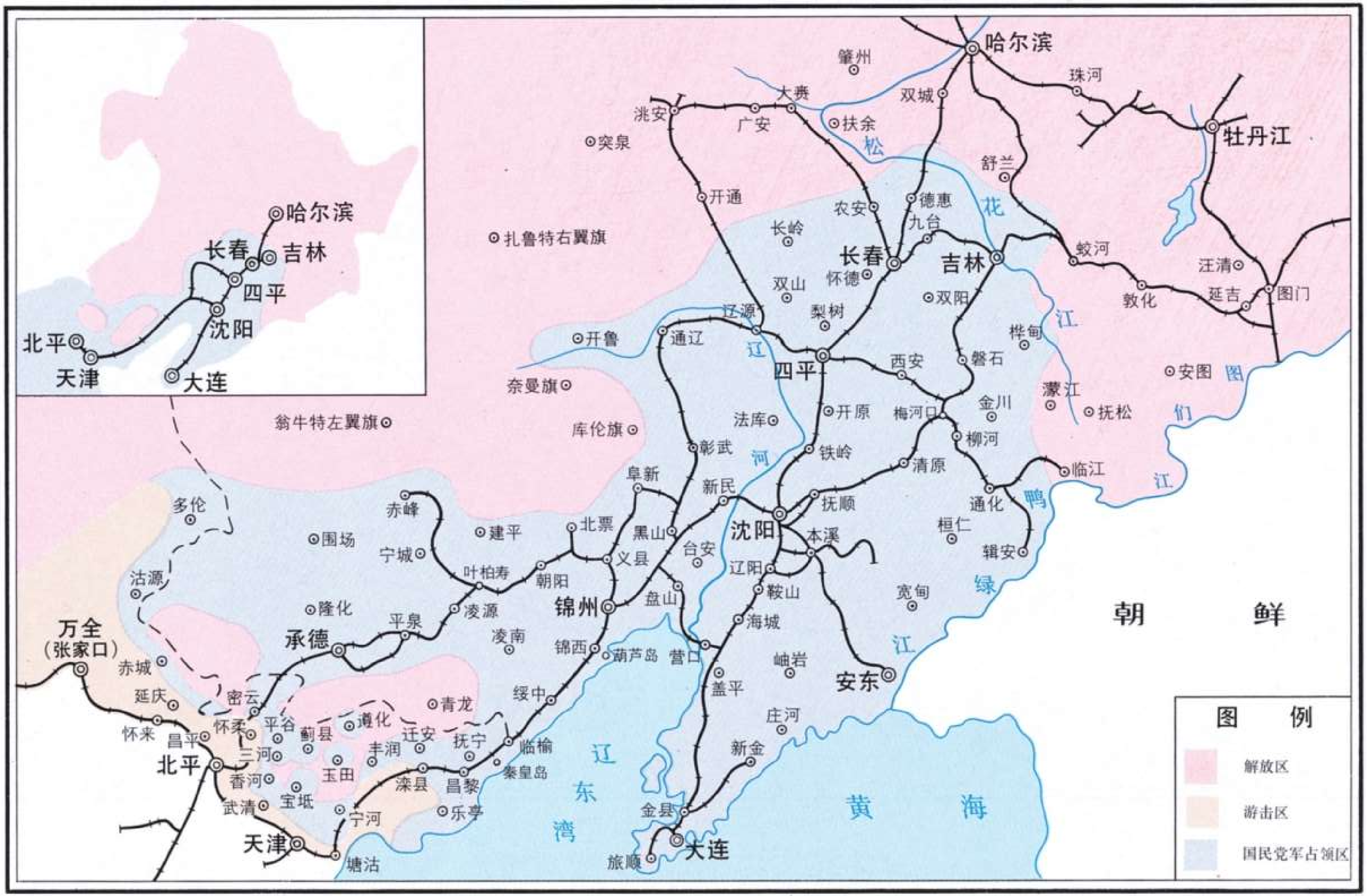


1949 年 1 月 22 日，林彪的東北野戰軍佔領北平。駐守北平的 25 萬國軍受到林彪的 90 萬共軍的封鎖圍困，在共諜密謀和心戰重壓下，最終選擇不戰而降。（照片 /Baldwin H. WARD & Kathryn C. Ward）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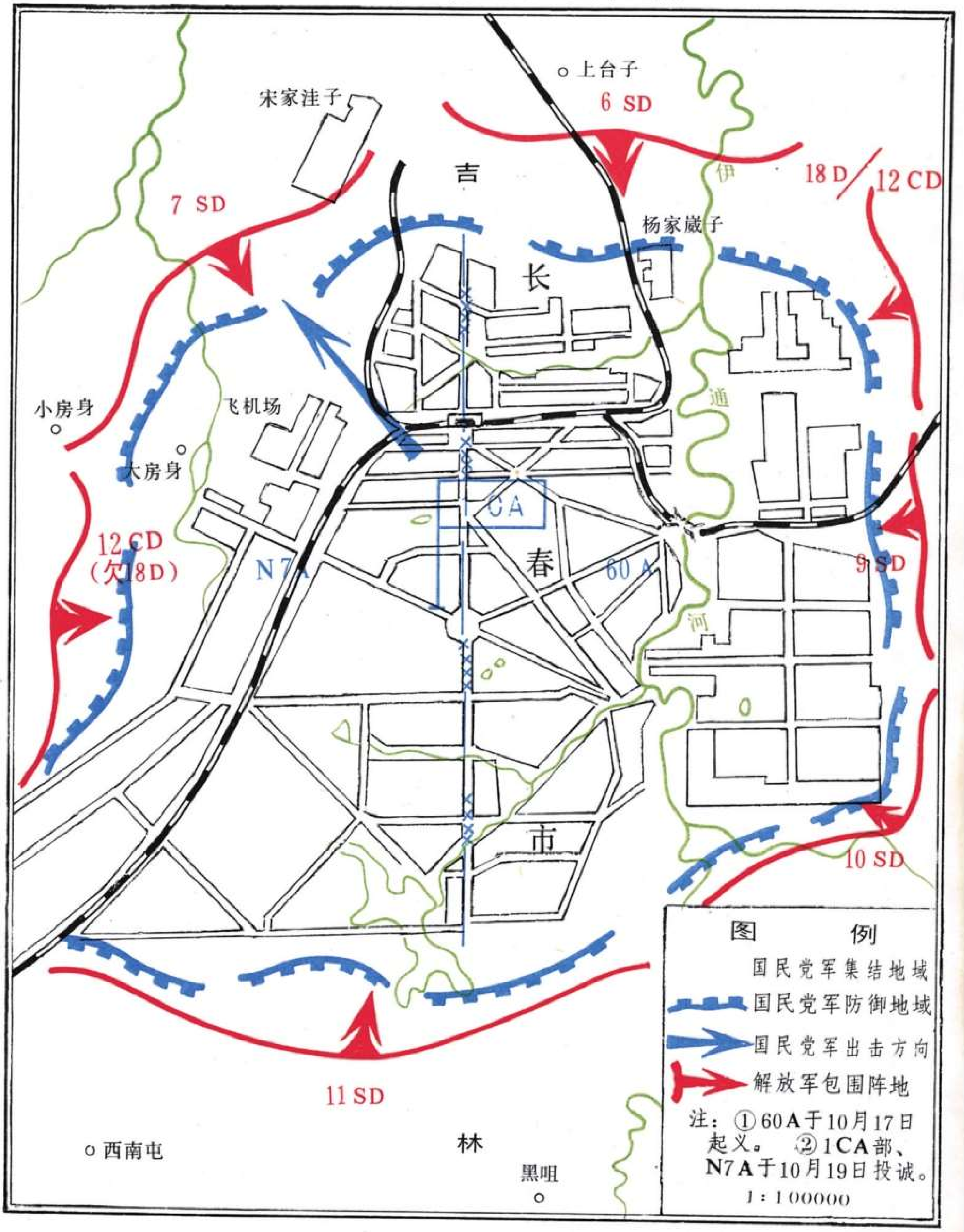
（1946年12月）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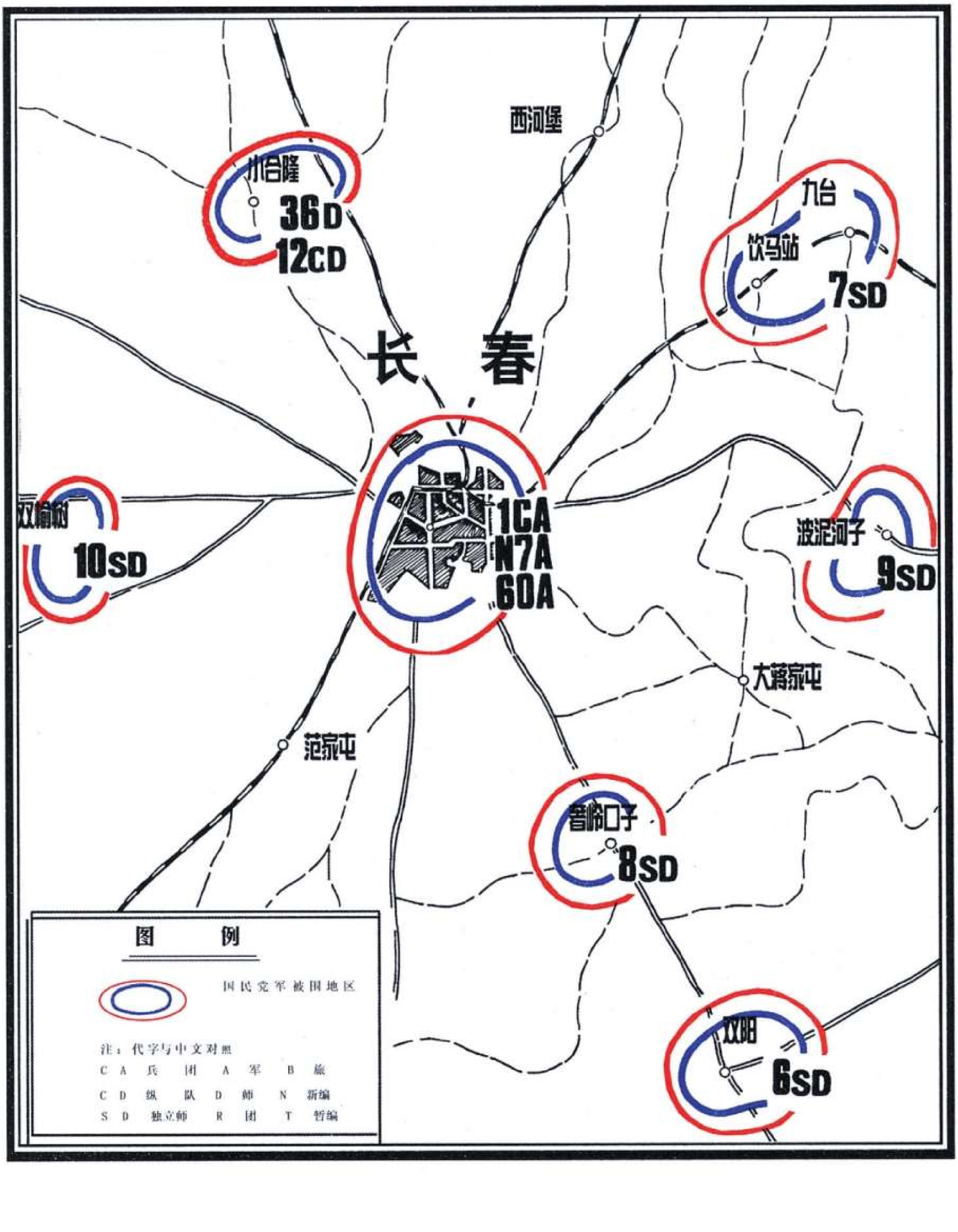
第一兵团固守长春示意图

1948年5月26日—10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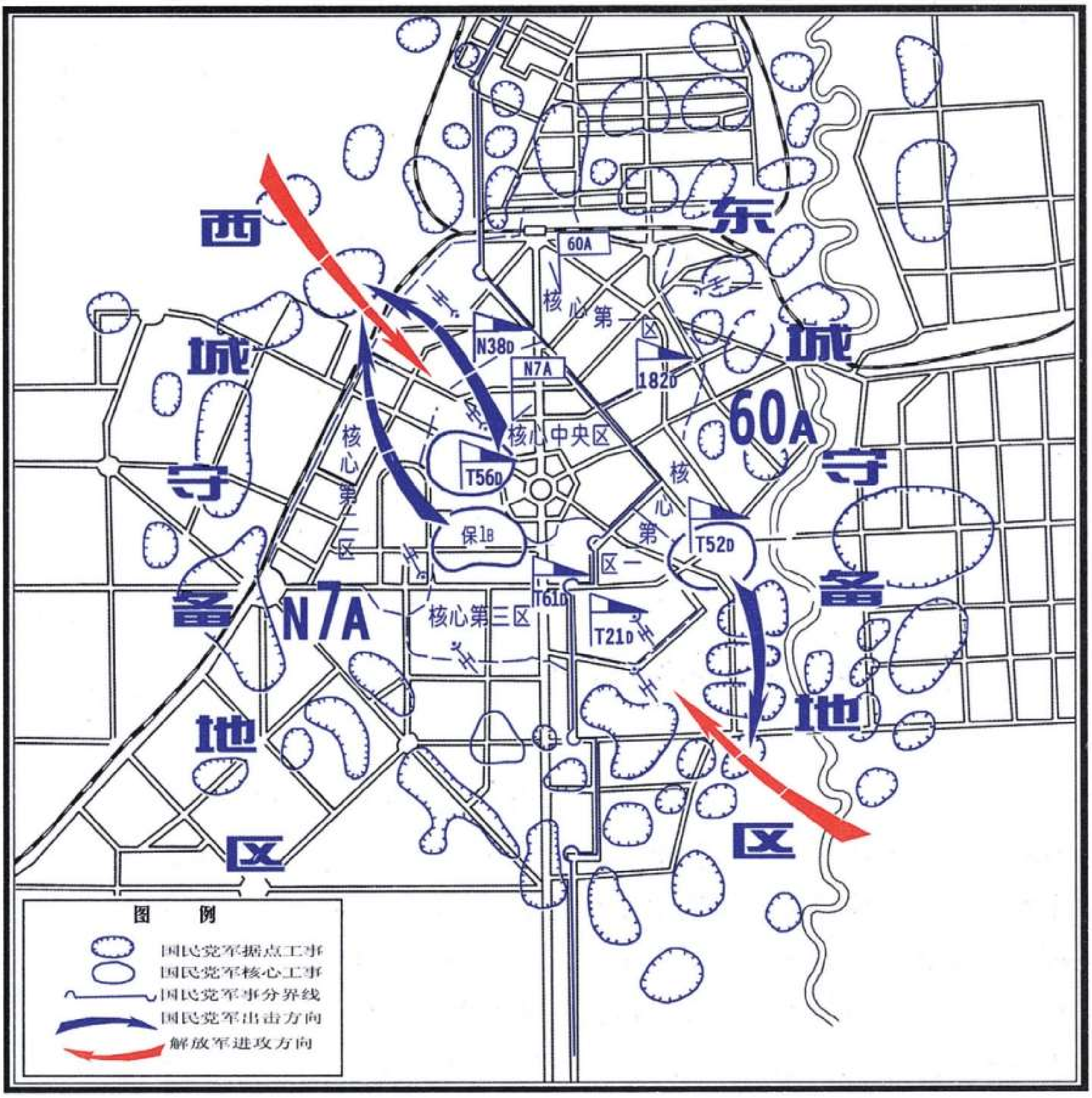


围困长春敌我态势图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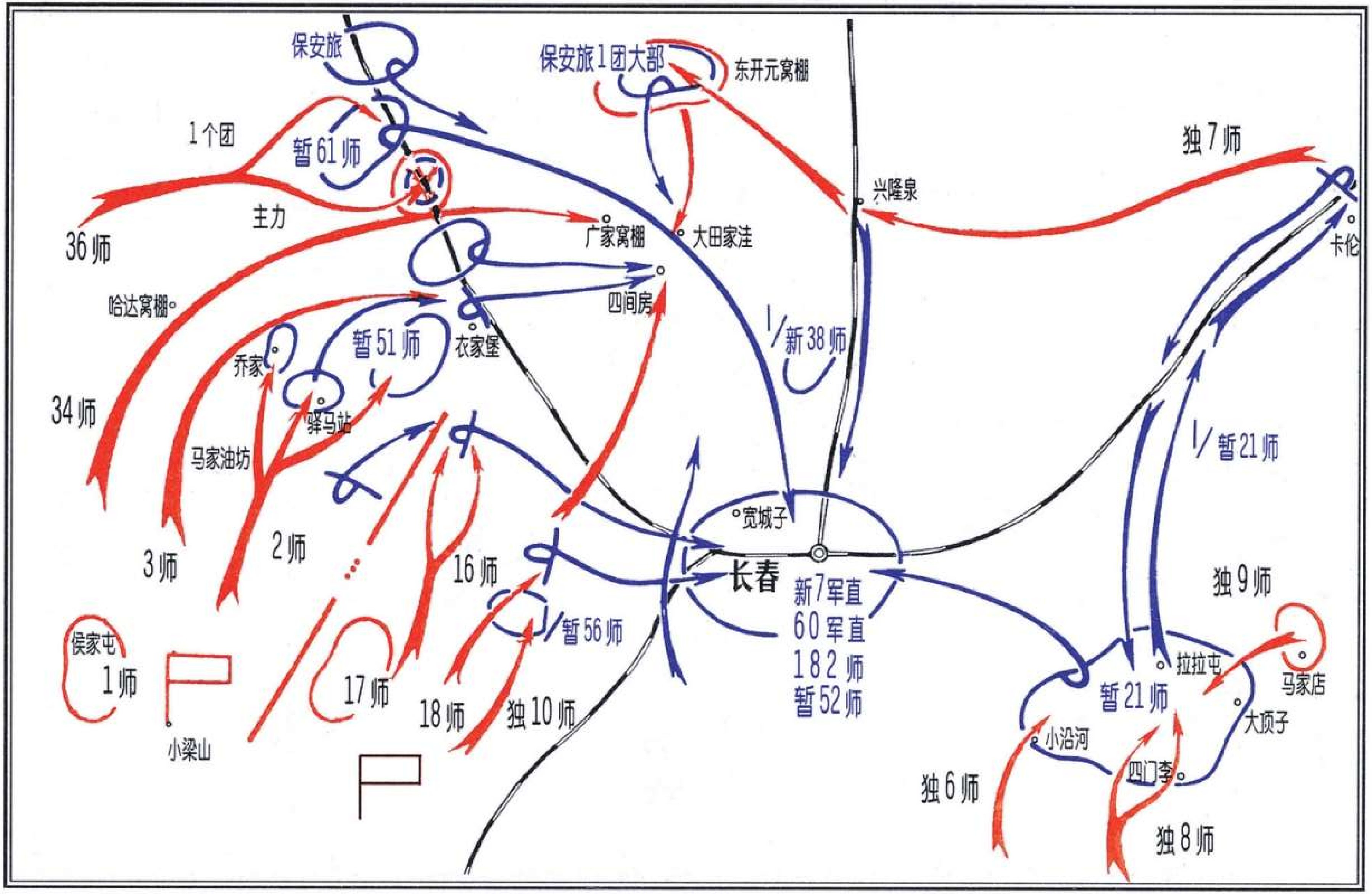


东北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守备兵力部署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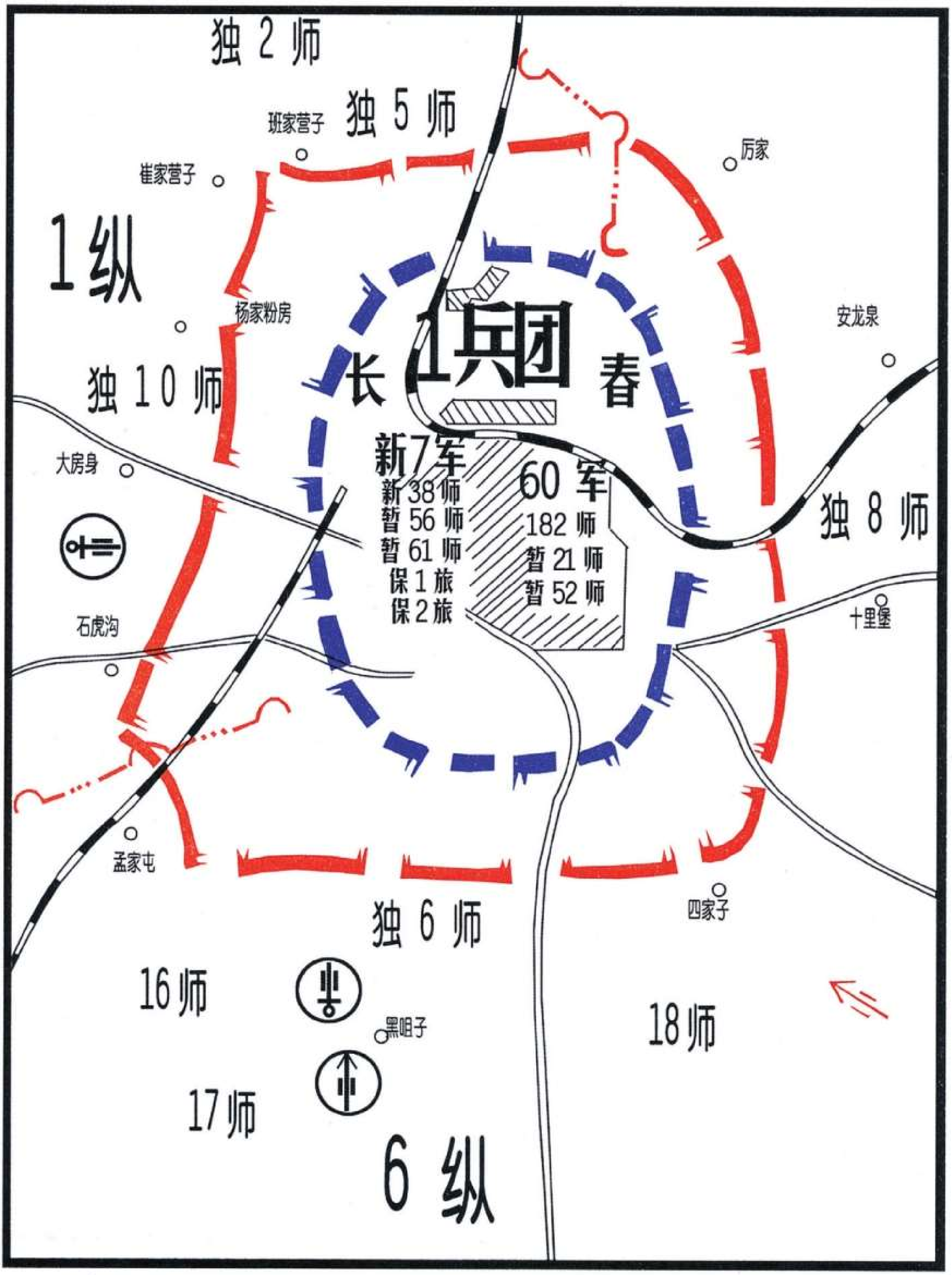
长春外围战斗略图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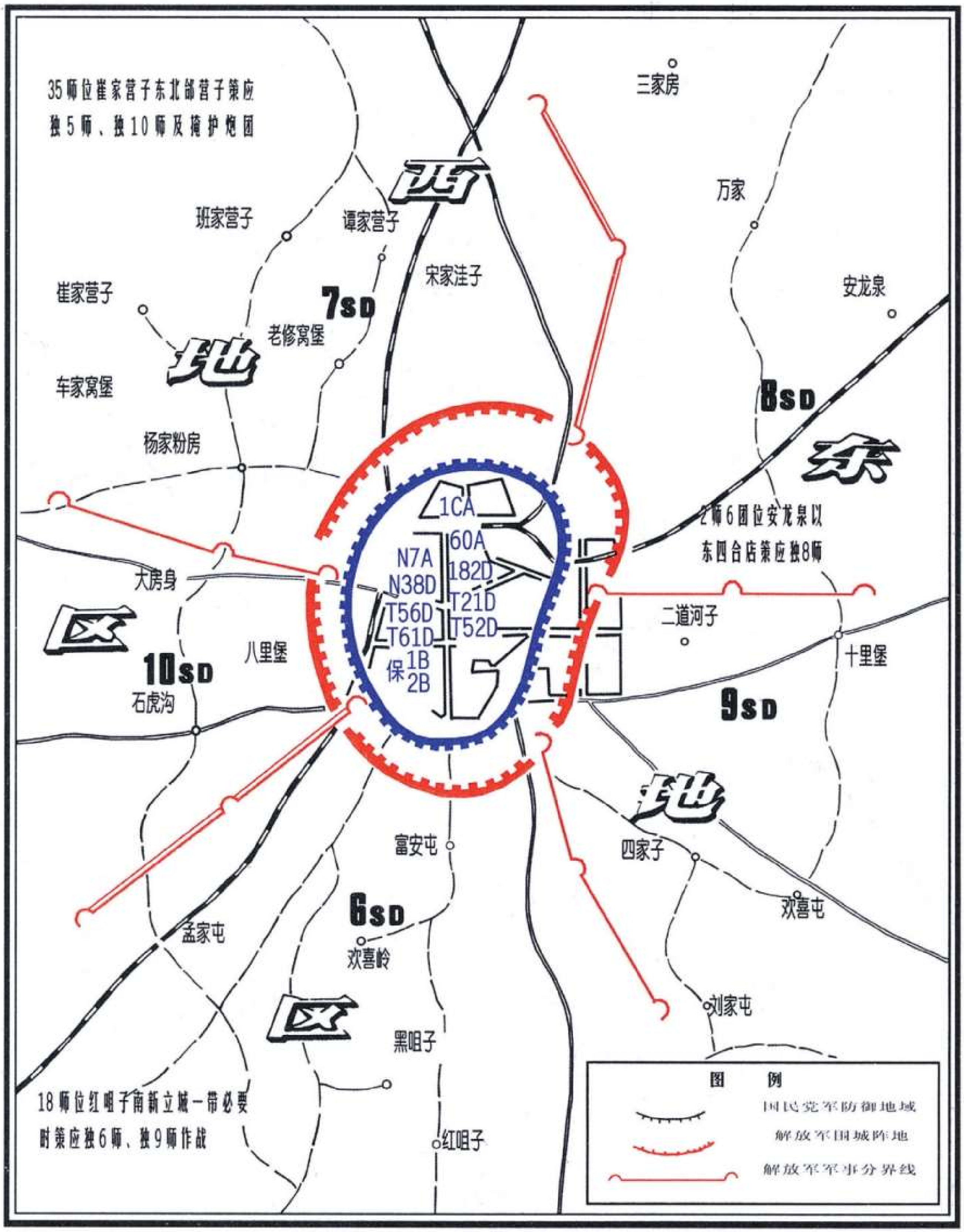
围长部队前进位置略图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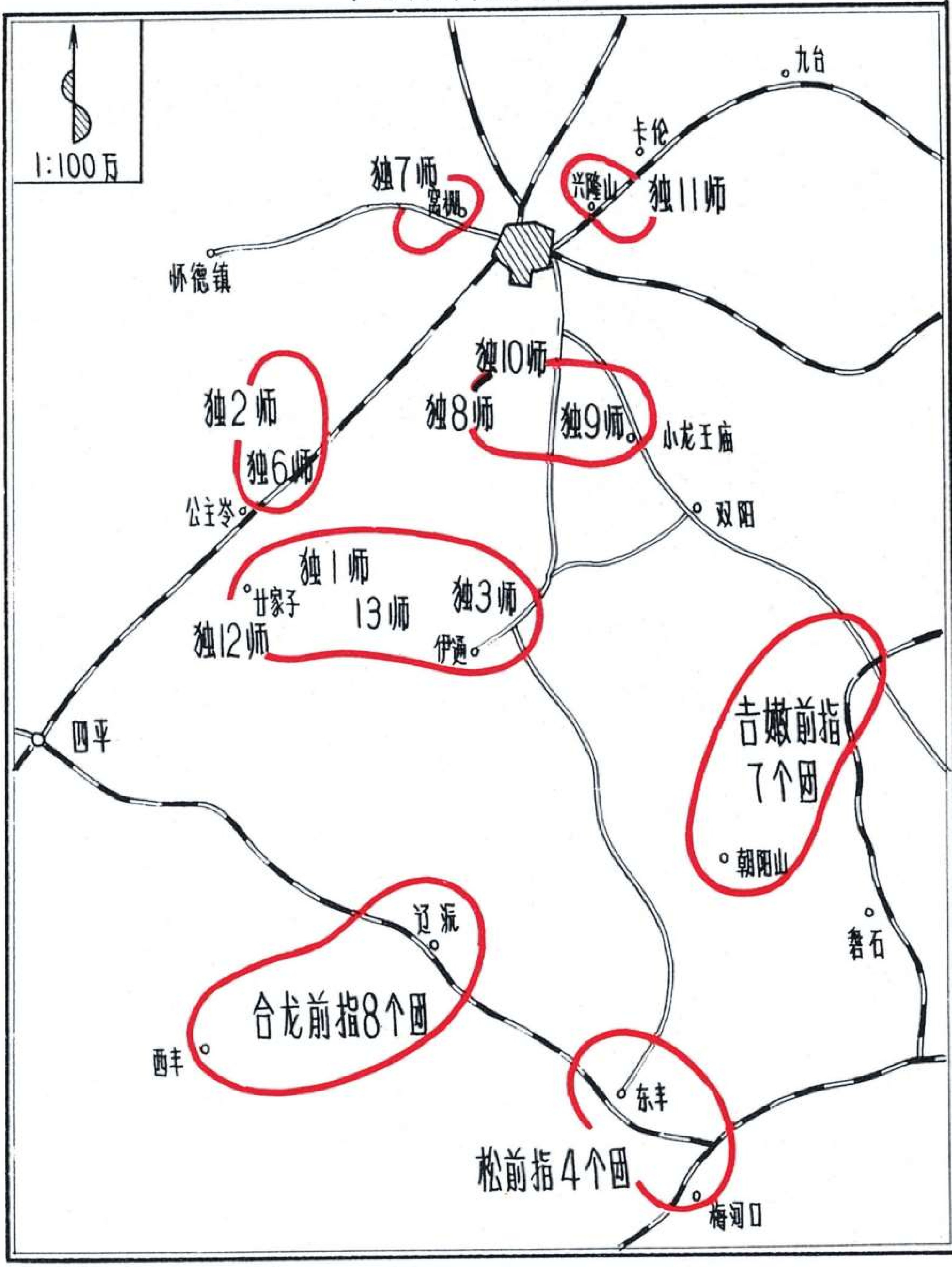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 围长部队部署示意图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一兵团所属部队部署图

(1948年10月9日)



注：第 34 頁至第 40 頁地圖均源自《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 主編，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版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又稱國共戰爭，是中國自民國建立以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為爭奪國家政權而爆發的內戰。整個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27 年至 1937 年間之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階段則是 1945 年至 1950 年大戰結束之第二次國共內戰。

1927 年 4 月，正值北伐期間，國共矛盾激化，因而蔣介石在南京宣佈清黨。同年 7 月，汪精衛領導武漢國民政府宣佈分共，中國共產黨與原有合作關係之中國國民黨決裂，開始建立自己武裝力量與地方政權。1928 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建立之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中國，之後先後五次圍攻在南方之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1934 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中國國民黨成功佔領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長征，於 1935 年抵達陝北。1936 年 12 月，發生西安事變，國共雙方在日本侵略中國下停止內戰，達成合作抗日協議，雙方皆編入國民革命軍編制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中央軍精鋭則包圍陝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則以敵後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敵後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多次軍事衝突。

1945 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國共雙方更在 1946 年全面開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瀋、淮海、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在東北與北方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至 1949 年已控制長江以北所有省份，並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整個中國大陸。而國民政府在 1946 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 1947 年改組為行憲政府後，因其領導之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輾轉於 1949 年 12 月撤退至臺灣，有效統治範圍最終限縮至台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1950 年後，雙方仍有小規模交戰，至 1979 年雙方停火後，大致維持相隔臺灣海峽分治的統治格局至今。

國共內戰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共產黨除了將國民黨擊敗，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圖取代原有的中華民國國家體制，造成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相隔臺灣海峽兩岸分立分治的局面。

（錄自維基百科）

1945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東北行營進駐長春，國共兩黨開始公開對長春以及東北地區進行爭奪。

1945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宣佈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開始著手軍事工作的具體部署。

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統一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彭真為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為第二政治委員。中共軍隊改名東北人民自治軍，是為隱蔽中共覬覦東北的勃勃野心。

1945年11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指示中還稱，党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要動員一切力量深入國民黨無力深入到的小城鎮和農村偏遠地區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激發群眾起來革命，組成民兵、游擊隊和自衛軍，穩固中共的地盤，配合正規軍消滅蔣介石的軍隊。

1946年3月，蘇軍開始撤離長春前夕，中共中央電示東北局，在蘇軍撤離前，與蘇軍交涉讓共軍佔領長春市和哈爾濱市以及請蘇軍加撥槍炮若干武裝共軍，並「力爭我黨佔領長春以長春為我們的首都」。

1946年4月18日，共軍佔領長春。

1946年5月23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擊潰共軍佔領長春。

1946年6月，中共軍隊第一次正面進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治區。

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向黨內作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指示：「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

1947年1月，共軍消滅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112萬人。

中國國共內戰大事記

（1945年8月～1948年3月）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

1945年8月9日，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1945年8月10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稱：「打倒這最後一個帝國主義，人類就應該進入建設和平幸福的時代了！」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中共延安總部總司令朱德在日本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國敦促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後，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區共軍對日軍展開全面反攻和受降。其中一道命令是責成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思、方毅部和駐冀熱遼邊區的李運昌部立刻向東北和內蒙地區進發，以「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敵偽軍投降」。由此，中共挑起三年內戰的序幕。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把抗戰勝利的果實比做桃子，並且說：「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澆，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在中國戰區，日本軍隊向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的日本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此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擁有正規軍和其他軍事力量共430萬人，而共產黨擁有正規軍、地方部隊共127萬人。

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並從關內各解放區調動11萬軍隊從水路和陸路秘密向東北開拔。

1947 年 8 月 5 日，蔣介石在給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的電文中寫道：「無東北，則華北無屏障。東北為我惟一之工業區，如為俄共所取，則彼以無量之工業生產，則可侵略中國之全境。如果至此，則遠東無寧日，世界和平亦無保障矣。又遼東與膠東為我國海防樞機。無遼東則膠東不能獨存。山東已失，則華中、華南亦無法生存矣。」

1947 年 11 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新編第七軍在長春組建，以新一軍為基礎，擴編成兩個軍，即：以新一軍之新編第三十師、第五十師和暫編第五十三師，編為新一軍；以新編第三十八師、暫編第五十六師和暫編第六十一師，編為新七軍。

1947 年 12 月 15 日，東北民主聯軍針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發動冬季攻勢。

1948 年 1 月 1 日，經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東北民主聯軍奉命改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同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說：「國軍所付的代價誠然巨大，但是所預期戰略的目的卻已如期完成。關內匪軍因為根據全失，接濟斷絕，就只得被迫分竄，成為流寇。」

1948 年 1 月 14 日，共軍開始針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隊發動冬季攻勢，截至 3 月 14 日佔領軍事重鎮四平，冬季攻勢結束。此時，國民黨在東北佔領區，只剩下吉林、長春、瀋陽、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數個孤立地區。

1948 年 1 月 17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防部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衛立煌被任命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

1948 年 1 月，中共東北軍區政治部任命劉浩為前方辦事處處長，楊濱為副處長，下設敵工、宣傳、俘管和總務四個科。

1948 年 2 月 7 日，毛澤東在東北戰場的軍事力量於全國各戰場取得優勢時，就東北作戰方向電示中共東北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並中央工委的朱德、劉少奇：「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

1948 年 2 月 12 日，蔣介石任命衛立煌兼代東北行轅主任。

1948 年 3 月初，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向蔣介石建議：將國軍撤出東北。蔣拒絕並說：政治上的考慮使他不能放棄長春，長春原為滿洲的都城。

1948 年 3 月 8 日，衛立煌派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趙家驤飛永吉（現為吉林市），下達第六十軍向長春撤退和炸毀小豐滿電站的命令，並佈置秘密撤退事宜。

1948 年 3 月 9 日淩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六十軍等部開始撤離永吉，未執行破壞小豐滿電站的命令，沿途遭到共軍第六、七、八、九等獨立師的阻擊，官兵死傷、被俘、失蹤達三千餘人，汽車牽引火炮和輜重行李大部分丟棄；同日，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十二縱隊組建，鐘偉任縱隊司令員，袁升平任政治委員，轄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和三十六師，三十四師和三十五師為長春西區機動部隊。

1948 年 3 月 11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六十軍撤至長春，與新七軍合守長春。

1948 年 3 月 13 日，共軍歷經 23 小時佔領四平，共軍傷亡數萬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東北只剩下瀋陽、長春、錦州、營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幾片孤立的地區，處於解放軍的戰略包圍之下。處境最危險的就是長春，與瀋陽的鐵路交通被切斷後，全靠空運補給。

目錄

/49 謝辭
/51 肉體證據

/55 「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65 蒼蠅的盛宴
/423 兵不血刃
/427 救生埋死
/441 公開和內部的餓殍人數
/453 清點餓殍
/459 餓殍戰術實施了多久？
/465 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473 餓殍原子彈

/476 附錄
/481 文獻來源

謝辭

寫這樣的書，完全是我自不量力。幸好還有倖存者的見證。

為此，我要獻上深深的敬意。

謝謝倖存者遠藤譽女士同我分享家族過往的沉痛與無言的淒涼。

謝謝倖存者沙秀傑女士，用質樸的文筆讓我領略了難民的自生自滅。

謝謝倖存者范傳華先生含淚與我分享他失去三位至親的揪心之痛。

謝謝陶永芳、范叔寒、馬行健、張德義、武田英克、梅震、李謙、竹中重壽等諸君留下的珍貴的歷史記錄。

當然，還有許多朋友付出了自己的慷慨和熱忱。

謝謝杜婉華老人、Lee小姐、巴丟草先生、阿古智子女士、向曉雲小姐、三千小姐、黃娟女士、Andrew Jacobs 先生、出版人張輝潭先生，還有孫毅、雲昭、喻塵、周起財等老友。

同時，我要謝謝我的父親杜寶賢。銘記他忍受病痛折磨多年，為我頂住來自國家安全局高官的施壓（由於我為美國《紐約時報》做攝影師和寫作揭露中共歷史真相的書），尊重我選擇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我遭到北京市國內安全保衛警察秘密拘捕後，父親默默地承擔著焦慮和掛牽。當父子再次相見時，是一簇新墳與一個兒子的相對，無處話淒涼。請恕我也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請他的在天之靈知道，此書即他的不孝子的工作之一。

感激的話，盡在不言中。

肉體證據

1.

「餓殍都堆成了山。」一個人在多年後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洪熙街卡子的後面，餓殍已經堆成幾座山了。」*

這個寫信的人，是長春餓殍戰的倖存者，也是原來居住在長春市洪熙街的市民。所謂的洪熙街（現稱紅旗街），是位於長春市區西南部的一條數百米長的街道，在長春餓殍戰中，是國軍官兵和長春城內的難民，以及滯留在長春城內的各色人等，南下瀋陽，進入中國內地省份的重要通道。林彪為此對這條通道部署了裝備精良、戰鬥力強的朝鮮獨立師進行嚴密封鎖，將出城的難民截阻在國共兩軍對峙的數百米的空白地帶，這是餓斃難民最多的封鎖地區。根據中共資料和當年媒體的估算，難民死亡人數在八萬至十五萬之間。

二分之一多世紀過去了，那些遭到餓殍戰術摧毀了生命的亡靈，已經爭先恐後地腐爛在中共黨史、戰史、國史，以及倖存者的生理、記憶和歷史之外，從未被計入內戰的非正常死亡之列，像空氣一樣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了。

2.

在這場餓殍戰中，國共兩軍指揮者在做甚麼？在卡子裡和長春城裡的難民遭遇過甚麼？究竟有多少難民被蓄意餓斃？國共雙方誰應該承擔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作為一個人，這是我的疑問，也是我寫作此書的緣起。

當探訪倖存者不盡如人意後，我開始去蒐集倖存者和親歷者寫下的文字。總而言之，呈現在此書中的某些發現，即是我努力的成果。

洪熙街卡子，是長春餓殍戰的代名詞。我從洪熙街卡子裡的倖存者

* 遠藤譽所著回憶錄《卡子：出口なき大地》，（東京）讀売新聞社，1984 年版，引語系向曉雲翻譯

的視角深入這場戰爭的內核。雖然他（她）們現身於某個時間點上僅為一個孤證，但也為這個世界提供了人間地獄的一瞥。

與此同時，我還使用了國共兩軍的機密電文與作戰會議的秘密講話、官方公開與內部的出版物、軍方的陣中日誌與內部資料、未能寄達的國軍官兵家書、親歷者的備忘錄、中華民國時期報刊的新聞報導等方面的見證史料，來審視這場手足殘殺的血腥內戰，以及餓殍戰術是如何策動、部署、指揮和具體實施的，又是如何將數十萬清白無辜的難民變成餓殍的。

在此書中，我遵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每段文字都有依據、每句引語都有出處。

鑒於某些見證史料的珍貴和稀缺，還有其中令人驚駭到窒息的細節，我極為小心謹慎地對待，不去改變其語境，更不進行轉述，而是直接摘引，讓文字自己去述說。我認為，透過這些罕見而又震撼的證詞，可以看到餓殍戰背後隱藏著的邪惡而又反人類的歷史真相。另外，為了接納抵達戰爭現場的更多細節，我採取了「編日史」方式，逐日來展示餓殍戰造成的城外屍橫遍野和城內餓殍遍地，以及萬籟俱寂的無人區。

當然，還是留下了很多遺憾。由於這場內戰的餓殍問題是中共高度敏感的議題，以及對相關檔案史料的嚴格束縛和刻意遮蔽，尚有許多關鍵性的決策內容，我們都一無所知的。

3.

在今天，餓殍問題依舊是籠罩在長春人心頭的一道長長的陰影。這個陰影，從房地產業可見一斑。那些建在當年卡子裡的難民大量餓斃之處的商品樓，售價相對城市其它位置的樓房要低廉一點，但購買者還是覺得風水不好或者有所顧忌。在長春城北，曾有某人購買了一套樓房，一層還贈送小花園。在其整理花園時，挖出了一些餓殍的骸骨。某人跟其朋友調侃說：「我買的是二層，地下還住著一層死人呢！」

這場餓殍戰造成的創傷，因為時代的動盪而無法量化。但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是不可能遺忘的，對日本倖存者遠藤譽來說即是如此。出生在長春的她，在 7 歲時目擊哥哥和弟弟餓斃，也在洪熙街卡子裡親歷了無以名狀的饑餓與死亡。童年的恐怖經歷如噩夢般已經伴隨著她數十年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仍在「持續」。「國共內戰目前還沒有結束。」

國共內戰永久地在殺戮中。

「有組織的饑餓計劃是一種強大的具有極大破壞力的戰爭武器，它必須在極廣泛的範圍內使用並能獲得最好的效果。」

——約祖阿 · 德 · 卡斯特羅 《饑餓地理》

「饑餓。大規模的饑餓已經進入了殺人武器的行列，被認為是一種現代的、隱形的、重要的殺人武器。」

——A · 阿達莫維奇 Д · 格拉寧 《圍困紀事》

「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國共內戰……中國最老的敵人是饑餓，和最新的敵人共產主義已經會師了……」

——《紐約時報》社論 1949 年 8 月 13 日

每一步都踏在人的骸骨上。

當長春城像刀子般立在眼前時，林彪內心在琢磨甚麼，我們近乎一無所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作為一名常勝將軍，他不可能不會想到四平攻守戰*給他帶來的奇恥大辱。

作為中共軍隊在東北的軍事和政治上的最高統帥，如何奪取長春城，無疑是林彪殫精竭慮的戰事之一。由於林彪後來在與毛澤東的權鬥中死於非命而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遺產均被中共刻意遮蔽，幾乎沒有公開的文字可以審視林彪在這場內戰中的所言所想。但是，從林彪的軍事搭檔、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於 1948 年 3 月 4 日在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一窺他的所思所想（此時，林彪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羅榮桓任副政治委員）：「我黨進入東北花了本錢，派了 10 萬軍隊、2 萬幹部，到東北的中央委員就有 20 個，工作當然應該搞好，如果還搞不好，那就應該打屁股。」「最近華北、華東我軍都要行動起來，敵人再想由關內抽調部隊出關已經越來越困難了。在陝北最近我軍又打了個勝仗，打得很漂亮。我們東北雖然也打了不少勝仗，但和他們比起來沒有甚麼了不起。我們有火車，他們是靠毛驢子。我們自己可以造炮彈，他們只能從敵人手裡繳。我們可以成立幾十個團往前線補充，他們沒有，陝甘寧邊區總共才一百幾十萬人口。在他們那樣的條件下能打這樣大的勝仗，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甚麼呢？是『截斷敵人退路，繼續分割、孤立、圍攻敵人，準備吸引和打擊敵人新的增援，爭取全部殲滅進入東北之敵。』」[1]

此時，中華民國國軍在東北的 38 個師 50 萬人，已完全處於被共軍分割、孤立的城市之中。在長春城駐守著 10 萬國軍精銳部隊。武器裝備陳舊落後的共軍，對付武器精良的國軍，一貫採取的策略是在游擊戰和運動戰中從側面來耗損國軍。現在，中共傾盡全力決心拿下物產資

---

* 四平攻守戰，是指中華民國軍隊與中共軍隊在東北吉林省的軍事重鎮四平展開的四次大規模的防禦戰和攻堅戰，兩軍反復爭奪，林彪率領的共軍進行了史上的第一次攻堅戰，雙方投入兵力 40 萬。戰爭從 1946 年 3 月 15 日至 1948 年 3 月 13 日，作為「軍事天才」和「常勝將軍」的林彪慘敗，共軍軍史稱「傷亡總數達 8000 以上」，但史學家認為傷亡至少 4 萬至 5 萬人。這場戰役，令共軍士氣受到沉重打擊，沉重到「連整個東北都險些給輸掉了」，林彪甚至準備放棄共軍在東北苦心經營的地盤哈爾濱，跟國軍進行「運動戰與游擊戰」。後來歷經兩軍反復的拉鋸，最終林彪以慘重代價奪取了四平。史學家認為，國共在四平拿出雙方最精銳的軍隊來廝殺，實質上是為了爭奪長春。

源豐富、背靠朝鮮和蘇聯的東北，是想作為自己與中華民國政府抗衡的根據地，而長春則作為首都。拿下東北的重任落在了林彪的肩上。

至於林彪是何時想到要以餓殍戰術來奪取長春城的，我們永遠無從得知了。餓殍戰術，這種野蠻而殘暴的戰爭手段，在中國 5000 年悠久歷史中數不勝數，而在世界近代史中也不罕見。比如 1941 年發生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圍城戰 **，還有 1945 年發生在中國河北省的永年圍困戰 ***，都是採取將城市圍困封鎖、斷糧且人禁出、以餓殍來迫使敵方屈服的戰爭。總之，林彪的餓殍戰術粉墨登場了。

根據東北野戰軍作戰日誌記載，在尚未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彙報前，林彪即部署部隊封鎖長春附近的糧食和圍困長春城：1947 年 11 月 4 日 15 時 30 分，林彪電令「騎兵師（......）其餘兩個團開長春西面和北面及西北地方進行剿匪和封鎖，斷進入長春的糧柴」。又在 19 時電令「九台、德惠附近之獨立團，設法封鎖長春以北、以東之糧柴進入，我軍決長期徹底封鎖政策」；1947 年 11 月 14 日，林彪指令所屬部隊將九台煤礦「徹底炸毀」及切斷九台到長春的電源線；1947 年 11 月 17 日，已有市民因為「長春煤、糧、水三荒」而有「自殺現象」的記載；1947 年 12 月 20 日，長春零下 30 攝氏度，市民在斷電和斷煤，以及「物價暴漲、人心惶惶」的酷寒中掙扎；1948 年 2 月 26 日，林彪即部署松江

** 列寧格勒圍城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軸心國——德國的統帥希特勒為攻佔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德堡）而實施的軍事行動，「決定從地球上抹去列寧格勒」，圍困從 1941 年 9 月 9 日開始，直至 1944 年 1 月 27 日才最終以德軍失敗而告終，共計被困 872 天，致使列寧格勒地區至少餓斃 64 萬人，被列入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戰役。

*** 永年圍困戰，是指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為爭奪河北省永年縣城而發動的一場內戰。永年縣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匯點，由 1600 名國軍駐守，是蔣介石政權在冀南地區的最後一處重要據點。

共軍在 1946 年 6 月兩次對永年縣城發動攻擊，由於城牆堅固，易守難攻，共軍傷亡六百餘人，於是變強攻為圍困。中共晉冀魯豫軍區指示：一定要做到「困死敵人在城裡，消滅敵人在城外」。為此必須做到：一、加強軍事封鎖；二、開展政治攻勢；三、修築工事，修築圍牆碉堡。並發動周邊五個縣的五萬民工修築了二十五公里的「城外城」，令國軍無法到城外搶購糧食，以便困死在城裡；國軍依賴飛機空投糧彈，空投的糧食全被國軍吞噬。1947 年 9 月 17 日，當空投被迫中止後，國軍只能搶奪民食。而居民只能以樹皮和草，乃至人的屍體為食。後來，無以為繼的國軍部分遭到槍殺，部分被俘，部分投降，「無一漏網」。

1947 年 10 月 4 日，當共軍進入永年縣城時，歷時兩年零五十天，三萬居民的縣城僅有三千人倖存（龍應台，《大江大海 1949》，台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8 月版）。共軍「領導親自出面主持」，將被俘的國軍「當官的都按官階殺了」，官階級別高的指揮員都「讓群眾給活剮了」（《流逝的歲月》，李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1 月版）。

部隊「派小部隊到長春附近封鎖糧食」；1948 年 3 月 13 日，部署各獨立師、松江部隊、吉林部隊圍困封鎖長春城；1948 年 3 月 18 日，決定封鎖長春國軍的大房身飛機場，準備攻長春和打增援。同時指令獨立第五師、第十師向長春逼近，執行封鎖長春任務；1948 年 3 月 25 日，國軍的大房身機場遭共軍炮火襲擊，兩架運輸機被擊毀，一架擊傷機尾。從此，國軍與瀋陽的唯一空中運輸線，趨於斷絕；1948 年 3 月 30 日和 31 日，國軍暫五十六師與共軍獨立第五師短暫交火；1948 年 4 月初，中共東北局、東北軍區召開政治工作會議、省委聯席會議和軍事工作等一系列會議。中心議題是，1948 年的任務是解放全東北，支持全國的解放戰爭，並準備強攻長春；1948 年 4 月 13 日，東北人民解放軍遼東前方指揮所改稱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東北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肖勁光兼司令員，肖華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三、四、五縱隊及遼東獨立師與地方武裝作戰。其任務是準備攻打長春。[2]

林彪的軍隊在擦槍時，中共連死亡人數都預定好了： 1948 年 2 月 2 日，上海《時事新報（晚刊）》刊登源自投誠國軍的一名共軍軍官提供的書面證件情報，證實中共「決定本年加緊血的鬥爭」與「本年革命鬥爭計劃」，「預定將死 1.5 億人，因共革命而犧牲。此項預算，包括清黨及戰鬥直接間接之死亡」。

與此同時，中共地方政府也在磨刀：1948 年 2 月 21 日，中共松江省委關於城市工作方針對長春工作委員會發出指示：必須發動農民群眾配合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斷絕敵人一切供應，號召農民不支應敵人，進一步不讓一粒糧食一根草運進城去，餓死敵人，以造成軍事上解放長春更有利的條件」。

在圍困封鎖長春城一個月後，林彪關於以餓殍戰術奪取長春城的謀劃似乎已確定且不可更改了。1948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及政治委員林彪，東北人民解放軍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東北人民解放軍參謀長劉亞樓，東北人民解放軍政治部主任譚政，七人聯名就關於敵我形勢和攻打長春的意見致電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以及中央軍委。他們在電文中稱：

> 關於東北敵人形勢及我們對於我軍下一步行動意見報告如下，請予指示。
>
> （1）東北敵人主要集中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城市及瀋陽、錦州附近，其他地區皆為我軍控制。長春到瀋陽以北之鐵嶺共 390 里，均為我軍控制；錦州到瀋陽以西之新民共 270 里，亦皆為我軍

控制：由錦州到天津以北之唐山共700里，此路敵交通時斷時通，沿途有16個師分散守備。

(2) 長春守兵為六十軍及新七軍，共6個師及其他支隊、保安部隊約8萬餘人。瀋陽及衛星據點（均在百里以內），共19個師及其各種直屬隊共約20多萬人。錦州、興城、義縣地區共有13個師以上。三處敵人皆築有永久防禦性的鋼骨水泥工事，工程堅固。

(3) 東北我軍在冬季攻勢中共有9個縱隊，最近又將各地獨立師新編成3個縱隊，共12個縱隊。另新成立了16個獨立師。在上述兵力中，能擔任在攻堅戰和野戰中骨幹者，約有8個師。

(4) 估計敵目前在東北基本方針為集中兵力固守瀋、長、錦三大城，藉以阻止我軍入關並企圖利用遼河、太子河的掩護，經遼中、台安相機打通瀋陽、錦州間的汽車路的交通。

(5) 我軍目前正在進行政治整訓，本月底可結束，然後擬以半個月時間進行軍事教育，加強攻堅戰鬥的學習，發動群眾路線的練兵運動。然後集結冬季攻勢中原有的9個縱隊，擔任攻長春和打援。以7個縱隊的兵力攻城，2個縱隊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其他新成立的3個縱隊及獨立師，擔任錦州、瀋陽間，瀋陽、四平間沿途箝制敵人。

(6) 作戰計劃：第一步實行圍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時間，進行攻城作業和各種攻城準備，並掃清周邊。在此期間，極力吸引瀋陽敵人北上增援。如敵增援，則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戰中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殲滅敵人；如敵不增援，則我軍即對長春發動全面總攻，計劃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時間內全部結束戰鬥；在總攻擊發動後，戰鬥已進行到重要階段時，估計屆時瀋陽之敵必利用我軍消耗與疲勞大舉北上增援，則我軍仍堅持將城打下。以2個原有的縱隊在鐵嶺與長春之間阻擊敵人。

在這份請示報告的電文中，林彪等人還稱，對其他的作戰意見也曾經深入考慮過，「均認為不甚適宜」。所以「目前只有打長春的辦法為好」，並準備以4萬人的傷亡來完成戰鬥。

在等待中央回覆意見時，圍困依舊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獨立第五師、第六師、第七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皆逼近長春附近。1948年4月19日，林彪的司令部作戰日誌中稱：「近日來，長春每天有二、三十人逃亡瀋陽，已被我軍扣留二十餘人（一縱報）。」而林彪則電示：「長春敵近有計劃地派遣大批人員南逃，應到處盤查。」

在四天后，即1948年4月22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復電林彪等人，一方面同意打長春的意見，同時指出南下北寧線（北寧線地貫遼西走廊，西起北平，東至瀋陽，全長八百多公里，沿線有天津、塘沽、昌黎、秦皇島、山海關、錦西、

錦州等重要城鎮，是連接關內外的重要陸路通道）作戰的重要意義。

從此開始，由林彪的司令部作戰日誌的記載來審視，林彪策動和部署的餓殍戰術已逐漸成形：

1948 年 4 月 24 日，總部電示：「長春之敵四處搶糧，並未見我獨立師嚴重打擊，對今後作戰頗為不利。各獨立師必須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長春城郊二、三十里隨時打擊搶糧之敵，嚴格禁止柴糧入城。各部應隨時電告，並每個禮拜作一次總報。」

1948 年 4 月 27 日，長春每日有四、五千市民紛紛向南逃。

1948 年 4 月 28 日，十縱報：長春南逃人員，已查到有青年學生 100 余人。

1948 年 5 月 5 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奪取長春作戰計劃向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提出三個方案：「1）目前即攻取長春；2）以少數兵力圍困長春，封鎖糧食，主力移北寧線及熱河、冀東地區作戰；3）對長春採取長時期的圍城打援，以兩至四個月的時間進行準備，然後攻城。」

1948 年 5 月 6 日，林彪的總部電示其所屬部隊：「長春敵庫存糧只夠維持到 5 月。各獨立師應加緊對敵糧食封鎖。」

1948 年 5 月 15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駐長春黨、政、軍負責人鄭洞國決定由新七軍抽出 1 個半師，六十軍抽出一個師，組成突擊隊，試圖驅逐長春西北方面的共軍，使市內免遭共軍炮火的射擊，以減輕對大房身機場的威脅，並乘機到四郊搶糧。與此同時，東北軍區將被俘的國軍原六十軍團長張秉昌、副團長李峥先以放俘形式分批派遣回長春城，開展對六十軍中上層將領的策反工作。

1948 年 5 月 19 日，國軍長春守軍以兩個半師的兵力向長春西北郊進發，企圖保護大房身機場並驅逐共軍圍城部隊於炮火射程之外。

1948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共軍出動多支部隊攻擊長春出城的國軍，並多處設伏試圖切斷支援長春國軍部隊的退路。

執行圍困封鎖任務的共軍很忙，而長春城裡的國軍也沒閑著。在 1947 年 5 月國軍遭到共軍重創後，即開始加緊構築長春城縱深配備的堅固立體防禦工事，已成為具有現代化防禦體系的城市。「（長春的城防，）市郊以鋼筋水泥築成的地堡和地堡群為骨幹，並以用路軌和枕木築成的塹壕與各種掩體同地堡相連接，構成堅固的主陣地。在主陣地外，還利用高地或大建築物設置周邊據點。這些據點，都是深溝高壘，圍著層層的鐵絲網和其它障礙物，這種環城工事的副防禦設施，被稱之為『固若

金湯』。在市區內，則依託高大建築物，增設了永久性、半永久性的並且能夠相互支持的巨大明碉暗堡一百五十餘處，以市中心之中正廣場為重點，層層設防，構成核心陣地，謂之『堅冠全國』。」[3]

1948 年 3 月 25 日，在長春，國軍第一兵團正式成立。鄭洞國兼任第一兵團司令官及吉林省政府主席，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兼兵團副司令，新七軍軍長李鴻兼長春警備司令；在 4 月中旬，由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牽頭，對長春市進行了一次戶口清查和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的市內現住人口數和存糧數，市內存糧，最多只能吃到 7 月底，8 月以後就將斷糧了。

在 1948 年 5 月初，長春市政府當局在市內搶購到糧食 300 萬斤，還把南京市政府存放的 100 萬斤大豆買下來作為政府機關公職人員的救濟糧。與此同時，還派出部隊出城掠奪周邊農民的存糧。

長春市政府當局將從松北五省（黑龍江省、興安省、松江省、合江省、嫩江省）被共產黨統治的區域以及從吉林逃亡流落在長春的大批地主、富農分子七、八千人組成六個志願兵團，作為對抗共軍的後備力量。

與此同時，長春市政府當局還替各級官員填寫假的身份證，蓋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聞記者，也發給一張假的身份證。一名身處長春城的戰地記者後來寫道：「市政府在發假身份證時並鄭重說明：是給大家作為逃難之用，使共匪在進城後，無法根據身份證逮捕公教人員。同時把市政府保留的戶籍冊，也先行燒毀。」[4]

由於圍困封鎖造成市外的糧食不能進入城內，在 1948 年 5 月初，市民的食糧已發生危機了。在長春城內的共軍地下情報人員會議確定，身體強壯能留的則留下來繼續潛伏，身體差沒有條件潛伏的就離開長春。一名地下情報人員後來寫道：「身體好的同志到國民黨軍隊去當兵。從敵軍內部瓦解敵軍，如果國民黨軍隊突圍時，能拉出多少兵，就拉出多少兵到解放區去，吃飯問題也解決了。不能去當兵的，並有家屬的同志馬上撤到解放區，不要餓死，要撤出的同志，馬上走，把餘下的糧都給留下的同志。」[5]

能留下的，都留下來了。能撤走的，都撤走了。既不能留下也無法撤走的，比如說正在生長期中的莊稼禾苗留下會資敵，怎麼辦？

林彪下令堅壁清野，發動「鏟苗運動」。「為了不讓一粒新糧進入市區，林彪部隊將長春城外方圓 40 里的農作物全部鏟光。」一位歷史研究者寫道，「『鏟苗運動』是『糧禁入』方針的構成部分。『鏟苗運

動』的出現表明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決心之不可動搖。」[6]

對具體指揮和實施餓殍戰術的共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來說，除了圍困封鎖長春城之外，按照他的女兒的說法，他還「有著很高的音樂素養」，他擅長吹洞簫和拉二胡。「在解放戰爭圍困長春戰役中，偶有閒置時間，父親經常一邊拉著他喜歡的二胡一邊思考著作戰方案，曲子仍是陝北和湖南的民歌。」[7]

與此同時，一個戰爭宣傳口號在圍城部隊中震耳欲聾：「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於是，一個蓄意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饑餓計劃，作為一種大屠殺的戰爭武器，開始在長春城方圓 45 公里、縱深 25 公里為範圍的區域內鏗鏘上陣了。共軍嚴密封鎖長春城不讓難民通過，任其在眼前化為一具具白骨。而守城國軍不僅將空投的糧食全部充作軍食，還肆意印發紙幣掠奪難民手裡的餘糧，更嚴密封鎖共軍不放行難民出城的消息。

數十萬清白無辜的難民寂靜地遭到餓斃，有的甚至成為倖存者果腹的食物。這些生靈好像從未於人間存在過一樣。

長春城是餓殍戰的試驗場。

蒼蠅的盛宴

許多食人肉的蒼蠅，肚子脹得已寬過了翅膀，
無論牠如何撲騰也飛不動。

（1948.5.23 ～ 1948.10.19）

1948・5・23

中共新華通訊社陝北以「舊中國在滅亡，新中國在前進」為題發表社論，該社論中稱，蔣介石統治 21 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了，「可以肯定地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民就要把這個『行憲政府』及其製造者送進他們自己掘好的墳墓中去的」。

上海《時事新報（晚刊）》長春電：「盤踞長春四週之匪（......）23 日夜 10 時突向長守軍攻擊，一度曾攻入孟家屯附近。市區內可聞清晰槍聲。」

在長春城外，共軍以一、六縱隊之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及獨立第六、七、八、九、十師擊潰長春國軍出動的突圍和搶糧部隊。

中共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司令員肖勁光寫道：「此時，長春周邊戰役已結束，鄭洞國及其 10 萬敵軍已被我一、六縱隊和三個獨立師團團圍住。」[1]

陸路和空路被共軍切斷後，長春對外交通安全斷絕，這就是斷絕糧源的開始。「5 月 23 日以後，孤城長春是內外雙重哨卡，從而形成了兩個包圍圈，裡層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哨卡，外層是解放軍的卡哨，」一家駐長春的媒體記者寫道，「卡哨與卡哨之間有一段真空地帶。這個真空地帶和市內如同兩座人間地獄。」[2]

1948・5・24

中共東北軍區總部在致各縱隊和中央軍委的電文稱：「長春周邊作戰已於本晨 5 時打響。」

為了對空實行封鎖，打斷國軍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共軍集中大部隊從東、西、南三面圍攻長春城，猛攻長春西郊大房身機場，將國軍擊退，國軍損失四個團 6000 人，俘虜一名副師長和兩名團長。共軍儘管奪取了大房身機場，但也傷亡 2100 餘人。

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通訊社長春電：「國軍長南殲匪戰場大捷，據軍方 24 日晚發表初步戰果稱：過去 12 小時內，斃傷匪軍 2000 餘生俘 100 餘名，繳獲輕重機槍 15 挺，步槍 200 余支。」

這一次對長春城的攻堅戰，讓共軍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原先對長春守軍仍然具有相當強的戰鬥力估計不足，圍城部隊本身對堅固設防的長春進行攻堅作戰也缺乏充分的準備，尤其是在戰術技術上尚有不少需要改進和提高之處。從而認為，對重兵堅守的長春並非用一兩次強攻就能輕易佔領的。」[1]

空中運輸通道遭到切斷，是國軍走向失敗的不祥之兆。國軍「剿總」中將副總司令、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後來寫道：「這一仗我們敗得很慘，不僅糧食顆粒未得，部隊也遭到嚴重損失。（......）最糟糕的還是機場丟失了。從此，長春、瀋陽間的這唯一的空中交通也徹底斷絕了。」[2]

鄭洞國自 3 月 25 日被任命為國軍第一兵團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後，即開始加強長春城的防禦工事，並四處搜購軍糧。中華民國吉林省民政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後來寫道：「截止 5 月 24 日，共購軍糧約 300 萬斤。」[3]

張英，東北人民解放軍炮兵第四團政治委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寫道：

> 從 5 月 24 日起，敵人空軍不得不採用空投的辦法向長輸入救援物資。空投，在當時要受氣象的支配，風天、雨天、霧天，都難

以實施空投。城內 10 萬守軍，每天起碼要解決 10 萬斤糧食。而天空能見度好時，敵人每天不過飛來五、六架大型運輸機，最多時 9 架，空投糧食二十至三十噸，與其實際需要相差甚遠。如遇陰雨天，則無法空投。對我軍來說，干擾與破壞空投則成為實現久困長圍作戰方針所必須馬上解決的一個新課題。圍城指揮所指令各部隊，廣泛開展用步兵武器打敵機，干擾破壞敵人空投的活動，並明確要求我們這唯一的炮兵團在打擊敵機空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高射炮兵要打，地面炮兵也應採取有效措施對付敵人空投。

為此，團黨委動員全團指戰員積極行動起來，獻計獻策，阻擊敵人空投。團裡命令高射炮連和高射機關槍連晝夜觀察，人不離炮位，及時準確地捕捉目標，做到令發炮響，不准敵機飛臨上空，最大限度地干擾與破壞敵人的空投。（……）每當敵機飛臨長春上空，天上地下槍炮齊鳴，高射炮彈丸在高空火花飛濺，地炮彈丸升高空炸，梯次追蹤敵機，猶如密集的火網，給空投敵機造成極大的威脅。我軍對空火力的加強，迫使敵機不得不由低空（高度 1000 米左右）空投，改為高空（2000 米以上）空投。高空空投很難完成準確投擲，給空投作業造成很大困難。

為了躲避我軍炮火，敵機有時不得不在雲層上盲目空投，結果是一半的空投物資飄落到我軍陣地上。夜間空投時，由於城內缺電和實行燈火管制，地面常以普通燈光或火把指示空投目標，高空觀察非常困難，更難保證空投的準確性。城內居民為了獲得空投的糧食，經常冒著生命危險點燃火堆誘騙敵機，因而有部分糧食落入群眾手中。盲目空投也給居民帶來了災難，砸毀民房，死傷人命的事時有發生。[4]

1948・5・25

東北陷入內戰深淵，人民顛沛流離。天津《益世報》早在5月19日稱，東北難民絡繹逃來天津超過萬人，無家可歸者眾多，「冀平津希望東北限制難民入關」。今日該報自北平電話稱，東北中學生流亡同學會說，「無情的炮火逼著我們到北平，最初在漠淡陌生的環境下，彳亍街頭，過著人間地獄的生活」，他們的境遇「唯有學生肯同情」。

共軍第一前方指揮所朝鮮獨立師*第六師政治部主任江學彬在四十年後寫道：「部隊夜以繼日地構築陣地，搶修工事，做好抗擊敵人突圍的準備。長春周邊殲敵作戰，為圍城戰役鋪平了道路。圍城初期，後勤供應未及時跟上，生活艱苦。有的連隊因糧食接濟不上，即以野菜充饑。郊區群眾更是苦不堪言，糧食被土匪搶劫一空，只得以豆餅、野菜度日。部隊開飯時，一群群小孩、老人經常圍著眼巴巴地要飯吃。」[1]

---

*朝鮮獨立師，是東北人民解放軍所屬的以朝鮮族為主的獨立師，共有三個獨立師：獨立第六師、獨立第十一師、獨立第四師。據中共官方資料稱，獨立第六師，是於1948年1月28日在吉林省九台縣組成的朝鮮獨立師，師長鄧克明，政委鐘人仿，副師長全宇（朝鮮族），師轄三個團：十六團、十七團、十八團和警衛、炮兵、偵通、運輸等分隊。全師共12000人，朝鮮族占40%以上，部隊裝齊員滿，軍政素質較好，戰鬥力極強。5月25日，這個師被調至長春市區東南紅咀子、廣播電臺、二道崗子一線，面對偽滿建國大學、洪熙街、南湖方向，擔任封鎖任務，堵住長春城的中華民國軍政要員和普通民眾南下進入關內；獨立第十一師，是按照東北軍區命令以吉南軍區為基礎，組建的朝鮮獨立師，王效明任師長，張百春任政委，李德山任副師長（朝鮮族），下轄三個團：一團、二團和三團。師、團領導和師、團機關幹部，漢族和朝鮮族各占一半；營以下部隊幹部，戰士除師警衛營外，全系朝鮮族，全師8000餘人。在獨立第十一師組建後，所屬一團在圍困長春時暫歸獨立第六師指揮，一直活動在長春以南地區的洪熙街一帶。1948年9月，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命令獨立第十一師為佔領長春城後的衛戍部隊。在1948年9月30日，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命令獨立第十一師參與封鎖長春的任務，主要活動在興隆山和卡倫一帶，堵住長春城的國軍和普通民眾向東北方向進入九台等地；獨立第四師是於1946年2月組成，歸屬遼寧軍區，師長王之任，政治委員方虎山，兵力達到12000人。

關於朝鮮獨立師，存有兩種有爭議的說法：一是中共稱朝鮮獨立師是在東北的朝鮮族人組建和發展起來的軍隊；二是史學界稱朝鮮獨立師是由朝鮮的義勇隊在中國境內配合中共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在日本投降後，義勇隊隨同中共軍隊進兵東北。按照朱德的命令，義勇隊分成三個支隊「組織在東北之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1949年4月，朝鮮勞動黨中央請求毛澤東將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獨立師調回朝鮮政府。1949年夏季，數萬朝鮮獨立師軍人整建制返回朝鮮，這些軍人成為朝鮮的精銳部隊。

據歷史研究者稱，在圍困封鎖長春中，中共使用獨立第六師和獨立第十一師封鎖長春城南部方向和東北方向的重要逃生通道，軍方似乎考慮到朝鮮獨立師是朝鮮人，可以避免軍隊受到難民們悲苦慘狀的影響和衝擊，以便更好地執行「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

1948・5・26

西安《西京日報》以「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為題發表社論，哀歎中華民族現在「正遭受空前浩劫」，因為共產黨軍隊所到之處造成的災難「令人觸目驚心」。該社論中稱：「共黨匪軍，正在大江以北，大規模的流寇式竄擾，攻城掠地，殺人盈野，廬舍為墟，赤地千里。」

天津《益世報》發自山西太原報導稱，因不堪共匪蹂躪，由匪區逃來我區之難民與日俱增， 在25處收容所接納「難民已達38.8萬餘人」。該報還稱，自4月15日至今，入關東北難民已有2萬多人，東北當局宣佈繼續逃亡的難民還有30多萬人要入關。此時，天津市已有難民8.1萬多人，眼下「東北難民每日賑濟1.5萬人，他地每日3萬供給相當食米」。對於東北流亡學生的急救問題，教育當局「有心無力」，只能「先解決住與求學問題，然後再替流亡學生化緣吃飯」。

在哈爾濱，中共東北軍區發出通知，要求各有關部隊，根據長春周邊作戰與國軍接觸的實踐及對國軍的偵察瞭解，冷靜估量，究竟有無一舉全殲長春國軍之把握。並將有關部隊上報的討論意見呈報中央軍委。

1948・5・27

中華民國政府軍聞社長春電：「長春周邊戰事仍在激烈進行，（……）我空軍機群，連日飛臨長郊施展強大之威力，於公主嶺萬家屯間掃射正在移動中之匪騎兵2000餘，斃傷甚鉅。復於西北郊大房身機場一帶低空掃射匪密集部隊，匪傷亡大半，並炸毀匪炮兵陣地數處。今日上午正在東北郊猛炸匪主力中。」

1948・5・28

新華社陝北電稱，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春季攻勢的第二個階段「1 月殲敵近 2 萬人」。

上海《時事新報（晚刊）》自長春電：「長春周邊戰事仍在激烈進行，寬城子機場仍在國軍固守中，匪數度猛撲，均被國軍擊退。大房身機場惡戰二晝夜，國軍已達成殲滅任務，當將機場設備破壞，主動向新陣地轉退。刻長春空軍正竟日出動助威，向匪猛炸。長北二道溝、宋家窪子一帶，戰鬥激烈。」

上海《糧食日報》以「饑荒：戰亂的溫床」為題，刊登署名為周起鳳的評論。該評論中稱：「中國一部廿四史，等於一部相砍書。並世各國的歷史，雖亦有有治有亂，但戰亂絕無中國之頻仍，承平時間決不似中國之短暫。（……）中國之有信史，至少也有了 3000 年，總結歷朝太平日子不過 200 年左右，還占不到全史的十分之一，治亂發展的不平衡，蓋可想見一斑。（……）當前的戰亂，（……）今日饑民之眾，冠絕各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1948・5・29

在中共統治區哈爾濱，《東北日報》刊登發自圍城前線電訊稱，共軍痛擊出城國軍，在「長春周邊殲敵 6000」。

在蔣介石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南京日報》稱：「此間郵局已停止收寄往長春之信件。又息：長春與此間商電之聯絡亦頗有困難。」

天津《益世報》稱，東北難民來天津日眾，行政當局借撥東北食糧 100 噸發放給已確認的難民。這些難民只能在「沿河空地」搭建的席棚裡棲身。

在哈爾濱，參加 5 月 24 日長春周邊爭奪戰的一縱和六縱，將戰場情況彙報給林彪。林彪認為此時要想速戰速決來奪取長春，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東北戰場倘若失敗，這將給面臨的國共大決戰塗上陰影，影響全國各戰場的共軍部隊士氣和民心。對此，他感到壓力重重。今天，他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報告，闡述長春作戰的意見和想法。他在報告中說：

> (……)
>
> 五、根據敵之戰力、兵力、工事綜合來看，則我軍攻長春，即會付犧牲最重大的傷亡，最後仍可能無法解決戰鬥。此種戰鬥絕非一個猛攻所能拿下，而須逐屋逐堡奪取。非特須長在敵炮火飛機轟擊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隊每連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無力繼續維持進攻；而敵仍能保持半個月城市，使我無法啃下。那時在城內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擊與退出，使部隊實力與士氣遭受重大的損傷。此種結果，對我甚為不利。
>
> 六、24 日戰鬥結束以來，連日我們反復考慮，並經東北局常委開會討論，又照顧各縱、師首長對攻長春所表示的信心並不甚高，因此我們建議改變硬攻長春的決心，改為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準備乘其撤退時在途中追殲該敵，而使我主力轉至熱南承德、古北口一帶作戰的方針。[1]

1948・5・30

天津《益世報》稱，在南京，東北滯留南京國代及立委 80 餘人，集會研討東北當前問題，並推薦代表到國防部請願，「促請以全力確保長春」。請願得到允諾：「政府有決心（確保長春）」。

該報刊登自北平電話稱，有瀋陽返北平的人說，瀋陽糧價暴漲，「人向牛馬爭食豆餅暢銷」，「有辦法難民多回老家，沒有抱負的人都歎息度日」。難民提及下一步的生活，「都哀歎連聲，只有等待運命的清算了」。

林彪還沒等中央軍委的覆電，已決定實施餓殍戰術了，他要把長春困為「死城」。

在哈爾濱，中共東北軍區召開軍事主管會議，會議決定圍困及嚴密封鎖長春，並對所屬部隊進行部署：「（1）使用獨立師以營為單位，接近長春周圍近鄰，堵塞一切大小道路，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制城外機場；（2）以遠射程火力，控制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3）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4）嚴禁城內百姓出城；（5）控制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便即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6）城南、城東歸六縱，城北、城西歸一縱，炮兵由炮司派歸一、六縱指揮；（7）兩個月來幾個獨立師圍困長春成績不大，未看成是嚴重戰鬥任務，無周密計劃和部署，應該改正。要使長春成為死城。」[1]

日期不詳

5月末，在長春城外，共軍將佔領吉林時收容的國軍六十軍軍官眷屬「大人發糧食，小孩發餅乾，並派人護送到長春」，讓這些人去瓦解長春國軍。[1]

日本在1945年8月戰敗後，中華民國行政當局對在長春的日本人進行了遣返歸國行動。日本為此在長春專門成立了「日僑善後聯絡處」，以便關照在該地的日本人。當國共兩黨為爭奪長春而槍炮相向時，日本人大都迫切渴望返回故土。在第二次遣返日本人歸國行動後，長春城內殘留的日本人有300人左右，其中有半數或三分之一在這場餓殍戰中喪命。在這些人中，大多是被中華民國行政當局留用的日本技術者以及他們的家族。在長春城內，一個異國女孩在靜靜地凝視著即將到來的困餓。她將「懷抱著無以名狀的悲痛」，寫下對她有養育之恩的中國的矛盾和糾葛。

遠藤譽，1941年出生在滿洲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吉林省長春市）。她的父親大久保在1937年從原籍日本來到中國，於新京創建了一家名叫「新京製藥」的工廠，生產專門治療吸食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癮者服用的戒毒藥物。她和父、母親以及一個哥哥與三個姐妹生活在一起。她的父親在兩次遣返歸國行動中，都遭到中華民國行政當局以不可或缺的技術人員為由強制留用。

在長春餓殍戰中，遠藤譽一家人困在城內，她的哥哥和弟弟活活餓死。在斷糧和希望破滅後，她的一家人決定離開長春城逃生。時年7歲、正讀小學一年級的遠藤譽，被困在洪熙街卡子的空白地帶，看到無數難民的屍體「綿延數里，覆蓋著大地」。她「露宿於成堆的屍體上，甚至目睹難民之中的中國人，去吃剛殞命的屍體」。

此時，遠藤譽的母親已生下一個男孩。在生產期

間，由於一時陣痛微弱，產婆甩手不幹了，她的母親以為自己不行了。於是，把她的五個孩子叫到枕邊，奄奄一息地說了告別的話，又向丈夫大久保道歉自己要以這種方式先走了。

「別胡說，你要挺過來呀！」大久保嚴厲地說。然後，飛快地跑到外頭去了。過一會兒，他從日本人居住的白菊村請來了一位年輕大夫。這名大夫看著抽搐中的患者安慰說：「馬上會讓你舒服一點。」

大夫用鉗子取出嬰兒，她的母親才保留了一命。剛出生的嬰兒瘦而弱小，但卻是個高鼻樑的漂亮男孩。她的母親給嬰兒取名叫萬代三，愛稱「小萬」，還說：「這孩子長大後，一定會讓女孩子們爭風吃醋啊！」

後來，遠藤譽寫道：

> 哥哥出生的時候，父親做了一首和歌：
>
> ——大久保勳高富士山，譽馨千代萬代傳。
>
> 父親根據這首歌，將我們孩子的名字從上往下排成：勳、高子、富士子、譽、馨、千代次。最後的「萬代」，是留給弟弟千代次之後，必定會來世的最後的一個孩子。雖然不知道為甚麼父親能夠預測到自己會有多少孩子，但父親似乎在許多事情上有著這種力量。[2]

1948・6・1

毛澤東針對林彪給中央軍委關於攻打長春建議改為久困長圍的報告，為中央軍委起草電文，在7時致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詢問長春作戰情況，並請其回答下列問題：

(1) 你們對長春使用幾個縱隊，是否已展開全力攻擊？

(2) 8天作戰我軍傷亡多少？

(3) 長春周邊工事是否均已奪取？

(4) 是否已和六十軍接觸，該軍戰力如何？

(5) 部隊打堡壘戰術是否已由集團衝擊的老辦法，改變為小組衝擊的新辦法。

(......)

(十一) 徐向前同志指揮之臨汾作戰，我以9個旅(其中只有2個旅有攻城經驗)攻敵2個正規旅及其他雜部共約2萬人，費去72天時間，付出15000人的傷亡，終於攻克。我軍9個旅(約7萬人)都取得攻堅城經驗，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大勝利。臨汾陣地是很堅固的，敵人非常頑強。敵我兩軍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鬥爭。我軍用多數地道進攻，敵軍亦用多數地道破壞我之地道，雙方都隨時總結經驗，結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獲勝。如果我軍不惜傷亡，以兩個月時間奪取長春，你們估計是否有此可能？局勢將會怎樣？[1]

20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回覆中央軍委電，回答長春作戰情況和正式攻擊長春的形勢分析：

(1) 辰迥(24日)在長春郊外，我軍以兩個縱隊和七個獨立師殲滅敵外出收糧和控制城外飛機場之敵五十六師、六十一師、保安旅各一部，共6000餘人，我軍傷亡2100餘人。

(2) 從有起，我以一部兵力控制城西和城西北之兩個飛機場。兩個縱隊和一個獨立師主力在長春30里外集結整訓和進行攻城準備。我軍其餘各縱隊仍在公主嶺、伊通以南地區繼續休整。

(3) 這次周邊戰鬥，還沒有同六十軍接觸。六十軍之一八二師老兵很多，戰鬥力較強(尤其在守備中)。暫二十一師在去年夏季攻勢，曾大部被殲過。其暫五十二師則由東北保安部隊編成，戰鬥力較弱，不過(該)軍官兵一部是六十軍派來的，一部是東北地主、憲兵、警察出身的，估計在戰鬥中仍然會堅決抵抗的。

(4) 東北部隊在去年夏季的四平作戰及冬季的戰役，各個縱隊

在攻堅上，有了相當基礎，特別參加突破前沿的組織和實施上。（……）不過進攻長春這麼大的大城市縱深作戰，從去年四平初步獲得戰鬥之經驗還不夠。地道作業在東北作戰中只進行過研究和準備，但還未實際採用過。

（……）

（7）如果我軍正式開始攻擊長春，估計瀋陽之敵，開始時不會輕易增援，必然會在我主力已投入縱深作戰，以及受到殺傷，而且未能解決縱深戰鬥時，才會出動。

（8）東北新、老共十二個縱隊，目前一個縱隊在熱河，其餘均在東北。此次如攻長春，我們擬以新、老八個縱隊直接投入攻城，以兩個縱隊阻援。我攻城兵力與守城兵力相比，不到三與一之比；但即三與一之比，打援兵力則絕對懸殊。故要攻城則不能同時打援，我軍在攻城戰中逐屋爭奪，消耗必大。能否維持消耗到底，而獲得解決戰鬥的結局，尚無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戰鬥末期，連隊人數太少，無力續攻，使戰鬥出現僵持的局面，屆時敵增援，則可能與守敵會合。

（9）目前對長春地形條件還不夠具體瞭解，不知地形條件對我是否有利，須待實地偵察後才能看出。因此，我們對此戰局無最後的確定見解，擬待偵察地形後，才可通過其他條件得出較有把握的意見。[2]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學海在給湖南新市的弟弟學宜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長春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今天報紙又不好看，匪軍仍在圍攻，炮也在響，晚上又在打。長春因匪軍圍困，生活暴漲，糧食甚恐慌。目前高粱米每斤價高達100萬元，大米每斤200萬元，豬肉每斤115萬元，黃豆每斤二、三十萬元，秤的大小和南方差不多，雞蛋11萬5千元1個，其它物價可想而知。窮苦百姓割青草、剝樹皮充饑，並且青草可吃的也賣三、四萬元1斤。部隊軍糧除以前存糧能食用外，最近10餘天以來，由飛機運送，但飛機到長春上空後，不能降落，只能由空中用降落傘投下大米和麵粉。兩周以來，運來大米和麵粉很多，每次飛機臨空，匪軍就發炮射擊，所以不能降落，並且運輸機還要戰鬥機隨同保護，外地來的郵件，也是由飛機投下的，所以我們要寫信回來就不容易寄出來。我們部隊因為糧食缺乏，自6月1日起，每日吃的飯是高粱米和黃豆。」[3]

青年學生吉凡在給北平的春榮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5天前我本打算走，可是在我要離開長春的前夜裡，城郊的炮聲就響起來了，繼續的炮聲響了四、五晝夜，於是卡哨封鎖，特別戒嚴，一直關到今天。

聽說卡哨開放了，不過適齡壯丁和高中以上的學生還不准出城，這又是一個難題。（......）不過聽人說，現在途中特別難走，到處共產黨，竟用工作方法阻礙青年人南去。他們希望多多的得些青年的力量，所以免不了要受些留難或阻止。」[4]

國軍士兵姚雪中，曾經在抗戰初期即隨軍隊與日軍作戰，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和對日受降。抗戰勝利後，又隨軍隊捲入東北內戰。他在給雲南的親人家榮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內戰之擴大是為所有人民空前浩劫，這種禍國殃民的共匪，實在為人民所不許，國家之敗類。國家元氣未完反而加重，故軍隊無法復員。失業饑餓、父母弟兄妻子離散，觸目皆是，悲哉。東北氣候極寒，物價飛漲，一日千里，情形特殊，有時音信被阻，行動處處阻礙，乃我父母不知此等原因，每接來示嚴厲催速還鄉料理家務，奈我無法遵命，未恐親戚朋友一直評論我之罪過。父母年邁，危在旦夕，對父母不孝真是有罪也。（......）現我在此無事稍為休息，待路上無阻決還鄉，保國還是重要。」[5]

國軍士兵耕在給湖南常德的女友健芳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我因為國難時艱，人的生死是不能預算的。但在我個人是抱著必死的信念，所以環境驅使著我，我不得不將我剩下的幾張照片寄給你。給你作為一個永遠的紀念。一面表示對你的誠心，縱然我倆將來不能相見或相聚，良心上也是足能安慰的了。如果我這條生命能夠保全，這便是我的萬幸，也足能如你的願望。我很感激你對我用心的真誠，你說死也甘心情願地等著我，這話將我的平日不靈的心竟而感動了，我太慚愧，甚至感動得為你而流淚。健芳，親愛的，我好像是個被解放的囚犯，我為了要使你不失望起見，不辜負你對我的熱望起見，我不敢隨便地將你拋棄，我的心永遠地印上了你對我的赤誠的烙印痕，至死也不會忘懷你。可是深處在北國的我，話說回來，我能不能南歸呢？年華易逝，在這兩年以內人的變遷太快，如果我久處軍中不能南歸，在戰火的東北，你又不能北來，你能白白地誠心等嗎？如果你誠心如此地對我，我倒變成了個罪人。（......）當我自己拿鏡去照自己的全身時，我倒無須要人來同情我。因為我已感到的是我還能夠為社會國家服務，一直讓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方罷。這是我最後的希望。」[6]

1948・6・2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稱：「人民解放軍經過 1946 年 7 月至 1948 年 6 月兩年的艱苦奮戰，總兵力已由戰爭開始時的 127 萬人發展到 280 萬人，其中正規軍由 61 萬人增加為 149 萬人，（……）全國解放區的面積擴展到 235 萬平方公里，並擁有縣以上城市 579 座，分別占全國總面積和城市總數的 24.5% 和 29%。解放區人口已達 1.68 億，占全國總人口的 35.3%。（……）在兩年的戰爭中，國民黨軍被殲 264 萬人，加上逃亡人數，總計損失 309 萬人。雖經大力補充，總兵力仍由戰爭開始時的 430 萬人下降到 365 萬人，其中正規軍只有 198 萬人。與人民解放軍兵力數量的對比，已由戰爭初期的 3.4:1 縮小為 1.3:1。正規軍中的 249 個旅（師）174 萬人，分別被割據在以瀋陽、北平、西安、武漢、徐州為中心的 5 個戰場上，大部分只能擔任主要城市和交通幹線要點的守備，很難進行戰略機動；留置於後方的 36 個旅（師）23.8 萬人，分散于廣大地區，難於機動。」[1]

在長春城內，國軍陸軍新編第七軍政工處處長楊天挺給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鄭發去電文稱：

> 一，自共匪竄踞長郊並不時窺犯市區以來長春人心恐慌物價暴漲食糧蔬菜上揚尤甚貧困市民咸以樹葉野菜果腹過去之飼料豆餅米糠豆腐渣等亦成多數市民之充饑珍品辰時開始接濟空投物資後物價雖見回跌人心亦趨安定但以杯水車薪糧荒仍極嚴重深望轉請增加空運物資數量以濟眉急而甦民困
>
> 二，由於幣值慘跌物價猛跳官兵伙食除主食可維持外副食已極感困難尤以攜眷官佐自停發眷糧後因調整之薪餉不能按時按標準一次發放生活均陷窘境竟有斷炊數日一籌莫展者生活困苦至此實已不堪言狀現在本軍除已領到分兩次按三月份標準加倍發放之四、五兩月份薪餉外四、五兩月份補餉何日發到迄尚毫無所聞當此將士用命保衛長春之緊張時期拖延薪餉逾期不放實足影響戰鬥意志擬請轉洽簡化發放手續按照調整標準每月按時一次發完為禱[2]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六十一師少尉樊化江在給湖南的父親樊國興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剛剛共軍又攻長春，飛機無處可降落，郵局不通。兒奉令出發剿匪，此次戰鬥比日本人還厲害。兒祖宗之德

被共軍活捉，向頭上打一槍，於是頭部負傷。當時流血過多，已死去，幸而是官長，八路軍就向兒身上打救濟藥針，生命才活。這是兒第二次的出世。兒在東北所受的痛苦，這是青年人應有的。（......）傷口好兒即回部隊剿匪。（......）共軍的組織殺人放火清算與民國 16 年辦農會一樣，共軍區東北人民痛苦不堪，軍隊每天吃豆子，一半高粱。」[3]

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方指揮所電示一、六縱：「派得力參謀檢查石虎溝、孟家屯之分界線，雙方部隊必須銜接起來，以免老百姓鑽空外逃。」[4]

1948・6・3

承德和熱河是連接關內外的戰略要衝。

熱河全省災荒嚴重，100 多萬人受饑餓。承德縣一個月餓死 600 多人。

針對參加圍困長春城的一縱司令員李天佑和六縱司令員黃永勝的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就攻打長春給毛澤東寫信說，如果攻打長春，需要有很好的坑道攻城經驗和相當多的武器彈藥消耗，並提出圍困長春的建議：「（......）長圍，在一定的圈子內，圍死他，使其糧彈俱困，人心動搖時再攻。」[1]

於是，中央軍委電示東北局，對長春作戰問題，要充分考慮朱德總司令的意見，對攻與圍，應權衡利弊，提出自己的看法：

> （一）以兩個或三個縱隊及幾個獨立師攻城，以七個至八個縱隊準備打援，是否可能？
>
> （二）兩種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強攻則用強攻辦法；（乙）不能強攻，即攻佔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後，改用長圍，構築堅陣，以一部圍困該敵，主力休整待機。
>
> （三）你們彈藥方面是否經得起一次大消耗。[2]

在長春市頭道溝東二條 43 號的富源長制米廠，是共軍的地下情報站。他們利用制米業務來搜集國軍情報，並與國軍軍官勾結，倒賣軍糧、抬高糧價、製造民慌。今日遭到國軍搗毀，兩名共軍情報人員在一個月後遭到處決。[3]

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方指揮所電示炮司：「速將三個高炮連調前方封鎖長春。」[4]

1948・6・4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縱 4 日報：（……）孟家屯無部隊（每日出二、三百人），建議六縱派部隊到孟家屯。」[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李建平在給兩位嬸嬸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因為長春激烈的周邊戰，鐵鳥也不能下來了，這可就耽擱了我們的訊息。（……）炮聲槍聲整日地在轟叫著；過慣了這種生涯在戰壕內也能看書呢。」[2]

1948・6・5

新華社華東前線電，山東兵團春季攻勢戰績顯赫，「殲匪 8.5 萬餘名，收復城市 19 座，繳炮 326 門」。

新華社東北總分社電：「記者隨軍行進在長春周邊距城二十至六十里以內，自東南到西北的百數十里弧形線上，親眼見到和聽到蔣匪的末日和哀鳴，也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控訴和希望。在戰馬倥傯之中，雖然所接觸的只是一些零碎和片斷的事情，而可以直接總結一句：在蔣匪末日將臨的掙紮下，長春群眾已像大旱之望雲兒急盼我軍去解放。」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關於進攻或圍困長春方案致中央軍委電中稱：

（一）關於東北部隊行動的問題，有三個方案：

（1）第一個是目前即正式進攻長春。

（2）第二個是目前少數兵力圍困長春，封鎖糧食，主力到北寧線、熱河、冀東一帶作戰。

（3）第三個是對長春採取較長期的圍城打援，然後攻城的辦法，時間準備兩個月到四個月。在此時期內力求爭取打援，同時進行練兵。此期內如未求得打援，那時我新、老部隊經過訓練，戰力提高，同時敵人已久被困餓，估計總攻擊開始後，戰鬥發展必快，則能在敵增援部隊未到前，即可解決長春之敵。

（二）如採取第一個方案，目前即正式進攻長春。則又一個無把握的仗，成功的可能較少，不能成功的可能則較多。我攻城新、老兵力與敵對比還不到三與一之比，而打援兵力只有兩個新成立的縱隊。在此種力量對比的條件下，我攻城部隊在戰鬥過程中力量的消耗，沒有把握能維持到最後取得勝利，而有可能殲敵和攻城一半後，因我各連隊所剩人數太少，出現僵持狀況，日夜在敵飛機、大炮下，遭受殺傷消耗。敵見我力量消耗甚大，必北上增援，我又因阻援兵力不夠，攻城兵力已被消耗，則援敵可能與長敵會合，使我軍不得不退出戰鬥。這種無把握的仗，如在別種情況下，有時仍是可以打的，就是只有半數或三分之一的部隊進行無把握

的戰鬥，即令未成功，仍不致改變全局。但如以全力進行無把握的作戰，若不能成功，則使整個局勢不利。這種無把握的仗，如估計以後形勢大中小勝仗的機會不很多時，有時以全力冒險向城打，則令不成功亦無大妨礙，而可以再經過相當調整後，在下一戰役中尋求小勝，恢復士氣。但立即估計今後難求中小勝仗機會時，則不宜於輕易的打，免得把士氣打下去了，難我恢復的機會。如此次攻長春不成功，將來帶著失敗情緒去執行圍困瀋陽、錦州、天津、北平的任務，是不利的。

（三）如我軍執行第二個方案，以主力南下，則南下主力仍可能撲空，或遇著同樣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敵人，結果也只是能圍困敵人，但這種行動又增加一個糧食補給的條件。現熱河糧食已甚困難，如我軍在秋收前南下，則糧食必更困難。又估計到我軍南下後，長春之敵無疑的會在瀋陽敵人接應下退回瀋陽，但長春之敵只要我們圍困的時間延長，我部隊戰鬥力提高，橫直可以被我殲滅的。如我軍主力南下，則這個橫直可被殲滅的敵人被他逃避掉了。所以我軍去熱河可能造成兩頭失利的結局，並且會感到嚴重的糧食困難。因此，目前也不宜採取這一行動方案。只有在長春敵被殲滅後，由東北到熱河的鐵路公路盡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後，那時我軍以一部圍困瀋陽，主力去熱河、冀東，則較為有利。

（四）因此，我們認為目前以採取第三個方案為好，即對長春採取較長期的圍城打援，並最後攻城的方法，估計敵被困餓到極點時，瀋陽敵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們以長春為釣鉤，就可能求得打運動戰的機會。如能求得運動戰，則對我最有利。如萬一無運動戰可得，則在我軍經過了數個月的訓練，戰術技術必大大提高，而那時敵人經過數月困餓，戰力必大大降低，我軍那時發動對長春的總攻擊，則必能迅速解決戰鬥，則在敵增援部隊未到以前結束戰鬥，而求得攻長春的完全勝利。這一行動除多費去幾個月的時間以外，沒有其他壞處，但能有把握的殲滅敵人和拿下長春。如目前即對長春進行正式攻擊，如不能獲得勝利，則士氣、實力損失，絕非短期所能恢復。那時須要等待的時間就比現在用以等待準備攻長春的時間還要長。且目前敵在東北、華北採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針下，我準備現階段上的要對瀋陽和類似這一類的城市除圍困外，暫時別無他辦法，暫時絕無可能進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夠兵力。所以無論主觀上是否急躁，但

結果仍只有採取較長期的耐心的圍城打援，並採取敵糧盡援絕而最後攻城的辦法。同時配合中原戰場、西北戰場運動戰和中小規模的攻堅戰，殲滅敵人，擴大根據地，和配合長江以南游擊戰爭的開展等方面，繼續發展全國戰局。

（五）如以兩個縱隊和幾個獨立師攻城，依據我們過去經驗，如我軍攻擊的路數太少，攻擊面太狹，不能分散敵兵力、火力，則敵必集中機炮火力與飛機轟炸燃燒，與部隊反衝鋒，將我軍打出來，使我軍遭受重大消耗，形成被敵各個擊破，故不宜此法。

（六）東北敵人炮火和自動火器較多，因此火力較強。因此，如我軍佔領半個城市後，即停止進攻，而與敵相持則仍日夜遭受敵之機炮殺傷，使戰力日耗，如此對我當然是不利的。故要打就要打到底，全殲守敵，結束戰鬥，才為有利。

（七）如果軍委同意我們實行第三個辦法，為了分散敵人向長春空運糧食的力量，則東北方面擬同時封鎖瀋陽周邊的糧食。在熱河方面須同時圍困承德，並準備待長春攻下，繼續圍瀋陽或進攻承德。[1]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

（……）

（2）長春之敵，已知我封鎖，近日各處周邊據點均加強工事。

（3）敵機近日仍空運長春，以空投為主。報載，敵將空運瀋（陽）糧食 40 噸、運長大米 300 噸。1 日來機 10 架，2 日來機 16 架，3 日來機 13 架，4 日來機 18 架，5 日來機 20 架，空投大米、白麵（2 日至 3 日共空投 1500 包）。

（4）長春難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經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樹難民無飯吃，搶我警戒部隊飯吃。柏家溝的青壯年夜間從樹林跑出來，（還有）五、六名老弱婦小。[2]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孫中魁在給浙江桐廬的妻子月朗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我家雖然有百多畝田，我分文沒向家寄過，也感覺無臉回家。尤其是共產黨將我家的田完全分了，全家老幼逃在甚麼地方也沒音信，提起來不覺痛哭不止了。我從家出來到現在，並

沒吃過高粱米，現在長春高粱米每斤要流通券4萬元，大米6萬元，豆油3萬元，青菜1萬元，像這樣高的生活，真是難過。可是窮人還不如我們，他們都吃青草、樹皮了。再說到長春燒柴很貴，每天每人要5000文流通券的柴火錢，你看怎麼過活吧。」[3]

林彪、羅榮桓、譚政發佈圍困封鎖長春的指示：

> （一）劃長市周圍50里以內為封鎖區，在此封鎖區內，除軍事所必須者外，應禁止人員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製造通行證及居留證發給人民（軍隊人員外出者由團部發通行證），以便憑證檢查。
>
> （二）在宣佈斷絕對長市商業關係，嚴禁糧食柴草及其它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後（由總部出佈告），凡以上項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但持有證明檔並其所運物資系流向我區者，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藉故留難。其有藉端勒索及不按規定手續執行沒收者，必須從嚴究辦。
>
> （三）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地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但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採取勸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毆打及開槍。
>
> （四）為實行上項封鎖政策，應在各大、小道口設立檢查站，以便實行盤查和戒嚴。除軍隊擔任者外，必須組織人民放哨戒嚴，使敵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此項戒嚴和盤查細則則由當地軍隊會同地方規定之。
>
> （五）勸告封鎖區內前沿地帶的居民，將多餘糧草及暫不需用資料窖藏起來，不要被敵搶去。[4]

在《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中這樣寫道：「東野總部的指示是十分明確而堅決的。在這樣的封鎖之下，長春敵人的日子當然只會是愈來愈難過，長春必然被我軍困為一座死城。」[5]

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電示第六縱：「派一個營去孟家屯封鎖敵人，派得力幹部檢查，不許長春居民出來，增加糧食負擔。」[6]

1948・6・6

廣州《中正日報》以「承德之圍」為題，刊登署名為林沖的評論，該文中稱：「長春瀋陽久圍未下，匪初步西鼓勇蟻赴攻堅，而城終不拔。匪軍頓悟攻堅深犯兵法之忌，遂改變作戰計劃，於是調兵西趨熱河，合圍承德。其戰略最終目的是希望取長瀋兩城，使無後顧之憂，以圖傾師入關，爭中原，渡江南犯。」

天津《益世報》自南京專電稱，一度沉寂之長春，自5日起又告緊張，情勢空前嚴重。共匪萬餘人從長春市郊發動攻擊，「並以熾烈炮火向城南之洪熙街勵志社一線集中猛烈轟擊。自5日下午1時起，至6日上午9時止」，從未間斷。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內，一個女孩忙碌而又仔細地打量著遭到圍困的城市。她將記錄下這段「恥辱和不幸」和「最痛的隱私」。

沙秀傑，時年15歲，居住貧民窟東大橋。她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患病過世四年，與43歲的母親以及五個姐姐、哥哥、弟弟和妹妹一起生活。她除了在街頭賣過香煙、在妓院賣過糖果，其餘的大多數時間是揀煤渣給家裡做飯和取暖用。在長春餓殍戰中，她帶著寡母、弟弟和妹妹身困洪熙街卡子的空白地帶，她們成為經歷了從關卡子到開卡子整整一個週期十四天的倖存者，她的一個弟弟活活餓死。最終她們一家人「爬出橫屍遍野的『洪熙街卡子』」。

當糧食成為緊缺物資後，向自然界乞討成為人們唯一的抉擇。沙秀傑在六十四年後寫道：

> 人們開始吃野菜和樹葉子了。高高的一棵樹，先是捋光樹葉，後再扒樹皮，榆樹皮裡有一層很黏的東西，能減輕野菜的苦澀味，並且很黏滑，應當説當時除了糧食，牠是飲食中的上等品了。可一棵有形有貌的大榆樹，裡層外層全被扒光，樹枝又做柴火，白亮亮得像一個剛被鞭撻過的一絲不掛的身軀，羞辱難當地挺在那裡。
>
> 再後來，實在沒有甚麼可以吃的了，人們就吃從水泥路旁長出來的竹節草。牠的葉子很小，採摘困難，莖又很硬，只好放點麵鹼，用在油漆馬路上摳下來的瀝青塊子當燃料煮著吃，但是最後還是得把纖維吐掉。[1]

在長春城內，一個男孩在學校和家庭之間往返穿梭。他將用數十年的光陰來追憶「一家四口人餓死三口」的傷痛。

范傳華，時年 12 歲，遼寧大連人。他的父親范先珍 36 歲、母親范王氏 40 歲和弟弟范傳章 10 歲，他們一家人在 1944 年隨父親所工作的工廠搬遷到長春市。當長春遭到共軍圍困時，他們一家人輾轉搬家四次，最後搬到市郊海棠街一戶逃難的日本人遺棄的兩間廚房裡居住。自從搬到這兒來後，他們一家人的日子就過得一天不如一天了，不是吃豆餅和豆腐渣，就是吃榆樹葉和野菜。在他們這個臨時的家的窗外不遠處，是國軍挖的縱橫交錯的交通壕。共軍在西郊大房身機場以西向市內打炮，炮彈經常落在他家附近一帶。他在二十九年後寫道：

> 天氣越來越熱，炮戰越打越激烈，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也越來越不象樣子。四肢和臉腫得也越來越厲害了，對繼續活下去的念頭越來越失望了。於是，晚上睡覺也打開窗戶，那時炮火向前延伸了。夜間，雙方進行激烈的炮戰，萬道火光劃破寂靜的夜空，仔細聽八路軍*炮兵的發射聲像隆隆的戰鼓聲，國軍炮兵的發射聲活像破鑼聲。這萬道火光，

---

* 八路軍，即中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之一。1937 年 8 月 22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由原西北主力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改編而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指揮。1937 年 9 月 11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全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把各「路軍」改編為「集團軍」），並下達命令：將八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部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改任總司令，彭德懷改任副總司令。9 月 14 日，朱德、彭德懷發佈八路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的通令。當 1946 年國共內戰時，八路軍這個名字也就名存實亡了，但國民仍以這個名字來稱呼共產黨的軍隊。

戰鼓聲，破鑼聲和炮彈的呼嘯聲交織在一起，簡直是節日的燃火晚會。

我們臉朝西躺在床上，把枕頭墊高些就可以看到這些光景了，有時炮戰持續一、兩個小時，看累了就不知不覺睡著了。[2]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412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一家人和其他五個家庭共二十三口人住在二樓的一個房間，以便使用一個壁爐取暖。

東野是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的外甥，他在戰爭期間生活於朝鮮，因為生活很差，就投奔到大久保的工廠來過活。在長春遭到圍困期間，東野經常將工廠的產品和原料偷偷帶到城裡賣錢中飽私囊，其他工人給他起一個綽號叫「白耗子」，意思是偷盜者。

糧價和物價暴漲，同樣讓遠藤譽一家人的生活逐漸困難起來。遠藤譽得知，放在藥品倉庫裡的製藥原料快要沒有了。

在長春城被圍困時，倉庫裡儲存有很多糖稀，既可以用牠到市場上以物換物來交換較高級的物品，而牠本身又是最好的營養品。她的父親一直珍惜牠，但卻是最先被白耗子處理掉的。在有糖稀時，她的母親用糖稀溶解製藥材料之一的洋菜，給一家人做透明的洋菜羊羹。當沒有糖稀後，她的母親只能用人工的甜調味料甘素和糖精等。甘素和糖精是工廠所制的藥品之一。

洋菜只是直通體內，對身體沒有甚麼好處，不過可以填飽肚子。然而倉庫裡最值錢的甘素、糖精自不必說，連洋菜也沒有了。這樣，變賣高價的東西的錢，陸續消失在白耗子的腰包裡。[3]

1948・6・7

天津《益世報》稱，在南京的東北人士，頃獲長春來電稱：「長春局勢危急，然最堪憂慮者為食糧問題。長市自被圍後，糧價日漲，豆餅已成為奢侈品。多數市民靠豆腐渣度日，多以樹葉代替蔬菜。現市內樹葉已被捋光，且售至流通券 3000 元 1 斤，豆腐渣 1 斤售 4000 元。」

在中共行政和軍事指揮總部延安，由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圍困長春打擊援敵的作戰方案，在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文中稱，中央軍委「基本上同意」阻殲援敵的第三個方案，希望酌量調節攻城與打援的兵力部署，「在某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打援方面（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攻城方面」，「主要應從攻城方法與打援的兵力配備及作戰方法方面著眼」。電文中還稱：

> （6）你們斷絕敵人從地面取得糧食的來源是很必要的，你們必須做到這一點。但是敵人可能從空中取得糧食，城內糧食亦可能不只維持三個月。（……）即使敵人的糧食能維持五、六個月，外面又有強大敵軍來援，我們亦有辦法在三、四個月內攻克長春。
>
> （7）長春勝利將給你們爾後南下作戰逐一攻克各個大城市開闢道路，各個大城市的攻克，將從長春戰役取得經驗。希望你們精心組織這次戰役，預先估計到戰役中將要發生的各種困難，逐步總結經驗，直至完全勝利。
>
> （8）在攻長春的三個月至四個月時間內，你們必須同時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張家口、大同區域作戰，或在冀東、錦州區域作戰所必需的糧食、彈藥、被服、新兵等項補給的道路運輸準備工作。[1]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

> 敵情
>
> （……）

(3) 今日長春市居民外逃者已減少。青壯年趁夜鑽樹林逃出，有上吊死者，有求我警戒讓其通過者。(4) 本日，敵機仍空投，6 日 10 架，7 日 4 架。(……)

決心與部署

(……)(二) 一縱派一科長，六縱派二科長檢查孟家屯銜接地區。

(三) 六縱派參謀檢查獨六師、獨八師（分兩個檢查隊）封鎖情況，(……)

(五) 六縱發佈命令：

(1) 封鎖部隊應視長春封鎖為我軍首要任務，切實動員，認真執行，否則應受批評處分；(2) 白天組織三、五人小組，逼近敵警戒線，不許居民外逃。夜間更應逼近，發現敵人時向天空鳴槍威脅；(3) 營與營間隙，偵察隊要切實活動，以填補之；(4) 宣傳隊要向群眾宣傳，不要進出。發動群眾封鎖，查獲敵資歸群眾；(5) 縱司政組織封鎖檢查隊，輪流檢查封鎖區，司政不斷派人檢查。每日 20 時彙報一次；(6) 教育部隊，不要有片面群眾觀點和同情心，以免妨礙封鎖和殲滅敵人。[2]

1948・6・8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 1 時專電：「長市的守戰，日見緊張，聞匪揚言將於 17 日發動全面攻勢，守軍厲兵秣馬，嚴陣以待。」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據檢查，獨六師封鎖的優缺點：(1) 動員好；(2) 工事修築普遍，但淺狹，欠適用，易暴露；(3) 孟家屯、黑咀子、肖家堡子的前線部隊逼近敵人，居民難通過。」[1]

在長春城內，市政府職員三等巡官翟作璋、二等警長張秀發、陳有萊三人具連保保結：「互相保證均不參加共產黨及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或違背政府之組織，如有違反，甘願受連坐處分。」[2]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少校何恩波在給四川成都的渥弟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長春成了孤島，也許你在報上看到或聽外界的傳說都是相當的嚴重，事實上市內的不景氣也是每況愈下的。但長春在軍事上很樂觀的，以軍事論軍事，我們是希望毛匪來攻，希望他傾其東北全力來攻，我們有堅固的工事嚴陣以待他自來送死，省得將來去找他打，將他十多個縱隊的兵力消耗完了，東北就完全接收。（……）恐慌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糧食問題，米已賣到七、八十萬法幣1斤了，柴火一萬多法幣1斤，老百姓已不少人吃草皮、樹葉，『糧食重於槍彈』，這是長春嚴重問題的關鍵。」[3]

1948・6・9

長春國軍派出兩支部隊突圍，遭到共軍擊退，死傷80餘人。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示一、六縱、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炮司：「為加強攻長春之戰鬥力和攻城準備，決以兩個月時間，進行攻城戰之戰術技術訓練，以少數兵力圍機場及控制機場，主力進行整訓。如封鎖長春之糧食和居民進出，要切實估計：需控制的炮兵陣地及需固守哪些陣地，需要多少兵力及炮兵圍困（幾個獨立師、幾個主力師），請各部速告。（……）」[1]

在長春城內，國軍六十軍少校軍官軍強在給廣西的父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兒自本年3月間到長春之後，即巧遇俗家之女，言談之中，互甚相得，後由朋友介紹經其家庭及本人許可，於4月中旬訂婚，6月5日于長春結婚。自忖兒離家十載年已三十餘歲，今且結婚，父母聞知，定能喜慰欲狂。但兒亦盡一孝之義。」[2]

國軍士兵陳毓坤在給瀋陽的岳母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共軍）每天大炮不斷向市里打。商民早有不幸的死傷了！往往在夜間就佯攻進郊區內部再退去！（……）高粱米今天每斤六、七萬元，簡直無法活下去。最後留用的皮鞋和單衣今天也送賣去啦。現在我已瘦得像鬼一樣。」[3]

1948・6・10

廣州《中正日報》自上海外訊稱：「共匪在過去 24 小時內對長春之國軍陣地施行連串攻擊。當戰事正酣之際，空軍運輸機由瀋陽出動空運糧食與給養，接濟長春守軍。」

由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國國民經濟苦不堪言。在中華民國統治區，惡性膨脹和物價上漲正如國民厭戰情緒一樣猛漲，戰爭的經費完全靠印刷紙幣來維持。以正在流通使用的法幣來看經濟的惡化：法幣的發行量，在 1945 年抗戰勝利時為五千五百九十六億元，到 1948 年 6 月已激增到一百九十六萬五千二百零三億元，增加近三百七十倍。

在南京，蔣介石於日記中寫道：「經濟危險至此，比軍事更是憂慮。」[1]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10 日六縱報：長春周圍 40 里土地大部荒蕪，糧食已被敵劫空，已餓死人。部隊助民搶種，每日節省一兩糧救濟。現發生傷寒、回歸熱、瘟疫等；（二）長春自由馬路機場，已受我六縱炮火有效威脅，近日未降飛機。」[2]

在長春城內，國軍軍官祝純良的妻子張鳳英，她的丈夫曾經參加過印緬戰爭，當時患上了肋膜炎，他在駐守長春時，數年積攢下來的一兩多金子被勤務兵拐跑，「所以一著急就病倒了」。後來，他匯給瀋陽的父母親的生活費也被其他人冒領走了。他著急上火，連同戰事失利，好友唐文超又被共軍俘虜後下落不明，「一個病人如何能接受這些打擊呢」？丈夫在嚥氣前，張鳳英生下的孩子才 11 天。

張鳳英在給瀋陽的公公、婆婆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為了紀念純良，所以給孩子起名叫祝純英。孩子出生時倒很胖，現在我的心不安，奶不太多，孩子瘦了不少，現在因為維持我們母女的生命，每日做點買賣，或替人家做點工來度日。今天高粱米 1 斤 108 萬，豆麵 90 萬，糠 30 萬，樹葉 15 萬，每日所入僅不過幾萬，生活艱難，所有的親戚朋友也時去打擾。在此米珠薪桂之時，外面是奸匪圍困，裡面米無多少，

如果純良不死，每月能得些眷糧，現在是人去財空，一無所有的生活艱難不堪想像。」[3]

國軍勵志社職員錚在給北平的父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長春差不多要像一枝樹葉漂蕩在海洋中，隨波浪之高、低、強、弱而左右其安危。（......）市民在盛食樹葉、樹皮、野草、野菜，（......）自6月3日匪又縮小包圍，連日以山炮向市內射擊，致軍民死傷續出。本社曾落過三次，尤以今天為甚，前第一次落一發，第二次一發，今第三次竟中三彈，致將正在修工事之士兵炸傷三、四人，其狀之慘目不忍睹，以今天計算至少有七、八十發。現長市每處均在匪之炮彈射程內，故不敢說何處為平安，不過長此下去都甚危險。（......）此地匪之工作人員太多，昨晚曾一起捉了九個。他們在編隊冒充國軍，試想炸毀某庫，竟被衛兵一人連射死四人，其他五人亦當場被擒。」[4]

國軍九三八七部隊野戰醫院軍人楊廷彥在給雲南開遠縣的母親及三娘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每逢佳節倍思親。明天是端午，現在兒在寢室裡寫信，但是長春市外隆隆的炮聲，已使人們忘記了顧不及思念遠古大節凜然的屈原。（......）展望西南角遠離的家鄉，突然一陣隆密的炮煙，遮斷了我的視線。生活的逼人，使處在東北的人們透不過舒適的一口氣來。60萬元1斤的高粱，100萬1斤的豬肉，我們已經六個月沒有吃過大米飯。草根樹葉充饑的大有人在。滿山遍野的赤血白骨代替了素稱物產豐富區 —— 東北的大豆高粱，盈野一片荒涼，到處十室九空。國家生命線的東北已變成人間的地獄。環境已使人不可消費。生活指數已提高每個人的警覺。（......）以後航空若無阻滯，自當源源補助。」[5]

1948・6・11

北平《益世報》稱，在熱河省，國軍收復灤平，並在承德周邊擊潰圍城的共匪；在長春，共匪揚言端午節總攻長春，據俘虜匪軍文件中稱：其犯長採用車輪圍困戰法，按自匪於5月20日開始犯長春迄今攻擊達十六次。國軍空運大批糧彈，前往投送。

中共潛伏在長春市長春大學的地下情報工作人員今日「以學生食堂停火為導火線」，煽動學生舉行了一次「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示威」，有500餘名學生參加。長春大學當局「被迫答應了學生的要求」。

在長春城內，國軍上尉梓湘在給湖南益陽的父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長春刻已受匪激烈進攻中。炮彈從頭頂飛過，駐地（市中心區警備司令部）附近前後左右陸續都受到襲擊，生命與生活在威脅中掙扎。（......）與各界除電信及飛機空投外，已斷絕聯絡，信件亦無法寄出。此信未卜何月何日能以鑒閱？（......）烽火的孤島，生活在恐怖空氣的人，是無法得以慰籍的。不敢說我們的生活有黃豆吃就是苦，大多數的人連把街樹的柔葉和青草全都吃光了。生活在這亂世的，豈但是人遭殃，連草、樹亦不可倖免！物價是高得嚇死人（因不足為驚）！白米九十多萬元1斤，高粱米七十多萬1斤，豬肉與米相等，雞蛋8萬元1個，豆腐4萬元1塊，草同樹葉也要5萬到6萬1斤，柴10萬元1斤，其它自然不必說了。將來也許土也要賣幾萬元1斤。」[1]

國軍士兵李如淵在給雲南的宏英小姐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可恨萬惡的共匪，出賣國家，殘害人民，使同胞流離載道，田土荒蕪，屋變廢墟......因此輾轉疆場的戰士，儘管家庭的溫暖可愛，也竭力殺賊救國而自救，俾盡天職于萬一。許多的戰鬥機，護著大隊運輸機，在天空投下朵朵白色蓮花，佈滿了天空；轟隆的機聲，震撼了大地......」[2]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的媽媽經常把雞放到家附近的荒地裡覓食。他的家搬到長春時就飼養了幾隻雞，到1948年春天時，只剩下四隻雞了，雞和他的家人一樣吃糠嚥菜。

他的家坐落在鐵道東側的黃土坎上，比鐵道要高20多米，鐵路西側就是長春火車站的編組車庫。在長春火車站不遠處的東北角，向

南 400 米就是興安橋，國軍新七軍第三十八師師部在他家旁邊，他家的窗外黃土坎佈滿縱橫交錯的交通壕和機槍工事。

今天是端午節。國共兩軍開始炮戰，他家裡的幾隻雞也像人一樣從炮戰中受到了鍛煉。剛開始炮戰時，幾隻雞被嚇得四處逃飛，在多次炮戰後，雞也能適應環境了。范傳華在四十八年後寫道：

> 這天早晨 7 點鐘左右，圍困長春的八路軍炮兵部隊從大房身機場以西向盤踞在這座死城的國民黨軍一兵團所屬部隊開炮了！
>
> 端午節一早，剛打開窗簾，媽吃驚地喊道：「不好了，要打仗了！」
>
> 我們爺仨還沒起床，爹不耐煩地說：「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
> 「不信你就過來看！」
>
> 聽媽這麼說，我們都起來，連衣服都顧不得穿了，跑到窗臺上看。果然是這樣，國軍全副武裝的士兵和騾馬嘶叫聲、汽車轟鳴聲彙聚到一起，熙熙攘攘地從興安橋向西開去……
>
> 我們哥倆連衣服都未穿，一直站在窗臺上看國軍過隊。半個多小時了，媽把飯做好了，可我們還在看，媽催促我們哥倆：「快到點了，吃飯上學了。」
>
> 媽把桌子放好，除豆餅飯外，還有一盤炒雞蛋。這可是件稀奇事。弟弟連忙問媽媽：「怎麼吃雞蛋了，媽媽？」
>
> 「今天是端午節，」媽應了聲。
>
> 「哦！吃雞蛋了！」弟弟樂蹦高了。
>
> 我們全家圍坐在一起。當我們剛拿起筷子要吃飯，忽然八路軍從大房身機場那邊打炮了。（……）這發炮彈就落在距我家五百米的西南方向一座大煙囱旁，距興安橋西橋頭大約三百米處。
>
> 爹見這一情形，馬上放下筷子說：「真的打起來了！」
>
> 我們哪能理解大人的心情啊。我們哥倆的心思全集中在這盤雞蛋上，而不管炮彈的事。
>
> 爹吃幾口飯就上班去了。我們也上學去了。[3]

1948・6・12

中共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發表公報：「承德周邊攻勢任務完成，打下 5 城，殲敵 7000，熱河省除承德外都已收復。」

《南京日報》自北平專電稱，據瀋陽電：長春周邊炮戰益趨熾烈，市內之關東軍司令部落炮彈十數起，匪陸續向周邊陣地竄犯，孟家屯曾一度情況不明，刻仍在爭奪戰中。

軍聞社長春電：「我空軍連日向長春周邊地區猛烈轟炸，摧毀匪炮兵陣地多處，斃傷散匪甚多。」

內戰讓東北人受禍連連，紛紛逃離家鄉，更有眾多民眾逃亡關內的北平。據中央社北平電稱，中央銀行北平分行現每日調用 200 人，辦理東北流通券兌換事務，但因兌換者人數眾多，仍感應接不暇。據該行統計，一週以來兌出金額折合國幣 2700 餘億元，以每日因東北陸空兩路來平之人數言，此種擁擠情形，尚將繼續若干時日。

從今天開始，國軍和長春市當局以「肅清奸宄，維護治安，減少食糧消耗」為由，決定從6月20日到6月末，決定疏散市內人口20萬。

> 《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中規定：被強制疏散的市民，「不得再行入市」，只准攜帶「10日份乾糧及應用衣物」。當局還規定：「為集中強制疏散時，須於當日晚戒備後，由主辦機關秘密執行，並于翌日3時前押出卡哨，送至指定地點。」
>
> 國民黨長春警備部憲兵隊及各警察分局則以此令到處抓人，致使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國民黨軍政當局還欺騙市民說：「七一毛澤東過生日，八路軍開放8天」，而將市民大批趕出。
>
> (……) 據有關資料統計，在長春市民中每一家都有被餓死的，有的全家都無一人生還。開始時，還有人埋葬，後來則暴屍街頭。在東大橋及公園僻處，狗吞鷹啄之餓死屍體臭氣逼人，慘不忍睹。[1]

在長春城內，國軍軍官江子平在給四川的父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男昨日過端午節，長春周邊雖八路軍炮聲隆隆地向城射擊，

但我們還照常依舊風俗，司令部的官佐亦舉行過節的儀式，好像似在家樣的過著端陽景象。吃了幾個菜一湯，並吃了幾個東北風味的粽子，是異常的高興。為甚麼呢？城外很多匪軍用炮轟炸城內，有多少官兵仍在槍林彈雨下而犧牲奮鬥，我們在司令部的官佐尚還過著舊俗端陽隆重的吉日，已算不錯，就在這些地方，可作為安慰。」[2]

國軍某部汽車營一位排副浩在給排長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昨日是端午節，照理每個人都要高高興興地過一天，（……）可是不幸得很，八路連一點享受都不願給我們，居然在國泰電影院裡扔手榴彈來，死傷的人可真不少，弟真不懂八路是甚麼意思，唉！真太殘酷了。」[3]

在長春城外，負責圍城的東北前線指揮所下達為具體執行對長春封鎖任務的指示：

一、在長春東南、東北地區以范家屯、竇家店、大南屯、奢嶺口子、新安堡、郭家店、放牛溝、卡倫、米沙子、萬寶山一線至長春市為封鎖地帶。德惠、伊通兩縣應西與長農、懷德兩縣聯絡商定具體分界線，伊通、雙陽以小河沿安家溝公路而向西沿大頂子山向南為界，雙陽、九台以長春放牛溝公路為界，九台、德惠以興隆山北通往飲馬河之小河為界。總之以不留空隙為原則，各縣分界線可互相商量稍加修改。

二、在此封鎖區域內，除軍事封鎖必須者外，應禁止左右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制定通行證或居留證慎重發給居民，以便憑證檢查（軍隊外出人員由團部發給通行證）。

三、封鎖期間嚴禁糧食、柴草、菜蔬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凡偷運過境企圖資敵者一律扣留，並由縣（或團）予以沒收或處理。但持有證明檔確系流入我區之物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藉故扣留或留難勒索。

四、（略）*

五、凡封鎖地帶之一切大小道路均應設立檢查站施行盤查和

*這一條內容在公開出版的書籍中被省略。

戒嚴，除軍隊擔任者外，各縣應組織群眾的放哨、戒嚴，使敵探奸商及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並應與當地軍隊協商佈置免露空隙。

六、勸告封鎖區域內前沿地帶居民將多餘糧草分散存藏，並挖防空壕溝，免受空襲損失。

七、參照而發動群眾封鎖辦法根據各地區具體情況參照實施之。

這一切封鎖任務是消滅長春敵人最有效手段，各地方、各部隊應認真切實負責執行並發動群眾，實行軍民協同封鎖，才能做到嚴密封鎖。應反對對封鎖任務之疏忽現象，並應在群眾及部隊進行深刻的教育。[4]

1948・6・14

新華社東北電稱，據承德消息：「蔣匪困踞下的承德城，8 萬市民呻吟在饑餓的深淵裡，四郊農民也普遍吃著樹葉和泥土（觀音土）。」

天津《益世報》自南京專電稱：鄭洞國 13 日發電報給東北籍立監委國大代表稱：長春人民已「以草根樹葉維持生命」，「請彼等速向當局呼籲，每日派飛機 40 架向長春空運食糧」。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敵六十一師 300 餘人，騎二團 100 餘人，分別於 14 日 11 時分三路襲占孟家屯，黃昏退去，放出群眾 500 餘人。」[1]

1948・6・15

從 6 月 15 日至 20 日，東北人民解放軍在吉林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東北軍區政治委員羅榮桓傳達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對東北作戰的方針。其要點是：截斷敵人向關內的退路，關起門來打狗；對長春先圍而不攻，待奪取錦州後再解決，一定要把東北蔣軍全部消滅在關外。會議決定，由黨政軍聯合組成圍城鬥爭委員會，貫徹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戰略意圖。並決定成立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任命肖勁光為司令員，肖華為政委，陳光、陳伯鈞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唐天際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會議還決定對圍城部隊進行調整：一、六縱隊後撤整訓，以十二縱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六縱十八師及獨立第六、七、八、九、十等五個師和一個炮團接防。10 萬大軍兵臨城下，圍城指揮所向各部隊印發了長春市區守敵分佈圖、敵工事編成圖，組織部隊開始進行全面的攻城訓練和培訓政治攻勢骨幹。

在會議上，政治委員羅榮桓對行動方針和四個月的練兵進行了傳達與部署，他在報告中說道：

（一）情況

敵人方面：敵在我進攻和他們連續失敗之下，接受了經驗教訓，首先在東北，其次在華北、華東，敵已由分散走到比較集中兵力，依靠大城市和永久和半永久的設施，準備固守城市，利用空軍接濟。去秋敵人接受失敗經驗不夠，下不了這個決心，現在已下這個決心了。依靠大城市堅固工事，集中兵力，主動地與我對抗，發現我軍動作，很快收縮兵力。

在華北，傅作義（華北「剿總」總司令）更採取靈活機動辦法，我集結，他集中，有空子他便鑽。一般地來說，現在打比較分散的敵人，是比較困難了。與敵大城市對抗的形勢是確定了。敵人的總作戰方針，在東北、華北，主要是採取對抗防禦，與我爭奪華中，爭取時間，重新組織訓練後備力量。

我們方面：一年多來勝利是很大的，但我們在繼續前進中，也暴露了弱點，也存在著困難。如現在要對付敵大城市，兵力上不能超過敵人，要有三、四倍於敵的兵力，且要應付增援；其它大規模攻堅戰，在技術方面也有許多不夠，且要有很好的供應線，否則就很困難。在華中我們現在還站不穩定，在西北力量還不很

雄厚，不能大規模南下。華中還未站穩足，土改中完全採取老解放區的辦法，有影響。因此，在戰局中出現好像暫時停止一樣。但這種情況，只要我奪取大城市的條件，或南面站穩足，能很快南下，便會打破的。

（……）

（二）方針和任務

我們在華北，要對付大城市，甚至華北的許多大城都落在我們身上。華北部隊可以南下，甚至往西北轉一轉，東北不能超過他們，剩下的便只有全力對付大城市。而今天我們奪取大城市，有些條件是不夠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應線，要有許多炮和炮彈，要有一定的技術條件，而這些條件我們是不夠的。因此，對付大城市，要採取久困長圍的辦法。（……）有些城市我們是可以打下來的，如長春，我們是要打的。但瀋陽二十幾個師就不一定要打下來，錦州也不一定打下來。因此，許多大城市要採取久困長圍辦法。長春咬緊牙關是可以打下來的，瀋陽恐怕不一定打下來。

大城市不拿下來，我們可以再積蓄力量。（……）在這種方針下，我們考慮打長春問題，我們決定打長春，否則，因別的地方沒仗打，敵人不分散，且長春比較孤立。打長春有三種情況：圍長打援，這是好情況，但這種可能性小。我們現在打，時間長，傷亡大，敵增援，我不能撤下很多主力打援，城市也不能一下解決戰鬥。我們也考慮咬一咬牙關堅決打下來，即使傷亡五、六萬人，補充不起來，解散幾個獨立師補充主力；打的幾個師專門整訓幾個月。但我們為甚麼現在又決定不打長春？因為周邊戰鬥沒有打好，才消滅敵人6000餘人。（……）打長春是第一個大城市，如打不下，影響士氣，也影響群眾。今年災荒及土改中偏差錯誤，刺激群眾生產情緒，打長春拿下來是一個勝利，拿不下來對群眾是有波動的。同時，拿不下來，有些部隊半年恢復不過來，對群眾情緒也有影響。因此，我們想到南面圍承德，奪下承德，並求得大規模打援。但冀熱遼部隊圍承德，只搞到隆化，同時糧食也大成問題，如從東北運，解決30萬人三個月的糧食，便要解決6萬噸的運輸，1500輛汽車，要運兩個月。如運不到，便要被逼分兵，而長春敵人也跑了，搞成兩頭失蹋。要打又是存在這些問題，不打又沒仗打，只好請示中央。第一次總司令來電給予鼓勵，說要打大城市，

「兩三個月打下來就是快的」，其次是打家當（指彈藥），我們考慮是可以打的，但是怎樣打法是個問題，一口氣拿下可能性很小，有人提出先吃肉，後啃骨頭。但去年四平經驗很明顯，一口氣拿不下來便是禍害。有人提出打半邊城，但敵機空襲也不大好辦。

我們提出三條方針：（1）一口氣拿下來；（2）向南去；（3）圍困長春。中央同意我們圍困長春的方法，兩個月的練兵後再打。這在打長春的時間上是解決了，但方法上未解決。（……）因此決定，第一步是圍困長春，大部分主力練兵在秋收前一定要拿下來，解決長春問題。（……）圍困有作用，首先敵人是被動的，精神上是一個負擔。同時增加民食困難，敵也是不好辦的。如果把所有大城市都圍困起來，作用會更大，許多城市要靠空運是解決不了的。

對長春圍困兩月，便會增加敵人的困難，同時，再加以瓦解工作做好，便會創造有利條件。而對我們則害處不大，最多增強一些工事。[1]

東北軍區參謀長劉亞樓在會議上提及練兵的任務時說：「一、二、三、四、六、七、八、十二縱確定為攻城部隊，要著重攻堅練習：說明一定要死拼，準備一比一的比例打下長春，有些連隊準備打掉一半，甚至打掉三分之二；思想上要有隨時抗擊敵人來增援的準備。」[2]

在會議上，有人提問：如果老百姓出城怎麼辦？在四十三年後出版的《羅榮桓傳》中寫道：「劉亞樓不加思索地說：『那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的話引起哄堂大笑。大家都把目光轉向在戰爭中已眇一目的李作鵬（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和周純全（東北野戰軍後勤部第二部長）。羅榮桓示意讓大家安靜，然後堅定地說：『對群眾要收容、安置。』會議決定主要陣地不讓群眾通過，個別情況個別處理，緩衝地帶要疏散。」[3]

日期不詳

共軍長春市地下黨組織配合共軍對長春「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發動市民開展持久的「反饑餓、奪空投」的鬥爭，從內部打擊國軍。

共軍除了封鎖圍城，還在考慮佔領長春後的恢復和建設問題，他們擔心將來戰敗的國軍有可能毀掉城市基礎建設，而供水和排水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必須要搶先把長春供水和排水管線圖弄到手。共軍地下情報人員王連馨在四十年後寫道：

> 獲取供水管線圖的任務，具體是由白鴻林地工小組完成的。（……）白鴻林小組成員中，有一長春大學學生姜法然，1948 年 6 月打入國民黨六十軍五十二師一團，（……）姜法然利用自己出入本團防地方便的條件，將供水管線圖用麻袋裝好送出卡哨，交給在卡哨外接應的交通員，再由交通員送到九台長春工委情工組。[1]

在長春市自強學校，學生和教師也像市民一樣紛紛出城逃命。教師裴素雲在四十四年後寫道：「學校班級一再合併，我校六年級六個班最後只剩下三、四十名學生。國民黨的飛機，每天給死守的軍隊空投武器、糧食，數不清的建築物被空投物砸壞。士兵、老百姓被砸傷、砸死。校舍遭到嚴重破壞，教室天棚砸了好幾個窟窿。」[2]

在長春市東大橋，已經開始餓死人了。沙秀傑寫道：

> 先是老弱病殘和社會底層窮苦百姓，誰家死人了，鄰里幫忙把死者扔到東大橋下的河裡，扔的多了，蒼蠅滿天，惡臭無比。我家住在東大橋附近，應該是地地道道的貧民窟。這裡居住的都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有賣苦力的，還有街頭做小生意的、拾荒的、縫窮的，還有無業者，這些人家大多都是沒有隔夜糧的群體。在長春市被困被餓死的十幾萬人當中，這個群體也是最早被餓死人最多的群體。
>
> 經常看到人在馬路上慢騰騰地走著走著，搖晃兩下就倒下去

了。如果有人給口吃的，沒一會兒還能站起來，千恩萬謝後扶著牆還能走。吃的越發金貴了，站不起來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開始看到馬路上的屍體，人們還能七手八腳地抬到僻靜處，可後來人們就沒有力量抬了，蓋張席子就算完事。可是這些人和後來身穿整齊長衫、橫臥馬路、面向青天、無半點遮蓋的逝者比起來算是厚葬了。

馬路上除了能跑幾輛軍用汽車外，幾乎看不到人力車和馬車。人們餓得渾身無力，自然就見不到人力車，拉車的馬都被餓死了，連馬肉也被人吃光了。行人稀少得一眼就能數出是幾個人，大、中、小學校全部停課放假。小的機關早已關閉。政要部門門前用沙袋圍成很高的工事，還用刺鬼架起了路障，24 小時有持槍荷彈的大兵把守。市面上關門閉戶。如果說還有集市，那就是東大橋有一個不足五米長的糧市，兩、三個人守著半袋糧食或用一個飯盆端著幾個餅子，在交易過程中，都十分謹慎，以防突然來人奪走他們的糧食。也有忍受不了饑餓的孩子突然奪一把生米填到嘴裡邊跑邊嚼 …… 我曾看到一個搶豆餅塊的孩子，他奪一塊豆餅塞到嘴裡後，跪下抱著頭，任對方怎麼撕扯毆打，就是一個勁嚼一個勁嚥，怎麼也不把豆餅吐出來，不知道嘴裡說些甚麼，最後商人無奈地說：「我還沒捨得吃一口呢！」[3]

居民們都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線上。一名被困在城裡的報社記者後來寫道：「摻假的鮮牛奶已經賣到 2000 元 1 杯，牛眼珠大小的油炸糕是 500 元 1 塊，後來又漲到 1000 元 1 塊。當我餓得實在難以忍受的時候，一狠心賣掉我僅剩下的一件呢大衣，得到的錢只吃了兩頓油炸糕就完全報銷了。那時候老百姓早就看穿了國民黨『固守待援』的謊話，為了死裡逃生，都在出賣家當，出卡逃命。偽皇宮前、長江路、四馬路，到處都是破爛市場。把一台鋼琴搬到市場上賣，標價 25 斤黃豆；一件狐皮大衣索價 15 斤黃豆。」[4]

物價隨著糧食的緊缺日日暴漲，民國政府當局開始想方設法掠奪民眾手裡的餘糧。中共長春市委一份內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長春的零售物價總指數若以 1937 年 1 月至 6 月為 1，則 1946 年 12 月為 538，1947 年 6 月為 3019，以後物價高漲得更快。1946 年 6 月大米每斤流通券為 25 元左右，1947 年 5 月即已漲到 55 元左右 1 斤，白麵每袋 3400 元，白糖每斤 400 元，煤炭每斤 8 至 10 元，陰丹士林布每尺 170 至 190 元，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發行面額更大的流通券本票，主要目的是用牠搶購軍糧，（......）本票本來是銀行簽發的一種支付憑據，是持有者向銀行支取現款的票證，是為了減少現金收付，便利結算的一種信用形式；牠不是貨幣，不該作為貨幣行使。但是他們發行的本票卻直接作為貨幣發行。與其説牠完全代替現金作為支付手段，毋寧説是一種強行掠奪的工具。牠的發行既沒有足夠的準備金，又不能兑現，而且發行沒有任何限制。在我軍縮小對長春的包圍圈後，原來賴以接濟糧款的唯一手段 —— 空投票子，此刻已不可能。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實行非常體制：凡軍需款項及政務費用均靠無限制的發行本票來維持。[5]

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利用製造出來的酒，到市場上偷偷出售和交換食物。現在，連制酒的原料 —— 糧食也缺乏了。在榆樹芽被吃光時，遠藤譽和大人們一起去扒榆樹皮。為了減少體力消耗，她們都一動不動地躺著，像鱷魚一樣等待夜晚的到來。遠藤譽在後來寫道：「小萬天一黑就怕得要哭，所以雖然只有一點燈油，母親有時還是給點亮。燈火一亮，躺著的我們心也微微地亮了起來。」[6]

1948・6・16

在中共統治區吉林，《吉林日報》稱，長濬人民不堪忍受蔣匪「饑餓恐怖死亡」的統治，從5月22日至6月12日逃來吉林受到接濟的難民191戶共520人。

天津《益世報》自北平電話稱，東北各地來北平學生日眾，各大中學校已接納逾4000人。

中央社長春電:「套上較大倍數的望遠鏡，透視東北戡亂軍事前途，實並非如最近國內外人士所『相憂』者之嚴重程度。自今年2月，吉林四平兩地國軍主動撤守後，這100天來，各線戰場中國軍的損失為數極小，僅抵過去兩整年中任何時期的犧牲之十分之一二，而共匪卻於同一時期內，在熱西錦北及長南戰場中統計，最少傷亡在6萬以上，（……）共匪其企圖很明顯，想把各據點（長春、瀋陽、錦州）的軍民活活餓死，以達共『枯點政策』的陰謀。但是長春所保有的民食，足夠長時間軍糧，又不斷從空中接濟上來，瀋陽的食糧比長春還要充裕，而錦州則為東北最大的糧庫，故共匪想在困的方面打擊國軍的希望，極為渺小。再反過來看，匪的『枯點政策』施展結果，其本身原始型的運輸補給站的惡劣條件，已自造成困人不成，反被困的顯著現象。譬如長春周邊匪軍，最近半個月來因缺糧，每日兩餐稀粥，士兵過半赤足。每人步槍子彈不足二十發，如此戰鬥力量，不充分條件下膨脹起來的部隊。一旦受到全面痛擊，則不難瓦解。」

在吉林市召開的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司令員肖勁光在關於「圍困長春的任務」的報告中說：「對敵人與對群眾的觀點不同，對敵要打，對群眾是增加敵社會不安。主要是封鎖糧食，不讓群眾通過，主要陣地絕對不讓其通過，個別的看情況處理，緩衝地帶要疏散。」[1]

1948・6・17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4）（……）城內高粱米每斤 8 萬元，有錢無米。士兵每日發糧 10 兩，高粱、大豆各半，無糧則發 5 萬元；（5）敵有計劃向我疏散老、小、婦女，孟家屯、洪熙街已趕出 500 人，田家油房一家 7 人無糧上吊；（6）長春附近八里堡仍有老百姓出來，利用夜間走野路，到卡倫買糧；（7）敵發現我高射炮陣地在西邊，敵機繞去東邊。每次空投前，城內由高炮及敵戰鬥機、驅逐機掩護，壓制我炮兵。」[1]

在吉林省長春縣，縣委會發佈《對封鎖長春的決定》的秘密通知：

（一）提高對封鎖長春的認識及觀點

封鎖長春是消滅敵人的有力工作，使長春內部混亂，以便於我們消滅敵人。這點我們須有足夠的認識。取消過去的慈善觀點，隨便放入放出，不利我們的封鎖工作，使糧食走入長春市和敵特橫行于我區。

（二）封鎖長春的幾項辦法

（1）在長春市周圍，我縣管境內 50 里為封鎖區，東起興隆泉，西至伊通河。

（2）封鎖區禁止車馬通行。軍隊必須有團司令部的護照；地方工作人員及群眾必須有區政府以上機關的通行證。否則一律嚴格禁止。

（3）為對付長春市的疏散人口計劃，各道路口和常走私地方，設檢查站，必須組織群眾放哨，與區村政府工作隊、軍隊配合起來，共同檢查，遇到長春市出來的人，必須阻回，不得出來，進入封鎖區。

（4）各區政府工作隊、村子成立聯防檢查隊，並多設檢查站及發動群眾，共同進行檢查（用各村屯比較好的貧雇中農十數名參加檢查站）。大部要在夜間去搞，工作隊、區隊要分開村屯巡邏檢查，以免發生誤會。

（5）封鎖區調查戶口（限較複雜的屯子），互相保證，不得收留外人。

（6）禁止封鎖區群眾到長春市走親戚，應當斷絕來往。

（7）封鎖區內，村與村之間，無路條者不准通行。

（8）對白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區使用的錢幣）絕對禁止使用，並於市

集時檢查，更要向群眾說明，封鎖長春及停用白票的政策道理。

（9）於封鎖期間，嚴格禁止往長市運輸一切用品糧草等。

（10）在村屯查出資敵者或特務，以及查出不報告或是放過者，都予以嚴重處分。

（11）查出給敵人當諜報者，交給政府處理。

（12）捉住敵人諜報者，獎勵糧食。[2]

在封鎖長春城內糧食的同時，林彪電令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告知部隊開始圍困瀋陽和熱河省省會城市承德。電文稱：「遼吉為增加瀋陽地區糧食困難，分散敵空運力量，決對瀋陽、撫順、本溪、鐵嶺、新民地區進行圍困，禁止糧食進入。規定中長路以西由遼吉負責，中長路以東由肖勁光肖華負責。封鎖部隊主要以地方部隊及獨立師負責，四、五縱也可以參加。瀋陽地區雖不能阻止嚴密封鎖，但必能增加敵人的糧食困難。封鎖辦法：一方面發動群眾；另一方面以部隊各組織幾處至多處的封鎖處理。熱河應封鎖承德糧、柴。」[3]

《東北日報》刊登「長春民謠」：

（一）

小白菜啊 地裡黃啊 長春市里 沒有糧啊

沒有糧啊 人心荒啊 遭殃軍哪 守不長啊

守不長啊 快投降啊 頑固不化 見閻王啊

（二）

高粱葉子 青又青啊 長春市里 不點燈啊

不點燈啊 蔣匪橫行 姑娘媳婦 沒有命啊

沒有命啊 鬧革命啊 裡應外合 攻進城啊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內，國軍兵學研究會以「軍事的觀點」，對長春的安危進行了「剖視」：

如今長春處在「圍城」的境地，每日裡炮聲殷殷，並且時有試探性的襲擊和小規模的哨戰發生。（……）有人認為長春不免一場火戰，然而這是膚淺平庸的看法。若就軍事觀點言之，共軍是無意以軍事力量進攻長春的。我們可以找出許多理由。

第一，共軍不具備進攻長春的條件

（……）按平均統計，在東北的許多內戰例裡，共軍攻城時經常要犧牲三至八倍于守軍的龐大資本。如以長春實際情形言之，共軍必調集五、六倍于守軍的兵力，才具有進攻長春的內在條件。當然這個假想的兵力，當在五、六十萬之間，是相當驚人的了。然而在事實上，共軍是否可能抽調五、六十萬的大軍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因為這個數位包括在東北的全部武力，如悉數調來，那麼，他在遼南、遼北、遼西、錦熱等地的成就，將完全瓦解，並且政府軍必跟北進，所以這個方面必為共軍所不取。至於抽調大批軍隊增援呢？也勢所難能。因為今日共軍在東北的控制區，甚為遼闊，因而加重了防禦的負擔，（……）而遼西、錦熱一帶是東北的主要戰場，也是兩軍生死力爭之所在。這是共軍不能抽調大軍圍攻長春之實際原因。

再就反面觀之，既使共軍真能抽調大軍來攻，那麼將是軍事上的冒險行為，如同孤注一擲。（……）那時至少將有二、三十萬人在傷亡裡消逝，所以「得不償失」。同時這種殲滅性的決戰，固然可以早日結束內戰，然而對共軍卻是不利的。

因此我們認為今日的共軍，並不具備武力進攻長春的條件。

第二，攻堅性的決戰，為游擊戰之忌

共軍裝備較劣，是不利於陣地的決戰的，（……）

第三，圍困是「政治戰爭」

綜觀可知，共軍一則由於策略之所牽制，以及內部因素的貧乏，所以本身並無軍事力量進攻長春的意圖。而上月24日之突襲，實則不過企圖保持枯點戰術的成就而已。如今共軍在長春市周邊，雖然集結大批武力，若依據我們的判斷，其目的是企圖長期圍困，加深糧荒，促進經濟崩潰，人心渙散，更加劇階級分化，挑撥軍民感情，然後企圖在潛伏的間諜及機潛鬥士的領導之下，醞釀群眾暴動而顛覆政府，使政府軍事自然解體。因此，「圍困」是政治戰的號角，決定長春前途，也就是決定鹿死誰手的因素，在於政治而不在於軍事。

如今共軍的軍事行動，正是向此方向走來。他們經常向市區發炮，這是神經戰，也經常用獨立師的小股（頂多不出1000人），輪流突襲，用以製造守軍長期的困惑，並且機動地控制守軍的出擊，（……）。更加緊糧食的封鎖，饑民出境的封鎖，以及對空投物資的威脅，都是這條路線的正確執行的表徵。然而，他本身也有弱點，就是軍需補給的困難（因長春市周邊農村破碎，共軍軍需必由後方運來）和兵力的浪費（減削錦熱走廊作戰的力量）兩點。

（……）長春將是相對安全的地方，長春不會為炮火毀滅，長春不會有巷戰，因為共軍無意以軍事進攻長春（……）在今日的鬥爭課題，則是政治戰而非軍事戰。換言之，就是軍事戰的意義，小於政治戰的意義。[1]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政治委員肖華，在三十五年後回憶圍困長春的原因：

> 我們圍困長春，是從兩個方面估計的：一種估計，我們把長春包圍起來，必然引動瀋陽的敵人出來增援。從瀋陽到長春有600華里，中間的鐵路被我軍掐斷了，敵人只能靠步行、騎馬或乘汽車運動。待敵人疲勞時，在運動中消滅它。如果我軍強行攻城，打下長春，在現代化防禦工事面前，我軍勢必要花費很大的傷亡代價。為了避免傷亡，形成敵人不攻自破，因此，對長春採取圍城打援的辦法，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
> 另一種估計，長春的敵人被圍困得裡外不通，既無糧草，又無救兵，沒有辦法，就得突圍。我們可以在敵人的突圍中，把敵人殲滅。我們採取攻城的辦法，就是把敵人拖垮。這是最基本的目的。如果敵人從瀋陽出來增援，我們就在途中將它消滅。這是我軍擅長的一種作戰打法。敵人不來增援，長春守敵又不敢突圍，我們久困長圍必然奏效。因敵人彈盡糧絕，如處在這種情況，就能順利地把敵人殲滅。[2]

1948·6·18～1948·6·20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

敵情：

（一）一縱三師報，長春八里堡附近，每天均有人到卡倫買糧食，每起五、六十人，利用夜間走野地，用麻袋將糧食背回長春附近，每天均有市民外逃。

（二）十八師報，八七醫院以北未封鎖，每日有糧進城，也有居民由該處外逃。

（三）孟家屯、洪熙街敵我交界處，敵放出老百姓萬余，19日、20日集會向我請願，要求出來。（......）

決心與部署：

（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令：（1）20日19時電第一前指，檢查與調整長春周圍部署，對封鎖機場陣地，必須嚴密，頑強固守。對其它陣地，則以封鎖糧食與行人進出。（......）；

（二）第一前指20日圍困長春部署：（1）總的任務，斷絕敵人糧柴，禁止行人進出，控制機場，不便敵人空運，擾亂敵機空投；並積極殲滅出擾之敵，尋敵弱點，逐步壓縮敵人，完成攻城戰場之各項準備，以造成我攻擊長春之有利條件。[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易永興在給雲南建水縣的岳父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關於返家一事刻下因交通阻礙，長春周邊盡都是匪，一時難以回家，（......）婿自到東北以來，被共匪俘去兩次，但很安全地回來，其只要武器而不要人（......）」[2]

駐守瀋陽的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給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密電稱：近日將可增派飛機空投食糧，還會向長春投送糧款3000億「協助搶購」糧食。[3]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三十八師軍人常紹權在給北平的紹玉姐

姐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到處槍聲聽得清清楚楚，並且距離我們非常的近，差不多只要戰事一起，就可以很清楚地聽著匪喊的殺聲衝鋒號聲。有一次我被派到前方去慰問的時候，接近匪軍頂多不過 200 米，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看得清楚，有時他還利用輕機槍向我們作試探性射擊，但是我們在那種情形之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害怕，反而感覺到是在做遊戲，當他們的槍打空的時候，大家都笑起來。不過也不敢出外面一步，來往的交通道路唯一就是交通壕，一矗矗破牆壞壁這此時也當著了擋槍牌。我們的營房是在靠著南邊，他們主力也是在南邊，所以隨時都可以聽著，或親眼看著，匪炮彈向市內盲目射擊，無辜百姓也因之天天在死亡。（......）長春的老百姓真太苦，有的每天吃不上一餐飯。並且還有的連豆渣、豆餅都吃不著。街上所有的木樹葉子完全被擇下來吃了，地上的野菜也看不見影踪了，真夠苦的了。」[4]

國軍六十軍暫編五十二師第三營副營長仲平在給湖南邵陽的老鄉用溫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因官兵饑餓，無奈見飛機一來，個個準備爭先搶吃，不料擲下之食品而將搶者打中，就此告終；有時打中數人，此事發生太多，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一點也不錯。」[5]

國軍士兵黃有芬在給雲南的弟弟黃有芳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老百姓從4月起長春三分之二吃樹葉為生，簡直餓得腳蕩手酸，連氣都沒有了。軍人自由吉林到達長春，今有半餘年，回想起來將近一年，並未吃著一粒大米，完全吃的是雜糧黃豆高粱米小米苞米小豆等類，都半飽半餓，你想飲食又簡單，操課勤務又緊張，這今天的剿匪軍人怎麼幹得了，以往下去更不知還要過何等日子。」[6]

1948・6・21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向所屬各部共八個師和一個炮兵團下達了嚴密圍城命令：斷絕敵人糧草，禁止行人進出，控制機場，不使敵人空運，擾亂敵機空投，並積極殲滅出擾敵人，奪取敵之弱點，逐步壓縮敵人，完成各項準備工作。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獨立第十師作戰參謀關志明在四十年後寫道：「整個圍城部隊在距長春城外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個封鎖區。圍困長春戰役就這樣拉開了戰幕。」[1]

為使封鎖圍困更加嚴密，圍城指揮所將圍城部隊劃分為東、西兩個地區。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獨立第十師師長趙東寰在四十年後寫道：「以獨立第六、八、九師為東地區部隊，六縱的十八師為東地區機動部隊；獨立第七師和獨立第十師為西地區部隊，十二縱的兩個師為西地區機動部隊。各師按分配的地域加強工事構築，搞好通訊聯絡，造成了『城外之城』的防禦體系。」[2]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李培新在給四川溫江縣的父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從前只是聽說災荒年辰有人吃草根樹皮，卻從沒親眼看到，現在我卻眼見長春老百姓吃草根樹皮了，而這草根樹皮也得要幾千元流通券1斤啊，（……）父親如有訓示，仍可寄到長春，靠飛機丟下，只要不飄出市區，或其他意外，我仍能收到。」[3]

1948・6・22

在長春城內，由長春市市長尚傳道會同省府秘書長崔垂言和省府參事兼兵團政工處長王中興起草的《長春市戰時糧食管制辦法》正式發佈。同時，還設置了由兵團司令部、吉林省政府、長春警備司令部、長春市政府等聯合組織的長春市戰時糧食管制委員會，由尚傳道任主任委員。

這個戰時糧食管制辦法，是因為鄭洞國和尚傳道無法接受蔣介石給出的救援辦法（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的折中之策。

> 該《辦法》管制的糧食種類有：大米（包括稻子及粳子）、小米（包括穀子）、高粱、高粱米、苞米、大豆、小豆、豆餅、麵粉、小麥，計10種。並規定：「前條所列之糧食，不論為軍糧或民食，不論為自存或代存，凡散在本市之商店民宅及各公私機關團體學校者，均須予以登記。」由「政治工作大隊」和「戰時工作大隊」派員協同區保指導員逐戶清查登記。
>
> 《辦法》第七款規定：「凡經存糧登記者，每戶按其戶籍登記所載之人口，每人每月以45市斤計算」，「准其存留……三個月之食用糧」。「如有多餘，稱為餘糧」，「餘糧」應由政府「徵購」。
>
> 對「登記不實」或「隱匿」不報者，不僅要受到從重懲處，所「查獲」之「私糧」還要「全部沒收之」，並獎勵「告密檢舉」者。[1]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林（彪）羅（榮桓）劉（亞樓）22日10時電一前指：孟家屯以北沒嚴密封鎖，注意妥為部署。」[2]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六十一師野戰學院軍人王榮生在給貴州貴陽的父親王洪興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光在近日以來，活活餓死的難民貧民不知多少，實太遭慘之極了。抗戰也沒有嘗試過這種滋味，甚至於有的活到現在七、八十歲的人在此遭受這種慘情也恐怕是第一次吧，吃樹葉、找野菜、收糟糠這都是此地的實情。說起吃大米的話，誰吃得起呢？但是一幫奸商官僚們吃得起，像我們這種小職員與一幫貧民難民等簡直是不敢問津。（……）天上的飛機天天載來的糧食，對長春市的人民來說有幾個看見一眼嗎？沒有。（……）恐怕兒自己性命也難保了。」[3]

14時，長春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電令十二縱：「石虎溝一個連兵力太少，應酌增一至兩個連。獨十師上下石虎溝部隊，應主動密切與獨六師部隊聯繫，求得互相策應。」

23時，長春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電令遼寧、安東、遼南封鎖瀋陽地區部署：「為增加瀋陽地區糧食困難，以達分散敵空運力量，決封鎖瀋陽、撫順、本溪、鐵嶺、新民、遼中糧食，以獨立師為主，結合地方黨政軍力量。」

與此同時，圍城指揮所還電令獨六師：「應擔負封鎖長春向孟家屯交通線，應立即以得力部隊控制和鞏固孟家屯，並逐步向前壓縮推進。主動與石虎溝部隊聯繫。」[4]

1948・6・23

在哈爾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23日電一前指：為統一指揮圍困長春，及實行將來攻佔長春的戰場條件之準備，決定組織圍城指揮所，除以一前指幹部及機構兼任圍城指揮所外，增陳光為副司令，唐天際為副政委。圍城指揮所統一指揮各圍城部隊。

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有百姓夜晚利用警戒空隙，運糧進城。22日晚，十八師一個排在田家油房及廣播電臺，截偷運糧6麻袋，每人背回30斤。」[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孫中魁在給浙江桐廬的妻子月朗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長春近來情況緊張，飛機不能降落，就是寫了覆信，也是在郵局放著，不可發出。聞近日將有飛機降落特寫信告你。現在長春生活比前更高了，大米1斤要法幣330萬元，高粱米300萬元，黃豆也要60萬元1斤，青菜23萬元1斤，豆腐渣法幣19萬元，我們每月收入6000余萬元的薪水，僅夠半個月吃的。此間的老百姓連糠（也要30萬1斤）也吃不起了，整日吃樹葉樹皮、野菜，現在把樹葉皮野菜都吃光了，可是糧食的漲風還沒有止境，因為長春市內的糧，全靠空間運來。最近長春周邊被共產黨團團包圍著，糧食一點也進不來，所以有如此的暴漲。我們現在官兵都吃雜麵所蒸的餅子了，真難吃，咽不下去。可是這樣的飯每人一天就法幣250萬元了。假如吃大米一個月就要一個億，你看怎麼得了吧。你幸虧早些回家，假使在這邊時，這飯你更吃不了。（……）所到的費僅夠伙食，就沒有錢寄，何時錢拿到手，就與你寄來了。」[2]

1948・6・24

《南京日報》以「挽救東北目前危機，監委提出三項意見」為題，刊登中華民國政府監察院第七次會議中曹德宣等三十位委員的提案：為挽救東北目前危機，解除民生痛苦，茲請行政院，對於增派大軍打通錦瀋走廊，解除關內外匯兌限制辦法，及撥給美援物資等三事。這份聯名提案簽署日期是6月21日，該提案中稱：

（一）從速增派大軍，收復熱東，打通錦瀋走廊，恢復關內外交通，以辟糧源，鞏固瀋長而確保東北。查瀋錦鐵路中間距離，不過百餘公里，自去冬被共匪破壞迄未恢復，瀋陽遂陷於孤立，物資來源斷絕，致民食軍糧，均極感缺乏，只賴空運接濟，實屬杯水車薪，士卒多負饑餒，無法作戰，而150萬市民，更陷於嗷嗷待哺中，一般貧民，吃樹皮草根糟粕及至饑餓而死者，累累不絕，人心惶恐，社會不安，長此下去，實無法維持。而錦西秦皇島葫蘆島有放之食糧，堆積如山，風吹雨淋，行將腐爛，若不於短期內打開錦瀋走廊，恢復關內外交通，則不但錦瀋軍事失去聯絡，有各個被匪擊破之虞，而軍民爭食，上下交困，勢亦必坐以待斃，故從速增援，打開交通。實為當前挽救東北惟一有效之辦法也。

（二）從速解除關內外匯兑限制辦法，開放申匯，以減輕東北人民困難，而免刺激平津物價。查東北軍事緊張，食糧來源困難，加以人民痛恨共匪之殘暴，不肯附逆，多準備逃避關內，因而傾家變產籌措川資，匯款關內者日多，此乃必然之趨勢，揆情度理，政府對於此種大批義民入關，自應體念其艱難，予以種種便利，藉以慰其內向之忱。而事實上適得其反，京滬既不准匯兑，平津又特加限制，匯往平津之款，不能自由取兑，拖延時日，致徒手入關，舉目無親之義民，無形中受到意外困難，與許多損失，衡之法理人情，詎能謂平。在當局認為關外遊資作祟，刺激物價，不得已而有特殊限制，殊不知遊資作祟，乃系全國。為今之計，政府應迅速作所列之措施：第一，解除現有平津之關內外匯兑限制辦法。隨到隨取，並開放平津申匯；第二，迅速開放關外京滬匯兑，以免集結平津；第三，迅速准許流通券，得照匯往平津之匯水，匯往各地；第四，徹查特殊假藉權位營私漁利之少數人，嚴行懲處。

（三）迅速撥給美援物資，救濟東北暨熱河難民難童，以收拾人心，東北暨熱河今日食糧之恐慌，與日常生活品之缺乏，殆較內地各省為甚，此為有目共見之事。現在國軍所控制之瀋長，及錦西承德一帶，殆完全成為戰場，共匪之再四燒殺劫掠，國軍之幾番出入騷擾，十室九空，雞犬皆無，餓殍載道，流離失所者，觸目皆是。若言救濟，則東北暨熱河實應首先辦理，而必先列為第一位，然政府對於美援物資之分配，從未提及東北暨熱河，而社會部對於兒童救濟食物之分發，竟先決定在平、津、京、滬、青、徐、汴、漢、穗等九地，及其附近地區辦理，不知是何居心，豈謂東北暨熱河兒童不應救濟耶，抑已置東北暨熱河兒童於化外耶，實令人不得其解。尤其因居瀋陽長春錦西承德一帶之難民難童，原住者，既無法為生，續來者，又有增無已，社會部似應首先撥給大批美援救濟物資，至東北暨熱河，以拯救成千成萬可憐待死之難民與難童。蓋彼等之生命，已掙紮在饑餓線上，彼等已面臨著生死關頭，是生死的問題，而不是營養的問題，當局竟忽視此點，殊屬措置失平，東北暨熱河兒童何辜，而受此差別待遇耶。務請當局予以糾正，從速作所列之措施：

第一，社會部應使東北暨熱河一部分人士，參加福利事業審議委員會國際兒童急救會工作小組，以使參加東北暨熱河兒童急救工作。

第二，社會部應將國際兒童急救會首批運華食物，撥給東北暨熱河區一部，專急救東北暨熱河之難童，可儘先以空運運往瀋長及錦西承德一帶。

第三，社會部迅速在瀋陽長春及錦州承德成立膳食供應站，專責辦理救濟災難窮苦兒童，少年及孕婦，乳母膳食等工作。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第一前指 24 日報：圍城部隊已於 20 、22 日進入指定位置，完成包圍封鎖。」[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明禮在給臺灣鳳山的才弟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目前高粱米已賣到 25 萬元 1 斤，今天下午已漲到 28 萬元了，常常每日漲兩、三回價，貧窮的人以樹葉草根為生的已有兩個多月了，

中等人家也只有食豆腐渣過活。今日的價錢買豆腐渣也得 2 萬元 1 斤，據說還得很記人情呢！軍隊的糧食現在是一半黃豆一半高粱米，過些時候，也許全食黃豆了。妻女的生活也很艱苦，過去有眷糧代金，現在甚麼也沒有了，全依薪餉度日。按照目前的生活，懷梓的生活費占我的薪餉的一半（她沒有奶吃，需吃奶粉）。如按本月份，全月的薪餉給她，怕還不夠呢！所以現在只好給她吃飯了！薪餉雖說按月調整，但 4 月份的補餉到現在還沒有發呢！在 4 月份本來即想送她母女兩人回家的，但始終沒有上到飛機。上月有希望走了，但匪軍襲擊，到現在飛機也不能降落，她倆何日方能南歸，那就看她的命運了！懷梓前些日子有病，今也好了，我們身體尚佳，幸勿遠掛。[2]

國軍新一軍汽車修理廠軍人吳鐵民在給廣州的父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有很多民眾把所有家私賣了，買一架馬車離開了長春向關內回去，有時順利者則國軍與共軍的防線平安地渡過，近日更使他們回鄉者倒楣，民眾如果要歸鄉者，得先往市政府辦理回鄉證明手續，手續辦好後，即三日內離出長春。但是近日國軍好像已開始反攻，由長春出去的民眾到了共軍的防地時不准他們進去。待再回長春時，則國軍的哨位已奉了上峰的命令，只有出沒有入。於是那些歸鄉者在進退兩難中住在『真空地帶』了，喝一杯涼水也要花 500 元。如果有技術的人到了八路軍的區內，就要給他職務，技術優點的則被送往共軍的後方哈爾濱市。前兩週聞友人言，有一位國軍的連長請了長假回家，在半路被共軍給留下送至哈爾濱受訓了。（......）兒對於長春沒有留戀之處，兒之所以不能回家完行婚事者，皆為以上之時局情形，陸珍怪我不即回來與她見面者，全是她的誤解，以為兒有愛人在長春，戀戀不欲回家。試問十八、九萬元 1 斤高粱米的生活，連自己也患不足自己用，哪裡還有能力來在長春立家呢？東北遍地糧荒，非常之慘，不欲再言，專此敬請金安。」[3]

姻妹是駐守長春新一軍五十師一位團長的妻子，她的丈夫士璞因為運送家屬離長的事情跟師長「起了衝突」，告了長假。士璞每週都以工作之便用無線電跟她通話一小時。此外，就是勸她坐老百姓的車經過共軍佔領區返家。姻妹在給雲南的眉姐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這邊的物質及精神已被困得水泄不通了。最特別的現象就是物資的高漲。很可以稱為全世界最高的地方。（......）我們家門口的樹木青草早已變成枯枝及平地。（......）或許是我們流浪的年數還不夠人生的坎坷，

那天他叫我坐老百姓的大車經過土匪及八路的佔領區而到瀋返家，結果因此地開戰在長郊。八路為了實行據點之故而不放行，數十萬流亡在真空地帶的老百姓，但我軍為戒備之嚴，既已出陣地前哨的人民也不放回。所以，在真空地帶的成千輛大車停滯了，吃的住的都在地上，先到吃光的搶後到的，後到的就忍饑挨餓，無法只有抵死在忍受生活的煎熬。這都是師裡有些家眷冒險前行動又返到長春來講的，餓後簡直是四肢發軟，面存菜色，很可憐。這邊的戰局是好是歹我都不知道，只能聽天由命。不過，請慰致上二老，如時局一旦不幸，不必悲傷，我覺得很滿足。雖然我流浪苦，但為了人生意志的到達，至死我也覺得很快樂的，很高興的。」[4]

《東北日報》刊登「蔣管區民謠」：

> 柳條兒青，柳條兒長，小小的娃娃沒爹娘。問他爹娘哪去了，
> 他提起此事淚汪汪：我爹被人綁去了，拉進城裡當「種秧」；
> 我娘在家年歲輕，保長霸去作三房；剩下自己沒人要，
> 每天要飯在街上。哭聲爹，喊聲娘，走遍大街和小巷，
> 並無一人答一腔。

日期不詳

在長春市長通路與東三馬路交匯處的興隆胡同，住著一戶大戶人家，四合院，黑漆大門，高院牆。這戶人家平時總是大門緊閉，一旦開門，出來的男女老少個個都滋潤光鮮，與15歲的女孩沙秀傑所在的東大橋居住的窮人截然不同，那兒的人們都是面黃肌瘦，大多是衣衫襤褸。沙秀傑的媽媽，在這個胡同口的一家藥房窗戶下賣開水。有一天早晨，她和媽媽發現了一個棄兒：

> 我在這個嬰兒的被角處發現一張紙條，字寫得很流暢，但很潦草。我和媽媽磕磕絆絆地讀懂了紙條上寫的大概的意思，這張紙條是嬰兒的母親寫的，她在紙條上說，她的先生是長春大學的教師，已經失蹤好幾個月了，她無生計來源。她要爬解放軍圍城的卡子，怕自己出現意外，不想讓孩子跟她一塊死。她請求這家人行好積德，收養這個孩子，孩子無命無姓，從此就是你家的人了。
>
> 孩子的哭聲很大，媽媽就大聲叫門，先出來一個很像僕人的人，後來又跟出一幫家人，男主人急忙叫人把孩子抱進去，就匆匆把大門關上。媽媽說：「從這個孩子的衣著和信紙來看，他的父母是有文化的人，也是對黑大門人家的身世很瞭解的人，不然她不會把孩子選擇給他家的，只有這樣棄之就走，連孩子的出生年月日以及姓啥都不留下，這家肯定會收留的，可見這番狠心也是一位母親的苦心和無奈之舉吧。」[1]

在長春城內，對國軍有毒癮患者來說，除了缺糧，他們還需要干涉毒癮的藥物。於是，國軍有毒癮患者就會想到吉福德祿。吉福德祿是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

研製的治療毒癮的專利藥品。遠藤譽後來寫道：

> 吉福德祿在二樓壁櫥裡還剩了一點，這就暫時能讓我們賴以為生。毒癮患者的國民黨兵，有時帶來扁平圓形像麵包似的食品做為回禮。那是用玉米麵做的黃色大餅子，我們馬上把牠平均分成二十二人份，每人只能得到五釐米的厚度。大餅子切口所掉的渣，母親還拿來分配在包藥紙上給每個人。我們是躺在床上凝視著測到毫克的天秤，一粒餅子渣也能使指針動彈。屏息注視著母親的手指，究竟把那一粒渣放到哪一份包藥紙上。
>
> 我們賣了絲綢的長袖和服、緞子腰帶、毛皮大衣、唱機、唱片、縫紉機等。這個時候，幾乎沒有人想買傢具甚麼的，因為長春市內的糧食已經沒有了，所以一粒高粱米比任何金銀財寶都更值錢。

到中國人活動和交易的歡樂場所、小偷市場公開進行以物換物，婦女和小孩去是很危險的。所以這樣的事情全由東野（即白耗子）主動承擔，而對東野來說，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 雖然明知道他是在收回扣，也只好託他。那是因為除了白耗子和他家以外的人，都瘦得皮包骨，腳步蹣跚。一旦發生甚麼事，連防禦力量都沒有。力量的源泉都被白耗子給吸掉了。白耗子吸取牠做自己的血和肉，以保持年輕、健康的身體。現在也只能依靠他的力量。

此時，遠藤譽的母親已經把珍藏的珠寶首飾變賣的差不多了，她的家之前有很多財富，但在日本戰敗前，為了國家而不斷地捐獻給了日本軍隊。

遠藤譽還聽人傳說，在中國人公開交易物品的地方，還有「人肉市場」，這是指戶主餓死後，只剩下

女人和孩子的家庭，將姑娘出賣的市場。[2]

在長春市郊，范傳華除了挨餓，還需要到學校讀書。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十年後回憶他們按班級列隊站在操場上參加朝會的情景：

> 校長向全校師生講形勢並提出要求。他說:「國共兩軍炮戰已經10多天了，站在樓頂上向大房身機場以西望去，只能看到打炮發射時冒的一股煙，看不到人。同學們，八路軍離我們還遠著呢。他們不是打我們，他們的鬥爭鋒芒是鄭洞國、曾澤生兩將軍的，主要是打街裡的。現在只有少量炮彈落在我們這疙瘩，過幾天就好了，大家不要怕，照常上課。這時候，有情況就拉長鈴，聽從值週教師呼喊。到時不要亂，不要怕，不要亂跑，更不要哭……。同學們，聽清楚沒有？！」
>
> 「聽清楚了！」全校同學異口同聲地回答校長的問話。
>
> 從端午節那天開始打炮以來，炮彈總是在我們學校附近和鐵道邊一帶爆炸。有時上學往返路上也能遇上雙方打炮。6月的一天上午，天氣晴朗，我們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裡傾聽班主任吳煥壽老師講語文課「南京中山陵、雨花臺」的故事。
>
> 突然，從西郊大房身機場的八路軍炮兵打來的炮彈落在窗外，玻璃被震碎了，幾個同學的身上被劃破，好幾個女同學哭起來了。
>
> 學校鈴聲長鳴，值週老師也拼命呼喊。各班老師把同學們帶到走廊隱蔽，秩序井然，再沒有哭的，也沒有鬧的，都在側耳聽炮彈在屋頂飛過的呼嘯聲和落在附近的爆炸聲。但也有少數女同學顯得神色緊張，吳老師握住她們的手安慰說：「不要怕，很快就會停的。」[3]

1948・6・25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25日22時，一前指電朱瑞（炮兵司令部司令員）、邱創成（炮兵縱隊政治委員）、匡裕民（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並報林彪、羅榮桓：（……）陸上封鎖已有顯著成效，擾敵空投，因高炮火力不夠機動與陣地選擇呆板，致敵機仍在自由馬路空投（繞城東）。準備令高射炮及炮兵部隊移城東構築陣地，控制自由馬路機場，擾敵空投。城西、城北各處，亦多構炮兵陣地，以便適時機動擾敵空投。建議炮司派一名比較負責幹部長住前指，以便積極協同動作；（二）24日23時十八師報，孟家屯西到八七醫院一帶無警戒，百姓利用夜間走河溝、荒地偷運糧食進去。阻糧經驗為：黃昏至半夜多放遊動哨巡查，在必經小路設伏，每晚能沒收幾百斤。」[1]

天津《民國日報》自瀋陽下午4時專電：「瀋陽糧價一日三漲。」該報自長春下午10時專電：「長春糧荒嚴重。」

據民國政府長春當局統計，長春城內糧價暴漲。以高粱米為例，從1月5日至6月25日，已上漲了168倍。苞米麵上漲了333倍。

在中共佔領長春四十二年後，吉林省軍區政治部《長春國民黨投誠》編寫組寫道：「我圍城大軍兵臨城下，數十萬二線部隊和民兵、自衛隊積極配合，在長春城外方圓50里的廣闊地域上，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封鎖區，從而揭開了久困長圍的戰幕。」[2]

日期不詳

在長春市長江路糧米市場，被困在城裡的一家報社記者發現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奇怪現象，他在中共佔領長春四十年後寫道：「米市上沒有糧食，只有一小堆一小堆地瓜秧、香瓜秧和莧菜之類的野草，偶爾也許發現有幾個沒長成的小南瓜或生瓜蛋，索價比黃金還貴得多。那時候擺在寄賣商行裡的美國派克鋼筆，標價是二兩黃金。又一次，我提著一麵袋東北流通券從市場上換來半麵袋地瓜秧。人的生活到了這般地步，確實是米珠薪桂，人命難熬。」[1]

無論生活如何艱難，也要想辦法活下去。國共兩軍沒有炮戰的一天，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忽然聽到鄰居郭大娘喊他的媽媽，請他的媽媽趕快到菜市去賣雞蛋，因為每個漲到 1000 萬元了。他的媽媽把剛剛攢下的 20 個雞蛋裝在小筐裡，支使他去賣。

> 媽還再三囑咐：「小心點，可別打碎了，20 個雞蛋能賣多少萬哪？」
>
> 「能賣兩萬萬塊錢！」我說。
>
> 「是啊，這些雞蛋能換回 20 多斤糠，摻點野菜夠咱們四口人吃半個月。」媽邊說邊把這 20 個雞蛋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我估計，這些雞蛋要是丟了都能認回來。我看這情景，心急地說：「媽，你別看了，時候不早了，再耽誤一會兒，菜市上就沒人了。」
>
> 「好啊，你去吧！」媽手摸我的頭還推了一下，讓我趕緊走。
>
> 出門往東走二、三百米，往右一拐，就是菜市。來往的人倒是不少，可是比起開火前可蕭條多了，不少的買賣家都「關門大吉」逃荒去了。
>
> 這天下午，小菜市只有賣青菜、高粱糠，還

有賣高粱米稀粥的，就那麼一小碗，就得五、六百萬元。你若好事，都能數出來這碗粥有多少米粒兒，只不過米湯比白開水紅點就是了。

我把小筐和別的攤子擺到一條線上，就像個佛爺似的坐在小筐旁，既不喊也不叫。說實在的，12歲了，還是第一次幹這差事，是有些腼腆，〔……〕剛坐下不一會兒，一個好消息傳過來了。「雞蛋1200萬元一個。」雞蛋漲價了太好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大伯似乎看出我的表情，對我說：「小孩子啊，其它東西也漲價了。」

「糖也漲價了嗎？」我關切地問。

「當然也漲了！」他索性說了句。

這麼快的變化，使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不，一會兒，顧客來，「小孩，雞蛋多少錢一個？」

「1200萬一個。」

「1000萬一個行不行？」

「那怎麼行啊，人家官家規定1200萬一個。」

這個顧客還沒走，又來了一個穿灰軍裝的人，左胸前還綴了一個紅十字，我一看是國軍的傷兵。〔……〕這個傷兵走在我的筐前駐足問我：「小鬼，雞蛋多少錢一個？」

「1200萬一個。」

我心裡像揣個兔子似的回答傷兵的問話，我的眼光緊緊地盯著他的腳，卻不敢仰臉看這個傷兵。

「哎呀呀，太貴了！便宜點行不行？」

「那，那怎麼行啊。再便宜，一個雞蛋就換不到一斤糠了。」我戰戰兢兢地說著。真出意料之外，他沒有理睬我，轉身走了。我這才松了口氣。

這時，夕陽已經落到地平線了，夕陽把雞蛋照得淡紅，像農人的膚色，真比珍珠還可愛。我默默地尋思：「要是〔……〕把這些雞蛋拿回家去，媽媽給我們做菜，全家在一起痛快地吃一頓，那

該多棒啊！」想著想著，口水都流出來了。

忽然，八路軍開始打炮了。炮彈落在菜市裡，這才打斷了我的沉思。

「不好了，打死人了，快跑開！」有人在拼命呼喊。

在戰爭年代生活慣了，再說炮戰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了，人們對此並不陌生，沒甚麼大驚小怪的，所以菜市的人群呼地一下都散開了。

我也不顧濺在頭上和身上的泥土，睜開眼，先看看筐裡的雞蛋是否被小土塊打碎，非常僥倖，一個也沒碎。於是，我拐起小筐慢慢地走回家。

還沒等我到家，媽就過來接我。她在家裡也聽到炮彈響了，有些不放心。

可我們娘倆一進屋，爹對媽就好一個不滿意：「死活不說，這年頭這麼亂，雞蛋要是叫人搶去怎麼辦？再不許讓孩子去賣了！」[2]

長春市內外，宛如天堂和地獄。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在其出版的書籍中寫道：「解放了的長春郊區人民在人民政府領導和人民子弟兵的支持下，迅速排除了國民黨土匪部隊帶來的創傷：生活有著了，生產恢復了，家園重建了；那曾經是一片淒涼景象的荒野，轉瞬間變成豐收在望的莊稼，牛、馬、豬、羊，膘肥體壯。勞動人民第一次體驗到解放了的歡快。（……）眼前的這一片景象，沖淡了與敵咫尺相峙的戰場氣氛，倒像是遠離前線的老解放區。然而，只隔了一條環城公路的那一邊，國民黨統治下的長春市竟是一座人間地獄！人們吃光了大自然賦予長春的盛夏綠裝。凡能往口裡吞的，都毫不計較酸甜苦辣填到肚子裡了，可是，依然難以活命。無論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那一張張浮腫、灰暗、毫無表情的臉，使人望而生畏。」[3]

馬鴻新，30歲，中共長春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兼民運部長，主要負責對長春國軍進行政治宣傳攻勢和瓦解國軍鬥志。在圍困長春時，他還兼任中共長春工作委員會工作隊黨委書記。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五十三年後，長春市政協為馬鴻新的人生歷程編寫了傳記。該傳記中是這樣記述長春工作委員會工作隊工作的：

> 由於城內存在著嚴重缺糧的問題，敵軍靠空投一點食糧也難保斷炊之災，所以，當城外解放區莊稼即將成熟，到了收穫季節，從城裡傳出要武裝搶糧的消息。為了防止敵人出來行搶，首先把到手的糧食進行疏散隱蔽，提倡有親的投親，有友的投友，沒親沒友的由政府代為找人保管。還沒有收割的莊稼，也採取了措施：要以戰鬥姿態保衛秋收，不讓一粒糧食落在敵人手裡。由工作隊所在村屯組成以村長、自衛隊為主，吸收有經驗的農民參加，組成保衛秋收委員會，並按前沿、中間、稍遠的地塊劃分了搶收區域，並規定收割時間。為加快搶收進度，減少運輸時間，節省畜力、人力，防止敵人干擾，提出離前沿較近的地塊要在夜間進行收割，穀子、高粱就採取掐頭割穗，用肩背人挑的辦法。〔……〕工作隊行動〔……〕使廣大人民群眾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有的無限感慨地說：「城裡國民黨，像個活閻王，城外共產黨，才是紅太陽。」[4]

對被困在長春城裡的人來說，他們像城外的共軍一樣急切地盼望著共軍能早日打進來。沙秀傑和她的家人，祈盼著共軍攻城的槍炮聲，她們不是不怕戰爭，而是要求生！她們覺得槍炮聲越大越激烈越有希望。

> 每一有槍聲，媽媽就叫我們快跪下來祈求：「真

> 主安拉，指點八路軍快打進城吧。」
>
> 如果再和不管百姓死活的國民黨死守下去，那只是死路一條，只有八路軍打進來才能有糧食。一有槍炮聲，人們不是害怕得躲在屋子裡，二是仨仨倆倆地到屋外聽槍炮聲的源頭。「這炮是從八里堡打過來的，快了，快了，這就快了！」更有興奮者說：「要是打進來，也是先從咱東大橋進來！」另一位說：「照這樣看，天亮前就能打進來！」
>
> 正當人們議論得起勁時，槍炮聲越來越稀了，等了一陣子，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了，人們才垂頭喪氣地進了屋。這真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都罕見的一種百姓祈盼戰爭的畸形心理。[5]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 412 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從二樓的窗戶往下看，興安大路已變成為死街。此時雖是盛夏，但那些本應是鬱鬱蒼蒼的街道樹的樹葉已經全部被人吃光了。她在後來寫道：

> 街道像死了似地在綿延著。在街道樹根旁，有一個倒下的人，那附近有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在哭喊著，周圍有狗在轉悠，狗在吃死去的嬰兒。
>
> 餓死者在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撫養者先走了後，小孩常爬在街道上喊：「爸爸……媽媽……」為找親人他哭泣著。
>
> 這樣的孩子是惡狗最好的攻擊目標，嘗過人肉的狗被喚回野獸的本性，變得非常兇惡，完全野性化了。
>
> 我們家也有過一條狗，叫波奇，是一條褐色的狗。
>
> 「狗，不賣嗎？」
>
> 有一天，來了一個中國人問，我們馬上知道他為甚麼來。在長春饑餓的街道，只有狗是最肥

的。

「叔母，與其給別人吃掉，還不如我們吃了啊！」白耗子勸誘母親。

母親看過波奇吃嬰兒，那時她看到波奇正在舔鮮紅的嘴巴，從已經不再使用的一樓客廳裡出來。母親嚇了一跳，恰巧地窺視著客廳，看到在沙發的旁邊殘留的波奇吃剩下的兩、三個孩子的頭，其中的一個還在冒血，濺出的血染紅了地毯。客廳的牆上有一幅宣傳畫，兩個大字「流言」的上邊刺著一把劍。這個宣傳畫是表現千萬不要被共匪謠言騙，是由國民黨政府強制張貼上去的。血還流動著。從那以後，母親看到波奇就感到毛骨悚然，也有可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襲擊小萬。雖然沒有叫牠上過二樓，可是現在波奇的眼神，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了，不知道牠還能幹出甚麼事。

母親同意了白耗子的勸告。

大姊像瘋了似地哭喊著想保護波奇，只有她一口不動波奇的肉，也不喝波奇的湯。這時大姊13歲，她幫助母親勤快地做家務，已經是維持一家不可缺少的存在。但過去從沒有在大姊臉上消逝的明朗的笑容，現在在大姊臉上消失了。從那以後，她不跟任何人說話，成了難以取悅的孩子。[6]

1948・6・26

新華社陝北電稱，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 5 月份戰績：「上月殲敵 13 萬餘，斃俘敵將官 18 名克城 61 座。」

天津《益世報》以「東北難民苦，欲哭淚已幹」為題報導東北難民陷入的困境，該文稱，連年烽火，不停的戰爭，許多人因受生命與財產的威脅，被迫離開了家園，來到同樣也「鬧饑荒」的平津兩地。現在收容所已經無法容納更多的難民，他們「只好在露天地裡坐待最後的命運」。

在該文章旁邊，刊登著一位名叫安東君的讀者寫給報紙編輯的信，他慷慨捐出 5000 萬元的血汗錢給難民，並希望「钜富們快快回應（接濟難民）」。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同為人類，同為黃帝子孫，全都應該（對流亡來天津的難民）表示同情。我雖然不是難民，然而難民是我的同胞，我雖然不是钜富，然而尚能溫飽，於是我把用血汗腦汁換來的 5000 萬元，送奉貴部代為救濟這群垂死的同胞。」

北平《益世報》稱，東北遊資氾濫市場，是北平物價暴漲的主要因素。據金管局北平組統計，東北寄往關內匯款數額在「本年 1 月至 6 月 10 日總額達流通券一萬八千七百億」。在這「洶湧遊資之洪流中公教人員匯寄關內之贍家費僅占一小部分」。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敵 24 日開會，決將長市老、殘、婦、孺及可疑分子，先登記後，武裝掩護送出步哨線，到我區就食。孟家屯集長難民 5 萬人，每日餓死十餘人。」[1]

在長春城外，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召開圍城政工會，政治委員肖華在會議上作了《關於圍困封鎖長春的政治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講道：

> 第一部分，發動群眾封鎖長春敵人
>
> （甲）圍困和封鎖長春的重要性
>
> 東北局總部決定以軍事包圍、政治攻勢、經濟封鎖等辦法來圍困長春，決不是消極的對付敵人，而是要求得達到奪取長春殲

滅長春全部守敵，解放長春人民的積極戰略目的，就是以今年的圍困，造成攻打長春的有利條件。同時我們還須瞭解面前的敵人是有龐大的軍隊，堅強的工事，我們以大規模的攻堅戰奪取之，決不可馬虎從事，而須有一定的準備步驟。那麼今天的圍城，也就是攻城序幕與有效的戰鬥手段。

長春約有60萬居民，10萬敵軍。如果我們在空中、陸上斷絕敵人的生活資料，嚴禁城外食糧輸入，不讓長春與市外來往（現敵空運已受阻礙，兩機場在我控制下），這樣經過兩、三個月後，敵內部情況定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將會造成敵人的饑餓與困難，軍民交困，軍掠，民怨，士氣瓦解，社會秩序發生騷亂，生存條件為我操縱，這時也將是我大舉攻城的有利時機。據我們瞭解，現敵存糧已難支持很久，高粱米已賣到38萬元1斤，樹葉也賣八、九萬元1斤，因此，我黨政軍民須全心全力，一致動員起來，認真執行這一封鎖長春的任務。

我某些部隊、機關人員對封鎖長春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重視不夠，如有的沒把封鎖當成第一件工作去做；有的反看成是單純的軍事鬥爭，沒認識到是對敵鬥爭的政策，是對敵作戰的形式；有的以片面的觀點或部分暫時的群眾利益，或某些幹部的思想中的片面慈悲觀點，因而對封鎖長春不嚴。他們不瞭解長春不打下，是長春市人民的永遠災難，也是周圍群眾的災難，甚至還有些機關與人員仍有不顧大局，從本位主義出發，財政觀念、營利走私、投機貿易，發洋財為第一。這些同志不瞭解這就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客觀上也就是資敵，這種現象極不能允許，是與黨的封鎖任務相抵觸的思想。我們要正視並須設法克服它，把它看成是樹立圍城思想工作之一。

（乙）封鎖中要注意克服客觀存在著的困難：

封鎖鬥爭是一個全面的尖銳鬥爭，我們要封鎖，敵人就要做困獸猶鬥，進行反封鎖，因此封鎖得好絕不是輕易就能辦到，須要足夠估計到客觀情況上會給我們一些困難，否則將會影響到我們計劃的實行。客觀上究竟有甚麼困難呢？

（1）長春周邊地區是經過敵人長期佔領，而我新收復的，又處於敵我交鋒的緊張地帶，群眾尚未發動，因此一般群眾心裡就是觀望等待。

（2）長春糧價猛漲（敵人也有計劃做），但日用品一般尚有存貨，價格較低廉，如以貨易貨可一本萬利，因此奸商流氓甚至少數貧民見有利可圖，鋌而走險者有之，尤其今後隨著圍困時間的持久，敵我區糧價物價越加懸殊，奸商流氓乘機走私會更加活躍。

（3）封鎖圓周很大（按環城公路路程算有90里），地形復雜，便於走私者進行鑽隙。

（4）長春周圍地區有地主、土匪作為敵之社會基礎，便於敵之特務活動，因此對我封鎖必然千方百計設法破壞。例如走私方法，以「破爛」換糧食，一村倒一村，或收買我區之破壞分子，作為掩護，或利用我區人民之親朋關係做走私之橋樑。

（5）我封鎖敵之大城市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內戰與抗戰中我只有反封鎖的經驗，而缺乏封鎖敵人之經驗，因此如我主觀上不加強，不發動群眾，都會給敵人留下空子。

上述情況必須清楚並積極想辦法，以軍事為骨幹結合廣大群眾，才能完滿完成封鎖任務。

（丙）如何進行封鎖鬥爭？（封鎖分陸、空兩方面，現只談陸地封鎖）

（1）封鎖甚麼？

一、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可供給敵人生活資料。

二、斷絕敵我區人員往來及親朋商業關係。

三、肅清土匪敵特活動及一切走私爪牙，嚴防破壞分子鑽入我區。

以上三點主要為糧食，但其中任何一項也不可忽視。

（2）封鎖地區及各縣分擔的任務。

長春周邊50里路以內為封鎖地帶（這樣即使敵出發半日也搶不到糧），沒有縣團以上機關證明的物資，禁止流入封鎖區。

各縣封鎖地區的劃分不應完全以過去原縣界劃分，而必須與軍事佈置相結合。

（3）封鎖大軍的編成。

一切圍城部隊及各縣區武裝、民兵、自衛隊等皆為緝私隊，以圍城部隊為第一線，地方武裝、民兵、自衛隊為第二線，其距離不應太遠，應按具體情況確定，群眾自己武裝崗哨必須與部隊結合，這就是封鎖大軍層層包圍長春。

（4）造成社會性封鎖大動員。

包圍封鎖長春必須使群眾人人知道，因此必須廣泛宣傳其要點：

一、軍民總動員，圍攻長春，消滅長春蔣匪軍！

二、反對蔣匪軍搶糧、抓丁，長春人民團結起來，配合解放軍收復長春！

三、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內！

四、反對奸商走私，走私就是犯罪的行為，嚴拿走私分子交政府法辦！

五、圍困長春，保護土地，保護生產，保護壯丁！

六、軍民一條心，把長春變成死城，變成敵人的墳墓！

這些口號要到處講，到處寫，並用政府名義，頒佈法令，獎懲條例，文字及內容要簡明，使群眾易懂易做。

（5）一般封鎖與重點封鎖結合，軍事封鎖與群眾封鎖結合，造成一個嚴密的封鎖網。

甚麼是重點？部隊結合部，地形復雜，羊腸小徑及有森林之處，土匪歷來活動及地主多的地方，伊通河兩岸及我工作薄弱地方，這些地區都是重點，須加強領導，派專人檢查，時間上要特別注意夜間，多派流動崗哨。

（6）敵我經常爭奪的地區，地主的存糧要勸他或幫助他搬到我區，如地主不在家，可用政府名義借來我區，但要禁止打土豪或沒收徵發。

（7）在我區一律禁止使用白票。

（8）以縣為單位，在封鎖區內進行戶口調查登記，過去敵人發的居民身份證一律回收，由區統一焚毀，重發新居住證，今後無證明的黑戶不得收留。

（9）嚴防敵人疏散市內人口。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強迫逼出；二、組織群眾向我請願；三、搞抬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擊護送群眾出境。因此，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過去早已入我區之居民就要不同處理，進行救濟，組織生產。

（10）嚴格部隊的糧食制度，防止以糧換物，或個別人員的掩護走私（地方尤應注意），違者重辦，對部隊中以少報多，以生換熟等浪費現象，亦須制止。

封鎖地區內的生產救災問題。

首先須保證在我區內把可能種的地種上，不讓有荒地，為此必須幫助群眾解決種子，節省民力，軍隊幫助勞動。其次要保證我區內不餓死人，為此必須設法貸糧救災，假定長市周邊40萬人口，20萬需救濟，每人每日5兩，一個半月須糧450萬斤，救濟須切實調查，農會證明，一次最多發3天，以防走私。同時還須準備一部分糧作解放後的救濟。〔……〕

第二部分，對敵攻勢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說明政治攻勢的重要性。我們圍困長春期間，要強化政治攻勢，達到削弱敵人的鬥志，減少甚至瓦解敵人的戰鬥力，求得達到奪取長春的軍事目的。

（甲）長春敵人的特點：

（1）部隊復雜，有土匪偽軍改編的、有雲南部隊、有中央嫡系等，彼此相互矛盾，相互歧視與排斥。

（2）長春敵人已斷絕了陸上的供援，是個孤點孤軍，軍事上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被我束縛並隨著我給予打擊的重量與圍困時間的持久，內部困難必然日益增長，士氣也愈益低落頹喪。

（3）長春敵人大部是被我殲滅或打擊過的，因此我軍的聲威與優俘政策對他們是有著影響的。〔……〕

（4）敵人內部成分大部為東北本地新兵和收編的土匪武裝，他們缺乏戰鬥經驗，並與我區有著若干社會聯繫，士兵中大部又為強迫抓來的，他們對蔣介石都是心懷不滿。

上述條件就是我進行政治攻勢的有利方面。當然我們也不應把客觀有利條件過高的估計，敵人的戰鬥力還沒有完全削弱，現仍在用盡各種辦法鞏固其內部，有可疑分子都加以逮捕，部隊雖有矛盾，但主要軍官都是大地主及資產階級代表，在反共一點上是共同的。

（乙）目前政治攻勢的要求：

（1）政治攻勢的開展，必須與軍事的圍困、經濟的封鎖，密切結合，因為每次的軍事行動，加於敵人的壓力，都為政治攻勢打開門路，同樣每次政治攻勢也為軍事行動打掃了道路，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我圍城黨政軍民都具有政治攻勢的任務。

怎樣才能密切的結合呢？一般可利用各種軍事活動，廣泛對

敵宣傳。如選擇靠近敵人的地方打宣傳彈，偵察崗哨活動時散發宣傳品，住伊通河邊的部隊可利用水流送宣傳板，再可進行口頭喊話，但在喊前要有準備，有內容避免空洞，應以打破敵人的幻想，揭破其欺騙宣傳，〔……〕對捉來之俘虜，一定要執行優俘政策，儘量放回，給予簡單任務，並帶進宣傳品去。對市郊蔣軍家屬須調查登記，多進行宣傳教育，使其設法送進宣傳品通行證等。總之各部隊要多創造各種各樣的宣傳及瓦解敵人的方式方法。至於一般逃兵，儘量不放，送後方集訓免流落地方破壞作惡。

（2）（略）*

（3）開展市民的宣傳教育工作。

要將老百姓的饑餓貧困的罪過歸到敵軍身上，擴大他們與群眾的矛盾，鼓勵敵人。（下略）**

（4）為攻城部隊準備材料

注意情報搜集，如軍事政治情況的調查，各種反動組織及各主要負責人物的瞭解，相片收集等。[2]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斌在給湖南桂陽的父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近一個月來，長春市被匪軍包圍，外面糧食不能進來，裡面更不能出去，因此軍糧民食大受恐慌。軍人初食高粱米，後摻黃豆三七成，後又改為對摻。近來更苦了，高粱米黃豆也幾乎不能維持。現已改糧食小豆（紅豆）、苞米、小米，都是對摻，初食不能進口，現在也覺習慣了。飯的顏色不是紫黑色的就是黃色的，只見豆飯，食下去肚子實是難受。因營養不足，吃了四、五碗甚至六、七碗也還不飽，因此引起食欲、消化不良之病狀。（……）至於老百姓呢？初食豆餅，後食樹葉、樹皮。現在連樹葉、樹皮也食光了。百姓真是看著待斃，現街頭已有餓死的了。長市白菜現賣流通券 30 萬元 1 斤，合法幣 345 萬元 1 斤。大人想這生活怎麼過呢？長春市的軍人同老百姓真是苦極了。」[3]

警察張寶田在給太原的朋友述舜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物價的飛漲十足驚人，目前高粱米已漲到三十四、五萬流通券 1 斤（10

---

* 無論是公開資料還是官方內部資料上，關於這一條的內容均被省略。

** 無論是公開資料還是官方內部資料上，關於這一條的內容均被省略。

兩），若折合關內的斤（16兩）合法幣約600萬元1斤，這種價格你不會想到吧！故自6月份起我們的主食已變成混合粉了（玉米麵摻豆餅），即豆餅也得法幣十一、二萬元1兩。（……）但我決不因此而感覺到苦，我覺得苦是革命建國過程必走的途徑，咬緊牙關渡過此一艱苦關，幸福自會降臨的。」[4]

1948・6・27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前指27日23時報，殲長春敵強送難民部署：（1）根據長敵擬對老、殘、婦、孺、嫌懷分子，用部隊掩護強送我區，現孟家屯北敵佔區內已集結難民萬余，每日有餓死者，此批難民敵想強送出來；（2）敵為減輕糧食負擔及打破封鎖圍困，採取上述手段之可能性很大，其出擊方向為西南孟家屯之公路；（……）（4）對敵此一企圖，必須給予痛擊，否則，類似此種手段的情況，將會增多。因此，各部必須努力捕捉這一機會，要估計到敵掩護部隊不會用很大部隊遠出作戰，即便小的機會也不應放過。」[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宋金書在給濟南的父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現長地以外不能通放，亦不能走出，後有機會再說吧。以往所出去的人都在范家屯和孟家屯一帶禁留不放，（……）街上要飯的人日漸增多不減，尤其挨餓也多起來了。現長地市內外吃糠和豆腐渣的在多數，餓得小孩子們叫苦連天。街頭上如有用車拉整袋的東西時，不管軍民一齊用刀割，分糧或是其它各物。兒看情況心酸難忍。餓的人在街上東倒西歪，尤其卡口外更甚。每天總有餓死大、小人三、四名，多時五、六名左右，淒慘不可言。」[2]

中共發表長春市各階層經濟情況的調查報告，稱長春市工商業的「破產和紛紛倒閉」，給市民生活帶來了困苦，還引用《中央日報》刊登的「糧食管委會調查長春市目前民戶之生活狀況」：

中山區：

吃純糧戶 30%　食粥 25%　食糠 15%　食樹葉 10%　乞食 10%

中正區：

吃純糧戶 30%　食粥 30%　食糠 15%　食樹葉 10%　乞食 15%

長春區：

吃純糧戶 20%　食粥 25%　食糠 20%　食樹葉 10%　乞食 15%

中華區：

吃純糧戶 20%　食粥 20%　食糠 30%　食樹葉 13%　乞食 15%

東光區：

吃純糧戶 15%　食粥 20%　食糠 20%　食樹葉 25%　乞食 20%

寬城區：

吃純糧戶 5%　食粥 10%　食糠 25%　食樹葉 20%　乞食 30%

居留長春之韓僑：

吃純糧戶 10%　食粥 25%　食糠 40%　食樹葉 10%　乞食 20%

全市平均食純糧占全體之 18.6%，食粥 21.4%，食糠 23.6%，食樹葉 15.7%，乞食 18%。[3]

1948・6・28

天津《益世報》稱，為堵塞遊資穩定物價的「物價戰」，華北剿匪總部像剿滅共產黨一樣要剿滅遊資，檢查飛機限制平津流通券的滲透，並停止流通券的兌換。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召開第一次師以上幹部政治工作會議，分析長春守敵的特點及其內部各種矛盾。政委肖華在會上提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利用矛盾，瓦解敵軍」的方針，部署了加強對敵軍的政治攻勢。

圍城指揮所發出《交通通訊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隊進一步加修工事，挖交通壕。除環城交通溝要保持各部隊之間，以及各部隊與指揮所之間的聯繫外，並要伸向最前沿，形成一個完整的地下交通網。[1]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內，一名被困城裡的報社記者目睹了圍城期間軍與民如何爭奪糧食。他在四十年後寫道：

> 困守長春的新七軍因為進駐時間較長，給養比較充足。六十軍是從吉林輕裝撤出的，輜重損失大半，糧食儲存顆粒皆無。士兵們由於吃不上飯，看哪家煙囪冒煙就到哪家去找飯吃，弄得老百姓白天不敢做飯。
>
> 市長尚傳道在報紙上對士兵們發表談話，號召「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這個舉動可把士兵們恨壞了，他們公開反抗說：「你們當市長的有飯吃，就說風涼話，不管別人死活……」
>
> 老百姓和士兵們沒有柴燒，最初是砍街道樹，刨馬路上的瀝青，後來就到洪熙街一帶和一些沒人居住的地方去扒拆空房子，取下木料當柴燒，有的人甚至燒黃豆、煮黃豆聊以果腹。
>
> 儘管市長尚傳道在5月初就曾圍繞糧食問題下了很多功夫，譬如號召市內糧商和郊區地主把餘糧儘量運進卡哨內。還曾指示工商局調查長哨內的空隙地帶，提出了「人人種地，日日練兵」的口號，號召居民利用宅後空地，公教人員利用機關內的空閒地帶，到處種植糧食作物。還特地派出由編餘人員組成的戰工總隊到各地區去調查人口和存糧，所獲結果非常令人失望，全市的糧食和人口對比，只能維持到7月份。
>
> 這次調查越發弄得人心惶惶，致使老百姓和下級職員想方設法偷越卡哨爭相逃命。及至6月底，市長尚傳道發覺老百姓的糧食快吃光了，明知道只有部分軍官和少數有後臺的商人還囤積著糧食，又無法保證各級公務人員去講甚麼廉潔奉公，便根據人口普查和糧食登記的情況，電告南

京請示。

蔣介石從廬山來電給鄭洞國指示：「盡收長春所有糧食物資，由政府統一分配。」

鄭把電報給尚傳道看，兩個人研究之後，認為蔣的指示只能徒擾黎民百姓，毫無裨益。尚因為難以遵命照辦，想借機辭職，被鄭婉言勸阻。後來兵團、省、市政府會同研究出來一個「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草案」，由第一兵團和吉林省政府會銜公佈。

草案公佈之後，各區、保成立了糧食管制委員會，號召揭發檢舉囤糧戶，並給予揭發者以獎勵。這種辦法不僅沒起到調劑有無的作用，反而給那些平時魚肉商民為非作歹的人打開了方便之門。有些人黑夜裡把糧食埋到地下深處，也有的託付給權勢的軍官們代為保管，缺糧之風越發加劇。[1]

王景春，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獨立第九師第二團三營九連文化教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講述了長春城內爭搶空投物資的情形：

每天上午8點到9點，總有十幾架次運輸機飛臨長春上空空投。開始時用降落傘。當敵機飛臨南嶺時，我高炮部隊就猛烈射擊，雖然日式高射炮射程不遠，但敵機不敢低飛，加上颳風，空投的物資，不是落到我軍陣地上，就是落到居民區，很少落到「空投場」。敵機空投時，可熱鬧啦。圍城部隊緊縮包圍圈，跟敵人搶。如有一次，我帶領八班在小油房、四家子村一帶遊動，敵機空投的七個降落傘向東飄來。我生怕落到敵人陣地上，就帶著八班向前猛壓，因為風大，這七個降落傘越過二道河子飄到我團警衛連防地。打開

著幾包東西看，全是美造的藍頂鋼皮電池，每包500對，共3500對。

空投的物資如落到城內，城內的六十軍跟新七軍，正規軍與雜牌軍相互間當仁不讓爭著搶；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有時也跟敵人搶。老百姓的搶糧經驗是從血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開始，他們搶整包糧，因餓得沒勁，不但糧沒搶著，反而連命也搭上了。後來，他們凡是能動的，每人磨一把尖刀，當降落傘落地時，他們先用刀割一塊傘布，往麻袋下一掖，再把麻袋劃開，扒上十斤、八斤米，提起就跑。這樣，搶到糧食摻點野菜就能吃幾天，當然也有因搶糧喪命的。[2]

有一天，有一個空投的米袋子落到長春市四馬路的一座院子裡，米袋摔破一個口子，米撒了出來。鄰居們都撲向米袋子。很快，國軍士兵也趕到了，看見人多，朝天鳴槍警告，也沒有讓搶糧的民眾停下來。

一個士兵跳上一個倒扣在地上的大瓷缸上，對準人群開槍，一個女童中彈倒地，前胸汩汩流出的鮮血染紅了大米。士兵們表情木然，將帶有鮮血熱氣的大米裝進口袋，揚長而去，「只留下一汪絳紫色的土地和撕心裂肺的哭聲，還有一具花一樣年齡的女童屍體」。[3]

1948・6・29

在長春城外，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各部隊，以各師防區為單位成立對敵鬥爭委員會，由各師政治委員擔任主要領導，加大對長春的封鎖圍困力度。

在長春城內，張仁智，一家電影院職員，他為禦寒曾購買十五片豆餅做燃料，已經燒掉了十片。隨著被圍造成的物價猛漲和糧食的短缺，他把剩餘的豆餅拌著雜糧果腹。他的二哥每天下午都要去修築城防工事，他認為生活已難以為繼，他為此寫信給父親以及舅舅，希望他們能寄錢來長春，以免「斷炊」。

他在給江蘇揚州的父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近來聽外面人傳說很使人害怕的，現在往外走的人多被阻于國軍防線及奸匪防線之中間，進退不得，因走出國軍防線往敵方防線走就不許可。由孟家屯至范家屯這中間是兩不管的地方，如再想回到城裡來卻是不可能的了。其主要原因恐怕敵人混進城來，所以多被阻於城外，並且吃的就更是苦事。餓死的人已不在少數，把青草都吃盡了，聽說一雙金鐲子換兩個大餅子，你老想咱們能走嗎？敵方是絕對不讓走的。以上這許多情形不只是一個人所說而能證實的，城裡任何人都知道的。」[1]

1948・6・30

天津《益世報》自瀋陽專電稱，東北物價如脫韁之馬，軍民爭相搶購食糧，「瀋高梁米8萬流通券1斤」，而「長春榆樹葉1斤亦售8萬」。

在長春城外，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下發《偵察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隊領導親自動手，實行部隊、群眾、戰俘三結合，對長春敵周邊據點和市內情況進行全面偵察。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文閩在給四川岳池縣的朋友述周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孤立的長春因城防極固，安全絕無問題。只有物價因來源受到影響，一月來已漲約60倍。6000元1斤的高粱米現在賣到30萬元1斤（均流券）。其它物價也是一樣，豆渣、榆樹皮粉也得7萬1斤，人民食此物者幾乎半數。尤其白糖，現已到300多萬1斤了，其價之昂可謂空前未有。（......）物價天天漲，豬肉已賣到60萬流通券1斤了，其他物品也是在並肩齊上。」[1]

日期不詳

楊治興，天津《民國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兼上海《新聞報》特派記者。他在四十年後回憶被圍困期間長春市民的慘況：

> 餓死人的事時有發生，有的人在街上走著走著就倒了下去，再也起不來了。到後來，一些人餓死了，連屍體都無人掩埋。
>
> 我曾親眼看到一個人饑餓不堪，掙扎著捋路旁的樹葉往嘴裡塞，突然瘦弱的身體倒在路旁，再也沒有力量爬起來。酒廠的陳年酒糟也被挖出來摻和少量豆餅麵熬粥喝，這還是有辦法有能力的人家。饑餓像魔鬼一樣吞噬著人們的生命。〔……〕在二道河子的人口市場，一個大姑娘只換四個窩頭，還無人問津。[1]

劉振坤，國軍第一兵團司令部警衛連長。他在四十年後回憶空投大米殺死人的一幕：「由於解放軍的炮火攔截，飛機不敢低飛，空投目標不准，有的扔到解放軍陣地，有的將老百姓的房屋頂砸塌，不少老百姓被砸死。惟長春警備司令部的糾察隊，日夜搜尋，倘發現老百姓揀到空投糧食不報，即以搶劫論罪。有一天，我在四馬路親眼看到一個三輪車夫被空投的大米袋子砸死，真是禍從天降！」[2]

在長春城內，沙秀傑的三姑家，住在東三道街與東門里交匯處的棚戶區內，於一排地房的尾端。在屋裡，使用秫秸間隔開一個廚房，一個門框拉上一個門簾，就把臥室和廚房分開了。臥室是南北對面炕：

> 北炕是姑父和姑姑夫妻倆住，南炕是三個表

> 姐住，原來一家靠姑父給「馬車房子」趕馬車為生，外加三個表姐糊火柴盒為貼補家用。

國共兩軍你來我去地爭奪長春城，糧食開始緊張，馬開始失去了草料，「馬車房子」倒閉了，沙秀傑的姑父就失業了。後來，她的姑父在柴火市場賣杯秸和木柈子。在長春被圍後，杯秸和木柈子沒有來源，柴火市場自然消失，這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三姑告訴沙秀傑的媽媽：「實在熬不過去了，咱兩家就一塊出卡子吧。」

沙秀傑的媽媽回答說：「那敢情好哇，你家人口整齊，我孤兒寡母的，就給你們添麻煩了。」

此時，沙秀傑家已經完全靠高粱糠麵餅子為生了：

> 因為糠餅子很粗糙，很難咽下的，所以就邊喝水邊吃餅子，而糠餅子又很難消化，在胃裡不走動，人們四、五天都不大便，憋得很難受，媽媽就叫我們幾個小的跪趴在炕上，把屁股撅給媽媽。她用手給我們一個一個地摳，實在摳不出來，就用筷子蘸點澆馬車軲轆用的黑粘油，等體溫把粘油融化了，大便就出來了，肚子就輕鬆了很多。可媽媽和孩子的力氣全部耗盡，全都倒在炕上喘著粗氣。

隨著糧食的稀缺，沙秀傑的媽媽感到再也難以熬下去了。此時，與三姑家已有半個月沒有聯絡了。媽媽就帶著她去三姑家合計一下如何出卡子的事情。

>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家裡的大黑貓死在院南角，兔子窩裡的兔子也沒有蹤影了。院子裡很亂，像是很久沒有住人了。媽媽可能想到甚麼，就扒著窗戶一聲一聲地喊「三姐！三姐！」可是裡邊還是無人應聲。

> 媽媽一推房門，一股腥臭味撲面而來。她回頭叫我別進來。我也覺得不對勁，就幾步跑到屋內，媽媽在前頭就直撲北炕，在炕上，三姑夫妻倆就像睡覺一樣的蓋著被子，三姑面向姑父，手伸出來，好像要抓姑父的被子一樣，可是兩人早已氣絕身亡了。在南炕上，躺著嫵姐（大表姐）、菊姐（三表姐）。可能是年輕姑娘的緣故吧，她倆臉上尚存一點肉色和彈力，都看不出掙扎和痛苦的表情，扁扁地、很規矩地躺在褥子上，都穿著衣服，沒有蓋被子，兩個姐姐的長髮都很凌亂地搭在炕沿上。
>
> 屋裡的一切東西都很有序，就是沒有能吃的東西，地中央只有半壺水。媽媽沒有過分地驚詫和疑問，因為在當時棚戶區一家一家地死人是經常發生的。媽媽只是邊哭邊說：「你姑家半月前就斷糧了。」[3]

後來，沙秀傑得知，她的媛姐（二表姐）當年被她喜歡的男人帶著爬出卡子，得以倖存下來。

在遠藤譽的家裡，所有人都開始吃做高粱酒後的難以下嚥的酒糟了。遠藤譽後來寫道：

> 到這個時候，蒼白、消瘦的我們的皮膚變成了像老人那樣的黑色，滿是皺紋，好像是在沙漠裡乾枯了的骷髏：肋骨一條一條地顯露出來，在其下邊只有肚子顯得格外大；手腳像短木棍一樣細，互相一碰都能出響，很硬；皮膚下邊就是骨頭，皮膚松塌到可以用手指拉長。據說可以根據拉長的皮膚，恢復到原來狀態所需時間，判斷營養不足的程度。我們要是被分類的話，可能是屬於最高營養不足，這是因為不用手指動一下就不能恢復。
>
> 皮膚開始出現維生素不足的潰瘍，肉開始潰

爛。我自己還活著，但覺得身子好像要先死去。頭部也有潰瘍，不那麼痛。說起來是發癢，所以無意中就把手指觸到潰爛處，那麼約一釐米見方的毛髮，就連頭皮一塊拔掉。貼著指尖大小潰爛肉塊的一束毛髮，看著讓人很不舒服，然而，眼下只能注視著牠從自己的身體剝離掉。

身體一衰弱，蟲子也來找麻煩。我們被富有生命力的臭蟲、蝨子所壓倒，任憑牠們隨意來吸食我們已經不多了的血，費一天時間才拿盡蝨子。第二天早晨一看，以頭皮、胳肢窩為中心又慢慢覆蓋成一片，襯衣的縫口裡蝨子排著隊。[4]

在長春城裡，很多人都在議論共軍的斷糧攻勢，但遠藤譽是絕對不相信的，因為她在共軍裡有一個趙大哥。這個名叫趙安博的人，是共產黨於1946年佔領長春時受公安局委派去保護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的製藥廠的八路軍士兵。

遠藤譽認為八路軍裡有趙大哥，而趙大哥知道她在這裡，八路軍是不可能採取斷糧攻勢來奪取長春的。遠藤譽覺得是國軍在造謠。她一直在默默等待趙大哥前來解救她。

在長春市海棠街，餓殍戰除了給平民帶來饑餓，還有死亡。范傳華在四十七年後回憶道：

杜學良是我同班同學，比我長兩歲，長得膀大腰圓，將來准是個當大官的料。〔……〕他家就住在我家南面，靠近鐵道邊，離興安橋一里多路。

在6月的一天，他感冒了沒上學。就在這天下午，他坐在家門口背陰處散熱。忽然，大房身機場西部的八路軍炮兵向城裡開炮，一發炮彈正好落在杜學良同學家門口，他的身軀被炸飛了，

連屍體都湊不齊了。

他的母親為兒子買口棺材，還在家停了三天。母親成天哭天嚎地地思念兒子，還為兒子燒紙燒香。

同學們看到這情景，也都跟著哭，女生哭得更厲害。

在長春城內，除了活人吃死人，還有狗。范傳華寫道：「從我家到興安橋一帶的鐵路兩側土坎，簡直成了亂葬崗。屍體被野狗拖得滿地都是。野狗多極了，吃死屍吃得眼睛都發紅了，（......）可這一帶恰是我們上學的必經之路，（......）為防止野狗襲擊，我們（......）在高年級大哥哥的帶領下通過野狗出沒的亂葬崗。那時我個小，膽小，總是抓住高年級大哥哥的書包帶不撒手。」[5]

1948・7・1

《南京日報》稱，旅南京東北籍立委、監委國大代表，昨午3時舉行座談會，就東北情況進行討論，並決議請求行政院仿照全國五大城市配糧成例，施之於長春，並請當局「運糧救濟長春與瀋陽」。

北平《益世報》發自長春的報導中分析認為，在長春，國軍「僅能防守30里以內的市區」，共匪「必要待冬天的到來」進行總攻。對於人口超過150萬的瀋陽，如果不能打通瀋陽和北平的通道，那麼饑餓也將會「襲擊」瀋陽。而處於瀋陽後面的錦州，則可以通過地面和空中通道運載糧食軍火至瀋陽和長春。共匪正在等待國軍「自生自滅」，現在挽救東北「要看政府能拿出多少力量，關內能給東北多少支持」。

在長春城外的李家屯，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對敵情、兵力部署、火力配備等問題作了研究和部署，特別強調要加強對結合部的封鎖。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1日11時30分一前指報：圍困長春部隊召集團、營幹部，檢查、研究圍困長春第一步任務完成情況，改善和加強其鞏固程度，修正部署（尤須注意結合部），同時研究執行第二、三步任務。（......）1日13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一前指、熱前指、遼吉、遼南：（1）由專人經常巡視檢查封鎖狀況，協助地方黨政機關動員城附近群眾堅壁清野。緝拿向城中偷送糧者；（2）前指應組織北寧與中長路以東的檢查，聶鶴亭、陶鑄應組織對此線以西的檢查，程子華、黃志勇應組織對承德週圍封鎖的檢查，並將對承德封鎖部署電告。」[1]

吉林軍區政治部文藝工作團，是直屬于長春前線作戰指揮部——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的綜合性專業文藝團體。文工團在長春東郊小長屯附近一個逃亡地主的大院裡，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司令員肖勁光、政治委員肖華、副司令員陳光等高級將領二、三十人坐在板凳上，觀看軍區文工團演唱歌曲，慶祝1948年「七一」共產黨的生日。[2]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劉效周在給西安的長亮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東北向以高粱米為主食，而今連高粱米能吃的人數確屬寥寥。至於大米、白麵享受起的，不過有限數而已，一般平民的食糧，則是豆腐渣、酒渣、麵子、豆皮、糠、麩皮、榆葉、榆皮、野菜、野草、樹根等，隨人們生活高低而有分區。軍人所食只靠軍機空投。然而空投有限，連人們需要的苞米大豆也被侵佔了，目前餓死的人相當多，餓不死的當然更多。然而八路軍為了斷絕糧源，已將百里以內田禾割盡，以實行其堅壁清野政策，所以餓不死的人將來也是餓死。我是如是想法，一般人也是如是想法。」[3]

1948・7・2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

2日10時，圍城司令部令各部注意之幾點：圍長戰役，我在形勢與兵力上均佔優勢，但由於長市敵還有一定人力、物力基礎，使我不得不分散足夠的兵力，進行較長時間的封鎖圍困，並組織奪取可能奪取之周邊陣地的局部攻擊，逐漸壓縮敵人。同時，還須粉碎敵反封鎖的出擊，才能達到周密封鎖、削弱敵人，造成攻擊長春的有利條件。因此必須注意控制突擊力量，保持適時換班，加強結合部，消滅我之弱點。各兵團部署一般的要合乎以上原則，但有的兵團存在著與友鄰部隊參差不齊，有空隙，有的結合部配備弱部隊，或派少數部隊和騎兵，有的不必展開三個團，而展開三個團建制，形成團有縱深，師無縱深，有的營有縱深，師、團無縱深，這些弱點不改變，便成為敵可乘之機，為此規定：

（1）各級單位盡可能控制第二梯隊，最好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兵力。

（2）結合部及威脅大的翼側必須設強部隊。

（3）規定部隊的換班次序與時間。

根據以上原則及7月1日李家屯縱、師幹部當面商決之辦法，調整部署，於本月10日前完成。[1]

在長春城內，國軍第七軍軍長李鴻發給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的電文稱，長春「糧源枯竭」。長春「糧源缺乏運補困難必要時豆餅亦須供人食用馬騾仍以食草為原則」，為共度難關，「請不必再請求為要」。[2]

1948・7・3～1948・7・6

在內蒙古赤峰，中共《群眾日報》7月3日以「饑餓死亡線上的蔣區人民」為題，刊登署名為齊肅的通訊文章，該文講述共軍進入國統區目擊到的承德南鞍匠屯一帶的嚴重饑荒：「大甸子村3天中餓死2人，有一個50多歲的老頭到山上去挖野菜，因無力餓死在山上。一間房黑溝門也餓死2人，四區大檳榔溝等幾個村幾天內已餓死十來人。」

為斷絕承德國軍的接濟，「增加其困難，造成有利攻取承德之條件」，林彪對承德週圍東、北30里以及西北50里區域進行部署封鎖，指令圍城部署務必於7月6日完成。並對封鎖提出要求：「行動要俐落，各圍困集結應協同地方黨、政、武委及公安機關動員群眾和民兵，劃定承德週圍30里為鎖區，實行戒嚴，各大小路口設立盤查哨，禁絕一切糧柴食用品進承德，盤查與防止奸細、奸商混入我區。應常派出小部隊（縣支隊、武工隊、或一個營左右兵力），接近承德周邊，進行偵察執行逮捕通情人員，消滅出擾搶糧抓兵之敵。我主力應集結於機動位置，主動地有計劃地消滅敵人之周邊據點，奔襲或伏擊敵的運輸、破擊敵之運輸線，切斷交通。當敵外出掃蕩時，則集中兵力，尋找弱點，消滅其一部。」*

《東北日報》7月6日前線訊：「晨，長春敵新三十八師、暫六十一師、暫二十一師、暫五十二師糾集各約一團兵力，在炮火掩護下，分向長市西南、正南、東南出擾，並以一八二師兩個連東出八里堡襲擾我軍陣地，圍城我軍某部分路予以痛擊，激戰至下午，各路之敵均被擊退。我斃傷敵480餘名，俘敵90名。」

廣州《中正日報》7月6日特電，兗州城郊白刃爭奪戰，今仍激

---

*關於共軍圍困封鎖承德市造成的饑荒後果如何，作者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查閱中華民國1948年同時期的20餘家報刊，除了天津《益世報》有幾篇發自承德的關於災荒的報導之外，其它的報紙僅對發生在熱河省的國共爭奪戰刊登過一些來源於中央社和軍聞社的電訊稿。

1948年10月19日共軍佔領長春後，中共《群眾日報》稱，承德是在11月12日中午佔領的。承德守城國軍第十三軍「在我強大攻勢震撼下」「倉皇棄城」逃走。8萬承德人民「以萬倍狂歡的心情」「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到來。

烈進行，共匪以十倍兵力猛衝，在「24 小時中達十三次以上，匪軍死亡已達萬人，遺屍遍野，血雨交流，戰況空前慘烈」。

在哈爾濱，中共《生活報》以「長春近況」為題，刊登署名為岳朴生的文章。該文中稱：「任何長春市民，都可以告訴你幾段南湖新增的浮屍或者某某路全家服毒的事情。這是由饑餓逼成的。現在長春的高粱米每斤十七、八萬元，還在繼續增長，榆樹葉也賣一萬七、八。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了。」

1948 · 7 · 7

《東北日報》以「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為題，發表社論紀念抗戰十一周年紀念日。該社論中稱：「東北解放區是全國進行愛國自衛戰爭的總基地，我們不僅要為解放全東北而戰，而且要擔負起支援全國的責任來。（……）由於以往的努力，我們已度過翻山頭的艱苦時期，今後必須再接再厲，發揚光榮傳統，盡一切力量來保證前方供給，滿足前線需要，一氣完成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任務。」

天津《益世報》自承德航訊稱，由於共匪的圍困，承德市內糧食暴漲，已發生饑饉現象，「搶米搶飯事件迭出」，市民遭「生活所迫為盜為娼」。

該報刊登一位署名為「無名氏」的人致報社編輯的來信，並附上一張法幣 2000 萬元的支票，請求代轉分發給受難的東北同胞。他在信中寫道：「（東北同胞）來津投奔無著者，夜宿街頭，日不一飽，風吹日曬，加以時降大雨，致而疾病叢生，呻吟之聲，遙聞於人群。厥狀之慘，一若人間地獄。鄙人深念兔死狐悲之感，因撙節日常所需法幣 2000 萬元……懇祈代為分發各位難胞。雖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但亦略表人類同情之意。」

在哈爾濱，林彪再一次對圍困承德部隊進行詳細部署，並提出嚴

令：「各圍城部隊必須接近敵人，保持接觸，經常襲擾之，並在大小道路設立崗哨，斷絕行人、糧草入城。圍困期間，加強政治攻勢，瓦解與動搖敵軍心，以利將來作戰。」

軍聞社長春電：「長春國軍5日晚向石虎溝及宋家窪子一帶出擊，斃傷匪300餘名，（……）6日空軍出動轟炸長春西大房身機場、范家屯一帶，炸毀匪炮兵陣地數處。另於范家屯附近毀匪補給大車百餘輛，（……）長春周邊匪獨九師6日拂曉遭我出擊部隊奇襲，匪猝不及防傷亡逾千人，刻已逃至孟家屯以西，不敢蠢動，刻國軍仍續向匪進擊中。」

1948・7・8

為了保證圍困長春的軍食民食，中共東北行政委員會頒佈命令：「東北解放區境內糧食得自由流通。」

1948・7・9

北平《益世報》自瀋陽報導稱：「現在的東北，只剩下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點，而這三個孤點，又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正受著風雨的激打，未來的命運確實使人擔心！瀋陽，是東北軍事、政治、經濟的心臟，（……）擁有150萬人口的大都市，數以百計的軍政機關和流亡省市政府都設立於此，形成了東北的神經中樞，自從北寧路瀋錦段中斷以後，東北與關內正式隔絕，（……）孤點瀋陽，在四面楚歌聲中，像一癱瘓的病者，僅僅靠著空運輸血，苟延時日，（……）掙扎在饑餓線上的民眾（生存和逃走都比）『登天之難』。」

中共東北局發出《對長春準備工作的幾項決定》，成立接管長春市籌備委員會。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三十八師軍人年釋在給江蘇金山縣的也春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久困的長春一切都呈著麻木不神了。馬路上車馬稀少，為的是入不敷出，馬車夫一天所掙的車錢給喂馬還不夠呢。三輪車夫吃了豆渣豆皮車子也不夠勁，這不是形容。為了糧食的嚴重，對於營養是談不到了，只能塞飽肚皮而已。最近學生中毒數十起，闔家吃了榆樹葉與乾魚粉而發生慘案，可知長春的市民在窮困中還瞎想著企圖飽的法子。」[1]

1948・7・10

天津《益世報》稱，熱河省17萬平方公里的版圖，由於災荒的肆虐，在60萬貧民和難民中，「正有許多人被惡運之神逼迫著走近人生沒落的邊緣了」。

共軍封鎖包圍長春後，長春工作委員會增加了接收難民和學生的工作，成立了長春學院，把由長春逃出來的學生收到學院集訓。至7月10日結束，共招學員450多人。從中選出220人編成六個隊，派往吉林市搞社會調查，學習如何管理城市。包括其它途徑，至接管時已經培養八、九百名幹部。[1]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岱雲在給青島的母親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在5月節前後走的同鄉都被留在國共交界之處，進退不得。據說連青草都吃沒了，餓死的很多。每逢雙方交戰的時候，被炮火打死的橫七豎八滿野都是，淒慘之狀令人難忍。（……）長春市現下最缺乏的要以糧食了，市政府現在成立了一個食糧管制委員會，限制百姓存糧，每戶不得超過三月，餘者沒收。長春市百姓家中存有三月食糧很少，人們簡直不能生活，一旦哨卡一開，人們立刻就得走一半有餘。現下長市已成死城，（……）我們突破難關之後，即會見面。」[2]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內，當貨幣膨脹到無法核算薪金時，民國政府當局只能以糧食代為支付了。被困在城裡的一家報社記者在四十年後寫道：「進入7月，公教人員的薪金就用黃豆和酒糟等來代為支付了。我領過兩次黃豆，每次30斤。以後就發票叫自己到酒廠去領麯子餅和酒糟。酒糟得自己去刨，本來就吃不飽飯，還要餓著肚子拿出力氣來去刨酒糟，那怎麼得了。陳年的酒糟本來是可以入藥的稱之謂『神麯』，如今要用來當飯吃，也只好試探著做了一下。先把酒糟用冷水浸泡了兩、三天，經常換出紅水，把剩下來的渣滓摻合豆麵做成小餅，再用油炸焦了食用。我第一次吃到這樣的食品還覺得挺香，可能是由於吃得多了些，吃完了後又喝了冷水，睡到半夜就肚子絞痛得難忍，然後就發高燒，下瀉紅水，一下子就撂倒在床，一病半個多月沒能起來。等病好之後，已經軟弱得不會走路了。」[1]

對身在長春市海棠街的范傳華來說，他連難吃的酒糟也沒有。但他也有了收穫：在他家門口的馬葫蘆（即下水道），是他尋找糧食的好地方。

> 一天午飯後，三十八師炮兵排的伙夫往馬葫蘆裡倒涮鍋水，污水滲下去流走了。我意外地發現散落在垃圾裡幾塊高粱米粥的透明鍋皮，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我趕緊爬過去揀吃了，回到家還告訴全家。一貫對我舉止行為要求很嚴的爹聽後，喘了口粗氣沒吭聲，但他並未制止我。
>
> 媽媽在一旁說：「這年頭天天打仗，死活不一定，甚麼乾淨不乾淨，吃一口就攢一口……」
>
> 打那以後，每逢國軍伙夫在飯後半小時左右就過來倒涮鍋水，而我就像貓候在洞口抓耗子似

地坐在馬葫蘆旁，就這樣，幾乎每次都能揀到點甚麼吃。到後來，由於全身浮腫行動就更不方便了，既不能蹲也不能哈腰，於是就側臥在馬葫蘆旁揀東西吃。國軍哨兵好像發現甚麼重要情況，也持槍過來看個究竟，一看我在幹這個，於是捂著鼻子轉身就走。

有一次，我意外地發現一小塊二合麵（苞米麵、高粱麵）窩窩頭，我吃力地好不容易才摸到手，這真是如同大旱得了雨，那當午的心裡簡直像開了花。不過，那年月是極少遇到這樣心情的。於是，拿過來就要吃，剛到嘴邊，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爹浮現在腦海裡。我放下小手，把這塊窩窩頭握在手心裡，爬到牆根再扶牆站起來，一進屋就趕緊把這塊握在手心裡的窩窩頭遞給媽媽說：「媽，給你！」

媽看是塊窩窩頭，就驚奇地說：「是誰給你的？」

「是國軍伙夫倒扔的，我在馬葫蘆裡揀的。」

「就這麼一口東西，你就吃了唄，還拿來家幹甚麼？」

「拿來給爹吃。」

媽媽躊躇了好一會，她才伸過一隻顫抖的手接過這疙瘩窩窩頭，窩窩頭雖小，卻重千斤……

媽媽看著手心裡的這疙瘩窩窩頭，眼裡浸滿淚水，慈祥地望著我不作聲，（……）她慢悠悠地把這塊窩窩頭遞給爹。

剛才的情景，爹都看在眼裡，他對媽說：「不光我餓，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掰開！一人一塊。」就把媽的手推了回去。

媽只好掰成四小塊，這時媽媽才突然發現，原來這塊窩窩頭都拉弦了，同時還散發出一股刺鼻酸味。

這些我們全然不顧，吃起來又是那樣香。弟弟沒吃夠，他對媽說：「媽，我哥要是每天都能

揀這麼一塊窩窩頭就好了。」

爹插嘴說：「哪有那麼好的事，這塊窩窩頭是餿了，要不國軍也不能扔啊，你沒看見他們每頓飯一個人才一個窩窩頭嗎？」[2]

在饑餓面前，嬰兒往往是最無助的。在長春城裡，被困的一名報社記者在四十年後寫道：

進入7月，糧荒越發嚴重起來，市內連續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我曾親眼看到保育院用手推車推出滿滿一車被餓死後剝得精光的男、女孩童20多個，像運白條豬一樣推往郊外去掩埋。這些無辜兒童大約都在十三、四歲左右，個個餓得皮包骨，全身呈土褐色，有的還沒閉上眼睛。

敵偽時代車站前的日本神社，國民黨時改作幼稚園，郝恩林在那裡當園長。有一天早上，幼稚園門前竟擺放著八、九個半死不活的嬰兒，有的穿著衣服，有的裹著小被，有的上面寫著紙條，記著嬰兒的名字，請求代為收養。其中有一封信是這樣寫著：「我為了活命，下決心要走出卡哨，為了自己的命，也為了這個小生命，我只好狠心扔下這個孩子，託福你們代為撫養，事出無奈，只好忍痛……」

後來，這種嬰兒越來越多，幼稚園也因條件限制，苦於無力收養，又值8月酷暑，那些嬰兒的嘴角、眼角、鼻孔、耳朵、肛門，都被綠頭蒼蠅叮得生出蛆來。大多是活活地餓死在幼稚園的門前，景象十分淒慘。更慘的是有的年輕婦女為了自己逃命，竟然用買糖果哄騙自己的孩子，扔到大街上就一去不復返了。[3]

1948・7・13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6時專電稱：「長春糧荒益嚴重，草根樹葉食一空。」

天津《益世報》自承德航訊稱，被圍困中的承德，饑饉日益嚴重。「倒斃街頭者日有數起，採樹葉挖野菜以充饑。」

圍困長春的10萬共軍也面臨糧荒。中共吉林省政府發佈「對開放糧食的指示」，指示中稱：「各級政府、農會，必須立即將政委會之命令，及暫行辦法傳達給群眾，並實際取消鄉村封鎖糧食的行為，使糧食能夠自由買賣、運輸。縣區政府及農會，應該深入檢查，如發現仍有封鎖糧食的村屯，應給以有效地糾正，並隨時接受群眾對封鎖糧食的控訴或報告。積極負責的予以處理解決，務使命令在自己工作範圍內能夠貫徹執行。」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412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目睹哥哥勲被餓斃。勲在軍隊時身體就很差，當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亡後，一連串的打擊，令他的身體變得更加虛弱。這一天，他在到井裡提水時累垮了，他說這是鬧肚子，就去睡覺了。

> 睡一會兒，哥哥心情會好起來，母親邊這樣想，邊向走廊走去，想拆卸滑梯做燃料。這時，哥哥突然大叫起來：「喂，拿——溫度計——來！」
>
> 哥哥像瘋了似地大聲叫喊：「不是！是要溫度計！溫度一個勁地上升！不是溫度計測不了！」
>
> 不知道從他身體甚麼地方喊出那麼大的聲音。已經是七月，不用考慮取暖的事，所以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房間。哥哥在樓上左側自己的房間裡躺著，這是離樓下最近的房間。哥哥的喊聲傳到一樓，在一樓客廳裡的父親，正在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商談重要的事。父親提出用豬飼料的豆餅做麵包的問題，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很傲慢，擺出一副架子。可是，由於是請求國民黨的政府拿出資金來，所以現在在政府官員面前要留下好印象，不然不好辦事。這不是父親個人的計算，而是為了不要出現更多的餓死者。父親生氣地跑上二樓說：「你不能安靜些嗎？你難道是個小孩子嗎！自覺點！」父親規勸後，又急忙下樓去了。父親商談結束後，來

到二樓時，哥哥的瞳孔已經放大。

「勲！你幹甚麼？振作起來呀……」

父親邊呼叫哥哥的名字，邊用顫抖的手抱起哥哥的臉，可是哥哥沒有任何反應。「不要！你別死！喂！勲！我說你不能死，為甚麼不回答呢？……不准你先走……不准你先走……」

「哥哥，哎，你喝米湯吧。」

母親往哥哥的嘴裡用匙子灌米湯，一看，哥哥咕嘟地喝下去了。

「哦！」

看到哥哥還活著的父親，立即扒開哥哥的前胸的衣服，把耳朵貼在心臟聽。可是一匙子的米湯變成了臨終的水。儘管這樣，父親沒有死心，跨在哥哥的上方，繼續做壓迫心臟的動作，可是哥哥終於沒有復活。

「這是怎麼說的……為了不讓你餓死，我才訓了你的。沒有想到這句話竟成了這個世上離別的話……你可能認為是無情的父親吧……勲……寬恕我吧！」

父親抱著哥哥哭起來。

我聽到父親嘶聲喊叫，這是第一次，看到父親哭泣也是第一次。

哥哥被埋在乙醚倉庫裡。

這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的事。

不久，父親倒下了。[1]

1948・7・14

在長春城內，居民陶永芳經歷了出賣衣物換糧充饑、糧價如脫韁野馬般飛漲、餓死者充斥街頭後，他不堪生存壓力，決定忍痛攜妻逃離長春城。他通過長春市南郊國軍最前線的卡哨，進入了「人間地獄」的洪熙街。在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幅度只有三華里（1500米）的空隙裡，塞滿了五、六萬難民，他們在這兒被阻不能南下，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煎熬中。他親自領略了人類怎樣同饑餓與死亡做最後搏鬥的殘酷情景：

> 長春市內新興的大車店如雨後春筍，每日出卡哨最多的時候達 3000 輛以上。「洪熙街」原是「滿映」（光復後接收而為長春製片廠）所在地，是著名的一條南下的通路。六月初旬，國軍難胞出市後即不准再度入市。共軍則每隔三、五日，放難民車通過一次。但自六月中旬起，共軍便遮斷交通，加強封鎖，任何人不准通過。可是洪熙街與市內消息不通，國軍卡哨放行，難胞的車輛仍源源而來，於是這三、四里的空隙，幾千幢被拆毀的住宅，便塞滿五、六萬不能南下的難民，洪熙街立刻成了鬧市。

陶永芳邁進這個「人間地獄」的門檻後，便感到死亡的恐怖氣息充滿在這狹窄的圈子裡：

> 最初難胞可以殺馬吃肉，用帶來僅有的衣物，換取偷過共軍封鎖線的老百姓背來的少量食糧度命。青壯年人還可以空身乘黑夜爬出封鎖線。可是後來共軍調來一批韓共*，充實軍事封鎖線的力量，使難胞想做漏網之魚也不大可能。
>
> 筆者 7 月 14 日來到洪熙街，正是韓共換防。四十華里圓周的封鎖線，把長春困得水泄不通。這道封鎖線幅度約十里，難胞必須爬過七、八個共軍卡哨，每個卡哨保持電線杆的距離，晝夜在那裡監視。老百姓扶老攜幼，三五成群，趁黑夜隱匿在高粱地裡伺機爬伏前進。可是人體撥動禾葉的響聲，孩子們被蚊子咬哭

＊韓共，即朝鮮獨立師第六師共產黨軍人。

以及老年人的咳嗽聲，很容易招來共軍監視的注意。一位母親怕孩子哭，把乳頭塞在孩子嘴裡，竟把小生命斷送了。

共軍發現老百姓之後，初則喝令「回去！」繼則向空鳴槍恐嚇，最後糾集幾個卡哨，把高粱地潛伏的老百姓驅聚在一起。他和靄地告訴大家說：「這是軍事命令，任何人不准通過，你們百姓回去吃，吃光了，長春就快『解放』了。」

百姓無論怎樣哭求都無效。天明之後，他們便將這些偷跑的難民執槍護送到洪熙街原處。假如強行通過，自將慘被射殺。老百姓在洪熙街那裡，晝間不得飽食，體力衰弱，夜裡爬過幾次不能脱出，饑餓與食野菜中毒，只有奄奄一息，坐以待斃。

筆者親眼看到倒斃的餓殍，散發著糜爛的臭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躺在馬路旁哭喊著：「我的親媽！可把我餓壞了。」一個3歲的嬰兒，母親把他丟在馬路上，已經餓得不會哭了。

洪熙街也有破爛市，衣物不值一文，吃食價格與市內平行。賣糠餅小販時遭饑餓群眾的搶掠分食。僻路上專有搶吃的暴民。這地方沒有「統治者」，國共兩軍的諜報員則出沒其間。夜裡兩軍開火中，這數萬難胞就變成火線上射擊的「活靶子」。

筆者和妻處於這生死線上，沒有恐怖，一心一意地尋覓怎樣掙扎脱出險境的路子，鼓起生之勇氣與饑餓死亡做最後的搏鬥。[1]

在之後的十一個晝夜，陶永芳和同行的六人展開了四整夜的突圍行動，但是因為突圍的人數太多，夜裡有月光，共軍的卡哨太密，結果都失敗了。同行中的三人無法忍受下去，決定設法返回長春城。

陶永芳和妻子依靠從城裡帶來的炒麵和挖來的野菜果腹，每天只吃兩餐，夜裡宿在兩層破樓的底層水泥地上，忍受著蚊蠅的錐刺。夫妻倆認為：置身死地，只有前進才有生路。

在長春城內，天津人宋憲文在給天津的福源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現下長春市民人人臉黃面瘦，都餓得不得了。一般窮民在花園裡打野菜，樹葉在菜市賣一萬四、五千元1斤，豆皮、豆腐渣、穀糠、豆餅每斤均賣東北流通券十幾萬元，高粱米、棒子麵每斤7月14日計三十余萬、四十幾萬1斤。白麵、大米每斤80萬元；關於往外走的情形，現下中央警備線任何人都能出去，但是再想回來辦不到。到周邊八路

卡子口任何人都不叫走，封鎖，也走不了，也回不來。集在周邊人馬車輛頗多，男女老少計數萬人口，將周邊草芽都吃光，餓死的頗多。現下警察局奉兵團司令部令，在長凡無正當職業及證明書者，一律送卡子哨外，為節省食糧起見，將弟此次也想回津，但是這種情形已實不能走，等八路解圍時馬上返津為盼。」[2]

1948・7・15

《東北日報》稱：「長春周邊我軍擊潰守敵小股出擾，三次殲匪 230 餘。」

北平《益世報》稱：金融管局北平組昨天奉財政部命令，調查 7 月 5 日至 10 日從東北匯款入關數和匯款數。

1948・7・16

中央社長春電：「與饑餓搏鬥達 50 天之長春市民，現莫不翹首渴望政府接濟彼等以較多食糧。據估計，每日若有飛機廿架空投食糧，則一切糧荒跡象即可消逝。」

《生活報》以「長春停在『六點半鐘』」為題，刊登署名為王坪的文章。該文稱，長大代理校長張德馨博士是 6 月 3 日化裝成商人逃出長春，6 月 17 日到達吉林。他說，長春人民「生活就是捱命，願望就是解放」。張德馨博士講了一個故事：「去年 10 月中旬，我軍進攻吉長路，小豐滿的電源被截斷了。長春在 10 月 17 日下午六點半鐘全城停電——電車走到哪裡便停在哪裡，機器轉到甚麼姿勢便停在甚麼姿勢上。就在那一秒鐘的時間裡，全城一聲『啊呵』便失去了熱力，失去了光明。直到今天，有的電車還停在街上，機器還保持著待動的姿勢，電鐘的時針還指著六點半。」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楊祖益在給雲南大理的友人王思傑未能寄

出的信中寫道：「現刻之長春市，如孤城一座，內缺糧草，外缺救兵，周圍毛匪如蠅，（……）市內樹葉皮都食得一光，鄉村裡房屋糧食被共匪搶得一光，人民餓死不計其數。」[1]

1948・7・17

新華社東北總分社電：「四個月來，長春蔣軍 3000 餘投誠。」

《吉林日報》以「古城末日：長春城邊隨軍見聞」為題，刊登署名為楊賡的通訊文章，該文中稱：

> 「再往北邊走，老百姓的生活就越發夠嗆！」當記者在長南城草溝我軍的一個連隊裡訪問時，戰士們都這樣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從 6 月 14 日由伊通邊門出發起，北來後的 4 天中，我巡視了這座圍城的一角，由挨近長春城南的我軍最前沿，縱深 20 餘里內，便得到了這個證實。
>
> 跨過走過這一帶，沿途使我更加深了「十室九空」的印象。這裡的十室九空，和長西更有不同，這裡不但是老鄉們家裡糧米和衣物都被搶光了，而且房頂的草也被「胡子」（注：土匪）扒了一層喂馬，樑木則被蔣介石的正規軍扛去當柴火了。（……）從望遠鏡裡向城邊看去，那有名的「滿映」以西的洪熙街，一棟棟的洋樓也都像經過了一場大火一般。（……）
>
> 我親眼看到了那些吃灰菜過活的人們，兩眼像個銅鈴，面孔好似瓜瓢，頸子只剩了一撮，壯丁卻像個孕婦似的。（據說還有吃了沒有鹽的灰菜身上長出白毛，像「白毛女」一樣淒慘的同胞！）今天（6 月 17 日）早上，房東王大哥告訴我：他家老爺子還忍饑在地裡幹活，今天就躺在炕上爬不起來。幾個小孩也像小燕似的貼在炕上。他一身要供養一家七口人，這日子真是沒法過。這些天，在我軍廚房的門口，乞討的人們不斷來去，仁愛的解放軍弟兄們，他們不顧自身任務的需要一定的營養和體力，寧願自己也吃不飽，硬要拉著老鄉一起吃飯，也有一起和老鄉吃灰菜腫了臉的。他們還節約出

糧食來，給老百姓換些種子把地種上。（……）

我們的炮手們可稱得起「百發百中」，城內敵軍的軍政機關勵志社、警備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都中了彈。據城內出來的人說，省政府的一個膽小的「官兒」，聽見炮響連忙藏進地下室，待他剛剛進去，炮彈也恰好趕到，不巧把他打死了。在前沿的陣地，我用肉眼也可以看到，那座相距幾百米由敵軍據守著的建國學院的紅磚大樓，也被我們的炮手們戳了四個窟窿。東面的一座白洋灰角樓，則被打得殘破不堪。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獨九師 17 日報：長春城內開始死人，已達二百。」[1]

日期不詳

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在其出版的書中寫道：

> 在我軍包圍下，長春市內，人人思危，前景是可怕的。除少數上層官員外，多數人饑腸轆轆。長春守敵一方面要「固守」，另一方面還要把市內幾十萬人民食口的包袱背起來，我阻止市內人口外流的目的就是促使守敵早日潰不成軍，縮短它苟延殘喘的時間，早日解放長春，早日拯救長春及其周圍人民於水深火熱。
>
> 我圍城部隊在長春周邊設有十個哨卡。開始，主要是控制人口外流和接待盤查國民黨軍逃兵。到了後期，這些哨卡有的成了我軍放行和收容市內難民外逃的出口。這些哨卡的位置在：宋家窪子以北；崔家營子以東；火燒里以南；大隨家窩棚附近；孟家屯附近；歡喜嶺附近；獾子洞附近，八里堡附近；東大橋以東；吳家窪子附近。[1]

楊治興，天津《民國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兼上海《新聞報》特派記者。他在四十年後回憶身處國共對峙的緩衝地帶的長春難民的慘況：

> 許多人拖兒帶女出城後困在緩衝地帶，進退兩難。7月間，我到二道河子周邊緩衝地帶觀看。在寬不足500米的地帶裡，聚集著數千名買動哨卡官兵而始得出城的難民，一些小商販在這裡設攤叫賣，他們把窩頭和玉米粥鎖在鐵籠子裡，以防被饑民一搶而光。
>
> 在這裡，物價高得簡直使人難以想像。如果不是親眼看見，我也不會相信。一個中年人用一

枚金戒指換回一個窩頭，給快要餓昏的孩子吃。（……）我抬頭向前看去，幾個赤裸著身子的孩子躺臥在田間的道旁，身上落滿綠頭蒼蠅，原來他們已被餓得奄奄一息，竟沒有力量驅趕這些討厭的東西。離他們不遠的高粱地裡，橫陳著幾具發脹的屍體，無人掩埋。更慘的是，竟有人用刀子剜割剛斷氣人身上的肉充饑……[2]

在長春市海棠街，對范傳華來說，這是他和10歲的弟弟范傳章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死人。

> 7月的天氣又悶又熱，嗓子眼像塞上一團棉花堵得透不過氣來。一天上午，我們哥倆在鐵道邊的苞米地裡挖野菜。剛爬到地邊，嗡！一群綠豆蠅子飛起來了，接二連三地直碰臉，就像一把豆子打在臉上。弟弟的眼睛挺尖，連忙說：「這裡有一個死屍，太臭了！」我說：「不要緊。」說著就爬到死屍旁，顧不上腐爛發臭的氣味，也顧不上綠豆蠅子碰臉上了，只要是有野菜就行！尤其是曲麥菜有一尺多高，又嫩又細，我們高興極了，不一會功夫就採得一乾二淨，就在這小塊苞米地裡挖了一筐野菜，我們哥倆高興地抬回家去。[3]

為將長春封鎖至死，共軍軍民聯合對敵鬥爭委員會制訂措施，斷絕封鎖區內人民自由向非封鎖區購糧換糧，嚴格控制封鎖區內的糧食流動，並加強崗哨、軍民聯防和群眾緝私工作的獎懲力度，令長春城陷入糧食缺乏的絕境。

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在其出版的書籍中寫道：「如獨立第八師指戰員經過反復討論，自訂出十項圍城紀律：（1）堅決完成封鎖任務，不放進一粒糧一根草；（2）

嚴格檢查行人，不馬虎放過一個人；（3）為解放多數群眾，不能為少數人痛哭哀告所動搖；（4）對群眾和氣耐心，做到逢人宣傳；（5）不亂沒收，不打埋伏；（6）站穩立場，不受賄；（7）沉著機智處理情況，不亂打槍，不脫離崗位；（8）認真耐心挖好工事，防止敵人出擊；（9）反對盲目輕敵，做好戰鬥準備，堅決消滅出擊之敵；（10）發揚吃苦耐勞精神，堅決完成任務。」[4]

在長春市東大橋，沙秀傑和柱子去找空投的糧食。柱子是個男孩，父親已亡，與母親相依為命，年齡比沙秀傑大三歲或四歲，兩個人是在妓院賣糖果時認識的。柱子說，他的媽媽已有六、七天水米沒進了，都起不來炕了，他想到南湖的水裡找一找，看是否有空投到湖裡的大米。弄點大米給媽媽吃，或許哪天身體好起來後，兩家可以一起出城爬卡子。沙秀傑同意了。

當時許多饑餓的老百姓也知道南湖是國民黨空投糧食的目標地點，都圍在目標外等著糧食投落。拿槍的大兵在裡圈看守著目標地。我倆剛到，飛機就轟轟地來了。看老百姓太多了，飛機上下飛旋就是不投米袋。老百姓見飛機不投米，就都沒命地跟著飛機跑，希望米袋子從飛機上掉下來摔碎會漏出些米來，好能搶點兒。（平時米袋經常）也有沒摔破的，老百姓跑在大兵前面，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刀劃個口子，人們就一哄而上。

柱子尚年輕，有點力氣，比大兵跑得還快，眼看著他跑在最前頭，後面跟著大兵和一群人。飛機把人群甩開，一個俯衝，扔出一個米袋子，人們喊：「下來了！下來了！」所有人都望著、奔跑著、喊著：「米袋子！米袋子！」

柱子哥，他還是個半大孩子，後面的人誰都沒喊他一聲，叫他小心躲開米袋子！他只顧死死地盯住米袋子，拼命地追趕著。米袋子迅速地由

一個黑點兒變成一個長方形的大黑片，在瞬間，一大片黑由深變淺旋轉 360 度，急劇往下落。

我從高坡上往下坡跑，眼睜睜地看著他傻仰著脖子，那米袋子不偏不倚從柱子的正上方直直地下來，把他砸倒了。等我跑到他跟前，大兵正拿著槍驅趕著圍上來的人群。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大兵喊：「他是我哥！他是我哥！他怎麼了？快幫幫我！」

兩個大兵把柱子挪抬到一邊，用手摸摸他的鼻孔說：「他死了！」我上前看，他哪兒也沒出血。我不相信地喊他：「柱子！柱子！柱子！」可他真的一動不動了。

那米袋子由於砸在柱子的頭上，也沒有被摔破，只是外層的包裝袋破了，露出裡面的四個小袋。人們見沒有收穫，又砸了人，就散了。大兵把四小袋大米拿走了。一個大兵把摔破了的包裝袋扯把扯把蓋在柱子的身上，對在一邊大哭的我說：「別哭了，快回家送個信兒吧。」

我哭著拎起柱子從家帶來的空米袋子，剛要走，一股風把蓋在柱子身上的袋子布掀開了，這時露出柱子慘白的臉。我邊哭邊往家跑。

可要到家了，我的腿軟了，全身打著哆嗦。我不敢進他家的門，我怕看見柱子媽聽到這個噩耗後悲傷絕望的模樣，她可能會像個瘋子般哭喊著打我罵我吧！我在他家門外來回打著轉，就是不敢開門。鄰家出來一個女人說：「你上柱子家呀，他媽病著呢。」

我慢慢地拉開門，屋子裡很暗，一點兒動靜也沒有，靜得我更害怕了。進到裡屋，看到大白天窗戶嚴嚴實實地關著，還拉上窗簾，柱子媽順著炕洞子躺在用很多被子墊高的被窩裡，在枕頭前，有一個空飯碗和一個盒子。她眉眼不睜。我喊兩聲「嬸子」，她才睜開眼睛，也不說話。我哭成淚人似的兩手掩面說：「嬸子，柱子哥叫空

投的米袋子砸著了！」

出乎我的意料，柱子媽竟面無表情地說了兩個字：「死了？」我涕淚交流地說不出話來，跪趴在地上，手扶著炕沿，點點頭。她的臉色幾乎一點兒表情都沒有，半天才從那滿是眼屎乾巴的眼角邊滲出很小的一滴淚珠，她慢慢從被子裡挪出一隻黑瘦乾涼的手，在我的淚面上劃拉一下說：「別哭了，他是想給我弄點兒米。這下我也就不用擔心了……你回家吧！有力氣別亂跑了，告訴你媽媽快出卡子吧。」

我甚麼都辦不了，只把柱子的空米袋子撂下，喊兩聲「嬸子」，就哭著走出了她的家門。後來，聽說柱子媽自消自滅地死在了自己的小屋裡。[5]

1948・7・18

北平《益世報》稱：「內匯開放後，東北資金匯天津數額益增，據天津金融管理局統計，6月30日至7月14日間，由中央銀行撥各行局庫者，共計八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億元。」

中央社長春電：「『綠化長春』之計劃已逐步實現，所有公園空地與馬路兩側之草壇，以及郊區土地，均已成為良田或菜園，總計市內已耕土地達500餘畝。」

1948・7・19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7時專電稱，長市市民生活艱苦萬分，「多數市民每天吃一餐」。

中央社漢城電稱，中共與北韓共產黨，於3月16日在平壤成立互助協定。據悉這份協定是中共代表在金日成官邸簽署的。協定的內容，系於極右派西北青年團所辦7月份《北韓通訊》月刊中發表。其要點如下：「（一）平壤政權盡速派遣部分北韓人民軍，赴華北參戰，至北韓政權向漢城進入時，中共為報答計，亦將派遣軍隊10萬以上，協助北韓人民軍；（二）平壤政權儘量自南韓購買橡膠、汽油、汽車零件及藥品，供應中共，換取東北之穀物；（三）北韓華僑應予適當之保護，凡僑居北韓之華僑，年在卅歲至卅五歲者，均應被征參加中共軍隊，所有在東北之健壯北韓人，亦應徵調加入中共軍；（四）平壤政權，以海產供應哈爾濱、吉林及長春區之中共，換取食糧。」

1948・7・20

北平《益世報》稱，大鈔發行後，北平和天津的「食糧瘋狂上騰」，其中「小米麵玉米麵各漲3萬」，市民一片恐慌。此間的權威經濟專家分析物價上漲原因稱：「表面雖為大鈔出籠刺激，實際仍為通貨膨脹影響」。所謂通貨膨脹，即為「東北（大量匯入關內的）遊資之控制已失效能，市場氾濫日厲」。

同時，行政和金融當局也認識到這一點，對東北流通券的兌換進行限制，並「派員監視」。

中共東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給各聯絡處及圍城部隊敵工部門發出指示信：

> 久困重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是我軍對長春蔣匪鬥爭的總方針、總任務。而當前長春市敵我形勢要求我們的敵軍工作，一方面要克服因封鎖而造成的工作困難，繼續盡可能的尋求時機，物色線索，建立關係，（……）而另一方面在目前更重要的是應以主要或全部精力，迅速全面地去組織展開對敵宣傳攻勢，（……）以下數點，希具體執行：
>
> （一）加強宣傳中的組織工作，建立內、外線有組織的宣傳攻勢，（……）建立秘密性的宣傳站，突破敵人思想封鎖的目的。（下略）*
>
> （二）（……）要研究如何使宣傳品有效地達到敵人手中，如何使敵人看見，如何收集反映。在關係工作中，要注意使組織與宣傳結合起來，要對所有接觸我們的關係，周邊人員、逃兵、學生、商人、各色群眾儘量進行宣傳，解說政策。招待所、武工隊要注意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宣傳品的散發，嚴格反對浪費與壓存宣傳品的不良現象。
>
> （三）（......）在宣傳內容上，目前主要應：（1）繼續貫徹宣傳告困守東北各城市國民黨軍官兵書，特別是其中我軍對蔣方人員的六條政策；（2）宣傳關裡最近各戰場人民解放軍的偉大

---

* 無論公開資料還是內部資料上，此部分文字均被省略。

勝利，説明東北蔣匪的困境，指出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長春，是孤城落日，早晚必陷，打也完蛋，跑也完蛋，聯繫地説明他們切身的利益，説明現在正是逃跑的好時機，否則在人民解放軍圍困下，不打死也會餓死。提出「呆在長春挨餓等死，不如逃跑回家！」「早拖槍逃跑，早到招待所登記，早一天不挨餓，早一天發路費，打路條回家！」等口號。根據情況隨時以各種方法，號召蔣匪官兵逃亡，拖槍投誠、起義，要告訴他們逃亡的時機與辦法，説明我軍優待投誠人員情形；(3) 宣傳我軍威力，説明在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裝備完善，有攻堅能力人民解放軍面前，長春工事，不足支持，(......) 堅守只是死路一條，號召他們戰場上迅速繳槍，槍口朝天放，讓出工事陣地，提出「少做壞事，多留後步」，以達到動搖削弱敵之鬥志與情緒。

宣傳的辦法，希在工作中大膽創造，更多採取口頭宣傳的方式，動員逃出來的群眾，回去宣傳，發動市郊群眾、蔣屬、逃兵、學生、馬車夫進行傳話，速捉速放俘虜人員回去宣傳。根據調查，開展給長市周邊守敵寫信運動，發動長市內部某些工作關係、周邊人員、同情分子，開展側面的流傳運動，很好地組織傳送宣傳單信件等。[1]

中共長春工委宣傳部部長馬鴻新，經過走訪調查，寫出關於《長春市南郊目前封鎖生產救災中幾個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寫道：

（一）一般情況

A・長南蔣偽時期共二十六保，有九保屬長春市雙德區，十六保屬長春縣大屯區。我們工作能及者，僅二十保 101 屯，經初步瞭解，二十保 94 屯調查有以下主要幾點：

(1) 人口流動特大，暫時陷於混亂狀態。原有 4131 戶 20120 人。逃入長市和隱蔽于附近之地主、富農、以及有政治問題者，再加逃難之貧苦農民共 533 戶，3280 人，占原戶數 13%，原有人口 16.3%。地主、富農時來時往，逃出貧民增加，另方面從長市逃來難民，也漸增多。例如大屯原只 500 餘戶，後減至 100 戶，現又增至 500 戶。半數以上是從長市逃來之難民，因此本區人口流動混亂，屢有變動，不宜查清。

（2）災荒普遍嚴重。據十七村 82 屯瞭解就有 2120 戶 6891 人，嗷嗷待哺，急待救命。已知者自我軍來後，已餓死 6 人，也有因餓得病而死的。普遍是無糧或少糧，無鹽或少鹽，吃糠咽菜，面黃肌瘦。普遍反映「三不管」、「沒路條，封鎖裡外不通氣」，勞力也因此普遍減弱，一人不頂一人用，甚至有的全屯是病人。

（……）

（二）救濟與解決糧食辦法

A · 救濟問題

（1）救濟原則是首先救命，推動生產，無力借貸，救命借糧。先救急，後救緩。先救將死，後救不死。先救有病，後救無病。先貧後富。地主、富農不救濟（個別的一般性富農確實沒辦法者可少救濟），中農雇農一樣看待，指苗借糧，指地借糧，軍屬有優先權，加倍救濟，孤寡酌量加一點。

（2）本區貸糧共 40 萬斤豆餅、7500 萬元，暫先發 10 日的，分三、四期發放。每期至多 3 天，免得暗中資敵。沒糧吃最困難者，在 6000 人以上。每人每日以半斤計，下地勞力每人每日以一斤計，老小半斤，再加其他應被救濟者在內，須用 15 萬斤左右。

（3）（略）**

（……）

B · 說服富裕中農、富農，出借糧食，以政府名義借地主糧食分配。發現如埋有糧食而糜爛者，挖出分配後，並懲治埋糧戶。

（……）

D · 沒收糧分配救濟。規定沒收五鬥以下者，30% 歸緝私者本人，70% 歸該屯分配。五鬥以上者，30% 歸緝私者本人，30% 歸本屯分配，40% 歸全區調劑。

（……）

（三）封鎖問題

對長市封鎖最近極不嚴格，特務奸商與落後群眾相結合，偷

** 在官方公開出版物中，這一條內容被省略。而在官方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這條內容被保留，其為：「一週前長市逃來的難民，組織生產。現在逃來者一律阻回，嚴密封鎖長市。」

運糧食暗中來往，偷爬、帶路領道包險、遷居、行商，甚至暗中成立糧棧，逐站偷運，尤以中長路為甚。今後規定：

（1）（略）***

（2）取消大屯糧市，發動群眾站崗、打更，成立三個檢查站，嚴加巡邏。

（3）實行戶口管制，月底前收回蔣偽之身份證，發放門牌，不斷查戶口，登記黑戶，糾正前方嚴、後方松之偏向。[2]

在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黑白晝夜封鎖長春城期間，於華東戰場、中原戰場與國軍決戰的共軍大敗國軍，國軍被殲 20 余萬，而東北戰場則悄無聲息。擁兵百萬之眾、武器裝備最佳的的林彪似乎感受到了某種巨大的壓力。

在「紀念遼瀋戰役勝利暨東北全境解放五十周年」時，瀋陽軍區政治部在其編寫的《決勝東北的英雄讚歌》中寫道：「時光如流水，圍困長春很快就過去一個多月了。東北野戰軍本來的想法是通過對長春的久困長圍迫使長春守軍糧彈俱困不得不向城外突圍，我軍則乘其撤退之機殲滅之，豈料東北國民黨軍此時採取的策略是堅決固守城池不肯輕舉妄動。眼看著中原、華東戰場我軍打得熱火朝天，而兵強馬壯的東北野戰軍卻長時間置於無用之地，對此，東北局和東北野戰軍的領導人個個心急如焚。」[3]

東北局經過討論，認為南下作戰可以立戰功。於是，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關於宜南下作戰不宜攻長春致電中央軍委稱，長春守敵在 10 萬以上，「工事與建築物均甚堅固，糧食能靠空投接濟」，如果攻打長春，「兵力消耗必甚大」。東北局常委經過研究，均認為以南下作戰為好，「不宜勉強和被動地攻長春」，攻長春「如不成功」，將「不能給全國勝利以有利的支持」。[4]

*** 在官方公開出版物中，這一條內容被省略。而在官方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這條內容被保留，其為：「難民一般禁止入境，原道送回，帶槍有功者可收。」

1948・7・21

《生活報》以「死城瀋陽」為題，刊登署名為左馨的文章，該文中稱：「瀋陽是饑餓的、騷擾的、腐朽的死城。災荒的群眾和貪汙腐化、荒靡淫侈的蔣家官僚擁擠在那裡面。（……）我離開瀋陽的時候，高粱米每斤5萬元，豆餅3萬多1斤，普通職員每月賺100多萬，僅能維持一人吃飯。食糧恐慌是日甚一日，有人統計能吃高粱米的已成為上等階級，食豆餅、雜糧麵的已占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七了。」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8時專電：「長春饑荒慘狀下，若干父母不惜將愛女以30斤高粱米之『聘禮』嫁出。街頭售賣幼子者，大有人在。若干昔日隱瞞年齡篩選之壯丁，而今均自動從軍。一般公務員在饑餓之下，服務精神大減，多願出賣一切，離長他去。又近日有以銀洋數百元，向匪卡購買天津之「路單」，於是，遂又有趁機發財者，揚言以法幣6億之數包送到瀋陽，因此被騙者至多。月前被阻於長西匪方卡哨之間的難民，由於饑餓，拾野菜、死狗、死馬為食之結果，日來發現霍亂，一日之間死亡甚多。」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發出偵察工作的電示：今日多方跡象表明，長春守敵似有逃竄準備。要求各圍城部隊密切注意偵察長敵各方面的動向。

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在其出版的書中寫道：「總的看，圍困長春的偵察工作，可以說達到了『詳』與『細』的地步。各圍城部隊不但對當面之敵瞭若指掌，而且均整理上報了大量的敵情資料。『圍指』整理的《長春匪情彙編》內容詳盡，其中包括敵軍連長以上的軍官名單。解放長春後核對證實，這些偵察資料的準確程度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當時『圍指』的司令員肖勁光同志回憶說：『那時，城裡有甚麼動向，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情報來的很快。現在看來，當時我軍的司令部工作，已有了相當的水準，是值得稱道的。』」[1]

1948・7・22

在南京，蔣介石召集高級幕僚和將領研究東北部署方針。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余以為只要瀋陽糧煤可以自給無虞，則不如准其固守待時，而不必急令其出擊打通錦瀋路也。只要瀋陽能固守不失，整補戰力，則東北共匪決不敢進擾華北，故決定堅守。而且世界大勢必將變化，不如沉機待時也。」[1]

由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關於向南作戰及速作各種準備的電文稱，「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攻擊長春「沒有把握」，可以「改為提早向南作戰的計劃」。[2]

在長春城內，國軍新七軍軍人韶光在給哈爾濱的友人純謹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每日炮聲隆隆不絕，高粱米大顯神威，提高了數十倍的身價，由幾千元跳躍到三十來萬1斤。路上死倒迭迭相連，老百姓把樹皮樹葉子都吃光矣，殘忍悲苦，使人痛不盡言，今後更不知能至何地步。」[3]

1948・7・23

《北平日報》自長春專電稱：「長春被圍數月，物價上漲驚人，米每斤 2000 萬，麵粉每袋 23 億，糖每斤 1.5 億。」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 6 時專電：「被阻於長市西南匪軍卡哨之難民，共 10 萬人，平均十分之三有的吃，餘者只好受餓，每日餓死者有 100 余人，及趁夜偷越匪方卡哨，被槍打死者約 30 人。22 日記者親見一由卡哨外逃進來之難民，他是 14 人中間逃進來僅存的兩個人之一，看其身形像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放出來的囚犯一樣，不同者只是他們除暴露的骨架，皮膚上多了一層可怕的黑紫色，至於他們的苦難生活更不堪問。」

《吉林日報》以「饑餓社會群像」為題，刊登署名為楊賡的關於長春城內難民慘狀的文章，該文稱：

> 走進長春的公園和小市，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饑餓社會的形形色色。
>
> 現在已經是葉綠成蔭的夏季了，但長春的公園裡今天卻宛如了一幅冬景。這裡雖然還有著穿紅著綠的女人們，在吃力地挖掘「光復煤礦」（這是偽滿時期堆積的一些煤渣，長春市民卻稱之為「光復煤礦」），依然也不能掩飾公園裡的一片荒涼，因為園內不僅草都被吃光了，那些樹枝也都是光禿禿的（間或還有些西裝革履的先生們，也爬在那少數的幾棵樹頂上採摘殘枝剩葉），陪伴著在樹旁站著「禁止攀折花木」的堂皇佈告，正形成一幅富有嚴冬色調的強烈諷刺畫。甚至連樹皮竟也「在劫難逃」。由於城內的「榻榻米」（草墊子）都被蔣匪們的軍馬吃光，於是，殃及到公園裡的樹木也都光了身子。這便是今日長春各處公園的景象。
>
> 小市上則又是另一種風光：清晨五、六點鐘，小車就從各處推來，「官太太」們自己跟著車子，抱著孩子，有的還帶上勤務兵，車上堆著各色的家具、衣物、鍋盆碗盞，五顏十色，紅綠雜陳，煞像趕廟會一般。到上午 9 時光景，從大同廣場到三道街就擺得滿滿的，道路擁塞，車馬都難於通行。女人們將孩子放在盆子裡，自己就打著陽傘躺在一旁，一面伸出黃瘦的乳頭奶著孩子，一面

卻眼淚汪汪地等待著主顧。這種女人是被蔣匪們遺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她們和那些靠著賣一件吃一件的人們同一命運，好容易賣掉一件嶄新的襯衫，也換不到 1 斤高粱米。那些想變賣掉家私跑路的「官太太」們，她們的東西雖好卻最無人問津。比如頂好的箱箱櫃櫃要劈了當作木柈子，才能賣得出去。糧食雖然是頂活躍的市場，但出賣的也只有兩、三斤，或是一口袋一臉盆，不時在變換著高得驚人的價格。有極少的兩種人是比較頻繁的主顧：一種是揮金如土、挎著女人膀子晃來晃去的蔣匪軍官們，一個則是強買強賣、靠著倒騰為業和收集故衣待價而沽的本地有錢人，其餘的往來市場者，卻大多是看看東西、問問價格就掉頭走開。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在饑餓線上掙扎了一天的人們，又都垂頭喪氣的收拾著破爛攤，推著小車漸漸地散了，於是街頭逐漸回復到死一般的靜寂。這就是長春大部分市民一天的生活。

這個饑餓社會的破產情況，也表現在工廠閉門和商店歇業。只有寥寥無幾的幾個商號，上午奉令打開鋪板，點綴著寂寞的市容；失業的工人和技術人員靠著篩煤核和倒騰小買賣過活。在這個企業倒閉、商業停滯的都市里，還可以看到一種倒退到類似中世紀的生活：日用必需的各種各式的手工制藝品，代替了過去大量行銷的工業產品應運而生起來，像洋燭、肥皂、火柴之類的東西（火柴還大多是由解放區運進去的），在市場上大為吃香。但是，也由於物質日見缺乏和價格不斷上漲，一般小商人並不願多賣，因為正如他們所說的「貨了本錢盡」，賣了出去就買不回來。工廠的凋零，這造成長春市內路斷人稀的現象。大街上，往來的行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盡是穿軍服的，剩下就多半是女人或是挨門託缽的要飯的。不少的女人領著孩子出來趕大車，據統計，這些女車夫要占全體車夫的五分之一，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長春一切私立學校都已經關了門，公立學校雖然還掛起招牌，而師生們過的卻是一種非人的生活。一個普通教師每月的收入，單身漢子也只夠 20 天的稀飯。學生們中，以長春市立師範為例，每人每月配給黃豆 16 斤和蔣匪東北流通券 5 萬元。這些吃不飽肚子的學生，不時要被征去修工事挖城牆，或是準備充當反人民戰爭的炮灰。像松北聯中 18 歲以上的學生就都被撥到了所謂「青年教導團」，蔣匪們要把他們訓練成班排軍官，他們在團裡成天

搬石塊扛木頭做工事，左右翻工，弄得那些餓得發慌的小同學一天要栽可多個筋斗，扛不動的，常要遭到無情的鞭打。那個逃跑出來的高巍，抽出他的多繭的手，憤恨地向我訴說著：「在那裡呆下去，真是老虎也要送了命！」

在這個饑餓的社會裡，人們迫於生計，投機取巧，爾虞我詐，搶劫掠奪，不顧羞恥，成了一種社會風氣。糧食裡面往往摻有沙子和煤渣，一不小心就要上當。十幾歲的天真的男女學生，也大多學會了投機倒把。從城裡到城東二道河子，食糧的價格每斤相差萬多元，於是，學生們就將兩、三斤鹹鹽頂在帽子裡，往來於這條路上，幹著這個營生。城裡掩耳盜鈴的禁酒令下來了，但商人們只要花上幾文錢行賄，就一樣地用「精製白醋」的商標出賣。年輕的女孩子也只要有一碗飯吃，就跟人家去做「臨時老婆」，而蔣匪的大小軍官們都利用著這個機會，到處央人說媳婦，進行著這個廉價的人肉買賣！

說到搶的風氣，起先是買豆渣要靠搶，當每天天不明時，豆腐店門前就擁集了人群，豆渣出來就一擁而上，搶購一空。隨後，就出現小孩們搶劫糧食車和菜車的普遍現象。每當糧車經過東大橋和南關大橋等處時，小孩們就圍了上去，他們假稱搭車，將一個鐵壺的嘴插進糧袋裡，或是將銅錢磨光割破糧袋，把漏出的糧食用布袋接了去。待跟車的發覺時，他們已逃得無影無蹤。賣菜的老鄉們，都要將大車用麻袋蓋得嚴嚴的，把繩子捆緊，有人叫賣時就只拿出兩、三斤來，這樣才能免於「浩劫」。這種搶劫還只是「文搶」，「武搶」的便大多數是那些手執武器、身著軍服的匪軍們。他們有的甚至公然佩戴符號。因搶劫而釀成兇殺的日有數起，警察們也不聞不問，人們聽慣了也都習以為常，絲毫不引起驚異之感。群眾性的搶劫，6 月 18 日在城東北的宋家窪子爆發了一次，饑餓的人群將那一帶許多的店鋪和人家都一掃而光。

疾病和死亡的現象，在這個饑餓社會裡更是家常便飯。營養不足的小孩們死亡得特別多。5 月下旬，在二道河子的臨河五條，半個月內就死去四名。市內的瘋子一天天增多，6 月 19 日的那天，永春路有一個少婦，要飯不到，就將自己的嬰兒掐死，如醉如癡地捧著死嬰，狂歌過市而去。自殺和上吊的事件也是層見迭出，

七馬路的一個姓楊的小商人，一家五口，當賣俱光，三個小孩餓得呱呱直哭，夫妻們商議之下，先把小孩勒死，然後雙雙懸樑自盡。像這樣的事情，和道旁的倒斃者一樣，城裡的人們都覺得很平常，也少有人去提及！因為大家也都是今日不知明日，所以各人除了只盤算著自己下一頓的下鍋米以外，竟很少去談論別人的生和死。

1948・7・24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發出「準備粉碎長春之敵再次出擊」的作戰命令，並對共軍東、西兩地區部隊分別作了打擊出擊之敵的具體部署。

在兩軍對峙的洪熙街空白地帶，長春居民陶永芳聽從城裡逃出的難民說，城內高粱米已需流通券 200 萬，黃金每兩達三億六千萬，銀元每個 300 萬。他看到城內的難民仍陸續不斷地湧出來，據稱是城內國軍控制的報紙造謠，說共軍又開放卡哨，所以洪熙街附近熙熙攘攘，擦肩接踵，皆是餓殍。

夜裡落下一場大雨。陶永芳和兩個同伴，避開難民們爬卡子的熱門之處，沿共軍碉堡工事邊緣爬越封鎖線（因共軍卡哨多集中監視主要路線，碉堡工事夜有燈火，老百姓多不敢靠近，然而工事周圍的草原並無卡哨）橫穿莊田、草原、公路、河流、共軍交通壕、孟家屯鐵路線，遍體雨水淋漓，一身污泥，輾轉曲折，一夜間踏破 20 公里，拂曉前抵達長春南的大屯站，終於逃出生天。

1948・7・25

軍聞社瀋陽電：「24 日晨， 匪 200 余，向長春市南郊偷犯，當被擊退，迄下午匪復向我炮擊，我當予猛烈還擊，匪軍炮兵被制壓，炮聲遂趨沉寂。」

日期不詳

中華民國政府當局在3月24日曾於長春開會討論過空投糧彈問題，並做過具體安排。隨後，從4月5日起陸續開始空運軍械彈藥、通訊器材、生活物資，但糧秣沒運多少。當大房身機場和寬城子機場遭到共軍炮火破壞和佔領後，所有作戰物資和生活物資全部仰仗空運了。6月11日，長春國軍組成了空投接收委員會，次日開始接收從瀋陽起飛的五至十架運輸機飛長空投。在長春城內設有兩個空投區：一個是新七軍的中山公園；一個是六十軍的南嶺運動場。因為這兩個軍的人數大致相等，所以空投飛機的架次和投糧數大致相同。

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在其出版的書中寫道：

> 最初一段時期，空投飛機每日少則五至六架，多則十餘架，所投糧食以大米為主，兼有少量麵粉，以後則全部是大米。以兩至三袋或四至五袋為一捆，用降落傘降落。6月18日以後，傘降空投漸減，用麻袋或麵袋，直接下投。這投法，落于平地尚好，糧袋摔碎也不致為害，有的落到居民房頂或人的頭頂上，就可謂禍從天降，無從防範了。即便如此，空投機數和次數也日漸減少，有時三至五日才乘天氣好來空投一次。這期間，儘管空投次數減少，在我高射火器尚未配置于長春市郊之前，敵機抵長春上空後，還可以低飛、慢飛，按預定空投地區落點效果尚好，很少飄出市區和兩軍防地。米袋墜地也很少破裂，損失甚微。
>
> 7月份以後，我軍高射炮火從四面八方控制了長春上空，敵機臨空，立即遭我高炮火力襲擊。從地面就可以觀察到，我高射炮彈炸點的火花，

始終不離敵機前後左右，敵機如驚弓之鳥，不敢低飛和慢飛。膽小的敵駕駛員們為了勉強完成任務，只好躲在雲層之上作漫無目的的高空投擲。有的甚至沒臨長春上空，即拋下空投物資倉皇逃去。因此，白色的降落傘，黃色的麻袋包，經常一包包地落到我陣地上來。其中有大米、白麵、服裝、彈藥、電池……甚至還有整個的肥豬肉柈子。有的落在敵我之間的空隙地帶，我即以火力封鎖阻止敵人去取，待夜暗時我取回或讓老百姓得到手。據不完全統計，僅敵空投大米一項，為我軍得到者即3000余包。這些落到我軍陣地上的空中飛來的「禮物」，我照收不誤，不打收條。能吃的，能用的，都物盡其用，派做用場。如我獨立第九師「八一建軍節」舉行慶功大會，那隆重的大會會場主席臺，就是用降落傘搭成的。戰士們風趣地說：「這運輸大隊想的還真周到，知道咱們沒有大禮堂，在露天開大會，連佈置會場的材料都給送來了。」

長春守敵眼巴巴地看著他們自己的飛機，把大量應該得到的糧食和物資降到我軍陣地上，（……）守敵10萬，每天每人以1.5斤計算，每日需糧15萬斤。而大型敵機每架最多載6000斤。七至八月份以後，每隔三至五天才能空投一次，最多四至五架次。何況陰雨天氣根本不能空投，即令毫無損失，每三至四天才能收到20000斤糧食，平均每人每天半兩，真是杯水車薪！

然而，儘管空投糧食為數如此區區，長春守敵的兩個正規軍卻都虎視眈眈，嫡系（新編新七軍）與滇系（第六十軍）為此矛盾日益加劇。由於兩個空投場，一個是中山公園在長春市內西北部，一個是運動場在長春市內東南部。入秋之後，多半颳西北風，因而，落到東南部運動場方向的糧食較多。新編第七軍大為惱火，故經常發生兩個軍

> 爭奪糧食的事件。鄭洞國為了息事寧人，只好廢除原定東、西守備區，各收各空投糧的規定。改為各自搜集後，如實具報，由兵團部統一分配的辦法。但是，新編第七軍強調他們的人數比六十軍多，反對平均分配。第六十軍則認為新編第七軍有儲糧，缺乏同舟共濟的風格。[1]

隨著戰事一日緊上一日，駐長國軍壓力重重。除了收集糧食外，最重要的是構築抵擋共軍進攻和炮火的環形防禦工事。修工事需要人，人從哪裡來呢？范傳華在中共佔領長春十年後回憶道，修工事的人手從市區平民中來。

> 國民黨長春市當局大張旗鼓地在市民中調動民夫去挖戰壕，並規定：「要健壯的成年人，不要婦、老、幼。」爹那時還上班，媽又是小腳，再就是我，才12歲，長的又那麼單薄。這可咋整？我爹和媽媽為這事挺發愁的。爹自言自語地說：「去吧，就得耽誤上班，不去吧，官家又不讓……」躊躇了好一會兒，突然說：「好！去找他大舅。」
>
> 我叔伯大舅那時混得挺不錯，還弄個甲長當當。聽說原來的老甲長逃荒離開市內了，臨走時把甲長的大牌子扔給大舅了，他就這樣當上了甲長。官雖不大，也倒有點權。爹託大舅向上面說個情，讓孩子頂替，就這樣我被允許替爹去挖戰壕。
>
> 那時，天天吃不飽肚子，又多少日子沒有吃到一顆糧食了，還要幹大人活，而且還有國軍軍官監視。從家到這裡走了五、六里路，腿已經不大聽使喚了，一餓兩眼就冒金星……
>
> 這五、六里路，要都是大道還好，快到前沿經過一段半人深的草地，蚊子多極了，個也大，

足有兩公分長，被牠咬一口立刻起紅腫泡。我扛把鐵鍬，乾糧用包袱皮包好系在腰上，一面用手撥草，還要趕蚊子。過了草地，就是一道道鐵絲網，有高的，還有低的，鐵絲網外邊就是戰壕。國軍還在鐵絲網地段開了條通道讓我們通行。這些工程已經完成了一半多了，戰壕有兩人多深，七、八米寬，全是黃土層，挖起來可倒省勁。

一到前沿，人們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驚奇地望著這一切，誰也不吭一聲。一個肩上綴著一顆梅花星的國軍少校走過來了，他以命令的口吻說：「快散開，趕快就地坐下，八路軍就在西邊，很近。他們要打炮，諸位民夫不要慌亂，聽我口令！」

少校訓話後，開始幹活，溝上溝下黑壓壓一大片，有挖土的，有往上甩土的。國軍的大官、小官在溝邊來回走動，有檢查品質的，也有監工的，（......）

「飛機！」有人高喊。緊接著就聽到隆隆炮聲，八路軍的高炮陣地離我們何等的近啊，發射時塵土飛揚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炮彈就在飛機周圍爆炸。這時，一位中校長官走過來大聲呼喊：「快到壕裡隱蔽！」大家蹲在戰壕裡望著飛機以及炮彈在空中爆炸的情形。飛機跑了，炮火也停了。這位中校長官站在積土堆上沾沾自喜地說：「哼！八路軍的高射炮一輩子也打不掉國軍的一架飛機。」他轉過身對我們說：「喂！八路軍不敢再打炮了，快出來幹活！」

中午時分，中校長官吹哨子並說：「午休一個鐘點，不許到處亂竄。」

天熱得嗓子裡像塞團棉花似的難受，大夥都躲在草叢裡吃飯，邊吃邊驅趕蚊子。午飯的花樣可多了，有的帶糠窩窩頭、麵子餅，媽給我包兩塊豆餅、野菜、糠合在一起做的乾糧，裡面還放點鹽，雖然吃起來挺澀的，但我卻大口大口地吃，

吃光了還感到不太飽。可是，在家裡，媽不會給我這些乾糧吃的。飯後渾身感到無力，睡一覺該有多好啊。可是哪能捨得放過這金子般的時間，這裡的野菜多極了，我跟著叔叔、伯伯們，在這一帶，不一會功夫，就拔那麼多的野菜，這一堆可咋拿啊！我又樂又急，兩眼直愣愣地瞅這堆菜，一時想不出法子來。大舅看出我的心事，他說：「那不還有包袱皮嗎？」於是從腰上解下包袱皮，把菜包起來，剛好能結上扣。這才坐下歇一會兒，看到這包果實也不覺得累了，心裡美滋滋地在想：拿回家，媽媽看到這些菜，管保能高興。

下午，又幹了三個鐘頭才散工。我戀戀不捨地離開這個富饒的地方，奔走在灰塵撲面的大道上。[2]

1948・7・26

新華社陝北發表社論，該社論中稱：「在一連串興奮人心的大捷聲中，人民解放軍邁著雄壯的步伐，勝利地跨進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在中原、華北和華東戰場上，我軍都打了大勝仗。（……）我軍不但在軍事上打了大勝仗，並且在政治上也繼續地打了大勝仗，（……）人民解放軍以偉大的勝利，揭開了解放戰爭第三年的序幕。我們熱烈慶祝這些勝利，並預祝今後更大的勝利。」

此時，中共領導的軍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年來，軍隊的總兵力由 127 萬人增加到 280 萬人，其中正規軍由 61 萬人增加為 149 萬人；中共佔領區域的面積擴大到 235 萬平方公里，並擁有縣以上城市 579 座，分別占全國總面積和城市總數的 24.5% 和 29%；中共佔領區人口達到 1.68 億，占全國總人口的 35.3%。

顯然，其中林彪所屬的東北軍隊發生的變化更為巨大：此時，軍隊已發展到 12 個步兵縱隊 36 個師，1 個炮兵縱隊，1 個鐵道縱隊，15 個獨立師，3 個騎兵師，計 70 余萬人，另有軍區系統地方武裝及二線兵團 33 萬人，總計達到 103.97 萬多人。[1]

今天下午 4 時，蔣介石和其夫人宋美齡乘專機到達杭州，宴請政府要人及中央黨部要員，《北平日報》稱，蔣計劃在莫干山小住數日「避暑」；該報還稱，在太原，自從太原機場被共軍佔領後，「食糧來源斷絕，城內居民有捧黃金無處購糧情事」。

中共承德工作委員會在準備接收承德的同時，對承德守城國軍第十三軍展開政治攻勢，還在多地分設「蔣軍接待站」，專門負責接待投誠的國軍官兵。

在長春城，戰時糧食管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尚傳道宣佈對擁有糧食卻沒有依法登記的徐景財的處分：對徐的 400 斤大豆、500 斤穀子和 150 斤高粱米「予以沒收」。[2]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前指 26 日報：26 日上午據內線關係送來可靠情報稱，長敵高級軍官近來忙開緊急軍事會議。（……）新七軍預備了 3 天糧食，準備全部出擊。昨晚與安橋戰鬥，傷亡 20 餘人，高粱（每斤價）漲至 350 萬元。」[3]

1948・7・27

天津《益世報》自瀋陽專電稱：「長春糧荒嚴重，滿市餓殍，衛立煌總司令已下令將在錦州存儲之社會部食糧 200 噸，限日內空投長春。空投辦法，每 10 公斤作一小包，五小包為一中包，兩中包為一大包，計 100 公斤，系在一降落傘下，投入市內。長春高粱米，售 180 萬元 1 斤，10 斤米可買洋房一所。」

中央社瀋陽電：「社會部撥發遼寧、瀋陽兩省市賑糧 540 噸，刻已全部由錦運抵瀋。尚有棉布 60 噸，在錦待運。又存於錦州之賑糧 200 噸，可望於日內向長春空投。」

中央社長春電：「天主教、基督教、紅十字會、道德會、婦女會等宗教慈善團體，頃分電各該團體之世界組織，請正視長春問題。謂長春實較柏林饑荒嚴重十數倍，包括蘇、韓、日、蒙之國際共產集團對長春之行動，不僅為餓死長春 80 萬軍民而已，且其對一切自由和平挑戰之陰謀，已極明顯。」

1948 • 7 • 28

新華社東北電稱，被困長春之敵「歡迎解放軍俘虜政策」，而且蔣軍「厭戰的情緒日益發展」，有的公開說「他們的出路只有『死』」，甚至還有的說，「我們將來的棺材就是野狗的肚子」。

在長春市，由於糧價暴漲，民國政府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已經無法應付龐大的軍政開支。後來的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暦 23-4-114 號卷中的《長春中央銀行各軍政機關借款明細表》記載：「從是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28 日，長春第一兵團司令部、吉林省保安司令部、東北軍糧籌購委員會長春分會等 11 個單位，累計借款 5117100 百萬元。」

1948 • 7 • 29

新華社陝北以「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為題發表社論，該社論中稱：「過去一年，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年，軍事情況的基本特點，就是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了進攻，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則由進攻轉入了防禦。」「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地堅持下去，我們就有了保證，足以在第三年戰爭中贏得更偉大的、對全域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並且在未來幾年的歲月中，贏得全國的勝利」。

北平《益世報》稱，長春大學校長羅雲平 28 日自瀋陽乘飛機來到北平，他告訴媒體說，在 5 月 20 日長春通往外界的交通斷絕後，他無法前往，只能在瀋陽以電報聯絡。他得知「去年迄今長春柏油馬路柏油全被取暖」，認為「長大已處臨全國或全世界大學歷史上最苦難之遭遇」。「長大現在長師生仍占多數，學生共 1600 人，教職員及眷屬 1500 人，陸續抵瀋陽者 320 人，抵平者 110 人。」他說，長大現在火線上維持，「現在每天有一個兩個，七個八個學生抵瀋」。他得知，長春已陷入糧荒，「3000 員生在長春人均日食高粱米 1 斤」。

1948・7・30

毛澤東決定令東北軍隊南下作戰奪取錦州。

他在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文中稱：「關於你們新的作戰計劃，我們覺得你們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國軍錦州守城部隊）范漢傑集團，然後再向承德、張家口打傅作義。如果你們不打范漢傑先打傅作義，則衛立煌將以大力集中錦唐線，衛、范協力向西援傅，那時你們可能處於很困難地位。」

1948・7・31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 1 時專電：「長市周邊匪主力有後退之說，連日均無戰鬥，匪僅以高射炮向空投機群亂射，日來空投加強，每日平均有 20 架臨空。」

上海《益世報》以「拯救人類文明」為題發表社論，該社論中哀歎稱：「今天任何人不得不承認，我們已步入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儘管人類智慧已發展到原子能的階級，但人類道德的腐敗與墮落，更達到空前無比的程度。」

在長春市西三道街中央信託局長春辦事處一處宿舍，住著張德義和他的妻子楊宗榮，以及三弟張德智。24 歲的張德義，出生在河北省玉田縣，他在 16 歲時到東北地區做學徒。在長春被圍餓時，他在中央信託局（是中華民國金融體系重要機構之一，主要辦理購料、儲蓄、易貨貿易、保險等業務，總局設在上海）長春辦事處做臨時雇工，負責辦理電匯款開單業務。

當時局日益緊張時，辦事處工作人員紛紛離開長春。這一天，張德義遭到正式辭退，發給他的當月工資是 2.565 億元東北流通券，這些錢可以買十三斤半高粱米，當日高粱米價 1900 萬元東北流通券 1 斤。

沒有工作，失去了經濟來源，張德義有點慌張。此時，他的妻子楊宗榮已經有了五個月的身孕。而他的三弟已經有些日子不能上學了，因為老師和學生都沒有吃的，學校只能放假。他的三弟患上傷寒病已有一個多月，「甚麼東西也吃不下，小胖臉變成了小瘦臉」。[1]

日期不詳

東北魯迅文藝工作三團，於 1947 年 5 月初組建於哈爾濱市，隸屬中共松江省委領導。1948 年 7 月，三團來到長春前沿陣地慰問圍城部隊，以及準備接收長春市近千名我方工作人員，演出了歌劇《為誰打天下》等節目。

每場演出都激發起廣大指戰員訴階級苦、民族恨。每當他們觀劇時，經常憤怒得振臂高呼：「活捉蔣介石、消滅中央軍、解放全中國」、「為天下貧苦人報仇」等口號 ......[1]

奔赴長春周邊慰問圍城部隊，除了東北魯迅文藝工作三團，還有吉林軍區政治部文藝工作團。在長春城外，吉林軍區政治部文藝工作團經常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

> ......
>
> 《圍困長春城》，這首歌是用舊歌曲填詞。歌中唱道：
>
> 嘿！春天打雷第一聲，
> 山又搖來地又動，
> 打開四平占吉林，
> 解放大軍又圍困長春城。
>
> 嘿！解放軍兵強馬又壯，
> 四面八方封鎖的緊，
> 一棵柴草、一粒糧，
> 也不運給賊老蔣。
>
> 嘿！天羅地網安排好，
> 解放軍的士氣高，
> 但等一聲號令下，

打碎他的烏龜殼。[2]

趙東寰，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獨立第十師師長，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寫道：「到了7月下旬，敵人的處境就更為困難，這時他們強迫市民向城外『轉移』，以減少食物消耗，饑餓和恐懼的市民被趕到兩軍陣地間隙——空間地帶，不少人死在荒草野地上。跑到我軍陣地的，我們安置食宿後，讓其到別處投親靠友。一些青年則紛紛要求參加解放軍，和我們一起解放長春。」[3]

姚鳳翔，國軍新七軍暫編第六十一師第二團上校團長，是新七軍與共軍的談判代表。他在四十年後回憶長春城內強迫疏散居民的慘況：「在長春，本來餓死的老百姓已經很多，而因餓致病，氣息奄奄，躺著等死的就更多。現在又來了一個強迫疏散，這就火上加油地搞得這塊本來就很不平靜的地方更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頓時社會秩序極為混亂。因而不幸地又在原來死亡累累的記錄上，增添了新的可怕的數字。例如在疏散過程中，有些連病帶餓的人，在路上走著走著就倒下去了。有的小孩，父母死去，而被遺棄路旁無人過問。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小孩被蒼蠅叮滿一身，躺在路口等死的慘狀。至今思之，猶有言之酸鼻，念及寒心至感。疏散前後，因吃豆餅、樹皮和草根而得病死去的更不知有多少。」[4]

饑餓令人無處逃遁。被困在城裡的一名報社記者，在中共佔領長春勝利四十年後寫道：「7月下旬，蔣介石從廬山打來的電報，准許將市民疏散出卡哨以減少糧食消耗。致使許多逃出長春市的男女老少被困在兩道卡哨之間的真空地帶前進不得、後退無路。餓死的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在馬路上走著走著

就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有的人因為沒飯吃又生病，死在炕上無人過問，等到發覺時，死屍已經變成了骷髏。有些胡同裡死屍橫陳，臭氣沖天。人們因為吃酒糟、樹皮、草根、生病的越來越多，因為無醫無藥，只好等死。甚至有的人家早晨起來不敢出去開門，怕開門碰上死屍。有的年輕婦女懷抱著嬰兒四處懇求著說：『誰要能給孩子吃上飽飯，我就跟他走。』」[5]

在長春城內，祈盼共軍打進來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對沙秀傑一家人來說，更是難以忍受。她家最後連食高粱糠的日子也維持不了了。她們認為，如果再挺下去，最終的下場可能跟三姑家一樣悄無聲息地活活餓死。沙秀傑的媽媽決定送兩個兒子到國軍部隊當兵去，她覺得只有如此，才能為沙家保留「兩根血脈」。這樣一來，她就可以帶著年幼的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爬卡子逃生。

> 當時國民黨兵源缺乏，誰當兵誰就有大餅子吃。這誘惑力太大了！所以很多「出卡子」的人家都先把男孩安置在軍隊，再去走那九死一生的「出卡子」之路。媽媽也把我的兩個哥哥送到國民黨部隊，軍裝還未換，當時報完名一人就發給了三個大餅子。二哥跑過來，抱著大餅子和媽媽說：「媽媽，我看你們先別急著『出卡子』，我倆一天能各節省一個大餅子，每天有二個大餅子，你們娘幾個再對付幾天，也許八路軍就能打進來。

從這天起，部隊每天中午 12 點開飯時，沙秀傑就領著體弱多病的三弟到哥哥所在的部隊兵營旁，等著兩個哥哥拿大餅子過來。

> 兩個哥哥揣著節省下來的大餅子，在靠近鐵刺鬼的圍牆內佯裝走路，邊走邊把大餅子塞給我

們。我和弟弟高興地把大餅子帶回家，媽媽再燴上些野菜，每天一人一碗餅子粥。吃完後，媽媽讓我們都躺下別走動，這就能維持一天的生命了。

每天，沙秀傑和弟弟去取大餅子。弟弟時常走不動路，就央求著吃點大餅子。她就從餅子中間挖點給弟弟吃。但這樣的好日子也只享受了五、六天。當她再去取大餅子時，發現刺鬼裡邊已經沒有偷賣大餅子的士兵了。她的二哥匆忙跑過來說：「快走，大哥昨天藏餅子被上級發現蹲了禁閉，以後別來了，上級開會訓話說了，誰再賣大餅子就是偷盜軍糧，特殊時期軍法論處就地槍斃。告訴媽媽，你們『出卡子』吧。聽長官的報告說，八路軍一時半會兒也打不進來。你們要從洪熙街走，因為那裡有些空房子，能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沒能帶回大餅子，全家人「都傻眼了」。當天全家人都躺在炕上，一口吃的也沒有了。

兩天過去了，媽說：「你爸病重時用來發汗的薑糖片還有一點，那上面粘些白糖。」媽媽把薑糖片又放了點鹽，煮了一壺水，讓我們喝下去，好提些精神，然後全家就準備「出卡子」了。我向媽媽提議，咱們一顆豆粒都沒有，三弟又病著，讓媽媽到幾家親戚家討要點兒吃的，哪怕一個餅子給弟弟吃上，讓他精神點也好走。

第二天，媽媽帶我和小弟去了親戚家，結果一粒糧食也沒討來。媽媽說人家鍋裡正貼著大餅子，看我們去了就是不揭鍋。糧食的金貴，也讓親情疏遠冷漠。親戚家的孩子餓急了，就偷偷掐小弟的手說：「你怎麼還不快走！」[6]

陳喜武，東北電影製片廠駐哈爾濱新聞攝影隊攝影助理。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四十周年時回憶，在

1948年初夏的一天，攝影隊接到電話，要傳達一個會議精神：

攝影隊負責人徐肖冰參加會議回來，對我們簡要地說：這是東北局林彪親自召開的會議，指示我們這個隊秘密做好一切拍攝準備，待命出發。

徐還個別對我說：你家住長春情況熟，趕緊準備進長春；現在城裡死人太多，又沒吃的。這幾天你買些紗布、口罩等消毒用品，還要買餅乾、蠟燭等東西。

聽完後，我很快將這些東西張羅齊備了。果然到了第三天，東北局又打來了電話，命令我們這個攝影隊隨軍前往長春前線，將解放長春的現場拍攝下來；（……）趕到長春郊外解放軍獨十一師的駐地 —— 興隆山屯，便在這裡住了半個多月。

此時，長春市有洪熙街、宋家窪子、八里堡等幾個放難民出去的「卡子」。在這「卡哨」與封鎖區的所謂「中間地帶」，是屬於三不管的地方。出逃的難民大都聚居在這裡，吃住無著，許多難民相繼病餓而死，屍體橫陳，情景十分悲慘。為了完成好拍攝任務，我們三人攝影隊先不帶機器，每天從興隆山走到八里堡這個「卡哨」熟悉採訪物件，有時還活動到東安屯等地。

有一天，我和徐肖冰攝影師採訪走到被國民黨軍洗劫的一個老百姓家。這家三間房，門外夾著鐵柞子。我先叫門，無人應聲；到了正房敲門，還是沒人出來；但門沒鎖，我倆推門進屋，見鍋臺的盆碗刷得乾乾淨淨，順勢往屋裡一望，男女共五口全都直挺挺地餓死在炕上了！後來，我們將這個場面拍了下來。

當時，八里堡一帶居民的糧食全被敵人搶走了，哪有甚麼吃的，一個金鎦子換不了一個饅頭，街上偶爾有賣「肉凍子」的，細一看，這凍子竟

是水膠做的，每斤好幾百萬元！

接著，我們帶著機器，開展了拍攝工作。在八里堡一帶，白天我們採訪難民，拍攝一些鏡頭，親眼目睹了國民黨守軍給市內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難民們個個餓得皮包骨，說話像蚊子一樣小，他們已沒力氣大聲說話了；有的走著走著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永遠也爬不起來了。小孩的肚皮餓得像鼓一樣亮；大人吃酒糟，連大便都便不下來。當時，每天、每分鐘都在死人，都是活活餓死的，屍首遍地，真是慘極啦！

晚上，我們登高向市里眺望，只見整個城內黑壓壓、死沉沉，沒有炊煙，沒有聲音，只有死亡和災難。在市中心處，依稀可見的是敵兵團司令部（即銀行大樓）的一絲燈光。[7]

1948・8・1

今天是中共人民解放軍二十一周年誕生日。

《吉林日報》刊登吉林二十七萬人民給前方指戰員的慰問信，該信中稱：「你們是我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你們二十一年的英勇奮鬥的歷史，說明了一個真理：沒有你們，就沒有中國，沒有你們，也就沒有東北的解放。」

天津《益世報》自承德航訊稱，在被圍餓中的承德駐守國軍開始節約糧食，來「救濟適齡壯丁」。

路透社倫敦電稱，中國政府代表一人，今日赴漢浦郡一鄉村房屋，視察居住該處每日僅以丸藥六粒代替食糧，作為期五日之試驗之學生八十名。「中國政府對此一試驗，極感興趣。如獲成功，則對當前糧荒，即不難獲得解決。」

從今天開始，國軍開始執行蔣介石從廬山發給鄭洞國的電令：「從8月1日起疏散長春市卡哨內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回卡內」。

> 被疏散的長春市民由軍警人員押送，通過東大橋、南關橋、西道口、興安橋、影城街、南嶺等卡哨驅逐出卡。每個卡哨設正、副哨長一人，由軍、政、憲、警組合而成。「如軍方有憲兵負責，政界有政工隊負責，民眾有警察負責，婦女有女警負責，奸宄有督察處派員負責。並有兵團部、市政府、市政工隊、警備部負監督領導之責。」
>
> 這些卡哨盤查人員如同兇神惡煞，將出卡饑民身上攜帶的一點救命乾糧搜劫一空，然後驅逐于國共雙方卡哨的中間地帶，也叫「卡空」。[1]

爬卡子

在長春城東北方向的共軍八里堡卡哨，五十米距離有一個士兵警戒。在木柵欄和鐵絲網圈起的卡子內外，各有一條兩米多深的大壕溝，裡面灌滿了水。士兵們黑白晝夜監視和凝聽著卡子內難民的舉動和聲響。時年 1 歲的八里堡居民周相匯，在長大後經常聽其父親講述難民餓得吃人肉和爬卡子的慘況。

> 我爹在我小時講困長春的時候，我有一個鄰居，大名我不知道，他那時 18 歲，是個木匠。我爹跟我講，有人賣驢馬肉，就是人的屁股蛋子肉，還有大腿上的肉，就是把餓死的胖的人的肉都整成人丸子來吃來賣，當狗肉、驢馬肉賣。
>
> 在八里堡卡子裡面的老百姓一動彈，（共軍）就用槍打，要是發現你爬卡子，就用機槍突突你。[1]

在國軍驅逐難民出長春城的西北方向的興安橋（現在改名叫西安橋），是國軍防禦共軍攻擊的卡哨。國軍朝外放難民，共軍採取武力阻截。

40 歲的長春司機張嘉鳴，據他聽其爬卡子得到倖存的父親回憶說，興安橋卡哨是「死口」，國軍執意放出難民，共軍堅決進行阻截，雙方發生激戰，「國共兩軍都打出城的難民」，夾在國共兩軍中間的難民死傷無數，「屍體堆成山」。他說，真正活下來的長春人「沒有說共產黨好的」。[2]

41 歲的長春司機王會利，他的父親出生在 1941 年，時年 7 歲，在圍城時家中餓死四人。他的父親隨其家人從興安橋逃出。他的父親告訴他說，當時「伊通河裡全是餓死的和被國共兩軍打死的市民的屍體」。[3]

在長春城正北方向的共軍的宋家窪子卡哨，時年 6 歲的李忠民，和他的父母親爬了幾次卡子都沒能出得去。他在中共佔領長春六十七年後回憶說：「跟困長春時那些倖存下來的老長春人打聽打聽，都知道，八里堡都餓得人吃人了。前面的人走得趔趔歪歪的，後面走的人比他強點，過去把他摁倒在那兒，弄刀從他的大腿上剜掉一塊肉就吃；肖勁光司令員就是死困，困著不讓你出來。出來的，人家說你是國民

黨的奸細，那老頭老太太能是國民黨的奸細嗎？但是為啥也不讓你出來呢？因為你可以幫著在城裡製造混亂，在裡面吃糧食。爬卡子被發現了，說不清楚是八路軍還是國民黨軍，拿機槍突突。開槍的應該不是國民黨了，因為國民黨希望你出去，對不對？因為你在裡面製造混亂嘛。」[4]

在長春城東面的南關橋，是國軍防禦共軍攻擊的卡哨，也是難民出城通道之一。時年 11 歲的王亞珍，住在南關橋二道街，她在中共佔領長春六十七年後回憶說，城裡面的難民「都餓得抬不起頭來」。她和父母親一家四口爬了一夜才爬過南關橋。她餓得無法走路，「媽媽背不動我，一會兒背著，一會兒拽著，一會兒拉著，悄悄地不敢出聲」。

回首往事，78 歲的王亞珍說，最令她難以忘懷的，是父親告訴她關於日本人集體自殺的事情。她的父親告訴她說：「他們（日本人）都死在卡哨內拉拉屯的苞米地裡了，全吃安眠藥，一堆堆的，一家家的，都死在那裡。」[5]

1948・8・2

在承德城外，中共《群眾日報》稱：「承德市陰風慘慘，市民挨餓上吊，學生失學街頭討飯。」

天津《民國日報》自瀋陽下午9時專電：「第二期都市糧食配售，瀋陽長春兩市，已奉總統核定列入，1日糧部有電致此間市參議會，略謂：瀋長二市糧荒嚴重，囑列二期配售一節，本部極表贊同。」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2日晚，長市土匪分兩股，企圖突圍（......）被我獨八師追擊全殲（......）。」[1]

在國軍武裝將城內部分難民驅逐到城外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時，遭到共軍武力阻攔，沒有任何歷史資料記載有多少難民為此死於非命。根據官方出版的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記載：

> 在長春難民處理委員會成立之前，即在8月初開始處理聚集在敵我防線中間地帶的難民時，主要由前沿部隊和長春工委工作隊擔當這項工作，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了十數日，便把聚集區的難民全部引渡到解放區進行安置。（……）
>
> 長南封鎖區由我獨立六師駐防，長春工委有一支工作隊在封鎖區前沿一帶村屯工作。1948年8月初，聚集在洪熙街停留區的難民已有2萬餘人。8月2日由難民推出代表進入我軍前沿防線，向我軍反映他們被國民黨軍驅出了卡哨的情形，訴說難民遭受的苦難，要求我軍迅速設法去解救他們。我前沿駐軍當即派出幹部、戰士（包括工作隊員），進入難民停留區查看情況，維持秩序，制止歹徒掠奪難民財物，並答應把他們引渡到解放區安置。[2]

1948・8・3

在哈爾濱，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3 日夜，保安旅一團 38 人（內有一營副及女人），帶機槍 3、步槍 2 ，向我獨七師投誠；（......）3 日，敵長白軍 140 餘，內有軍官 13，家屬 57，攜輕機槍 1、步槍 22 向我投誠。」[1]

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召開軍事檢討會。蔣介石在會議上說：「國軍處處受制，招招失敗。（......）無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情形的表現，的確是嚴重而危險。」[2]

1948・8・4

這一天，對從長春逃出來的難民們來說，是事關生死存亡的一天。「8 月 4 日是不尋常的一天，餓以待斃的饑民們終於盼到了可以分批進入解放區。從 4 日到 9 日的六天中，通過洪熙街進入解放區的難民計 18191 人，加上『長江』部隊放進的 300 多名及偷進者，總數達 2 萬人之多。進入解放區的難民，『每人發三天糧，富者少發，窮者多發。』一些因病餓在路上或到解放區後死去的 119 人，均予以掩埋。那些死難者的親屬在哭聲中感激『共產黨救活人埋死人，世世找不到這樣恩人』。『很多老太太給我軍下跪磕頭等，感謝我們幫助推車拿送行李背小孩。』」[1]

在長春城內，張德義打算離開這個危險之地。他的首選地是北平。他知道僅有北平、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可能電匯寄出錢去。他還存有一點高粱米、黃豆、煤炭和木頭拌子劈柴。他覺得要是把這些生存必需品都賣了，肯定是一筆钜款，到了北平不僅不會有凍餓之虞，上學也是沒有問題的。[2]

日期不詳

張守三，長春市雙陽縣人民政府財糧科、財政科科長。他在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回憶如何經濟封鎖長春城：

根據鬥爭需要，我們全縣上上下下通力合作，重點加強了經濟封鎖，尤其是對糧食的封鎖。但在開始時，糧食走私卻很猖獗，伊長公路及飲馬河兩岸尤為嚴重，每天約有100石糧食從這些地區流入長春市內。有的成幫結夥進行走私活動。奢嶺口子逢雙日為集市，糧食交易竟達40至50石。我們曾查獲一夥走私糧販，他們一次就走私運出糧食10餘石。針對這種情況，縣政府當即採取了果斷措施：(1) 廣泛地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2) 斷絕封鎖區人民自由向非封鎖區購糧、換糧、借貸糧食；(3) 糧食進入封鎖區，必須有解放軍團以上、地方縣以上機關證明，方可通行；(4) 嚴格管制劉家店、奢嶺口子、新安堡三個集市，並在這幾個地方建立糧棧，實行糧食統管、專買專賣、取消新立城糧食集市；(5) 對封鎖區的糧食買賣、分配、統一由當地救災合作社負責辦理；(6) 發動群眾、民兵、兒童團，開展緝私活動，加強崗哨聯防工作。

縣政府還命令公佈經濟封鎖獎勵條例，其中規定，緝私禁運物資提成獎勵3%至5%；捉獲特務1人，獎勵糧食50斤。

由於我們對敵人實行經濟封鎖，長春市內糧荒日益嚴重，物價暴漲，貨幣貶值。糧食牌價每斤高達1500萬元，甚至有的用黃金換糧食，且有價無市。到後來，一捆鈔票只能換一捆青草了。

孤城內的蔣軍妄圖擺脱困境，從1948年夏季以來，實行了惡毒的「殺民養軍」政策，強迫

> 大批市民、乞丐、犯人、無用的軍官、職員和病殘者等出城，以減少城內生活物資特別是糧食的消耗。長春市外50里的所謂「真空地帶」，土地荒蕪，餓死者不計其數。市內滿城屍臭，路無行人。（……）強行驅逐於敵我封鎖線之間的難民，有時不下10萬人，死者日趨增加，情景甚慘。[1]

在城外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難民們一直在寂靜地死亡。而在長春城內，難民們也在寂靜地死亡。

中華民國吉林省政府駐長春代表段克文認為「糧食價值高於一切」。他寫道：「我家住在鬧市的背巷，巷口有個小孩，躺在地下淒慘地哀號：『爸爸！媽媽！你上哪兒去啦？我想你們呀！』他大概十四、五歲的樣子。有個人去安慰他，他總是不搭腔。旁邊有個賣水的說：『孩子的父母為了逃命將他丟了，他只想他的父母，一股勁兒地哭。』第二天走到那裡，他已經死了。這類事情很多，我不過在此略舉一例而已。這時主要的大街上死屍雖然不多，但是路過空房子、背巷子就要小心。所以我在必須走過那類地方時，只有低著頭快步，深怕看到了甚麼慘狀。」[2]

楊治興，天津《民國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兼上海《新聞報》特派記者。他在四十年後回憶長春市內棄兒的慘況：「在長春的大饑餓中，街頭多的是三五成群六、七歲的孩子，到處遊蕩乞討，或坐在道旁哭喊著自己的父母。鄭洞國曾發動部隊眷屬和『慈善機關』收養這些孩子，甚至按軍階指定必須收養，無奈被遺棄的孩子太多，到七、八月間，每天總有幾十或近百。但除了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帶頭領養一個女孩外，其他人都沒有領養。當時，長春一片戰亂，哪還有甚麼『慈善機關』？許多孩子都在饑餓中喪生。」[3]

一個共軍東北士兵，參與圍困長春城，守衛著洪

熙街哨卡。這名士兵看到空白地帶的數千具難民的屍體，還有骨瘦如柴的難民抱著嬰兒跪在同袍面前乞求放行的情景，他忍不住哭了，但他「不能抗命放他們走」。

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六十一年後，他對一位作家說：「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子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裡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牆跟的，軟綿綿撲在門檻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裡。看得我眼淚直流。」[4]

1948・8・5

從 8 月 5 日至 30 日，國軍組織軍隊外出到郊區搶糧，但在共軍嚴密封鎖下，國軍被擊退回城，顆粒未獲。

1948・8・6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 5 時專電：「長市空前大饑餓，市民百分之九十九的面色黃瘦，市區內平均每日餓死則在 300 人以上。匪揚言，一支手槍可換六個人的路單。」

該報下午 11 時又發專電：「（一）6 日午後 2 時，匪以密集之重炮向市內西南郊區二、三馬路持續發射。至 9 時始止，記者距離一百步遙之鄰人，為炮火炸斷左腿，市民有傷亡，市區房屋有若干座為炮擊焚；（二）夜 10 時，市西洪熙街匪我有接觸。」

1948・8・7

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國防部發表《半年來戰局總檢討》。該檢討中稱，這半年來，共匪「得到相當的發展」，但也遭到國軍的痛擊。同時該檢討對東北、華北、西北、華中、華東戰局進行了總結。對於東北戰局，國防部如是檢討：

> 東北林彪匪的企圖，是在想把長春、瀋陽這兩個富有政略戰略意義的地區拿去，打算實現毛匪澤東、李匪立三、亞洲共產國際情報局，和成立為傀儡組織的迷夢，但是國軍據守這兩個戰略要點，不特牽制住匪的50萬精銳，不能自由活動，而且等於置了兩個定時炸彈，使國際野心家躊躇徘徊，除了廣大共匪這支國際第五縱隊的叛亂外，總不敢學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魯莽，就頃刻把東北一口吞下去，他們勉強掙扎由去年冬季，直到現在還只有在熱遼邊區作流寇式的滋擾，而在這個區域裡的廣大人民就是毛澤東匪及所說的「解放軍」的基礎，卻反，大批成千成萬的攜幼扶老，跋涉千里，投奔到祖國懷抱裡，到目前為止，單是到了平津區的，百多萬人民，其不能進關而想逃出來的人，何止千萬。目前在東北的數十萬國軍始終屹立不動，匪亦無可奈何，這個事實就證明匪軍之基礎的動搖，國軍戰略政略的成功。

天津《益世報》自瀋陽專電：「長糧荒尤甚，售米論兩，窩頭割小塊出售。空投食糧及軍方捐款濟貧，均不能解決普遍問題。餓斃者累累，送出而死於真空地帶者日必數百。（又）長市在糧荒中不乏戲劇性故事。有人由長來瀋，存200斤米於友家，久而忘其事。日前其友自長來謂：米已代售，得流通券9億。其人聞之發狂。」

在長春城內，國軍士兵張介榮在給瀋陽的親人未能寄出的信中寫道：「今去此信非為別故，茲因長春被困數月有餘，每日三餐一湯不能入口，每日以樹皮野菜充饑。長春的百姓十有九戶無有飯吃，困難

到極處。不得已，我和姐冒危險步行到瀋陽謀生路，先將我的履歷書郵去，(……)我現在如果有一線之路，亦不冒險走。長春物價高粱米七、八百萬元1斤，想想我一個月亦得不了2斤高粱錢。一家五口的生活怎麼維持下去？太難了！大豆每斤600萬元。大胖、二胖每日要米吃，物價隨便漲，哪有餘款買米吃呢？我預定立秋後起身，先到公主嶺，然後再赴瀋陽。大約陰曆7月末，我們就能見面了。回想6年以前我們在一起說笑，多麼高興！現在呢，我被困這幾月，面目大變更，變得太難看了。每日不得飽飯吃，哪能好看了。心想有許多話和您說，但是提起筆，寫不下去，心不在肝上，心思雜亂，其餘話，我亦不寫了。」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外的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主要負責長春以西地區情報工作的作戰科副科長岳英，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8 月，守敵開始將成千上萬的饑民驅逐出城。規定每個警察要趕走市民八人，每個保長要逐出三戶。被逐市民不願離開者，則沒收其全部家產。」[1]

長春城的災荒已經如此嚴重，共軍還不時地向城裡開炮，餓得有氣無力的難民們，一切只有聽天由命了。中華民國吉林省政府駐長春代表段克文寫道：

> 不過在這麼慘的饑荒裡，老百姓還沒有聚眾鬧事的。據我所知，曾發生過這麼兩件事情：
>
> 第一件事是有個時候，街上出現賣熟肉的，沒有皮，說是家裡的狗肉。大家就搶購一空。有個外科醫生也去買，一看是人的骨頭，趕緊報告治安當局，把賣肉的抓到。果然賣的是人肉，他的辦法是把小孩誘到屋內，一棒打死，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居然做起生意來。治安當局立刻把他抓去處決了。
>
> 第二件事，是在 8 月的一天，四馬路附近唯一的一家小飯館，有一個顧客吃過飯算帳時，把手伸向懷裡做掏錢的樣子，不到幾秒鐘，就呼地一聲，一顆手榴彈爆炸，把自己立時炸死，跑堂的和其他客人都受了傷。我走過那裡，聽到有人在議論：「他大概是死也要做個飽死鬼，又覺得吃飯不付帳，見不得人，所以乾脆把自己炸死完事。」[2]

大煙土是中共奪取革命勝利的一個特殊的功臣。侯諾青，松江省公安處辦公室主任兼情報科長，他在 1948 年年初奉省委命令，抽調幹部組織一班人去長春

周邊，「等待解放後入城接收國民黨警察」。他在新成立的長春工委情工組協助搜集長春的軍事情報和掩護從事地下工作人員在長春城內潛伏。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五十周年時談到如何開闢多種管道，使用大煙土來解決醫藥等急需軍用物資和籌集活動經費：

> 因為當時我軍缺乏西藥（消炎片和盤尼西林）和血料子（熟皮子用），有的戰士受傷，由於缺藥發高燒化膿而死；無血料子不能熟牛皮，戰士冬天就無「烏拉」（即全部用牛皮做成的鞋子）穿，有的因此凍壞了雙腳，變成殘廢。解放區沒有黃金和白銀，為解決這一急需軍用物資，就需用大煙土從敵區換取。
>
> 為此，我情工組通過我地工人員劉勤軒（經濟藥房副經理）與長春市長江路經濟大藥房建立了聯繫。經濟大藥房的總經理于經武，對國民黨不滿，一貫同情共產黨，是位進步的商人。
>
> 為了做好于經武的工作，劉勤軒陪同于經武及其妻子劉少卿到九台，同我談判如何用大煙土換其西藥和血料，既做地工又從事商業活動，用經商來掩護政治活動。經過工作，于經武願意為我黨工作。就這樣，經濟大藥房為我黨提供了大量醫藥，並經常通過敵人的封鎖線。
>
> （……）
>
> 長春圍困期間，敵人一聽說「共產黨」三字，就心驚肉跳，毛骨悚然，嚴加防範，鐵網封路，崗哨林立，劃地為牢，置民眾於死地。在此種情況下，我地工人員的行動，也受到了限制，出入更加困難。如白天小組的交通員白天生同志出入敵人卡哨，將情報裝在陰莖套裡吞下腹中，待到目的地之後瀉拉出來。這種精神，真令人敬佩！又如季炳章因入敵區無鈔票，為解決活動經費，他們將大煙土裝在陰莖套裡，從其肛門與其妻子陰戶中塞入，幾天幾夜，不能吃東西，待入城後拉出來，變換成鈔票使用，維持生活，繼續堅持地下工作。[3]

1948．8．8

北平《益世報》自瀋陽專電：「東北最後遣返日僑工作，從今天起開始，2000日僑中，除了以前各工礦留用的技術人員和眷屬外，五分之一是在光復後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女人，因為她們都不甘食豆餅之苦，遂紛紛請求下堂歸去。據說這些求去的日女，都是嫁給工人和蹬三輪車的車夫，不用說吃大米，連豆餅渣也難得維持一飽。至於另一些嫁給我國軍政高級人員的，享受程度起碼比光復前的她們日常生活還高，因此也樂不思蜀了。據調查此次遣返在瀋陽的日本女人有二百多人，都做了妻在江南，調派東北的某些人們的『臨時太太』。所以有人說：『來東北不但能接收物資，還能接收一位日本太太。』」

中央社長春電：「長市各機關團體之數萬公教人員，刻均以最大決心，配合國軍應付目前之艱窘局勢。彼等為響應澎湃之軍人救死運動捐款，已決定將蔣總統所撥於200億公教人員賑救金，悉數轉撥饑民。」

1948・8・10

在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給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報告中寫道：「（中華民國）政府軍隊似乎沒有作戰的意志和能力，（......）局勢的惡化已經進展到接近崩潰的地步。」[1]

《北平日報》自南京專電：「前瀋陽防守司令梁華盛 8 日由瀋經平轉京，報告東北近況。梁強調長春國軍刻仍可牽制林彪匪部。（又）長春市長尚傳道 9 日電此間有關方面，並向各界呼籲謂：長春已瀕於嚴重階段，市內食糧缺乏，36 萬人口已一半陷於死亡線上，如每日以 20 架飛機長期空運食糧，方可解除軍民之危機。長春市長尚傳道電此間稱：長春高粱米每斤售價達法幣千萬元，市民購米以兩計。」

在長春城外，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通報：自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長敵地方遊雜部隊，曾有四起經我獨立第八師地區偷越警戒線外竄，均被我消滅。要求各部引起注意。[2]

在長春市西三道街，失去工作的張德義，疏散了生活物資，將出售糧食、煤炭和木柴的事情，交給了他的一位親戚來處理。他們均認為，再過 5 天，即 8 月 15 日，這一天是日本戰敗投降三周年紀念日，八路軍會開卡子放人。

他的妻子楊宗榮，用小石磨磨了一點高粱米麵和黃豆麵，做成餅子，又炒了些高粱麵的炒麵，這些乾糧足夠三人吃幾天了。他們都換上了破舊的衣服，身上只帶少許的錢，還帶上一個可以燒開水的小鋁鍋。他的妻子把金鐲子摵直成一根細棍兒，又用針錐子在鞋墊上紮了個洞，把金小棍藏進小洞裡。早晨，他們吃了飽飯，背著乾糧，走向洪熙街卡子。他在六十四年後寫道：

> 洪熙街是條西南東北向街，那個時候街兩邊也沒有多少房子。卡子就設在洪熙街的南頭。先是由國民黨正規軍把守的崗哨，全副武裝，每個人都要搜身，看看你帶沒帶武器，別的不管。
>
> 出了這道卡子，又是一道，是保安隊的卡子。保安隊就是原來

的那些地方部隊，過來好幾個當兵的圍住了我，一句話沒有，其中一個人把我上衣袋裡的鋼筆拔下來，別在他的口袋上，把我的懷錶掏出來「轉移」到他的兜裡。搜出來的錢，隨手就扔到旁邊的錢堆上，地上的錢都是很新的東北流通券，花花綠綠的，要是收起來足有幾大筐。卡子邊上就是鐵絲網，鐵絲網上還架著電線。別的地方你是休想通過的。老遠處還能看到流動的兵們。

戰戰兢兢地出了這兩道卡子。最外一層，還有騎著馬的匪隊，這些人也都穿著黃色的衣服，屬於哪個系統看不出來。這些匪隊用槍指著剛出來的人，必須馬上離開向前走，如果再往回走當即開槍射殺，沒有朝天開槍警告之說。他們打槍是平著打，直接把人打死。

出卡子的人並不多，三三兩兩地朝南邊走去。四周都是蠻荒野地，沒有房子也沒有街道。路過一個乾坑，坑邊仰躺著一個小姑娘，約有兩、三歲，周圍沒有一個大人，三弟走到孩子跟前問：「你媽呢？」小姑娘有氣無力地回答：「我媽給我買糖去了。」我心裡可憐這個小姑娘，說：「要不咱帶著她？」宗榮阻止道：「你自己還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去，算了吧。」

又走出約有一、二里地，是一些東、西向的鐵道叉，一道一道的，印象裡有五、六道吧。鐵道南邊就是高高的土崗子。這個地段積聚著很多人。鐵道上、土崗上都是用破布單支起的帳蓬。放眼望去，不知有多少千多少萬的人。（……）人的臉是土黃色。也見坑邊、路旁躺著的死屍，不細看看不出來，那死屍就像是一堆黃土。心裡奇異的是：老輩人的話是那樣的準確，人死如燈滅，死了就是一抔土呀。人之將死要變成土，先要接近土的顏色，土才收留，試想一個鮮活的顏色能和土摻合到一塊嗎？像我們這樣面色還有些紅潤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剛從卡子裡出來的。這麼多人都默默地坐著或躺著。走著的人也是慢慢地在移。看到這般情景，無需打探，再往南走肯定是徒勞。

走了一天，累得不行，好長時間沒走過這麼遠的路了。宗榮也累，但還掙扎著支起小鋁鍋，撿了些柴禾，鐵路旁間隔不遠就有一個個方形的水泥坑，裡面都有半下清清的水。舀水燒開，三人就水吃了些乾糧。

夜幕降臨，我們找了塊自認為合適的地方，把帶來的被單鋪上，乾糧由我這個「壯漢」保管。為保證萬無一失，炒麵袋當枕頭枕著，

大餅子包就抱在懷裡。因為白天又緊張又累，躺下後很快就進入了夢鄉，睡夢中好像是頭動了一下，感覺不是很舒服，隨後稍做調整，又沉沉地睡去。沒想到這一覺竟是我們一行三人生死攸關的一個節點。[3]

1948 · 8 · 11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南下作戰因糧食等困難，造成行動時間難定，在致中央軍委電文中稱，由於公路和鐵路被30年來未見的大雨沖毀，現在沒有戰機可求，如果南下作戰，將「無法解決」部隊的糧食問題。目前對部隊南下出動時間，「仍是無法肯定」。[1]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1時專電：「自6日長市內居民聞洪熙街匪開放卡哨，市民於兩日內相繼走出者約10萬人，不料匪仍關卡不放。該批難民，皆露宿於野外，連日來長市多雨，於日曬雨淋之下，一日死300餘人，夜來相枕而眠。活著不僅整日無食，且無水無糧，且所在地，適當雙方卡哨中間，一桶水須以整條生命換來。記者10日化裝前往，見10萬餘人擁擠於一曠地內，新到者尚能活動，早來者均面無人色，仰臥地上，有7天未吃飯者。該處附近野草均被吃光，10萬人群居的曠場，竟無雜訊之聞，蓋皆奄奄一息矣。妻離子散，父母顧不了孩子，孩子顧不了父母，慘絕人寰。記者歸來，訴諸我方當局，彼等聞後謂：匪死我勝，匪勝我死，願早一拚，何以讓無辜百姓受此慘劫，言下極為悲痛。」

該報自北平專電：「在平東北立監委一部約20餘人，11日下午，在奉天會館集會，呼籲搶救長春，並請當局運糧救濟。」

在洪熙街卡子范家屯方向的空白地帶，張德義早晨醒來的第一個感覺是頭下枕著的地面冰涼。他趕緊一摸，炒麵口袋沒了，懷裡的大餅子包也不翼而飛。他向四週看看，妻子和三弟還沒有醒來，靜無一人。一種末日來臨的恐懼籠罩了他。

他的妻子和三弟醒來後，定睛看著他，而他則歉疚地望著遠方，誰也沒說話。他的妻子站起來，慢慢地向遠處走去。三弟也跟著她走了。後來，他看見妻子和三弟手捧一些野菜走回來。他在六十四

年後寫道：「我一看是一些曲曲牙和苦媽子，8 月的曲曲牙，那些個刺兒都已經長得老硬。宗榮找來石頭支上小鋁鍋，把洗淨的野菜放進鍋裡煮，煮爛了，又放進一點鹽。這些東西放進嘴裡，滿嘴的苦澀，還有些紮嘴。真是難以下嚥，可肚子已經咕嚕咕嚕叫，硬是嚥了下去。」[2]

1948・8・12

毛澤東顯然對林彪等人無法確定南下作戰的電文不悅，他在給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對部隊南下無期等問題的批評電文中責難稱:「關於你們大軍南下必須先期準備糧食一事，兩個月前亦已指示你們努力準備。兩個月以來，你們是否執行了我們這一指示一字不提。（……）現據來電則似乎此項準備工作過去兩個月全無進行，以致現在軍隊無糧不能前進。（……）對於戰局有何利益？」[1]

39 歲的武田英克，不想在長春城內坐以待斃了。作為日本人，他在 1933 年加入滿洲中央銀行，1945 年日本戰敗後，滿洲中央銀行更名為中華民國中央銀行。他作為技術人才被政府留用，任中央銀行發行課長。隨著糧食緊缺，餓死者日增的情勢下，他和其他 4 名中央銀行的日本同事在 1948 年 7 月 12 日被書面解除留用關係。此時日本人的「日僑善後聯絡處」，主任叫做津田。

武田英克和津田商議逃脫長春之法。最後決定由他和被長春市政府解除留用關係的兩個日本人去洪熙街卡子打探情報，並尋找機會與共軍進行交涉。

今天清早，武田英克和他的兩個同伴，從中央銀行宿舍出發，他們的兩輛拖車上堆著三個人的背包，裡面裝著足以滿足這段時間需求的糧食。這是聯絡處為了犒勞他們，煞費苦心地給他們弄來的米和麵粉。「這樣的話我們能在卡子裡過些日子了。」他們三人高興地想道。

穿過順天公園，順著長春市街南下，走向洪熙街卡子。他們在國軍第一道哨所前出示聯絡處開具的「出京證明書」得以通過。

在洪熙街上，他看到有許多像他們一樣用拖車拉著行李的中國難民在排隊前進。剛開始，中國難民是邊說邊笑向前走著，當過了第三、第四道國軍哨所後，他們的神情漸漸陰沉下來，腳步也放緩了。在南部的卡子裡能聽到槍聲不斷。就在武田英克覺得可疑的時候，不知不覺他們已經來到了最後一個哨所——第五道哨所。國軍士兵不斷用槍劍杵著猶疑不前的難民們，催促他們趕緊進入真空地帶。武田英克預感到卡子裡的情況比他想像得還要惡劣，然而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

武田英克和他的兩個同伴，聯絡國軍士兵，請求和他們的長官進行交涉。他在三十七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 我這樣和最終第一線哨所的最高軍官將校交涉：「我在長春的時候，因為留用者大約 150 名都保存著性命，如果我一直這樣，進入卡子甚麼聯絡都沒有的話，數日後留用者中大體上全員都會進入卡子裡來的。如果有障礙的話，卡子內部的實情也只有我知道吧。」
>
> 那位軍官的日語也非常熟練，和日本人非常親切，是一個滿懷厚意的人。他只把我帶到他家裡去，對我說：「這個卡子內沒有糧食，人食人肉，就像是一個人吃人的地獄。一旦進入卡子的話，大半都不會活著出來。現在數萬、數十萬的市民都是不能出去卡子也不能返回市里，一直期待著八路軍打開卡子的門，每天都有數百、數千的人死去這樣的淒慘狀況。日本人留用者也是這樣的狀況，如果事先取得通過八路軍卡子關口的允許的話又是另當別論了，如果沒有取得允許的話，進入卡子就意味著死亡。」
>
> 這是比預想還要嚴峻的形勢。因為必須要取得緊急聯絡，我就想立刻返回長春，和「日本人民會」會長見面，要轉告他採取對策的時候，這位軍官滿懷厚意地告訴我：「鄭洞國司令官下了嚴令，說卡子內的真實情況一定不要告訴市民。但是你回到長春的話，我終究是要被處罰的，因此一定不要說卡子裡的情況。只告訴會長，在這裡不是那麼容易地就簡單的獲取內部情報，只是留用者們出來這件事情要暫時等待。以書面形式告訴我們的話，我會用非常緊急、適當的方法交給日本人民會長。」
>
> 我在那時立刻寫了概略，拜託聯繫的書信作為第一次武田的

情報，在兩、三天內被轉交給民會和留用者，馬上進入卡子的行動也被中止了。

後來，倖存的武田英克，從長春逃脫的難民那裡得知，他傳遞回城裡的情報「多少對白白餓死這樣的事相繼發生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他還是很高興的。但是他們三個人就非常悲慘了，無路可選，就這樣被追趕著進入卡子了。進入卡子後，他們立即遭到了中國難民的襲擊和搶掠。

從最末端的哨所開始朝無人地帶直接走一會兒，順著道路右轉，進入樹林中，直接走到從哨所看不見的地方，突然出現了暴民化的難民，二、三十人手持棍棒，一邊討好我們說「不要其他東西，只要糧食就好了！」一邊叫著奪走了我們的背包。

那是進入卡子以後我們的命根子，我們相當不想讓奪走。雖然也做過抵抗，但寡不敵眾，感覺再這樣下去自己要被棍棒打死了，所以就放棄了。三個背包都被撕碎了，裝著米和麵粉的袋子都被搶走了。搶奪糧食的難民來勢洶洶，就好像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這條道路的兩側倒著很多因為抵抗而被毆打致死的剛死不久的屍體。

這些中國人並非從一開始就是暴民。他們最初也是善良的一般老百姓。在卡子裡被搶走糧食後他們也才變成了暴民。這也是我之後才知道的——這樣的「接力式」搶奪每天都在重復。

後來聽一個在瀋陽經歷過此劫難的日本人說，有的人以為別人用白布包裹著的骨灰盒是食盒，一把搶過來打開蓋子就把裡面的東西往嘴裡塞。

聯絡處的人煞費苦心為我們籌來的糧食，剛進卡子就被人搶走了。我們三個人完全不知道今後該怎麼辦，真是欲哭無淚，只能呆呆地站在那裡。之後我們三個人拉走空空的拖車，步履沉重地穿過雜木林走向草原。

南邊右手方向約 300 米的地方，滿鐵的鐵路線修在高高的土堤上，貫穿南北。左手方向是一排排紅色的建築物，但大多已經崩壞殆盡了。

這一帶是長春城出來的難民們聚集的廣場。正如國民黨第五軍哨所的將軍所言，不論是道路還是廣場，到處都是橫躺的屍體，越往裡走屍體就越多。

破爛衣物、器具和屍體散落一地，這些屍體中有已經化為白骨的，有正在腐爛的，還有剛死去不久的，都橫躺在道路兩旁的溝裡和房子的角落裡。

不長草的紅土地上，明顯能看到有的地方會突出來一部分，那是屍體的一部分露了出來。有的屍體頭部以下都被被子裹得嚴嚴實實，只留下個腦袋已經成了骷髏模樣。

廣場中間都是屍體，連個踏腳的地方都沒有。特別是看到抱著孩子的母親時，我忍不住捂上了眼睛。這是一大一小兩具已經化為白骨的屍體。大的旁邊有一堆散落的長髮，小的是個嬰兒，這孩子大概是躺在母親的懷裡死去的。

剛死去的屍體，馬上就會爬滿黑乎乎的蒼蠅。剛開始看上去像一塊黑色的東西，走近時蒼蠅哄地一聲都飛起來了，露出底下屍體瞪大的眼球、好似微笑而張開的嘴角。屍體上還有一些未飛走的蒼蠅，嗡嗡嗡地撲騰著。

「鬼哭啾啾」——我聯想到了這個詞。

沒走幾步，就能看見用木片寫著姓名和生卒年月日的墓碑。恐怕是他的家人為了祭奠而立的吧。我覺得這些人是幸福的，至少還有人有精力來安葬他們。

廣場裡也有貓、狗和馬的屍體，想必是牠們的主人將牠們帶進來，為了取食又把牠們吃了吧。骨頭上的肉都被很乾淨地剝掉了。

廣場裡充滿了屍臭味。見了這麼多慘不忍睹的屍體，我感覺胸膛裡堵得慌，好像馬上就要吐出來了。

那時，在我們的前方10米處有一個背對著我們蹲坐著的男人。他突然轉過頭來看著我們，這個人大概50歲上下，瘦削地好像馬上就要倒了。他目光很凶，帶著一種殺氣。感覺到我們靠近之後，他迅速地把手裡拿著的東西塞進了嘴裡。

「甚麼東西？可能是吃的吧？」我正這樣想著，眼睛瞥見了他腳底下躺著的一個小孩兒的屍體。孩子趴在地上，褲子被脫了下來。屁股的地方被切開了，有一大塊鮮紅的肉露出來。男人右手上拿著的像刀一樣的東西，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

我瞬間明白了眼前的一切。這裡果然是一個「人吃人」的地獄。此時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聲吐了出來。

場內各處的房子都被炮擊得只剩下些殘磚斷瓦，連個避雨的地方都沒有。殘留的幾口水井也都飄著死屍，難民們就當沒看見似的喝著裡面的水。這種時候已經不能考慮甚麼水臭不臭的了，

因為除了喝這裡的水我們別無他法。

在不知道是餓死還是病死的屍體旁，長著一些野草，有人採這些野草而食，這些人馬上也會快死了吧，變得只剩下皮和骨。

這就是地獄中的情景。沒等到開門就死在卡子裡的人究竟有多少呢，**10** 萬、**20** 萬……不，肯定遠不止這些。

八路軍的柵門處聚集了黑壓壓的人群。可能有數千數萬，反正是數不清的大量難民。

八路軍決定甚麼時候開門完全是看心情，有時候一天開好幾次，有時候好幾天也不開一次。即使開門，時間也很短，而且只允許柵門附近的一些瀕死的難民出去。

然而難民們總擔心開門的時候自己趕不上，就都聚集在門口處不肯離開。離柵門較遠的地方幾乎沒有人。八路軍也考慮到難民集中在柵門口，有益於他們宣傳難民政策，所以也沒有阻止。

八路軍有時候會進來收拾屍體，或把一些屍體集中掩埋，這是為了防止瘟疫，或是為了趁機調查難民的動向。我們三個人也在離柵門較近的地方安頓下來。

這時候太陽已經西斜，卡子內的木柵門、鐵絲網、磚瓦房以及散亂的死屍都被太陽光映得紅紅的，這副淒美的景象，仿佛是夕陽要將世間的一切燃盡。

我鋪開席子，剛躺在上面，後背突然被一個堅硬的東西戳了一下，原來是一個頭蓋骨。於是我往旁邊挪了挪，不似剛才那麼恐怖了。

隨著夜色降臨，屍臭味也變得越發濃烈。這一帶萬籟俱靜，只能偶爾聽到烏鴉吧嗒吧嗒振翅飛翔的聲音。

即便這樣我也久久不能入眠。白天看到的孩子屍體的紅肉、男人帶有殺氣的目光，都深深地刻進我的眼眶裡揮之不去，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鮮明。

另外兩個年輕人似乎也沒有睡著，只是無言地盯著天空。也許是被白天看到的場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也許是憋著努力不讓自己吐出來。夜色更深了。[2]

1948・8・13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應蔣介石邀請乘機到達牯嶺，同行的還有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共商美國援助問題。《北平日報》稱，蔣介石還邀請一眾党國元老赴牯嶺「避暑」。

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關於空投長春糧食，給長春市長尚傳道發來密電：「茲據空軍總部報告，長春近郊匪高射炮火熾烈，空運機進入空投極為困難。為減少空運機之損失，應由長春守軍切實對匪高射炮火予以制止，並將投物場設于市中心區以利空投。如匪炮火不能予以有效之制壓時，擬勉力實施夜間空投，惟能擔任夜航之空運機甚少（......）」[1]

《北平日報》自長春專電：「長春糧將盡，市民餓斃者日達百餘人，長市人口由 50 萬減至 30 萬，軍食亦極恐慌。」

天津《民國日報》自瀋陽下午 9 時專電：「長春周邊匪百余人曾於 12 日下午乘長市難民出市混亂之際，竄入洪熙街，當被守軍擊退，斃俘甚多。」

在洪熙街卡子裡，武田英克和他的兩個同伴，打算去難民中找「日僑善後聯絡處」的伊藤一行人，特別是中央銀行的伊藤金太郎一家。他們是在一週前的 8 月 5 日進入洪熙街卡子的。但武田英克轉來轉去發現，卡子裡的難民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並沒有發現日本人的蹤跡。他們找了一天，只見到一些散落的屍體。武田英克認為，或許伊藤一行人已經出去了（事實也是如此）。

武田英克看到真空地帶全部被鐵絲網圍起來。為了防止難民脫逃，卡子每隔 10 米就會設置一個步兵用來監視難民。

在中午時，武田英克翻過鐵絲網和監視難民的八路軍搭話。搭話的是個韓共士兵，日語講得很棒。「我是滯留長春的 150 名留用日本人的代表，我有話對你們司令部的長官說。」武田英克對這個韓共士兵說道。這個士兵猶豫片刻之後，打開柵門，把武田英克帶到了司令部。能跟八路軍交涉，這使武田英克非常開心。武田英克以「日本人民會」津田主任的名義跟司令部的軍官展開了交涉。

我們提出：「現在長春被留用的人中，極大多數都是首要貴

重的小豐滿水壩建設的最高責任技術者、鞍山制鐵的最高技術者、大陸科學院、長春大學的最高水準的醫者和很多的學者。就這樣留在長春的話都會餓死。八路軍這裡能夠活用技術者的話，對於共產黨政府也是很有利的。這樣的話日本人中的技術人員可以自由通過卡子的門，明天或者哪天和長春那邊取得聯繫，爭取把這些人都帶來。」

然而，司令部的軍官表現出一副不耐煩的表情，他的態度好像完全沒有在聽我說話。他們說：「這場戰爭讓日本人受了很多苦。現在的先決問題是讓長春早日陷落，完全沒有空閒考慮這樣的救濟。」

雖然我又被趕進了卡子，但為了彙報第二份武田情報，我又來到了國民黨的第五道哨所，見了之前的那個長官，我拜託他們幫我發一封短信，信件的內容大概是：伊藤和加藤一家音信不明、剛進入卡子就被暴民搶走了糧食、八路軍不開門、卡子內屍橫遍野、以及日本人留用者通關無望等。

我們三個人的任務，就這樣暫時完成了。今後如何在卡子內生活，何時才能出去，這是個大問題。

因為不知道八路軍甚麼時候開門，我們每天早上都會去柵門附近探探情況。一旦從中國難民的舉動中判斷當天不會開門，我們三個人就會輪流去盡可能遠的地方裝一麻袋野草回來。

這時，柵門附近的野草已經全部被拔光了，不去遠一點的地方根本採不到野草。（……）能食用的野草有莧菜、藜、酸模等。這是在長春時，一起生活的一個采野草的人告訴我的，因此我能分清楚這些草。因為每天都生吃野草，大便也變成了綠色的。考慮到晚上八路軍不會開門，我們一般選擇夜間出去採集野草，但稍微走得有點遠的話可能會受到兩軍的掃射，因此晚上採草也是很危險的。[2]

1948・8・14

餓殍的累累白骨，暴曬於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

今天，中共吉林省委發出《關於處理長春周邊難民的決定》：

> 長春蔣匪近來以滅絕人性的罪惡行為，在搶盡長春市民存糧使他們陷於饑餓之後，又把他們強迫驅出在敵我封鎖區之間，為數 8 萬餘人，且日漸增加中。該難民停留區，由於敵人搶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於嚴重的饑餓狀態中，每天餓斃者日漸增加，情況甚慘。省委按東北局指示，為救活數萬難民著想，已決定分別收容，緊急救濟，分散安置，對處理這批難民的具體辦法省委決定如下：
>
> 一、（……）組織處理難民委員會，（……）處委會的任務，領導和處理難民一切工作。省委責成該委會，立即召開會議，決定計劃和規定具體辦法，並限期處理完畢。救濟辦法由處委會決定，原則上必須多照顧最貧苦的難民。
>
> 二、（……）分配各縣難民數目由處委會按實際情況（糧食情況，搞農業副業條件可能等）去決定，大體規定如下幾種辦法：（1）有勞動能力的工人及其它技術人員一律送省府及工業部，分別考察使用；(2) 16 歲以上青年學生（不論男女）一律送東大集中考查教育（已請示東北局）；（3）原屬東北其它省份逃出的難民，由處委會介紹其回原省處理；（4）毫無依靠之小孩、婦女及老弱者，分散到各縣適當安插和發動群眾作社會救濟；（5）一般的市民，應利用其社會關係安插，或分散各縣參加生產；（6）反動首領及重要的嫌疑分子，屬軍事系統的送軍區政治部，地方系統的送公安處分別處理（如收容登記時，發現陰謀破壞分子，除省公安處認為須拘留者外，應驅逐出境）。
>
> （……）
>
> 六、（……）數量巨大難民單靠政府長期救濟是不可能的，必須依靠群眾力量和組織難民自己生產，解決生活問題，才是最根本的辦法。同時各縣必須展開救濟難民宣傳運動，著重揭露蔣匪滅絕人性罪惡行為，普遍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發動市鎮特別發動富裕市民募捐救濟（救濟款交處委會分發）。

根據《關於處理長春周邊難民的決定》，決定主要在興隆、淨月、長南三處設放行口，在西部也不定期放行。處理災民的原則有五：

第一，只限我警戒線附近難民，在敵區邊緣的無法救濟。

第二，不能行動的就地救濟，每日能走5里以上的，送長春邊緣各縣安置。每日能走15里以上的，遣送較遠各縣安置。

第三，救濟辦法，放出者按地點行程，計日發糧，並多發2日。就地救濟的每次發3天糧食，3天發一次。

第四，對放出人員檢查。防止壞人混入解放區，並嚴格防疫。

第五，集中分批遣送。指定10個縣接收難民，指定路線，沿途設招待站，禁止難民到處流亡。[1]

今天，東北人民解放軍改名為東北野戰軍。

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林彪的提議，將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機關分開，以便東北野戰軍機關更好地指揮和部署與東北國軍的決戰。林彪任東北軍區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羅榮桓任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劉亞樓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

《東北日報》發表記者劉白羽的述評：「今天，在東北人民海洋中只漂浮著長瀋兩處冰島，既然人民勝利的春季已經來了，冰島的消滅也就不遠了。」

北平《益世報》自南京專電：「堅守長春鄭洞國將軍頃電中央稱，長春糧荒嚴重，市民餓斃者日達百餘人，長市人口已由50萬減至30萬，糧食亦少盼速設法解決。」

1948・8・15

今天，是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抗戰勝利三周年紀念日。

中央社天津電：「共匪林彪屬下頃有一師長向國軍投誠，日前到津，現已在津治安當局保護中。據悉此一投誠師長名顧金山，因痛惡共匪禍國，喬裝逃出匪區。」

天津《民國日報》自長春下午2時專電:「（一）三年前的『八一五』此間軍民慶祝勝利所發出的歡呼，而今已完全為此間的饑餓所沖淡。今日僅軍方舉行500人合唱團歌『黃河大合唱』聊以點綴慶祝，而一般老百姓，今日又為高漲之糧價威脅幾至窒息，高粱米每斤已合法幣1.5億元矣。（二）長市中央銀行本票，已發出千億元流通券。（三）洪熙街卡哨外，尚有千餘為匪所阻的難民，他們扶老攜幼，不僅沒有糠草吃，甚至連一杯汙濁的冷水都要以生命換得。現長市百姓的饑餓慘狀，若把我國所有形容饑荒的言詞拼集一起，恐怕也難描繪出實際慘狀十分之一。」

該報自瀋陽專電:「此間頃悉長春高粱米已售至每斤1000萬元。」

在洪熙街卡子范家屯方向的空白地帶，張德義和妻子以及三弟滿懷希望地等了一天，他們認為在這個令世界振奮、中國歡慶的日子裡，共軍不會忍心他們這些難民挨餓的。但是，從清晨到天黑，共軍的卡子始終沒有開放。[1]

1948・8・16

在長春城外，圍城指揮所召開軍事會議。此時的圍城指揮所已奉令改名為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為進一步威逼長春國軍，確保攻擊錦州順利，兵團司令部「亦向前壓縮至距長春城 20 里的四家子村」。

民國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經濟研究處以特急密電將長春市 8 月 15 日行情發給中央銀行：「（1）糙米，20 億元；（2）二號麵粉，無市；（3）黃豆，95000 萬元；（4）花生仁，無市；（5）植物油，8 億元；（6）蔬菜（土豆），95000 萬元；（7）鹽，22000 萬元；（8）豬肉，26 億元；（9）牛肉，20 億元；（10）木柴，8000 萬元；（11）煙煤，18000 萬元，（12）穀草，2300 萬元；（13）麥皮，3 億元；（14）料豆，無市；（15）細布，18000 萬元；（16）棉花，12 億元；（17）20 支紗，1 億元。」[1]

1948・8・17

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中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講道：

> 目前正處在圍城的緊張期間，根據近來封鎖工作的情況，有些問題還須要予以說明：
>
> （一）繼續提高認識，堅定圍城思想
>
> 自圍城政工會議之後，各部隊都進行了打通圍城思想的教育，而且收到了成效，提高對圍困的認識，堅定勝利信心，糾正片面慈悲觀點等。但隨著時間的延長，目前又發生了兩種偏向：一是急性病，要求快打，不贊成久困，甚至有的幹部說上級對長春敵情估計錯誤，他以為敵軍大批逃亡，糧源已斷，且饑餓嚴重，敵人逃不可能，應是打的時候了。這種情緒在許多連隊裡也是自發地存在著；另一偏向就是鬆懈麻痺的思想。在開始圍城的時候，有些人還表現著驚慌失措，時間長了，反而又生出麻痺現象，如土匪乘我警戒疏忽之際而突圍，還有的幹部和不少的戰士因在陣地上疏忽大意，不注意隱蔽，致遭受了不必要的傷亡。這些思想

偏向對於圍城封鎖鬥爭都是有害的，必須予以糾正。（……）

（二）正確掌握封鎖政策

（1）對難民的處理：由於長春敵匪之搶掠搜刮慘無人道，致造成嚴重的饑餓死亡現象，其慘狀難言。有些逃至我警戒線附近之饑民，根據總部指示，已予部分放行於救濟，但各部執行當中，尚不夠一致，因之在幹部戰士中招致了某些疑惑，如今後是不是還要圍困呢？並因此鬆懈了警戒與封鎖。

所以特重新說明：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市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於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

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佔之地區，對因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清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肆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採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處委會。

丁、在前線放行之出口，設立檢查站，後面設事務所，各師地區設辦事處，以上均由軍隊、地方雙方參加組成。東部地區已由吉林省委組織難民處理委員會，負責整個救濟安置處理難民工作。

難民處理原則：

（一）有家可歸，有親朋關係可投者，可資助其或回家或投親友；

（二）無家可歸及老幼孤寡者由各縣分別安插，發動群眾救濟，及組織他們生產。總之，今天救濟難民是必須做的工作，也是一個極大的困難的群眾運動。至於西部地區可按此原則組織進行。

（2）對糧食及貿易的封鎖，根據調查證明仍有糧食流入市內，敵人之軍糧徵購委員會尚能收到糧食，敵報紙上曾透露有商人整車向城內運糧，因受一諜報員敲詐，向敵司令部告發，即將諜報員槍斃。這證明了敵人是極力鼓勵糧食之進入長市，並且也證明了有的商人還在向城裡運糧。近並發現我在封鎖區內貸出之救濟糧，有被用以向長市換取布類，獲利十倍。在邊沿地區這種違法的糧販子還是很多的。根據這種情況，故應多方考察，絕對禁止糧食入城。且斷絕城內外之貿易來往，不放任何人進去。必須進去者須經各師批准。嚴禁部隊、地方之任何人員和單位向長市作貿易及發難民財，違者貨資沒收，並予以紀律制裁。

有的伙食單位藉口節糧換豆換菜，而出賣糧食，實行糧食倒把，這也應禁止。糧食之換豆換菜應由師以上之供給部門統一負責調劑之。部隊任何人員不得與群眾合作進市內或市郊作買賣，不得隨便給群眾開路條到後方購糧。駐區群眾須到後方換購糧食者，由團政治機關考察清楚後發給路條。

（3）正確執行政策，不得濫行沒收。對於放行之難民及收容之逃兵，除其帶有之武器、軍事檔及毒品外，其餘概不得沒收。難民遺失之物品，應與保管，待期來領，不得私分。至於接收賄賂，藉口軍用濫行沒收，或要難民去買望遠鏡、藥品等作為放行條件者，形同勒索，亦應嚴禁。

在我區內禁止使用白鈔，但不得沒收難民之白鈔，至於難民攜帶有我鈔者，亦不能藉口說他們要來買糧食而予以沒收。

除以上三種指定沒收物品外，其它沒收必須經師級機關批准。

（4）為加強封鎖工作，應以駐軍區域成立軍隊與地方合組之鬥爭委員會，領導封鎖工作，以求得在政策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而克服軍隊與地方工作聯繫配合不好，工作不統一，執行政策不一致等現象。

（三）開展全面對敵政治攻勢這期間，各部隊對政治攻勢的工作都比較重視了，而且有的初步總結了許多寶貴經驗

目前圍困鬥爭已至很緊張的時期，為了配合軍事行動造成我更有利條件，故應繼續加強此一工作。圍城以來，已殲俘及收容投誠的敵人將近1萬，7月份各部隊共收逃兵及起義者達5000餘人，8月上旬即收達2000以上，有整排、整班拉出者，有土匪部隊拉出兩個支隊，由此證明敵人在圍困封鎖中士氣是受到了

很大打擊。

（……）

四、陣地聯歡，這是最近在三三部隊中所發現者，今後可以加強這一工作。

廿九團有的連隊利用小孩向敵人送去米飯和炸丸子，敵人爭搶，這對於每日兩餐、五成大豆的蔣軍當然是極大的刺激。此外據逃兵談：他們在前線上夜間聽到我部隊演劇作樂，非常羨慕，故可動員宣傳隊在喊話時配合以動人的音樂和瓦敵的歌唱。

（……）

六、凡帶槍出來之逃兵應准其帶家屬三人，不得拒收，其家屬應資助遣送回家或投親友，無家可歸者，聯絡部門應設法處理。

對敵之武裝人員投誠者，不論攜槍否，一般均應收留。個別逃兵未帶槍而攜有一、二家屬，又很難說服送回去者，亦應收留。敵散疏清洗之軍官、家屬、老弱、傷兵等可以動員其回去向敵人要飯吃或拿出槍來。對於收容之逃兵，應經過爭取教育，改造其思想，一般的不釋放。逃兵中之壞蛋、土匪、逃亡地主、特務等，不可輕放，要調查清楚，分別處理。

（……）

（五）幾個具體工作

（……）

二、群眾在市內買槍者允許放行，買槍者多系有錢人，故可不獎，但奪取敵人槍支者一定要照章獎勵。

三、前沿陣地已砍之青苗，按百分之七十賠償，未砍者不要再砍。

四、各部應配合地方政府工作實行審查難民，清查戶口，嚴密軍民崗哨，以防止特務土匪之活動。近來投毒暗害，打黑槍，製作謠言等事件已屢發現，應引起警惕。[1]

東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辦事處發佈「爭取長春蔣匪地方武裝起義投誠的報告」，這份報告中稱：

長春蔣軍，在我嚴密圍困下士氣低落，饑餓與疾病日增，逃亡普遍。（……）據我們初步的瞭解，長春蔣雜地方部隊最近連續起義投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1）在我軍圍困下，深感前

途無望，糧食困難吃不飽，這些部隊很少能領到實物，一般只能領到低於市價一半的貸金，甚至有時貸金也領不到；（2）鄭洞國要改編他們，（......）；（3）我政治攻勢普遍展開，我軍政策影響日大。（......）；（4）這些蔣雜地方武裝彼此多是朋友或親戚，官兵關係較密切，上下牽制較少，行動較容易，平時在其上級來檢驗的時候，多把武器藏起來，今天投誠拿槍比較方便；（5）我們有計劃有組織的派遣爭取，適時的找出具體物件有重點的進行關係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於蔣軍逃兵的日益增多，蔣雜地方武裝的連續起義，對於長期被圍恐慌萬狀的長春敵人，（......）我們（......）繼續加強政治攻勢，以期配合軍事的要求，達到更多的瓦解敵人。[2]

1948・8・17

廣州《中正日報》特電：「北平據息：現時空運糧食至長春益感困難而危險，包圍長春之共匪備有高射炮之故，現時長春城內每日之餓斃人數約在 100 至 200 之間。目前共匪使用之高射炮，相信系蘇聯退出東北時，留給共匪之日本武器。雖然長春機場仍在國軍手中，惟長春未有飛機降落已有數星期之久。根據目前情況，以地面部隊解救長春被認為無甚可能。蓋由瀋陽向北出擊，在人力及物力方面均需付出重大代價，而兩者均非政府所願者。」

廣州《勞工新聞報》自長春航訊：「此間糧食再創奇峰，高粱米每斤法幣 2.4 億，一般百姓生活艱苦難以形容。卡哨外之難民，十六、十七兩日經大雨澆擊，於曠野之間死者猶多，然於此空前絕後之老百姓饑饉慘狀，仍不為殘共哨兵所理，聞殘共派工作人員至難民群中宣傳，讓青年人到哈爾濱，實行到並鬥爭，禁止面色尚壯之百姓再回長春市。現哨外難民群餓迫之呼聲，慘絕人寰。」

1948・8・18

天津《益世報》自南京專電：「長春戰事又起，14 日以來，匪方以重炮猛擊，周邊據點大多失守。現戰事正在洪熙街一線進行。17 日勵志社曾中彈，形勢頗緊。該地連日大雨，氣候惡劣，空軍無法前往。總統已令鄭洞國堅守，據軍方判斷：此為共匪秋季攻勢開端。」

該報自瀋陽專電：「目前東北最大問題，為長瀋糧荒。長春高粱米每斤已售達流通券 1000 萬元。此間急救長春難胞委會，除積極募捐募糧外，並將向匪區廣播，並空投傳單 10 萬，籲請重人道，停止餓死政策。」

1948・8・19

中央社南京電稱，改革幣制今日公佈施行，「即日起採用金本位，發行金圓券總額 20 億，收兌法幣 300 萬合 1 元，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

北平《益世報》稱，在北平的東北國代立監委昨天接到在長春的吉林省縣市聯合會的一封信，報告長春困苦的情形，呼籲外界能伸出援手進行「救死運動」。信中大意說，長春「高粱米每斤 1.7 億」。對長春軍隊的空投食糧「始終未能如數」，軍糧仍要從當地採購，民食空投「迄今顆粒未見，老百姓不堪饑餓，多到郊外求生，在近週有 15 萬人被阻於洪熙街、二道河子封鎖線之外，每天餓死很多」。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等十一人組成處理難民委員會，來負責和領導工作，其委員會下面設立興隆、淨月、長南三個辦事處，負責調查、教育、管理、救濟、轉送等工作，與此同時，確定此三處為難民開放路口，其它哨卡不准放行。[1]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的叔伯大舅王守信決定逃離長春城去尋找活路。他們賣掉全部家當，帶上幾斤黃豆和一些衣物，還有點零用錢，全家四口人推著一輛手推車上路了。范傳華在四十九年後寫道：

> 大舅啟程時，媽媽帶我們哥倆在門口為大舅全家送行。媽還讓大舅母給娘家捎信：「等緩一緩能動彈了，我們就八月十五（中秋節）再走。」
>
> 當我們娘兒三個送走了大舅，走進屋時，見爹躺在床上流淚，屋裡冷冷清清，誰也不吭聲。媽趕緊拿來毛巾給爹擦流到耳邊的眼淚。
>
> 「咱們走不動了，又沒有一粒糧食，怎麼能走啊？只能看著人家走。再說出來這麼些年，一文錢也沒給家裡捎，怎麼有臉回去。」爹傷心地開了第一腔。
>
> 「就咱們這個樣子，連一里路都走不到就得倒下去。」媽含著淚說。
>
> 「是啊，咱們心有餘而力不足。只有這樣靠了，寧肯安安穩穩地死在家裡，也不倒在大街上。」爹就這麼決定了。[2]

為更有力的配合軍事鬥爭，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決定從本月 26 日進行一周政治攻勢的突擊運動，指揮所在指示中寫道：

> （一）立即佈置動員，檢查過去，表揚好的成績，批評壞的缺點，有計劃的分工。（……）要個個打政治仗，人人作宣傳，大家想辦法。
>
> （二）各部隊攻勢之主要對象是當前對峙的敵人，要在敵軍內部擴大我之政治影響及軍事勝利的聲威，使其瞭解我之俘虜政策與對逃兵政策，以削弱敵之鬥志，使其瞭解只有放下武器才能不致餓死或打死，爭取他們起義和投降（……）
>
> （三）（略）*
>
> （四）宣傳的方法，主要是陣地喊話，喊話時間一般的以拂曉黃昏夜半為好，（……）[3]

在長春市東大橋，沙秀傑的媽媽決定出城逃生。性情剛烈的她，要跟死神賭上一把，以逃生來拯救她身邊年幼的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出城有三個關卡（宋家窪子卡子、二道河子卡子和洪熙街卡子）通向共產黨統治區，但僅有兩條路可供選擇。沙秀傑後來寫道：

> 一條路，是白天走出國民黨的哨卡，等到夜晚，再走到八路軍的邊境線，待後半夜爬過邊境，越過溝壑和障礙物，進入解放區，當時這叫「爬卡子」，走這條路的人較少，危險也很大，但重要的是要具備人強體壯，人手整齊，一旦進了屯子，給農民點兒東西可以貓兩天就四散，沒有人管的；另一條路，是拖家帶口、老弱病殘一家子一家子地通過出城，到八路軍的關卡哨所前，守著等待八路軍放卡子，進入解放區，這叫「出卡子」。

1948 年農曆 7 月 15 日，即陽曆 8 月 19 日，沙秀傑一家五口人奔上逃生路。與她們一起上路的，還有鄰居王叔、王嬸與他們不足 4 歲的兒子三口人，相伴同行是為了在路上互相有個照應。兩家人推著一輛手推車，車上裝著破爛被褥、鍋碗瓢盆以及其它雜物。沒有眷戀

---

* 無論是公開資料還是官方內部資料上，關於這一條的內容均被省略。

和不舍，「只是把兩扇門對上找個繩系上」，就開始了生死大逃亡之路 —— 洪熙街卡子。

街頭巷尾傳言說，共軍的洪熙街卡子這幾天要開始放人出卡。沙秀傑剛到自由大路一帶，就看到逃生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蜂擁向洪熙街：

> 有的推著車子，把一家老小放到車上；有的背包挎簍兒，扶妻攜子艱難地向洪熙街方向挪動。當時人們誰也不知道哨卡在哪兒，只是跟著人群走，等人們一步一步挪到了長（春電）影（廠）一帶，就自覺地開始排起隊來，三排長隊遠遠望不到盡頭，人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像是到了下午，我們才排到國民黨用重兵把守的出城哨卡前。這裡可是戒備森嚴，大木頭樁子釘成三角形纏滿刺鬼橫擺在馬路上，持槍的大兵看到誰有疑點，就指揮去另一排仔細盤查，他們看到我家的車上坐著一個病著的三弟，也沒有啥，就用槍指著前方說：「快走！」就這樣過了幾道屏障，到最後的一個屏障過去以後，一個手拿話筒的士兵喊：「快走！不許回頭！回頭就開槍！」說話間，就聽到天空兩聲槍響。人們拼命地往前跑，不知是誰喊：「快貓腰！」人們就都貓下腰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多遠，槍聲漸漸遠去，人們都停下來了，累得都躺在地上喘著粗氣……
>
> 這時，又有一個人喊：「出來了！前面就是解放區！」媽媽也在不停地祈求真主保佑。忽然聽到有人在哭，據說是剛才那一陣的緊跑有人累死了。這是我出卡哨遇到的第一例死人，她看上去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女孩兒，只有 20 多歲左右，一個中年婦女抱著她哭喊著：「兒啊，你都出來了！前面就是解放區了！有飯吃，還能給你治病，不是為了你，我們還跑出來幹啥呀！」一個中年男子撫摸著女孩兒的雙腿無聲無淚，滿臉的哀愁。往前走的人們，表情木然，沒有圍觀，也沒有勸解。

目睹此景，沙秀傑的媽媽說：「咱們要歇好再走。」在路旁的壕溝裡，長著許多野草。在斜歪的小樹上，還有稀稀拉拉的樹葉。媽媽弄來些野草和樹葉，給孩子們咀嚼其中的汁液，雖然有些苦澀，但也算是「甘露」了。沙秀傑的三弟無法下嚥，只能吞咽兩口涼水。人們繼續往前走，才走了大約 500 米，據說前面有以毛巾蒙著臉、端著槍的土匪打劫，只要子彈、銀元、槍支和糧食，不要金銀首飾。此時，逃生的人們已

經來到了國共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 —— 洪熙街卡子。

天快黑下來時，車子已不能前行了，整個國道密密麻麻全是人和車子，饑餓疲憊的人們都圍著自家的車子旁席地而臥。至於前面還有多長的難民隊伍，到八路軍哨所還有多遠，誰也不知道。國道兩旁是很深的壕溝，壕溝裡漂著被泡臭了的屍體，上面佈滿蚊蠅，很可能是上次出卡子時死的吧。國道上滿是人堆，非常像現在早市的攤位。一堆就是一家，你越過哪一家都沒有個落腳的地方。左側壕溝上面有一個「大房框子」，裡面也住滿了人，看來這「大房框子」也曾是個大樓，被人們扒木材扒得也只剩個框架了。先來的有些體力的人揀些磚頭，搭成一個離地有一尺多高的床鋪，也算是一戶人家了。

沙秀傑一家五口人和王叔一家三口人，在牆角高處一塊凸凹不平的瓦礫上，找到一席落腳之地，兩家人被子挨著被子鋪上，總算能暫時安頓下來了。

王叔家的王丫頭（是男孩，卻取了個女孩的名字）是個乖孩子，顛簸了一天，不哭不鬧。可到了晚上，卻哭鬧了起來，孩子一哭，王叔就煩躁地罵王嬸，王嬸抱起孩子哄，後來她解開懷，讓孩子的臉和嘴都貼在她的前胸上，可孩子還是哭。媽媽說：「她嬸子，孩子餓了一天了，挺不住了，有啥東西就給他吃兩口吧，他們（指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大了，能挺住。再說，他們都累了，睡下了。」媽怕王嬸有顧慮，才說下這番話的。王嬸摸黑不知給孩子吃了啥，孩子一會兒就睡著了。

涼夜陰深，足有上千號人躺在露天的國道上，心情如這夜幕一樣漆黑厚沉，遠處不時傳來嬰兒啼嗷聲劃破夜空，撕扯著人們的心肺。[4]

日期不詳

在距長春 600 公里的瀋陽，《新報》記者于衡獲悉長春消息的唯一來源，是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這些消息不對外發佈、僅供軍政首長閱讀。他是在 1948 年 3 月乘坐國軍 C46 軍用運輸機離開長春的戰地記者之一。他從「參考消息」中得知，新七軍和六十軍為爭奪糧食發生摩擦，市民開始吃樹葉甚至餓死，他的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還有他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當他有一天聽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談及長春存糧已無法維持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時，他向宋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可以跟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但宋稱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能否獲准。數天后，他得到答覆：上面已經原則同意他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他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佈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他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佈新聞。如果他同意三個條件，宋將替他安排時間。他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 B25 轟炸機。轟炸機上彷彿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
>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 2 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周，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甚麼也沒

> 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炮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炮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 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
>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之外，甚麼也沒有看到。[1]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和他 36 歲的父親餓得成天躺在床上，只有他的母親和弟弟出去挖野菜。他後來寫道：「隨著季節變化，附近一帶野菜不多了，加上三十八師在這一帶放牧軍馬，野菜就更少了。媽媽和弟弟的擔子就更重了，往往跑出去多半天筐還不滿，這怎麼能夠糊口的呢，只好挖些草根煮著吃。」[2]

作為中華民國吉林省政府駐長春代表的段克文，他的家裡眼看也要斷糧了。他的妻子帶著兒子出城逃生，也被共軍擋在空白地帶不放出，只好再設法返回城裡。他後來寫道：「在真空地帶鑽了幾天，回來後母子倆簡直成了呆子，哭泣無言。後來我的兒子才說，死屍遍地都是，經過熱毒太陽一曬，肚皮脹得好高！到處腐臭難聞，真嚇死人。母子倆回來後，很多天都精神失常。這時城裡有個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奉命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心裡極度不安，就自殺死了。大家聽了這個傳言，以為這下共軍可能放行了，就又出動碰機會，結果仍然是不放。共軍還是那句話：『我們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你們千萬別再過來，過來只有對不起開槍了。』」[3]

張英，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炮兵第四團政治委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

周年時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根據圍城指揮所的命令，我團各營、連在圍城期間執行對長春城內部分重要目標（如敵一兵團部、新七軍軍部、六十軍軍部、臨時機場等）實施不規律射擊的任務。幹部戰士稱此為打『攻心炮』，壓其士氣，震其軍心。一旦發現敵人有大規模的戰鬥行動，則實施集中炮火猛轟。長春城西綠園地區，敵人築有一座堅固的大碉堡，距我軍前沿約100多公尺，由新七軍一個加強班守衛，不時向我前沿掃射和打炮。8月中旬一天上午，我三營榴炮七連觀察所發現，一軍官下車向碉堡走去。榴炮七連立即開炮，一發炮彈在吉普車和碉堡之間爆炸，車損人傷。在我榴炮七連連續炮擊下，敵人碉堡變成了『啞巴』。」[4]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看到駐在家附近的國軍士兵每到黃昏時都要全副武裝，到前沿農村搶收糧食，借此來解決部隊的缺糧問題。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十一周年時寫道：

> 國軍的士兵聽說執行這項任務個個都樂得摩拳擦掌。
>
> 那幾天，每逢到黃昏時分，國軍的士兵帶上全副裝備，在我家窗外，三五成群地簇擁在一起議論，看樣子可能又要出征了。
>
> 老百姓看到這局面也在私下議論：「看他們的動靜，莫非是長春的戰局有變化？」「他們要突圍？」「他們要起義？」「他們要投降？」總而言之，凶多吉少。
>
> 我不能出去看熱鬧，坐在家裡照樣能看到。我好奇地問杜班長：「班長叔叔，你們到哪去？」
>
> 「到西郊前沿去！」他索性說了句。
>
> 「到那幹啥？」
>
> 「保衛長春的安全嘛。」
>
> 周排長迎面走了過來，對杜班長說：「集合！」
>
> 杜班長把隊伍集合好，周排長做簡短的訓話：

「具體任務長官昨天都講過了，晚上巡邏一定要拿出精神來，不要像喝醉了酒似的，要特別提高警惕，千萬別做共軍的俘虜，搶收糧食動作要輕、要快、要多，搶收多少吃多少，上面再不供給。」

都秋風涼了，可他們還著一身單軍裝，一張張焦黃的小臉，顴骨都突出來了，〔……〕我弟弟也哈巴在窗臺上看熱鬧，他小聲和我說：「哥，你看他們像不像些猴子？」我小心翼翼地對他說：「這要是叫他們聽見了，能把你腦袋扭下來。」他似乎有些害怕了。

第二天黎明，當我們還沒起床，卻被「保衛長春要緊張」的歌聲驚醒了。向窗外一看，好傢伙，他們背的背，扛的扛，排成一條長蛇陣，簡直成了一支秋收的隊伍，有的背一捆尚未成熟透的黃豆角，還有的扛一大包高粱穗，杜班長還裝一挎包苞米穗……

到營房後，周排長囑咐幾句就進屋了。

杜班長命令士兵把高粱穗放在圍牆上晾曬，把黃豆拿到屋裡，將豆角統統摘下來。

這時，士兵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這是我們額外的收穫，這回可吃頓飽飯了。」[5]

在長春城內，僅在6月到9月的三個月間，糧價就上漲了700倍。後來，糧價再漲，已有價無市了。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司令員肖勁光在回憶錄中寫道：

圍城期間，我們密切注意城內的動向，經常派偵察員潛入偵察，或者向逃出的老百姓瞭解情況。因為經濟情況是敵人心情況的寒暑表，也是我們決定圍城工作的各項部署的主要依據之一。

為了減輕城內缺糧食的壓力，緩和矛盾，敵人還採取了惡毒的「殺民養兵」的政策。他們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

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策問題。

當時，在第一線擔任封鎖任務的幹部戰士，十分同情這些出來的群眾，把自己的飯拿出來給群眾吃。後來，出來的群眾越來越多，靠一線部隊自己的力量已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指揮部就開會研究，決定設立難民處理委員會。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劃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地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6]

當入秋後，野菜就所剩無幾了。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家裡的糠麩子也所剩無幾了。所有能吃的都吃進肚裡了。有一天，他的媽媽發現枕頭裡裝著的是穀糠。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八年後寫道：

於是，就把枕頭拆開，倒出一看，使用多年的枕頭，裡面的谷糠全磨碎了，多半是麵狀，這可怎麼吃啊？媽媽挺犯愁的。爹說：「放在鍋裡炒一下看看。」炒後的穀糠就是灰。人怎麼能吃灰？這就要靠人的覺悟和意念 —— 吃下去就能活下來！

於是，全家就圍著一小盆熱乎乎的枕頭糠，抓一點填到嘴裡慢慢地咀嚼，苦澀是最突出的滋味，每吃一口就像吃藥似的，用水送一下，閉著眼，

仰起脖吞下去。

這是第一道關 —— 吃。靠人的覺悟可以過。但是，第二道關 —— 拉。這道關可不是由人的意志而轉移的，這道關的確是個難關。既無油水，又不摻野菜，就是不行。無論怎麼用力，也拉不下。有時蹲半小時也無濟於事，憋得連喘氣都困難，弟弟經常被憋哭了。媽媽心疼地用鐵釘往外扣。糞便硬得簡直像石頭，稍不留神就碰到肉了，疼得嗷嗷直叫。

就這樣，我們家四個枕頭，最後就吃剩下一個了。[7]

共軍是如何救助從長春城裡逃出的難民呢？圍城部隊某團宣傳幹部劉漢勤在多年後寫道：

在百姓饑寒交迫的時候，我圍城部隊看在眼裡疼在心上。紛紛向首長彙報，要快採取措施搶救老百姓。第一前指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肖華，根據圍城部隊軍、師領導的迫切要求，下達兩條命令：一是動員我軍幹部戰士節省些糧食救濟難民；二是建立難民接待站，放難民出城，安排生活出路。

（……）各處接待站設妥後，迅速接待難民出城，每隔四、五天放一次，每次每個站口都放難民幾百名，多達千名。（……）八里堡放的難民較多，（……）在一個半陰半晴的天氣，八里堡站又一次放難民，難民越聚越多，長長一隊等待出口。我們檢查完後，陸續往出放，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戶出走，單行人很少，多數都是步行，極個別的有推車推著老人行。

難民由於長時間在城無糧吃，用野菜、草籽充饑，到後來草籽也採不著了，一些人身上出現了浮腫，臉鐵青色，瘦成皮包骨，走路很困難，

一歪一斜的。其中有個姐倆往出走，弟弟十一、二歲，姐姐十五、六歲。弟弟全身浮腫很厲害，腦袋浮腫得有兩個人腦袋大，大腿腫得有兩個腿粗，兩面臉、兩條腿肚子均裂開口子，從裡往外淌黃水。姐姐背他走，一起身摔倒了，連續起幾次都未成，姐姐哭了。這時，我看怪可憐的，把小傢伙背起來，隨著人群走，姐姐跟在後面行，高興地連聲說「謝謝！」，我說：「不用謝，這是我們應該做的。」邊走，小傢伙臉上的毒水邊流進我的身子裡，滲到腳底下。就這樣我也沒說一聲，還是往前行。

大約走了二里路，小傢伙頭歪在我脖子上不動了，我覺得不好，放下來和他姐姐搶救。弄了一會兒，往嘴裡喂水，半天才醒過來。於是，我背著小傢伙又繼續往前走，又行有四里多地，才到了十里堡村政府。汗水、毒水浸透了我的衣服，累得頭都覺得不得勁，氣喘吁吁。急忙找到村長，找到醫生先救小傢伙。吩咐村長一定把姐倆生活安排好。村長說：「你放心，到我們這裡都得救了。你看這四、五口大鍋，好幾套空房都是給難民用的。」

我一看真是不假。空房裡坐滿了難民，端著碗喝高粱米、苞米渣子粥，心裡有說不出高興，暗想政府配合工作做得很出色，凡到這裡的難民都得救了。

我剛走出不遠，那個小傢伙的姐姐追上來，到我跟前就跪下了，雙手拜起一直說：「謝謝解放軍，謝謝解放軍救了我弟弟，我們永遠忘不了您！」

我迅速把姑娘扶起來，說：「不用謝了，這是共產黨讓我們這樣做的，要謝你就謝共產黨、毛主席。」[8]

在洪熙街卡子裡，武田英克和他的兩個同伴，一直在盼望著韓共士兵打開柵門放行。一天晚上，武田英克正在採集野草準備留著食用，突然從共軍卡哨方向射來的一顆狙擊彈擊中了他的腹部。

我感覺到一股貫穿腹部的疼痛。一瞬間我覺得自己要死了。我倒在草叢裡，悄悄地用手捂住腹部想看看哪裡受傷了。然而我卻沒有發現傷口，我把褲子往下提了提，發現原來子彈打到了我腹帶中揣著的一塊懷錶上又飛出去了。這塊表是與我交好的大陸科學院院長志方博士託我保管的。他讓我把表送到他京都的家中。（……）表內的指針等已經被打飛了，然而這塊表的犧牲卻奇跡般地挽救了我的生命。

每天吃野草、不進穀物的生活一直持續著，我們的體力急速下降。我們變得很容易疲憊，而且一躺下來就睡著了。起來也只覺得頭沉得厲害，想好好看看眼前的景象都費勁。手掌的皮膚像老年人一樣皺，抓起一塊皮很久都恢復不了。我雖然體格也不大，但感覺體重已經降到了30公斤以下（兩個月後在瀋陽的收容所裡測量的體重為24.4公斤）。

剩下的兩個人也是瘦得皮包骨頭，只有眼睛還有點神兒。因為年輕他們的體力消耗得格外大，兩個人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身體無法攝取鹽分真的很痛苦。（……）我們想舔一舔汗水來補充鹽分，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三個人漸漸地都不能動彈了。

連大白天也很容易犯困。但我們三個人不能同時睡，因為擔心睡著後會被難民殺死取食。連晚上我們也必須輪流起來警衛。

這樣一來記憶力也衰退了，我已經不記得來這裡幾天了。我們抱著「今天一定會開門」的這種渺茫的希望每天給自己打氣，只有這樣才能支撐著活下去。

到底是第幾天了呢。某天晚上，最年輕的同行者說「看到有兩個月亮」。我抬頭看原來是滿月，當然也只有一個月亮。男人開始緩慢地訴說住在家鄉橫濱的家人的一些事情，但我根本沒有心思聽。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沉默了，並垂下了腦袋，他就這樣斷氣了。他是餓死的。我那時才第一次知道餓死的人最後時刻的意識是清晰的。

剩下的我們兩個人，將他的遺體搬到附近的一個窪地上，找了一些艾蒿蓋住他的身體，同時為他祈冥福。這是我們兩個人能為他做的最多的了。

第二天早上，另一個人說，自己要一個人再去和八路軍交涉一次，他晃晃悠悠地站起來，拖著極度疲倦的身體走向柵門的方向。我懶得站起來，況且也沒有任何阻止他的理由。

同伴直到晚上也沒有回來，他可能在中途倒下了，也可能被八路軍射死了，總之他肯定是死了。我如此想道。

終於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感到一種寂寞和恐怖。草叢中是很危險的，還不如找一個能被人看見的地方。於是我卷起席子，開始挪地方。我向距離難民較遠的大路中間移去。這樣的話有誰靠近我都能覺察到。我躺在席子上，盯著天空看。這時我突然想到：這月亮不就是兩個嗎？我感覺自己也快死了，不由得悲傷起來，並開始懷念家鄉父母的臉。[9]

1948・8・20

廣州《中正日報》特電:「長春訊:長春受圍將近三月,民心尚鎮定,惟糧荒逼人,餓斃者日以數百計。米每斤合法幣3億,麵粉每袋180億,市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食野草、酒糟充饑,而連日陰雨,空中接濟中斷,糧價終日跳數次,且有行無市,軍民僅寄惟一希望於大量空投。瀋陽訊:長春遊資洶湧來瀋,16日匯款流通券8000億,影響瀋陽物價飛漲。」

吉林省處理長春周邊難民委員會制定了《處理難民的組織和工作簡則》。在《簡則》中提到關於遣送難民辦法,要求在轉運途中,20公里設一大站,10公里設一小站,大站負責食宿,小站負責臨時休息,均委派地方幹部負責此項工作。同時,還規定了難民應遵守的紀律,如「不准沿路偷青,違者受罰」等。[1]

那狄,圍城部隊宣傳人員,他在《圍城簡報》第二期中寫道:

> 解放軍和民主政府動員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救濟被災的地區,(……)人們永不能忘記是誰要他們死,又是誰把他們救活!於是,群眾組織起來,配合解放軍封鎖長春。蘆家溝有個兒童團員,臉還腫著,但依然拿著一支掛著塊破碎紅布的矛槍,和他的一幫小弟兄們追著盤查過往行人。及至夜晚,村頭路口的崗哨又改換為壯年大人,雖然他們也還沒有吃飽,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和決心,查走私,抓壞蛋,不准一粒糧、一根草運進長春去,把長春的蔣匪軍餓死、困死!(……)
>
> 今日長春,已經被蔣匪軍盤踞蹂躪得完全成為死城一座。然而死城也還有復甦的日子,這就是人人翹首期盼即將到來的,解放軍全殲十萬蔣匪解放長春的一天![2]

中共長春市淨月區工委在《關於半個月生產救災封鎖的報告》中寫道:

> 淨月區工委7月13日成立,20日正式組織進行生產救災。到八月初,全區已經產生了新的氣象。我們主要辦了兩件事情:一個是大力救災,使餓腫了臉、餓死、逃亡、離散的悲慘情形基

本上復活過來。今後「再不會餓死一個人」的口號，是較有保證了。初來時，各村兒童多死氣沉沉，吃草過多，兩目腫得只剩細縫，眼珠不轉，現在則組成活躍的兒童團，到處都在演操練兵、衝鋒、捉俘虜。這是生死的轉變。（……）

（二）進一步動員展開對敵封鎖運動。（……）今後淨月區群眾工作的中心任務應是進一步組織群眾性封鎖運動。今天有條件，有吃，種了地。封鎖期，必須加緊封鎖，（……）成為銅牆鐵壁，水泄不通的封鎖戰線，開展群眾封鎖，要提出五項具體要求：（1）走私要緝回來；（2）出來的人要堵回去；（3）特務要發現；（4）依靠貧雇工；（5）結合搞生產（副業）。

具體辦法提出以下八點：

（1）召開村屯大會，再動員封鎖，講政策、講紀律，兒童團、自衛隊，分別討論；

（2）每個行政村按具體情況制訂封鎖計劃，工作隊帶頭執行，包括 a) 調查走私小道；b）規定夜間放哨，哨位及注意事項；c）選定白天搜索地帶；d）重新整編兒童團、自衛隊，戴袖標、符號，發原始武器；e）組織基幹民兵，背土炮、大槍，佈置專線緝私；f）村屯聯繫及互相通報。

（3）群眾封鎖紀律——全屯封鎖公約，兒童團守則，自衛隊紀律等；

（4）發現和注意走私路線，現有的追根究底，取得經驗，查獲走私案件，依輕重召集村屯檢閱大會，及時獎勵與處分；

（5）劃第一、二、三線，層層封鎖，露出者，原道轉回，記明職責作為教訓，並發動競賽；

（6）四山打柴，割蒿，指定要盤查路人；

（7）夜間組織打更看青（莊稼），建立窩棚；

（8）五天一次無規律地清查戶口，檢舉黑戶。[3]

天剛有點亮，在洪熙街卡子內，睡在「大房框子」裡的難民們開始有了騷動：有人傳說前兩天共軍的哨卡剛剛放人出卡子，可能這幾天不會再放人了。這個消息，對沒有食物來源的難民們來說，無異于「五雷轟頂」：只能在這兒被活活餓死了。

忐忑不安的難民們，一邊等待共軍開卡哨，一邊用磚頭支起架子放上鍋，再去揀些乾柴或樹枝，開始燒水或煮東西吃。

> 媽媽就用老法子去找榆樹，削掉表面粗皮，把黑層裡的白皮刮下來，再用白皮煮一些灰菜和掃帚菜等野菜，再放些鹽粒來充饑。媽媽勸著王叔和王嬸說：「把心先安下來，再放寬點。我看這裡還比城裡強呢，城裡連能吃的樹葉都沒了，這裡還能找到野菜。慢慢等吧，天無絕人之路。」

後來，沙秀傑才知道，她們這些難民安頓的地方，是一條通往四平和瀋陽的國道，難民隊伍有上千米長。她們所在的「大房框子」，屬於這個逃難隊伍的末尾：

> 國道上的人們為了躲避日曬風雨，在車上支上七長八短的棍棒，用些五顏六色的床單子、毯子搭成車棚，沒有杆子的人家，也就東家扯西家地用繩子搖搖晃晃地也連上了棚子。站在「大房框子」高處放眼望去，車棚底下的一家子一家子的老老少少，有呻吟不止的病人、有口含母親乾癟的乳頭而哭聲不止的嬰兒、也有挺著大肚子的孕婦……

沙秀傑還發現，那些等待共軍開卡的難民們，他們的鍋裡已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煮著吃了，也開始學她的媽媽一樣吃樹皮和野菜，「很快一人多高的樹皮被扒光，光溜溜地矗立在道路的兩旁，不知道向人們訴說著甚麼」。

現在，用來支鍋做飯的磚頭已經很難再找到了。人們紛紛用泥巴在道旁壘成一個馬蹄形的小灶，從遠處看去，這些小灶整齊劃一，一排排都蹲坐在國道旁的北側。國道兩旁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撂荒地。在難民住處北面約有一百米的一棟破舊樓房裡，住著打劫的土匪，難民可以用購買來的子彈和銀元和他們換點食物。儘管他們從未騷擾過難民，但難民們還是很恐懼，遠遠地躲避著他們。

最令人欣慰的是，這兒有一眼救命的水井，井裙用水泥砌起有半米高，井口直徑約八十公分，水很清澈。在這兒的 2000 多名難民靠喝這口井裡的水為生。顯然，排隊來打水的人很多，於是此處成了消

息的傳播地：

> 誰家昨晚死了一個人、誰家兩口子把站不起來的老娘扔下，夜裡繞道爬卡子去了等等；還有一條爆炸性新聞：一個孕婦要生產，家人就用車子把她推到八路軍哨卡前，請求八路軍幫忙，八路軍很快就把他們放了進去。一位見解頗高的老者說：「這孩子不凡哪！在娘肚子裡就能把全家人救出卡子，以後也定是個有出息的孩子呀！」其實人們最希望聽到的是啥時候能放卡子。又有人說，他在前面能看見八路軍了，問大兵啥時候能開卡子，大兵們說不知道。問當官的，當官的說：「聽上級的命令。」這樣不溫不火的消息，也只能給已經愁滿心胸的人們增添了絕望。

距離這個空白地帶不遠處，有一塊黃豆地，黃豆長勢很好，剛剛結了指甲大的小豆莢：

> 豆秧的葉子也嫩綠，上面有一層嫩絨毛。不知道誰先發現了牠。人們就像見到救星一樣黑壓壓地撲上這塊黃豆地，筐簍太小，有人索性把褲子脫下來，用兩隻襪子系上褲腳，讓裝滿兩個褲腿的豆秧騎在脖子上。一天的功夫，把這塊黃豆地擼得只剩下直挺挺的豆杆了。
>
> 媽媽把帶葉子的黃豆秧放點鹽煮熟了，我們大口大口往嘴裡填，鹹滋滋的很好吃，一陣猛嚼。大部分都能咽下去，只吐出一小團兒纖維絲。媽還知足地說：「我說過天無絕人之路吧，這豆秧可比道旁的草好咽多了。」而我三弟和鄰家的王叔，還有王叔家的王丫頭都吃不進去，三弟和王叔是嚼兩口就引來一陣幹嘔，體能消耗很大，已無力吞咽這種東西了。媽媽說：「他們爺倆沒能力再折騰了，別讓他們吃這個了。」說著，媽媽就從鍋裡翻出幾粒小嫩豆角，剝開裡面像小水泡一樣的小豆粒，一口湯一口豆地喂他們爺倆。王丫頭更是讓人心痛，兩隻小手把著鍋沿子，看著一鍋煮豆葉子，眼淚都掉到鍋裡來了還哭個沒完。

沙秀傑看到王叔自從來到這個空白地帶後，就打蔫兒，整天一動不動地躺在褥子上，雙腳浮腫得像發麵饅頭，手一摁就陷進去一個深坑。

王嬸說：「他一年前就有了腎病，還挺著去拉車，後來也沒人坐車了。心想他歇歇就會好了，誰曾想在家歇了半年，不僅沒好，反而越來越嚴重了，再加上有個把月沒吃到一粒真正的糧食，就用糠菜對付著。現在更是站都站不起來了！他本來寧可死在城裡，也不願意出來，可為了我們娘倆，強把他逼出來的。」王嬸手裡有點兒給孩子儲備的糠餅子給他，他也不忍心吃。[4]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和他的父親餓得只能躺在床上。此時，他的母親的兩條腿腫得特別亮，無法和弟弟再出去挖野菜了。

10 歲的弟弟自己到鐵道邊的苞米地裡挖野菜，挎個筐他嫌太重了，背一個黃書包走了。一下午，連滾帶爬，好不容易才把書包裝滿。他站起來拄個小棍，剛走幾步，一個成年人追過來說：「小孩，小孩！站住！」那個人上前對弟弟說：「你這一書包的菜是我的！」弟弟說：「這菜是我在苞米地裡挖的。」那個人厲聲說：「都給我！」年幼無知的弟弟只好扔掉棍子，從肩上慢慢取下書包，正在躊躇中，就被那個人一把奪過去。

那個人拎著裝滿書包的野菜美滋滋地走了，可弟弟卻站在那裡哭……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他拄著棍，一直哭著回家。一進屋，爹就問哭甚麼，弟弟抽抽噎噎地把剛才的事講了一遍。平時對我們十分嚴肅的爹，這回卻心疼地安慰說：「別哭了，你剛才應該和那位先生說一下，把書包給他，野菜不給他就好了。」弟弟說：「那個人都要。」爹氣憤地自言自語地說：「人吃人的世道有甚麼法子！」

媽媽看到自己孩子受的委屈，再看看廚房筐裡的野菜也不多了，今晚就揭不開鍋了。她像個木頭人似的站在廚房裡掉眼淚。[5]

1948・8・21

中央社南京電稱，蔣介石電令全國各省市政府「嚴格執行幣制改革」，希望人民忠實貫徹守法，「如若怠忽職守中央決予嚴懲」。

中央社徐州電稱，匪冀晉蘇豫皖軍區旅級副參謀長范中峰，深覺共匪禍國害民，乃「毅然率領」1300 余名官兵向國軍投誠。

中央社長春電：「圍困長春毛匪，現正集體屠殺國軍警戒線外廿余萬無辜之婦女老幼，記者以極悲痛情緒向世人泣訴此一慘絕人寰之匪徒罪狀時，市內仍不斷傳聞市郊新屍激增之驚人數字，遭受饑禍難民，多為魯冀遼籍之工人或農民，彼等因缺乏糧食，乃扶老攜幼，由長南遷求食，而彼等出境時，即被共匪囚禁於長南石虎甘、二道崗及孟家屯等地，不予放行，亦不給飯食。綜合各方情報，以上各地，實已變成最淒慘之人間地獄，而寫出匪亂史中殘酷新頁。據估計，餓斃者已達 5 萬，囚禁地帶內，活人與腐屍混雜，已成羅剎場矣。」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電示圍城各部隊反敵突圍的作戰部署，指出：長春守敵在共軍久困長圍下，日趨瓦解、衰敗、饑寒交迫、孤立無援。在發現我主力南下，瀋陽敵人及北寧線被我嚴重打擊的情況下，很有可能突圍，要求圍城各部隊作好反敵突圍的準備。

真正救濟難民的時間開始於今日。

從真空地帶放出來的難民，每人發鹽 2 兩，發糧不超過 10 天，每天發糧 1 斤（糧食、豆餅各一半）。[1]

張守三，長春市雙陽縣人民政府財糧科、財政科科長。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 各接待站都設有粥鍋，終日炊煙不斷。我親眼看到，每當難民端起粥碗，就止不住流下淚來，感激救命恩人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政府。有的說：「這碗粥不知要值多少金子啊！」
>
> 接待站還對難民的不同情況，分別做了妥善安置。對有勞動能力的人、技術人員，一律送省政府及工業部門安排使用；對 16 歲以上學生送東北大學集中教育，考查後另行安置；對原屬東北

各省及其它省市逃出的難民，介紹回原地安置；對無依無靠的老、弱、殘者和婦女小孩，由縣安排或發動群眾、合作社救濟，並幫助安家立業。...... 難民說：「從長春市內到解放區一線之隔，卻是兩個世界，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2]

在洪熙街卡子內，沙秀傑發現難民們開始死了。在白天，有的人摔倒後就再也起不來了。

而大部分難民都是在夜間死去的。早晨家人發現人一動不動，就快用手摸摸鼻子，要是沒有氣息就是死了。餓死的人倒也非常安靜，死前沒有喊叫和掙扎，好像也沒有痛苦的呻吟，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實際上是他們全身的體能已經耗盡了，連運動臉上肌肉的力氣都沒有了，留給人的印記，無論生前醜俊、男女老少，都是一個形象 —— 骨瘦嶙峋。深深地癟塌的小腹和深陷的眼窩，不算猙獰，可也不算安詳的一副面孔。這天「大房框子」死了有十幾個人。

王叔就是在這天走的，他的面孔倒是好看多了，因為王叔全身浮腫，顯得很胖，只能是有些嚇人的慘白。他前半夜說有尿排不出來，呻吟了幾聲。我們小孩子睡著了，媽和王嬸守著他。媽說：「王嬸，你把手給他，他就不害怕。」可王叔的手腫得也攥不上，王嬸就把臉頰貼到他的手心上。可能是王叔已經昏迷了，王嬸需要一隻手託著他的肘，一隻手扶著他的手掌，稍鬆開一隻手，他的大手掌就滑落下來。

天亮了，王叔一個五大三粗靠力氣養家糊口的漢子輕易地被這場劫難先擄走了，撂下兩家人的依靠，離開了眼前這個無望的世界。兩個女人的哭聲弄醒了我們。王嬸求鄰堆的那家男人幫忙把王叔抬出去。可人家一看王叔又胖又大，都很為難。媽媽說：「大家快來幫忙吧，天氣熱，他會招來蒼蠅和蛆的，到處亂爬對大家都不好。」

王嬸的哭聲又驚動了幾戶山東人家。一個山東漢子說：「大家出點力氣，把他抬出去吧！」這句話說完後，走出來四、五個山東漢子，七手八腳地把王叔抬出了「大房框子」，想扔到壕溝裡。

王嬸跪下說：「別把他扔到壕溝裡，壕溝裡太臭了，求兄弟們幫人幫到底，把他抬到溝上沿荒地裡吧！」

山東人真講義氣，有兩個人先跳過壕溝，在溝那邊接著，另外兩個人下到溝裡，污水不是很深，沒沒到膝蓋，用肩和手把王叔託過壕溝，總算把王叔放到了溝對面的荒地裡邊上。[3]

日期不詳

在長春市西四道街田家大院22號，這個大院曾經居住著三十六家一百五十多名平民百姓，除了活活餓死的人家之外，能逃命的都逃命去了，僅有七戶人家還在饑餓中煎熬。年逾40歲的電車公司司機石鴻引和妻子，以及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即是其中饑腸轆轆的一戶人家。他的大兒子小成子，時年12歲，二兒子二連子，時年10歲。當他的家庭在7月將米糠、野菜、樹皮和草根吃光後，死亡就籠罩了他的家。劉季昌是石鴻引的鄰居，一個稱石為大哥的博客主，在六十一年後寫道：

> 石大哥是在熱天死的。死人也死不起，孤兒寡母的，死人往哪送呀！石嫂磕頭作揖地請了兩個鄰居，用手推車把光著兩隻腳的石大哥扔到偽皇宮門前廣場的死人堆裡。那裡早已是橫屍遍地，臭氣沖天，臨走，石大嫂還把石大哥的一條皮帶扒了下來，準備回來給孩子們換點吃的……
>
> 沒過幾天，小成子開始「脫像」了，人一「脫像」，也沒有幾天活頭。早晨，石嫂把小成子叫到跟前囑咐他：「你要是感到不好，今天要完飯，就別回來了。你看你爸死，媽媽求人多難呀！」小成子點點頭。可是天一黑，12歲的孩子在外邊沒有撲奔，又掙扎著回來了。石嫂抱著小成子邊哭邊埋怨：「苦命的孩子，你怎麼這麼不懂事呀……」
>
> 第二天，小成子沒有回來。有人看見，說，是揀屍車把他拉到二馬路集中站去了。二連子那年才10歲，跟媽媽說：「媽媽，我也不給你添麻煩，哪天我要是不回來，我也就死到外邊啦……」石嫂抱著二連子哭成了淚人。
>
> 過幾天，二連子真的沒有回來。不久，石嫂

帶著剩下的三個孩子出卡子，聽說都死到那裡了。

解放後第三天，石嫂（娘家）八里堡的一個遠親來長春打聽石嫂的消息，說，石嫂娘家人也都讓人家給吃了。[1]

在洪熙街卡子范家屯方向的空白地帶，張德義和他的妻子以及三弟，依賴野菜果腹已數天了。他們覺得野菜的味道越來越適口了。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要面臨一個嚴峻問題：由於人多而地面小，附近的野菜越來越不好找了，有時走出去老遠，才摘回一小把來。顯然，這也是困餓在卡子裡的所有難民面臨的嚴峻問題。有一天夜裡，有三、四個不認識的難民來約張德義，去偷採蕎麥花。

我在後面跟著。伸手不見五指，辨別不清方向，有的是小道，有的不是道，是莊稼地。腳底下不是莊稼秸杆，就是亂草石子。有時前搶來個大馬趴，有時又一下子摔到小溝裡，跌倒趕緊爬起來跟著快走。白天吃的是野菜，夜裡也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勁。

走了好長時間，估計有七、八里路。這裡清靜得很，一個人也沒有，用手一摸，軟軟的，嫩嫩的，心想，這就是蕎麥花吧。大家動手了，像拔麥子似的，一手大把大把地採，塞在另一手的布袋裡。很快，每個人的布袋都塞滿了。不知是誰，喉嚨裡發一聲喊：「走！」大家很整齊地背著蕎麥口袋又疾行回來。人不知鬼不覺地爬進各自的窩棚裡。

張德義發現偷採來的蕎麥花，實際是沒有根的嫩蕎麥。煮熟了一嘗，軟嫩，稍有些甜味，但比苦澀的野菜強上百倍。

有一天，張德義看到一個穿便衣的年輕人，腰裡別著手槍，站在高崗上大聲喊話，鼓動難民們「打回

長春去」。人群一陣騷動，然後又恢復平靜。

> 因為沒人帶頭往回走，真要是往回走，挨不著長春的邊兒，就得讓土匪的馬隊打死。三弟還到近處看了看那個年輕人，見那人還戴著國立長春大學的校徽。真空地帶應是離八路軍的地界比較近。國民黨的特工不敢到這個地方來。也有八路軍的零星人員來到難民中來，一些人質問說：「讓老百姓都餓死在這兒，你們是甚麼八路軍呀！」那些人說：「是上頭的命令。」還說「晚上你們會爬卡子呀。我們不會往人身上開槍的。」

是的，對難民來說，爬卡子是唯一一條逃生之路。

張德義看到難民們都瘦得皮包骨，眼窩深陷，臉都是土黃色的，活人和死人無法目測識別。當看到餓殍時，他心裡琢磨，如果共軍再不開卡子，那麼自己也要餓死了。此時，他想跟其他難民一樣找一處共軍監守薄弱的地方，從鐵絲網、壕溝和遍佈雷區的間隙爬出去。這一天，有人開始悄悄組織難民在夜晚爬卡子。幾十個難民在約定的地點集中後，開始出發。

> 走了一陣子，進了一條大溝，大溝裡全是沒人的蒿草，沒水，是旱溝。前邊引路人壓低嗓音命令：「趴下！」後面的人都順從地趴下，後邊的人摸著前邊人的腳，魚貫往前爬行。雖然餓了十多天了，可是並不覺得累，還有些莫名地興奮與精神。
>
> 前邊的人快爬，我們也跟著快爬；前邊的人慢爬，後邊的人也跟著慢爬。有時突然一停，後邊的人就追尾了，一頭撞在前邊人的屁股上。
>
> 我爬在宗榮和三弟的前頭，不時地回頭來看看他倆跟上沒有，這要是掉了隊，黑燈瞎火上哪去找？再說，如果把這兩人，不要說都丟了，就是丟一個，我一個人爬出去還有甚麼意義？

我胸前捆著一個大包袱，爬起來著實不便，姿勢稍低，就得拖在地上。當一停下，他們伏在地上，我則可以趴在包袱上喘氣，舒服多了。

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爬了多遠，滿心想爬了這麼半天，八成能爬出去了，爬出去就活命了。正幻想著，爬著爬著，最前邊的人「噹啷」碰響了一個甚麼東西，細一看，是鐵絲網上拴著的空鐵罐頭盒子。接著就是「呯呯」幾槍，槍聲就像是在耳邊炸響，大家聽到槍聲，都急速趴下。我覺得脊背發涼，心想是不是因為姿勢高中彈了呢？又一想我們是在溝底，一般是打不到的。

接著，就聽到有人喊話，像是從地下發出來的聲音，大概是在地堡裡吧。聽口氣肯定是警告企圖穿越鐵絲網的人們，但聽不懂說的是啥。隊伍裡有人說：「這是高麗話。」又有人說：「這是高麗的八路軍。」又有一個人厲聲說：「回去！」我大著膽子說：「往哪回呀？」一個人說：「給你兩槍，你就知道往哪回了！」另一個稍溫和地說：「沖著大亮星走就回去了。」

我心想，沒餓死，不能立馬讓槍打死吧。大家又不約而同地往回爬。這時，天邊已經出現了魚肚白。人們又回到鐵路上。喘息未定，我又支起布棚子，宗榮爬進去說：「就是死了，我也不爬卡子了。」

回想起來，是爬近了八路軍地下工事，否則槍聲怎麼會是在身邊放的呢？準備了一天，費了一夜的勁，爬卡子的這條路就這樣斷了。

爬不出卡子，還得解決肚子的饑餓問題。蒿麥花吃沒了，野菜也難以尋到了。沒有食物，只能喝點熱水充饑。張德義覺得大腦反應開始遲鈍起來，昏昏沉沉地只想睡覺。「站著想坐下，坐下想躺下，躺下就懶得起來。」他寫道，「我想許多人都是在坐著或躺著的時候就再沒有起來。有時看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倒

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在張德義時而清醒時而迷糊時，他的妻子撥拉了他一下，指給他看，見一個人拿著幾個糠餑餑在賣。

> 我倆爬進布窩棚裡，從鞋裡拿出那個金鎦子，那人拿到手裡掂了掂，說，給四個。我說，一個金鎦子才給四個？那人把金鎦子又放回我的手裡。我一咬牙，四個也換！救命要緊，人死了金鎦子有啥用！糠餑餑每個有拳頭大小，黑黑地，很硬。
>
> 我們三人每人掰了一小塊，用門牙啃下點沫兒，有點澀，還有點糠的味兒，來不及再品，大量的唾沫湧上來，把這點沫兒捲進喉嚨裡。糠本來沒有粘性，他是怎麼把糠弄到一塊的呢？又有一人看見我的糠餑餑，說：「換不？我這兒有黃豆。」我看他在手心裡攥著有二十多個黃豆粒。我知道糠餑餑別看個兒大，實際並沒有甚麼營養，黃豆可是正經糧食呀。我一咬牙用兩個糠餑餑換下那個人的黃豆。有人看到，說：「甚麼時候啦，還做買賣！」我沒理他。

張德義的妻子把黃豆泡得大大的，煮熟，每人一粒。張德義用舌頭一攪豆瓣就全粉沫化了，滿嘴的豆香味，慢慢地咽下去。此時，妻子告訴他一件事情：

> 離我們布棚不遠處，有兩個大人領著一個孩子。有一天夜裡，他們把孩子帶著走了，那個孩子也就是三、四歲的樣子。回來的時候，孩子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了。又過了一天，夜裡那個孩子也不見了。白天，見他們那個破鐵皮桶裡有兩根細細的棒骨。[2]

1948・8・22

在南京，金圓券正式發行。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為挽救經濟而採取的舉措。總統蔣介石為此發表書面談話，指「改革幣制意在安定民生，深望全國同胞一致擁護，破壞新幣者必予以嚴懲」。蔣介石還稱，抗戰勝利三年來，依舊民不聊生，根源在於共匪的「叛亂」。現在「國家統一一日沒完成，戡亂職責一日不放棄」。並希望「當此國家民族存亡榮辱之交」，全國同胞要「信任政府遵行法令」，共同努力「完成國民革命」。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獨十師 22 日報：據俘供，昨長敵演習突圍動作。另息，長市 18 至 25 歲青年，已不許出入；（二）一前指 22 日報：長敵 8 月 1 日至 20 日空運情況如下：共來敵機 154 架，共投糧 7432 包（我拾 109 包）。22 日，長市小米每斤 3000 萬元，高粱米每斤 2400 萬元，糖每斤 800 萬元。」[1]

在洪熙街卡子范家屯方向的空白地帶，這是張德義和他的妻子以及三弟在卡子裡的第十二天。昨晚一名八路軍幹部已給卡子裡的難民們開過會，讓難民們選出代表，保證在離開卡子後不偷吃農民田地裡的莊稼。

這天早晨，太陽掛在天上。張德義將剩下的十多粒黃豆分給自己、妻子和三弟吃了。然後，他們跟著其他難民一起提著、挎著、背著自己的行囊，像一股土灰色的洪流從四面八方朝西南部范家屯方向的共軍卡子湧去。

> 漫山遍野的人都彙集到一條路上，擁擠的程度可想而知。就這樣，我和宗榮、德智走散了。人群裡，一個中年婦女拎著一個六、七歲孩子的脖領子，那個孩子閉著眼，這個當媽的，滿巴掌的照孩子臉上摑，氣急敗壞地喊：「快走哇！」那孩子兩腿耷拉著，雙腳拉著，就是不邁步，他媽「啪啪」地還是摑。旁邊的人說：「別摑啦，死啦。」

難民們繼續向前走。張德義看到有一處掛著一個橫幅，上面寫著：「西線救濟委員會。」

> 一個大笸籮筐裡放著拳頭大的豆餅塊，每人只能拿一塊，人們一擁而上搶豆餅。一個八路戰士怕把人擠壞了，用樹枝子抽。一個幹部走過來說：「你怎麼打老百姓！關你的禁閉。」那個戰士說：「我是轟開他們，哪是打呀。」
>
> 等我擠上去時，豆餅已經沒有了。那個戰士安慰我：「不要緊，前邊還有！」
>
> 在人流裡，我大聲招呼，沒人應。我急了，逆著人流搜尋，就是望不到他們的影子。有人說：「不要緊，前邊有一個石橋，那是個必經之地。你在那裡等，一定能等到他們。」
>
> 果然，前邊有一座石橋，我站在橋邊等，時不時地喊：「德智！德智！」
>
> 等了好長時間，才見宗榮和德智蹣跚而來。一人懷裡還抱著一個包袱。我埋怨：「都這時候了，還撿這個幹啥。」
>
> 原來卡子一開，人們蜂擁而出，跌跌撞撞，擠丟包裹，擠掉鞋的，都來不及撿，就被人流裹挾著向南湧去。宗榮身體不便，三弟本來是個小孩子，大病未愈，又加十幾天的饑餓，所以不會走在人流的前端，走著走著就落在了後邊，趔趔趄趄，看見路上人們的腳底下絆過來踢過去的有兩個包袱，宗榮出於本性還是撿起來，和三弟兩個分別在懷裡抱著。就是這功夫，我就走在了前邊，他們兩人就和我走散了。
>
> 找著了他倆，我喜出望外，我們三人終於走出來了。再往前走，又有一處發豆餅的，還有涼水。不斷地有人告訴：東西不能吃多了，要不撐死。其實發豆餅也有這方面的考慮。豆餅很硬，只能啃下一點點兒，這樣不至於一下子吃下去很多。

長春到范家屯的路程 30 公里，張德義一行三人到傍晚才到達。之後，他們以步行和乘坐馬車的方式到達瀋陽。後來，僥倖乘上給駐瀋陽國軍運送軍用物資的飛機到達天津。在 1948 年 9 月 18 日，他們從天津坐火車到達目的地北平。[2]

在洪熙街卡子裡，沙秀傑看到王嬸去壕溝對面的荒地裡看望丈夫的遺體。她們所在地方的難民們沒有得到可以准許出卡子的消息。

沙秀傑聽王嬸說，王叔「瞪著眼睛看天，沒個遮蓋」。她送去一件衣服，把王叔的臉蓋上了。[3]

1948・8・23

在洪熙街卡子內，沙秀傑看到王嬸又去壕溝對面的荒地裡看望丈夫的遺體。「她抱些荒草想給他全身都蓋上，結果草往王叔身上一扔，大綠豆蒼蠅一窩蜂似的撲向王嬸，王嬸就再也沒去看過王叔。」

王叔是非常幸運的，因為他死了，還有人能照料一下他的遺體。隨後幾天，死去的人的遺體，就沒有人來幫忙抬了，因為大家都沒力氣了，「甚至死了人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人死了還在活人堆裡躺著，死人生了蛆就往活人身上爬（……）」

廣州《勞工新聞報》以「念長春」為題發表社論，為正在饑餓中煎熬的長春難民發聲。該社論中稱：

> 長春已陷於饑饉恐怖中，長春市長尚傳道向各方發出緊急呼籲說：「目前長春市內食糧奇缺，36萬人口已有一半淪於死亡線上，日以樹皮草根苟延殘喘。」懇請速以飛機空運糧食接濟，挽救長春危機。東北旅平、京同鄉，也一再向政府請願，要求派兵解圍，運糧應急，目前的情勢是長春不能放棄，也無法放棄，長春必須扼守，必須援救。願政府不要等閒忽視，再鑄造一次錯誤，長春倘不立刻獲得援救，恐怕就要淪於共手。事極迫切，我們要向政府發出十萬火急的呼籲：「急救長春！」
>
> 長春四面被圍，已成孤島。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守固難，突圍轉進亦不易。（……）在目前的情形下，長春無法放棄，也

決不能放棄，現在已不是長春應不應該守的問題，而是如何增強長春軍民的防守力量，進而解救長春圍困的問題。

根本解救長春的危機，最有效的辦法自然是打通長瀋和關內的交通，擴張周邊的控制面。然而，這個問題，在整個戡亂軍事中，政府自有全盤考慮，一線一點的進退有緩急輕重的權衡，即令已有打通長瀋交通的計劃，在時間上，也非嗟咄之間立刻可以完成。

我們今天同情長春地方官民的呼籲，要求中央做到最低限度的援救，即是立刻空運大批糧食救濟，先做到長春現狀的保持，以為來日恢復開展的基礎。

就我們所知，在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長春的防務，誠如尚傳道市長所說：「決可無虞。」所可慮者，就是軍民糧食的缺乏。據報載吉林省縣市參議會聯合會謂稱，長春被圍三月，軍食仍就地採購。賑糧迄今不見顆粒，這種情形，我們實在不能不為長春安全萬分擔心。無論防禦工程如何堅固，軍隊槍彈如何精足，但是餓兵絕不能打仗，饑民更不能為軍隊後盾。古今多少名將，扼守危城造成彪炳史跡，主要原因，在依靠軍民的合作，糧食充沛；若干固若金湯的城鎮的不守，往往就由於軍民不能融洽和糧食恐慌所致。

長春今日已是兵餓民餓，還要採購民糧，驅餓兵和餓民奪食，情勢的危殆，真乃不可想像。又如上電所雲，長春糧價昂騰不已，高粱米每斤價達流通券 1500 萬，折合法幣在 1.6 億以上，我們對此消息，固極驚訝，但我們驚訝的還不是糧價如何奇昂，而是長春圍城到今天竟然仍有糧食市場存在，在此半數市民以樹皮草根為食的時候，糧食實在不應該再允許作為私人的持有品。無論從人類的同情心，從生死同患難的需要上講，長春市內如果有一斤糧食，這一斤糧食也應該為全市所共有，為全體軍民所共用。倘若還有人操持糧食，囤積居奇，發饑饉財，發圍困財，其人固應殺無赦，長春市當局也不能不負縱惡瀆職之罪。

因此，我們除了為長春軍民向政府作急救長春的緊急呼籲而外，更願本其赤忱，切望現駐長春的負責當局為了解救長春危機，減輕長春糧荒，應儘量設法以最大努力，俾長春人口減少至最低限度。其沒有疏散的人口，則無論軍、民公務人員，既共在圍城，

即應本互助協力之義，力求糧食合理分配。直接參加戰鬥的人員，固然應該有較多的糧食，一般市民也絕不應聽其餓死，同甘共苦，團結一致，來渡過當前的難關！

日期不詳

鄒衍，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獨立第八師政治委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 對敵實行堅決打擊、嚴密封鎖的同時，我師指戰員以高昂的政治熱情和無比的智慧，對敵展開了大規模群眾性的政治攻勢。政治攻勢的形式多種多樣，在實踐中，指戰員們發揮出聰明才智，以黨的政策和影響瓦解敵人。
>
> 陣地喊話。陣地喊話是當時採取的最普遍的方法，每個前沿連隊都在進行。起初，部隊喊話缺少經驗，口喊，聲音小，速度快，效果不大，且易暴露自己。一些投誠士兵過來說：「你們喊得太快，聽不清楚。」為了提高宣傳效果，部隊就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敵人鼻子底下。有個連隊為了接近喊話，挖交通壕 2900 多米，散兵坑 160 多個。喊話用的工具也不斷改進。開始不少連隊做了簡易小喇叭，後來又創造了用長竹筒綁成的「彎形長話筒」。喊話人員既要有北方人，也要有南方人，使敵人都能聽明白。這樣做既安全，效果又好。二團十二連指導員呂遠超同志，在向駐東站敵軍喊話時說：「六連二排的兄弟們，你們整天站崗放哨，菜都吃不上，飯也吃不飽，在街上天天聞著死人的臭味，這是為了誰呀？這麼幹有啥意思？快帶槍過來吧。如果帶槍過來，還可以得到優待和獎勵。」第二天，該排果然有兩個正副班長和兩個士兵帶著槍跑了過來。
>
> 有的單位還組織投誠人員喊話，講自己投降動機、經過和我軍的優待俘虜政策，揭露敵人的欺騙宣傳。效果很明顯，馬上就有兩名中尉、兩名少尉帶著九名士兵攜械向我投誠。

散發宣傳品。部隊創造了打宣傳單，在伊通河內投放宣傳漂浮物等辦法，將宣傳品送到市區。有的制慰問袋，內裝宣傳品；有的寫信送月餅（內放宣傳品）。農曆八月十五日，我師在九台縣趕制了大量月餅，送到敵軍陣地。三團一營針對六十軍的情況，在宣傳品上寫道：「中秋佳節月兒圓，拋下雙親在雲南。投降起義歸故里，棄暗投明好兒男。」組織群眾宣傳。二團二連四班長李鳳春，通過當地一個16歲的少年給敵人送宣傳品。這個少年對出來拆民房的敵士兵宣傳說：「你們快過去吧，那面優待你們。」結果這個少年先後帶出31名敵軍士兵。李鳳春還通過一群眾，帶出了敵人一個班。我二團十二連文化幹事王群讓一難民去做瓦解敵軍工作。這個難民第二天把敵五十二師二團六連的一個班長帶來和我們取得聯繫，這個班長回去後，把全班9個人帶出來向我投誠，並攜帶5支步槍、1支衝鋒槍。二團二連還利用敵新三十八師投誠士兵，在七、八天內搞來6支步槍。

建立聯繫，做敵內部工作。敵五十二師二團四連共有90余人，班長以上大多數是南方人。該連剛到東站接防時，沒有菜吃，我們就給送去兩斤辣椒，並寫了一封信，帶了一些宣傳品。這個連很快就給我們回了信，大意是：辣椒收到，不勝感激之至；生活困難，請再給一些菜云云。我們收到信後，又通過群眾送去十餘斤菜，從此建立了關係。經過20多天的政治瓦解工作，這個連先後有50多人向我投誠，其中有排長1人，班長5人。

轉送家書。長春守敵在我軍包圍封鎖下，不但斷絕了陸空供應，通信聯絡也只能依靠無線電，就連他們官兵的家庭通信也依靠空投。當時，我師曾拾到敵機空投飄落到我陣地上的一個郵包，

裝了不少長春守敵的家書，有的是高級軍官的。我們就讓敵工科設法全部送進城裡。[1]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看到駐在家附近的國軍士兵每天三餐喝野菜湯，乾糧只有一點小疙瘩。士兵搶收來未熟透的糧食擺在營房晾曬，還派士兵放哨，以防老百姓哄搶。他的媽媽因為揀了一穗高粱而受到國軍羞辱。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十一年後寫道：

我們對面的炮排周排長也帶他的士兵到大房身前線搶收一批高粱穗，營房周圍到處都是高粱穗，他們還把裝在柳條包的高粱穗放在我家的圍牆上晾曬。

在翻曬時，一穗高粱掉在圍牆裡面。一天下午，媽媽看窗外空地上幾棵野菜長大了，就去拔，正巧一穗高粱在牆角下，(……)媽媽揀到這穗高粱，非常高興，一手拿這穗高粱，一手攥一把野菜走進屋。

哨兵看到媽媽手裡的那穗高粱，立刻到我家。哨兵端著槍，明晃晃的刺刀，對準媽媽。媽媽嚇得往後退，一屁股坐在床邊。這個南方蠻子兵吼道：「你的拉哈動用國軍的軍糧？」

媽媽向哨兵哀求：「老總，這穗高粱是我在圍牆裡揀的，你看，還有泥土，地上還有下霜打的印。老總，行行好吧。」媽媽哭著向士兵求饒。

「揀的也不可以！」哨兵惡狠狠地說。聽到哨兵的吼叫，周排長也闖進我家，他軍服筆挺，整整齊齊地佩戴少尉肩章。他雙手背在後面，用小皮鞭子敲打自己的後背，站在屋裡掃了一眼。

爹見此情，吃力地從床上爬起，跪在床上，苦苦向周排長央求：「周長官，原諒我們吧。下次再不揀了，行行好吧。國軍一向是寬宏大量的，一向是寬宏大量的。」

我躺在床上看著周排長，再看看哨兵明晃晃

的刺刀，顫抖地喊了聲：「周——大叔，周——大叔。」而弟弟嚇得躲在牆角直哭。窗外擠滿了炮兵排的士兵。

這位排長尋思半天，惡狠狠地說：「你動用了國軍的軍糧！」緊接著向媽媽胳膊抽了一鞭子。

這一仗，他們勝利了，揚長而去。而我們一家四口卻哭成了一團。[2]

在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難民們每天經歷著死亡的錘煉。一名被困在城裡的報社記者在四十年後寫道：「最殘酷的是1948年6月至8月之間，卡哨外的活地獄裡，用一枚金戒指只能換到一個小小的窩頭，還有人由於饑餓難忍，竟把餓死的人的大腿燒著吃，那真是一幅地獄的描繪，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到了那種地步已經完全失掉了人性。據說有某個商店的大老闆，想用一根金條換取一小塊豆餅吃，拿著豆餅的人在掂算著，他知道這個老闆已經餓得不行啦。他沒有把豆餅換給對方，而是瞪著眼睛看著這個老闆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好把金條奪過來據為己有。沒想到金條剛到手，他自己也因為病餓交加而氣絕身亡了。」[3]

國共兩軍之間的炮戰日趨激烈。為數不少的家庭都在燒香拜佛，盼望著共軍早日打進城裡來。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的媽媽也是這樣。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七周年時寫道：

有一天，她當著全家人的面，弄來一隻雞蛋，放在鏡面上，大頭朝向鏡面，尖部向上，用手扶著，嘴裡還不停地叨咕：「天老爺行行好吧，可把我們全家餓壞了。老天爺保佑我們全家平平安安，八路軍快些地打進來吧。（陰曆）八月十五能打進來，你就站住吧。」

扶了好半天，這隻雞蛋果真站住了！可把媽媽樂壞了。我們哥倆也信以為真（......）我們這個家頓時活躍起來了，幾個月的沉悶氣氛被沖到

九霄雲外了。媽還對著這面鏡子摳掉塞在牙縫裡的野菜，一股喜出望外的氣氛，都在一心盼著八月十五長春解放。[4]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412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一家人仍在饑餓中煎熬。她的父親大久保已經病倒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武田英克從洪熙街卡子裡傳遞回來的消息。遠藤譽在三十六年後寫道：「遺憾的是，武田先生用命換來的情報沒有傳遞給我們。……日本人居留民會的津田主任已經獲得這個武田情報，通知鄰組（根據遠藤譽書中的注釋：鄰組，為日本昭和15年，即1940年規定的，二戰時期所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而設立的基層組織。約10戶為一單位，受地方政府、町居民會等控制，政府通知、物資配給、勤勞作業、防空訓練等都通過該組織實施）『制止南下，等到中秋節』。」

此時，遠藤譽看到曾在民國馬政局（馬政局，1933年設立，是軍政部大臣監督之下的政府機關，其任務是主管有關馬匹的行政，進行滿洲馬的改良，向民間普及馬術知識，以適應軍事和經濟的需要）服務過的M氏和他的小兒子先後餓死了。

當蘇聯紅軍進城的時候，擔任過俄語翻譯的M氏，在第二次遣送的時候也沒有回國。他就算回到日本去生活，也不會有著落。如果父親需要的話，希望能留下來，於是就留在了這裡。他學過農業學，有夫人、姑娘一人和兒子二人，共五口之家。夫人過去常唱德國歌曲，很動聽。

有一天，M氏躺倒了。

「好像鬧肚子……」他説的是和哥哥一樣的情況，入睡的情況和哥哥也相似，所以不吉利的念頭掠過大家的心上。這個不安真的也猜中了。

「夫人，我的丈夫有些奇怪。」M氏夫人來找母親時，M氏已經斷了氣。

數天以後，M氏最小的兒子也死去了。[5]

在長春市老虎公園北門，住著李素娥一家八口人：

父、母親和六個孩子。時年16歲的李素娥記得，家中在7月中旬斷糧，當野菜和樹皮吃光時，最先餓倒的是父親，接著是大弟弟。在她家附近的老虎公園是國軍糧食的空投點，飛機一來就掉糧袋。她在四十五年後回憶道：

> 盡是大米，南方大米，東北人叫「線米」，飛機一響，國民黨就戒嚴。看不住。老百姓早準備好了，哪兒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麼准，老百姓搶，國民黨就開槍。開槍也搶，用小刀劃開袋子，摟些就跑。有的見到糧食就往嘴裡抓，甚麼都不顧了，也忘了，槍打刀紮，就那麼抱著糧袋不放。槍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們家人祖祖輩輩都膽小，可人到了那份上也就沒甚麼膽小膽大的了。媽甚麼也捨不得吃，總讓我吃個半飽，說「你是咱家頂樑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動一動就冒虛汗，可一看糧袋掉下來，勁就來了。
>
> 白花花的大米撈在手裡，那是全家人的命呀！有個姓劉的姑娘，比我大一歲，叫糧袋砸死了。離我不到10米遠，砸得扁扁乎乎的。
>
> (……) 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裡就癢癢，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見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有人給我保媒。甚麼「保媒」，「結婚」的，就是換大餅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換了大餅子，換給郊區農民。(……) 東西不值錢，錢不值錢，金子不值錢，人不值錢，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
> 每天都餓死人。死在家裡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嘍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6]

1948・8・24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通電稱：我主力在北寧線正準備殲滅錦州南北各線分散之敵，預定下一步敵人若龜縮於幾個強大據點內堅守不出，則我主力仍有打長春或打援敵之可能。我圍城部隊對正式攻打長春之敵仍應做準備。

在洪熙街卡子內，沙秀傑看到媽媽躺著不愛動，她非常害怕媽媽也會像王叔一樣死去。

1948・8・26

廣州《中正日報》特電：「北平訊：據接近政府當局之報導稱，自上星期六迄今，以空中投擲物品救濟在饑餓中之長春人民，每日達二十次以上。自東北往北平之旅客曾述及長春有人食人之事實。自空中投擲物資可減少該區國軍處境之危機。長春系東北首邑，但其地位已為瀋陽所代替，在熱河省會承德之國軍，刻在儲備糧食以應付將臨之冬天，該處公路鐵路均遭共匪切斷，國軍飛機刻在空運物資，供給該城。」

1948・8・28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九天。她的媽媽仍舊躺著不愛動。她發現，曾經幫忙把王叔抬出去的那幾個山東大漢，他們在白天總是躺著不動，一到晚上就會弄出動靜。她猜測這些人可能是在夜晚出去找吃的東西。

> 這天夜裡，我聽他們又有動靜了，我也偷偷地起來，就跟在他們後面走出了「大房框子」。他們四個人，手裡都拿個木棒子。我拉開距離跟在他們後面走，走了一陣子，下了一個大寬壕溝，再爬上溝，怎麼四個人一個都不見了呢？隨著喘粗氣聲，我判斷他們上了壕溝，都在趴地前行，我也就快趴下爬。不是平地是壟溝，壟臺上有秧棵，很紮臉，我用手往秧棵上摸，摸著一個滑嫩的比拇指長的小東西，葉子和蔓很扎手，我斷定這是剛做紐的小西葫蘆，就掐一個往嘴裡填，太嫩了！脆生生的就咽下去了。又摸了一個，邊往前爬邊摸，一連吃了好幾個，甜絲絲的一點渣子也沒有。趴在壟溝裡身子往前爬，兩手左右地劃拉，天哪！豆角架！架上已經結了小豆角，但是很少。我邊摘著豆角邊不停地往嘴裡塞著。（……）這時才想起媽媽，我不能只顧著自己吃，得快點兒摸，得揣在兜裡給媽媽帶回幾個。
>
> 這時，山東人在小聲叫他們的同夥：「快走，屋裡有燈亮了！」我也跟在他們後面下了壕溝。天濛濛亮了，他們發現了我。我趕緊說：「大哥，我媽媽快不行了，我跟著你們弄幾個小西葫蘆。」他們四個人誰也沒說甚麼，就說：「快走吧，天亮了。」
>
> 我走到荒地土丘上，回頭望一下剛才去的地方。在朦朧的晨曦中，尚能看到這是一處莊戶人家，兩間很破舊的小草房，紙糊的窗戶，有巴掌大小的一塊玻璃碴子鑲在中間，整個小庭院都掩映在高秧棵和小樹中。離房前有段距離就是我們剛剛去過的有百米長的小菜園。

沙秀傑回到「大房框子」，把偷來的小西葫蘆和小豆角塞進媽媽的嘴裡，她想救媽媽。但她的媽媽再從嘴裡掏出來，往她弟弟的嘴裡放。她告訴媽媽說：「給你的，你別瞎塞了！」

下午，她的三弟沙風臣偷偷央求媽媽，讓媽媽用手上的銀鐲子去跟土匪換一塊大餅子尖兒來給他吃，還說吃了就能站起來跟她們一起爬卡子逃命。

沙秀傑看見媽媽拄著個木棍出去，在外面站了一會兒，回來後說：「兒啊，人家不要哇！」媽媽哭著給三弟掩掩被子說：「求真主吧！」

這時，天色已晚，三弟把被子往頭上一蒙，說了一句話：「那我就不等了……」

《南京日報》自瀋陽電：「長春國軍於昨（27日）清晨2時，向西郊之匪突然採取攻擊行動，當於拂曉前將大房身機場一舉攻佔，因系出匪不意，故奪獲匪彈藥武器等甚多，敗匪曾數度向我反撲，均經我軍擊退。」

中央社長春電稱，長春國軍在27日晨趁勝追捕犯長逃匪，於虎石溝、寬城子一帶，俘匪100餘名，擄獲槍支彈藥甚多。

1948・8・29

新華社陝北電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 1948 年 7 月戰績：7 月份我軍戰績空前，殲敵 30 萬克城 73 座。」

廣州《中正日報》自北平專電：「據息：昨日國軍曾克復距離孤立之長春西北 15 里之大房身機場。共匪曾數度企圖奪回該處機場，均遭國軍擊退，國軍苟能固守並運用該機場，則可空運糧食至長春，減少該處之缺乏程度。」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向所屬各縱隊、各師首長下達了戰鬥動員令。在動員令中說：「我軍以部分兵力圍困長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寧線前進，以奔襲的動作，堅決殲滅分散于北寧線守備的各處敵人，切斷與摧毀東北敵人與華北的聯繫，使兩處敵人彼此完全陷於絕望的孤立中，並求引出長春之敵突圍，而在突圍中殲滅該敵，由此求得加速全東北解放之早日到來。」[1]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十天。沙秀傑發現，這一夜間，死了三、四十人，其中包括她的 12 歲的三弟沙風臣，還有王嬸的兒子王丫頭：

> 每天早晨，媽媽一爬起來，都會一邊嘴裡叫我們的小名，一邊用手挨個兒地摸一下我們的鼻孔，看看有沒有氣息，摸到三弟時，媽媽大聲喊道：「三兒！三兒！」三弟沒了氣息……
>
> 媽媽的哭聲驚醒了我們。「媽的小頑童！媽的小頑童！苦命的三兒！苦命的三兒！媽就沒給你弄來一塊大餅子尖兒。苦命的三兒！」
>
> 媽媽的哭聲，引來了鄰家的哭聲，匯成一片，那哭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多。不是替我家哭三弟，而是這天早晨差不多「大房框子」的每家都死了人。（……）一下子三、四十家子，死了三、四十口子人，那哭聲混成的哀調，每個音節，都在滴血錐心，（……）人們驚了，都趕緊喊著、摸著，清點自己的家裡的人。（……）沒有人把死者抬出去，沒有互相求助和幫忙。媽媽用被單子把三弟裹得嚴嚴實實，抱起來並挪到她身邊躺下，一隻手還攬住三弟

的屍身。

王嬸的兒子王丫頭，也是在這天淩晨餓死的。

王丫頭前半夜讓媽媽摟著他，他一隻手捂著王嬸除了乳頭就是肋骨的前胸，想把頭貼在母親的前胸上，吮著乳頭，可他沒力氣抬頭。王嬸怎麼也拽不出她那貼到前胸上乾癟的乳頭。孩子在王嬸的懷裡蹭了幾下，沒找到他想要的東西，就垂下了頭！王嬸怕捂著他，就把胳膊抽出來，她一推孩子的頭，覺得不對勁兒，就喊我媽媽。兩個人劃了一根火柴，就火柴一亮的那一瞬間，看到王丫頭已經沒有了呼吸。王嬸抱起孩子就沒完沒了地哭泣。還是那位幫著抬王叔的山東漢子，從王嬸懷裡搶過孩子說：「別哭了，我送他到他爸那去吧！」

沙秀傑發現，「大房框子」裡的人越來越少，當眾多死者擺在生者面前時，他們大多人都認為，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斃。於是，年輕力壯的年輕人都嘗試著爬卡子去了。在這天，沙秀傑還發現，王嬸不見了，她的所有家當都沒有被帶走。她的媽媽說：「她是跟著抬王叔的山東人爬卡子去了（……）」留在「大房框子」裡的人，基本上是老弱病殘者與拖家帶口者。顯然，還有那些餓殍。

「大房框子」因死人太多，綠豆蠅和帶著尾巴的大胖蛆，不但是爬在死人身上，活人也躲不開牠們了。人們寧可讓雨淋著，也都搬到國道上排長隊去了。我家已無力搬動了，而且我們住在一塊較高的瓦礫上，周圍死人的屍體相對要少一些。

東北農曆7月是個多雨的季節。睡在國道上，每下一場雨，就要淋死一批人。無遮無擋地被雨淋一夜，暴雨淋得活人披頭散髮的，簡直像個鬼，而死人則被雨水浸泡得白白胖胖，倒是比活人好看許多。[2]

北平《益世報》以「血淚話長春」為題，刊登署名為馬行健執筆的紀實報告。該報告是從一個長春逃脫的難民「口中聽到」的「悲慘

的事實」，「並代表被困的80萬難胞向全國以及世界人類呼籲」：

當5月榴花滿眼紅的季節，長春80萬市民開始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悲慘命運。從5月24日午夜起，共匪嘯聚了蒙、韓外匪，開始圍困孤城長春，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半月的悠長日子，80萬善良的生命，在共匪慘無人道的「餓死戰法」下陷於絕境，造成了空前未有的人間慘劇。現在，慘劇還在繼續扮演，共匪更變本加厲地伸張著魔手，攫奪在長春的80萬難胞的生命。

被圍的當時，因為市內還有一些餘糧，情勢還不十分嚴重，80萬市民的生活還沒有感到過分的恐慌，希望能有一條生路，不至於活活餓死。但在共匪的包圍圈子漸漸縮小，市郊的田禾，都被鏟光，終至飛機不能降落，只有仰賴空投少許食糧來延續多數人的生命，誰又料到共匪從何處調來的高射炮，使空投食糧的飛機也受到重大的威脅。終於，嚴重的饑荒，像野火般地、普遍地燒到每個人的身邊，饑餓的人群，在死神猙獰眼底一個個地倒下去，東北的孤城長春，在共匪緊緊圍困下，已形成「人間地獄」。

在共匪以「餓死戰法」圍困下的長春，到處扮演著殘酷的悲演。野菜樹葉都被採摘一光，老樹軀幹俱已蒙羞。以豆餅果腹的算少數，豬狗不食的發黴酒糟，變成了珍貴的食物，因食草根樹葉而中毒的比比皆是，頭青、臉腫、腹瀉、夜盲成了普遍性的疾患。在街頭行走的人，都似乎搖搖欲倒，吃不飽肚皮，又怎麼會有力量。人們都以同疾相憐無神的眼光互相打量，互相顟歎，今日遇到的親朋，說不定明天就被饑餓攫走，疾病的呻吟和饑餓的呼喊，讓夏夜的晚風傳播到每個人的耳邊，每個人的生命，也正同螢火蟲尾上的微光。僻巷裡餓殍橫陳，陋屋中僵死屍處處，市區空田暫作臨時墓地，在沒柴燒的今日，哪有棺材收斂，上天註定了他們的命運，光著來和光著走，死了一個人如同死了一條狗。十斤米換一位女人，三斤米換一幢洋房，並不算奇異的事。可是誰有米來換洋房和女人呢？

饑餓威脅著長春，長春的市民再也忍不住饑餓的侵襲，一批批地難民，冒著炮火的危險，爬出死線去求一條生路，但都被罪惡的匪哨攔阻，大有非置80萬同胞於死地，不肯甘心之勢。

當饑餓的死神扼住了喉管的時候，長春的市民不得不冒著危

險逃命，和市區一溝相隔的宋家窪子就是共匪的哨地。在 8 月 1 日的午夜，我們一行三十人，結夥由市區爬出來，每人背了 5 斤炒大豆，做為一路的乾糧。在一彎弓月高掛天空的夜裡，爬到匪哨的跟前，一排排子彈射過來，我們口裡喊：「不要打，我們是百姓呀！」才止住槍聲，挺腰站起來受檢和訓話以後，又把我們擋回，並且告訴我們：「快回去吃餓長春，等『人民的軍隊』，把你們解放。」天呀！回去就得餓死，還等甚麼「解放」。我們被趕回之後，就在泥塘邊的茅草層裡煎熬過一整夜。天亮後，吃些大豆、飲些塘水，又等待著天黑：準備另走一條小路繞過崗線。可是同樣地又碰了回來。直到第三天夜，我們化整為零，以五人為一組，分路爬行在高粱地裡，一個整夜，也不知爬了多少路。天明後，遇到一位老鄉，才知道走了 15 里路，離范家屯車站還有 60 多里。這時夥伴們散失了，只剩下五個人，在死裡逃生。白天不敢走，怕的是碰到匪哨，夜裡繼續蛇行。

第二天黎明，才走到范家屯，經過兒童團的盤詰，放進市區。露宿一宵，算是安然地睡過一夜。第四日清早，每人脱一下罩布衫，雇了一輛「生產車」，奔向公主嶺，沿途的盤查，並不像長春周邊嚴厲，當晚到了公主嶺。翌日又用去 25000 元紅票（即中共統治區的貨幣）雇車到四平。四平到哈爾濱的火車已經通車，但都在夜裡行車，為的是避開國軍飛機的轟炸。四平老百姓也吃米糠，布和藥品極度缺乏。四平市過一夜，走向開原站，經過一夜又到中固，攜帶的大豆被吃光，只有嚼路旁未成熟的玉蜀黍來充饑。從中固出發，走了 10 餘里的「真空地帶」，最後走到鐵嶺，統共用了十整夜的時間，才到了目的地 —— 瀋陽。

1948．8．30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十一天。沙秀傑擔心自己會在躺著時不聲不響地死去。

> 我堅持白天不躺著，寧可身靠著牆根兒閉著眼睛打盹兒，也不敢躺下，連著躺兩天，人就起不來了。得想轍呀，趁著天還沒放亮，我想一個人再去找個小菜園子摸點兒東西吃。按著原來走過的方向就下了壕溝，剛要爬上壕溝，就聽到狗叫。我嚇得一下子就滑到溝底，臥住不動，待了半天，沒動靜。我剛起身爬到溝沿上，突然一聲槍響！我想：完蛋了，我一定是中彈了！
>
> 半天才緩過神來，身上沒有哪兒疼，太萬幸了。我當時穿著一條媽媽的又肥又大的夏布抿襠褲，漿洗得很硬。後來，媽媽說：「褲腿上有兩個小槍眼兒（當時住在這城邊的三不管地方的農民，怕遭土匪都備有氣槍）。」想那持槍者是往我腿上打的，是肥大的抿襠褲擋住了槍子！

顯然，對沙秀傑來說，扒菜園子找食物的路是行不通了。她覺得自己不是怕槍打，而是怕被狗咬，她認為，「真要是被狗撕了，還不如餓死呢」。經過這番折騰，她覺得口很渴，就想到水井旁喝頓涼水。她從井裡打上水，剛要喝，突然在井旁邊的一堆大便吸引了她的注意：

> 這不是普通的大便，牠牽住了我的眼球。因為拉大便的這個人可能是沒有消化功能了。拉出來的便中除了稀水，還摻著很多炒熟的沒有消化好的黃豆瓣兒。這些豆瓣兒邊緣整齊，沒有粘黏的東西。當時我沒動牠，但是我蹲在邊上看住牠。待了一會兒，稀水被曬乾了，我把豆瓣兒一個一個地挑出來，足有三、四十瓣。然後，我到井沿用清水一頓猛洗，聞一聞，沒啥怪味。一小把兒全部放進了嘴裡。那可是十幾天沒見到的糧食啊！嚼了半天，也沒品出個香臭，就嚥下去了。真是感歎這位種豆的偉大農民，全世界只有他種的豆子，有幸經過兩個人的胃腸道遊歷了兩次：第一次沒消化好，接著第二個人重新咀嚼，再經過胃的打磨，腸的蠕動，最後做到了全能的物盡其用。[1]

中央社長春電:「長春警備部29日槍決偽造中央銀行本票張儀先、趙靈清兩名，該犯於7月初偽造國行100萬元本票達30億之鉅，經警備部以『戰時緊急治罪條例』擾亂金融罪判處死刑，29日上午執行。」

《北平日報》以「高粱稈子可作窩頭」為題刊登瀋陽航訊：「市衛生實驗所張威夫，發明利用蟲災之高粱稈制粉做饅頭，其法為取稈之根部四、五節，剝皮火煎乾燥磨粉，加五成豆麵，可作餅或窩頭，刻正逐步製作為瀋市糧荒聲中一大發明。」

深夜，在洪熙街卡子裡，武田英克四處眺望時，看到一對中國難民夫婦面向月亮，跪在地上三拜九叩，他感到十分好奇。他接著看到這對夫婦背著行李向南部共軍的鐵絲網方向走去，他遠遠地尾隨著。在鐵絲網附近，有一大片生長著的芒草，這對夫婦鑽進草層裡，很快就不見了。

武田英克暗想，他們可能是找到逃脫的路徑了。當他鑽進草層裡查看時，發現有一個半人高、比肩稍寬的地洞。他猜測這可能是難民們偷偷挖掘的通往卡子外的暗道。此時正下著雨，他也顧不得髒了，匆匆地爬進洞裡，想試試能否出去。他不知道爬行了多久，身體沒有力氣，好幾次都要窒息了。他花費了很多力氣拚命爬，前方出現洞口了。他發現已經爬出了卡子的封鎖線。「終於得救了，」他後來寫道，「激動地眼淚都掉了下來。」

後來，武田英克反復地追憶，他怎麼也記不清楚自己是在8月30日還是31日逃脫的。不過，這都不要緊了。重要的是，他還要趕路。在之後的8個月裡，他一個人一邊乞討一邊步行，跋涉了2000公里，在1949年3月到達上海。此時的他，體重下降到二十多公斤，僅剩皮包骨了。1949年4月上旬，他才到達了自己的祖國——日本。[2]

1948・8・31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十二天。上午，沙秀傑看到天空中突然飛來了兩架低空飛行的飛機，飛機的艙窗都能看得很清楚。

有人喊：「八路的飛機！八路的飛機！」

飛機的轟鳴聲震醒了躺在國道上昏睡難起的難民，沒人號召，都爬起來跪下了！有爬不起來的，也拄著棍子或扒在自家手推車上，但都是跪姿的，雙手抱拳，頭仰望著飛機，嘴裡像是禱告似的，其實他們是在喊：「八路軍救命呀！八路軍快救命呀！」有點兒力氣的竟往地上磕頭，更有聰明的人舉起手來搖晃花衣服和破花布。然後，大家都學著，舉起或挑起帶顏色的東西晃，還有把鍋和盆子敲起來的。整個國道上的人像瘋了一樣一下子亂了套了，形容是沸騰，說是求生的吶喊都不為過，要知道這是一群在彌留之際正在走向死亡路上的人們，這嘈雜的喊聲，飛機的轟鳴，猛然驚醒了他們，譜成了召喚他們回頭的強音。他們像拽著救命稻草一樣，順著這聲音，回頭折路。飛機低空盤旋了五、六分鐘，帶著嗡嗡的風聲飛向高空。

飛機的出現，給這些飽經饑餓折磨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大多數人都認為，共軍的飛機前來偵察，是要開卡子的徵兆。但也有人認為，飛機是被共軍派來拍攝死人有多少的。無可置疑，飛機的出現，給這些人帶來了生機。

那些奄奄一息的人臉上出現了一種表情，這種表情是最優秀的演員也難以模仿出來的。饑餓的人們骨瘦嶙峋，露宿在無遮無擋的荒郊野外，又在死人堆裡軲轆了十幾天，蓬頭垢面，即或是喜悅，也讓人難以分辨是人的喜悅，還是鬼的獰笑。深陷的眼窩下，一雙灰暗無神的眼睛，高聳的顴骨下，兩片乾癟得包不上牙齒的嘴唇，但畢竟眼珠還能轉動，手也能抬起來揮動幾下，這就是他們在全身衰竭中求生欲望的展示，也是表達他們一種從心裡高興的表情。

日期不詳

周保中，中共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吉林軍區司令員，他所屬的吉林軍區部隊擔任配合主力部隊封鎖、保衛長春的任務。在如何對待長春市內逃出來的餓得東倒西歪的難民問題上，周保中和林彪發生了分歧。他的傳記作者寫道：

> 林彪堅持：「外不許進，內不許出，讓老百姓和國民黨搶糧」的方針。周保中認為，圍城已久，城內糧食已空，我們已有取勝的絕對把握，就應該讓外逃求生的老百姓自謀生路，哨卡放行他們。會上，周保中為此積極地向林彪提出建議。林彪沒有表態。周保中深知林彪戒心重重，即使和他推心置腹交談意見，也難免招來新的是非。但他仍然果斷地來到林彪的住處，誠懇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今天我們圍城和明天打進城不都是為了人民嗎？現在，眼看長春市內的百姓躺倒街頭，奄奄一息，我們能無動於衷嗎！我們對要求出城的百姓應該放行。」
>
> 林彪聽後卻說：「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原定方針不能變。」
>
> 「林總，我知道你是從整個戰局出發，考慮問題是慎重的，但你想過沒有，長春人民在十四年的抗戰以及這兩年的解放戰爭中，付出過重大犧牲，對我黨有過巨大的支援，難道我們能看著這些有功的人民，就這樣地倒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嗎？」
>
> 林彪看了看周保中，非常嚴肅地說：「老兄，這是戰爭！」
>
> 不過，林彪還是聽取了周保中和眾多同志的意見，修正了「內不准出」的規定，同意積極安置從城中逃出來的居民。

1948・9・1

上海《糧食日報》自南京專電：「吉林省委林富春王煥彬等有電來京，請監委王冠吾國代于斌及其他東北人士告以長春之近況，原電所陳慘景不忍睹，聞並請在京發起長春輸糧救死運動。莫德惠返京後，已與（行政院）翁文灝院長商談，但無結果。東北人士日內將為此事向蔣總統請願，要求軍事支援長春，並解除糧荒。」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一前指 1 日報：敵新三十八師一一二團三營，自 22 日至 28 日，以恩慈醫院為依託，在炮火掩護下，向我一〇三、一〇五陣地，綠園花園陣地出擊，大小達五次之多，斃俘敵 80 餘人，我傷 50 餘。（二）獨十師 1 日報：新七軍騎一團之騎一排，有 10 人，帶機槍一，衝鋒槍二投誠我方。」[1]

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改稱為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其所屬圍城部隊至月末和 10 月初，又增加了遼北軍區獨立第一、十二、十三師，安東軍區獨立三師，蒙古騎兵第二師及合龍、松江、吉嫩軍區的 19 個獨立團。所指揮的部隊分成第一、第二線兵團大縱深多梯次配置，在長春周邊地區築起了堅不可摧的「城外之城」。[2]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向所屬圍城部隊，以及地方政府，發佈《關於保衛秋收的指示》，在指示中稱：

> （……）
>
> （2）長春敵已將城內糧食搜淨，面臨饑餓，必乘秋收機會拼命用盡一切手段進行搶糧購糧。敵搶糧方式估計以軍事出擊掩護搶糧為主，或勾結胡匪或組織市內饑民，用分紅辦法誘惑出來偷搶，或以物易物利用奸商高價收買。
>
> （3）因此，保衛秋收，保衛糧食，保衛群眾翻身利益，是我們各部隊最近一時期嚴重的鬥爭任務，亦即達到進一步圍困封鎖敵人的最有效的戰鬥手段。必須向部隊進行思想動員，激發部隊高度戰鬥熱情，以頑強積極的動作，壓縮敵人；打擊敵一切大小搶糧部隊及胡匪活動；加強封鎖，嚴禁走私，以保衛秋收。我

們的口號是：「不讓一粒糧一根草被敵軍搶去！」「不讓一粒糧一根草流入長春！」「不讓快餓死的敵人復活！」「不讓一個搶糧的敵人逃回去!」

(4) 要向群眾動員，首先打破其對我力量的懷疑，「長春能否打下？」及因受敵欺騙造謠，以及過去土地改革中集體吃飯打大場等過左的錯誤，因而懷疑到「糧食是否歸公？」「是否沒收？」或「是否共產？」之顧慮。宣傳誰種誰收，誰種歸誰，不要被敵搶去，保護糧食就是自己的生命，把廣大群眾都組織到秋收戰線來。提倡四快，快割、快打、快藏、快運，只有做到四快才能免得被敵搶去。收割中要組織一切人力男女老幼編成互助組、變工隊等。收割步驟應先前方而後後方。後方還可組織幫收隊，首先說明前沿地區，最前沿由部隊掩護夜間搶收。建議各當地政府、黨委組織專門武裝工作隊，到前面組織領導這一秋收工作為當前主要突擊任務。

(5) 已收回的糧食，除去給群眾留下生活上維持三個月必需的糧食外，其餘都要運到封鎖區後面保存。要向群眾宣傳說服自動寄存到非封鎖區的親戚朋友家中去。或由政府訂出具體保存辦法：由政府代替保存，按月授糧；或由貿易局以鹽等食物交換；或將群眾餘糧購買；或部隊於秋收期間，就地借糧借柴等辦法。但爭購政策要按中央東北局對新區政策規定實行。[3]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十三天。天氣炎熱，沙秀傑看到緊裹三弟屍身的被單裡鑽出來的蛆四處亂爬，「涼涼的、肉乎乎地爬到了」她的臉上和身上。

沙秀傑看到人們都在打點行囊。有的人在處理死去的親人，而處理的方式無非是將他（她）們的屍身擺正，或加床被子，或以繩子捆好，並將他們的衣服燒掉。

沙秀傑感覺自己精神好多了，她將這歸功於飛機的出現和吃下的糞便中的三、四十顆豆瓣兒。

我和媽媽說：「你們娘兒幾個，也要精神點兒，都說明天就要放卡子了！」小弟和小妹也很興奮地從地鋪的被窩裡出來走走。可媽媽說她是很難站起來了。我揭開媽媽的被子一看，嚇了一大

跳：媽媽的兩條腿腫得已經看不見膝蓋了，白亮亮的；兩隻腳就像兩個小枕頭，水靈靈的；別人骨瘦如柴，可媽媽卻全身浮腫。媽媽說，她除了餓以外，可能還有病，也許和王叔一樣的病吧！

我們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在這生死關頭，媽媽是我們唯一的依靠。如果媽媽要像王叔一樣，那可是天都塌了！我們三個孩子都撲到媽媽的身上，嚇得嗚嗚地哭了起來……

媽媽撫摸著我的頭說：「你行！你把你弟弟、妹妹帶出去逃生吧！我領著三兒去找你們的父親去……」這一定是媽媽打蔫兒的那幾天盤算的後路吧。娘兒四個頓時哭成一團。哭到沒力氣時，我倒清醒了。（……）有了求生的希望了，怎麼能放棄呢？我得為明天出卡子做準備去。我叫弟弟、妹妹扶著媽媽試著站起來慢慢地走走。

當我走出「大房框子」一看，吃驚不小：原來人山人海的國道上，突然人稀少的多了。但東西扔得滿地都是，搭的棚子東倒西歪，死人大部分都挪到路邊。人們甚麼東西都不要了。人和手推車都挪向前邊了，家家都在為明天趕早出卡子做準備呢。

我家在城裡也算是最貧困的人家了。從家裡帶出來的東西，遠不如人家扔的東西好。我知道當時「白花旗」棉布是最有用也是最能賣錢的好東西了。我把家裡的破東西全扔了，去揀別人扔下的好被裡子布（「白花旗」棉布），被裡子布是縫在棉被上的，必須要拆下來，因為力氣實在有限，我就把被子的一頭壓在較重的東西底下，另一頭用手拽、用剪子剪，有的是從死人身子底下拽出來的。我一口氣揀了十二條「白花旗」被裡。我的標準必須是新的，而且沒有下過水的。揀了很沉的一大包。

我回來一看，媽媽仍在地鋪上躺著，弟弟、妹妹說，媽怎麼也站不起來。我扶著媽媽站了起來。當媽媽剛一站起來時，腳背上的薄皮就炸開了，黃水就從媽媽的腳背流出。媽說：「媽實在不能走了，你把弟弟、妹妹帶出去。到大屯鎮找一位叫沙廣興的人，他是你父親的遠房兄弟，請他幫你姐弟三人找條活路。等長春解放了，再回來找你們的兩個哥哥。媽就是累了，就想睡下了。」

我看著媽媽這個樣子，真是心裡沒底了，病情這麼重，一睡下就起不來了，接下去，我不敢再想了。我和媽說：「你要是執意不走，那我們三個也不能走了。眼睜睜看著生路不逃，難道大家就死在這裡嗎？」這時，我看到媽媽閉著的雙眼流下了淚水。

我回過頭又向弟弟、妹妹小聲說：「哭，你倆使勁哭，就說不願意死在這兒。」

弟弟、妹妹很聽我的話，拽著媽媽的手，哭著說：「媽媽快站起來走吧，這裡的人都快走沒了。你總說解放區沒有餓死的人，前面就是八路軍。媽媽，我們不願意像三哥一樣死在這兒……」說著就哇哇大哭起來。

這時，媽媽很傷心地擦拭著弟弟和妹妹的眼淚。我一看媽媽的心好像活了點兒，就緊接著說：「爸爸死的早，您不是總說苦和累都是要為父親留下根苗嗎？兩個哥哥槍林彈雨的誰能保准啊。小弟可是咱家現有的唯一的一顆根苗了。你就忍心我們三個陪你一塊死？把沙家的根苗斷了嗎？」說到這裡，我們三個孩子抱著媽媽又哭成一團。

媽媽痛苦地說：「主要是媽媽的腳不敢沾地。」

我勸媽媽說：「你就忍著疼痛站起來，讓皮都綳開，讓黃水都淌出來，腳才能輕快。我去給你找鞋去。」

當時的「中間地帶」，除了能吃的以外，一切物品應有盡有，真是「共產主義」呀，想拿甚麼就拿甚麼。鞋多的是，皮的、膠的、布的，但就是沒有媽媽能穿的鞋，因為她腳部腫脹必須穿大號的軟的布鞋。我給媽媽找鞋的同時，也給弟弟、妹妹找到了好鞋、好衣服，讓弟弟、妹妹都換上了。

後來，我在壕溝邊上看見一具被雨水淋泡的、白胖、高大的男屍，他的腳腫得和媽媽的差不多，腳下穿著一雙大黑布鞋，我給扒下來了，這鞋濕漉漉的，黏糊糊的。由於弟弟、妹妹的哭訴和我的勸說，加上媽媽看著我吃力地背著個揀來的大包，手裡又拎著一雙大布鞋，媽媽的心就軟了，答應明天和我們一起走。

當時，我們非常高興，掛滿淚珠的小臉突露出久違的笑容。我們又給媽媽穿好鞋子，又扶著媽媽練習走路。嘴裡還不停地喊著：「我們要走啦！我們要走啦！」[4]

梅震也想離開這個「饑餓地獄」—— 長春。他是中央銀行理事，也是武田英克的同事，同為被民國政府中央銀行留用的日本人之一。此時，隨著滯留長春的日本人的大量減少，「日僑善後聯絡處」，也已更名為「日本人居留民會」，主任為津田。梅震接受津田的懇請，

將欲出城的日本人組成一個團隊以便互相照應，梅震被推舉為名義團長，團隊共四十九人（成年男、女三十五人，男、女孩十四人）。

今日，梅震帶領他的團隊「戰戰兢兢」地走進了「陰森恐怖」的洪熙街卡子。他在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寫道：

> 終於踏入了傳說中的卡子。兩軍最前線之間相距四、五百米。道路左側是文教部紅色的、已經倒塌的宿舍，右側是一片寬闊的草原。這草原大概有300米寬，一直延伸到鐵路的土堤。這片平坦的草原就是我們被迫滯留的卡子。國民黨政府由於糧食短缺，並沒有阻止居民出城。日本人出城雖然必須經過公安局的許可，但是除了特殊留用者（大學或工業研究所的職員）之外，日本人一般都是被無條件許可的。然而，八路軍卻不能允許無條件通過。我們只能等待放開關卡。
>
> 我們這一行人進入卡子的時候，卡子裡的人們都聚成一小撥一小撥的，散在場內各處。整個卡子非常安靜。然而越往裡走，觸目驚心的場景越使我們退而卻步。卡子內到處是廢棄物的碎片，呈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另外不斷能看到人的屍體，有已經化成白骨的，有正在腐爛的，還有看上去剛死去不久的。這些屍體橫躺在道路兩側的淺溝裡或建築物的角落裡。這其中也有蓋著被子死去的人。武田（英克）的信中寫道，有時候八路軍會過來收拾這些屍體。但他們收拾的也只是這多得收拾不過來的屍體中的一小部分吧。到底有多少人沒等到出去就死在這裡了呢，我也不知道。在草原上也有用木片記載著姓名和生卒年月日的墓碑，我想這些人是幸福的，因為至少還有人有精力來安葬他們。
>
> 我們找了一個離八路軍的步哨線近的地方安頓下來。這是考慮到能方便和對方接觸，以亮明我們日本人的身份。隨著後來進入卡子的人不斷增多，我們變換了兩、三次棲身的場所。我鋪開席子，剛躺在上面，後背突然被一個堅硬的東西戳了一下，原來是一個埋在地裡的頭蓋骨。
>
> 此外，當我們轉移到道路沿線的草堆中時，旁邊的電線杆底下也有許多雪白的骨頭，這些骨頭旁邊還有小骨頭，我想大概是大人和孩子的骨頭吧。看起來死了有幾個月了，那時的天氣已經轉寒了，屍體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在去打水的途中，我們路

過一個房子，房子的地上有一大一小兩具腐爛的屍體，大的旁邊還有一堆散落的長髮，表明死者是個女人。小的是個嬰兒，大概是躺在母親的懷裡死去的吧。剛開始我不敢正視牠們，但後來路過次數多了，我都可以毫不在乎地從女人的頭上跨過去。[5]

1948・9・2

軍聞社長春電：「長春我守軍連日以有力部隊向市郊出擊，與匪八、九、十等獨立師均連續發生激戰，擄獲甚多。1日拂曉國軍某部鐵騎，收復長北衛星據點安家窪子，復衝破匪重重封鎖卡哨，指向農安。」

《南京日報》自瀋陽電：「匪獨七師所部5000餘人，上月31日藉優勢炮火掩護，由長西班家園子、白狗屯等地向我宋家窪子國軍陣地猛攻，激戰竟日，計斃匪60餘，俘匪4人，獲步槍10支，匪負創敗逃，國軍乘勝追剿。當將陣地擴展至宋家窪子西北一帶。又，長南匪獨六師一部企圖向北竄擾，當經我炮兵予以奇襲射擊，斃傷匪40餘。」

在洪熙街卡子內，這是沙秀傑一家人在此等待的第十四天，也是她們出卡子的日子。當這一家四口人醒來時，她們發現「大房框子」裡出奇地肅靜，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嘈雜。

> 除了我們娘四個以外，滿地都是橫七豎八的屍體，而我們鋪的周圍又多了幾具新屍。我趕緊去摸媽媽和弟弟、妹妹的口鼻，都有氣息。媽媽慢慢地睜開眼睛說：「我都摸你們好幾遍了。咱們可千萬別像這幾位（指著昨夜斷氣的新屍），馬上就得救了，卻死在這裡。」

沙秀傑發現，在「大房框子」裡的死屍中，還有幾個尚未斷氣的人。

> 這部分人的末日，是用文字難以形容的悲慘：人還沒死，就等於當死人被處理了，這也該算是千古悲劇吧。他們是靠自己的能力已經站不起來了，家人又背不動、抱不動，被放棄了的「活死人」。他們也是懷著強烈的求生欲望，在這裡已經超過十四天了。他們這時的能動力只剩下眼神了，焦急渴盼的眼神向生命發出最後的求援！可眼前讓他們看到的是一撥一撥的拖兒帶女的人群，包括他們的家人，都走出了「大房框子」，奔向陰陽合扇的陽門，陰扇的大門卻留給了他們……我腳下的三男一女，他們雖行將就木，但思維尚存、意識清醒，誰能揣摩出他們當時的心情呢？（……）我看他們最後一眼時，面對死亡，他們的表情依然

木訥呆滯，眼裡沒有淚水，唯有眼角下兩行乾涸淚痕的白道。可眼珠子卻靈活地跟著我們轉，應該說他們用的是一種絕望永恆的目光，送我們走出「大房框子」大門的。

沙秀傑一家人邁上希望之路。她的媽媽、弟弟和妹妹，站起來和行走都是搖搖晃晃的。國道上的人稀稀拉拉的，跟剛來時的密密麻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屍體和棄物滿地，要想插腳，就得相互扶著邁步。媽媽邊邁步邊說：「千萬別跌倒，別踩到『先人』（指屍體）！」

人們都排著隊，排隊應該是站著的，而這個隊伍大部分人是躺著排隊，圍著自家的車子，前面有一點兒挪動，後面的人就跟著爬動幾步。

面對開卡子，人們凝重的臉龐上，反倒看不出一點兒興奮，誰也不說話，呆呆地望著前邊。可是有一句現在聽來非常沉重的談話，當時卻回答的如此輕鬆。

問：「你家撂下幾口？」

答：「三口！你家呢？」

答：「兩口。」

沒有不悅，沒有失禮，都是順溜地脫口而出，可眼睛卻是回望著那段親人倒下的死亡公路上……

我左肩背個大包袱，右胳膊挎著媽媽，她右手拄著一根棍子，後面跟著三妹，她背著一個生鋁鍋，小弟背著一個鐵水壺。艱難地跟著隊伍緩緩前行。

我家是沒有男人，體能也是最差的，是走出「中間地帶」最後的一撥人，所以我有幸看到了滿目瘡痍、餓殍遍地、萬劫不復、人間地獄的洪熙街最後的景象！

生死這時可要分開了。悲雲湧動下的荒郊曠野，有的家人對亡者做了最後也算是最隆重的安葬和祭奠：用被子包裹好，或用被單子蓋上，四邊壓上磚頭，用荒草代替燒紙，在亡者的頭頂上，籠起火焰，這可算是最隆重的葬禮了。而道旁壕溝裡的屍體可就不一樣了，被黑綠水浸泡得體態臃腫，面目變了形，口眼猙獰。道旁裸露的屍體，男女老少全都是一個模樣，高高的額頭下，兩隻眼睛掉進深深的眼窩裡，個個都高鼻癟腮，口唇像兩片風乾的

人的生與死！後面是死神點名的地獄，前面便是天使招手的天堂。

剛走出來不遠，就看見道旁一個用席子搭的棚子，有人圍攏著。小弟喊出聲來：「八路軍給吃的了！快看八路軍給吃的了！」走到跟前兒，看見有三、四位八路軍，地上放著兩個裝滿豆餅塊的大籮筐，每塊足有半斤重。餓扁了肚子的人們雖無力爭搶，但兩眼卻冒著久違的欲光，當領到兩塊豆餅時，馬上就往嘴裡填。

一位八路軍看了看我們一家老小，就多給了兩塊。媽媽讓我們跪下謝恩。我攙著媽媽挎著包袱跪不下，妹妹從小失聰聽不見聲音，倒是小弟機靈，撲通一聲跪下了。（......）當時他跪的是那樣的順溜、痛快，可是卻站不起來了。他的小脖子只有今天的杏仁露飲料罐那樣細，高高的奔兒頭（額頭）下，深深的眼窩裡，兩顆明亮眼珠子在轉動，兩隻細長的胳膊下連著的是個黑大腦袋，肩背著水壺；託著兩塊豆餅的兩隻手也在抖動著。八路軍上前把他抱起來，又給了他兩塊豆餅。我忙上前連聲道謝。小弟回過頭來撲向我，喊了兩聲「二姐」。四塊豆餅，在卡哨上足以救活幾十個人的性命，他就像接到了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一樣，那麼地滿足和興奮！他又笑著撲向媽媽，抖動著兩片臘肉乾似的嘴唇，雖然他動員了全身的肌肉，可是呈現在人面前的還是呲牙裂嘴的笑。這哪裡是個孩子，儼然是個獰面的小骷髏架子。本該是手拿糖果、玩具活蹦亂跳討人嫌的（七、八歲稚嫩的）淘小子，竟被折磨得如此一副人鬼難分的模樣。

沙秀傑一家人剛進共軍統治區，就目睹了難民們被脹死的情形：

（難民們）一見了豆餅，就瘋了似的往嘴裡填，並且一下子吃了很多，加上驕陽似火的天氣，人就要喝水。路邊有井，人們就抱起「柳罐鬥」（從前老井軲轆上井繩拴著用柳條編成的公共水罐）拼命喝涼水。被餓扁了的肚子裡，涼水和豆餅一下子就會脹起來。在道旁上，有人停下腳步，抱著肚子呻吟不止。能折騰下大便的算是幸運的，可折騰不下去的，真就被活活地撐死了。這部分人的死相可沒有「中間地帶」裡死去的人那樣斯文了，他們掙扎著，兩手抱著肚子，叫喊著。餓死的人是胸腔高聳，腹腔塌陷，真是前腔貼後腔，離地皮只有十幾公分高。而脹死的是腹脹如鼓，肚子像個大白泡泡兒。這些歷經磨難的人本來已經抓住了救命的繩索，

乾魚片，包不上的牙齒還相互緊咬著。正趕上天氣酷熱，肥胖的大蛆和綠豆蠅，哪裡能放過他們，屍體上落著一層，亂爬亂拱，進行著盛宴，口眼鼻部位的綠豆蠅都翹起大肚子，頭鑽進有孔的地方，撕咬著，叫人心麻，慘不忍睹。空氣中彌漫著腐屍的腥臭味兒，濃濃的，吸一口都嗆嗓子。

整個國道上，除了有一條很窄的、能走人的、過推車的道兒外，全是東倒西歪的屍體和滿地的棄物：有手推車、被子、鍋碗瓢盆等，亂七八糟，花里胡哨，破敗不堪，一片狼藉……

沙秀傑一家人隨著蠕動的隊伍走走停停，臨近中午才到共軍的哨卡前，現在鐵絲網設置的柵欄門已經打開了。

此時的八路軍都不帶槍支，也不檢查難民，只是立正著站成兩排，目送著慢慢走出的難民。有些體力稍好的，激動地先給八路軍磕頭，再給蒼天磕頭。我記憶很深的是，有對青年男女，把身背的包袱摞起來，男青年站在包袱上，女青年攙扶著他，他向難民喊道：「鄉親們，別著急，慢慢走，我們解放了，前面就是解放區了！共產黨萬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共產黨萬歲！」這個口號。

後來，我從回想中猜測，這兩位青年很可能是黨派入難民堆兒裡的地下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形象，沒有難民那麼襤褸不堪，喊口號的精神也很振奮——「共產黨萬歲！」從敵佔區出來的難民、百姓，只知道八路軍不讓窮人遭罪，解放區人人平等，投奔八路軍就有飯吃，不挨餓，在四八年就喊「共產黨萬歲！」肯定是黨的地下工作者。

（……）這十四天，不！半年多來，我第一次把僵硬愁苦的面容鬆開，費力調動起全臉面的肌肉，嘴角上提地對弟弟、妹妹說：「我們不會再挨餓了！前面就是解放區了！」又笑出聲地喊向媽媽：「我們娘兒四個終於全都活下來了！」媽媽腳下邁著艱難的步子，口裡虔誠地念著「古蘭經」。那種生命回歸的感覺，還沒走出曠野，就立馬感到草木都煥然一新，陽光和煦，空氣清新。再看看周圍的人群，儘管他們體能已消耗殆盡，無力為重獲生命而激動地手舞足蹈，但是，我知道他們心裡都翻騰著兩句「生」的真諦：「我獲救了，我們活過來了！」在這不足千米的洪熙街上，卻滿載著

卻因吃法不當，又不幸地掉下去了！

（⋯⋯）媽媽不允許我們吃生豆餅，（⋯⋯）而是收到了包裡。看到別人一家老小都坐在道邊大口大口地嚼著生豆餅，餓紅了眼的我們，哪能聽進媽媽的話，弟弟、妹妹鬧哭著坐在地上不走。（⋯⋯）媽媽無奈，想了一個辦法：她把豆餅掰成小塊兒，放在水壺裡用水泡軟，找來三塊磚頭，再找些乾草和有人隨地扔的破鞋甚麼的，點著火，把豆餅煮一下，才給我們分著吃。吃的時候，她還不斷地提醒我們要細嚼慢嚥，（⋯⋯）這就是我們進入解放區的第一餐。

1948・9・3

新華社東北前線電：困守長瀋等地敵軍「軍心渙散逃亡日眾，我前線某部月餘收容 1730 餘人」。

上海《糧食日報》自南京專電：「糧食部息：東北長瀋兩市不在配售範圍之內，該部已另籌糧源調劑現存錦州葫蘆島及天津等地之糧正分別加緊空運。據衛總司令電告，以米 13000 包空運長春，麵粉 18 萬袋運瀋陽，分別撥充軍糧民食。」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十二縱 3 日報：長敵糧食困難，經政治攻勢後，部隊已逐漸瓦解。據瞭解，長敵騎一、二旅已全部瓦解，騎一旅從八里堡突圍，被獨八師消滅，有的投誠，逃出 400 餘人，竄至靠山屯西北汪灣一帶。騎二旅曾一度向八里堡突圍，被獨八師擊回潰散，投我 200 餘人。獨七師於 27 日出擊中殲其 200 餘。餘部潰散於機場附近，先後向我投誠 400 餘人。現長敵只三十八師發糧，六十軍發代金，買不到糧，引起六十軍不滿，曾澤生與李鴻大鬧，部隊雙方在中心廣場衝突。」[1]

1948・9・5

在洪熙街卡子裡，梅震一行人的團隊中也出現了死者。他在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稱：「一個叫隅田義子的十二、三歲的女孩兒死了。她剛開始就搖搖晃晃地走不穩，且連話也說不好。最終她成了我們當中的第一個犧牲者。連天的乾旱使滿洲的土地變得像石頭一樣硬，因為沒有掘土的工具，我們沒法使她入土為安。於是我們找了一個灌木叢，拔一些生長茂密的艾蒿蓋上了她的臉。我雖然和她的家人一起送別了她，但之後路過那裡的時候，我卻一點也沒想往那個地方瞧一眼。」

1948・9・6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隨時準備殲滅長春撤退之敵致中央軍委的電文中稱：「長春敵人糧食已極端困難，該敵必隨時等待機會以求突圍，故我們在北寧線作戰過程中，留出大的力量隨時準備自瀋陽西南回頭殲滅長春撤退之敵，瀋陽敵人無論北上策應長春或西來策應錦州，我軍皆準備大量殲滅該敵。但如敵發現我尚有強大力量在瀋長線及其以西，則敵之行動可能謹慎。」[1]

中央社承德電：「塞外正忙秋收，今年收成一般較上年為佳。匪首林彪控制糧食之佈告，早在一個月前，即已貼滿各鄉，匪黨今且開始行動，全面展開搶糧暴行，並嚴禁糧食私買私運。熱省府為確保農民糧食，決在安全地區，設置倉庫，代人民集中保管糧穀，發給執照，准予隨時支取動用，俾免為匪白白掠去。現已組成刈糧隊，分別下鄉工作。」

上海《糧食日報》自南京專電：「報載東北九省三市立監委及國大代表王德傳等五十餘人，自獲尚市長來電後，以長春被圍十五月，陸空阻絕，糧荒嚴重，今年 4 月長春市民已有半數以米糠豆餅混合樹葉草根用以充饑，高粱米每斤賣值達流通券 2400 萬元，且無處購買，青草樹葉亦售至流通券四、五十萬元 1 斤。月前餓斃者每日平均在 500 人以上，且日有增加，尤以兒童犧牲最大，情形最慘。餓斃者屍體最初則已成黑市上之商品，人肉每斤竟賣至流通券 180 萬元。近有數萬市民迫於饑餓，結隊徒步赴瀋求食，竟為奸匪所阻，進退不得，死亡載道，尤屬慘絕人寰。東北早寒，現已深秋，隆冬一到，在零下 40 度之酷寒，軍民雖不餓死，亦必凍死。因感危機迫切，特於日前聯名呈請總統請求集中空運力量，空投食糧。據悉：糧政當局，早決定供應麵粉，惟空運技術太困難，所運麵糧僅能高空拋擲，如低飛遭匪方高射炮猛烈射擊，則粉袋破裂，麵粉四散，現當局正考慮另想辦法。」

日期不詳

到9月上旬，長春大約有1200多個學生和教師離開長春逃命去了。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徐慎決定離開長春。他後來寫道：「之後，到圍城兵團司令部向肖司令員、肖華政委、唐天際政治部主任等領導同志彙報了長春的情況。我說如果我軍再不開放搶救挨餓的市民，在國民黨『殺民養軍』的政策下，市民還要大批的死。兵團領導同志聽完後，確定把情況反映上去，再定。」[1]

張英，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炮兵第四團政治委員，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榴炮九連炮陣地，設在大房身機場北側的高粱地裡，指揮所設在機場的紅樓頂上。長春城內及城郊敵人活動的情況都在我觀察之內。為麻痹敵人，有一段時間，我曾停止炮擊。9月一天早晨8時許，榴炮九連一號觀察所發現距我炮陣地七、八公里處的宋家窪子附近空場上，有一個營的敵人正在會操。榴炮九連指揮所得到報告後，認為是炮擊的大好時機。由於距離較遠，乃採取最大號裝藥，全連集中火力射擊，連續發射四十餘發炮彈。頓時，炮彈在敵群內開花，使敵死傷慘重。黃昏時分，敵動用十多台汽車搶運傷患和屍體。」[2]

中共嚴厲斥責國軍在長春殺民養軍，精心製造了「嚴重饑餓災荒」，在空投解決不了問題時，就大肆在市民中搜刮和搶奪，導致民眾「有死無生」：

> 在長春的小市上，有許多婦女抱著孩子從清晨到黃昏眼淚汪汪地等待著主雇，好容易賣掉一件嶄新襯衫，也換不到1斤高粱米。不少的女人領著孩子出來趕大車。據估計這些女車夫，要占全體車夫的五分之一。

> 由於饑餓自殺事件也是層見迭出，如七馬路一個姓楊的小商人，一家五口人當賣俱光，三個小孩餓得呱呱直哭，夫妻二人商議之下，先把三個孩子勒死，然後夫妻二人懸樑自盡。街頭乞丐多不勝數，皆是蓬發、裸體、骨瘦如柴，餓死者已為常事，異常悲慘。
>
> 由於匪徒們慘無人道的搜刮和搶奪，郊區農民生活也異常貧困，十室九空，不僅糧食顆粒未剩，就連衣服都被搶走。農民吃的是野菜，穿的是襤褸不堪，逼得農民無法過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長春真是一所人間地獄。[3]

在洪熙街卡子裡，梅震一行人的團隊裡又增加了七名中國太太，她們都是早前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女人。卡子裡的兩、三口水井，是他們「唯一的救命水源」。他在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稱：

> 我們三人每次拿一個桶打七分滿的井水，用於全天的飲用和炊事。我們到處搜集看上去能吃的野草，將牠們放進高粱米和大豆的糊糊中增加鹹味。這樣的飯我們每天吃一、二次，到最後連這個也變得很困難。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穿著講究的衣服，拿著精緻的食器，卻根本沒有果腹的糧食。我一看到他們就來氣，但這當中也有人是吃光了糧食才逃出來的，因此也不能一概責備他們不用心準備食物。
>
> 每次看見有將軍在前線的時候，我都會趁機拉住他們，想法設法地去交涉。守衛這裡的八路軍全是韓共士兵，能聽懂我的話。另外，我還會試著問一些偶爾來卡子裡問話的便衣工作人員：「為甚麼不讓我們出去，到底甚麼時候才能放我們出去。」然而他們總不能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們的回答也不能給我們帶來任何希望。即使哭

訴著說我們都快餓死了，他們也會毫不理睬地反駁道：「這裡的所有中國人不也一樣嗎？不能單把你們日本人放出去吧。」有時士兵也會誘詢道：「你們有照相機、望遠鏡或手槍嗎？有的話就放你們出去。」不巧的是，我們當中並沒有人有這些東西，再說即便有這些東西就真的能放我們出去嗎？要放也只是放那個有東西的人，而不是把我們都放出去吧。

有一天，一個時常來卡子裡的八路軍過來問話。我認得他，他原來是中銀俱樂部的服務生。他似乎也認得我，悄悄地跟我說：「我來帶路，你們幾個就能出去。」我有點心動了，但拋下其他人單獨行動的話，作為名義團長的我內心多有不安。於是我拒絕了他的好意，另外在場的幾個人最後也沒有跟他出去。後來他遞給我一個裝著煮小豆的飯盒。

我們一天天地饑餓起來。這裡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絕，別說是八路軍的糧食補給了，連個賣東西的小商小販都沒有。針對這種情況，國民黨政府可能會這麼說：「你們都是自願出去的，這之後的事情就與我們沒甚麼關係了。」另一方面八路軍可能會這麼說：「我們也不能一股腦地讓出城的人全部都通過吧，不知道裡面混雜著些甚麼人呢。既然是戰爭時期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總之兩方面都不管我們的死活。

中國人進入卡子的時候，多少都備了點吃的，但畢竟也是有限的。他們有時會翻越鐵道線去刨那邊的田地，來偷些大豆和小米。這期間不斷有餓死的人出現，他們就像睡著了一樣一動不動，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死的，之後不久，就會被一大幫黑色的蒼蠅給團團圍住。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食物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甚麼也不是。人們將紙幣當作衛生紙使用，剛開始還是用500日元的，後來連使用1000日元、

5000 日元的也很多見了。

這樣過了五、六天以後，先進入卡子的人開始搶奪後來者的糧食。只要發現有人出現在卡子入口處，人們就一擁而上，一邊叫喊著「只要糧食快交出來！」一邊沖向那人的行李。搶奪食物的人和拼死保護食物的人之間的爭搶就像是地獄的場景。後來聽一個在瀋陽經歷過此劫難的日本人說，有的人以為別人用白布包裹著的骨灰盒是食盒，一把搶過來打開蓋子就把裡面的東西往嘴裡塞。我們日本人當然不會去搶東西，但我們也撿拾別人掉下來的大豆，把那麼五、六粒大豆生著就放進嘴裡嚼。這大概就是我出發前聽說的劫匪吧。但因為我們一行人是前面的人走了之後才進來的，因此倖免於此劫難。

這時候，有一個穿著便服的中國男人進來了，他問同行中的那些曾經是中國太太的日本女人願不願意出去為八路軍幹活。其中有幾名婦女跟著他出去了。這些女人之前在長春都過著很奢侈的生活，她們也許根本忍受不了那樣的粗活。但她們也無暇考慮這些，她們甚至沒有考慮過這個男人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此外，這時兩軍之間不斷發生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我們時常能聽到槍聲。有幾名向鐵路那面逃竄的中國人不死即傷，還有一個女人滿身是血地哭著跑回來了。我們同行的人中，一個叫城田井的女人眉間受了傷，因為當晚只允許受傷者出去，她和同行的另一個身體孱弱的中年婦女橫山一起出去了。[4]

1948・9・7

毛澤東決定要在五年內擊敗蔣介石。他為中央軍委起草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中稱：

我們準備5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00個旅左右，5年殲敵500個旅左右，就能達到此項目的。過去2年我軍共殲敵正規軍191個旅，平均每年95個半旅，每月8個旅弱。今後3年要求我軍殲敵正規軍300個旅以上。今年7月至明年6月，我們希望能殲敵正規軍115個旅左右。此數分配於各野戰軍和各兵團。要求華東野戰軍擔負殲滅40個旅左右（他們7月殲滅的7個旅在內），並攻佔濟南和蘇北、豫東、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戰軍擔負殲滅14個旅左右（7月已殲2個旅在內），並攻佔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戰軍擔負殲滅12個旅左右（8月已殲1個半旅在內）。要求華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團殲滅閻錫山14個旅左右（7月已殲8個旅在內），並攻佔太原。要求你們配合羅瑞卿、楊成武兩兵團擔負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軍35個旅左右（7月楊成武已殲1個旅在內），並攻佔北寧、平綏、平承、平保各線除北平、天津、瀋陽三點以外的一切城市。欲達此目的，戰役部署指揮的適當，作戰休息調節的適當，是決定性關鍵。

你們如果能在9、10兩月或再多一點時間內殲滅錦州至唐山一線之敵，並攻克錦州、榆關、唐山諸點，就可以達到殲敵18個旅左右之目的。為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于該線，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瀋援錦之敵。因為錦、榆、唐三點及其附近之敵互相孤立，攻殲取勝比較確實可靠，攻錦打援亦較有希望。如果你們以主力位於新民及其以北地區準備打長、瀋出來之敵，則該敵因受你們威脅太大，可能不敢出來。一方面長、瀋之敵可能不出來，另一方面錦、榆、唐諸點及其附近之敵（18個旅）則因你們去的兵力過小，可能收縮于錦、唐兩點，變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費時費力，這樣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動地位。不如置長、瀋兩敵於不顧，專顧錦、榆、唐一頭為適宜。再則，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個月內，你們要準備進行三次大戰役，每次準備費去2

個月左右時間，共費去6個月左右時間，餘4個月作為休息時間。如果在你們進行錦、榆、唐戰役（第一個大戰役）期間，長、瀋之敵傾巢援錦（因為你們主力不是位於新民而是位於錦州附近，衛立煌才敢於來援），則你們便可以不離開錦、榆、唐線連續大舉殲滅援敵，爭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這是最理想的情況。

於此，你們應當注意：（一）確立攻佔錦、榆、唐三點並全部控制該線的決心。（二）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於同他作戰。（三）為適應上述兩項決心，重新考慮作戰計劃並籌辦全軍軍需（糧食、彈藥、新兵等）和處理俘虜事宜。

天津《民國日報》以「苦難日深的長春」為題，刊登該報特派員笑星自瀋陽航訊：

長春——猶如花園一樣的近代都市，被東北中、韓、蒙、日的聯合匪軍，圍困已有三、四個月了。她的北、東、西三面，是一片的匪區，南方距離收復區最近，也有400餘里，這樣，她如汪洋中的孤島，兀立在四面八方都是匪軍之中。共匪終日不斷的炮擊和小規模的侵犯，使在那孤島中的80萬軍民，無時無刻不在受著戰火的威脅，尤以食糧來源斷絕，使80萬軍民更遭到空前的浩劫！

長春的高粱米，8月中賣到500萬流通券1斤，大家都認為創造米價最高峰，現在市民大多數無力買高粱米吃。只有吃樹葉，吃樹皮，長春最美麗的一條大街中山馬路，兩旁的街樹的葉和皮，都已被吃光。而那光滑的柏油馬路，也讓市民把路皮剝下來當柴火燒了。

一般公務員雖然吃得較好，但也只是把做酒用的酒糟磨成粉末吃。大米白麵不是沒有，那除非是特殊又特殊的人們才可以吃到。金銀財物在長春已失掉牠的貴重性了，當人們在饑餓的時候，1兩黃金也許沒有1斤米值錢，因此很少有人要金銀，最要緊的是食糧。3斤高粱米能換一座洋房，這是人間奇跡，卻在長春出現。

最近雖然開始空投食糧，但是粥少僧多，同時匪用猛烈的高射炮火射擊空投飛機，因此徘徊在13000尺高空往下投，約有十

分之二的空投食糧，因為太高的緣故，而不能投到長春市內去。

犧牲在空投下的民宅和市民，也是時有所聞。雖說食糧投下之後，因為地心吸力的原因，越離地面力量越大，有時不免把民房砸成空洞。有一個市民因為貪看食糧由空下墜的情形，致被食糧把頭都砸到脖腔裡去。

洪熙街是人間地獄

有很多的市民為求生欲的促使，很冒險地逃出了長春，而欲奔往瀋陽，結果都被困在那有名的洪熙街至封鎖線一帶！在這裡，最少曾被圍過20萬難民，一構人間最悲慘的戲劇，每日不斷地出演在那裡。

這個地方是由洪熙街到范家屯，方圓不過二、三十里地的大小。這是真空地帶，匪我雙方在這裡都沒有駐兵，在這以南即是匪的封鎖線，難民逃到這裡以後，往南不讓過，北歸歸不得，雙方的炮火都經常照顧了這個彈丸之地，而「食」的困難，較長春市內更為嚴重。

由長春逃出的難民，最多不過攜帶三日的食糧，在這裡一困就是十天半月，所以都饑餓而死的，每日要有四、五百人。活人睡在死人旁邊，死人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就這樣在腐屍身上便溺。在炎熱的天氣裡，疫癘便狂暴地襲擊起來，因病致死的也很多。

在這裡交易不用錢，而以大豆計算，起初以一把計算，後來以粒做單位。飲水更是困難，土井曬乾，滲出的濁湯，也是珍貴的飲料了。

常遭擊斃

做父母的在這裡因為饑餓困迫，恨不得子女早點死掉，但誰又忍心把親生的兒女殺死呢？只有盼著他們一天一天地熬不過饑餓和疾病，而讓他們自然的消滅！

年輕力壯的小夥子，不甘困死這裡，少有冒險深夜爬過匪軍封鎖線，一旦被匪軍崗哨發覺，一彈即可斃命。

這一、二十萬人，如果讓共匪一次炮火斃了生命也算痛快，但是他們卻不願落個屠殺的惡名而要眼睜睜看著這些人一個一個地倒下去。

秋風起，東北早寒，天氣已涼。長春市民和被圍洪熙街的難

民們的命運，將更不堪設想了。

這是人間的一個悲劇，一個醜劇。我們要請全國人士來重視這一個事實的存在，我們實在不應該讓那些無辜的同胞，受著更無前例的苦難！

在洪熙街卡子裡，梅震一行人的團隊中有一個中年男人也死了。他在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稱：「他是我在國民黨的哨所裡遇見的。剛開始就因為營養失調連路都懶得走。據說他是在通化事件（即1946年2月3日日本關東軍與國軍地下武裝力量糾集數千人向接收通化縣的共產黨政權發動攻擊，暴亂遭到鎮壓，其中3000餘名日軍被殺死。）中倖存的原陸軍大尉，自稱靜村操，我覺得那恐怕是個假名。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覺得他像個流浪者。韓共軍隊的工作人員似乎很想知道他的身份，屢次過來問話。有一次，那個男的獨自一個人吃了韓共人帶來的高粱飯後就一直在睡，不知道甚麼時候就死了。因為他身材高大，我們三、四個人把他抬到了一個空地上，並把他放入了空地上的一個大坑。儘管這個坑裡已經有很多人的屍體了。」[2]

1948・9・8

在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對奪取蔣介石的政權信心滿滿。他在會議開幕時說：「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一兵團8日報：9月5日，敵共空投19200包，帶傘87包，內裝武器、彈藥、電池、電臺，電池每包30塊，共來飛機312架，落我陣地389包。」

日期不詳

劉振坤，國軍第一兵團司令部警衛連長。他在四十年後回憶陣地喊話和槍殺逃跑士兵：

> 一兵團在城外有7個防守據點，紅十字會這個據點是六十一師二團四連防守的。進入9月，解放軍的前沿陣地與四連陣地相距不過100余米。每到夜深人靜時，解放軍便展開政治攻勢，喊道：「蔣軍官兵弟兄們，你們為誰扛起槍，你們為誰來打仗？」「你們是國民黨用繩捆索綁抓來的。你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姐妹日夜都在盼望你們回家團圓呢！」「你們趕快醒悟過來吧，再不要給國民黨賣命了。」
>
> 解放軍有時還宣傳《土地法大綱》，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等。解放軍的喊話宣傳，激起了士兵們的思鄉之情，喚醒了他們的良心，不少人陸陸續續地投奔了解放軍。
>
> 新七軍見狀慌了手腳，急忙組織一個百餘人的宣傳隊，分赴各個防守據點進行反宣傳。他們白天和士兵們一起狂跳亂舞，唱黃色歌曲，晚上則恬不知恥地呼喊甚麼「共產黨共產共妻」、「國民黨抗戰有功」，再不就是敲鑼打鼓，干擾解放軍喊話。妄圖以此阻止守軍進步官兵投向人民解放軍。有天晚上，一個叫李桂林的士兵，聽完解放軍喊話後，因思親情切，歸心似箭，便偷偷地順著解放軍的喊話方向跑去，不料被哨兵發覺，將李桂林抓回，當即就槍斃了。[1]

廖中符，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九師師長，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由於我軍的封鎖，使長春已經成了一座死城。老百姓從市內外逃，開始

我們勸說他們回去向國民黨要吃的，後來設立卡哨，分批放行；國民黨士兵、個別軍官攜槍外逃，我們則沒收其武器教育放行；經審查是敵特嫌疑者，則給以任務令其回去……」[2]

在長春城，空投的糧食都被國軍吞噬。饑餓的市民跟國軍是不可能討來食物的。怎麼辦？吃人肉。

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三十九年後，一名作者悲痛地寫道：「那時，長春還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賣人肉事件：有一個年約30多歲的人，他的妻子餓死了，他也饑餓難忍，便把他妻子的大腿割下煮了，後來又把割下的肉當作豬肉在街上賣掉，得了一筆錢。從此便產生殺人賣肉的惡念，做起賣人肉生意來。白天他把街頭的兒童哄至其家，給以食物，晚間便把兒童打死，翌日賣其肉。先後被他哄騙打死的人共十一名。最後一個較大的兒童，沒被打死逃跑了，報告與警察局，將其逮捕。經審訊後供認不諱，當即處以極刑。當時有佈告張貼街上。」[3]

1948・9・9

9 月 9 日，是抗擊日軍戰爭勝利三周年紀念日。

中華民國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發表廣播講話，申述「剿匪正是八年抗戰延續」，希望全國同胞「全力支持戡亂建國」。

國軍第一兵團司令部司令官鄭洞國和副司令官曾澤生，聯名簽發《關於空投物資接收的訓令》，訓令中稱，接收空投物資已授命空運接收指揮所權辦，各有關部隊機關軍公人員，必須嚴格遵守該所的一切設施並協助辦理，非該所接受人員外，「不得冒假接收及盜搶空投物資」，如有敢故違者，該所可以「執行就地槍決」。[1]

由羅榮桓起草數月來封鎖圍困長春的總結報告，並以林彪、羅榮桓、譚政的名義，將《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發送給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鑒於這份報告對研究長春餓殍戰的文獻和歷史價值，全文如下：

一、長春守敵兩個軍及地方遊雜部隊共約十萬之眾，憑堅固工事及建築物實行困守。

我以十二縱三個師及六個獨立師，採取圍困方針，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攻勢，發動對該敵作戰。從 5 月末開始長春周邊戰，奪取機場後，逼近市郊，6 月 25 日起，正式對長春進行封鎖圍困。

二、兩月來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高粱每斤 3000 萬元（敵東北流通券），且有價無市，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饑，餓斃甚多。

敵軍除新第三十八師、第一八二師等外，均以酒麴（指用糧食做酒剩下的渣子製作的麴，也叫酒糟，通常作牲口的飼料）作主食，每日才 4 兩大豆，遊雜部隊更壞，因營養不良，大豆難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敵雖尚存一部糧食，空投還可接濟，但不敢食用，以準備作戰）。故市內秩序日形紊混，軍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爭取工作，其兩個保安旅及保安團等日呈瓦解狀態，正規部隊亦發生極大動搖。自 6 月 25 日起至 8 月 25 日止，兩個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敵方逃兵及投誠人員已達一萬零四百七十一人

（戰鬥俘獲不在內），其中正規軍占百分之六十八，雜牌軍占百分之三十二，軍官占百分之二點三，帶武器者占百分之十。敵人情緒普遍低落，由個別投誠已轉向整班投誠。鄭洞國在其高級軍官會上說：「鞠躬盡瘁吧！」其士兵則反映：「八路這方法真絕，還不如快打。」

三、圍困情況的初步經驗：

（1）敵對我之圍困，採取強制疏散市民以減輕負擔，並便於掠奪其餘糧。

其辦法為瘋狂提高糧價，搶購市內存糧，逼人民出市。實行糧食管制，檢查發現每人存糧不足三個月者（每人每月應有45斤），即強制趕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饑民及開釋監獄犯人將其押送出來，並對市民進行欺騙說：「七一毛澤東過生日，八路軍放卡子。」或誘以發糧名義，集體趕出，或組織工人學生向我請願，或發動大群難民，向我步哨沖來，使我無法抵制。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線上50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湧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8月初經我部分放出，3天內共收2萬餘，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700萬跌為500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1000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于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2）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

饑民們對我會不滿，怨言特多：「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也有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的。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來的。經糾正後，又發生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難民，甚至開槍射擊（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圍困時間延長，部隊普遍發生急性病，有懷疑我之圍困系力量不足，有認為長圍無用，敵有空運接濟要求快打。

對此主要説明久困長圍意義，並以逃兵講述敵之困難情形，逐漸提高對圍城認識。敵現進行惡毒宣傳，説我欲困死長春人民。我則以放出難民實行救濟之事實，揭穿敵搶糧製造饑餓，以達到趕出市民之陰謀。放出之難民雖對我不滿，但經救濟後，影響較前稍好。

(3) 斷敵糧源，必須發動群眾，軍民一致參加封鎖。

初合圍時，敵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糧食約五、六十石。據傳當時敵軍糧徵收機關每日能購二、三十噸，主要因長春市周邊均系新區，群眾尚未發動，地方工作只注意後方生產，忽視對敵鬥爭，且軍事封鎖不嚴，封鎖線又距城太遠。後來確定不按原縣區界，而根據圍城各師防區劃界，成立軍隊地方統一的對敵鬥爭委員會，以師政委任主任，統一領導封鎖工作，發動群眾配合軍隊站崗，設立盤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並規定以沒收走私糧百分之三十（後為五十）作為獎勵。經嚴密封鎖後，入市糧食大減，但還不能根絕。因市內糧價奇高，布及工業品則較賤，運糧入市，獲利十倍，故有商民專以走私為業者（出來時偷領難民，乘機勒索）。他們在沿途各村設有秘密據點，逐村轉糧，數人數處分帶，如一部被查獲，其餘亦足獲利，並有武裝擊傷群眾崗哨者。我地方機關及圍城部隊人員，亦有不少違犯禁令，藉口打入關係而託買筆買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機發難民財、收購販賣者，也有亂沒收難民金銀白鈔以至我鈔者，以致封鎖不嚴。經檢查教育後始予克服。斷敵糧源另一辦法為統制封鎖區糧食，劃長春市外五十里為封鎖區，禁止糧食交易，此地區早為蔣軍搶劫一空，糧食缺乏，故糧價高於後方集市數倍，如不統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轉入市內。在封鎖區成立生產救災合作社，組織群眾集體到後方買糧。政府所發種子及救濟糧，亦通過合作社，計地計口貸出，糧食以每三、五天發一次，以免走私。長春西地區因救濟糧較少，不能停止後方糧食交易，採取帶領群眾集體購糧，或限制每人購糧不得超過10斤，並保證不准走私。六、七月間瓜菜未熟執行中尚無問題，8月間即發現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濟糧以走私營利者。敵人方面則鼓動運糧進市，敵曾槍斃敲詐運糧商人之士兵，併發採購通行證予以便利。現仍繼續高價搶購。除新三十八師外，其他部隊8月初即發糧代金，金額雖逐增，但均不足1斤高粱之價，此即鼓勵部隊自行夜掠人民存糧及從市外購糧。以致市民饑餓日趨嚴

重，有冒險搶敵糧車，不顧死刑危險分搶空投糧食者。市面統治秩序已日漸混亂。

(4) 在圍困中，我發動部隊進行對敵攻勢並派出幾個敵工站，在城垣附近積極發展內線工作，有很多便利條件，利於開展政治攻勢，這是兩個月來瓦解敵軍收效較大的原因。

敵士兵生活很苦，近來情形更壞，且封鎖日久不見援兵，感覺前途暗淡。新七軍與滇軍第六十軍有矛盾。東北暫編師與蔣系矛盾更大，故滇軍及東北籍之軍官，有不少與我接近拉關係，送情報掩護我方人員入城，故內線關係較易建立，情報亦較靈通。但發動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幾股土匪武裝及暫第五十六師一部 90 餘人有組織的投誠反正外，其餘均系個別人或小股逃來（8月起，整班投誠者增多）。因市內缺乏黨的組織，且敵人管制甚嚴。自王家善師〔指1948年2月25日在營口起義的國軍暫編第五十八師〕反正後，幾個東北師的師團幹部多被撤換，改以蔣系軍官充任。但其所屬兩個保安旅已呈瓦解狀態，最近有兩大股突圍企圖逃竄，轉至我後方擾亂，已被我大部殲滅。我對敵宣傳，是以陣地喊話（尤以用敵逃兵喊話收效大），通過群眾傳話，散發宣傳品，送回敵傷兵及以宣傳彈（製造與炮彈相仿，如同飛機散發傳單一樣）發射宣傳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傳木船，通過內線關係在市內設秘密宣傳站翻印宣傳品等。但以宣傳彈效力大、射得遠、散得寬，使敵來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敵兵對我傳單尤其通行證極重視，有出高價託人來買，逃來者有帶我方傳單以表示接受我宣傳，並作為出城之護照，居民藏我傳單謂打開城可持此領糧。敵對逃兵則施行鎮壓，實行士兵三至五人連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帶槍者捉回槍殺活埋，政治上進行欺騙宣傳，謂臺灣新兵中秋節時增來東北，9 月瀋北會戰，長春即將解圍等等。但此項仍不能挽回其日趨渙散之軍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發生偏向。有的自行規定，不帶槍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屬不好處理，故將家屬拒回。又因清查難民之假裝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帶符號不會唱蔣黨歌，不會走正步，不知其官長姓名者都不收。這使敵兵發生顧慮，發現後已予糾正。收容的逃兵現已集中解放團訓練，準備經過訓練清洗後，爭取補入部隊。投誠的幾股土匪武裝，因成分很壞已一律繳槍，準備大部遣送回原籍生產，少數罪大惡極的頭目，送地方政府依法處理，因長春這類武裝尚多，為了不影響爭取，故對他們暫時

仍予優待。

(5) 發動生產，救濟封鎖區群眾，是發動群眾圍城熱情的重要工作。

因市郊糧食去冬即為蔣軍搶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喂馬，今春市東一個區餓死40人，圍城開始時土地大部荒蕪，有種後又荒蕪者。為了避免荒蕪，長春東南地區由吉林貸糧1000噸，錢5萬萬元，1000噸蕎麥種，由部隊抽人力牲口，並發動後方一些人馬助耕搶種搶鋤，業已大部種上。現周邊5萬垧地將開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約可收四石，現正佈置搶收。對哨卡外難民之救濟，分別由吉遼兩省在長春市東西地區組織處理委員會，下設辦事處、事務所、檢查站。派人將饑餓嚴重者介紹出來，儘量資助回原籍或投親友，無家可歸者送附近各縣安置，發動社會救濟組織生產，並在難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學生入伍。

(6) 圍城部隊在長期間內，已逐漸形成規律化之陣地生活。

初圍時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體等需要構築和加固，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時日夜不休，非常疲勞，加以天雨運不到糧食，有的吃三天稀飯，又發生傳染病（痢疾），某些新組成的獨立師在初圍城時怕敵炮火、飛機，發生逃亡、自傷或亂打槍者，數次發生誤會，造成恐慌情緒，後經動員並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陣地守備發動養豬種菜（每師已種百畝以上）、割草（解決燒柴喂馬），現生活已獲得改善，並節約了大批糧食救濟災民，目前情緒很高，不願換防，但亦不願守陣地，要求快打，同時也發生麻痹現象，在陣地上主要進行軍事練兵，政治教育不夠，違犯政策紀律現象時有發生，其事實已如上述。

(7) 圍城鬥爭極為複雜，絕非僅為軍事鬥爭，必須黨政軍民一致動員，故要強調一元化領導。

長春敵亦宣傳所謂「總體戰」，我之圍城中曾發生配合不好，政策貫徹以及組織不一致。如長西地區未按軍隊防區成立對敵鬥爭委員會，在長南地區長農縣曾一度發生疆界爭執，對收逃兵、放難民、處理走私、處理難民財貨、禁止貿易、停止後方糧市等政策發生不一致現象，使工作受到損失，這是圍城鬥爭中必須注意的一條經驗。

在洪熙街卡子裡，梅震一行人的團隊裡有一個男孩子死了。他在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稱：「淩晨，我聽見旁邊小池英三的孩子正十一直氣喘吁吁的。我問他母親：『他怎麼啦？』他母親說：『從剛才開始就不大對勁。』最後，我們僅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孩子在天亮前嚥氣了。我們想找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把孩子埋了，他母親不願意跟著一起走。我抱著孩子，找了一個房子背後的窪地把孩子放下了，還找了一些草蓋住他的身體。因為這孩子從進入卡子以來就和我很親，我也很憐愛他。」[3]

日期不詳

中共對長春難民的處理方式因何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軍事作家劉統根據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所存的一份軍事文件——共軍地下情報員楊濱寫給東北野戰軍總部的一份機密報告——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份報告似乎令林彪認識到了餓殍問題的嚴重性。劉統在其著作《東北解放戰爭紀實》中寫道：

> 被國民黨趕出來，滯留在敵人哨卡與我軍封鎖線之間的「真空地帶」的長春百姓，是關係到我黨的群眾政策的大事。當時有的部隊掌握政策出了偏差，規定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造成了許多混亂和麻煩。在長春周邊負責對敵工作的楊濱同志發現了這些問題，在九台給上級領導寫了一個詳細的情況反映。
>
> 楊濱的報告反映說：這種做法是極不符合我黨政策的，會造成極壞的政治影響。因為「城市貧民，國民黨對付他的政策是：要長春不要人民，把許多貧民都趕到卡哨外面。他們對這些窮苦老百姓說：『共產黨是為你們窮人的，你們快出去找共產黨吧。』把不夠三個月糧的人，都儘量想法攆出來。一種是強迫，一種是用各種各樣的欺騙宣傳。如：七一是共產黨的生日，我們的崗哨開放三天，便騙出幾萬人來；八一是毛主席生日，大赦三天，又騙出好幾萬人來。出卡哨時就把身份證收回，然後一個也不讓回去。」
>
> 楊濱繼續寫道：「這些老百姓到我們卡哨，同樣不讓進來。因此數萬難民便被阻在敵我卡哨的真空地帶活活地受餓受凍，已經餓死了不少。」「假如還要這樣圍困下去，長春基本群眾可能全部餓死。留下來的，就只是過去有些存糧的中等以上的地主資本家。等我們去長春去救濟著的，都會是一些地主資本家。然而這些人雖然得了我們救濟，還是仇恨著我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不是從仁慈觀點出發，而是今天我們要不要老百姓的問題。國民黨反動派不要老百姓，堅決把窮苦老百姓趕出卡哨外邊來。而我們也堅決不要他們進來，

讓他們在兩卡哨的中間餓死，我們覺得這是值得考慮的。」

楊濱指出：「圍困長春堅決不讓一個老百姓進來，其目的，我們認為：1）造成整個長春的混亂、恐懼，使敵人增加困難；2）使長市的老百姓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大家鬧起來，進行暴動等。但是敵人採取了主動，把城裡遭受這饑餓的貧民一概趕出卡哨來，所以事實上沒有增加敵人多少困難。相反的，敵人採取了高物價政策，把糧食價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糧，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離開長市。其次是市民鬧起來或暴動起來的問題，長市敵武裝約 10 萬人，而市民全部約共 50 萬人（現在已不足此數），其中一半是婦女，還有極大一部分是老弱殘廢。就是説長市青壯年總數也不過是 10 萬人。因此，要靠這些沒有槍桿的人起來與拿著槍桿的 10 萬武裝部隊進行鬥爭，是不可能的，這僅是一種想像。」

「假如今天把敵人已經攆出來的難民收容起來，可能會起甚麼影響呢？我們認為對敵人的困難並未減低，因為他們根本就是在敵人的卡哨外面。而對我們則是一個負擔，但進長春後這些人仍然是要我們負擔的。相反的，我們認為，今天大量讓老百姓、真正的難民過來，對敵人的瓦解作用會更大。出來就是一條生路，人心向我。每個人都往我解放區逃跑，不願拿著槍桿在那裡等著挨餓、挨打或當俘虜。所以我們的具體意見是：1）應該把真正的難民適當收容救濟，進入我解放區；劃定一定的難民區，有計劃地收容；2）規定所有攜帶武器及軍用物資者（軍人例外），一律不得作為進入我區的條件，而是規定獎金。」

楊濱同志的報告受到領導的重視，很快由圍城指揮部送到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手中，周桓轉給譚政主任，譚認為這個報告事關重大，又呈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審閱。林羅剛剛就此問題給毛澤東寫了報告，看到楊濱報告中反映的嚴重情況，決定不等毛澤東答覆，立即採納楊濱提出的建議。

1948・9・10

軍聞社滬社瀋陽電：「長春周邊匪日來加強對長郊之補給運輸，並積極構築交通壕，冀圖向我陣地邊緣接近。」

在洪熙街卡子裡，今日是梅震一行人的團隊進入卡子的第十天。

他們「迫切期待是今天能出去還是明天能出去」。

梅震每天都這樣自我鞭策：「在這裡不能灰心喪氣，卡子的門也許甚麼時候就打開了呢。」

1948・9・11

中央社長春電：「我軍民艱苦防禦長春，將及四月，由於空投補給之步入定時定量及各線防禦工事之完成，顯示軍民堅忍四月之心酸。（……）此間枯草落地，已報秋深，寒霜催人，準備迎接冬臨。」

該社另一長春電：「自此間各報之『讀者投書』信中得悉，在長軍人及公務員之關內眷屬，深盼贍家匯款以維生計，蓋甚多軍政人員，近日多接獲催匯生活費之家族信函。記者今分訪長春國行各負責人，據稱自『八一九』奉總行電令停辦內匯後，迄未開放。而實際上，即7月中旬以後在各該行所匯款項亦多半積壓電信局，估計約有5000餘份尚未拍出。聞長春各軍政機關擬聯名電請中樞開放一部分公務員贍家匯款，俾解除彼等在關內眷屬之窘困。」

東北軍區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林彪、副政治委員羅榮桓、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高崗、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在《關於長春難民出城的處置》的電文上聯合署名，致肖勁光、肖華、陳光、唐天際、解方並告十二縱、吉林、遼北報軍委。電文全文如下：

>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春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出來者，一律准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依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儘早的開放，做到於十天內放完。
>
> 對出城之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及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宣傳慰問，對老弱走路無力者，幫助人力及馬車的輸送。第一步應就附近各縣分批疏散安置，發動群眾救濟，使其出城後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以挽回影響，取得民心。
>
> 混在難民中的特務，應予以清查扣留；敵方官兵則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團訓練。中學二年以上學生、技術人員、專家等應努力爭取來我區服務。
>
> 以上開放難民出城，不是對長春敵人解圍，圍困敵人的工作，仍需繼續，不得鬆懈。關於防止敵人利用秋收出城搶糧，及組織軍民搶割搶收等，即照兵團指揮部的計劃加緊進行，將執行情況望隨時電告。[1]

將困在空白地帶的難民分批放出，在《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中這樣寫道：「這是我軍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為了進一步瓦解敵人而採取的一項重要行動。長春前線的圍城指揮所立即遵照東總的指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饑民全部放出並給予安置。為了保證出城的饑民都能得到安置，這種放行未敢無限制地敞開，而是每個哨卡一天放出 2000 人左右，將其安置在臨時趕建的幾十個收容所中。為了防止饑民在饑餓衰弱的情況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腸胃出毛病，收容所頭兩天先給饑民吃稀飯，以後逐漸改吃正常食物。這項工作是以流水作業的方法進行的，收容所中的饑民送到可以生活的農村去之後，又接納下一批饑民，一直到長春解放為止。」[2]

在洪熙街卡子裡，今日是梅震一行人的團隊困守卡子的第十一天，也是他們出卡子的日子。他們終於等來了好消息。

早上，韓共突然通告，僅有技術人員可以出去，要把技術人員的名字都寫出來。梅震在他十年後出版的私家備忘錄中稱：「場內立刻就緊張起來，僅有技術人員可以出去的話，或許會被八路軍徵用。但是現在處於生死之境，也顧不上考慮這些事，急急忙忙作了名單，僅有女人、孩子的家庭以及各種技術者人員的家庭全都寫上去了，提出了希望全員出去。然而就要出發了，一行人的半數已經跨過了警戒線的時候，有一位準備出去的中國人說，走得稍微晚的單身女人和丈夫不在的家庭不是技術人員的家人。這就給出去的人帶來麻煩，被軍隊攔截回來了。（……）我雖然名義上是團長，但留在後面的都是女人和孩子，想再留下來一會兒，但是被後面陸陸續續湧來的人潮推著，被緊催著快點出去，出於無奈只好和他們分開。」

梅震一行人出了卡子，然後清點人數，發現出來的僅有技術人員與他們的家族共十九人。在之後的逃難中，梅震一行人還要飽嘗艱辛。他們要在 1949 年 9 月才能抵達他們的祖國——日本。[3]

日期不詳

人在不停地餓死，貨幣在不停地膨脹。

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年後，三名作者寫道：「9月下旬，又開始發行6000元一張的大額本票。（……）緊接著，又發行1.2億元一張的特大本票。」[1]

9月的一天，在長春城街頭，一件靠殺人來販賣人肉的慘事被發現：

> 長春第五醫院的軍醫與一個賣肉的發生爭吵，正趕上督察處處長張國卿到此巡察，並上前詢問。軍醫對張說：「我在買肉，這個賣肉的説是狗肉，但我肯定這不是狗肉，究竟是甚麼肉，賣肉的不肯實言。」
>
> 於是，把賣肉的帶到督察處。在督察處的棍棒、皮鞭下，賣肉的供認：「我叫王萬富，山東人，木匠。因沒有吃的，我每日去市場哄騙孩子，説給他們吃的，把他們領回家，用斧子將他們砍死，骨頭扔掉，肉煮出來賣。每個孩子只能有三、四斤肉，大部分都是水，賣肉的錢，我再買糧。」嗣後，警備司令部將王萬富梟首示眾。[2]

1948・9・12

東北野戰軍決定南下奪取錦州。錦州是東北與華北的咽喉要道，是東北國軍堅固設防的重要城市。拿下錦州，即切斷國軍通向關內的道路。

共軍在極為保密的狀態下向錦州方向進行運動。「1948 年 9 月 12 日，一縱、二縱 5 師、六縱 17 師和炮縱部隊，在四平、梅河口等車站秘密登車，向遼西開去。運送部隊的列車全用棚車，開車前車門加鎖，貼上封條。列車運行時看不到部隊人影，聽不到說話聲音，就連鐵路員工也不知道運的是甚麼。在 9 天之內，共運送 64 次軍列，將 10 萬大軍安全、迅速、秘密地運到西阜新，創造了解放戰爭中的一大奇跡。當義縣戰鬥打響，拉開了遼瀋戰役的序幕時，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機關居然一無所知，奇怪這麼多的『共軍』是從哪裡來的。」[1]

遼瀋戰役從 9 月 12 日開始，至 11 月 2 日結束，共軍稱以 6.9 萬人的代價消滅和收編了國軍 47.2 萬人。

中華民國政府長春分行給中央銀行的第 2957 號電文稱：「長市現有市民僅 13 萬人，因饑餓驚慌而冒險外逃者與日俱增。」[2]

1948・9・13

福建《中央日報》稱:「據社會部消息: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公開叛亂,所至之處,鬥爭清算,焚殺擄掠,其盜匪行為早為舉世所知。華北、東北等二十餘省市,蹂躪殆遍,受害最深人民,流離轉徙,情形至慘,(……)截至本年6月底止,據各省市政府及社會處局報告總計匪災及水災難民人數,約為5500萬人,除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貴州等省水災,被災難民1000餘萬人外,遭受匪禍而流亡之難民,約計4355.1萬人。」

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圍城部隊調整對長春國軍的宣傳攻勢。在召開的敵工會議上,司令員肖勁光指出,下一步的工作要注意做國軍上層的工作,組織戰場起義,從敵人內部來瓦解敵人。肖勁光在其回憶錄裡寫道:「為加強策動六十軍起義,東北局委派1946年5月海城起義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為第一兵團副參謀長,同時派共產黨長期做滇軍工作的劉浩、楊濱主持東北軍區聯絡部前方辦事處的工作。潘朔端利用各種關係給長春城內的上層軍官寫信。劉浩化妝後秘密潛進長春城內做蔣軍上層工作。在六十軍臥底的共產黨也不斷地做瓦解工作。在此之前,他們還將被俘虜的蔣軍一八四師團長張秉昌、李崢先等人有計劃地派回長春城內做工作。」[1]

在長春市西三道街和大經路交叉路口東南側的中國銀行第三宿舍區大院,居住著幾十戶平民人家。 時年17歲的李謙,正在自強中學讀書。他的家裡有六口人:父親、四個弟弟和妹妹。他的父親與一個朋友合夥開了一個只有一台磨高粱米機器的小型制米廠。當長春城被圍困後,出城採購高粱的途徑切斷了,制米廠僅存的一點高粱米遭到政府當局強征走了。

到6月時,僅有的黃豆吃盡了,一家人開始吃高粱米糠和野菜度日。因為教師缺糧,學校從此放假了。李謙和16歲的弟弟經常到中山公園裡挖野菜和揀樹枝。「我們見到在中山公園的亭子上掛著死人;在路上和湖邊也躺著三、五個死人。但是,沒有人圍觀,也沒有人營救,」李謙在六十一年後寫的備忘錄中稱,「因為他們的身體都是浮腫黑亮的,臭味很大,也沒有人敢接近。」

在 9 月時，李謙家連高粱米糠也吃光了。此時，他的家人已經聽說出卡難民在城外受阻，許多人都餓死了。但是，沒有食物吃，再耗下去也只能活活餓死。他的父親決定帶領全家人冒險出城，返回河北省昌黎縣的老家。

今天早晨，李謙一家人，還有叔伯嫂子郝淑賢，一起上路。他的叔伯大哥因為逃避服兵役已先返回老家了，郝淑賢隨同他們一起逃難尋夫。他的父親推著手推架子車，往洪熙街走去。在國軍哨卡檢查時，一個士兵把他們的一罐鹹菜和一個理髮推子沒收了。

當走出卡哨不足一百米時，李謙看到有幾十個人嗷嗷地喊叫著，朝他們跑來，有的手裡還拿著小紅旗。他們不知道這群人要幹甚麼。

> 他們走近了，才知道是先來的難友們來「迎接」我們來了。他們的目的就是找吃的。他們很有經驗，知道車子底下會藏有吃的東西，所以，首先把我們的架子車掀翻，然後再搶吃的東西，我們在車子底下也的確藏有一小袋炒黃豆和一些鹹菜，都被搶光了。把弟弟、妹妹們也都嚇哭了。我估計這些難友在這裡「蹲卡子」已有些時日了。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才這樣幹的。可是，國民黨軍隊卻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竟然朝人群（當然也包括我們家七口）開了一槍，槍響過後，我親眼看到一位男難友單腿跳著離開了人群，向南面水井方向跳去。至今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
> 我們被搶光了，大家也都成為平等的難友了。難友們告訴我們：共產黨的確是不放人，而且民主聯軍守邊的戰士都是朝鮮族人，不講漢語，沒有方法溝通；國民黨也不讓回城。同時，他們也告訴我們，他們已經「蹲卡子」好長時間了。可是，甚麼時候能放人，他們也說不清。就這樣，我們就參加了「蹲卡子」的難民大軍。
>
> （……）「卡子」的東、西方向是雙方對峙的軍隊，（……）「卡子」的面積大概有一個足球場大，四週都是鐵絲網。南面有一個高臺，高臺似乎是馬路（可能是洪熙街的西端），高臺下面有一口水井；北面是一片高粱地。在高粱地的東面還有一條壕溝，估計是國民黨軍隊挖的護城溝。
>
> 在「卡子」裡面躺著許許多多死去的難友，他們的身軀都是又黑又胖的，可能是衣服被膨脹的身軀撐破了，所以，看來他們

都是光著上身的。初到時，還能聞到一股臭味，但是，很快就適應了。

因為活著的和死去的難友很多，地方有限，又不敢（也不能）移動死去的難友，所以，只好混居。我們是新來乍到的，「好住」的地方自然輪不到我們，所以，我們的地鋪只能鋪在離死去的難友更近的地方，也就是一、兩米的距離吧。但是，並沒有感到害怕，如今回想起來，也沒有後怕的感覺。也說不清這是為甚麼。雖然由城裡帶來的吃的東西被難友們分吃了，但是，在我的腰上還圍了一圈炒熟的大豆，蒙難友照顧，沒有搜我的身，得以保存下來。安定下來以後，都是難友了，即使他們再發現，也不會再採取甚麼行動了。何況，高粱地就在眼前，吃是不愁的了。

可是，喝水卻成了問題。本來南面那口水井是有水的，但是，因為難友們互相爭搶的結果，有人動了氣，往井裡扔了一些大塊石頭。在井上可以看到水，但是，井水的深度有限，「尉得羅」（小鐵水桶）卻打不上水來。只好由我和我嫂子兩人輪流到靠近國民黨兵的那個水溝中去打水，因為怕國民黨軍隊發現，都是天濛濛黑的時候偷偷下溝打水。但是，國民黨軍隊的子彈總是在頭上飛過，所以，我們都是爬著行進的。[2]

1948・9・14

林彪、羅榮桓等《關於防長春之敵突圍及保衛秋收》致各縱各師電：

> 我軍主力已南下作戰，準備在北寧線先殲滅分散之敵，展開勝利的攻勢。因此，長春敵人可能乘機出擊，企圖打退我軍，且秋收已到，亦想拼命出來搶糧，將城外人民糧食運入市內，以求活命。並在瀋陽敵人北上策應情況下，還可能突圍逃走。這種情形就給我圍城部隊殲滅敵人以良好機會，我圍城部隊必須抓住這種機會取得勝利。你們應以堅持積極持久作戰的決心，繼續圍困敵人，保衛秋收，使群眾快要到手的糧食不讓敵人搶去，使饑餓疲困的敵人得不到新的糧食供應，只要新的糧食不流入市內，我們就有可能繼續以大力開展政治攻勢爭取瓦解敵軍。
>
> 如敵人出擊，則放手打擊爭取部分殲滅之。在敵人突圍時，則以不顧疲勞與困難的精神於長短距離的運動作戰中爭取全部殲滅之，並由此佔領長春。
>
> 目前長春市敵軍已面臨絕境，欲逃無路，繼續掙扎，困難更多。經我封鎖圍困後，市內存糧已大部用盡，現在僅賴空投接濟。但空投畢竟是有限的（空投數有限，且受氣候限制不能常飛），加之冬季快到，饑餓之外又加寒冷威脅，其處境將愈來愈壞，其希望亦愈來愈微，軍心將繼續渙散，戰力將繼續消失，最後其士氣必致全部瓦解，而且現在已有瓦解的徵象（圍城 70 天的統計，敵軍投誠及逃來我軍者，已達 12600 人，其比率數日趨上升，這是敵軍士氣瓦解的徵象）。如此饑餓凍餒，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敵軍是決難繼續持久的。所有這些，都說明敵人的困守全無出路，陷於絕境。而在不久的將來必被我軍消滅。[1]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14 日林彪、羅榮桓、譚政、劉亞樓給各縱各師各軍區的指示：我軍在北寧線已於 12 日打響，切斷義縣敵之退路，並完全消滅昌黎灤縣沿線之敵，控制該段鐵路，各部應即在部隊放手動員殲滅北寧全線敵人，並殲瀋陽長春錦州增援敵人與乘長春敵逃跑時消滅之。在長春

敵未跑時，繼續圍困瓦解，過去收容 16000 人，兩個月後爭取瓦解 24000 人。如敵不退，準備待敵削弱到更大程度時，再以主力回頭消滅該處之敵。」[2]

在長春城內，遍地餓殍。腐爛的氣息籠罩了每一個還能呼吸的活著的人。而在國共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屍臭則飄出數十里。

《東北日報》刊登長春民謠：

長春民謠 —— 長春蔣匪軍「十好」

長春蔣匪第一好，百姓餓死不老少，
因為糧食搶光了。
長春蔣匪第二好，老頭幹活小夥跑，
因為壯丁受不了。
長春蔣匪第三好，拆的房子真不少，
因為修工事的木頭沒有了。
長春蔣匪第四好，拿著飯碗滿街跑，
因為軍糧少又少。
長春蔣匪第五好，脫了棉鞋就光腳，
因為軍需不夠了。
長春蔣匪第六好，夏天景致變冬景，
因為喂馬沒有草。
長春蔣匪第七好，指揮部一天跑兩跑，
因為大炮轟怕了。
長春蔣匪第八好，運輸機也來不了，
因為解放軍打高射炮。
長春蔣匪第九好，裝在罐裡跑不了，
因為解放軍包住了。
長春蔣匪第十好，士兵就盼打仗好，
戰場繳槍就解放了。

在洪熙街卡子裡，李謙一家人在「蹲卡子」。李謙的嫂子郝淑賢去靠近國軍卡哨的水溝去打水，但是一直不見她回來。李謙在天黑後去找她。李謙在備忘錄中稱：「在爬行的過程中，只要碰到躺在地上的似人的黑影，我就爬近他們，並輕輕地喊『嫂子』。但是，沒有一個人回應，更沒有求救的。估計這些人都是被國民黨的士兵誤認為是解放軍摸卡子而開槍殺害的。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體力不支，沒有能力爬回來的。還可能是他們死在卡子裡後，由他們的家屬或難友把他們拖到那裡進行『天葬』的。」[3]

1948・9・15

天津《益世報》自南京專電稱，受各戰區炮火影響，流亡的學生「全國至少 8 萬人」。

《吉林日報》以「長春知識青年大批投奔解放區」為題，刊登署名為魏玉珊的消息稱：「長春在國民黨的殘酷的統治和摧殘之下，已變成饑餓的一座死城。人民已無生路，成群結隊地跑出人間地獄——長春，而來到解放區。在這裡邊有很多的知識份子，包括大、中、小學生和中、小學教員以及大學教授。民主政府為了照顧知識份子起見，在省教育廳的領導下，吉市特設立一個國民黨統治區來吉學生收容所，撥了一批經費，並派專人負責接待，截至本月 11 日止僅僅 10 天，據初步的統計，已收容學生 900 餘名。」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

> 十二縱報：15 日起開始放朱家崖難民，每天放 5000，10 天放 5 萬人。如果每天 2 萬要 25 天，預定 18 天放完。14 日晚放出 3000 餘，查出輕機槍 1 挺。
>
>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 19 時給一兵團電示：在敵人對整個企圖尚未判明前，我長春圍城部署暫勿變更，以使敵不過早判斷我正式攻北寧線企圖，待敵判明後再動。

在洪熙街卡子裡，李謙一家人仍在為嫂子郝淑賢打水沒回來而焦急不已。李謙在淩晨時去找嫂子，「最終還是沒有回應」。[1]

日期不詳

為了確保奪取錦州，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主力六縱、十二縱南調通江口、開源一線集結。圍困長春部隊獨立第六、七、八、九、十和十一師根據總部指示繼續壓縮部署，奪取國軍周邊據點，牽制和迷惑敵人，以配合北寧線的戰鬥。

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瀋陽軍區在其出版的書籍中寫道：「9月，東北『剿總』聲稱『機油兩缺』，由應付性的數日一次空投，到完全停止空運給養。（......）第六十軍由過去的每天1斤糧，減到5兩、4兩，最後連2兩糧也難以分到了。絕大多數官兵饑不擇食，只得挖野菜喝稀粥過活。至於保安旅、騎兵旅等地方部隊，好在他們吃『活食』習慣了，則劃定一個地區，由他們去搶到甚麼就吃甚麼。一些部隊買不到蔬菜，就去搶、去偷，有的單位每班經常派一個人去偷菜。在街上，經常可以看到這種褲腿裡、襯衣裡裝得鼓鼓的『專職』偷菜士兵。由於饑餓，很多士兵面部浮腫，染上了夜盲症。」[1]

陳運剛，國軍第一兵團政工處第二課中校代理課長。他在四十年後回憶長春城內饑餓的慘況：

> 我到各區去講課，看見到處是死屍。除了幾條通衢大街外，一般僻街小巷冷胡同，公園空地，屍體橫陳豎臥，根本無人掩埋；全家死在屋裡的，數量還大得多。幸好北國冬早，中秋後氣溫常在零度以下，不然臭氣熏天，瘟疫流行，就更慘了。在「掘鼠羅雀以為食」都不可得的情況下，為了活命，有的人竟煮人肉來吃；我曾收到過十多次這樣的報告。更有甚者，告發有把人肉絞成肉泥來炸丸子充驢、馬肉賣錢的，經兵團司令部查實，捕殺了幾個，也未能制止。市政府社會科原設有

兩個兒童保育院收容孤兒，到這時，父母或親人死了的兒童，流浪街頭，成群成夥，無家可歸，到處撿抓東西吃，蓬頭垢面，成百上千。保育院已無處可容。收來的孤兒一天也供不上兩頓麵麵糊糊。街頭巷尾，屋簷下，經常有餓死的人：看見這人間慘劇，除灑幾行傷心的同情淚外，又有甚麼辦法呢？[2]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 412 號「新京製藥」廠，一切看上去都是可怕的。遠藤譽覺得她的父親大久保與其說像一個木乃伊，倒不如說是活骷髏穿著衣服，在衣服裡，好像只有心臟還在跳動。

大久保在等待「莫逆之交」林楓帶領軍隊進入長春城來解救自己一家人以及藥廠職員。林楓在 1946 年擔任中共長春市市委書記，大久保和林楓曾經互相提供過幫助，兩人成為要好的朋友。林楓在撤離長春時曾經告訴過大久保，共軍一定還會殺回來的。他說：「請你等著吧！」但是，此時的林楓根本沒有參與圍困，而是在哈爾濱擔任中共馬克思列寧學院東北分院院長職務，每天忙著給中共幹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沒有任何公開的文字顯示，林楓還記著被圍困在長春城裡的朋友大久保。

在這一年裡，父親頭髮全變白，垂到肩膀，長長的鬍鬚，每次開口時在胸前搖晃。在白眉毛下，只有眼睛放著奇光，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陰氣逼人的神怪的幻影。

在此之前，即今年年初，大久保拿到吉林省頒發的關於吉福德祿的發明專利證明書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決定強制留用他，並欲遷到南京建造藥廠。當長春市長前往南京對建廠進行可行性調查時，長春的局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共軍的勢力越來越咄咄逼人。

這讓長春市長歸期無望。當長春市長終於歸來後，大久保前去拜見，請求解除強制留用。

> 「你真是大久保先生嗎？」據說市長看到變得面目全非的父親，最初還懷疑是否為本人。
>
> 知道確實是父親時，市長說：「為甚麼搞得這樣你還忍耐呢？……」
>
> 市長對未能踐約表示了道歉之意，臨別前又給了些錢，還有大米、高粱、大豆，另外還給了裡頭裝有胡桃仁、松子仁的軍用攜帶食品。這是意外的收穫。
>
> 父親用這錢買了一輛大車，把剩下的錢和糧食都平等地分給大家。白耗子得知父親還有這樣的利用價值時，一下子又改變了態度，對母親也叔母長、叔母短地奉承起來。

有人建議大久保不要放棄工廠逃離長春，理由是有這些錢和糧食，留下來可以等待共軍打進長春。大久保說：「不，不要那樣啦。那是市長知道我要逃出長春，做為臨別禮物送給我的。如果那樣做，那就等於騙人了。他認為是永別的。我不想違背人家人情啊。還有，八路軍到底甚麼時候進城，我也不知道。如果時間拖長了怎麼辦？所以不如用這些錢和糧食，恢復體力，再有全力的時候，逃出長春，看起來是有把握的。另外，敲詐勒索的人常來，如果我們仍舊待不下去，那就不知道會遭甚麼罪啦！」[3]

在開放卡哨放出難民時，共軍制定了一些具體政策。對於難民帶出槍械的規定是：「一挺輕機槍可帶出七人，步槍可帶出三人，手槍可帶出二人。」

但是，據共軍二二部檢查站分析，「帶槍出來的人，實際多是有錢人和地主。」而對於那些貧苦潦倒的難民們來說，「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饑餓和死亡」。[4]

王景春，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九師第二團第三營九連文化教員，他在四十年後寫道：「9月下旬，有一戶老百姓從我連檢查站出來，他說：『我們傾家蕩產地花了幾十個億本票買了點酒菜，把一個軍官請來喝酒，把他灌醉了搞了這個玩意，（一支手槍，順手遞給我檢查站人員）全家來投奔你們的，希望你們救城內的老百姓，早日解放長春。』手槍送到連部，我們一看，是一支嶄新的昭和14年式手槍。當時我們分析：敵人下級軍官只配美式的衝鋒槍子，營級才配加拿大式手槍，團以上配一些美觀輕便的防身槍，我們斷定使用這支手槍的軍官可能是校級軍官。老百姓為了生存竟跟國民黨中級軍官鬥爭，可見城內局勢的嚴重。」[5]

日期不詳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 412 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的母親為丈夫大久保準備好了壽衣，還準備好了為結束母子生命所用的氰酸鉀。

此時，東野向遠藤譽的母親說了一件令人害怕的事，那就是城內出現了人肉市場，專門「切著人肉賣」。

大久保拿出一個奧爾沃薩姆特制的帶鏈純金懷錶，這是他手中剩下的最後一件昂貴的物品。他委託東野上街去將懷錶賣掉，換一點糧食回來分給大家吃。他告訴東野說：「大家的生命全維繫在這個表上了。」

但是，東野很晚才兩手空空地從街上趕回來，他哭著說，賣掉懷錶換來的糧食都被人偷走了。大家都知道東野是在撒謊。此時，遠藤譽看到東野的「眼裡一滴淚水也沒有」。

大久保非常絕望。「你是非常無情無義的人 ...... 無情無義啊！我一直在等待著你的良心發現，」他對東野說，「你的賤骨頭怎麼爛到這個份上！真可憐啊！」

沒有糧食，就意味著死亡。大久保說：「離開長春吧，離開吧 ......」[1]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一家四口人一直在苦熬。范傳華後來寫道：「入秋後，吃不到野菜了，一天三餐都是糠窩窩頭。開始幾天還好，過幾天大便乾脆便不下來，（......）弟弟有幾次便不下憋得直叫喚，（......）媽就找來一根鐵釘，用釘子頭一點點往下摳。我便不下來，媽也用這種辦法。有時鐵釘碰到肉疼得鑽心啊，但我卻咬緊牙關忍受，絕不流露出疼的樣子，為的是怕媽媽心疼。」[2]

彭雲鵬，國軍第一兵團司令部直屬特務團迫擊炮連第二排準尉排長。他在四十年後回憶人狗相食的悲劇：

一天，司令部要我連集體出趟公差，因為煮飯的燒柴沒有了。我們這支有氣無力的士兵搖搖晃晃地走了老半天，才來到二道河子區郊外的一個村莊。我們發現，該村四周沒有一個活人走動，房屋裡有的死在炕上；有的雖然一息尚存，但連眼珠都轉不動了，骨瘦如柴，躺在那兒靜待死神的到來。野外的小路旁、水溝、空地、大樹下等處，都可以看到倒斃在地的餓殍。目睹此景，實在令人心寒！

我們也走不動了，就在村裡拆老百姓的板壁房屋。這時，一個士兵突然發現了遠處的荒野上，有一條餓狗正在撕咬著甚麼。一班長精神一振，端起衝鋒槍一梭子彈掃過去，將野狗打死。走近一看：「呵！狗嘴巴裡還銜著一根人骨頭呢！」

士兵們七手八腳地拆了一陣房屋，將房木裝滿了幾部卡車後，連長命令將那被打死的野狗扔到車上一起帶回。這條狗很快便成了我們的佳餚。這真是狗吃人、人吃狗，人狗相食啊！[3]

1948・9・16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向各圍城部隊下達了嚴防長春國軍突圍的電令。

在長春城內，25 歲的張淑琴，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她的大孩子 6 歲，小的 1 歲，其中小女兒餓死了。她在四十五年後回憶道：「我們在卡子前排隊，推車一個接一個，八路在隊伍兩邊來回走。邊走邊說：『誰有槍、子彈、照相機，交出來就開路條出卡子！』（……）我們家是 9 月 16 號那天走的，往『卡空』裡一宿就出去了。是託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 X 光醫生，那邊缺醫生，講明白就讓過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這條，不然早走了。」[1]

在洪熙街卡子裡，李謙一家人繼續等嫂子郝淑賢打水回來，但還是沒有消息。此時，他們意識到嫂子已經不在人世了。因為水溝離他們的地鋪並不遠，如果她還能爬動的話，是可以爬回來的，所以李謙的父親阻止他再去尋找。李謙在備忘錄中稱：「嫂子一走，我們家也就徹底破產了，因為我們家的幾乎全部家產——十幾個『金鎦子』都藏在她的頭上了。不過，還有五、六塊『袁大頭』是縫在我妹妹的小尿被中的，如今，這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產了。當時的紙幣是金圓券，已經貶值得一塌糊塗，即使你帶上一麻袋，也買不了甚麼東西。所以，出逃的人沒有帶金圓券的。另外，長春的房子是租來的，我們一走，也就沒有容身之地了。我們成了名副其實的難民了。」[2]

天津《益世報》以「長春：今之人間地獄」為題，發表《長春論壇報》記者范叔寒逃離長春後寫就的紀實報告。他在 9 月 14 日給《益世報》編輯的信中「請求」把自己耳聞目睹的報告「發表出來」。他僅想把「這 60 萬顆生命在『政治的鬥爭，是殘酷的！』的理論之下，所遭遇的悲慘命運，向社會的控訴罷了」。《益世報》將這篇報告分為 16 日和 17 日兩天的報紙進行了連載。該報告中稱：

饑餓中的光芒

繼3月8日永吉撤守算起，長春淪為孤島已經半年之久了。此一星期間，這個祖國在塞北的孤兒，在共匪困死餓死的圍城政策之下，牠的慘境，是一天比一天向嚴重方向沉淪。長春的食糧，本來就不充裕，在趙君邁、孫桂籍兩位市長任內，為了糧食問題，都曾經傷透了腦筋。

永吉未撤守前，吉長之間的交通雖然已被共匪遮斷，但是沿著吉長路這條線，時斷時續地多少能起一些輸注作用。伊通、九台、德惠、雙陽一帶的糧車，縱在共匪的嚴密監視之下，也能偷偷地把糧轉運長春。農民這個行動，不是沒有目的的，他們為的是要由長春換取一些布匹日用品類的東西。及至孫桂籍市長當選了立委、辭職不幹以後，尚傳道以民政廳長身份，兼掌長春市的時候，長春周邊的情形，已經變化得進一步嚴重起來。

共匪為了從經濟上打擊長春，曾使用高糧價政策，企圖扭轉糧車輸向長春的趨勢。但是，老百姓是需要物資的，印毛澤東照片的紙票，為數縱然很多，但總不比布匹來得切實，所以糧車仍然會偷偷地由各地向長春方面集中。於是，共匪為了克遂其殺人的決策，變本加厲採取了更毒辣的辦法：除去發動政工人員，拚命搜征長春周邊各縣的食糧，嚴禁糧車出境而外，並在長春方圓100華里以內發起鏟苗運動，把田裡青苗完全剷除，聲稱遮斷糧源，根絕生產。通過一段拖長的時間，把困在長春裡面的60萬軍民活活餓死。

共匪這套毒辣的辦法，其實政府未必不絕對沒有辦法對付，怎奈永吉撤守後，撤退的軍隊和大批的難民，都洶湧地擠進長春，在糧源斷缺的情形之下，反而增多了食糧的消費。同時，尚傳道市長偏在這個時際，政治措施上又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即是對於食糧採行了限價政策。正當永吉撤守的兩星期以後，正是敗軍、難民把長春攪得一塌糊塗，大家都爭吵著要吃要喝的時候，食糧的有無問題，比食糧賤貴問題嚴重的多，而尚市長竟於3月25日對於糧價下了個限價命令，這個限價令，在尚市長的打算裡面，也許想在混亂之中，快刀斬麻式地平抑一下糧價，俾做以後安定民生政策的基礎。

然而，外在條件的限制，在間接上反而杜塞了糧食的來源。限價令頒佈的第二天，糧戶不肯賣，納戶不敢買，市場上許多

糧車因為交易不妥，都紛紛趕回鄉下去了。這時期，共匪利用由永吉搶得的流通券，有計劃在四鄉高價套購食糧，及至政府察覺情形不妙，尚市長又在4月9日發表談話撤銷限價令的時候，事態種因已成，挽回已來不及了。

長春的悲劇，就從此時可怕的展開了。

3億元1斤秫米

起初，軍隊搶購食糧，糧價斷線風箏似的直線上升。因為國軍卡口的限制，加上限價命令的刺激，外糧進不來，於是便往市內僅有的餘糧上拚命的買，秫米由10萬元流通券1斤，一躍為15萬元，再躍20萬元，再則30萬元，糧價的上升，是採取滾一五一十的形式，及至突破50萬以後，便猛孤丁的衝破百萬大關，緊跟著便直越200萬元。這是4月中旬的事。當時，合法幣1000餘萬1斤秫米，在京滬平津後方聽來，也許駭人聽聞，但是，長春的老百姓，到了這種程度，反而處之極其泰然。原因是他們已經開始和秫米脫節了。老百姓吃不來秫米，改吃玉米麵和大豆麵，再吃高粱糠和大豆麵的混合粉。市政府曾經發動裕昌源、益發合等家大制粉廠，專磨糠和豆麵混合粉，平售給公教人員和一般民戶。

但是，無論如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畢竟東西是有限的，縱然方法很好，並不能克服了「無」的問題。緊跟著秫米、大豆，甚至高粱糠都一齊上漲，老百姓又得改吃豆腐渣。豆腐渣也貴，也沒有了。於是，吃豆餅，由豆餅又發展到吃酒糟。在長春叫酒糟為「麯子」。據市府調查：長春各造酒坊共存酒糟有300萬斤左右，可供長春市民半個月吃用。總之，凡是能夠吃的，不問其營養之有無，都計劃著吃了。

截至8月中旬，記者離開長春的時候，酒糟要100萬流通券1斤，大豆750萬，而秫米已經800萬元了。用關裡的數字來表示：吃1斤秫米需要法幣1個億。（據最近長春消息，米已到3000萬流通券1斤，合法幣3億。）

市場上的情形，變得可憐，也變得可怕。糧食由論幾百斤幾十斤的賣法，變成論斤，論一盅，論一把，甚至大豆論粒賣了。

一個又黑又髒的酒糟與糠混成的饅頭，索價100萬流通券。至於小得可憐的當地土白麵饅頭或燒餅，並非絕對沒有，但是價格昂貴得使你不敢過問，在一般人的眼目中，已經相等於熊掌、燕窩，成為珍貴的奢侈食品了。

極貧的吃些甚麼？

不過，所說這些，畢竟是屬於有購買能力，也就是在吃上尚有「辦法」的這一階級的情形。至於那些本就貧困的細民，他們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呢？說來更是可慘，當糠和豆腐渣都昂貴而且稀少得無從購得的時候，一般貧困的老百姓，便開始往野果和樹葉上面打算，首先去吃榆樹葉和野生的屈母菜，這兩種菜7月中旬都到過10萬元流通券1斤。繼則吃灰菜莖以及嫩楊樹葉（至於樹皮是剝下來曬乾充做燃料的）。最後有一種叫著「線兒菜」的野生草，據說含有植物毒素，也被充當代用食品。食後中毒，臉上手腳都腫得好似發胖，但是那深陷無光的眼睛，沒有支撐力量的手腳，都清楚地說明了饑餓在吮吸著他們的神經和肉體。在長春，不管是有辦法的或者貧困的，面黃肌瘦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臉型。營養太壞，體力不支，都拖著沉重的步伐在街上蠕動，散漫，病態的懶惰，是普通的一般的現象。

街頭上寥若晨星地點綴幾輛三輪車子。這些三輪車夫，會在踏車行駛期間，因為腹空饑餓，冒著滿頭大汗而昏厥過去。對於500碼以上的乘客，他們只得皺著眉頭拒絕不拉的了。

其實受饑餓威脅的，並不完全是貧困的，沒有錢的，或者赤貧的叫花子，衣冠齊楚的人物，擁有財產的紳士，惟因沒有糧吃，一樣的可能餓死。中正廣場躺著兩個中年婦人，都是穿得高級的潔白衫褲死在那裡。由於吃的問題高於一切，人們對於財物的觀念也變化了，金銀財寶，都失掉了作用。拍賣行，舊貨店，街頭巷尾，擺滿了豪華的衣服和珍貴的器皿，卻都寂寞得無人過問。

在7月中旬，五、六斤豆子便可換來一件相當可觀的毛皮大衣。用衣服換糠，換豆腐渣的交易，到處都是。窩頭，大豆，都代替了貨幣成了流通價值。討一個老婆，要用豆子講價，平

康那裡已為饑餓淪迫為娼的女人，是以糠麵窩頭談判其夜宿資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吃，為了克服這個人為的饑饉。

長春市長尚傳道，除去為了糠，為了麯子麵，整天价在大傷其腦筋而外，已經沒有甚麼行政工作可做。上級給他的任務，是想辦法弄糧，下級的呈請，也是想辦法解決吃。總之，目前的長春饑餓統治了一切，饑餓威脅著人們在死亡線上發抖。

所謂「真空地帶」

饑餓，死亡縱然威脅著長春人們，然而，大家可都清楚認識這種死亡的威脅，是來自外面的圍城政策的。

長春的情況，雖然發展到這樣窘，這樣嚴重，但從來沒有暴動，沒有暴民搶糧的事的發生，長春人民的善良和守法，這裡是可以充分的說明的了。人民為了求生，為了在絕望中摸索一條生路，很多自動地冒險走出孤島，想要衝破共匪的封鎖線，回歸他們的故鄉，或到瀋陽另謀生活。但是長春周圍方圓 50 里內，共匪是五步一卡，十步一哨，圍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想要通過此道難關，勢比登天還難。共匪的打算是：長春裡面少一名百姓，便是減輕國軍一名擔負，所以在他們認為，放一名老百姓的生路，是和困死餓死長春軍民的政策有所違背的。因此，縱然目睹著老百姓活活地餓死，他們也是不肯放行的。有些老百姓硬著頭皮去質問共匪的政工人員：共產黨不是一向標榜為著老百姓呀？怎能看著老百姓餓死而不救呢？他們的答覆很是乾脆，說：「政治的鬥爭，是殘酷的！」在今天他們是和政府做政治鬥爭的時期，對於老百姓的殘酷是不可免的，必然的，等到他們「革命」成功了以後，就能考慮到老百姓的存亡利益問題。

參加圍困長春的共匪部隊，是由東北共匪國際部隊混合編成的。在長春西北方面，農安到宋家窪子間是蒙古騎兵，這些蒙騎部隊具有一種原始的殺人獸性，遇上中國人民，是燒殺淫掠，無所不為。長春正南方向，由大屯到拉拉屯之間，是韓共的獨立師，這些韓共的構成份子，大多是由北韓或吉東間島（指韓國人對圖們江以北、海蘭江以南的中國延邊領土的單方面稱呼，包括延吉、汪清、

和龍、琿春四縣市）方面徵發來的農民，經過一番共匪的民族離間的政治訓練，對於中國人民都持有偏頗的嫉仇觀念，所以，對於逃出來的中國人民，也特別殘酷不仁，隨便用國特名義，就能殺掉。

這些異族部隊，對於困死餓死中國人民的政策，執行的特別嚴厲，更特別徹底，任憑你怎樣的哀懇，是絲毫不會換來他們的同情的。

天羅地網逃不得

脫出孤島的前進不得，後退不得，便都聚集在兩軍間的「真空地帶」。所謂真空地帶，圍在長春周邊四面皆是的。因為國軍方面放出卡口只有洪熙街、南關、東大橋三處，所以逃出的難民都聚集在這三個地方，特別是洪熙街，因是南下必經的關口，難民的人數也就分外的多，目下足有15萬人左右。難民身上所揣的食糧，最多不過三、四日用，吃光了便必吃草吃豆葉充饑。不能想辦法脫出這個地帶，就得讓活活地餓死。

洪熙街外長約500碼左右的柏油路和附近的草地上，密密地躺著全是這批難民。沒有遮掩，沒有房屋，他們是暴曬在赤日炎炎。下雨，暴露在大雨淋漓之中，為饑餓放躺下的人，都自然地睡泥潭的水裡。這十幾萬人，包含生的、死的、老的、弱的、男的、女的，都赤裸裸地擠在一起，生活已經變成原始了，隨便在旁人面前便溺，也隨便地活著，隨便地死去，不定在哪一張破舊的被窩底下，你會發現一具已經腐臭生蛆的屍身。

一個個從都市出來健康的人，在這地方目觀此景，再嗅到這種氣味，便會神經衰弱發昏過去。疫癘無遮攔地橫行無阻，衛生醫療都談不上，不管人是怎樣死的，一律都認為他是餓死，因為在這地帶，惟有饑餓這個概念尚很清楚，因為這遍野擠滿了人，人死了是沒有地方掩埋的，便聽其自然地暴屍在那裡，屍身上能有一張被子的，那還算屬於「有」的階級的。

人吃人，在這種情形下不敢保管牠絕對沒有。不過，6月初旬記者隨同長春參議會李議長出卡觀察的時候，確有想從一個母親手裡買她死去的嬰孩充饑的事情，後來，因李議長看著不忍，出錢買下掩埋而罷。這個地帶，死的嬰孩為數特別之多，在密

集的人與人縫之間，經常有些死掉母親的嬰孩，支撐著乾癟的腦袋，嘶啞的泣叫，說起來那種慘絕人寰的情景，真是慘無以述。

在二道河子的樂土街、東盛六條一帶，是比洪熙街有房屋可住的。不過，每一空屋子裡都有餓死的屍體。記者親觀一間屋子裡東倒西歪地躺著五具乾癟的屍體。在真空地帶隨便死一個人，比死了一條狗還很自然，大家在「死」的跟前，都陷於一種麻痹狀態，似乎並不比「餓」來得可怕。

真空地帶，是兩軍對峙的地帶，最近的地方，有的相接不過500碼，晝夜槍炮聲不絕於耳，雙方的炮擊，或因夜間的誤會，都經常把難民打死一些。流彈下死傷的難民，每日數不可勝數。據一位同業的估計，8月中旬，真空地帶每日餓死、病死以及打死的人，可能有5000人之多。這個數字雖然未必可靠，總之，死亡率是相當驚人的。

這些難民唯一的生路，就是在夜裡偷偷地爬出共匪50里地長的封鎖線，否則，遲早務必餓死的。然而，爬警戒線又必須具有壯健的體力，能繼續爬上三夜、四夜不可。一個靠吃草吃乾豆葉度命的人，縱然能有力量爬上一夜，第二天便會躺下不能動彈，結果，非特不能爬出去，連繼續向草地裡覓取食物的能力都會喪失，於是只好「躺」以待斃了。

我們要不要長春呢？

在水深火熱之中，長春的老百姓始終對於政府系以無限的希望，他們從共匪那裡得來的是一種政治上的「殘酷」，所以惟有期待政府溫情的救援了。

鄭洞國在剛就吉林省主席時，秘書長崔垂言曾對記者說：「我們決不能再演『九一八』，我們是不能扔掉人民的！」然而，事實在幾個月中，人民縱未扔掉，差不多也給餓光了。吉林省府和鄭洞國指揮的第一兵團，既是孤雁塞北，想不出辦法自屬當然，老百姓是不曾過於苛求的。然而，最高當局既不想放棄長春，似乎就該對長春採取積極的處理態度。不幸表現在人民眼中的，確是一味的搪塞和敷衍，始終看不到真實的決策。記得在6月中旬，長春《中央日報》上刊出一則令嗷嗷待哺的長春人民讀來啼笑皆非的消息，這消息的大意是，長春市長尚

傳道為籲請中央火速運糧救濟長春60萬饑民，並致電監察院副院長劉哲，請求代向當局呼籲，劉哲當即書謁主席，據情報告，請求撥糧救濟，主席對於長春深為關懷，遂即批令國防部長速辦，國防部長遂即電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火速撥糧空運長春，以濟眉急，而衛總司令頃電吉林廳兼主席，應與長春市長尚傳道籌辦云云。這一套為了「救濟」長春的官樣文章，除了費了些文字的周折，對於事實是毫無補益的。

長春人晝夜的兩怕

空投的糧食，軍用尚且不足，老百姓是絕對沒有份的。參議會和市政府，為了呼籲撥運民糧，救濟饑民，雖然十萬火急的電報，一封接著一封拍向南京，結果，都是少有反應。另一方面，長春的守軍，為了確保軍食，竟不顧一切的在市場上大車「搶購」軍糧，央行是在軍當局控制之下的，所有現鈔都是由軍方使用。

於是，在有價即購的決策下，把糧價刺激得滿天飛漲。又因為沒有小票，流通上不方便，長春市銀行也跟著發行了百萬、五百萬、千萬元的本票。流通券在市場上失掉了流通作用而消蹤斂跡了。8月中旬，街頭上隨便一種交易，起碼都是500萬元，這種軍糧搶購辦法，無異議地是直接影響民食的。但是，這樣卻苦了市長尚傳道，他從司令官兼主席方面，得來的是軍民都得兼顧的二重任務，而實際他的民食辦法卻正和軍糧政策有著嚴重的矛盾。

其實，長春的情形，是顧了軍，就顧不了民，顧了民，就顧不了軍的，而現在所采的無問題是前者。限於最高當局不另設法救濟，單憑那一孤點長春是想不出能夠解除長春人民死之威脅的辦法了。

長春人民對於「軍糧」和「空投」，都懷著恐怖的心緒，因為每當軍糧開始採購的時候，都會製造一個「殺人的物價」，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而空投呢，又因共匪的高射炮對空射擊，飛機大都在一萬公尺以上盲目地往下投擲，於是，糧袋打死人，砸壞了房屋，形成一種「殺人的空投」。老百姓每天須用躲避敵機的心情，忐忑地出來張望著投糧的機群。

前幾天，共匪開始用炮向市區盲射達兩小時之久，落彈有四、

五百發，四馬路、永春路都起了火焰，人也傷亡了四、五十人。於是，長春人民又多了一層憂慮，晝間為了害怕飛機盲投，必須出來張望，夜裡，又害怕匪炮盲射，又不敢在床上安睡。飽不得飽，睡不得睡，長春人民是在饑餓與恐怖的壓迫下生存著的。他們出來不得，在裡面又活不成，在這殘酷的歷史面前，註定了他們悲慘的命運。他們無從預卜他們自己的存亡！（9月14日在天津）

1948・9・17

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也是全家人團圓的日子。但死亡是如此普遍，令人猝不及防。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的父親在饑腸轆轆中寂靜地餓死了。後來，他的弟弟和媽媽也寂靜地餓死了。十天之內，一家餓死了三人。

> 天剛亮，爹向媽要水喝，媽當時有點不耐煩，她渾身浮腫也很厲害，像灌鉛似的，行動極不方便，每動彈一下都要費出極大氣力。那時我們都一樣，睡覺從不脫衣服，因為浮腫，脫了就再也穿不上了。再說白天腫的厲害，到晚上睡覺時也脫不下來，乾脆不脫了。
>
> 就這樣，媽好不容易才爬起床，下地，端來一碗涼水給爹。媽一看不對頭，怎麼說話細聲細語，還聽不清楚，才喝了一口就閉上嘴，而且還撤了一枕頭。媽就大聲呼喊：「他爹啊，他爹，你怎麼啦？」
>
> 爹沒有回聲，媽知道事壞了。馬上到雞窩裡把快要餓死的一隻母雞拖出來殺了。拿來新鮮雞血用小勺喂，第一口喝下去半勺，餘下的從嘴角流下，再喂一勺就一點反應也沒有了。
>
> 媽見勢不妙，就拼命喊叫：「他爹啊，你怎麼啦？你快說話啊！……」
>
> 爹甚麼話也沒給我們娘兒三個留下。就這樣，帶著一肚子野菜和半勺雞血，不聲不息，平靜地走了。
>
> 雖然是在兵荒馬亂的歲月，外面還在打炮，但夫妻情、父子情依然是深的，沒有被外界所隔斷。媽伏在爹臉上失聲痛哭，一個勁地哭呀，喊呀：「他爹啊，你甚麼也沒說呀 —— 扔下我們娘兒三個就走了，這可叫我怎麼辦哪，這日子哪天能熬出頭啊，你閉上眼睛也沒吃頓飽飯哪！」
>
> 我們哥倆也爬起來，依偎在媽兩旁，哭喊著叫媽媽。
>
> 哭叫聲驚動了在窗外站崗的炮兵排哨兵，也驚動了鄰居們。
>
> 媽的哭聲稍平靜了點，她下地打開箱子，拿出來一套八成新棉衣，這是媽兩年前做的，還很乾淨，只聽喇的一聲，媽把領子撕下來，記得表情是那麼莊重、沉重，淚水還一個勁地往外湧。

我問：「媽，你怎麼把領子撕下來？」

媽很快給爹穿好衣服，爹平靜地躺在床上，可兩隻眼睛卻睜得大大的。媽看了又看說：「他爹，我知道你扔下俺娘兒三個，你有心事啊。」又哭起來了。

弟弟看了就說：「媽，我怕爹。」媽就把弟弟摟在懷裡說：「是你爹，你怕甚麼，別害怕。」她用手在爹臉上從上往下整理一下，這回好了，一副沉睡的樣子。

媽剛剛騰出手來，又去打開箱子，找來一塊白布，撕下三條白布條，每人一條系在腰上給爹戴孝。

收拾好了，媽媽領我們哥倆到門口，媽坐在石臺上又大哭一場，我們哥倆並排站在門口默不作聲。媽哭得很傷心啊！在遠離故土的這座死城裡再沒有親人了。就我們這娘兒三個相依為命了，而鍋裡是空的，野外的野菜人吃加上國軍的牲口啃，都光了。天啊，這可怎麼熬啊？！正像媽上次和我說的，大哭一場心裡能鬆快些。

媽哭了一陣子就出去了，往東走，到誰家，我不知道。不久，媽媽一手攥著炒黃豆，一手攥著半小塊糠窩窩頭，扶著圍牆進了屋。媽把窩窩頭一掰兩塊，給我們哥倆一人一塊。這十幾粒炒黃豆，一人抓幾粒，媽媽甚麼也沒留。我就問媽：「媽，你怎麼不吃？」我媽坐倚在石臺上閉著眼睛斷斷續續地說：「孩子，媽不餓，你們哥倆吃吧。」

媽媽真的不餓嗎？不是這樣的。我就掰一小角窩窩頭遞給媽媽。我媽說：「媽不餓，你們哥倆吃吧。」

我說：「媽，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我逼著我媽接過那一小角窩窩頭。媽媽拿著窩窩頭放進嘴裡咬了一點點。如果把窩窩頭一口填到嘴裡是綽綽有餘，但媽媽只咬了一點點，然後就把窩窩頭揣進了兜裡。

天黑了，媽媽給爹蓋好，把拉門（注：日本房）關好，還用棍子在走廊裡支撐一下。這一晚上，我們娘兒三個就在門口過道上過夜，在水泥地上鋪上兩床被子，媽靠門口，弟弟在中間，我在裡邊。〔……〕剛躺下，我對媽說：「媽，明天我到鐵道邊找點野菜吃。」媽應了聲：「好啊，孩子。」[1]

程啟文，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七師副師長，他在四十年後寫道：「中秋節，長春上空飛來大批運輸機，除空投糧食外，還投下大批美制罐頭慰問被困的長春守軍，以振士氣。結果大部分落到我軍陣地上，這些慰問品成了蔣介石贈送我軍的節日禮物。我軍圍困長春兩個多月，居民斷糧的越來越多，餓死者天天增加。」[2]

王玉樓，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八師三團一營一連副連長，他在四十年後寫道：「陰曆八月十五日，是我國人民傳統的中秋節。我們利用敵人的厭戰心理，抓住這一時機進行宣傳。光我們連就把八十塊月餅分成四十包，把寫好的傳單夾在中間，派人在夜幕的掩護下悄悄地放在敵前沿的指定位置上。第二天夜間『廣播』一開始，陳長發就向敵軍發佈了這一消息。他喊道：『我們知道你們現在還沒有吃上月餅，昨天我們特意往你們陣地前送了月餅。你們不要客氣，快到你們左邊的小紅房邊領取吧。』時隔不久，透過月光，我們看到一些敵官兵像是忘記了這是戰火紛飛的戰場，爬出戰壕，抱著月餅返回陣地。」[3]

關於共軍在中秋節與國軍心戰的花招，中華民國報紙《新報》的一名記者還有話說。這名記者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分，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 8 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麯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4]

《吉林日報》以「中共與東北人民血肉相聯」為題，刊登署名為君文的文章，該文回顧了過去十七年來東北人民飽受日本侵略者和中華民國政府的蹂躪和踐踏，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帶來的「偉大勝利」，告訴東北人民，只有依靠中共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從切身經驗中，東北人民已經懂得：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東北人民真正的救星，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給東北人民以民主自由與幸福，才能引導東北人民走向革命的最後勝利。」

在洪熙街卡子的空白地帶，這是李謙一家人「蹲卡子」的第四天。這天傳來了好消息：共軍準備放行難民了。

共軍首先放大、中學校的學生和鐵路工人出卡子，因為共軍需要兵源和技術人員。李謙是中學生，還有自強中學的校徽，他的一家人僥倖得以首批被放行。共軍動員中學生參軍，李謙沒有答應。他們拿著共軍統治區地方政府給開的「路條」（難民證）推著架子車，緊隨浩浩蕩蕩的難民隊伍，沿著瀋長公路向西進發。從長春到老家河北省昌黎縣不足 1000 公里路程，李謙一家人要在 115 天后（1949 年 1 月 6 日）才能到達。[5]

1948・9・18

在哈爾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值班人員在《陣中日記》中寫道：「18日保安旅二團一連長蘆鳳武率 24 人、騎兵旅連長齊鳳發率 55 人向獨七師投誠。」[1]

上午，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的鄰居郭鳳歧用手推車將他死去的父親推到 50 米遠的鐵道邊，他的媽媽用小鐵鍬當拐杖拄著，在後面送靈。范傳華在六十七年後回憶說：

> 她一點點地一點點地挪，邊挪邊哭喊：「他爹啊，你走了，我來送你了……」
>
> 我們對面國軍三十八師炮兵排士兵，都站在他們的門口默不作聲地看著這一切。
>
> 媽媽沒有力氣來挖土。我爹被郭大伯一下子從車上掀到一個小坑裡，甚麼坑，也就是豎木頭做的電線杆子的坑。國軍把電線杆鋸掉拿去修工事了，老百姓又把剩下的那一截挖走了，挖走了不就出來一個自然的坑嘛。坑裡還有水，因為牠旁邊還有一個水塘，所以電線杆的坑裡也有水。郭大伯一掀手推車就把我爹扔進了水坑裡，遺體還露出來一截呢，就這麼著把我爹送走了。媽媽還撒幾鐵鍬土，根本沒蓋上，在那裡又大哭一場。
>
> 那時候，死一個人是非常簡單的，處理也非常簡單。我爹就這樣被送走了，也沒埋，白天送走了，晚上野狗又給叨走了。[2]

日期不詳

中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在《告六十軍書》的政治攻勢中寫道：「現在你們又困守長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堅守與撤退都是死路，（……）擺在你們前面的光明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毅然決然，脫離反革命的蔣家軍隊，率部或攜械投誠到解放軍來。（……）只有這樣才能保得滇軍不被消滅，才能使三萬子弟回到可愛的雲南，否則，你們將被消滅，將落得個妻離子散，無家可歸。」[1]

中共東北軍區政治部在《告長春蔣方人員》的政治攻勢中寫道：「蔣介石在東北進行的反人民賣國戰爭，早已註定了死亡之命運。（……）僅困守少數據點，隨時有戰死被殲的可能。你們處在四面被圍的孤島長春，將作何打算？守嗎？內缺糧草，外無援兵，孤立作戰，就一定被殲。（……）只有悔過自新，立功贖罪，反正投誠，是唯一安全長久光明正道。」[2]

東北野戰軍、長春地區前線指揮部在《告長春市民書》的政治攻勢中寫道：「我們對於你們這種困境，不斷寄予懷念，現在也正為了你們的解放，打垮蔣匪的統治而努力。長春不久就要解放，就將成為人民的城市，蔣匪永遠再也不會占去了。（……）同胞們，我們知道，你們在蔣匪掠奪下，受著很多困難，解放軍進入長春後，糧食燃料，將予大家必要的調劑，毋庸擔心憂慮，懷疑不安，為消滅蔣匪，解放自己，保護長春而奮鬥吧！」[3]

1948・9・19

新華社東北前線電稱，困踞長春的蔣匪，在三個月中，「13000向我投誠，內有校官16名尉官182名」。他們到達我軍駐地，「莫不感激涕零，認為相距100米的步哨線，就是一條生死界，留在那邊便是死路，逃了過來不僅得到溫飽，也就是走上了幸福和光明的大道」。

在四十三年後，由官方出版的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稱：「對進入我區的難民，我在前沿執勤的幹部、戰士，在開始一段時間，主要是按照圍困長春的要求，採取勸阻和送回的辦法，後來當看到出來的難民那種淒苦的情形，他們出自於對長春人民遭受苦難的同情，懷著真摯而又樸素的階級感情，對出來的難民，除了把其中少數懷疑是間諜、特務、官吏、逃亡地主和糧食走私犯之類的人送回去以外，一般都予以放行。他們有時口頭也往回動員，但當難民表示不願回去時也就默許放行了，或者表面上把難民送回去一段路，難民繞了一圈子又回來了，我們的幹部、戰士明明知道又回來也不再往回送。（⋯⋯）對這種私放難民的現象，雖然有的領導同志在報告中批評過，但從來沒有哪個領導同志追究過。據估算，這樣零散出卡哨進入解放區的難民也有四、五萬人之多。」[1]

對工作在長南區的長春工作委員會「長白」工作隊管理員郜玉金來說，他負責隊員的「吃喝拉撒睡工作」。他在四十三年後回憶救濟難民之事稱：「七、八月份，放難民開始了，每隔三、五天就放一次，從我們這個口子，每次放出的難民多則幾百人，少則五、六十人，孟家屯設為第一站，三家子為第二站，每站都設有粥鍋。」[2]

在長春市興安大路412號「新京製藥」廠，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已經不能再等待共軍打進長春城了，他的等待已經到極限了。經過與眾人的商議與斟酌，他決定選擇帶領大家闖卡子逃命。

這一天，對遠藤譽一家人來說是悲痛的一天。小萬餓死了。

> 一旦做出決定，無論如何要恢復體力。我們已好久沒有吃上高粱米，但必須按米湯、稀飯、乾飯的順序逐漸增加濃度，量也一點一點地增加。（......）母親忙於準備逃出用的包裝和攜帶的糧食。小萬出生後，沒有得到過一次大米，母親立即給小萬做了大米的濃米湯。可是小萬不理睬特意做的米湯。

「很可憐啊，初次給他喝這樣高級的，他是不是嚇一跳呢？爸爸，對不起，他不習慣，能不能一點一點地喂他？」母親把小萬託給父親，繼續準備著包裝和攜帶的糧食。

「媽媽，萬代三的情況不對勁啊！」父親呼喊母親，那是在9月19日的傍晚。小萬美麗大眼睛的瞳孔已失去了光輝，只是空虛地注視著天空，小嘴唇失去了色彩，微微抽搐起來。「小萬……啊！小萬……啊！」母親把乾巴巴地滿是皺紋的乳房露出來，把乳頭塞進小萬的嘴唇裡，但嘴唇已經是涼的。

「那麼，把我的奶讓他吃一吃看吧。」跑過來的白耗子夫人，把自己的乳頭塞在小萬的嘴裡。這個夫人是和母親同一時候生下男孩子的，她的乳房豐滿白潤，充滿著不可想像的豐富奶汁。

白耗子夫人的乳頭進入嘴裡時，一直無表情的小萬的臉一瞬間變歪，用舌頭往外頂出了乳頭。爾後，以這個動作作為最後舉動，靜靜地結束了小小的生命。

父親清洗了小萬的身體。

「說起來，讓他活著也是太過份的要求啦……」父親看著簡直只有顱骨和肚子，與枯枝連接起來般的那樣枯瘦的小萬身體，向小萬道歉說。小萬被埋在面臨興安胡同的宿舍窗下，內院地面鋪著混凝土，所以這是最靠近土的地方。

往樓下走去的時候，父親把小萬抱在手臂裡，叫母親看一下。「媽媽，瞧，已是臨別啦，怎麼都不好好地看一看呢？」

小萬是穿著3歲弟弟千代次的過百日時穿的帶家徽的禮服，他在父親的手腕之中靜靜地睡著。

後來知道，母親這個時候是這麼想的：「我很想送小萬到埋葬他的地方，可是我還有五個孩子，我不能讓這些孩子們死去。我有義務保護好留下來的性命。為了這些孩子明天的出發，我一刻也不能休息。再說，小萬在丈夫的懷裡，好像靜靜地睡得很香，睡得真好看啊，我不想看被土搞得很髒的小萬。填上土就不能喘氣了。如果我看到不能喘氣的小萬，我就不知道我將變成甚麼樣了。我的小萬要永遠在丈夫的懷中安眠。這就行……這樣就行啊！」

母親是這樣說給自己聽的，咬著牙，但沒有停止準備出發的活。[3]

1948．9．20

整個長春城餓得像萎縮了的胃。

走在街上的人，都像跟身體裡的敵人在戰鬥，頭低垂著，脖筋暴凸著，身體前傾著，一小步一小步地把自己向前拖。看到已經倒斃且腐爛變形的屍體，像甚麼也沒有看見。

年輕人的臉和老人的臉一樣變得恐怖起來了。

《東北日報》刊登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區的民謠：

蔣管區民謠

婆婆丁，黃又黃，小禿淚汪汪，抓走了爹，搶走了娘，
哭呀！叫呀！挨了「種秧」軍兩耳光。

明要稅，暗貪污，不管百姓苦不苦，百姓眼淚流成河。
蔣匪拍手笑哈哈：「只要我快樂，誰管你死活！」

魚沒水，樹沒根，沒有爹娘，沒親人；有了八路，有親人，
魚有了水，樹有了根。八路是咱救命星，救咱百姓出火坑。

中華民國政府長春分行發給中央銀行的第3059號電文稱：「長市現在居民不足10萬人，所有公務人員均冒險外逃。」[1]

1948年9月20日，這是共軍打開卡哨讓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的難民自願出來的第九天，也是林彪等將領電令各圍城部隊務必「做到於十天內放完」來「挽回影響」的指示發出的第九天。

遠藤譽一家人和她的父親大久保的製藥廠的職員們，終於踏上了逃亡之路。這些異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座真正的人間地獄，而他們一度曾經對牠寄託了全部的希望。

他們穿過白山公園、牡丹公園和順天公園，一路上可以看見零零落落的餓殍。他們和一群同樣逃離長春的日本人會合。大久保被大夥兒委任為這一行隊伍的名義團長，他以自己身體虛弱進行推脫。大夥兒說，團長只是一個「形式」，只要出了卡子就可以結束。他「只好

承擔下來」。

遠藤譽對共軍統治區——「解放區」充滿了好奇，她認為在那兒肯定有自己「未知的東西」。當夕陽染紅天空的時候，他們來到了以鐵絲網釘在木樁上的木柵欄前，這兒就是國軍的卡子。

當遠藤譽看到這個木柵欄入口兩側時吃了一驚，那是攤販列成排在賣東西，煮好的毛豆、玉米餅，還有白麵饅頭，這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光景。遠藤譽的母親也看到了這些好吃的東西，她想給自己的幾個孩子買一點。她剛要打開錢包時，一位老年女子抓住了她的手臂。這位老年女子是遠藤譽的弟弟小萬出生時請來的產婆。這位產婆大聲責難遠藤譽的媽媽沒給她接生孩子的報酬就想一聲不響地離開長春。其實，遠藤譽的家裡當時已經沒有錢付給產婆。遠藤譽的母親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就將錢包遞給了產婆。產婆抓過錢包就匆匆走了。遠藤譽的母親抱歉地對她的幾個孩子說：「對不起啊，孩子們。我說出去給你們買點甚麼，媽媽也真想給你們買的 ...... 請原諒吧，只要能越過這個門就是解放區，就能吃上大米甚麼的。所以原諒我吧，要忍耐啊。」

遠藤譽心想沒錯的，只要能越過這個木柵欄就可以。「只是靠近解放區就有這麼多攤販，」她後來寫道，「那兒解放區就不知道該怎樣好呢。」

> 柵門（卡口）周圍的難民擁擠不堪，在那裡有國民黨軍的哨所。當兵的在檢查東西，所謂檢查，也不過是查一查有沒有武器等，其餘幾乎是無條件地准許出卡口。（......）因為有再次考慮不能返回的人、惜別的人和攤販討價還價的人等關係，難民的步伐就慢下來，這時國民黨兵用刺刀從背後催促快走。我發現難民通過的路兩側都拉著鐵絲網。（......）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著越過木柵欄。
>
> 空曠得連草也不長的平地。奇妙地寂靜。突然聽到鳥的拍翅聲，一隻烏鴉從難民中飛出。「啞——」一聲留下強烈的叫聲便消失在夕陽之中。
>
> 難民之外連個人影也沒有，這些難民也一步一步地連聲也不出地往前走。忽然間產生了奇怪的感覺，我開始把全身變成眼睛和耳朵窺視著周圍。
>
> 突然，在前方發出了「哦——」的喊聲。等我們定神後，從

喊聲那裡飛出一大群蒼蠅。一瞬間，使周圍變暗的大群蒼蠅，在長春街上只看到這一回。

「豈有此理 ...... 豈有此理 ...... 不應該有那種事。可能和甚麼搞錯了吧，搞錯了。希望這是搞錯了 ......」

但，並沒有搞錯：腐爛裸露的頭骨，睜開的眼球，像發笑似地張開的嘴，從嘴裡露出的牙 ...... 蒼蠅進到嘴裡嗡嗡地發出響聲，像洗衣機那樣薄的胸部已經幹透發黑，蒼蠅聚集的不多。出生以來，我頭一次在身旁看到腐爛了的餓死屍體。我想要吐，感覺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當我將要倒下的時候，支持我的是父親的手腕。

（......）蹣跚的步伐往前邁步了。隨著前進，餓死的屍體的數量就越多。道路往右拐，看到生長著幾棵樹的小林子，從林子的右邊出來幾個兵。一看這是國民黨軍隊，又被檢查了東西。說是檢查，每次都把好東西奪去。這次被奪去的東西裡有皮包，在這皮包裡裝著父親最重要的研究資料。皮包裡裝有一直到現在的研究成果記錄、政府發的正式文件，以及戰敗後的日記等。這些都是貴重的資料，這些兵可能認為這裡有值錢的東西，從難民手裡掠奪去，把皮包拿走了。

一過林子，又從前方來了兵，這次是八路軍，跟趙大哥衣服一樣。這兒是怎麼回事？八路軍的兵也說要檢查東西。他邊檢查邊用朝鮮調很濃的日語問：「長春，現在是怎麼樣了？」朝鮮人說日語是比較好的，但一般說，缺點是該濁音的字母按清音發音。

「鬧糧荒，連續不斷地有餓死者，我們九十名日本人，是為了避免餓死而由長春逃出來的。」父親回答說。

「嗯，那麼，往那邊走。」這個八路士兵邊指著前進的方向邊照樣從大車上搶走了好東西。

餓死的屍體數量不斷增加，有時被撂在道上的手腳差點絆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屍體的腹部在腐爛之後膨脹而爆炸，腸子從腹部流了出來，散得到處都是；小的只有腦袋一樣的嬰兒，趴在像是母親的女性胸口上，就這麼乾癟下去；已經化為白骨的屍體、腐爛的屍體，還有彷佛剛剛倒下的還溫熱的屍體，這些屍體或散亂四方，或迭在一起，就這麼被扔在這裡。大部分的屍體都身無寸縷，是被人扒掉了嗎？腐爛屍體的腹部全都發綠膨脹，夕陽漸濃的時候帶著綠色，更加地駭人。

可是，被大車或兩輪拖車軋過去的屍體，腸子都露了出來，像光有頭的嬰兒臉，朝下把手搭在像他母親的胸脯上，已經幹透了；已經化為白骨的屍體、腐爛的屍體，以及好像剛剛倒下的新屍體等。這些屍體有的很散亂，有的是一個迭著一個，無人管，也就那麼放著，幾乎都沒有穿衣服，可能是被扒走了吧。

走到難民集合的地方，都在地面上鋪上草席、被褥，在上面坐著或躺著。太陽已經落下，周圍昏暗起來，數不清的難民的眼光，只有這些眼光像在黑暗中的狼一樣奇異地閃耀著，看著這邊。我們借著月光找到屍體較少的一塊地方，鋪上被褥，趕快坐下了，在左側排列著倒塌的房子的牆。

一躺下，脊樑很痛，感到耳鳴。太冷啦，腳的哆嗦就是不停，這裡到底是哪兒呢？八路軍確實在，但國民黨軍也在。這兒不是解放區嗎？我們到底來到甚麼地方了呢？

一看天空，滿天的星斗顯得冷冰冰的。真受不了的疲勞，終於使我睡著了。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的露宿。[2]

1948・9・21

廣州《勞工新聞報》自上海特訊稱：「據外息：長春形勢，轉趨嚴重，周邊共匪以重炮向城內轟擊，落彈千枚，有若干民房被炸毀。逃抵北平之長春難民謂長春居民均有餓死，空投糧食傳未能成為事實，而軍隊之逐屋搜查徵用糧食，再使糧荒情形嚴重。」

天津《益世報》以「饑餓長春無生路，十萬難民逃命急」為題，刊登該報自瀋陽通訊：「遭匪困擾，交通阻絕的長春，成了一個獨立無援的孤島，糧荒嚴重，迭起各報。記者今偶遇由該地逃來難民數名，將所經歷的情形，報導於下：據說長市食糧、燃料均感匱乏，秫米每斤流通券竟達3400萬元，大豆每斤2500萬元，樹葉每斤150萬元。因為現鈔不夠流通，都臨時利用銀行發行的本票。每天依賴著一、二十架飛機運點糧食，亦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一、二十斤糧食，可換一棟樓房，有的還不幹。談到燃料問題，煤炭一點沒有，門、窗、桌、凳都充作了燃料。市外周圍30里的稼禾，都被難民採個淨光，用以果腹。豆葉、穀穗、綠草等，都成了難民們充饑的珍品。人皆菜色，形同囚犯，因餓而倒斃者，每天不下1000人。國軍駐守洪熙街裡，匪軍盤踞洪熙街外，把持甚嚴，夜間偷爬卡門，被匪軍擊斃的難民，不可數計。」

《東北日報》以「在蔣匪的『搶食區』裡：長春蔣匪『殺民養軍』慘狀目觀記」為題，刊登署名為關寄晨的通訊文章，該文中所涉及到的這個名叫八里堡的村莊，處於長春西部國共兩軍火力的中間地帶，可以由此一瞥林彪的「餓殍戰術」造成的人間地獄。這是中共傳媒對此最真實的描述，也為這場殘酷而又反人類的內戰留下鐵一般的證言。鑒於此，該通訊全文如下：

> 在長春近郊的八里堡，我看見了蔣家匪幫所一手造成的饑餓世界，我要說這是人間最悲慘的景象，任何描繪殺人場和地獄的字彙，在這裡都不能反映出牠真實的內容。長春蔣匪們「殺民養軍」的殘忍手段，從八里堡這一實驗場看來，已超過了古今中外任何屠殺人民的惡魔。
>
> 八里堡是一個有市集的大村莊，實際上離長春不足五里。今年6月，當我軍解放了長春近郊的時候，八里堡便處在我軍陣地

的前沿。我軍的火力控制了村莊的大部分，而在村莊的另一端即滿布著敵人的地堡工事，基本上仍然是敵人的據點。

為了徹底瞭解八里堡人民的災難，8月下旬，在武裝部隊的掩護下，我走進了這個人間地獄。那時候，正是炎熱的中午，一進村子劈面就傳來一股濃重的屍體腐爛的臭味，村莊的四外全無一棵莊稼，一片高高的荒草，幾乎掩蓋了所有的房屋和街道，沿路所看到的到處是破爛的門窗，頹倒的牆垣，滿街都是由於人們吃青草而拉出來的類似驢糞一樣的黑青的屎堆。偶而遇見一兩個行人，那形象會使人感到一種説不出的可怕，他們的腿全部浮腫著，走起路來像戴著腳鐐一樣，蹣蹣跚跚地拄著棍子，光著身子的骨架上，頂著一個面黃肌瘦的臉孔，滿頭長長的蓬亂的頭髮幾乎遮著了一切。當他們看見我們走進來的時候，似乎已沒有一點力氣説話，只用兩雙無神的大眼睛瞧了我們一下，就默默地走過去了。

我繼續往前走進去，在一個胡同跟前，開始發現了兩具滿叮著蒼蠅的孩子的死屍。迎面有一個推著兩條死屍的車子走過來。不久，從另外一個方向，接著又抬過來兩個。這些死者並沒有人送葬，死人，抬人，埋人，在這裡好像已經成了極其平常的現象，對此，沒有人再會流淚，也沒有人悲號，大家似乎都在默默地等待著，遲早總有那麼一天，自己也會像別人一樣悄悄地躺倒在路旁。——死亡的寂靜，正威嚴地統治著人們。

惟一有點活氣，有點聲音的地方，是菜市週圍。那裡過去曾是八里堡市集的中心，是一個最熱鬧的地帶，但是當我走進這個方圓不到百米的市集以後，看到的仍然是滿目淒涼，那裡雖然仍在進行著買賣，但大多數是破破爛爛。其中最好的商品是駱駝牌紙煙，最多的則是草籽、灰菜，偶而有人賣一小包糧食，或者三、五個黑色的餅子，那簡直比金子還貴。而且一不留心，還有被搶的危險。在這裡做買賣的人全都帶著木棍，開始我們奇怪，後來才知道這是防衛自己的武器。

在菜市的旁邊，一片粉白的牆上，我看見正貼著一張奇怪的黃紙，前面擺著香案，陳列著香爐、黃表等物。當我走過去企圖仔細看看是甚麼神靈的時候，四、五個饑民同時走到那裡來。他們詳細地看看我之後，便焦急地問我：「解放軍甚麼時候來救救我們呵？」其中一人立即跪倒在香案面前磕頭禱告。據他們説，

每天在這個香案面前磕頭求解放軍快來的人，實在太多了。這張黃紙所敬的是菩薩，實際上是人民解放軍。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一同向我跪下來，哀求著說：「同志，來救命呀，我們四個孩子統統餓死了，解放軍再不來，我們就得死完。」那種淒慘的語調，我簡直不忍聽下去。只好勉強地安慰著他們，沖出他們的包圍。

從菜市再向裡走去，路旁經過一個很大的席棚，我好奇的揭開席角，出我意料之外的裡面卻滿滿地堆著屍體，一大堆蒼蠅隨著刺鼻的腐臭猛烈地撲來，使我連忙向後倒退了幾步，趕緊離開了那裡。但是愈往前走，愈是屍體縱橫的地帶，爬著的，仰著的，各種各樣的姿態，實在慘不忍睹。看樣子，人們餓倒在哪裡，哪裡便成了他永遠的墓地，沒有人還有力量能把他移開。我默默地數了一下，僅僅擺在我面前的死屍，一共七條，左面三個，右面四個，其中人多是婦女和小孩，他們慘白的浮腫的面孔，使我簡直不敢觀看。但那有甚麼辦法呢，到處都是這樣的面孔，這樣的餓殍，在死亡的巢穴裡，你又能說些甚麼呢？

不久，當我再向前走上幾步抬起頭來的時候，一個更加悲慘的景象，又出現在我的面前。沿著街道的兩旁，我看見正有五、六個死屍懸掛在牆上，這些可憐的饑餓者統統是把一根木橛釘在牆上，然後綁上自己的褲帶吊死的。在他們的屍身下面，高高的墊腳石，還東倒西歪地擺在那裡……

我再也不忍前進了，這些悲慘的事實，像一個沉重的鐵錘一樣，把我完全打昏了。在一家比較整齊的房前，我開始停下來坐著休息。想不到房主人，一個衰老的誠樸的農民，在和我談了幾句簡單的問話後，又把我拉進一家破爛的房子裡去。這是一間普通的農民房屋，裡面很暗。我看見有幾個人正躺在炕上，老人把我帶到他們跟前後，便默默地指給我看，原來這些人已經大部腐爛在炕上了，一群群乳白的蛆蟲，正從屍身上慢慢地向著被子上面蠕動。其中有一個婦女，似乎還有呼吸，眼睛也還在轉動，但是由於無法動彈，也只有在她的家族旁邊慢慢地腐爛下去。這是怎樣的情景啊！而這樣類似的事實，據老人說在八里堡是不算稀奇的。

然而，悲慘的事實還不僅如此，再轉回去的路上，我又發現了八里堡人吃人的慘劇。一個老鄉拿著一片人肉到我跟前來。開

始我不知道那是人肉，只覺得這塊肉很薄很細。而且肉皮經過煮熟後漲起很高。後來他領我去看了幾個被割去大腿肉的屍身，說明了人肉買賣正在八里堡秘密進行著。據他說，每斤人肉賣價250萬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種。許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夠了，這些罕世少有的慘狀，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是蔣衛匪軍「殺民養軍」政策下大肆搶劫的結果，也是匪軍騎兵第一支隊以八里堡為「搶食區」所留下的人造災難。然而，八里堡苦難人民的呼喊沒有白費，隨著這一呼喚，現在的八里堡，正在人民解放軍及民主政府的大力救濟中，一萬以上的災民已脫離了這個死亡的巢穴，而在我軍陣地就近的萬千不能行動的災民，也每人每日得到四兩糧食的救濟。八里堡復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今天是林彪等將領電令各圍城部隊必須將卡子內自願到共軍統治區的難民們放完的第十天，也是最後的期限。但是，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一個7歲的小女孩將親眼見證那一幕又一幕令人驚駭的殘酷場景。在洪熙街卡子的空白地帶，遠藤譽在清晨醒來，她對自己看到的一幕大吃一驚：

在頭的上面，從地面伸出人的手腕。我慌張地站起來時，受到迎面而來一望無際的難民群的衝擊，像野獸那樣閃耀的光、惡狠狠的臉、發呆的眼神、奄奄一息地喘著氣的人……那黑壓壓的人群延續得很遠很遠。到底用甚麼辦法集合了這麼多人？填補人群的空間是餓死的屍體，我害怕得蹲下來。

被褥的下面有甚麼太硬的東西？母親把褥子翻開一看，發現一個頭蓋骨沒有壓進土裡；左側是整體地蓋著被，永遠醒不過來的人，這個人已經死去了；在那邊有一個男人，只是凝視著一個點，一心一意地咀嚼著東西，那就是皮帶；在我們的左、右邊排列著混凝土裡嵌著磚頭的破牆，在那旁邊有一棵樹，樹皮被全部剝光，露出了白木質。在樹下，有的難民把樹皮含在嘴裡吸吮。

「爸爸，這兒是哪裡呀？」

「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中間地帶。卡子好像有雙重柵欄，在那邊的是解放軍的出口。」

向著那方向看去，右側鐵路沿線有和昨天傍晚越過一樣的鐵絲網欄，在柵欄那裡，有大型柵門，這可能是去往解放區的出口，柵門（卡口）被嚴密地鎖著。

「爸爸，那個門不開嗎？」

「不會開門的。」

突然右鄰的人說話了，是中年的日本女子。「那個門是一周開一次，甚至一個月才開一次。四、五天前才剛開過，那時，我正好上那邊的鐵路旁去挖野菜。」

中年女子用手指向右邊，看到不高的山崗。「結果不巧，我可能吃了毒草，是帶刺的已經結種子的草，不一會兒昏迷了。正在這個時候，門開了，我急忙跑去，已經來不及了。」

說起來，這附近連一根草都沒有，據說順著鐵路一直向右邊走就長著一些草。當然，鐵絲網那邊的解放區是野草叢生的，可是把手伸出鐵絲網外的人是要被八路軍射擊的。

隨著太陽升高，遠藤譽覺得嗓子乾渴，但是水壺裡沒有一滴水了。她發現在倒塌的牆後面有一口水井，這口水井可能就是已經離開了卡子的沙秀傑一家人喝過的那口水井。在水井那兒，已經有很多難民在排著長隊等候打水。

戰敗國的日本人，連排隊都不讓。剛才，母親和大姊一塊提著鐵水壺去，可是一看她們穿的裙褲，就知道是日本人，（排隊的難民）就破口大罵，被攆回來了。這樣，沒有辦法，（只有）把窪貯的可能是雨水凹坑裡，不知道是不是雨水，把最上面比較清澄的一層撈出來，移到鍋裡，用床單、揀來的枯枝，點上火燒開，做成極其寶貴的飲用水。一點一點地舔。（……）實際上，這些水是貯於屍體和屍體之間的。

坐在遠藤譽一家人右邊的那位中年女子說，在那口水井裡，已經有好幾個人掉進去了。「因為都沒有力量，從井裡打水到半途，吊水桶往回下，人被水的重量拽下去。因為費很大的勁得到的水，不想撒手而掉下去。還有在井邊彎腰拽吊水桶時，被後面的人給推下去的。（……）」

突然，遠藤譽聽到右方傳來了一陣槍聲。她看見有幾個難民一邊

叫喊著一邊朝她所在的方向奔跑。她隨後看到過來的難民有的頭上流著血，有的腳部被打傷，其中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胸口滲出血。她懷疑這些負傷的難民是國共兩軍隔著鐵絲網對戰造成的。

> 槍聲一響，卡子內變成了可怕的寂靜，大家都屏息注視著八路軍的動向。三個端著槍炮的朝鮮人八路軍，從八路軍的卡口往柵欄內進來了。（......）在難民之間來回徘徊巡視。父親和母親似乎想要把孩子從槍口保護起來，悄悄地用雙臂圍住了我們。（......）略看了一遍難民之後，八路軍就消失在卡口之外，看清楚之後，大家都喘了一口氣，心情放鬆下來。
>
> 「這種對戰是常有的，那邊是八路軍的鐵絲網和國民黨軍隊的鐵絲網之間距離最狹窄的地方。」等待到說話的機會似的，中年女子就悄悄地用下巴指出鐵路線的方向。

在這番緊張氣氛過後，難民們都在想著弄點甚麼來吃。遠藤譽的母親把高粱米麵拿出來，給每個人的手掌心分了一點，大家都仔細地舔著下肚了。現在，遠藤譽迫不及待地想做一件事情。

> 我心裡有個難言之隱，說實話就是想解手。從早晨醒來就一直憋著，雖然是個小孩，但已是 7 歲的女孩子了，不願在旁人看見的地方脫下裙褲。離開被褥的上面是害怕的，拖住母親幫我給看著，然後，躲著死者到左側的殘牆旁邊。這面牆和下一面牆的空隙較窄，恰好沒有人。我到屍體少的地方蹲下時，有甚麼硬得東西碰了一下屁股，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一個由地面露出的像枯枝那樣的死人的手指。
>
> 急忙向前移動了一下。可是那裡有圓睜的眼睛瞪著我。這可能是小便洗掉了土，淺埋的屍體的臉露出了地面。可能被埋的時間不長，臉上還帶著肉，皮膚敷上濕土，滿是皺紋。在皺紋的褶紋中，睜開的眼睛以及嘴裡都堵滿了土。
>
> 湧上的血退下來，心口感覺難受，想要嘔吐。皮膚表面颼颼發冷，冒出冷汗，從鼻尖掉下。（......）我扶著殘牆，用無力的、顫抖的手支撐身體，費好大勁才站起來。正好和我胸高一樣的殘牆。我把身體靠在牆上，暫時閉上眼，等著變暗的眼前恢復過來。嘴唇顫抖，冷汗濕額，始終沒有停。

好不容易睜開了眼睛。這個瞬間，我嚇得倒抽了一口氣：一個女子在我眼前倒下，在那女子的胸上，有一個吃奶的孩子滿臉是血，用小舌頭舔著該女子胸脯流出的血。她可能就是剛才兩軍對戰時被擊傷的女子。從胸脯流出溫暖的血，這個吃奶的孩子，可能誤認為從乳頭流出的是母親的奶汁。

我想馬上離開這。為了把靠牆的身體離開，我再次在手腕上使勁。這時，有一件東西把我的視線固定住了：那是在牆圍的旮旯，有一個男子在不聲不響地啃著人骨頭，眼珠注視著倒下的女子，一心一意地啃著骨頭，又長又大的骨頭。他穿著綻線到肩的破爛黑衣服，坐著的膝蓋以下都是赤裸的，也沒穿鞋，長髮和鬍子鑲邊的臉上油光光的，有雙好像吃過嬰兒的那個波奇一樣的眼睛。

如果男子的視線轉向我，我就會被這個男子吃掉，這種想法像閃電般地穿過我的身體。於是，我便像被推出去似的離開了牆。雖然躲著屍體走著，但我現在踩著地下的屍體，這麼一想就怕我的腳踩在地面上。

等遠藤譽戰戰兢兢地回到家人身邊時，她又吃驚地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情：這兒突然又多了一些人。

這是怎麼啦？那邊的地面、這邊的地面，有黑色的東西鼓脹起來！這是一直橫躺著的人站起來的。每人手裡拿著枯枝、短棍等，喊著「嗚哦」的粗聲，很快地把新來的難民包圍了。吼聲變成尖銳嘈雜的一瞬間，黑色人群像武士退兵似的，返回原來的位置。像甚麼事也沒發生過那樣的寂靜之後，穿戴全被扒下的新來的難民呆呆地站立不動。倒下的人，也有穿裙褲的日本人。

迅速返回到原來位置的黑色人群，已經開始狼吞虎嚥地吃著剛才奪得的食物。有一個男子用兩手抓取食物後，把一手的食物迅速送到嘴裡，還想最快地返回自己的位置，這可能是他想把另一隻手的食物，帶回去給家人吃。可是周圍的難民，可能已經發覺了這個男子另一隻手裡的食物。難民們從男子的後面追上去。男子為了不讓他們奪去食物，而急忙把另一隻手放在嘴裡，但這時已經被他們圍住了。有人啃著可能是從日本人手裡奪來的遺骨，把嘴周圍搞得雪白，把骨灰盒的灰用手抓著舔。

父親進入卡子時，把小高司的遺骨箱子用白布包好，掛在脖

子上。如果我們萬一遭到這樣的掠奪，小高司的骨灰也會被那樣地給吃掉？我也有可能被那些短棍亂打死，或雖未被打死，也可能被踩死了。

「爸爸，我們至少沒有遭到那種暴行，算是得救了。」母親驚恐萬狀地說。

「真是不可思議啊！」

右鄰的中年女子又插嘴了。「那種掠奪每天都有，而且是幾次。為甚麼只有你們沒有遭到掠奪，我也覺得奇怪。也許是與平時行善有關吧。」

「爸爸，我認為是爸爸在保護我們。」

「不，這可能是神保護我們，也許是萬代三當了替身。」

「你們盡說廢話啊！」從中年女子的那邊，粗嗓子的男音開始說話。這個男子是一個鬍子長得亂蓬蓬、高顴骨的人，他向這邊回頭看，眼神可怕，有可能是把日本人安放在一塊，這個男人也是日本人。

「早晚，你們也會被變成掠奪幫的，而且不只是掠奪，馬上就有好戲看。」男子「嘿嘿——」一笑令人不快。這時，這個男子將身體轉過去。中年女子小聲說，這個男子也是差點未能出卡子的一個。

馬上就有好戲看……這話令人不寒而慄。我想起那個殘牆內腐爛男屍的眼球，那個腐骨……

（……）有人把倒下的人拖走，處處有難民的圈子。一個挨著一個，排成黑色的背，把所有的光景遮起來，一點也看不見在圈子裡究竟發生了甚麼。這裡一條，那裡又有一條，一股灰煙向天空升去。那個男人用明白是怎麼回事的眼神往這邊看了看。

枯萎了的高粱葉隨風沙沙響著。

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不斷地凝視著共軍鐵絲網旁的柵門。只要出了那個柵門，就會吃上飽飯了。他拿出「莫逆之交」林楓給他的布條。林楓在臨別時指著布條對他說：「如果到解放區有甚麼苦難時，把這名字給他們看一看，他們肯定會幫助你的。」大久保要將這個布條給朝鮮共軍看，以此來交涉放行他帶領的一行九十人出卡子的事情。但是，朝鮮共軍士兵看過布條後，根本沒有理會他。「可能因為他們是朝鮮人，」遠藤譽後來寫道，「所以不知道林楓的大名和權威。」

遠藤譽看著父親失望地返回來。此時，夕陽已經傾斜，而且逐漸鮮紅起來了。遠藤譽看到「染上通紅夕陽的屍體皮膚下，好像有紅色血液正在流淌」。

秋天的太陽，說掉進黑暗裡就掉進黑暗裡去了。夕陽在山崗落下後，很快天空就由明變暗，黑暗馬上降臨到卡子上了。在冷颼颼的秋風裡，大久保和他的妻子將孩子們緊緊攬在臂彎中。抱著父親的遠藤譽，凝神傾聽著黑暗中任何細微的聲響。現在，她莫名地害怕土地下的死屍和土地上的活人。

突然間，她聽到有一種呻吟聲傳入耳裡。「那聲音痛苦得從四面八方彙集起來，形成共鳴，然後變成波動，哇啊哇啊地振動著卡子。」

> 這個時候，父親的身子微微動了一下。
>
> 「哎呀！」我緊緊地抱住父親，我在想，可能是被褥下的死屍在活動，血在倒流。
>
> 「沒事，沒事……這是沒能被拯救的靈魂的聲音，我們一塊祈禱吧！哎，好孩子，把手放開，爸爸有事，要去一趟。」
>
> 「不！不……不……」我的聲音抽搐著。出生以來，從沒有執拗過父親的我，這次激烈地對抗著父親，父親沒有辦法，只好任憑我的任性。我緊緊抱著父親的手臂，跟父親站起來了。
>
> 從我們睡覺的地方往柵欄內方向走，再向左拐，就見著還沒有完成、倒塌的兩層樓房的牆。父親在那廢墟和解放區一側柵欄內間向左方走去。
>
> 在薄暗之處看到蒼白的山，大地的振動逐漸增大。不可言狀的排斥力，充滿山和我之間的空間。山變大了，又逼近了，排斥力猛烈增加。最後，在山前爆發。
>
> 那是——需要仰望，才看得見的屍體之山。
>
> 解放區一側的照明和月光，清清楚楚地浮現出一具具的屍體。

大久保跪在地上，聲嘶力竭地為這些亡靈祈禱。站在父親身旁的遠藤譽，聽到父親的祈禱聲蓋過了那些痛苦的呻吟聲。

> 「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吧……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吧……」筋疲力竭的父親跪在屍體堆旁，兩手著地，哆嗦著肩膀哭泣。垂到肩膀的父親的白髮，映著月光，泛著亮光。未能辦完此世的事而發

出呻吟聲的屍體，停止了蠕動。是否是父親的祈禱，真的解脫了未被解脫的靈魂呢？卡子恢復了寂靜。[1]

1948・9・22

新華社東北總分社前線電稱，在18日和19日，長春被圍之敵近百人及家屬，「又兩起集體投誠」。

廣州《中正日報》自北平特電：「據由長春逃出抵平某人士談：長春饑餓情形，絕非外界所能想像，市民多食野菜中毒，全身浮腫，體力不支，隨時倒斃街頭。市府成立屍骨掩埋委會，收埋街頭棄屍，觸耳皆聞呼爹叫媽之聲，慘絕人寰。吉林建設廳長于鎮藩，在街頭親自研土為食，貧民生活可知。建設廳會計主任王祝堯，無法生活，8月9日，擬突圍南逃求生，在雙方真空帶，與難民數萬人，被圍困餓死。此間人士接長春友人來電稱：高粱米每斤價流通券3000萬元。長春百姓，已成未來之孤魂餓鬼。」

在長春城內，國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召見暫編第二十一師師長隴耀等高級將領，認真考慮共軍提出的要第六十軍反蔣起義的忠告。

在長春城外，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對滯留在空白地帶的難民實行分批放行救濟。第一兵團政治部在《圍困長春綜合報告》中稱：「一個卡哨每天放2000人，進行檢查登記後，安排到附近村莊。地方政府設立幾十個救濟站，給難民熬稀飯吃。」[1]

在洪熙街卡子的空白地帶，遠藤譽在清晨醒來，這一天讓她無法忘記的，不再是饑餓的難民和餓殍，而是兩名朝鮮共軍士兵對餓殍的漠視：

> 兩名八路軍士兵從大柵欄門旁的小門進來。用像耙子的東西，開始把地上的屍體耙在一起。可能是要堆在昨天的那個死屍堆上，八路兵好像掃院子似地，悠然自得地拉著屍體。

遠藤譽看到同行的一位日本人跑到朝鮮共軍士兵面前說了些甚麼。一會兒，這位日本人帶著一副高興的神情跑過來，對她的父親大久保說，出卡子的許可批下來了。這位日本人抱歉地說，他給朝鮮共軍士兵看了自己的身份證明，就允許他出卡子了。

在離開長春前，為了達到機會均等的目的，大家達成一致諒解：不帶身份證等證明。所以，帶來身份證，就是違反大家達成的諒解。被留下的日本人，紛紛責難要出卡子的這一位和他的十幾名家族親人。

東野問他的叔叔大久保，是否也帶著可以證明身份的檔。大久保沉默不語。他身上帶著吉福德祿專利證明書。他視這份專利證明書勝過自己的生命。

父親從懷裡取出一張長春市長證明離開長春的『新京製藥』關係者一行名字的證明書。這是在父親找長春市長告別時，市長寫下的解除父親為吉林省衛生材料廠技師長留用的證明書。市長親自做了署名，在父親的名字上還寫著『新京製藥』社長的頭銜。這可能在說明已解除了留用之約，所以恢復父親原本的身份。

此時的大久保，在昨夜的祈禱後，已經疲倦得站不起來了。東野乞求叔叔讓他拿著專利證明書去跟朝鮮共軍交涉出卡子的事情。大久保在眾人的請求下出任團長，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不願意帶著家人而拋下其他日本人離開卡子。但他的妻子請求他考慮考慮對孩子們的責任，因為他是孩子們的父親。在妻子和東野的再三哀求下，大久保亮出了自己的腹部，他是把日本、英國、滿洲國三國的吉福德祿專利證明書，用細長布帶包好後直接紮在肚子上的。東野從大久保手裡揪走專利證明書口袋和長春市市長證明書，向柵門跑去。

「喂，稍等一下！」父親叫住白耗子。「聽著，你能不能以這份證明書要求全部日本人都被放出，希望好好做一次交涉，能做到嗎？」

「好啦，叔叔，那麼說 …… 可以試試看。」

「好呀，全都拜託你啦！」

東野飛快跑向卡口。沒過多久，東野邁著輕快的腳步跑回來了，告訴大久保說，有可能會出卡子了。大久保問，是全體日本人都能出去嗎？東野說，那可能很困難，不過已將專利證明書交給他們去審查了。大久保擔心專利證明書再也回不來了。

> 「哎呀，叔叔，請您相信我吧。他們明確說：『新京製藥』的人可以考慮。他們要把專利證明書和市長的證明書保管一個晚上，所以我交給他們了，他們要審查研究。」[2]

爬卡子

在兩軍對峙地帶的難民們生不如死。一名報紙記者見證了某些瞬間：

在一棵樹下，本來有十幾個男女老少在那兒避雨。一夜之後，天亮時，只剩下三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吃奶的嬰兒還活著，其他人都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洪熙街卡哨外的真空地帶，有一口瀕於枯竭的水井，這成了逃亡求生者的唯一水源。儘管井水已經很髒，人們還得仰仗牠來解決一點饑渴。一個男人到井邊打水，還沒等到把水弄到手，就暈倒在井臺上，再也沒起來。

我有個同學，那時他在長春大學教書，因為不忍心年邁的老母在卡哨內受活罪，決心爬出卡哨把老母送到瀋陽的姐姐家去。於是他崩了半麵袋黃豆，還帶了兩個暖水瓶，實指望能夠在真空地帶耐上一個星期就可以通過警戒線進入解放區，不料一直等了半個月，也未能如願。眼看要餓死了，幸虧一個老同學看到他，分給他不到 10 斤小米。他就用這點小米每天給老母親煮點粥喝，好歹算對付到解放軍卡哨前來放人，這才免於一死。

有的母親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孩子由於病餓而死去，想哭也哭不出眼淚來，只是顫抖著蒼白乾癟的嘴唇昏倒在地。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死後還那樣戀戀不捨地噙著他母親的乳頭不肯放鬆，原來他母親也差不多與他同時昏死過去。還有個連餓帶病的老年人，由於痛苦難忍，竟然和他的兒子和兒媳商量「快點將他致死」。

又有誰能想像得到，就在這垂死掙扎的活地獄裡，也還有投機取巧和強盜之類出現。有那麼一對年輕夫婦，已經在卡哨外蹲了 10 天，帶的東西都吃光了。男的正患著浮腫已經站立不起來了。女的平時算是個窈窕淑女，現在變得黑瘦，兩隻大眼睛，一條小細脖。當時他倆身邊唯一的財產，就是一支訂婚戒指還戴在女的手上，她為了解救丈夫，把戒指捋下來，去向死人堆裡的投機販子換到一個拳頭大小的窩窩頭。就是這樣一個用黃

金換到手的小得可憐的窩窩頭，還沒等吃到嘴，就被一個餓得發瘋的年輕人搶去了一大半。有的人餓急了，還到處去找蚱蜢和昆蟲之類燒著吃，可在這種地方連昆蟲也絕跡了。[1]

在長春城內， 時年 24 歲的理髮匠于連潤，後來回憶起遭到圍困一幕時，總會想起自己被餓死的孩子，還會想起在二道路被遺棄的孩子，「一場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那時，他就時常尋思：「你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仇，咱老百姓招誰惹誰了，要遭這種大難？可尋思這個有甚麼用，誰把咱草民百姓的命當命了？」

煎熬到 8 月份，他決定爬卡子去逃命。他的一家人在空白地帶呆了十多天才被允許進入共軍統治區。

人們捋樹葉子吃，成牲口了，樹沒皮沒葉，草剩個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綠了，人都吃綠了。一家，一堆，擠擠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裡，大部在露天地呆著，鍋呀，盆呀，車子，被子，活人，死人，到處都是。

8 月，正是最熱的時候，日頭那個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場窩雞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麼放著爛著，骨頭白花花的，有的還枕個枕頭，骨架子一點兒不亂。（……）

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沒有，能說話時，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一聲聲都像是「餓呀」、「餓呀」。沒聲了，眼睛有時還睜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麼表情也沒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睜了，還喘氣兒，像睡著了，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燈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還像笑模悠悠的，更嚇人。趕上毒日頭，那人一天功夫就發起來了。腦袋有鬥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發，先綠後黑。一會兒「啪」的一聲，又悶又響，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響，夜靜聽得最清。這一聲，那一聲，有的就在身邊響，鼻子早就聞不出甚麼了，可那一聲響過後還是受不了，沒聞過的想像不出那味兒。

在「卡空」裡熬過十天的人不多。老天爺照應，那幾個大

餅子過卡子沒翻去，「胡子」也沒搶去。不能讓誰看見，天黑時偷偷掰點吃：這麼對付有十天，又吃兩天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

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往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一塊兒來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準備讓人聽個響臭塊地了。後來發了個救命的「難民證」。這個謝天謝地呀，出去沒幾天又回來了——長春解放了。[2]

在長春市平治街的一處平房子裡，生活著英子的爹娘與三個姐姐。我們無法得知英子的具體年齡，他的家人在爬卡子時，他還沒有出生，他似乎是從父母親和姐姐們那兒聽來的爬卡子的往事。他在五十六年後寫下的文章裡稱，大姐 15 歲，二姐 8 歲，三姐 3 歲。他家的房子對面是市立醫院。他的爹娘開了一家小飯館來謀生。由於過往的行人很多，生意做得紅紅火火。

當圍困長春城的共軍與國軍進行槍戰時，他家的飯館曾經為住在市立醫院的國軍傷兵做吃的。後來，他的爹爹去米市買米時，米價一天高上一天。最後一次買米時，他的爹爹是用小車子推著一麻袋紙幣去，只買回 20 多斤米。城裡的存糧比黃金還貴時，飯館無法撐下去了，只好關門。

街頭開始佈滿餓殍。

他的家裡除了一些黃豆外，再沒有其它糧食。黃豆炒了乾吃，再喝些涼水，肚子就會有飽脹的感覺。眼看炒黃豆也快吃不上的時候，他的爹爹看看自己身邊的三個孩子，把幾件衣服卷了卷，長歎一聲說：「往外跑吧！跑出去興許有條活路！」

爹領著一家向東走，出了伊通河邊國民黨的哨卡，過了南關大橋，進入了伊通河對岸。再往前走就是八路軍的哨卡了。八

路軍在城邊圍起滴水不露的哨卡，要通過這道關，還要看你的運氣如何。

八路軍用鐵絲網圈成的哨卡處，只留下一個窄窄的出口，出口處設有重兵把守。鐵絲網外面還挖了2米多深的壕溝，灌滿水。壕溝外面還有密佈的雷區，誰也休想從這裡沖出去。

一群又一群饑餓的老百姓湧到這裡來，距出口10米遠的地方就被哨兵們攔住，蹲在寒光閃閃的刺刀面前伸長脖子等，沒有人敢靠得更近些。

餓得不成個人形的老百姓們蹲在野地裡，是等著八路軍的路條。

一個小個子當官模樣的人出來了，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個本子在人群裡晃來晃去。他管發放路條，人們見了他，眼裡放出光來。皮包骨頭的人向他伸出了期待的手，乞求能拿到路條快快出城去。軍官認真打量著每一個人，走到一個兩腮塌陷、眼窩老深的婦女面前，軍官就在本子上寫下幾個字，遞給那瘦弱的婦女。婦女撐了幾撐身體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一步一挪往哨卡走去。

路條只發給城裡出來的真正窮苦人，判斷是不是窮人的唯一標準就是餓得瘦不瘦。誰餓得精精瘦，牙呲出老長，誰就可以拿到出城的路條子逃出鬼門關。

娘也餓得精瘦，又帶著三個精瘦的孩子，軍官圍著娘前前後後看了兩遍，才撕了張路條給娘。娘欣喜若狂，爬起來拍拍屁股上的土，忙領著孩子往外走。哪知剛走出兩步，就聽身後那軍官喊了一聲：「你留下！」

軍官是讓爹留下，爹生來就胖，再加上是開飯館的，自然比別人家油水多些，臉還胖胖得有些肉，不像個受苦的人。

「你留下！」軍官指著爹，冷峻地說。

「俺們是一家呀！長官！」「一家也不行，他得留下！」軍官鐵面無私。

爹百般求告只是無用，就摸摸三個孩子的頭說：「你帶著孩子們先出去吧！我再等幾天，活一口算一口！」爹轉身就往裡面走。

「不！」娘在後面大喊著追爹。「我帶著三個孩子，出了城也不知道往哪裡去，還不是一樣餓死？要走咱一起走，要留咱們一起留！」瘦弱的娘頭髮被風吹得很亂，淚流滿面，娘的樣子淒涼哀傷。

爹的淚也流了下來，他抹了抹臉，回身抱起三姐，說：「回吧！」

爹娘帶了孩子們往回走著，哪知再走到南關大橋時，被伊通河東岸的國民黨軍的哨卡攔住了。我家住在平治街，要過了國民黨的哨卡才能回家，可這裡的哨兵說甚麼也不讓爹娘過去。「只要過了這個哨卡就別想再回來！」哨兵的槍栓拉得嘩嘩響，明晃晃的刺刀離爹的鼻子就半寸遠。

這時城中已無存糧，國民黨兵把老百姓千方百計地往外趕，怕老百姓消耗城裡的糧食。而八路軍的策略正相反。

全家五口人，進不得退不得地夾在國共兩道防線之間，到處都是明晃晃的刺刀和無情的喝斥，爹無路可行。天黑了，爹說：「家也回不去了，先找個地方住下再說吧！」

爹有個老鄉住在這一帶，爹就去投奔了他。爹的朋友姓徐，老徐一家也出不了城，窩在家裡天天嚼著炒黃豆。見爹來了，老徐就把爹娘安排在西廂房裡，說不要房錢。其實，這時城裡的人都不再關心錢的事，有了錢也派不上一點用場。

爹住下後，天天到八路軍的哨卡處等路條，爹還有一些黃豆吃，不見瘦，路條就落不到爹的手裡，爹一天天空手而回。一個月後爹帶的那些炒黃豆也一粒粒數著吃完了，再住下去，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條。這時徐家又來了個逃難的人，是一個精瘦男孩，老徐的親外甥，只剩下一口氣，老徐就讓他和我爹娘一起住在西廂房裡，我爹娘住在大炕上，瘦男孩鋪一張破席，睡在地上。

男孩雖住在徐家，老徐並不管他飯吃。老徐家殺了一匹馬，天天煮了馬肉給自己家人吃，肉香飄得很遠。男孩已餓得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他聞到香味，爬到老徐的籬笆牆外，伸出一隻細麻杆樣的胳膊，舉著一個小木碗，用盡全身的力氣對老徐說：「舅！給我一口，就一口……」說著說著已癱在地上。老

徐冷冷地看了自己的親外甥一眼：「給你，我吃甚麼！」啪地一聲關緊房門。

男孩手一松，小木碗骨碌碌落在老徐的院子裡。他又爬到西廂房，一路啃了滿嘴的土。男孩爬到屋裡，不一會兒就死了，死在他那張破席子上。爹娘和姐姐們看著他嚥了氣了，也沒有力氣往外抬，就讓那死孩子一天天在地上躺著，老徐也沒來看過。

黃豆吃完後，爹已沒有辦法可想。這時，聽人說伊通河裡有一處河床草深，有人曾從那裡偷偷爬出去過。爹就動起了偷爬卡子的主意：「咱們就偷著往外爬吧！興許還真能出去呢！」

爹當天去看了地形，回來對娘說：「明天！咱一家人都去爬卡子！」

第二天，爹和娘給三個姐姐囑咐了老多的話，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爹像個領路的將軍，帶著一家人上了路。爹先看好了路，有處河灘草深，就帶著一家人順河床往那邊走。路上有一個抱著孩子的年青婦女跟了過來，說啥也要跟爹一起走。爹在前面帶著路，一家人就奔了那河灘。

伊通河高岸上到處都有重兵把守。八路軍在城外設下三道崗，用二姐的話說，就像納鞋底那樣一個個插空站著，密密麻麻整三層，別說過人，就是草棵子裡蹦出隻螞蚱，崗哨都看得清清楚楚。餓昏了頭的爹，卻帶著他的老婆孩子想從這裡突圍出去，爹的想法夠大膽的。

天黑了，爹指指前面的草灘悄悄地對娘說：「就從這爬吧！手腳麻利些，爬過去一個算一個！」

爹爬進草叢，才發現草叢裡一個接一個的死屍，橫躺豎臥，都是沒爬過去餓死在草裡或被打死在草裡的人，看來和爹想到一塊去的人還真不少。死屍發著沖天臭氣，爹和娘甚麼也顧不得了，從一個個死屍身上爬過去，緊張得連呼吸都快停止了。

突然，跟在爹娘身後的婦女一下子絆在死屍身上，懷裡的孩子嚇得大哭起來。哭聲一起，就聽到河岸有人高聲喊：「誰！快出來！」喊聲未落，一梭子子彈已從爹的頭上掠過。

8歲的二姐原是趴著的，聽到槍響，兩眼直勾勾的，一下子從草叢裡站了起來，只聽到「滋溜——！」一聲尖叫，一道滾

燙的東西貼著二姐的頭皮飛過，爹狠狠一把按倒了二姐。過後才看到，子彈貼著二姐的頭皮，把二姐的頭發燒焦了一道溝。

那年青婦女被槍聲嚇得慌了神，一把捂住孩子的嘴，猛地把孩子的頭按進河水裡。槍聲還在熱熱鬧鬧地響著，孩子卻沒有丁點聲音了。

可憐一個兩、三歲的男孩子，就這樣被他娘活活浸死了。

一陣槍響後，崗哨更盯牢這處河灘，草叢晃一晃，就有槍子飛過來。爹和娘在河裡趴了一夜，也沒有機會爬過去，看看天快亮了，爹揮揮手，全家人只好爬回去。

八路軍的三重崗哨真如銅牆鐵壁，每天都有抱著僥倖心理的人來這裡爬卡子，除了在河灘的草叢裡增添一些屍體外，沒有一個人走得出去。

爹和娘在河灘裡趴了三天三夜，夜夜擔驚受怕，夜夜失望而歸。三天裡，全家人已無一粒糧食吃，也無一夜安穩覺睡。緊張、勞累、饑餓，使爹這個胖人徹底變了樣子，兩腮塌成深坑，眼睛像個黑窟窿，牙也呲出老長，活脫脫一副活鬼的樣子。

娘喘著氣對爹說：「還是回去等路條吧，你都瘦成這樣了，估計人家也不會再難為你。」爹茫然地看著城邊的重重哨兵，看著迷蒙中城外的田野，沉重地點了點頭。

於是，半死不活的一家人拖拉著兩腿，就往八路軍的哨卡處走。已餓了幾天又熬過三夜，二姐和大姐完全垮了。她們順著樹一出溜坐下來，說啥也不肯走。爹已顧不了自己，可還得強忍著背起三姐。娘只好狠打大姐、二姐的腦袋，狠擰她們的胳膊，打疼了，二人才掙扎著往前走幾步。

這一路走著，幾乎到處都是死人，路邊的水溝裡，橫在路上的，還有倚在樹幹上的，有老有少。如果這些人再多喘一口氣，從八路軍的哨卡走出去，也許還能活下來，可他們沒走完這最後的一段路。

沿途的樹木個個都是光杆，被人剝了皮捋了葉子，白剎剎的枯骨一般。

從爬卡子的河灘走到八路軍的哨卡，一家人走了半天多。終於看到八路軍的哨卡了，爹已累得臉色臘黃，虛汗珠子一串串，

兩條腿抖成軟麵條。娘再也不能向前挪一步，大張著嘴喘了半天，對爹說：「你走，你帶孩子先走出去，我不行了！」說完，娘就要斜斜地往地上躺。

二姐嚇得尖叫起來，大姐掙扎著扶起娘。大姐、二姐看一路上的死人，都是這樣一躺下就嚥氣了，她們哭著一前一後拖起娘走，她們說啥也不叫娘躺下。

死拉活拽，娘和爹算是走到了八路軍的哨卡處。那裡仍然擠著一團團等待路條的難民們。天已經涼了，淒風苦雨之中，老遠就能聽到難民們發出的哀叫聲。

發路條處換了人，上次那個矮個子軍官不見了，換了個高個子軍官。英氣逼人的軍官看到爹已一副餓鬼相，二話沒說，給爹開了路條。爹接過路條時滿身抖得站不住，一手舉著路條，一手扶著背上的三姐就往外跑。說來也怪，只剩下一口氣的爹，竟然背著三姐跑出了哨卡而沒有昏死過去。

快死的娘也得了路條，領著大姐、二姐一步一挪出了哨卡。她們像是走完了一生的路，拼著全力邁過鬼門關，渾身都軟成了空口袋。[3]

在長春市二道河子，26歲的宋占林，家有十三口人，用他的話說是「父母，弟兄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他們兄弟四人身強力壯，他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但即使這樣，在長春遭到共軍圍困期間，十三口之家，其中四人死亡：父親被流彈打死，孩子全部餓死。他在四十五年後回憶道：

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麼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是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麼的，後來就那麼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

> 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十里、八里外都熏得頭痛。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是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趟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趟兒」），六口全死了。
>
> 舊曆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鐘，還「嘀嗒嘀嗒」走著。
>
>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條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4]

對宋占林來說，最令人揪心的是孩子，那些父母親將孩子遺棄街頭，是期盼有錢人揀走能有口飯吃活下去。他記得自己居住的二道河子這片最多，那些孩子大多5歲左右，在地上爬來爬去，啞著嗓子哭喊媽媽，喊不動了，就歪在那兒慢慢死了。悲慘的景象，使人們都不敢打那兒路過。

宋占林一家人是分四批走的。他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他是第二批，二哥和母親第三批。他的母親走時，大哥還在家守著。哥四個各奔他鄉。他們一家人認為：「怎麼也是個死，往外跑還能有點指望。」他出卡子折騰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他帶著老婆和孩子，從二道河子行走2.5公里到靠山屯，在天亮時被站哨的兒童團發現，十多個孩子問他要路條，他沒有路條，就被趕回來了；第二次，他想從卡子邊上爬過去，又給抓住了，幸虧帶著老婆和孩子，才沒被扣留下；第三次，他與老婆以及孩子在空白地帶轉悠了兩天，遇到在共軍卡哨當兵的小時的玩伴王來順進來偵察。當王來順得知他家的慘況時，蹲在地上直哭。後來，這名小時的玩伴給他指出了一條生路：「有命令，你們這片不放，明天放『馬車地號』（趕車拉腳的人）

的，你跟他們走。」於是，宋占林與他的老婆以及孩子，在空白地帶呆了三天，終於出了卡子。

船越美智子，28歲，是滯留在長春城內的日本人之一。根據遠藤譽在1984年出版的日文版《卡子》一書中所述，船越美智子計劃從長春東北部的東大橋往吉林省方向逃生，但她在尚未過完東大橋時就看到了佈滿鐵絲網的封鎖線，也有跟洪熙街卡子一樣的單方通行的柵欄門。

「距離東大橋不遠的叫做八里堡的地方，八路軍的步哨隔幾米站成一排，監視著難民。難民朝外踏出一步就射擊。」船越美智子後來告訴訪問她的遠藤譽說。「所以最終難民聚集在東大橋和八里堡之間的地方，餓死在那裡。」

遠藤譽在書中寫道：

> 東邊的卡子，是寬廣的草原，原來好像是地主居住的空房子還星星點點的。船越女士就在那裡遮風擋雨。有時候發生游擊戰，也有人負傷。船越女士在那裡食雜草，捕捉青蛙吃，有時候遇到迷路的野狗也抓住吃掉。吃了毒草身體砰砰地腫脹，就這樣死去的人也有。因此船越女士只吃不是毒草的艾蒿和水芹之類的，把剩下的春草全部採摘了吃掉。
>
> 也有從八路軍那裡得到種子的中國難民。把種子種在卡子的土裡做起農業，八路軍說：「你們也在這裡做農民吧。」對卡子裡馬上就快要餓死的人們來說，能等到種子發芽結出果實嗎？真是何等豁達的話啊。拿到種子的難民們，當場就把種子放在口裡吃了。
>
> 吃人肉的人也有。還有人賣人肉。中國人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都可以立馬開始做買賣。難民死去的有很多。把他們切了放在鍋裡煮，把指甲之類的都乾乾淨淨地除去，就說是驢肉賣出去。親自去做那樣的事雖然無法忍受，煮過的某種東西的話，不管牠是甚麼，就算是心裡明白，口上說是驢肉，知道眼睛看起來是其它東西也買了回去吃的人也是有的。

在東邊的卡子裡關了約一個月的船越女士，在某個夜晚，趁著夜色鑽了八路軍步哨兵的空子，闖過了八里堡的步哨線。背著還沒有過過生日的孩子。再走一會兒，就被八路軍攔住問道：「你是甚麼人。」一看那裡又站著把長春環狀包圍的八路軍的步哨兵。船越女士說，也就是說八路軍的包圍是幾層的，被問了是誰。

船越女士在這之後進入了難民收容所之類的地方。那裡收容了從卡子裡逃出來的難民，如果在解放區有身份保證人的話，就會成為自由之身、拿到通行證明書一樣的東西。找不到保證人的難民們再次被帶回到卡子裡。船越女士很幸運，在解放區吉林有認識的人，從收容所出去了。

固守東邊卡子的是中國人八路軍。[5]

1948・9・23

1948年9月23日，是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圍困長春的三個月的紀念日，以肖勁光、肖華、陳伯鈞（副司令員）、唐天際（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解沛然（參謀長）的名義，發給中央軍事委員會東北分會關於「三個月圍城軍事政治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分析了三個月中對長春軍事圍困、經濟封鎖、政治攻勢的優缺點。

在軍事圍困部分，這份報告中說，自從6月21日發出圍城命令，規定各部隊具體任務，根據各部隊先後報來的部署方案後，發現以下弱點：

> （1）與友鄰部隊參差不齊，存在漏洞。
>
> （2）於接合部上（主要是師與師間）配備偵察部隊或少數騎兵部隊非常薄弱，一突擊破。
>
> （3）一個師展開三個團的建制，形成團有縱深，師無縱深。
>
> （4）有的部隊則是僅僅營有縱深，師、團均無縱深，這就造成縱深與接合部薄弱，封鎖不嚴，分散與疲勞兵力之不利形勢。

對此，部隊在7月1日召集會議，進行調整部署，修正存在的弱點，使「封鎖較前大為嚴密」。

> 但在日期較長的圍困下，很多發生鬆懈及執行命令中打折扣的現象。如獨八師方面，自7月30日至8月2日，匪小股遊雜部隊四次偷越我封鎖線，前兩次均被乘隙偷過，經過檢討教育後，以後兩次則被我殲滅，主要經驗教訓如下：被敵兩次偷過原因，第一，部隊在長期圍困中麻痹鬆懈；第二，在部署上接合部注意不夠，不主動積極配合，不執行增加崗哨、加強火力的指示；第三，警戒部隊與機動部隊聯絡不密切，追擊時不積極、迅速、勇猛，怕傷亡，放走了敵人。

報告中說，在阻敵空運與擾敵空投方面，參加的炮兵，共為四個野柳炮連、三個高射連、兩個機炮連。依西部地區為重點，計三個野柳炮連、兩個高射連、一個機炮連；東部地區僅野炮、高射炮、機關炮各一個連的兵力，基本上控制了敵匪的飛機場，對匪空投也起了一

定的阻擾作用。但也有不少經驗和教訓：

（1）匪機航線變更及陸上火炮配合均較機動，我們炮兵（高射柳炮）火力機動與陣地機動均不能很好適應匪軍的變化。

（2）我炮兵陣地距離較遠，個別炮兵指揮員顧慮、猶豫甚至自由移動到友鄰戰鬥地境去，三、四天也不向上級報告聯絡。

（3）控制周圍31公里面積、42平方公里的城市，火炮數目還嫌少些。

（4）高射炮新裝備不久，機件多是拼湊起來，固定偏差未能求出，射手不熟，這也是原因之一。

在攻城準備方面，部隊採取戰術偵察，組織所有圍城部隊及炮司、偵測隊參加偵察：

各級司令部組織了各科參謀人員深入部隊幫助工作，經過了約42天的偵察時間，及將近半月的反復研究，整理彙編了長春匪情材料，在匪情掌握上至少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關於對大城市攻堅戰術偵察與整理經驗如下：

（1）群眾路線。長春戰役是在周邊作戰以後，匪軍龜縮市內，我軍團團包圍之下開始的。匪我雙方碉堡相對，聲息相聞，造成我多數部隊在寬大正面上與敵短兵相接之形勢；其次，匪軍孤立無援，士氣低落，反蔣厭戰，逃亡、投誠每日平均二百左右（70天達12000人）；再次，是蔣匪與民奪糧，肅清內部，減輕負擔，大批驅除市民（三個月來約20萬人）。以上三點都是我們最有利、廣泛的群眾基礎，組織領導上如何將這三支大軍的力量組織起來，進行偵察與收集材料，這是戰術偵察成功與否的關鍵。

（2）步、炮、工，黨、政、軍聯合偵察。這次偵察內容與要求是比較系統、比較廣泛，不僅要查明周邊前沿，還要查明縱深；不僅查明工事構築、兵力配備，還要查明兵要地理；不僅查明情況，還要提出判斷結論與破壞方法。這就是要採用多方面的聯合偵察，使一般與專門、戰術與技術、直接與間接、內部與外部，為著一個一個任務嚴密分工而又結合起來的偵察部署。這次偵察基本上

是採用了這個辦法，收到重要效果。但黨、政、軍這一聯合做得較差，主要是我們主動不夠。（......）

在工事構築方面，圍城以來共構築各種單人掩體19994、輕重機掩體2077、地堡1206、交通溝911871公尺。

在封鎖鬥爭中，主要是禁止糧食、菜蔬、燃料、牛、馬及一切可供敵人的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市，其中重點是糧食封鎖。這一困餓政策致使長春市被圍困兩個月即「已變成了一座饑餓城」。另外，從敵人空投數量的上升也可以看出糧食的緊缺狀況：

6月20日前，平均每天一架。從6月20日到8月15日，平均每日11架。從8月20日到現在，則每天均在20架以上。9月13日達29架的最高數。截止9月15日，共來長運輸機908架、戰機63架、偵機22架、轟炸機22架。其中絕大多數是運輸機。所投物資中除4646降落傘的電池、武器、單衣外，糧食計有54004麻袋，平均每麻袋以100斤計，則共投糧5400400斤（兩千七百噸），如以敵9萬人計，每人每日1斤，則可維持兩個月食糧。但事實上因我高炮阻擾及誤落我方、群眾偷搶、麻袋散落、敵人貪污等，實收只能到百分之七、八十，因此仍無法擺脫饑餓。現敵軍除三十八師待遇稍好外（即比別師每人每日增加大米3兩。注：舊制16兩為1斤），平均每人每日只發12兩（內豆餅3兩、米3兩、高粱3兩、麥子麵3兩），有時只發貸金不發糧，每人每天1200萬元，菜金900萬元（主要吃鹽水），士兵面黃肌瘦，體重削弱，夜盲病兵甚多，士氣沮喪，軍掠民怨，市民處於空前災難，餓死者據說達5萬以上。

在對敵政治攻勢方面，經過三個月軍事圍困打擊、經濟的嚴密封鎖與政治攻勢的雙管齊下，敵軍情緒與戰鬥力已與圍城前發生了劇烈變化：

官兵對陸上供援無望，面臨饑餓寒冷，普遍對前途悲觀，逃亡日眾。從6月25日到9月10日，敵軍逃亡、投誠者共13873名，其中正規軍8560名，占百分之六十；地方軍5313名，占百分之四十；尉官240名；校官19名；整班投誠者僅獨八師收

容了45個班。武裝步槍1073支，短槍329支，衝鋒槍51支，輕機32挺，六零炮2，各種彈藥8萬餘發。

在政治攻勢上，主要內容是展開猛烈的對敵宣傳攻勢，大量瓦解敵人，實踐證明：

只要我軍動嘴，把政攻變成了群眾自覺運動，並能加以親自有力指導，將典型經驗與方法及時加以推廣與提高，並善於針對當前情況，抓住敵人處境困難、怕餓、怕死心理，把餓（封鎖）、打（壓縮）、喊（宣傳）有機的結合，特別是善於掌握每次敵人出擊遭受打擊與我炮兵試射後，或雨天空投困難的時機，進行及時的宣傳，往往收效就大。但對政攻還須要有持續性與發揮創造性，不斷地摸清、研究當前不同敵人心理情緒，適時提出對策，則任何敵人在嚴重困餓情況又加上我軍強烈的攻心戰下，不能不發生動搖瓦解，敵人一切控制辦法是無法抵擋住的。

當然，在政治攻勢中，不可能沒有缺點：

開始忙於生產救災、封鎖、挖工事，故對政攻未引起全面注意，只少數敵工人員參加，未能形成群眾運動。各敵工聯絡站、前沿檢查站都把主要力量放在處理俘虜逃兵上，而且有的部隊對收容逃兵條件亦太苛，如獨八師曾規定正規軍必須攜帶武器及穿制服、帶符號，有的部隊拒收敵保安旅及地方部隊，及拒收新兵，影響逃兵不敢外出，並對敵未作詳細調查研究，後經圍指糾正，至8月份圍指再三強調，對敵政攻與執行東兼東北野戰軍政指示後，各部隊才普遍的、有組織領導的進行。再則，宣傳品供給很不及時，缺乏針對長春敵具體情況的宣傳，甚至將3月間我軍收復吉林送蔣屬回長春過時的宣傳品，這時仍對敵散發。再則，對敵內線關係曾發生亂接關係，有些關係甚至是被敵特利用，未加審查識別，對敵逃兵收容後檢查不嚴，不少壞蛋、特務混至逃兵中潛進瀋陽，竟未能查出。

這份報告在最後的結論中寫道：

> 從三個月圍城情況的變化可以看出，敵人饑餓、困難是隨著我圍困封鎖強化持久而愈益加深，戰力愈益低下，士氣更加沮喪，走上瓦解。而我各圍城部隊雖大都系獨立師，但在廣大群眾支持配合下，經歷這兩個月來的艱苦的鍛煉，等於上了生動的一課，開始學會打陣地仗，打封鎖仗，打政治仗，士氣更加旺盛，戰力日益提高。全體指戰員更從圍城實踐中完全體驗到，東北局、軍分會對於長春採取久困長圍方針的正確性，這是對於有龐大敵人堅守的大城市必須採取的步驟，與造成我軍最後攻打與逼敵突圍、殲敵的有利條件，長春敵人今天的處境，是表示我圍困方針的勝利，也是象徵著敵人日暮途窮的標誌。[1]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部召集圍城各部隊敵工幹部，總結圍城以來對敵政治攻勢經驗，並研究如何開展對敵第二期猛烈全面的政治攻勢。在討論中，批判了政治攻勢中的某些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只顧當前片面利益的觀點：

> 如有的部隊及敵工站單純為了封鎖，為了多弄幾條槍，為了減少麻煩，機械的執行東政不要送蔣屬到哈爾濱的指示，拒絕收容帶家屬的逃兵，強制逃兵夫婦分開；為了防止假逃兵混出封鎖線，規定過來的條件，如不穿軍衣不戴符號不收，老弱退伍不收，甚至不帶槍支不收。這實際與長春敵情完全不相符合，與我們爭取大量瓦解敵人政策是相抵觸的。再則缺乏周密的調查研究，各部隊對當面敵人內部的政治情況，組織變化及思想情緒，既無系統的理解，也缺乏部分的瞭解，只是零碎的知道一點工作一點，遠沒有達到「知彼」的程度。再則還暴露有個別同志只狹隘的看見了政治攻勢，而忽略了研究如何與軍事打擊及經濟封鎖抓緊時機密切結合，孤立的想在敵我陣地前面造成「和平共居」以便活動，事實上敵我不可能和平的，「和平共居」則將安定了敵人與麻痹了自己。而且只有軍事及經濟封鎖給敵人壓力愈大，打得愈痛，政治攻勢才愈有效！這是緊相聯繫不可分離的。（……）而檢查各部隊敵工幹部，有三分之一是敵工兼民運或保衛，三分之一由保衛兼代敵工，只三分之一有專職敵工幹部，而下面工作幹部人數既少，政治素質也低，因之在工作中，不僅發生一般的違犯政

策紀律現象，有某些敵工站本身就有違犯俘虜政策，買換東西，向城內買東西的行為，組織混亂，缺乏統一領導，經驗交流傳播得也不及時。

在會議上，政治委員肖華稱，目前戰爭形勢發展，大的攻堅戰愈益增加，政治攻勢更應提到重要的戰略組成部分，必須認真加以重視。他還指出，今後政攻的方針，除繼續開展對敵猛烈宣傳攻勢，大量瓦解敵人外，特別強調組織蔣軍戰地起義工作，創造裡外應合條件的重要性。他要求政工幹部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這個工作，下本錢，用幹部，拉長線，釣大魚。其次又指出，今天瓦解的條件更加對共軍有利：「（1）長敵是孤軍孤點；（2）長敵面臨饑餓寒冷，士氣沮喪，對戰爭前途已失去信心；（3）我軍兵臨城下，敵處於四面楚歌；（4）長市內軍掠民怨，早失民心；（5）敵內部複雜，存在矛盾。」[2]

副政治委員唐天際在總結中稱：「目前，敵陸上供援斷絕，面臨饑餓與寒冷，民心向背，死亡載道，陷入重圍絕望之境地，敵之情緒與戰鬥力，已與圍城前起了激烈的空前的變化。因此，我們政治攻勢的成績，歸納起來有以下兩點：一、達到了削弱敵人的鬥志；二、大大的瓦解了敵之戰鬥力。敵逃亡之與被殲數等於消滅敵人一個半戰鬥師的兵力，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同時，在政治攻勢中，我們的部隊學會了打政治仗，學會了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經濟鬥爭的結合，這不僅是取得了圍城政治上的勝利，且在軍事上也已經和將要取得徹底的勝利。」[3]

天空綻亮時，雨停了下來。

在洪熙街卡子裡，遠藤譽看到那些淺埋的屍體，被雨水清刷掉了身上的泥土，在朝霧之中顯露出原形。此時對她來說，這些難民的遺體只不過是單純的「東西」而已。但對她的父親大久保來說，他一直為能否要回專利發明書、出卡子的事情能否被批准、一行日本人能否全部放出而煩惱著，以致徹夜未眠。就在此時，三名朝鮮共軍士兵從卡口向他們走來，還用生硬且不合文法的日語喊道：「『新京製藥』的傢夥們，出來……」

仔細一看，三個人中個子最矮的八路軍，把上著刺刀的槍背在肩上，手上高高舉著兩、三張紙喊道。那張紙——，那不正是

專利證明書嗎？還能看到英國專利證明書的紅色印標。

「哦，是，是專利證明書 …… 神啊，感謝啊！」在這瞬間，父親下了決心說。

八路軍士兵在父親面前站下來。「喂，『新京製藥』，是你這小子吧？」

「是，是我。」父親扶著手杖站起來。

「趕緊給我出去！」

「明白了。」父親朝我們環視了一下。「『新京製藥』關係者一行人出發！」父親臉上露出苦澀的表情，但也松了一口氣。

「這個還給你！你該感謝啊！」八路軍士兵把專利證明書交給父親。

「哦，太謝謝啦！」然而，專利證明書少了一份，沒有「滿洲國」的專利證明書。「對不起，『滿洲國』的專利證明書呢？」

「甚麼！偽『滿洲國』？你再說一遍！」八路軍士兵把肩上的槍端起來了。

「甚麼『滿洲國』？『滿洲國』在哪兒？」突然，八路軍士兵把上有刺刀的槍頂住父親的胸脯。

「啊 ……」父親沒有再說甚麼。

父親平靜地把日本和英國的專利證明書放在懷裡。

朝鮮人八路軍 —— 勝利者，憤恨不齒地歪著嘴，把槍收回去了。

父親叫我們做出發的準備，讓五十幾個日本人圍成一圈坐下來。我們十九個「新京製藥」的人坐在中間。

「各位，大家都已經聽說了，我絕不自辯。我目前的做法離開了為人之道。敬請各位原諒。」父親兩手朝地，向留下的日本人鞠躬致歉。雖說意料中的事，可是被留下來的日本人仍是一片責難之聲。（……）

父親說團長原本是個形式，但最後還是以團長的身份說話：「太對不起啦 …… 請各位高抬貴手！」

沒有人搭話，父親把剩下的糧食交給了他們。

在柵欄內，每個人都要接受檢查名字和互相之間的關係。朝鮮共軍士兵拿著長春市長開具的留用和開除證明書，清點「新京製藥」的人員的名字。

「全都是『新京製藥』關係者？」朝鮮人八路軍問道。

「是！沒有錯！他們都是和我一塊幹活的職員以及他們的家族。」父親邊回答邊環視排成一行的我們。

「好，出去！」

大柵門打開來。

就在這個瞬間 ——，「等一下！」

八路軍的其他兵從旁邊擁進來，用上了刺刀的槍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全體人員站住了，可是原來對準我們的槍，這次突然對準 M 的寡妻。

到底為甚麼呢？

「你不准出去！你的孩子也不行。」用日語說話的也是朝鮮人。這個八路軍用刺刀尖把 M 的寡妻和她的兩個孩子與我們分開。他比允許我們出卡子的三個八路軍士兵身份可能更高。剛才的八路軍不做聲地聽著他的這個命令。

「為，為甚麼呢？甚麼理由呢？」吃驚的父親憤憤地追問八路軍士兵。這位身份較高的八路軍大聲喊著：「這位遺族不是技術人員！」

M 寡妻的臉上迅速消失了血色。

「怎麼能這樣說！她丈夫是高級技師，為我的製藥公司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遺族是和我的職員一樣，哦！和我的家族成員是一樣的，我有責任要保護所有遺族。」

父親認為只要是自己的關係者，都能由他帶出去，所以極力加以抵抗。「既然能讓我的家族成員出去，那麼，也應該讓她和我們一起出去，這兩者不是同一碼事嗎？」

「求求你們 …… 這位女性就猶如是我們的家族成員一般。」母親也苦苦哀求，連白耗子也插上話了。

八路軍士兵冒火了：「你們打算出去嗎？或者你們 ……」

這個八路軍冷冷地說到這後，加重語氣大喝一聲：「不想出去嗎！」

他的聲音很大，刻意強調，如果不按他說的辦，那麼就要關上卡口，他把手放在柵門上。

「豈有此理？」父親以憤怒的眼光瞪著八路軍。不論怎麼好說歹說，八路軍還是不對 M 寡妻和孩子放行。

父親突然跪在八路軍士兵的面前說：「求求你了，請通融一

下吧 ......」

「聒噪！」

八路軍士兵朝父親的臉踢去，已經沒有體力的父親跪著仰面朝地倒下去。

「爸爸，你不要緊嗎？ ......」母親急忙跑過去，扶起了父親。

「出去還是不出去，給我快一點！」八路軍士兵拿槍把捅父親的面頰。

「爸爸 ......」在母親的幫助下，父親搖搖晃晃地爬到 M 寡妻面前，雙手著地，仰視著她，蒼白無血的臉上滲出了汗珠，他說：「請原諒吧 ......」此時，父親已經語不成聲了。深深低下頭的父親，他的肩膀微微打顫。

「請原諒吧 ......」母親也雙手著地，邊哭邊哀求 M 寡妻的原諒。

M 寡妻臉色蒼白，茫然地站著，兩手一邊拉一個孩子，萬分頹喪，嘴唇發抖。

我們把留下的糧食一粒不剩地收集在一起，又把中國人喜歡的棉衣，和可能用於以物換物的東西，全部放在 M 寡妻的懷裡。但 M 寡妻雙手無力，凝視天空，兩個孩子一邊哭一邊抱住母親手腕滑下來的糧食袋和衣服。

「快點！別磨蹭！」八路軍士兵用槍刺催促我們。

我們走向卡口，M 家 14 歲的長女妙子邊嚎啕大哭邊追上來：「拜託！帶我們走吧！不要丟下我們啊！ ......」

哭喊的妙子被交叉在一起的上刺刀的槍堵住。妙子的哀求，突然變成責難：「叛徒！」

我們把這些哭喊聲遠遠甩在背後，一行十六人便一步一步地離開了卡子柵門。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回頭看。父親勉強用手杖支撐著身體，不時停下來，合掌祈禱，合掌的手指尖厲害地哆嗦著。

大久保帶著一行人邁著沉重的步伐默默地走了數小時。從坡道爬到山崗頂點時，大久保開口對妻子說：「媽媽，你看，那就是長春啊！萬代三在那裡長眠著。告別了，再見吧！」

父親還想說些甚麼，可是卻難以說出口，只能像把話咽回去

一般緊緊閉上了嘴唇。

往身後看，看見了遙遠的長春的市區，還有那被鐵絲網重重包圍著、被炮彈打得千瘡百孔的灰色街道。

「爸爸……我們的小萬……小萬……」母親這麼一說，突然間像打開的水閘般地痛哭起來。在小萬死的時候，從沒有流出一滴淚的母親，現在竟然哭得萬分傷心。

「小萬啊！……小萬啊！……」母親向遙遠的長春不停地喊著。

如果再任由母親這麼哭喊下去，很可能就會在這個小山崗上斷氣的。

我們已經在長春市外。我們現在確確實實逃脫了地獄般的死城，長春。

不管怎麼樣，保護孩子和父親而到這裡的母親，一想到脫離長春的瞬間，就全身虛脫，據說這個時候她才想到：小萬真的死了。

「喂，媽媽，走吧……」父親把手輕輕放在母親的肩上。

我們走下坡道，離開了絕望的城市，長春。

大久保帶著他的「新京製藥」的人走出卡子，遠遠看到共軍的難民接待站。共軍發給他們高粱粥充饑。然後，他們再接著向前走。遠藤譽看到天空是明亮的，「高粱旁若無人地垂著沉甸甸的穗子」。

我們一行十六人就像走在鄉間小道上的送葬隊伍一樣，腳步遲緩而沉重。我跟著行李車，只是茫然地望著前方，踉蹌前行，因支撐著全身重量的雙肩向前傾著，像是要摔倒般，大家誰也不想開口。

遠藤譽和其他人一樣腳步沉重地向前走著，她感覺「彷彿在畫中漫步」。她看到了飽食過多而脹死的餓殍。

在高粱地裡，泥濘小道一直延伸到天際般，擋住視線的是孤零零的難民街頭商販店鋪，被煙煤熏黑了的紅色招牌下擺放著玉米麵蒸的窩窩頭、像麻花似的油炸點心，而在那店鋪下橫臥著的是——餓死的屍體。賣食品的店鋪旁邊橫臥著死屍，而且誰也不處理，鋪子的主人也顯出一副事不關己的表情，仰著頭，望著空中。

「一下子吃得太多就會那樣，大家可能都餓了吧。稍微忍耐一下，都知道了吧？」父親終於開口說話了。

在走到孟家屯時，遠藤譽看到道口有一個寫著「難民路」的牌子。從那兒道路開始向右拐，出了卡子的難民，必須去劉家屯的難民收容所報到，之後何去何從，將在那裡被決定。

雖說是自由區了，但是我們還是不能自由行動，到處都是看守著的八路軍警衛隊。(......)那八路軍也常常在道中間檢查過往行人，讓行人打開包裹。名曰檢查，而每遇到值錢的東西，卻揣進自己的腰包。父親脖子上掛了個骨灰盒，裡面裝著嫂嫂和餓死的兒子小高司的骨灰，以及哥哥的頭髮。八路軍的崗哨大都認為那是甚麼貴重的東西，總是要求打開那掛在脖子上的用白布包著的盒子查看，而每每一看見屍骨和頭髮，又都扭過頭去，便予以放行。

在傍晚時，遠藤譽與她的父母親一行人終於到了劉家屯。他們必須到難民收容所提報自己的姓名，不允許隨便行動。遠藤譽發現那一帶的哨兵特別多。後來，他們被帶到一所破爛得快要倒塌了的農舍休息，房間裡是沒有鋪地板的土地。大久保被一名士兵傳喚到難民收容所接受審訊。這些軍人說的是漢語。

他們問父親是怎麼樣逃離長春的。如果回答是工程師的話，就會被迫留用；所以想儘量回答說是普通難民。普通難民可以發到一種相當於通行證的難民證明書，叫做「路條」。有了牠，就可以南下瀋陽，瀋陽連著葫蘆島，是一個可以通往日本的港口。

父親身體極度衰弱，根本沒有能力拉著一群人走南闖北。他想返回日本，所以很猶豫。但是，那卡子的大門是不會向普通難民開放的。如果從卡哨以外的鐵絲網下鑽出去而僥倖逃生的，一旦被發現，也會被冠以間諜等罪名，再次被送回到卡子裡。所以撒謊也是很危險的。

父親無奈，只好承認自己是治療毒品上癮症的特效藥吉福德祿的發明者。給他們看了專利證明書後，才出了卡子的，還出示了綁在腰上的專利證書。八路軍士兵明白後，立刻就決定在八路軍政府留用，明天一早去吉林。

（……）父親當時僅有58歲，但頭髮、鬍鬚又白又長，看上去像90多歲的老人，那瘦骨嶙峋的面龐，已經沒有人樣，大家誰都預感到父親的時間不多了，然而，他卻活著。

（……）我也達到了極限。手腕上的綳帶裡生了蛆，蛆撕裂血膿，從綳帶縫裡爬出來聚滿了大綠豆蠅，可是我卻連驅趕蒼蠅的力氣也沒有了。[4]

大久保一行人到達吉林後，接到新的命令：與藥品有關的人員，還要再往東走，到朝鮮邊境的延吉去。到達延吉後，中共延吉市公安局讓大久保建一個製藥廠，這個製藥廠後來成為延吉地區最大的製藥工廠。

再後來，大久保和他的家人，還要繼續在紅色中國這個無形的卡子內滯留五年之久，才能回到日本那個真正屬於他們的祖國。

天津《益世報》以「爬！爬：爬出了長春」為題，刊登《長春論壇報》記者范叔寒從長春城逃脫後寫就的紀實報告，范叔寒以「悲壯」的心情追憶「第一座在自己生命史上曾有過深刻記憶的城」，因為「饑餓」，他才「不得不離開了」。他從7月27日出發，冒險三次才最終逃出長春封鎖線，在8月9日到達天津。他以沉痛的筆調寫道：

三次突圍

所謂突圍，就是在夜裡偷偷地爬出共匪的封鎖線。這種行動的首要條件，就是必須熟悉地理，詳細知道共匪卡哨的位置，能在他們卡哨與卡哨的縫隙間「摸」出去。與記者同行的一共五個人，都是長春大學同學，內中有一位女同學是記者的表妹。我們這四男一女，對於地理是茫然無知的，唯一的資本，就是「闖」。反正爭取的是生存，不得生存就是滅亡，這個決心是下定的了。

突出長春大致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經洪熙街，直奔大屯的南道；一條是出南關經二道河子去伊通的東道。我們因預知南道方面在洪熙街聚集的難民太多，不容易走，便採取了東道。7月27日午後，在細雨濛濛中，我們出了南關。接近黃昏時分，離開二道河子真空地帶，按著東南方向，爬溝過城壕向四家子逃。郊外的蒿草根深，走不出1里路，便在水溝裡發現餓斃的屍體，路旁也橫列著死孩子的腦袋。死的恐怖開始襲擊著我們的神經。草叢裡有些饑民在蠕動，他們似乎在尋覓草根底下之物。一個年老的

向我們看了一眼，無力地問道：「往外爬啊？你們！」。語氣裡對於我們似乎贊羨，也似乎在歎息。但從他那投射的疲乏的眼光看來，又顯然的是在預告我們的失敗。在我們甫一出來，是顧慮不得這些的，大家都低著頭繼續向前走去。

剛距四家子不遠，我們被捕了。共匪的卡哨，堅持他們的上級命令，不讓過去。長大同學搬出一套共產主義的理論向他們説辭，也是不起效用。他們説得很乾脆，他們的目的是困餓堵長春，讓我們回去幫著國軍吃，吃完了就可以「解放」。但是，我們斷絕地表示不能回去，縱然打死、餓死也再不能回到長春去，女同學託辭走不動了，説甚麼也要留在此處。最後共匪卡哨也弄得沒有辦法，而且天色已經黑沉，便把我們送到他們的連部所在地叫做小油場的村落。共匪的連級幹部看到哨兵把我們送來，大為不滿，聲稱這是警戒線，不能讓外人來往，於是又逼令哨兵把我們送回四家子。四家子距長春有十餘華里，偏逢大雨滂沱，當夜，在農家的狗棚裡借了一宿，第二天又被哨兵押送回進二道河子了。

第一次的「闖」，是完全失敗了。有兩位男同學認為前途沒有把握，中止行動。於是剩下了記者和一位姓崔的同學，另一位是記者的表妹。我們決計不闖出去誓不甘休的。尤其崔同學相信他那套左派理論，一定能夠打動共匪的政工人員，放我們過去。可惜這次遇到的都是前線戰鬥部隊，是很難以理喻的。於是，我們三人在二道河子擠滿死屍的破房子裡，休息了一天，在7月29日夜裡，又復出發了。

這次雖然我們有上次的經驗，讓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四家子，而未被發現，但在距離長春20華里左右的趙家店附近，又被卡哨發現逮捕了。趙家店住的是「二五一聯絡部」，可也顯露了萬分的輕蔑。在他們認為，政府區的學生，都是些徹底的小資產階級，缺乏革命的堅決性。當我們質問他革命為甚麼要把人民活活地餓死的時候，他除去搬出一套「政治的鬥爭，是殘酷的！」的理論而外，訓斥我們理論不夠，不懂得革命戰爭的比重性，意思在説：目前爭取戰爭勝利的事大，餓死老百姓事小。同行的崔同學，認為瀋參謀是一個空隙，很可利用，便和他談了個徹夜，從論聯合政府談到史達林憲法，結果，真就很有效果，在把我們「招待」了三天以後，只准許崔同學單獨前進，而記者和表妹又被押送回進二道河子了。（記者寫此報告時，崔同學已經由吉林逃出安抵瀋陽。）

接連兩次出走的失敗，並未挫折了我們向外闖的勇氣，尤其「二五一聯絡部」瀋參謀那套輕蔑的言論，以及共匪迷信他們圍城部署的周密，說是任何人插翅也難飛出的那種傲慢態度，更喚起記者一股抗拒的心理。表妹是一向不肯示弱的，冒險突圍，在她是一種興奮的試嘗，無論如何是堅決還要走的。於是，在8月3日，我們在真空地帶花1200萬流通券買了5斤炒豆，換了雙為爛泥拔掉了底子的鞋，約近黃昏以後，改向正南方做第三次出發了。

職業亡命者

積累了兩次走的經驗，加上道聽途說的啟示，使我們知道光是盲目的「闖」，是無濟於事的。最好能夠找到一個熟悉封鎖線的一帶地理的人來做出路，否則這50里方圓內，縱深配置的卡哨，確真是插翅難飛。然而這種帶路人又真難以找的。據說這種帶路人，大都是共匪窮人會的份子，他們家庭都是住在真空地帶裡面，為了跑到封鎖線外弄點食糧是經常跑來跑去的。在來去之間，順便帶幾個人，也可以賺點錢，但這種行業無疑是一種冒險，因為在暗夜裡行動，可能在共匪的盲射下犧牲，也可能為共匪捕住殺死的。所以他們的行走也特別的神秘，不可捉摸。我們經真空地帶一位甲長的介紹，很幸運地便遇上了一個，他答應僅能領我們走到距離長春東南50里的新立城，往前他不走了。50里已經離開封鎖線，想像再不會有甚麼嚴重的麻煩，於是我們便送了些衣服給他當做路費，他雖然不滿意，但也勉強收下。當時我們身上除去一點吃的東西而外，是一文不名了。

這位以亡命為職業的領路人，他的官能的銳敏，可說是天才的秉賦。他走的飛快，穿過草地，鑽進莊稼，涉水，爬坡，都是保持相同的速度。因為過分集中視聽在行路前面，他是輕易不回頭照顧我們一下的，若非我們拚命追緊了他，隨便在甚麼地方丟掉了我們，他也不會發覺的。他對於共匪卡哨配置地位的熟悉，令人敬佩不止。有好幾次是卡哨在獨立屋的左角，而我們是從右角悄悄地走過來的。記者邊走邊想：假若國軍能把這種人才網羅一些，經過一番訓練，組織若干突擊小組，我想一夜的光景，就會把共匪的50里封鎖線，擾得稀亂。

將要走出封鎖線，接近何家屯的時候，領路人忽然變卦不走了。他表示要到別的地方去，馬馬虎虎地指示了我們一個方向，便消逝在高粱地裡去了。這時除記者和表妹而外，路上偶然碰在一起的亡命者，已經彙集了二十三、四人之多，大家都茫然無措了。據想：這位領路人可能因為人集的太多，目標太大，怕途中被捕，便事先擺脫走了。事情既已至此，大家只好盲目往前走了，結果，在剩 1 里地的路程就可脫出封鎖線的地方，我們這隊亡命者，便被發現了。

先是，共匪卡哨鳴槍喝住。大家聞聲都慌亂地鑽進蒿草裡面伏藏起來。共匪喝令出來，並向草面開槍，表示不出來就要打死。有一批十幾名的家族，因有婦人、小孩在內，經不住恫嚇，都先後出來了。共匪尚認為人數不夠，仍然繼續往草叢喝令出來，並聲稱要擲手榴彈。此時，記者和表妹均在草裡，呼吸緊張萬分，然都未做任何聲息。等了好久，共匪用電筒照射也未發現，便押著那批家族走了。事後，我們察覺，剩下的是記者和表妹，另三位長春高中同學。

日期不詳

清晨，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發現弟弟范傳章靜靜地餓死了，死時10歲。他不知道弟弟死亡的具體日子。他在四十八年後寫道：

那時，媽媽也沒本事了，坐在床上，抱起弟弟，看了又看，親了又親，放聲哭訴起來：「二兒啊，我苦命的孩子啊，你真可憐啊，你呀像你爹一樣啊，也是空著肚子走的呀。二兒啊，媽媽和你哥哥都走不動了，也不能送你了，你原諒媽媽吧，我的二兒啊……」

我和媽媽渾身浮腫，都不能動彈，連說話都沒有力氣。媽把弟弟放在床上，強撐著身子給弟弟穿上一件單衣，根本沒有力氣下炕翻箱倒櫃找棉衣。接著，又把我摟在懷裡，我們娘兒倆哭成一團。看著弟弟的遺體，我一個勁地掉眼淚，弟弟活活餓死了，心裡能不難過嗎？

這場面，又把國軍三十八師炮兵排的士兵招來一大幫，都在窗外看著我們娘兒倆和放在床上弟弟的遺體。人雖多，但都不說話，仍然很靜。

不論如何，也得把弟弟發送出去。可是，我們娘兒倆都不能動彈了，沒有那麼大的本事，根本抱不動。於是，媽坐在屋裡叫住窗外一個年輕人，當他進屋時，媽媽央求道：「先生，行行好吧。二兒子死了，我們娘兒倆都不能動彈了，麻煩你把孩子抱出去，在鐵道邊埋起來，你再回來，你看家裡甚麼合適，你就拿吧。先生，不管怎麼樣，行行好吧。」

這位先生用眼掃了一下，眼睛盯住弟弟的遺體，躊躇了一會兒說：「行啊。」於是，他抱起弟弟走出門外。媽又哭了：「二兒啊，你走了，媽不能去送你了……」

（後來鄰居告訴范傳華：這位先生根本沒埋弟弟，瞅著

哨兵沒注意，就放在碉堡附近的草叢裡就走了。）

沒幾分鐘，這位先生就回來了。一進屋，就把掛在牆上爹生前上班穿的一件協和服取下來，緊接著，去打開幾個箱子，翻了一陣子，選中一塊七尺長粉紅色綢布，就看中這兩件東西，拿走了。媽還連聲向這位先生道謝。

1948・9・25

天津《益世報》載南京專電：「長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150萬……」[1]

這一天，對身在長春市海棠街的范傳華來說，是他成為孤兒的日子：他的媽媽也餓死了。范傳華在獻給中共奪取長春四十七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 夜幕降臨，媽突然拿下蓋在臉上（防止蚊蠅叮咬）的毛巾，側過身喊：「傳華，媽——不行了。」說著，她在頭上的小鐵桶裡摸出一塊糠窩窩頭幹遞給我。「你——吃吧，媽——不行了。」
>
> 我哭了，用全身氣力喊：「媽，媽——我怎麼辦啊？」
>
> 「你，你——找郭鳳歧大爺，他——他推車到市內賣劈柴——就給你捎到火車站，你——回大連——到姥姥家。這——這錶是你二舅的，還——還給他。」
>
> 媽把懷錶遞給我，眼看她的手噗通一下落在床上。媽媽就這樣和我永別了。
>
> 媽媽雖然停止了呼吸，但是媽媽仍在我身邊，她頭朝裡，側身躺著，穿一件紫色毛衣，一條黑布褲子，臉背著我。我睡在媽媽身旁，時刻能看到媽媽，看到媽媽我就放心了。我沒力氣給媽媽換衣服。[2]

1948・9・26

《東北日報》刊登關於長春國軍的歌謠」：

長春蔣匪歌謠

兵：豆餅麵子是好飯，提心吊膽把崗站。心一橫來牙一咬，去投八路見青天。

官：「中央」軍官有三怕：一怕光發票子不發糧；二怕戰場打黑槍；三怕當兵的不打仗，成對成幫去投降。

廣州《中正日報》以「對長春軍糧票，立委紛提質詢」為題，報導發行長春軍糧票帶來的爭議。這篇報導中說，在25日上午召開的立法院糧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上，部分委員質詢長春軍糧票發行之事對長春市民的不公：「軍糧票之發行，對於解決長春軍民之生活問題，仍多困難，且以戡亂期中，人民所應全體負擔之重責，交由數十萬長春市民承當之，似欠公允與合理，同時因發行糧券而獲利之特殊人物，亦屬難於防制，多數主張，政府應再鄭重考慮其後來以利施行。」

對此，財政部和糧食部官員分別答覆稱，在此辦法未公佈前，政府會再三考量各項措施方施行，「而目前長春軍民之經濟問題，首要者，當為加強糧食之空運」。

1948・9・27

在長春城外，第一兵團政治部根據東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指示，就關於處理俘虜官兵的事項，向所屬圍城部隊下達《處理俘虜官兵幾項規定》，該規定中稱：

> (……)
>
> (2) 對俘虜官佐中、上校以上官階及少校以下官佐，分送各指定地點軍官團及解放大隊。
>
> (3) 對俘虜或投誠之尉以下的官佐，可資就地利用進行工作，或派入敵區者，須師政治部以上之機關批准。
>
> (4) 對敵投誠官佐及零碎小股投誠之官兵（除起義的以外），均送指定之招待所處理，其所攜帶之武器，按東政規定，每支步槍發給獎金4萬，輕機槍或衝鋒槍發7萬，由接受部隊付給，並在轉送時檔注明。[1]

除了俘虜官兵攜帶武器受優待之外，國軍家屬、難民、商人、地主和富農等有錢人攜帶武器同樣也受到優待。

在官方出版的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據張誠華（長春淨月封鎖區長春工作委員會第二工作隊隊長）回憶稱：「對於攜帶武器出來的敵軍家屬和市民也給予優待，有些跑到城裡去的地主、富農，為了不被餓死，也買槍帶槍出來。這樣，我們工作隊每天都接待帶槍出來的人，每天能收到十幾支槍，大都是手槍。」[2]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和已經死去的媽媽在一張炕上躺了兩天。這天，他的媽媽死去的消息被在窗外站崗的哨兵知道了。為了防止瘟疫的傳染，國軍三十八師炮兵排決定協助將屍體掩埋。下午，五、六個國軍士兵闖進了范傳華的家，前來收斂屍體。范傳華在獻給中共奪取長春四十七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 他們個個用毛巾從前往後把口鼻子捂上，在脖子後系個疙瘩。一進屋，馬上把我抱到門口，上床兩人，他們四個人各扯一個褥

子角，把媽媽抬起來，剛一抬，媽媽腿上的棉花掉了，已經生了好多蛆，國軍士兵驚呼：「蛆！」

於是，他們趕緊把媽媽抬到門口的手推車上，送到鐵道邊掩埋。他們在埋葬時，正逢在三十八師當伙夫的王雙全大叔上班路過這，他湊過來一看：「唉，這不是老范大嫂嗎？」士兵們說：「是啊，我們怕得傳染病，拉出來埋下。她家裡還有一個兒子，也差不多了……」

王大叔轉身就朝我家走來，我躺在床上見王大叔進屋，我特別高興。

王大叔說：「老范家小孩，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明天我就搬來住。」

我當時萬分激動，就把這塊懷錶遞給王雙全大叔。「大叔你上班用吧。」他接過懷錶，看了下，就揣在棉軍服上兜。不一會兒，郭鳳岐大伯進屋送給我半個糠窩窩頭。

王雙全以及其子搬到孤兒范傳華家中一起居住。王雙全偶爾能給范傳華捎點吃的食物。但沒過幾天，由於糧食緊缺，不在軍籍的王雙全被裁減回家。填飽肚子，只能靠挖野菜。當野菜也沒有時，王雙全和他的兒子也就沒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父子倆哪兒去了。[3]

1948．9．28

長春市長尚傳道針對長春面臨的缺糧困境，給蔣介石發去兩封求救電。蔣介石和其夫人宋美齡給尚覆電稱：「總統及余對長市糧荒、藥缺、棄嬰等問題均極關懷，現在多方面接洽，尚無飛機足供運輸，一俟飛機派定，即予盡速空輸空運，有辦法即予救濟。」[1]

根據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統計，在長春城外的興隆山區獨立第八師方向，從 8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共收容與救濟放出難民 31302 人，其中學生 1224 人、醫生 194 人、車夫 851 人、小販 1621 人、商人 4575 人、工人 6305 人、農民 7028 人、自由職業 1229 人、其他 8275 人。[2]

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一直在等待王雙全叔叔回來，但始終都沒回來過。他餓得實在受不了了，就從炕上挪下來，兩手拄著一根向日葵杆，一點點地向 20 米處的鄰居劉守緒大伯家挪去。他哭著告訴劉守緒的妻子劉大娘說：「我要吃飯。」劉大娘說：「孩子，你先回家吧。等會大娘就給你送去。」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十八年後寫道：

> 打那以後，劉大娘每天傍晚黑天前就送給我一大碗湯。這碗湯雖沒有油水，但有鹽，多是辣椒葉或茄子葉，有時是野菜做的。
>
> 因我們一家三口都死在這個屋裡，劉大娘進我家有些膽虛，每逢送湯，就在窗外喊一聲。我躺在床上，用向日葵杆子把窗戶向外捅一下，劉大娘在外面就把窗戶打開了，把菜湯倒進我事先準備的小缽子裡，放在窗臺上。然後，我握住向日葵杆這端，劉大娘握住另一端，把我拉起來。當我坐穩了，劉大娘從外面把兩扇窗戶對上才離開。我再一點點地挪到窗臺前，把湯喝了，就把小缽放在窗臺上，等到明天這個時候再用。
>
> 這樣的生活，約摸有五、六天。那五、六天，我就靠劉大娘送給我的這碗菜湯度命。[3]

1948・9・29

廣州《中正日報》自北平特電：「《北平日報》稱：據南京消息，當局曾懸賞金券 100 萬元，生擒共匪首領毛澤東及朱德。該報又稱：朱毛諒不易生擒者。」

1948・9・30

為了抽調精銳部隊奇襲奪取國軍駐守的錦州城，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封鎖圍困長春的作戰任務，由獨立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等 6 個師擔任，其中的獨立第六師和獨立第十一師為精銳的朝鮮獨立師。為此，圍城部隊的防區又做了新的秘密調整部署。

根據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統計，在長春城外的長南區獨立第六師方向，從 8 月 12 日至 9 月 30 日，共收容與救濟放出難民 68471 人，其中學生 3202 人、醫生 204 人、商人 2528 人、工人 10679 人、農民 3368 人、技術人員 869 人、教師 517 人、職員 1097 人、軍人 160 人、鐵路 258 人、郵政 21 人、其他 22826 人。[1]

中華民國上海《大公報》記者張高峰，今天發表長篇文章《我們要活命 —— 長春五十萬人民的控訴》。這篇文章稱：

> 一位朋友從長春逃到瀋陽，來過一封信說：「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長春被圍困半年，50 萬人餓得全成半死狀態。國軍要減輕長春的負擔，強迫疏散人口，走出城門不許返回。共軍硬要給國軍增加困難，不許人民通過封鎖線。十幾萬難民在兩軍的真空地帶，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前進後退兩不得。長春野外已經餓死 1 萬多人，嗷嗷待斃的十幾萬，人心真是黑了。9 月 8 日，我實在再也消化不了連豬也不肯吃的陳酒糟，偽裝一個鐵路員工的兒子，勉強地拖著病體，從死屍堆中爬出長春，保留了小命一條。

半年的饑餓，把我摧殘得不成人樣子，勝利了三年，你説還希望甚麼？」

（一）被圍以後

（......）5月間共軍在城郊發動鏟苗運動，40里方圓內的農物全被鏟光，沒有一粒食糧能入市區。城郊又佈滿了高射火器，國軍飛機投糧食彈藥要從1萬公尺以上投下，共軍曾撿了許多便宜。內無糧食，外無救兵，長春的日子，一天難一天。（......）

（二）狗吃人的世界

（......）人民沒有食糧，（......）最近糧食更恐慌，當局沒有辦法再約束那些（持槍向民搜刮糧食）人的紀律，既然要守長春，只好讓老百姓先餓死。每次飛機空投，糧包上沒有傘，像炸彈一樣落下來，多少人民被擲傷擲死，但是人民對空投仍有半喜半憂的心理，萬一落在自己院內不被擲死，豈不是多活幾天！然而拿槍的人會知道誰家得了食糧，沒有人民的便宜可占。被毀的是貧民的平房，擲死擲傷的也是人民，吃著糧食的卻不是人民。

人民沒有活路，餓得邁不開步子，一跌其就站不起來。街頭上的餓殍，半死的棄嬰與幼童觸目皆是，呼爹叫娘，糧食救不了那麼多的孩子，眼看他們餓死。

從長春逃到北平的一位朋友曆述可怕的饑餓慘狀，眼含著淚水說：「太慘了，我不想再往下說。」餓死的孩子們，被更饑餓的野狗分屍。狗餓得眼紅，你不敢上前把牠們趕走，正在吃死人的時候，一群狗可以把活人咬死。等到了8月份以後，人又把狗全打死分吃了。長春市內看不見一隻豬、羊、雞、鴨，沒有富裕的食糧再飼養牲畜家禽。平時豬都不吃的酒糟摻合豆麵麵做饅頭，一個要法幣2000萬元，人民陸續地死亡，長春市民政、督察兩局負責組織了「屍骨掩埋委員會」收埋各處死屍。餓死的並不完全是窮人，凡不是軍人眷屬，都在奄奄一息地等死。

（三）一切為了活命

因為饑餓，省、市政府的工作完全停頓，區、保公所全部解散，少數的公務員每天拄著一根竹竿去上班，來往的公文只是一個問題——糧食。長春市政府的中級以上職員，集中在招待所食宿，每天吃的是三成大豆、七成酒麵，一進大門口，臭氣沖天。酒麵都是早已發了黴的......用眼一看，立刻反胃，實在是不容易消化。下級職員連酒糟大豆也難得吃到，很多人都想加入市府伙食團，

只因為鍋小，用具少，早已人滿。建設廳長于鎮藩餓了，自己到街上買2斤土豆，平均每個要法幣100萬，廳長的生活尚且如此，一般公務人員的生活可想而知。

長春市內的物價不是貴賤問題，而是物資有無的問題，能吃的已經吃光，能用的也用光。全市沒有一家飯店，縱然有也不過是賣酒糟豆粉的混合饅頭的小販。過去四馬路比鄰的商店，幾乎全部關門，有的是賣點零星貨物，聖經與日文字典的紙，作了捲煙。火柴是從哈爾濱偷運過來的，一盒法幣400萬。物價如此之高，票面5萬、10萬的流通券無濟於事，長春半年來是靠中央銀行發行本票過日子，市面通常使用的是流通券500萬一張的，一共發行了多少，據不正確的統計，約在法幣一萬萬億以上。(……)「將來長春人把骨頭都賣了，也不能抵膨脹的通貨價值。」(……)

（四）封鎖線外

6月底共軍對長春全部封鎖，不許人民出來。市內糧食恐慌，無法解救，國軍強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門的就不許再回來。共軍利用這個機會，獎勵「執槍歸來」，凡是有一支槍，除自己眷屬外，可另發給四張通行其區的路條。有錢的人家，就百般設法買到一支槍，據説並不難，自己眷屬先走出國軍的封鎖線，在共軍的真空地帶去等，有人移售了你的槍，你再獻給卡哨上的共軍，然後拿著路條逃往瀋陽。共軍又獎勵「鐵路員工歸來」，這個不好冒充，是假的一問可以發覺，只有年青的或年老的偽裝鐵路員工的兒子或父親，花點錢給真的鐵路員工請帶過封鎖線。至於被強迫疏散的平民就慘了，長春城郊國軍有三處卡哨：(1)西南的洪熙街；(2)勝利大街東南的二道河子；(3)北面的八里堡頭道溝。除了國軍卡哨，周圍三、四十里的方圓，就是真空地帶，每天人民成群結隊走出卡哨，督察隊員上前檢查，有手錶、鋼筆、金銀財物，必被指定是「有意通匪」，順順當當地留下的都是好百姓。走出卡哨的人民財物一掃而光，身份證必須在卡哨繳下，長春市民的身份從此取消，不許再回市內。往前走吧！碰上了共軍的卡哨，不許通過，「餓得慌，為甚麼不回到長春去暴動？」老百姓是守法的，他們哪裡敢，自己的糧食財物在市內早被搜刮一空，每人都餓得半死不活的神態，縱然是想暴動，體力也不支了。成千成萬的難民，前路不通，又想回到市內，國軍的卡哨又瞪著眼，舉起槍，哀求也無用，一喊一打，父母、妻子全

被沖散。據說三里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帶，有十幾萬難民，睡在被共軍鏟光了農物的曠野上，風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慘劇就在真空地帶演出。

人們餓得不能走動一步，女人就在人堆裡小便，男人解手也不顧及女人，餓得難受，顧不到甚麼羞恥。一星期拖過去，死屍遍野，疫癘流行，人民死得太慘了。吉林建設廳的會計主任王祝堯，人受不了饑餓，就在8月9日這天通過了國軍卡哨，打算逃到瀋陽，在兩軍的封鎖線外餓了十幾天，病倒，想回市內，卡哨不准通過，想盡辦法給建設廳長于鎮藩帶了一封信。建設廳下令說：「會計主任王祝堯交待不清押解回來查辦。」這樣才把他救回市內，但因胃已潰爛不治身死，長春還是人的世界嗎？

（五）冬天是難關

天已經秋涼，長春人民沒有吃的，也沒有燒的。年青一點的都逃到真空的地帶，正在那裡等死。據說留在市內的人民還有十幾萬，全是老幼婦孺，餓得不能出門。在街上看見的多是軍人，軍人趁著老百姓逃走以後，就把房屋拆了燒火。人民住三間的擠到兩間去，留出一間來拆木頭毀傢具，長春的燃料與食糧同樣的恐慌。市政府對街頭的餓殍，原來是想火葬，省人力，又減少傳染病，但是沒有劈柴，只好到處讓人去收埋。

轉眼就到冬天，長春去冬已經拆房砍樹取暖，而長春的冬天常是零下三十幾度，叫饑餓的人民怎樣過冬？毫無疑問的，絕對要把幾十萬人凍死，人民太慘了，請來拯救人民！這是東北人民十四年來所等待的「勝利」嗎？[2]

上海《糧食日報》以「論長春軍糧票之發行」為題發表社評，該社評如是為長春市民發聲：

自政府決定在長春發行軍糧票，作為該市的特定通貨後，連日來，引起立法院的熱烈質詢與反復討論。按軍糧票以高粱米為本位，以其體積為單位，分為一兩、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七種，發行定額共計三千萬斤，藉以收回長春市上數達70萬億元之鉅的流通券及其本票。

本來，今日長春已形成國內通貨膨脹的最高峰，高粱米賣到流通券三、五千萬元1斤，1億元的本票竟淪為「路不拾遺」的小鈔。如此洶湧的鈔災，正沉重地壓迫著瀋陽錦州，強烈的觸角甚至遠及平津，對於金圓券實有極大的破壞性。所以政府此一斷然措施，使長春採用單行幣制，顯有築堤防洪的作用，在經濟全域上講，自無可厚非。

立委中的反對者，認為長春之現狀全系戰亂的後果，其災難如何任七、八十萬市民單獨承當。但此並非問題的核心，因為政府發行以實物為本位的軍糧票，目的恰是為了要穩定長春的物價。關鍵倒在長春圍城四月，糧食瀕絕，人民是連凡含有葉綠素的植物都吃光了，試問軍糧票的實物準備（高粱米）在哪裡？所以，唯一的辦法，只有運糧出關，出動一切可能調用的軍民航機，對長春不斷的空投，大量的空投，80萬軍民總有活路，三千萬斤軍糧票總能維持幣值。

廣州《勞工新聞報》以「長春屍橫遍野」為題，刊登自北平外息稱：

長春城內國共陣地間之「無人地帶」滿呈餓斃之死屍，據目擊者雲：竟有食人肉之情形在無人地帶發生，長春市府秘書周建甫談稱：數千自長春逃亡之難民滯留於國共陣地間廣十里闊一里之地帶內，共匪不准其通過，而彼等離長春，亦不能獲准重返長春。共匪每月或准難民通過一、二次，惟均系經嚴密之檢查，因進出兩難，被迫留在該地帶內，以樹皮樹葉為生，有竟食死屍之肉者。長春糧荒情形系於端午節後日益嚴重，當時即開始食馬肉、騾肉，目前城內已無畜類，居民只得食樹葉，草，及豆餅等。7月間糧荒更為嚴重時，市府下令強迫罪犯、失業者、無身份證者及有共匪嫌疑者離境，共匪亦於當時開始向長春城內炮轟，落彈數千，若干居民因不勝恐懼自動逃亡，共匪分子在城內散發傳單，謂共匪行將佔領長春，並要求民眾勿將房屋破壞，及煽動國軍叛變。在長春，雖系軍人，亦未能獲充分食糧，彼等亦食自城內各倉庫沒敗之豆餅。7月以前，通常有空運接濟，惟自共匪將高射炮運至城外後，飛機迫得高飛，投擲糧食當未得完全落在國軍區內。

竹中重壽，28 歲，原為日本關東軍駐哈爾濱情報員。他在 1945 年日本戰敗後於哈爾濱做日蘇兩軍的軍事調停員，後來又加入國軍任職情報大隊長。他在饑餓的煎熬下，決定出城逃生。

今天中午，他隨著同樣渴望逃生的一些日本人一起進入洪熙街卡子。他們剛進入卡子，就遭到兩、三百名中國難民們的「襲擊」，隨身攜帶的食物「一瞬間就被洗劫光了」。他後來寫道：「餓鬼們離去後突然又返回到我們這邊的時候，我們看見了難以言表的修羅場，就像『活生生的地獄』。戰後，我們一邊救出開拓團員和敗殘兵一邊奔走於北滿的山野的時候，幾次見到集團自殺的地方，看到很多死於發疹、傷寒和霍亂的屍體。但是，這樣的慘狀還是第一次見到。也不知道是數以千計還是數以萬計的屍體，埋在縱橫挖掘的戰壕裡，填滿了用炮彈炸開的窪地，沒有間隙地散亂在紅土的荒原上。而倖存的餓鬼們在屍體和屍體之間，過著絕望的日子。」

竹中重壽和其他日本人，將數間廢棄、沒有房頂的殘牆斷壁中已餓斃的屍體全部運出，作為棲身地。他們將倖存的食物拿出來分給其他人。相對健康的人以雜草根為生，不放過任何一片葉子和莖。有的人因為誤食了有毒的草喪命。在隨後饑腸轆轆的日子裡，他們也和中國難民一樣搶掠新來的難民們。[3]

1948・10・2

蔣介石由北平飛抵瀋陽。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聽取有關錦州戰況的報告，研究援錦方案。

在長春城外，共軍召集師以上幹部會議，研究部署圍城事宜。這時，城內情報源源不斷地送來。司令員肖勁光後來寫道：

> 我們獲悉：蔣介石命令鄭洞國率部突圍；鄭洞國在洪熙街查看地形；敵人連續幾夜演習夜行軍，急行軍；敵人每人發了三天軍糧；敵軍家屬集中于海上大樓；敵將走不動的馬都殺掉（......）這些重要情況說明敵人有突圍的明顯跡象。
>
> 於是，我10萬圍城部隊立即緊急動員，準備戰鬥。不久，又獲悉，敵人估計我主要防守西南口中長路，於是將突破口選在長春以西大房身機場方向，企圖以最精銳的部隊新三十八師作試探突圍。
>
> 對這一情況掌握後，我第一兵團司令部又作了幾個戰鬥方案，並交由前線部隊進行充分的研究討論。在討論中，我提出，估計敵人這次出來的兵力不會少。我們的「刀子」插得深一點好？還是淺一點好？如果插得深，把部隊全調進去，固然可以多截擊敵人。但是，就像流水一樣，突然截住了，衝力大，漏掉的可能要多得多。如果淺一些，梯次配備，從側面打擊敵人，一個梯次消滅一部分敵人，放過一部分敵人，由第二個梯次再從側面伏擊。餘下的敵人留給第三梯次去解決，這樣也許更好一些，自己傷亡也會小一些。經過大家反復討論，同意了我的意見。
>
> 這樣，我們部隊在幾十華里的區域內，分三個梯次部署展開。[1]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就攻錦州還是打長春致中央軍委電：「（......）（2）估計攻錦州時，守敵八個師雖戰力不強，但亦須相當時間才能完全解決戰鬥。（......）（3）錦州如能迅速攻下，則仍以攻錦州為好，省得部隊往返拖延時間。（4）長春之敵數月來經我圍困，我已收容逃兵18000人左右，周邊戰鬥殲敵5000余，估計長春守敵現約8萬人，士氣必甚低。我軍經數月整補，數量、質量均大大加強，故目前如攻長春，則較6月間準備攻長春時的把握大為增加，但須多遲延到半月到二十天。」[2]

日期不詳

在長春城外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的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八師一團參謀長劉悌接到通訊員報告，說有一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

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人，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他們進去一看，鍋裡還剩一條大腿沒吃完。團長回來對通訊員說：「那天都沒吃飯。」[1]

前往長春慰問共軍圍城部隊的東北魯迅文藝工作三團，被多次組織去八里堡、洪熙街等地，當時被稱為「真空地帶」的難民區參觀。他們看到難民「有的全家老小一排屍骨擱放在炕上。街上被打死、餓死的屍橫滿地」。[2]

史說，國軍新七軍少將副軍長兼長春警備司令部副司令，他在四十年後回憶道：「在南郊和東郊兩軍陣地之間約兩、三里至四、五里的空隙裡，逃出去的居民人山人海，餓死、病死的無法計數。還有臨時產生的土匪乘機劫掠難民的食物和財物，真是慘狀百出。有的父母逃出去了，小孩留在市內，慈善機關發動軍官去領養，哪裡領養得完呢？（......）到 10 月初，已是山窮水盡。軍隊吃豆餅酒糟，官兵個個浮腫，腳已難以走路。（......）長春毫無指望了。」[3]

1948・10・3

在上海，民國政府金融當局稱，金圓券發行總額逾9.5億元。

《東北日報》以「長春敵軍大批逃亡，旬日投誠兩千餘人」為題，發表來自圍困第一線的通訊：

> （……）被圍困於長春死城之敵，饑餓動搖，軍心渙散，尤以雜牌軍及地方部隊遭其嫡系部隊歧視，待遇惡劣，處絕糧境地，更呈土崩瓦解之勢。
>
> 目前長春民間糧食被敵軍搜刮殆盡，空投不濟。敵軍士兵給養已減至每人每日僅發雜糧12兩（內大部為豆餅麩子麵），但嫡系部隊之新七軍三十八師則待遇獨厚，每人多發大米3兩。在糧食不能供應時，地方部隊僅發代金，此種代金規定每人每日發蔣匪東北流通券1200萬元，而糧食黑市以高粱為例，則已漲至每斤1500萬元，尚屬有價無市。在此種差別待遇之下，敵新七軍與六十軍之間摩擦時起，雙方士兵曾在市內大同廣場鳴槍衝突。而國民黨土匪部隊待遇則更為惡劣，日以豆餅鹽水果腹，他們在難以為生之情況下，紛紛瓦解，其駐城西二道溝之敵吉林保安旅，不斷成班成排向我投誠，以求一飽。

在二十天之後，即10月23日，中央社瀋陽電稱，陷落於國共兩軍空白地帶的長春難民「不但要受餓死的威脅，還要受不斷的流彈炮火的震驚。10月3日，國軍向匪軍出擊，兩軍在長北宋家窪子、大小房身及長南一帶交鋒，難民便犧牲了不少。」

1948・10・4

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給東北區域行拍發電報稱：「惟因軍方購糧需款甚急，每日仍繼續發據流通券本票 5 萬億元（約合金元券 1500 萬元），據此計算，11 天發行 55 萬億元。為此本票發行總額共為 138 萬餘億元。」[1]

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給中央銀行的第 3296 號電文稱：「長市居民僅及軍隊半數，而物資枯竭。」[2]

1948・10・5

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給東北區域行拍發電報稱：「長春市流通的東北流通券約計 5000 億元。」

上海《糧食日報》自長春專電：「長春連日淒風冷雨，氣溫更見低下，落葉亂飛，草木枯黃，一片初冬景象。旬日來市民南下者更多，據非正式統計，長市人口已不足 7 萬。街頭行人寥寥，多為武裝同志。昔日最繁華之大馬路一帶大小商店，十九關閉。永春路及珠江路兩處菜場交易清淡，供售者以騾馬肉及糟糠麵等居多。」

1948・10・6

中央社長春電：「駐長國軍精銳部隊，今日拂曉向長春西郊出擊，於小房身一帶曾與匪接觸，發生激戰，斃匪400餘。」

廣州《勞工新聞報》自南京專電：「行政院定7日召集空總、交通、糧食等部首長舉行會議，討論加強空運長春糧食問題。」

在長春城內，發行本票的面額，開始發行時為30萬元一張，繼而發行5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一張的，迅即增到1.2億元一張，乃至發行不定額本票。截止10月6日已發行13種，總額達831133億元。[1]

史說，國軍新七軍少將副軍長兼長春警備司令部副司令，他在四十年後寫道：「長春的物價飛漲。50元、100元票面的『東北流通券』已不夠流通了。長春的中央銀行分行就發行『本票』，票面由萬元、10萬元增加到1億元、10億元。長春分行幾十個職員通宵達旦的開本票還不夠用。因為今天開的，明天又不管用了。」[2]

今日，國軍新七軍軍長李鴻率領部隊突然出城向西北方向突圍。在《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中，是這樣記錄這次衝突的：「由於這是幾個月來敵軍第一次出擊，我圍城部隊事先未得到情報，準備不很充分。加之敵軍一出來就是三十八師一個師，還有新七軍六十一師和六十軍一八二師的配合，所以雙方剛迎戰時敵軍就突破了我圍城的獨立七師防線。我東野總部得到報告之後，命令前線圍城指揮所的肖勁光司令員『必須以炮火控制機場，阻敵機空投。如步兵能佔領即佔領，並將跑道破壞』。我圍城的獨七師和獨十師不僅堅決地阻擊了敵人的進攻，而且把機場跑道炸了一個大窟窿。這一招很起作用，機場已不能使用了，又何須拼命去佔領機場！李鴻和曾澤生都主張把部隊撤回來，曾澤生又找鄭洞國說官兵沒糧，餓著肚子怎麼沖得上去。鄭洞國只好下令出擊部隊全部在8日退回城內。這一次突圍就這樣結束了。」[3]

1948・10・7

中央社長春電：「7 日此間天氣晴朗，上、下午陸續有大批空軍運輸機，來此空投。（……）但一向每有飛機空投時，即行盲射之匪炮，則未鳴一響。大批物資乃得由較低之高度安全投下。」

《東北日報》稱：共軍共收容長春難民 15 萬余人，發放救濟糧 4000 餘噸，救濟金 6 億元，食鹽 500 斤。

日期不詳

在長春市海棠街，饑餓的范傳華一直在等待王雙全叔叔回來，能給他弄點吃的東西。坐著等，躺著等，就是不見人回來。

一天下午，他好不容易從床上坐起來，他感覺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這裡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和他開玩笑，室外的一切也在晃動，活像變戲法，一會兒倆，一會兒仨，看窗外的國軍一個哨兵站崗，可他看上去像一個班，齊刷刷地在接受他的檢閱。

等到心緒平靜時，他在床邊箱子上找到紙和筆，在兩眼冒著金花中，以顫抖的手直接給長春周邊的共軍寫求救信。他在中共奪取長春勝利二十九周年時回憶道：

長春西線大房身機場八路軍叔叔：

我住在長春市鐘華區海棠街和國軍三十八師炮兵排是鄰居，我在西陽區小學三年級上學，國軍把我們學校校舍拆了，拿去修工事，再加上吃不飽，我們都不能上學了。

我家四口人，已經餓死三口了，我家的一塊樹皮也都吃光了。現在甚麼吃的也沒了。八路軍叔叔快打進來吧！趕快打進來吧！可把我餓死了。

一個失學沒有爹媽的小國民 范傳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秋天

這封信寫完後，他既不知道寫信的具體日期，也不知道具體收信人地址，更沒有郵政快遞，他只能將這封信留在自己的手裡。

1948・10・8

中央社長春電：「長春出擊國軍，今日下午 3 時已完全收復長南 15 華里之孟家屯車站，各路出擊部隊均續有進展。長西之車家窩堡、崔家營子、白狗屯一帶高地，亦已入國軍掌握。」

1948・10・9

國軍長春新七軍兩個營出城襲擾，被共軍擊退。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再次調整和部署兵力，在吉長以南不過一百至二百公里的狹窄地區內，集中了兩個縱隊，10 個獨立師，19 個獨立團的重兵，嚴防國軍增援部隊。

在長春城內，開始發行和流通 1.8 億元的本票。[1]

1948・10・10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周年國慶紀念日。

中央社南京電稱，總統府舉行慶祝典禮，蔣介石總統致辭，感懷昔日先烈「締造民國之艱難」與「今日建國責任之艱鉅」。蔣稱：「共匪為民族主義之敵人，其目的在消滅中國民族。當此國家民族成敗存亡關鍵之際，政府同人民應特加警惕，一致奮勉，（……）完成戡亂建國之責任。」

上海《益世報》以「國慶昌言」為題發表社論，該社論中指斥中共稱：「誰都知道，當前局勢之所以嚴重，不僅在中共是一個挾有武裝的叛黨，而在其為具有國際性的破壞集團，他們實際是在替某一國家做第五縱隊，做滅亡了自己的國家而投入別人懷抱的工作。中國的內亂，是國際性的，是共產國際世界活動的一部。」

在長春城內，鄭洞國接到蔣介石命令突圍的親筆信。他當即召集師長以上將領研究，一致認為官兵體力甚弱，勉強突圍有全軍覆滅的危險。鄭和曾澤生、李鴻兩軍長聯名覆電蔣介石，說明不能突圍的理由。

在哈爾濱，中共已做好接管長春城的準備工作，成立長春市籌委會。先後組織了一批幹部到哈爾濱市進行培訓，學習管理城市的政策和經驗，又到哈爾濱市委、市政府及所轄市區進行實習。[1]

與此同時，市籌委會也將長春工委的一部分幹部派到吉林市參加接收工作，進行城市管理的實習。中共官員馬鴻新受命任長春市和順區區委副書記兼區長，曹瑛受命任長春特別市市委書記，他們將隨軍隊進入長春城。[2]

1948・10・11

中央社長春電：「長市各中、小學頃因受戰爭影響，一般市民紛紛離長南下，學生人數已較前銳減。據市教局上週三之調查，全市現僅有中學生 1127 人，小學生約萬人，均不及本學期開學時之三分之一。教員離職者較少，約為二分之一弱。」

1948・10・12

廣州《中正日報》自天津特電：「據由長春逃出者稱，在長春曾以大米九十斤換得黃金六條半。」

1948．10．13

福建《中央日報》稱，在錦州市郊，國軍「殲滅共匪達萬餘人」；在張家口，國共兩軍「戰鬥慘烈，3 小時內匪以人海戰術反復衝鋒二十餘次，死傷慘重，終未得逞」；在遼西塔山，國共兩軍「戰鬥激烈，匪罔顧人道，迭放噴射性毒氣」。

天津《民國日報》自瀋陽下午 9 時專電：「長春 80 萬市民之生死問題，已引起國際間之普遍注意，東北中、韓、蒙、日國際共產聯軍圍困長春，已曆四個月，市民因饑饉致死者，日逾 500 人。而逃亡者，復遭共匪槍殺，或逼返長市，或留為擔架夫，此種變相屠殺，世人共憤。瀋市各界 13 日成立救濟長春難胞委會，將大量募款救濟。據由長春來人談：由長逃出之 1.5 萬人，均被困於匪區，饑餓待斃，嗣經推薦代表，要求放行，共匪恐激起民變，已允通過。故抵瀋難民，日有增加，有商人三名，以一條毛毯，換韓共大豆 30 粒免於餓死。長市高粱米每斤已售法幣 1.2 億元。」

1948．10．14

在錦州城外，共軍向錦州城發起總攻。

在長春城，國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密派張秉昌、李峥先（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先持他本人、暫編二十一師師長隴耀和第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學三人聯名親筆信，出城與共軍聯繫，表示決心起義。

在長春城外，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等人研究了張秉昌和李峥先帶來的關於第六十軍計劃起義的信件內容，認為比較可靠，即報告兵團司令部。肖勁光與眾人反復分析討論，最後認為「六十軍在當前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起義是可能的」。他請人向張秉昌和李峥先轉達意見：「對六十軍起義表示歡迎，請曾澤生派正式代表出來商談起義。」[1]

與此同時，肖勁光佈置了防止國軍第六十軍以投降為名進行突圍的準備工作。

1948・10・15

深感東北危機的蔣介石，親自坐鎮瀋陽，空投突圍手令，命令鄭洞國、曾澤生、李鴻遵令即刻開始突圍行動。電文說：「現機、油兩缺，爾後即令守軍全成餓殍，亦無再有轉進之機會。如再遲延，坐失機宜，致陷全般戰局於不利，該副總司令、軍長等，即以違抗命令論罪，應受最嚴厲之軍法制裁。」[1]

午後6時許，共軍佔領錦州，消滅和俘虜國軍范漢傑部隊10萬餘人。錦州陷落，引發東北國共戰局的急劇變化。「錦州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處東北和華北之交的走廊地帶，一側是高山，一側是渤海，東有大淩河流經，地勢險要。」一名中共文史學者寫道，「……錦州還是國民黨政府向瀋陽和長春空運糧彈物資的基地，是大軍從陸路出入華北和東北的必經之地。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錦州一旦解放，等待著瀋陽和長春國民黨軍隊的只能是全軍覆滅。」[2]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歡迎六十軍起義。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副參謀長潘朔瑞等接見張秉昌和李崢先，要其轉告曾澤生，另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談起義事宜。

在四十三年後，由官方出版的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稱，共軍在處理難民工作有一條紀律：「不拿難民一針一線。」該書中寫道：「在封鎖區前哨執行任務的幹部、戰士，在執行這條紀律上都是高度自覺的，無論是在長東或是長南工委工作隊所在的封鎖區內，沒有發生一人違犯紀律，沒有一人趁機侵吞難民的任何財物。用『秋毫無犯』這句話來稱讚我們的幹部、戰士，他們是當之無愧的。」[3]

但是，真相果然是如此嗎？

在今日出版，由共軍編印的《圍城簡報》記載著對圍城部隊在執行任務中違犯難民紀律的現象，以及對城市政策的學習進行了批評和總結。該簡報摘錄了軍方《前線報》以「一九部開展向違犯紀律現象作鬥爭」為題的社論，社論如是稱：

> 圍城以來有不少的同志，不顧黨的政策與圍城紀律，不顧我

軍政治影響，企圖乘機發難民財，發逃兵財，發戰爭財，因而大肆收買難民和逃兵的東西，特別是鋼筆和手錶，這不僅有戰士，而且排、連、營級幹部，甚至還有團級幹部，拿金子（公款）到城內去買，並且還有些人趕快往家裡寫信，要家裡寄糧寄錢來收買東西。當然這些違犯政策和紀律的同志，有的是盲目的，認為收買點沒有甚麼關係，或是受了上級幹部的影響，認為上級幹部都可以買，我買一點怕甚麼，也就跟著犯了紀律（當然這種跟著犯紀律也是不對）。但另外一部分同志則是為了個人利益，雖然自己知道不對，但結果還是買，這種犯紀律行為是明知故犯的，這種人多是幹部。因為他是幹部，所以他就大膽去買，因此不僅他自己買了，而且還影響了別人，使得別人跟著走，而他就算起了帶頭作用。但必須指出，不論哪一種人，本質都是一樣，自私自利的個人打算，個人主義。

違犯紀律的不僅表現在收買東西這件事情上，而且還表現在打罵難民及亂行沒收難民、逃兵、走私奸商的東西。據這次紀律檢查的結果，收買難民、逃兵的東西以「江山」部最為嚴重，全團收買八十餘支鋼筆，二十餘塊手錶，而打難民及亂行沒收的現象也最為嚴重。如該部二連就是很標本的事實，打難民、罵難民、打傷難民的現象都發生了，這完全是一種脱離群眾、沒有階級立場、沒有群眾觀點的軍閥主義行為，是革命紀律所不容許的行為。又如該部某連擅自沒收難民銀鐲子及難民和逃兵的十余塊現洋等，對奸商的沒收，也是事前不請示而擅自決定。這些都是違反紀律破壞政策的嚴重現象，亟待我們以嚴肅的態度和對黨負責的精神來嚴格檢討並徹底的糾正。

該簡報中還對一一部城市政策的學習做出了總結，總結中如是稱：

嚴重違犯紀律政策的現象與發洋財思想：如一團在長南圍困任務時，買難民的錶三十六塊、鋼筆九十六支。偵察連有三分之二買了難民的布、線、襪子、錶、筆、衣服。三團二連 130 人，就有 90 人想搞錶、鋼筆、鞋、襪、襯衣等。二團三連戰士説：「敵人的東西，不管倉庫和其他別的，我們還可以拿，這不違犯紀律。如果不拿，敵人來了，還不給他留下嗎？」這不僅是戰士，在幹

部中也同樣存在。如一團八連長在劉家店動員會上號召「把不用的東西扔掉，到長春去甚麼都有了」。

其次，有些幹部及戰士預備幾千幾萬元，等打開長春去買錶、筆，以便來解決苦難問題。

該簡報還刊登了二三部政治部對「二三部駐地的保衛工作介紹」，並指出了其中個別下級幹部仍有嚴重的違犯政策的現象發生的問題：

二十八團管理員劉振鐸，隨便打犯人，用逼供信的辦法刑審不關重要的犯人，並用假槍斃辦法，威脅犯人：「不說就槍斃你！」並真用槍在一旁打好幾槍。

二十八團一大隊的高營長，將已釋放的戰俘捉來（並有釋放證明書）進行審查（是對的），但毫無證據，便說人家是特務，並將人吊起，用火烤前胸，想用逼供信的辦法使其承認是特務，政教看到也不制止。

二十八團的宣傳員鄧文柱、九連文教馮維國在瞭解被查住的老鄉時（可疑），也打了人家。

二十八團偵察參謀王志祥，在前邊也將查住的老鄉（可疑）不很快處理或交政治機關審查，而個人押起，不給吃飯，還有打罵行為。[4]

1948・10・16

上午，國軍第六十軍暫廿一師副師長任孝中和一八二師副師長李佐，攜帶著蔣介石 15 日的空投突圍手令和鄭洞國的突圍計劃出城，作為曾澤生的正式代表，與共軍商定起義的具體計劃。

唐天際向他們轉達了解放軍兵團司令部歡迎他們起義的意見，並希望六十軍能參加攻擊新七軍的要求，任孝中和李佐拒絕了這一提議。肖勁光在回憶錄中寫道：「對他們提出參加打新七軍的要求答覆說：六十軍被圍時間已經很長，官兵們吃不飽，身體虛弱，不必參加解決新七軍的戰鬥了，起義後即出城。」[1]

中午，鄭洞國接到蔣介石第三次突圍命令。他迅速召集軍長和參謀長等將領開會，決定 17 日拂曉突圍。

晚上，曾澤生到各師駐地對營以上軍官進行起義動員，並在一八二師五四五團開設軍臨時指揮所。與此同時，按照共軍的意見，將第六十軍參謀長徐樹民、暫編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及三個團長扣押，以防止他們洩露起義消息。

深夜，有人向鄭洞國報告，第六十軍有可疑行動（第六十軍正向新七軍佈防）。在證實這一消息後，鄭洞國下令新七軍拂曉停止突圍行動，撤回原防。

「軍事失利（錦州陷落）以後，其軍事本身惡劣之影響並不甚大，而社會、經濟、外交與人心極端惡化的現象，絕非想像所能及也。」蔣介石當天在日記中寫道，「此乃自來亡國之景象，不料今日由余親嘗其滋味，悲慘曷極。」[2]

1948．10．17

共軍代表劉浩潛入長春城會見曾澤生。

曾澤生派第六十軍政工處長姜弼武持信到鄭洞國處，勸鄭投降共軍，遭鄭拒絕。新七軍兩個重迫擊炮連在第六十軍防區，隨同第六十軍一同起義。

鄭洞國派兵團部副參謀長楊友梅、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和長春市市長尚傳道面見曾澤生，勸曾「從長計議」，被曾拒絕。

上午，鄭洞國召集新七軍師以上軍官開會，研究突圍，與會人員默不作聲。經再三催促，唯鄭的老部下暫編六十一師師長鄧士富說：「建議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徐圖別策。」鄭只好採納此議。

下午，鄭洞國兵團部機關搬至防禦堅固的中央銀行固守。

劉浩和曾澤生抵達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代表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肖華對曾澤生率部起義的行動表示熱烈歡迎，並具體商談了交接防務事宜和起義部隊行進路線，集結地域等問題。當晚劉浩和曾澤生同車返回長春城。

天津《民國日報》記者楊治興時常出沒於鄭洞國處。今天晚上，他到史說寓所，問史道：「你為何不聲明退出國共內戰？」史問：「此是鄭（洞國）公之意？」楊治興佯稱「正是」。於是，史說決定第二天派代表與共軍聯繫投降事宜。[1]

楊緒亮，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九師第二團參謀長，是圍困長春的一員。他所在的團奉命在晚9時進入長春城接收第六十軍防地。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寫道：「當晚9時，我們以二營、三營在前，一營在後作預備隊，進至二道河子東郊、鯰魚溝地區，派三營長劉振奎去二十一師聯絡交涉。10時，我團進到長春市氣象臺防地，三營接收中央廣場以南，二營接管史達林大街孝子墳以南，18日晨2時接收完畢。（……）此刻，我們與新七軍只有一路之隔，相距不過幾十米，來往行人說話都看得見，聽得清。部隊迅速在牆上挖了槍眼，做了簡易工事，做好戰鬥準備。」[2]

19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國軍第六十軍已起義致中央軍

委電：「（1）六十軍已起義……（3）我圍攻長春之各獨立師及十二縱正向長春前進，以武力威逼鄭洞國投降，並準備殲滅新七軍。」[3]

楊尚峰，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部參謀，參與圍困長春的一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是當晚9時後進城的，兵團首長親自派我給解參謀長送一份東北局轉中央的重要電報。在入城的路上，我借著皎潔的月光，環顧市區情況，一片淒涼景色。在路邊道旁橫七豎八地躺著一些饑民的屍體，慘不忍睹。」[4]

羅兆雄，東北野戰軍獨立第九師二團二營教導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回憶如何從南嶺進入長春城接收六十軍防務：「南嶺下邊一片野草地，躺著許多屍體，無人掩埋，腐爛發臭，慘不忍睹。由於天黑，部隊急速行軍，四連的戰士一腳踩在死人的肚子上，弄了滿腳血水。為了爭取時間，我們也顧不了許多了，快速向長春走去。在接近市區的地方，看到敵人修築的許多碉堡、崗樓和交通壕。這時，已經沒人把守了，只留下一座座空碉堡和空崗樓，一個個黑洞洞的槍眼。」[5]

共軍接防部隊進城完成接防。同時，第六十軍撤出城外，開往九台休整。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後來寫道：

> 天一亮，縱貫長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東地區便成了我們的天下。曾澤生起義後的當天，我與肖華在兵團司令部會見了他和部分起義將領。我說，你率部起義，我們竭誠歡迎。今後我們是一家人了。你們絲毫不孤立，前途是遠大的。我們對待起義部隊的政治、經濟待遇和我們的解放軍一樣，不受任何歧視。
>
> 曾澤生軍長說：我感謝共產黨對我軍4萬餘眾的爭取和挽救，得到生存，今後絕對服從命令，接受教育改造。
>
> 我看曾澤生比較拘謹，就笑著說：你的思想上不要有甚麼顧慮，你打過日本人，還有戰功呢。今後對我們有甚麼意見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講。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並肩革命。
>
> 我和肖華與曾澤生軍長在一起照了相，以後東北電影製片廠還來拍攝了《民主東北》的紀錄片。

在六十軍開往九台的路上，起義官兵有的將帽徽扯下扔掉，有的索性將帽子都扔掉了。（......）

六十軍起義後，鄭洞國的後院起火，長春守敵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曾澤生起義時，曾想爭取鄭洞國和新七軍一同起義，然而沒有成功。六十軍起義後，我們發動起義官兵利用各種相識的關係給新七軍和敵指揮機關的官兵寫信，促其起義。

當時，中央考慮，鄭洞國是東北「剿匪」副司令，是黃埔一期生，所率是蔣軍嫡系部隊，又佔據有堅固防禦工事的大城市，爭取其起義，對全國各大城市的蔣軍官兵都是一個極大的震動，有很大的意義。[6]

江學彬，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六師政治部主任。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17日淩晨，我先頭部隊十七團進入市區，接替了原六十軍二十一師防地。傍晚，師直和十六團趕到水道科、洪熙街一線。晚10時許，蔣介石還派了高參乘飛機到長春上空用報話機向鄭洞國等人喊叫甚麼『不成功，便成仁』。我們聽得一清二楚。飛機走後，市區死一般的寂靜。」[7]

王效明，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獨立第十一師（朝鮮師）師長兼長春衛戍司令。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師從接替六十軍防區起，即以長春衛戍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執行任務，我任衛戍司令。新七軍放下武器投誠後，一團奉命歸還我師建制，（......）在長春軍管期間，我師主要是執行城市警衛任務，未參加軍管的具體工作。但對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則進行了大量的收容、教育和審查工作，然後移交給訓練團或做了其它妥善處理。這部分人總共有七、八百名之多。」[8]

接替國軍六十軍防區的共軍，端著子彈上膛、上著刺刀的槍支，殺氣騰騰地踏入了長春城。夾道歡迎他們的，除了黑夜，就是一具又一具的餓殍。

數十年後，出生在長春的倖存者遠藤譽造訪故地，已是人過中年。一位當年隨軍隊入城（沒有參加過圍困）的老年軍人，他曾在東大橋周邊看到了非常多的餓殍。他在長春接受遠藤譽訪問時說：「路上到處都是屍體，連走路都很困難，（......）」[9]

1948．10．18

接管長春的中共部分幹部隨軍隊進入長春市區。中共長春特別市市委和市政府成立，曹瑛任市委書記，鄒大鵬任市長，張文海任副市長兼代秘書長。

楊緒亮，東北野戰軍獨立第九師二團二營教導員。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回憶如何與國軍新七軍將領談判投降事宜。當天淩晨4時許，新七軍一名連長來找他們要求投降接收防地，他們表示懷疑，讓這名連長回去令其也願意投降的團長姚鳳翔來談判。新七軍團長姚鳳翔、炮兵指揮官王及人和師政工處主任吳祥伯趕來，要求他們派人去接收武器。他們仍懷疑投降者的「態度不誠懇」：

> 經我們研究確定，暫時不讓他們走，先派人把榴彈炮拉過來，看看是否是真的。當時，我就派通信參謀卜繁榮去拉炮。10時，六門105釐米口徑的榴彈炮，用六輛大牽引車，拉到我們團部。
>
> 我們見這幾個人果有誠意，向他們宣傳了我軍的政策，要他們回去，再做其他軍官的工作。
>
> 上午11時，三架敵機偵察盤旋數周，在東部我軍接收地區投下了數枚炸彈飛走。下午2時，又來三架飛機向我防守地區投彈轟炸。其中一枚炸彈在距我團司令部駐地200米處爆炸，將東光寮大樓的玻璃震碎。我們也準備著情況的突變，戰鬥氣氛非常緊張。
>
> 中午，我們立即將當前的情況向師和兵團部報告，請求速派首長來同敵人談判。
>
> 晚上，廖中符師長來了。隨後，長春前線指揮所、兵團參謀長解沛然也來了。我們向他們作了詳細的彙報，決定明天繼續談判，要求對方派正式代表來。
>
> 晚10時許，新七軍派了七位將領，代表該部前來東光寮談判，其中有各師的副師長、團長等。（……）談判中，我軍全權代表解參謀長首先發言。他說：「我們歡迎諸位代表來和我們談判。你們是否有鄭洞國和李鴻的正式函件？」
>
> 對方一位代表站起來先敬個禮，解參謀長擺著手，連連說：「坐下講，坐下講。」這位代表說：「我們沒有鄭洞國和李鴻的正式函件，他也不會給我們正式函件。我們是代表個人來的，也代表我們的

士兵。」

解參謀長説：「沒有正式函件，你們代表有效嗎？」

對方又一位代表説：「...... 我們這些師長、團長都不願意打了 ......」

解參謀長説：「我們知道你們也不能再打下去了 ......」

對方的一位代表説：「我們願意放下武器，並保證各種倉庫物資不受破壞，歡迎貴軍和平接收。我們只有三條要求：一，請貴方不要廣播，不要登報説我們投降了；二，請保證我們軍官和士兵的生命財產安全；三，我們有的人願意到香港去，有要回家鄉的，請放行。」

解參謀長説：「你們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這是一件好事，是一個光榮的行動，應該叫全國人民知道，我們應該登報、廣播，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傳。我們黨的政策是對放下武器投誠的人員寬大處理，一個不殺，不搜腰包，不沒收私人財產。對你們也是這樣辦。你們的官兵，願意回家的，我們可以發給路費資遣回家；願意工作的，我們分配適當工作；至於到香港去的問題，目前我們還辦不到，那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和他們還沒有外交關係。我們勸諸位最好不要到香港去。」

（......）最後，經雙方議定，接收的具體措施如下：（1）所有的倉庫、被服、武器、彈藥、銀行等物資設備，均不得破壞，原封不動地交給人民解放軍接收；（2）現有戰鬥部隊的所有武器、裝備、車輛、馬匹等，以營為單位集中交解放軍接管；（3）軍隊校級以上軍官，到前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集中，尉級軍官，到偽滿國務院大樓集中，聽候處理。士兵以營為單位集合，等待人民解放軍調動，不得有零散士兵在街上或在居民區亂跑。

中午，新七軍派代表與共軍商議投降事宜。

下午，鄭洞國到新七軍軍部召集師以上軍官會議，鄭説明上面命令仍要求突圍，但參會人員態度消極，鄭無奈返回兵團部。

晚上，國軍周邊據點的保安旅、獨立團、新七軍騎兵團投降。24時，新七軍與共軍開始正式談判，並在投降協議上簽字。

1948・10・19

上午10時，共軍在國軍新七軍代表引導下入城受降。新七軍部隊以營為單位集體放下武器投降。長春警備司令部、長春國軍勤雜部隊及東北五省流亡政府等相繼投降。然而，鄭洞國兵團司令部，仍據守中央銀行，拒絕投降。共軍通過尚通的電話對鄭勸降遭拒。該兵團司令部參謀處少將處長郭修甲要求共軍派代表就投降進行商談，商定10月21日投降。

在洪熙街卡子裡，日本人竹中重壽已在絕望中困餓了十九天。

今天，他突然看到卡子的柵欄門打開了。於是，他和近百名難民們「像雪崩一樣沖向解放區」。他認為自己是「奇跡生還」。

（但是，他的苦難還沒有結束：他和其他日本人在逃到四平街時，被共軍關在拘留所兩週後得以釋放。接著他在去瀋陽的路上又被共軍抓獲，便開始為中共東北政府工作。再接著受到中共的調查和清洗，被以戰犯和反革命犯的罪名判刑入獄七年，1953年因為中日開始交流時被提前釋放並得以回到日本。）

他後來接受遠藤譽的訪問時證實，自他在1948年9月30日進入卡子後直至10月19日共軍佔領長春城的這十九天之內，共軍從來沒有打開過卡子放難民們逃生。

遠藤譽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您寫到在卡子中被關了十九天，在這期間，解放區的卡子的門一次都沒有開過嗎？」

「是的，一次都沒有開過。」

「也沒有只讓技術者出去過嗎？」

「沒有呢。只是，我們一行人中有四、五位技術者，他們在半夜的時候帶著家人朝著卡子的門走過去了。大家都湊集了一些財物，拿去交涉要從卡子裡出去。但是其中有一人被射殺了，結果，誰都沒讓出去，都回來了。」

「啊，被射殺……那麼十九天間沒一個人，也就是說連技術者也不讓出去嗎？」

「是的，一個人都不讓出去。」[1]

在長春市南關大橋東側對面的一個院子裡，住著陳喜文一家十六口人，8 歲的陳喜文，有兄弟姐妹九人。他們一家人，依靠二哥陳喜雲販賣糧食維持生活。在圍城初期，家裡存放的幾袋黃豆成為救命糧，一家人佐以野菜、米糠和樹皮果腹。到 10 月時，鄰居們死的死，跑的跑，十室九空了。他的家庭也撐不下去了：十個孩子，已有五個餓死。他們決定出城逃命。

今天，陳喜文的大哥陳喜庭先帶幾個人出城。他們從南關大橋走出國軍卡哨。陳喜文在六十五年後寫道：「一路上磕磕絆絆，經常看到饑民的屍體，有的已經腐爛，發出的臭味讓人嘔吐，身上帶的一點吃的也讓人搶走了。好不容易走到洪熙街解放軍卡子，才聽說長春解放了！不用出城了。」[2]

上午 11 時，在長春市海棠街，范傳華繼續等待王大叔。一直等到絕望了，他才重新躺下。他不吃，也不喝，更不拉，他覺得自己成為機器人了。當然，躺在炕上，他連白天和黑夜都不知道了。當有人拼命敲打他床邊南側的小圓窗戶時，他慢慢醒了。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寫道：

> 我被這突然急促的拍打聲慢慢地驚醒：「老范家小孩，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了！」
>
> 那時的我，眼神不好，聽力減退，反應遲鈍，活像八、九十歲的老人，好半天才緩醒過來。還沒等我應聲，劉大娘聽屋裡沒動靜，很是放心不下，於是又放開嗓門喊了起來：「老范家小孩，八路軍來了！」是好鄰居劉大娘把我從死神手中奪了過來。
>
> 我聽見劉大娘熟悉的喊聲，我使盡全身氣力，微弱地喊了聲：「劉—大—娘。」這時，劉大娘才放心地離開我的窗前。

范傳華曾在兩年前見過八路軍，他覺得他們是好人。自己終於有救了。他靠著本能從床上爬起來，下地，扶牆，拄棍，去歡迎八路軍。八路軍是歡歡喜喜的，一派歡樂的氣氛。一名八路軍看到他，問了一些話，然後抓了一把炒黃豆給他。范傳華說，他就是靠著這把炒黃豆給胃墊底，才沒被活活餓死。

下午 3 時，警察部隊乘坐在運送救濟糧的大馬車上風塵僕僕地進城了，車上的救濟糧是乳白色的小米。共軍在海棠街政府召開民眾大

會，一條街道總共到會十四個難民，范傳華是被鄰居葛叔叔背著去的。他在六十七年後回憶道：

> 在街政府門口，圍一圈人，我根本站立不穩，還是葛叔叔照顧的。會議由新上任的街長蘇昆主持，他穿著黑色棉軍裝，挎著匣子槍，腳著黑布鞋，頭戴朱德帽。其他的解放軍穿著的是黃色棉軍裝，武警是黑色棉軍裝，都頭戴朱德帽。
>
> 蘇昆在會上說：「長春的同胞們，我們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專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隊伍。今天，長春解放了。我們運糧馬車大隊緊跟著部隊前進，部隊打到哪裡，我們運糧馬車大隊就送到哪裡，糧食就送到哪裡。從今天起，我們當家作主了。今天，我們每個同胞發 3 斤小米。請大家注意，回去只能煮稀粥吃，不准吃乾飯，而且每餐只能喝一小碗，不准吃第二碗。請大家放心，以後糧食有的是，一律免費供應。現在不讓大家吃乾的，主要是怕撐死。在宋家窪子，就發生一些同胞沒被餓死，好不容易熬到解放了，可是，解放了，他們卻被撐死了，真使人痛心啊。主要問題是肚子飽而眼不飽造成的，請各位鄉親父老牢記這一條；第二，請大家注意，發現哪裡有國軍和武器彈藥，都要及時報告，論功獎賞。鄉親們，大家能不能做到？」
>
> 「能，能。」大夥兒一邊說一邊掉眼淚，很屈，今天解放了，就改天換地了。其實，大夥兒都沒多少力氣，是用最後一口氣奔到街政府來領救濟糧。把大麻袋一打開，大夥兒就撲上去了，捧小米啊，捧一下，聞一聞，捧一下，聞一聞，鼻涕眼淚都落在大麻袋裝的小米裡了。鼻涕眼淚啊，沒有一個人去挑剔的，都是激動的心情。
>
> 「哎呀，小米啊，久違了，久違了。一年多沒見哪，圍困期間，一年多沒見哪。」有點文化的人都這麼說，一邊說一邊流眼淚。「感謝人民大救星毛澤東，感謝共產黨，感謝八路軍。」那時候老百姓還叫八路軍，不知道該叫解放軍，感謝毛澤東，感謝共產黨，感謝八路軍。[3]

兵不血刃

1948・10・20

新華社陝北電稱，長春解放，中共中央特電祝賀：「名城光復，秩序井然，人慶更生，歡聲雷動。此皆我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前後方工作人員與廣大民眾奮鬥的結果。」[1]

長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成立，由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任主任，市委書記曹瑛、市長鄒大鵬任副主任，張文海任副市長兼市政府秘書長。軍管會為長春特別市最高權力機關。軍管期間，市內的安全、保衛工作，一律由軍管會負責；除武器彈藥須交指定的軍事部門處理以外，其他一切敵偽物資，統由軍管會接收管理；後方機關部隊人員進城，須持專門護照。

新成立的長春特別市委「把救生埋死（搶救活人和埋葬死屍）當作一場重要戰鬥來完成」，連夜組織給五萬至六萬倖存的市民發放救濟糧。曹瑛後來寫道：「我們乘車入城，看到道路兩旁死屍橫陳，慘不忍睹。老百姓家，有的一家一家地餓死在炕上，活著的人也都奄奄一息。當時天氣已寒冷，不少人還沒有穿上棉衣。」[2]

長春特別市委鼓勵有勞動能力的群眾，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先發給救濟糧，再組織他們參加埋葬死屍和清理垃圾等恢復工作。在10天內，腐爛得很厲害的「死屍十多萬具」受到火葬或集體掩埋。[3]

進入長春城的共軍士兵李勤，後來轉為新成立的市公安局的一員。他在進城中看到「沿途遍地都是秋風吹下來的黃樹葉，每隔不遠就有一道鐵蒺藜路障，路邊還有橫躺豎臥的匪軍屍體和餓死的老百姓」。[4]

夜晚，在秋風蕭瑟中，傳來共軍唱響的歌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後來，一家報紙記者寫道：「這是久處水深火熱之中不能自拔的長春人民聽到的走向幸福的歌聲，是中國共產黨把長春人民解放出來的歌聲，這歌聲回蕩在長春的上空，經久不息地回蕩在長春的上空……」[5]

1948・10・21

天剛破曉，鄭洞國的特務團開始對空鳴槍半小時，然後，鄭洞國等 400 餘人投降。一個軍官向其士兵講話：「弟兄們，我們先交了槍，但是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1]

至此，共軍全部接收了長春。「這座塞外春城被圍七個月，終於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來。」[2]

共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後來寫道：「在我軍勝利進軍的凱歌聲中兵未血刃地結下了這個富有戲劇性的城下之盟。說來也巧，鄭洞國所率領的守城部隊是國民黨第一兵團 10 萬人，而我圍城部隊的番號和實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團 10 萬人。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富有戲劇色彩。」[3]

新華社長春急電稱：「鄭洞國部的投降，是國民黨守城軍隊在高級指揮官率領下實行全體投降的第一次。這是中國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並將繼續發生更大變化的象徵。因為這一點，長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東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給所有據守大城市的國民黨軍隊指出了一個前途。」[4]

中共《長春新報》在提及奪取長春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意義時說：「此次解放長春，解決了 10 萬守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尚屬首次，這一勝利的全部過程，充分證明了毛主席戰略指導思想的英明正確，同時也說明了中國革命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勝利的最大特點，則是我軍一槍未放地奪取了這一強固設防的名城，爭取了六十軍的全軍起義，及鄭洞國的率部投降，正像我長春前線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同志所說的：『敵人困守長春，以為我軍是猴子吃核桃，啃不動，豈不知核桃內部早已腐爛了，況且我軍也絕不是猴子，而是一個沉重的鐵錘。』」[5]

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政委肖華後來回憶說：「長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沒發一槍一彈，把蔣介石的 10 萬精銳部隊解決了。這是我國第一個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一座大城市，開創了在解放戰爭中迫使整軍起義，實現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輝範例。」[6]

救生埋死

共軍佔領後的長春，真的像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宣傳科長那狄在1948年8月20日所預言的那樣，「今日長春」已經「完全成為死城一座」。

一名85歲的長春老人回憶說：「解放後的長春城，很多房子的木門和木窗戶都被拆下來燒火做飯和取暖用了，不用進房，在外面就可以看見房裡全是露著半截身子的餓死的人的屍體。」[1]

時年1歲的周相匯，是長春市八里堡居民。他的父親經常跟他講述圍困的往事。他在六十七年後引述他的父親的話說：「八里堡整個都餓得沒人了。那些房子，誰占了就是誰的地方了。」[2]

時年6歲的李忠民，是長春市宋家窪子居民。他在六十七年後回憶說：「宋家窪子是居民點，餓死的人不能在那兒燒。我家那會兒住在宋家小學旁，我看見從宋家小學的操場上把餓死的屍體用膠皮車子，拉往十多公里外的唐家營子煉，整整燒了一個多月，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沒有一天有好空氣，聞到的那個味兒，都是人肉燒焦的味道。」[3]

時年12歲的孤兒范傳華，在長春市海棠街，他的爸爸、媽媽和弟弟餓死。他在六十七年後回憶說：「（共軍進入長春城時，）到處是死屍，沒有一處房子是沒有死屍的，要是哪個房子沒有死屍簡直是奇跡。到處都是死屍。」[4]

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為慶祝長春解放，通知各部門和單位應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 （1）開幹部和群眾會議，普遍熱烈慶祝廣泛宣傳長、錦偉大勝利，加緊生產，準備踴躍交公糧，市鎮宣傳募冬鞋慰勞前方，提高群眾，更加努力支前，解放全東北。
>
> （2）（……長春周邊）等縣的民兵自衛隊，應加緊戒嚴，實行路條制，捕捉散兵，嚴防長春少數漏網之敵特首要分子等潛逃。

(3) 後方任何機關部隊在軍管期內一律不准入長市和收買物資，違者處分。

(4) 前從長春出來之難民，因市內缺糧等，勸其暫緩回去，候政府正式通知有組織地返回。[5]

前來慰問圍城部隊的東北魯迅文藝工作三團，以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宣傳隊的名義，為起義的國軍第六十軍演出歌劇《白毛女》等節目，激發國軍士兵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的階級仇恨，還積極「向居民宣傳中共的城市政策，挨家挨戶走訪調查，向群眾發放救濟糧，清理廢墟和掩埋屍體；（……）在市內主要街道進行宣傳講演 ……」。[6]

在長春市國立長春大學就讀的學生趙銘紳，在1948年3月下旬參加了中共的地下秘密工作小組「東北人民解放先鋒隊」，負責搜集中華民國的工商業情報任務。當長春城遭到圍困封鎖後，他和其他同學一批人離開長春，趕往中共設在九台的長春學院學習。10月中旬，他和同學們接到緊急通知，與接管長春的幹部組成進城工作隊，他被編入第二大隊，開赴長春城。他在四十年後寫道：

10月19日長春解放，我們二大隊負責接管頭道溝區；我和王曉波被派到當時的二、三聯保（南廣場以東一片）接管保心所。

這時的長春，(……) 大多數人已餓得骨瘦如柴，臉色灰暗，兩目無光。工廠、商店多都倒閉，到處是空樓空房，街道骯髒，垃圾成堆，有的房子還有沒掩埋的死屍，發出腐臭味。工作隊進城的首要任務就是救生埋死。我們下到聯保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從解放區後方突擊運來的小米，緊急發放給老百姓。多少天沒有吃到糧食的老百姓領到黃燦燦的小米，人人笑顏逐開，他們說：「如果長春再晚解放幾天，我們都得餓死，還是共產黨好！」不斷向我們道謝。救生任務完成後，第二件事就是發動和帶領群眾大搞衛生，打掃街道，清除垃圾，把掩埋不深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運到市郊火化或挖深坑埋起

來。

經過半個多月的突擊緊張工作，城市面貌大變，防止了瘟疫的發生，群眾恢復了生氣，對共產黨逐漸清除疑慮，基本群眾更加靠近工作隊。[7]

中共《長春新報》熱情洋溢地讚美了中共黨、政、軍進入長春市後如何展開拯救活人和掩埋死人工作：

長市人民在蔣匪統治時期，得不到糧食，多食酒糟、穀糠或豆餅，不是餓得面黃肌瘦，便是吃得腿臉俱腫，蔣匪殺民養軍政策之慘，令人發指。民主政府為保證解放後不再餓死一人，在解放前即由商業局從吉林省政府邀請了汽車大隊協助，並雇用工友，自入城翌日起，全體幹部與工友，即以連續兩天兩夜不休的時間，緊張籌劃和運輸，23 號即把第一批糧食 18 萬斤分運到各區，以後就集中全力搶發，到 27 號已各種糧食 73.8 萬斤到各區。各區政府接到糧食後迅速向群眾發放。（......）

各區發放救濟糧辦法：一般是先和群眾見面，瞭解饑餓情況，進行宣傳、慰問，以後通過保甲或群眾會議作初步統計，再在群眾大會上自報，大家評議，最後經工作隊批准，公平合理地發下。更為結合恢復建設，對一部分有勞力的，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發放救濟糧，先賑後工，正組織群眾打掃衛生，替逃難戶看管房屋財產，組織運輸等工作。現各區所組織的以工代賑，均已取得了初步成績；長春區群眾已將妨礙市面交通的大馬路一帶完全打掃乾淨。

（又）鐘華區首次救濟已經結束，計救濟了 3280 人、1659 戶中有手工業及工廠工人有 210 戶，餘均小商販、城市貧民，約占鐘華區所有基本群眾之半數。該區的救濟辦法是：一，調查，看臉色，發給糧食；二，先宣傳政策、救濟辦法，甚麼人可以領糧，然後自報公議。（......）區管內首先埋完死屍的保於 28 日已開始登記發放救濟糧，結合控訴國民黨殺民養軍的罪惡，放救濟糧，並組織代責。（......）很多饑餓將死的人，重慶更生，已能外出。康平保一姓焦的，他用極度感激的神情，握住工作同志的手說：「救命恩人，我死不了。你們再晚來 3 天，我全家三口人就完了。」還有一戶死得只剩

> 一個女孩和一個老頭，女孩常守著老父哭泣，工作同志去時，老人對其女說：「孩兒，不要哭了，吃上了救命糧，爹爹死不了啦！」感動得工作同志也悲喜交加。
>
> 目前經過救濟後，鐘華區情況已大為改變：開始時能動員的勞力僅數十人，今天已能自願組織起一千餘人的勞動力埋死屍。[8]

自國共發生內戰後，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了十三個戰地攝影隊。出生在遼寧省昌圖縣的攝影師李光惠，因為對長春熟悉就被分配到「解放長春」這條戰線上了。共軍佔領長春後，那些倖存的難民在等糧下肚。李光惠的傳記作者寫道：「為了挽救這些瀕臨餓死的群眾，在長春周圍一圈設了粥鍋。難民到此處，每人只給一碗粥喝，以免長時期饑餓，一下吃太飽撐死。而後走上 5 里，又是一圈粥鍋，共三圈。我們一個粥鍋的炊事員，見難民都給他跪下了，便放棄了每人只給一碗粥的規定，敞開讓這些人吃，有的人操起臉盆盛粥吃，結果，還沒等到第二層的粥鍋點，就有幾個人被撐死，負責粥鍋的同志，因此受到處分。」[9]

中共打掃戰場。腐爛發臭的屍體需要火葬或掩埋，而埋淺的屍體則需要挖出重新掩埋。在出卡哨必經的和順區，餓殍更是處處皆是。這對新任命的一區之長馬鴻新來說，擔子是格外沉重的。在中共奪取長春五十三年後，長春當局在為馬鴻新編寫的傳記中寫道：

> 為了搶救那些嗷嗷待斃的居民，馬鴻新和區、街幹部一道，從區、市里領取糧食到調運、分配給街道直到分配到戶，他從頭抓到尾，按照公平合理、不漏一戶一人的原則，把救生工作做到戶，做到人。(……) 當時區裡對「救生」的任務是繁雜的，「埋死」的任務尤為艱巨。「埋死」如不及時處理好，使一座城市屍體遍地，不但有礙各方面工作的進展，而且時間不容人。長春解放時，就已經是 10 月中、下旬，天氣開始冷起來，一旦上了凍，不但挖坑費

勁，就是搬運也增加了困難。

為此，要緊急動員，在抓「救生」的同時，抓緊「埋死」的工作。「埋死」的工作必須趕在地面封凍之前完成。而當時困難是很多的，特別困難的是缺乏人力。隨軍進城的工作人員要投入到政權建設，防奸反特和全力投到搶救饑民方面，而「埋死」這活，就得靠組織一些市內尚存的一些民工去完成。這在當時來説，真是困難重重。因為，已經外逃的市民，大都沒有返回，剩在城裡的人，由於長期缺糧，大都處於面黃肌瘦、病魔纏身的狀態，不要説拿鍬鎬去挖坑埋人，就是空身走路都打晃。有些稍好一點，能走能動，但動員他們出來，也很費勁。

面對這種情況，區政府採取了很多相應措施。馬鴻新組織帶領部分區街幹部，深入街道，深入居民家中，逐戶進行動員。他們從思想發動入手，宣傳「埋死」工作對防止疫病傳播，（……）動員了一部分居民投入到「埋死」的工作。為調動群眾對這項工作的積極性，還採取了用糧米抵工錢的做法，每個市民，出工埋一天屍體，就發給5市斤高粱米。

但是，有些居民由於封建迷信思想作怪，一些死者都是在饑餓情況下而斃命的，形象極為難看，有人就不願上手接觸，也有一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願參加這項工作。一對夫妻的情況，就很典型。有一對中年夫妻，原本是作小生意的。長春圍困之前，倆人用高粱米麵炸丸子賣，不但掙下了幾個錢，而且，還存下了一些用作原料的高粱米和高粱米麵。在全城普遍缺糧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挨餓，到長春解放時，他們還有存糧。他們繼續作炸丸子的生意。男的經一番考慮，打算出來參加「埋死」的活，每天可掙5斤高粱米，幹十幾天，掙幾十斤高粱米，原料充足些，可以多掙些錢，可女的堅決不同意，她認為賣一天丸子，可以掙十來斤高粱米錢，而且還鬧個乾淨，沾不上腥臭怪味兒。

這事雖然看來是個別現象，可牠卻有一定的代表性。馬鴻新得知這一情況後，覺得只有通過啟發他們提高思想覺悟入手，進而向他們擺清楚利害得失，才會取得效果。馬鴻新根據情況，對那位中年婦女做思想教育工作。他首先指明，凡是死在街頭的，不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是當官的，也沒有一

個是有錢的。可以說，全是些貧苦百姓。靠炸丸子賣錢糊口的，也算不上富裕人家，都屬於貧苦兄弟，一個階層的人，能忍心看著他們暴屍街頭不管不問嗎？再者說，作買賣總是希望買主越多越好。可城裡除了遍地的屍體，沒有像樣的地方，跑出城外過上安定生活的人，能願意眼看著這種慘狀回城裡來嗎？沒有很多人回城，也就沒有很多人買你們炸的丸子，你們能掙到很多的錢嗎？說一千道一萬，只有先把城市治理好，人民過上安穩日子，你們的買賣才會興隆起來。到那時候，你們每天不止能掙十幾斤高粱米錢，而是幾十斤，甚至幾百斤呢！（……）一席話，說得那對中年夫婦連連點頭，又加上有人告訴他們，他們面前說話的是位區長時，他們真的被感動了。因為他們心目中，區長也是好大的官呢！女的不但同意男人拿上鍬鎬去參加「埋死」工作，而且，逢人就說，共產黨的官真好，不但沒有官架子，而且說起話來特別和氣，入情入理，聽他們話，沒錯。從此，她不但不阻攔自己的男人，而且還動員了幾個鄰居出來。（……）

　　據有關材料記載，僅 10 月 29 日這天，就組織有 670 多人參加埋葬工作，當天掩埋屍體 3606 具。不但確保在封凍前完成任務要求，而且都達到了遠埋、深埋、埋好的標準。[10]

于克，中共吉林省委社會部長兼省公安處長。他在 10 月 21 日成立的長春特別市公安局任局長。他在慶祝中共奪取長春勝利五十周年時出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剛剛接管的長春滿街都是廢舊、燒毀的汽車，街邊兩旁樹下、胡同裡、馬路上、馬葫蘆、土坑裡到處都是死屍，僅在市中心廣場旁的煤灰裡就挖出 500 餘具屍體。在郊外找到一個合適的大坑將屍體運到那裡埋掉。」[11]

沙秀傑的姐夫是長春鐵路火車站行李房的主任，他參加了政府動員組織的清理和掩埋餓殍的工作，由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抬屍功臣」。沙秀傑在中共奪取長春六十三年後寫道：

他（沙秀傑的姐夫）回憶說：「長春一解放，首要任務是整頓市容，清理屍體。政府召集有體力的男性去抬屍體。發給一副白線手套、一個口罩，報酬是每天給3斤小米。完工後領到一張3斤量的小米票，到指定地方可以換回3斤小米。」

3斤小米，在當年的兩天前（沒解放），那可是能換回一根金條的金米啊。應徵者排起長龍，但被錄用者甚少，因為大部分人骨瘦如柴，自身都難以站直。我姐夫人長得身高馬大，身板也直挺，就被招用了。

他們每個人各有分工，兩個人一組，一個手推車，先揀死在路邊的屍體，再到各家挨門挨戶地敲門，無應聲者就開門而入，抬出炕上、地下的屍體。常有一家子都一個不剩的，不知斷氣幾天幾月了，屋裡腐臭撲面，有的骨頭都腐爛脫節了，只好用褥子託著抬出來。據說全長春市當時有8000多人幹這工作，一部分工人因為體力太差，需要四個人抬一具屍體。

我的姐夫（……）把當時發的小米票留了一張，作為紀念保存了起來。在80年代中期，全國執行劃分老幹部參加革命工作時間，時間順序是解放前參加革命者為離休幹部，長春市是以長春解放紀念日為界限的，即1948年10月19日。

姐夫就是憑著這張小米票被認定是天亮前的離休老幹部。這張不足三寸的小米票，不但使共和國多了一名抬屍功臣，當時換回來的3斤小米還拯救過兩條人命呢。

臨長春解放的前幾天，姐姐家早已斷糧多日，還正逢姐姐身懷六甲，餓臥在床，她已瘦骨嶙峋，全身只有下腹突起，像一個小盆一樣扣在肚子上。姐姐感到已經8個月的胎兒，胎動越來越慢。姐夫急得在地上團團轉。姐姐只好多喝糠糊，可糠糊喝得越多，大便就越乾燥，行方便用力又怕把孩子給逼出來。他們就輪班兒拍肚子，幫孩子胎動。一面拍，一面胎教說：「孩子別睡，動一動！要挺住！八路軍馬上要打進來了，八路軍來了，媽媽喝大碗熱粥給你！」

姐夫第一次領到小米，姐姐一頓就喝下1斤小米的稠粥。姐夫蠻有底氣地說：「只要我天天出工，小米粥，你娘兒倆就能喝得飽飽的。」[12]

26 歲的宋占林，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居民。他的十三口之家，其中四人餓死。他後來回憶道：「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 5 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麼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13]

共軍奪取長春後，遠藤譽的父親大久保利用一個到長春出公差的機會，去尋訪 M 寡妻和一雙兒女的下落。大久保多方打聽得知，M 寡妻的兒子餓死，M 寡妻和女兒妙子被卡子裡的農民所救。在長春被中共佔領後，卡子柵門開放，M 寡妻出卡子不久因病而死，臨死前將女兒妙子託付給救她們的農民做了養女。

大久保想把妙子帶回去撫養。但是，妙子和她的養父都一口回絕了。沮喪的大久保無可奈何，又到「新京製藥」的遺址探訪。遠藤譽後來寫道：

> 在面向興安胡同的公司宿舍窗戶下，埋著最小的兒子小萬。一到「新京製藥」廠，父親便直接來到這裡。
>
> 父親說，埋小萬的地方，開滿了牽牛花，有的已結出黑色種籽。父親將那種籽拿了一粒在手裡。又去埋哥哥的乙醚倉庫，那裡已變成馬棚。
>
> 父親從長春回來，便為我們拿出餅乾，高高舉過頭頂，那是用線串得像項鍊似的，是在吉林站裡賣的那種餅乾。「這是給你們的禮物，那時候咱們買不起。」
>
> 父親勉強打起精神說著，臉上已沒有了離開延吉時的神采。
>
> 「孩子媽，埋萬代三的地方開滿牽牛花呢。」
>
> 「噢，牽牛花……在那孩子墳上……是嗎？……那，遺骨呢？」
>
> 「嗯，花開得很美，而且，那裡已經屬於別人的了。」

「但，起碼 …… 哪怕一點也行啊。」

「孩子媽，看這 ……」

父親將一粒黑色花籽放在母親手中，是牽牛花籽。「這是萬代三的生命，那孩子還活著，正開著好看的花，不是還結了籽嗎？ …… 我還挖甚麼呀 ……」

「孩子爸 ……」

母親緊緊握住那花籽，無聲地哭了，父親也哭了。

「與萬代三相比，高司怪可憐的，他每天躺在馬糞下面。」

「可是，孩子爸，寶寶只用毛毯包，而他哥哥是裝在藥具箱裡的。」

「是呀，但小馬駒的小便還是能滲進去。」

那時，父親的表情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慘。總說甚麼總有一天要遷墓或火化之類的，不管哪個總之要做。然而，聽說挖墓需要批准才行，並且要批下來很費時間。

之後，父親所說的「總有一天」一直沒有到來。* [14]

周相匯，長春市二道河區八里堡的倖存者，時年 1 歲，他後來聽其父講述當局如何處理餓殍以及他所看到過的累累白骨。他在中共佔領長春六十七年後回憶說：「長春城死人太多，沒辦法了，只能用馬車像裝柴禾似的頭腳不分地摞著，一輛馬車能拉幾十個屍體，拉到八里堡東 10 公里外的一個萬人坑掩埋。那個萬人坑我看到過，真是白骨一堆一堆的。在 1964 年開墾墳

---

* 2015 年 9 月 30 日，75 歲的遠藤謍女士在給本書作者的電郵中寫道，她一直不敢回長春。她在 1990 年代終於鼓足勇氣第一次探訪長春。在面目全非的洪熙街卡子原址處，她「哭又哭，快要昏迷了」。而在她家「新京製藥」廠原址上，她看到挖掘機正在挖著深坑，工人們在為建設新樓施工。她寫道：「在這挖掘的土地裡，肯定會有我的哥哥和弟弟的骨頭。我問過施工的工人和領導有沒有發現過。他回避了回答這種敏感問題。結果我帶回去了那裡的小石頭，作為我兄弟的遺骨。我母親拿著這些小石頭，一邊喊著『小萬』，一邊哭，而把牠懷抱著好像抱小娃娃。」

墓場作為耕地的時候，那個萬人坑裡的骨頭渣子成堆，骨頭白花花的，人腦袋和人骨頭有的是。那些屍體往大坑裡一扔就完事了，幾年以後都是骨頭渣子了。誰給你燒啊，沒有人燒，燒不了那麼多屍體。我看見的那些骨頭堆得像山一樣高。」[15]

1998年6月，倖存者范傳華利用四十多年時間完成了他的回憶錄，這本書記錄了解放前後的長春，以及在長春餓殍戰期間父親、母親和弟弟活活餓死的百般慘狀。他懇請1948年任職圍城部隊東北野戰軍獨立第八師政治委員、從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的職務上離休的鄒衍老人為其回憶錄題詞。鄒衍老人為他的書題詞：「用苦難的歷史，教育青年一代。」

范傳華在與鄒衍老人的兩次會面中談及了餓殍問題。79歲的范傳華老人在2015年8月8日回憶說：

「我到瀋陽兩次晉見鄒衍首長，我把書稿帶上給他看，他說：『小同志，你打算叫我幹點甚麼呢？』

「他是個江西老俵，說話挺坦率的。我說：『首長，我這書寫好了，請首長給我指點一下，多給我指示。』

「他說：『不要說指示，我看了你的這個書稿以後，我感覺更明確。』

「我說：『首長不能這麼說，首長你們是攻城部隊，貢獻是最大的。你們是最清楚，我就是一個小難民的回憶。』

「他說：『不能那樣說，看著你寫的這些東西，更增加了我對當時老百姓在城內所遭受的疾苦的瞭解。』

「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同志啊，長春解放的第二天，我坐著吉普車沿著長春市轉了一圈，我的車沒法起步了，走一走，我的通訊員就得跳下去，把死屍拖到一邊，再走走，再跳，把死屍拖到一邊。小同志啊，為甚麼家裡的親人餓死了，家裡不但不掩埋，相反地還扔在大街上，扔在大街上，這是為

甚麼呢？』首長就問。

「我說：『首長，這不是家裡人扔的，而是這人走在路上由於饑餓的關係，支撐不住，噗通地就倒了，倒了就起不來了。』

「首長就閉著眼睛默默地不作聲了。首長說：『太苦了，太苦了，死的太多了，太殘酷了。』他就一直在點頭。」[16]

范傳華老人回憶中共如何處理餓殍問題：

解放後，解放軍將所有的大街小巷的餓死的同胞的遺體都收集到一起，在地面上挖一個一尺多深的小坑，把劈柴放在上面，倒上煤油，點火，然後把遺體拖到著火的劈柴上，用火燒。那時長春沒有火化場，即使有火化場，十多萬人的遺體怎麼燒？火化場也忙不開啊，所以就用這種辦法火葬。有的遺體還沒燒盡，都沒徹底地燒成灰，還有骨頭架子，因為沒有那麼多劈柴。怎麼辦？那就把沒燒盡的遺體統一掩埋起來了。

解放軍真是辛苦啊。他們唯一的勞保護具是自己的毛巾，往嘴上一捂，戴著棉帽，把袖子挽起來，也沒有手套，把人就這麼燒，吃飯的時候洗洗手就得了。燒的時候允許老百姓看，小孩子都過去看。

我爹和我弟弟在幾個月前就餓死了，狗都把遺體叼走了。我媽享受的待遇是最好的了，她被國民黨軍埋起來了。到解放後燒的時候，被解放軍扒出來，弄去燒了。[17]

提及焚燒餓殍，對王均平來說，真是難以忍受。王均平是 1948 年圍城時的中共長春工作委員會第一中隊隊員，他後來回憶焚燒餓殍時，仍舊不能忘記那一幕：「記得在南嶺一帶掩埋、焚燒死屍時，臭氣沖天，其慘狀目不忍睹，至今回味起來，還令人髮指。」[18]

公開和內部的餓殍人數

1

長春解放的經過

龍國鈞（國軍新編第七軍少將參謀長）

《走向光明：長春國民黨投誠史料》，吉林省軍區政治部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1948 年 10 月長春解放時，長春僅剩市民五、六萬人了。

2

《羅榮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

楊國慶 白刃

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版

後來到長春解放時，城內只剩五、六萬居民。

3

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

金永順

《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解放長春之戰，（……）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因饑餓和疾病而死掉了 12 萬多人。

4

一九四九年工作總結（草案）

《長春的接管與社會改造》，1996 年版

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702005 號

長春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殺民養軍政策造成了歷史上罕聞鮮見的饑餓死亡的嚴重苦難，解放初生者面黃肌瘦，奄奄待斃。死者餓屍、浮靈滿布城郊與貧民區街巷（由於當時營養不足，經醫院檢查，已有 25 個初生孩無黑眼球）。我黨政軍入城後，即展開救生埋死工作，共發放救濟糧 858500 餘斤，救濟了 10 萬餘人，另外

以工代賑的辦法（貸出 107000 餘斤），掩埋了 58063 具屍體（農業科材料上發糧 320 萬斤，救濟了 68500 人，埋屍體 27210 具未包括在內）。

5

一九四九年工作總結（草案）

《長春的接管與社會改造》，1996 年版

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

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702005 號

1949 年春季發動全市大清掃運動，運出垃圾 149809 噸，處理屍體 34614 具（內重新掩埋者 24026 具）……

6

長春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2002 年 5 月版

吉林省內部資料出版物第 200201016 號

由於國民黨實行「殺民養軍」政策，致使 10 余萬無辜市民死于饑餓和戰亂，餓殍遍地。市委、市政府組織人力突擊掩埋死者，到 10 月 28 日，就發現屍體 3 萬餘具。

7

吉林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

《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2002 年 5 月版

吉林省內部資料出版物第 200201016 號

剛解放的長春，萬戶蕭疏，房倒屋歪，所有公用設施毀壞殆盡，停水斷電，了無聲息。被困期間，長春人口由原有的 58.4 萬銳減至 17.7 萬，除去逃難在外的，總要有十幾萬人死於饑餓。街頭巷尾，餓殍遍地。

很多百姓整家整家地餓死在炕上，有口活氣的也都奄奄一息。（……）在7天之內即把市內的85273具屍體運出埋葬，還及時做過防疫消毒處理，保證來春曾經腐屍遍地的災城竟未發生瘟疫。

8

長春的接管與改造

張樹範

《城市接管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整個長春市（……）人民流離失所，人口急劇減少，光復前1944年長春市人口81.7萬，光復後1947年減少到58.4萬，解放前夕又銳減到17.7萬人，有10余萬人死於饑餓和戰亂。

9

孤城末日

陳運剛（國軍第一兵團政工處第二課中校代理課長）

《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年第2輯

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157號

說起長春當時死的人，實在駭人聽聞。解放後收屍掩埋部隊每天出動10部汽車，整整用了半個月時間。

10

China Is Wordless on Traumas of Communists' Rise

By Andrew Jacobs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 2009

中國的歷史書歌頌這場戰爭，視其為內戰的決定性勝利之一，驕傲地稱毛的軍隊沒有耗費一槍一炮就餓死了強大的國民黨駐軍。中共官方的故事情節沒有透露的是，在1948年6月至10月解放軍圍困長春期間，至少有16萬平民餓死。

11

長春困守紀事

尚傳道（中華民國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

《遼瀋戰役親歷記》，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 11 月版

從 8 月 1 日開始強迫疏散人口以後，市民因輾轉餓死在卡哨內外中間地區的，日有增加，餓殍載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內外，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絕，儼似人間地獄。到 10 月 19 日長春解放為止，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 12 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 8 萬具。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

12

長春市志（人口志）

長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

1）1932 年長春城市人口為 16.7 萬人，1936 年增加到 30.5 萬人，1944 年猛增到 89.9 萬人，增長 4.3 倍。(……) 解放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發動反人民內戰，長春城市人口銳減，1948 年 10 月解放前夕，長春城市人口僅剩下 17.7 萬人。

2）解放戰爭時期，長春地區處於國民黨與人民解放軍的交戰地帶。據國民黨地方政府統計，1947 年下半年，長春市人口 630047 人，(……) 1948 年上半年，長春市人口為 611246 人。

3）1945 年至 1948 年的三年間，長春（……）市區死亡和逃離人口數量很大。日本投降前夕，長春市區人口為 74 萬人，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時，人口下降到 56 萬人左右。1946 年 4 月 14 日解放軍解放長春市區時，人口約 47 萬人。1947 年 5 月國民

黨軍隊困守長春市區時，人口為 39 萬人，10 月 19 日長春市區解放時，人口為 179241 人。

4）1948 年上半年，長春市區家庭戶數為 136588 戶，人口為 630049 人。

13

一位難得的好領導

裴戎

《馬鴻新的人生歷程》（內部資料）

長春《馬鴻新的人生歷程》編輯委員會，2001 年版

1948 年 10 月剛剛解放後的長春，實際上是一座死城。（……）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市人民在從長春解放到 11 月末，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得到救濟糧 37.5 萬公斤，救濟了 8 萬多饑民。

14

中央銀行本票

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

《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5 輯

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長春解放前夕，由於走、死逃亡，只剩下 5 至 6 萬人口，每人要承受 25 億元左右的（債務）重擔。

15

一個秘密組織：記中共長春工委情工組

侯諾青

《崢嶸歲月》（內部資料）

長春市公安局，1998 年版

1948 年初長春市約有 40 萬人，圍城後餓、病死約 7 萬人，解放時僅剩 173923 人。

16

關於今後兩月（十一、十二）工作的決定

中共長春特別市市委，1948 年 11 月 1 日

《長春解放》，長春市檔案館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 9 月版

長市是我們長期圍困而解放的孤島，（……）人民大批餓死和餓散（估計逃到市外者約35萬到40萬左右……）。

（……）估計逃難出去的難民，大部還可能回來，約數在 10 萬人到 20 萬人左右。這是一件大的工作。他們的房子多被破壞，東西傢具多被賣盡或損失，因此他們回來沒有房子要安置房子，沒有吃的還要給予救濟。（……）對市民外出遷移，必須加以管制，盡可能地嚴密崗哨，進行盤查，但必須嚴格遵守群眾紀律。

17

戶籍管理工作的建立完善與發展

李聿修 霍恩義 于寶和

《崢嶸歲月》（內部資料）

長春市公安局，1998 年版

長春解放時，國民黨時期的戶口檔案基本被焚毀和損失。迅速查清長春市人口狀況，維護革命秩序，成為當時公安機關非常重要的任務。據市公安局行政科解放後兩個月工作總結記載：為瞭解當時人口增減情況和社會動態，依據東北公安部頒佈的《各城市戶口管理規定》，市局行政科制定了戶數、人口、男、女、年齡、出生、死亡、市外遷出遷入，市內遷移，黑人黑戶、特殊人口等 23 種戶口呈報表、統計表及簿冊，佈置各區從基層開始，對管內居住的人口，分偽滿、國民黨和解放後三個時期進行調查統計。調查結果：偽滿時期人口為：721118 人（包括日本、韓國等外國人 200847 人）；國民黨時期為：700260 人（包括日本、韓國等外國人 188532 人）；國民黨投降前為：178758 人（包

括日本、韓國等外國人1375人）；解放當時僅有122872人（包括日本、韓國等外國人504人）；1948年12月28日長春市的人口為289804人（包括日本、韓國等外國人633人）。

18

長春市志（糧食志）

長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945年8月東北光復，長春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1945年末前後，在物資流通領域，出現了暫時的繁榮景象，農產品在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然而好景不長，不過數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內戰，又使瘡痍滿身的長春市變成內戰戰場。國民黨把長春市作為北方的「橋頭堡」，戰火迭起，人民又陷入了饑寒交迫之中。長春市內糧食緊張，價格飛漲，餓殍遍地。1948年3月以後，迫于饑餓的長春人民紛紛逃亡，60多萬人的城市最後僅剩17萬人。

19

長春市志（軍事志）

長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在國民黨實行「殺民養軍」政策的迫害下，約有10余萬長春市民獻出了生命，為解放長春，軍隊（傷亡4000餘人）和人民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一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將永遠載入人民革命鬥爭的光榮史冊。

20

《雪白血紅》

張正隆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在南京，國軍報紙《中央日報》刊登長春的新聞「長春防守經過」，這篇文章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 15 萬具。」

21

《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

遠藤譽

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餓死者的總數，據中國政府所公佈的統計為 12 至 15 萬人，國民黨政府發佈的資料則為 60 至 65 萬人。而我自己參考 1947 年前後長春人口的變化，加上 1983 年，向倖存者取材得到的情報，最後推算出的數字為「30 至 35 萬」左右。雖不是多麼精確的資料，但犧牲者多達數十萬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22

《大江大海 1949》

龍應台

臺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8 月版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 50 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 80 到 120 萬。

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 17 萬人。(……)餓死的人數，從 10 萬到 65 萬，取其中，就是 30 萬人，(……) 30 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

23

《我的童年》

范傳華

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在這場特殊的戰役中，長春城內有20萬人被活活餓死，* 其中僅少數人被炮彈打死以及國軍空投糧食時被麻袋包或房屋瓦礫砸死。

這個數字是1948年11月上旬在長春市各界人民歡慶「遼瀋戰役」勝利結束暨東北全境解放的大會上，長春市市長鄒大鵬講話時，首先提議向長春在國民黨統治饑亡的20萬死難同胞默哀。那天，我也參加在中山公園舉行的大會。

24

新華社長春1948年11月2日電

據不完全統計，長市人民在國民黨29個月的黑暗統治下，因饑餓致死或遭槍殺者達1.2萬餘人，……」

* 在2015年8月8日，79歲的范傳華老人在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說，這個餓死20萬人的數字還產生了爭議。他在作為大連市沙河口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老戰士報告團報告員給一個部隊作解放長春的報告時，一名部隊首長問他：「有的書上寫的是長春餓死老百姓12萬人，你寫的是20萬人，這是怎麼回事？」

對此，范傳華回憶說：「長春是1948年10月19日上午11時解放，瀋陽是1948 年11月2日解放的。2日解放以後，具體是在11月幾日我忘記了，在長春中山公園，召開了長春各界人民慶祝東北全境解放大會。當時在大會上，講話的是長春市市長鄒大鵬。中山公園站滿了人，而且還舉行解放軍入城式，入城式很壯觀，就像現在的閱兵似的。一聽是入城式，我們這些小同學都跑出來了，跑到長春日報社門口，長春日報就在中山路，現在叫史達林大街，在路邊等著。在講話時，我們就在那兒聽，護著這個位置，看解放軍。鄒大鵬市長講話，我記得非常清楚，他說：『長春各界同胞們，我代表長春市政府，向長春市在國民黨統治期間被餓死的20萬死難同胞默哀。』20萬的數字就是這樣說出來的。我寫在書上的，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我就怎樣寫，不信就查檔案啊。長春市市長在長春解放後第一次在全市的講話，這是非常嚴肅的，肯定有檔案，肯定有講話提綱，不可能隨口講的。那首長說：『也是。』」

清點餓殍

究竟餓斃多少難民？或者有多少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

要想知道餓斃多少難民，或者有多少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首先要搞清楚擁有長春市戶籍的常住人口和外地來長春的流動人口有多少。

擁有長春市戶籍的常住人口有多少？從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的秘密電報、國軍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長春軍政負責人鄭洞國的回憶錄、中華民國政府吉林省民政廳廳長兼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的備忘錄、長春市檔案館收藏的人口檔案、長春市人口志等資料，可以得出一個完全準確的人口數字：在 1947 年下半年至 1948 年上半年，擁有長春市戶籍的常住人口有 63 萬人。*

外地來長春的流動人口有多少？從中共 1945 年 8 月指令 10 萬大軍開赴東北後，中共上萬名軍政幹部深入東北偏遠的農村地區大搞野蠻的「土地革命」，動員農民參軍，而那些受到殃及的地主豪紳和親國民黨的精英人士紛紛逃離原籍，奔向防禦工事素有「堅冠全國」美名的長春城，這些蜂擁進來的流動人口顯然是難以量化的；另據中華民國時期的媒體報導和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報刊發表的文章可知，在 1948 年 3 月 9 日國軍第六十軍從永吉市撤退到長春城時，有 8 萬至 10 萬平民攜家帶口跟隨其後逃難到長春城。國軍第六十軍和原來駐守長春城的新七軍等部隊加起來有 10 萬名國軍官兵。

綜合以上數字，可以謹慎地得出一個結論：從

---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的《長春市志（人口志）》稱：根據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統計，1947 年下半年，長春市人口為 630047 人；根據《民國三十六年上半年全國戶口統計總表》中記載，長春市區戶數 136588 戶，人口數 630049 人。
另據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2-28 號卷記載：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統計，長春市男人人口數 349515 人，女人人口數 280794 人，全市人口數 630309 人。

1947 年 11 月 4 日起，在共軍決定圍困封鎖長春城時，長春市區容納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以及駐守軍隊的總數相加，將達到乃至超過 80 萬人。另在當年媒體報導中，也有多篇文章稱長春被困軍民有 80 萬人的記錄。

要想知道餓斃多少難民，或者有多少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接著要搞清楚從長春城逃出有多少難民，共軍從卡子裡放行有多少難民，共軍佔領長春城時還倖存有多少難民。

從長春城出來逃生（包括遭到國軍驅逐出的）的人數有多少呢？在朝不保夕、餓殍遍地無人問的時代，是難以量化的。但中共在《東北日報》上提供了一個公開數字：救濟了從長春城逃出的難民有 15 萬人。即共軍從封鎖區放行了 15 萬難民。另據官方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稱，封鎖區的共軍沒經上級批准「自行放進」其統治區的「難民也有四、五萬人之多」。

中共佔領長春城時，城內還倖存有多少難民？從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的個人傳記、國軍新編第七軍參謀長龍國鈞撰寫的回憶文章、中華民國政府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給中央銀行拍發的電文、中共官方公開出版物以及長春特別市市委書記曹瑛的回憶錄等記錄可知，倖存者的人數幾乎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謹慎地得出一個結論：1948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共佔領長春市區時，城內僅倖存 5 萬至 6 萬難民。

將放行得到救濟的 15 萬難民、私自放行的近 5 萬難民和城內倖存的近 6 萬難民相加，等於說，總共有近 26 萬名難民倖存。

現在，有三種核算方法可知有多少難民遭到餓斃，或者有多少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

第一種核算方法，即按照長春市區容納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有 80 萬來計：首先減掉 10 萬國軍，接著減掉共軍從卡子內放行的近 20 萬人，以及共軍佔領

長春城時倖存的近 6 萬人，最後得出餓斃人數為 44 萬，或者有 44 萬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

第二種核算方法，即將駐守的 10 萬國軍和東北五省逃到長春的流動人口忽略不計。按照擁有長春市戶籍的常住人口 63 萬人來核算，減掉中共堅稱的長春解放時僅剩下的 17 萬人，63 萬人減掉 17 萬人，最後得出餓斃人數為 46 萬，或者有 46 萬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

第三種核算方法，即把共軍公開放行的 15 萬難民和私自放行的近 5 萬難民，以及城內倖存的近 6 萬難民的相加，然後再拿擁有長春市戶籍的常住人口 63 萬減掉倖存的近 26 萬名難民，最後得出餓斃人數為 37 萬，或者有 37 萬難民從中國人口登記冊中永久消逝。

採取這三種核算方法僅能作為參考的粗略數字。但是，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長春餓殍戰，至少餓斃 30 萬難民。

長春餓殍戰，這場內戰製造的餓殍的真實數量，可能只有地球和食人者的胃知道了。

餓殍戰術實施了多久？

由毛澤東和朱德批准，林彪和羅榮桓策動與部署，肖勁光和肖華指揮與具體實施的餓殍戰術，從 1947 年 11 月 4 日至 1948 年 10 月 19 日，進行了近一年，共 350 天，餓殍戰術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即 1947 年 11 月 4 日至 1948 年 5 月 23 日，林彪決定部署軍隊開始封鎖進入长春的糧和柴。1948 年 4 月 18 日，以林彪為首的東北高級指揮員聯名正式電告毛澤東、朱德和劉少奇以及中央軍委，攻打長春有難度，並提出三個方案。中央軍委批准了其中一個方案，即封鎖圍困長春。

第二個階段，即 1948 年 5 月 23 日至 1948 年 6 月 20 日，林彪和羅榮桓電令圍城部隊控制國軍陸空通道，全面圍困封鎖，嚴密盤查，斷絕糧入人出。從 1948 年 6 月 6 日開始，軍方已有難民在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上吊而死、而 6 月 10 日則已有人餓斃的記載。

第三個階段，即 1948 年 6 月 20 日至 1948 年 9 月 11 日。從 6 月 15 日至 20 日，羅榮桓在長春前線主持召開師以上高級幹部會議，進一步強調，對長春以方圓 45 公里、縱深 25 公里為範圍劃為封鎖區，久困長圍，從政治、經濟和宣傳上發動對國軍心戰攻勢。這段時間，長春城已經開始斷糧，是難民在城內和兩軍對峙的空白地帶大面積餓斃的高發期。

第四個階段，即 1948 年 9 月 11 日至 1948 年 9 月 28 日或 9 月 30 日，中共基於政治上的惡劣影響，而非人道和悲憫，在 1948 年 9 月 11 日，以林彪為首的東北 5 名軍政最高指揮官聯名致圍城司令員肖勁光、政委肖華等的電令中，要求「於十天內放完」封鎖區「願出來」的難民們。但是，根據共軍公開出版物和內部資料的記載以及倖存者的證言，共軍對難民出卡子的人數實行流量控制，理由是「為了保證出城的饑民都

能得到安置」，每日僅放行數千人、數百人，甚至數十人，根本沒有在規定的十天期限內將難民們全部放出；另根據倖存者證言，在餓斃人數最多的洪熙街卡子裡，圍城部隊只是短暫地放出部分難民到其統治區，然後有選擇性地放出共軍急需的技術專家及其家族到其統治區以供驅使。

據官方公開出版物記載，難民出卡子的開放行口共有興隆山區、淨月區、長南區三處。這三處開放行口何時截止放行難民呢？據軍方的《圍城簡報》記載，興隆山封鎖區自 1948 年 8 月 28 日開始放行，截止至 9 月 28 日。長南封鎖區自 1948 年 8 月 12 日開始放行，截止至 9 月 30 日。另據官方內部資料《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記載，淨月封鎖區自 1948 年 8 月 13 日開始，截止至「長春解放前夕」。

第五個階段，即 1948 年 9 月 30 日至 1948 年 10 月 19 日，可以謹慎地得出一個結論：在這 19 天裡，無以計數的難民成為了餓殍。

從上述三處封鎖區開放行口的截止時間可知，放行難民出卡子的截止日期分別為：興隆山封鎖區為 1948 年 9 月 28 日；長南封鎖區為 1948 年 9 月 30 日；淨月封鎖區截止到「長春解放前夕」，按照軍方令行禁止的特殊性，這個「長春解放前夕」不會超過 1948 年 9 月 30 日。據日本倖存者竹中重壽稱，他和其他日本人一起在 1948 年 9 月 30 日進入洪熙街卡子後，直到 1948 年 10 月 19 日共軍佔領長春城後，才打開柵門讓他們出卡子逃生。儘管這僅是一個孤例，但是也從側面印證了共軍自 1948 年 9 月 30 日即終止放行難民這一事實。

從這三處開放行口放行難民的截止時間來審視，又引出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長春城被共軍佔領的時間為 1948 年 10 月 19 日。從軍方的內部資料、共軍指揮員以及倖存者的備忘錄中可知，在規定的 10 天期限結束後，封鎖區內依舊關著無以計數的難民，而

且在 1948 年 9 月 30 日即終止放行任何難民，在共軍佔領長春城後，才打開柵門，放行所剩無幾的難民們，任其四散逃生。在這段時間，無人知道又餓斃了多少難民。為甚麼拒絕放行難民逃生呢？是圍城部隊沒有時間或者沒有食糧救濟難民嗎？還是共軍要憑藉時間之手將這些見證者間接屠殺殆盡呢？

遺憾的是，沒有任何資料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可能是長春餓殍戰給歷史留下的一個沒有答案的最大的謎團。

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歷史似乎從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作為戰敗方並且被驅逐到一個偏遠小島 —— 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是永久無處置喙的了。

作為長春餓殍戰的遙控者、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他們均沒有公開留下過任何關於餓斃平民的文字。*

作為策動和部署東北戰場所有戰役的東北野戰軍總司令林彪，在官方或其後人出版的書中均沒有提及長春餓殍戰的問題；而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羅榮桓僅在發給東北野戰軍「全殲東北敵軍的政治動員令」和「在東北野戰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讚美過長春餓殍戰：「自錦州大捷，六十軍起義、新七軍投降之後，東北局勢已發生新的大變化。（......）這對敵方士氣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們在錦州、長春已取得圓滿與偉大的勝利（......）」[1]「我們採取圍困長春的方針是恰當的。（......）部隊在圍困長春中

---

* 唯一可以查閱到的資料，是在長春被中共佔領前一天，即 10 月 18 日，中共官員曹瑛帶領部分幹部隨部隊入城，成立中共長春特別市委和市政府，曹瑛任市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長春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他在 1948 年 11 月奉調回中央。在長春期間，他起草了《接收長春的經驗》的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認為入城部隊應該遵守軍紀、採取從上至下命令敵方人員交出資財和檔案、將敵方原建制帶到城外指定地點集合、要有足夠的衛戍部隊和公安部隊進行戒嚴和管制、黨政幹部應隨部隊迅速入城管理、令敵方交出要害部位的佈防圖及重要人員，以及各項政策應以市政府名義發佈為妥等七條經驗，總結中對如何處理餓殍的問題隻字未提。這篇經驗總結受到毛澤東的激賞（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均圈閱了電報全文，一致同意轉批），並將此文以電報形式轉發給中原、華北、華東各大區和部隊主要負責人。這篇總結報告使中共接管許多大中城市「少走不少彎路」，為中共「接收城市工作提供了範例」，「有人甚至說這是接收城市工作的『經典著作』」。後來，曹瑛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駐地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了長春的一些情況。在官方為曹瑛編寫的傳記中，沒有公開曹瑛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了甚麼內容，但書中稱，毛澤東注意地聽著，「用鉛筆在小本上作了一些記錄」，毛澤東讚揚曹瑛寫的接收長春的經驗總結，他說：「很好，我們要進大城市了，現在正需要這方面的經驗。」（《鐵骨丹心——記老黨員曹瑛》，中共長沙市 長春市委黨史辦 中共湖南平江史志辦，長春出版社，1999 年版）

得到了鍛煉。」[2]

作為記錄東北野戰軍光輝歷程的戰史中，關於圍困封鎖長春一節中，沒有提及餓殍的問題，僅在1948年5月24日共軍攻擊大房身機場時提及一處傷亡：「東北野戰軍傷亡2100餘人。」[3]

作為長春餓殍戰的直接指揮者、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無法查到他曾經公開討論過餓殍問題的相關文字。在他公開出版的回憶錄和軍事文選裡，提及長春餓殍戰時，無論是經驗和教訓，或者成績和過失，都沒有提到餓殍戰餓斃數十萬平民的慘況。他在回憶錄裡寫道，國民黨「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驅逐到長春城外，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策問題。」

他接著稱，在第一線擔任封鎖圍困任務的幹部戰士「把自己的飯拿出來給群眾吃」。後來決定設立難民處理委員會，以便「有計劃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他在回憶錄裡僅有一句話提及難民的死亡：「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他最後寫道，是「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兵未血刃地結下了這個富有戲劇性的城下之盟」。[4]

作為長春餓殍戰的直接參與者、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的各縱隊、各獨立師的指戰員留下的回憶文字裡，對親身參與圍困封鎖的經歷，不是輕描淡寫，就是隻字不提，似乎從來就沒有參與過這一場內戰。

使用大規模的饑餓製造餓殍來威嚇敵方屈服的戰爭武器，既是一種軍事恐怖主義，也是一種反人類的

野蠻暴行。在這場餓殍戰中，國共雙方究竟誰應來承擔歷史罪責呢？

對於這一點，中共似乎早已深思熟慮了。在共軍佔領長春城後，立即開動人肉機器，以各種方式給倖存者洗腦。孤兒范傳華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海棠街街長蘇昆叔叔三天兩頭地召集民眾大會，教歌子，講政治，講革命道理，比如：講國民黨為甚麼失敗了；共產黨為甚麼能打敗國民黨；還講我們吃的小米是怎樣從東北解放區運到長春前線又發給老百姓的 ......」[5]

不僅倖存者需要知道是誰給他們飯吃並拯救了他們，甚至連警察也要接受革命洗腦。在中共進入長春城後，需要新一代警察充實到公安戰線，市公安局在 1948 年 12 月 2 日成立公安幹部學校，向社會公開招聘政治合格的學員。時年 18 歲的于興河加入了幹校學習。他在四十年後寫道：「（幹校）主要是對學員進行革命人生觀和公安專業教育。由於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思想上難免存在一些糊塗認識，主要表現是：對國共兩黨內戰的責任問題、長春被困餓殍遍野的責任問題以及國民黨的反動本質等問題。通過學習，使學員逐步搞清了是國民黨反動派搞獨裁發動的內戰，共產黨是被迫還擊，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長春被困餓死不少人，是國民黨殺民養軍反革命政策造成的。」[6]

中共給長春餓殍戰蓋棺論定。1988 年 9 月，在中共慶祝奪取長春勝利四十周年時，東北瀋陽軍區公開出版的《圍困長春》一書中就餓殍問題的罪責給出答案：

> 從現象上來看，對長春市沒用強攻就獲得了解放。但圍長鬥爭勝利的取得，並非易事，牠是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換來的！從周邊戰鬥到圍城結束，經歷三十餘次大小戰鬥。在這些戰鬥中，我軍傷亡 4000 餘 ...... 圍長期間長春市內因病餓而致死的人民群眾，多達 10 余萬之眾，這是血的代價！

應該認定，任何戰爭勝利的取得，都必須付出一定的犧牲和代價，不付任何代價的勝利，是不可能有的。在長春，國民黨那麼多美械裝備的正規部隊，依託那麼堅固的防禦工事，豈能輕易走起義、投誠的道路？因此，我們說，這代價付出的很有意義，牠不但爭取了長春的早日解放，也促進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乃至全國的提前勝利。這是個局部與全局的關係。長春是個局部，而整個遼瀋戰役和全國的解放，則都是牠的戰爭全局。在一定的條件下，局部作出了犧牲，而使全局獲得了更大利益，是值得的。所以，應該肯定：在歷史上，長春人民為解放長春和遼瀋戰役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也為支持全國的解放戰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當時來說，就這一問題，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能那麼接受和理解。然而，戰爭必須付出血的代價，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戰場上，總要看到若干親密的戰友在自己的身邊倒下去，或者是自己倒在戰友的懷裡。這些嚴酷的戰爭事實，難道能以片面的慈善觀念和所謂人道主義思想去衡量和代替？……

歷史的回答是：當時長春人民的一切災難，都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所造成的惡果。國民黨軍在長春奉行的殺民養軍政策，是導致長春市民大批死於饑餓的根本原因。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罪魁禍首是發動內戰的國民黨反動派，應該痛恨的，是親手炮製殺民養軍政策的蔣介石！[7]

與此同時，瀋陽軍區在其僅供官方內部參考的同名書籍《圍困長春》中增添了採取餓殍戰術的理由：

假如我軍圍城之始，即把長春守敵肩上的幾十萬市民食口的包袱卸下來，讓他們吃飽了肚子，精力充沛地對付我們，豈不是失去了圍困封鎖的意義？既然包圍封鎖，就必須盡可能地給敵人製造固守的困難，幾十萬市民食口的包袱，宛如我對敵經濟封鎖的另一支強有力的偏師，卓有成效地削弱了

> 守敵的固守能量，縮短了我軍圍困的時間，促使守敵早日土崩瓦解，我軍早日解放長春。[8]

但是，採取餓殍戰術來奪取一個大城市，從而導致了數十萬生靈活活餓斃，都是中華民國執政的國民黨的罪責嗎？

饑餓把長春城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一位在餓殍戰中得以倖存的長春老人說，內戰是自相殘殺，不可能都是國民黨的罪責。「國民黨和共產黨窩裡鬥，把老百姓都坑害了。」他說，「雙方都拿老百姓當擋箭牌。」**

** 2015 年 8 月 25 日，本書作者在長春市街頭隨機採訪中，受到政府當局維護社會穩定人員的干擾，無法得知這位倖存老人的名字和年齡。

餓殍原子彈

中共視長春餓殍戰為國共內戰的決定性勝利之一。「（長春）城裡多張嘴，國民黨就多一份壓力。城裡添具白骨，就多一顆射向國民黨軍心士氣的子彈。」一名中國軍事作家寫道，「城內，街頭風雨中號泣、倒斃的孩子，烈日下和靜夜中『蓬啪』炸裂的屍體，就是炸響在國民黨心頭的軟性原子彈。」[1]

對中共來說，這些餓殍似乎是戰爭直接死亡人員。

200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60周年紀念日。一名76歲的長春藉老兵王鈞儒（譯音），曾經是參與困餓長春的10萬軍人之一，他現在悔恨當初追隨中共將數十萬難民餓斃。關於共軍為何要將難民們餓斃的問題，他這樣告訴《紐約時報》說：「我們得到軍令是，他們（難民）是敵人，他們必須死。」[2]

一種名叫餓殍原子彈的新型核武器誕生了。

附錄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战斗序列表

<table>
<tr><th colspan="2">兵团</th><th colspan="3">师</th><th colspan="3">团</th><th>备注</th></tr>
<tr><td rowspan="4">司令员</td><td rowspan="4">肖劲光</td><td rowspan="6">独立第六师</td><td>师长</td><td>邓克明</td><td rowspan="2">十六团</td><td>团长</td><td>李平野</td><td rowspan="24">①炮兵第四团系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建制部队，围困长春战役开始后，配属第一兵团，并受其领导和指挥。</td></tr>
<tr><td>政委</td><td>钟人仿</td><td>政委</td><td>张辉</td></tr>
<tr><td>副师长</td><td>全榆
马翼飞</td><td rowspan="2">十七团</td><td>团长</td><td>赖万方</td></tr>
<tr><td>副政委</td><td>祝世风</td><td>政委</td><td>彭世盛</td></tr>
<tr><td rowspan="4">政治委员</td><td rowspan="4">肖华</td><td>参谋长</td><td>刘甦</td><td rowspan="2">十八团</td><td>团长</td><td>曾兴茂</td></tr>
<tr><td>主任</td><td>江学斌</td><td>政委</td><td>朱国栋</td></tr>
<tr><td rowspan="6">独立第七师</td><td>师长</td><td>罗华生</td><td rowspan="2">一团</td><td>团长</td><td>于韬</td></tr>
<tr><td>政委</td><td>邱子明</td><td>政委</td><td>魏宝善</td></tr>
<tr><td rowspan="4">副司令员</td><td rowspan="4">陈光
陈伯钧</td><td>副师长</td><td>程启文
余勋光</td><td rowspan="2">二团</td><td>团长</td><td>钟生栋</td></tr>
<tr><td>副政委</td><td></td><td>政委</td><td>赵进之</td></tr>
<tr><td>参谋长</td><td>刘可夫</td><td rowspan="2">三团</td><td>团长</td><td>马哲武</td></tr>
<tr><td>主任</td><td>童浩生</td><td>政委</td><td>汪翟卫</td></tr>
<tr><td rowspan="5">副政委兼主任</td><td rowspan="5">唐天际</td><td rowspan="6">独立第八师</td><td>师长 前任
后任</td><td>刘子奇
王明贵</td><td rowspan="2">一团</td><td>团长</td><td>吴志玉</td></tr>
<tr><td>政委</td><td>邹衍</td><td>政委</td><td>李国秀</td></tr>
<tr><td>副师长</td><td>蔡久</td><td rowspan="2">二团</td><td>团长</td><td>张耀远</td></tr>
<tr><td>参谋长</td><td>章申</td><td>政委</td><td>王鉴三</td></tr>
<tr><td>主任</td><td>桂生芳</td><td rowspan="2">三团</td><td>团长</td><td>郭季芳</td></tr>
<tr><td rowspan="2">参谋长</td><td rowspan="2">解沛然
（解方）</td><td></td><td></td><td>政委</td><td>刘路明</td></tr>
<tr><td rowspan="6">独立第九师</td><td>师长</td><td>廖仲夫</td><td rowspan="2">一团</td><td>团长</td><td>赵立贤</td></tr>
<tr><td rowspan="5">副参谋长</td><td rowspan="5">潘朔端</td><td>政委</td><td>钟民</td><td>政委</td><td>朱军</td></tr>
<tr><td>副师长</td><td>罗文华</td><td rowspan="2">二团</td><td>团长</td><td>周黎</td></tr>
<tr><td>副政委</td><td>谭文帮</td><td>政委</td><td>向军</td></tr>
<tr><td>参谋长</td><td>冉泽</td><td rowspan="2">三团</td><td>团长</td><td>陈朋</td></tr>
<tr><td>主任</td><td>谭文帮
（兼）</td><td>政委</td><td>马星五</td></tr>
</table>

（1）共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戰鬥序列表

续表

兵团	师	职务	姓名	团	职务	姓名	备注
	独立第十师	师长	赵东寰	二十八团	团长	段志清	
		政委 前任	蔡明		政委	杜西书	
		政委 后任	崔国辉				
		副师长	邓中仁	二十九团	团长	杨易风	
					政委	汪历锋	
		参谋长	王玉华	三十团	团长	刘俊岭	
		主任	江腾蛟		政委	石世良	
	独立第十一师	师长	王效明	一团	团长	朱玉林	
		政委 前任	张百春		政委	许先进	
		政委 后任	宋景华	二团	团长	关键	
		副师长	李德山		政委	沈钧	
		参谋长	康干生	三团	团长	陶雨峰	
		主任	王海青		政委	余升云	
	六纵十八师	师长	阎捷三				
		政委	袁克服				
		副师长	黄荣海				
		副政委	孙汉				
		参谋长	周明国				
		主任	朱子统				
	十二纵三十四师	师长	温玉成				
		政委	谭友林				
		参谋长	王亢				
		主任	高先贵				
	十二纵三十五师	师长	王魁先				
		政委	栗再山				
		副师长	李光汉				
		参谋长	姚克				
		主任	齐渭川				
				炮兵第四团	团长	朱光	
					政委	张英	

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战斗序列表

兵团		军			师			团		备注
司令官	郑洞国（兼）	新七军	军长	李鸿	新三十八师	师长	陈鸣人	112 团	李克己	①彭杰如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兵团副司令一职并未到任，兵团参谋长一职空缺。
						副师长	彭克立	113 团	曾长云	
			副军长	史说		参谋长	李性常	114 团	陆心仁	
					暂五十六师	师长	张炳言	1 团	涂尚均	
						副师长	王正国	2 团	徐汉杰	
						参谋长	刘大名	3 团	方维藩	
			参谋长	龙国钧	暂六十一师	师长	邓士富	1 团	李卓	②兵团部队除表列外尚有一些土杂联勤部队和空军站等未列入。
						副师长	宁伟	2 团	姚凤翔	
						参谋长	曾德辉	3 团	黄醒	
								青教团	涂尚均	
								骑兵团	凌绍康	
副司令官	曾泽生 彭杰如	六十军	军长	曾泽生	暂二十一师	师长	陇耀	1 团	李树民	③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于 1948 年 5 月 24 日飞机场战斗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缺额后未配。
						副师长	任孝宗	2 团	李家祯	
			副军长			参谋长	杨肇骧	3 团	赵时雍	
					暂五十二师	师长	李嵩	1 团	胡家驹	
						副师长	欧阳午	2 团	周曙初	
						参谋长	汤启圣	3 团	谢绍贤	
			参谋长	徐树民	一八二师	师长	白肇学	544 团	胡彦	④暂五十六师一团团长汤克振、二团团长书剑，于 1948 年 5 月 24 日长春飞机场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调涂尚均、徐汉杰继任第一、二团团长。
						副师长	李佐	545 团	朱光云	
						参谋长	杨正隆	546 团	邓应斌	
								教导团	凌发启	
								骑兵团	毛尊五	

（2）中華民國東北“剿總”第一兵團戰鬥序列表

续表

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战斗序列表

兵团		军			师			团		备注
副参谋长	杨友梅	长春警备司令部	司令官	李鸿（兼）						
		吉林省保安司令部	司令	郑洞国（兼）	吉林保安旅	旅长	何大刚	1团	司连福	
								2团	邓凌光	
			副司令	李寓春（兼）		副旅长	陈惠民	3团	文卓群	
			参谋长	韩云五（兼）		参谋长	王秉洵	独立大队	张贯三	
								骑兵营	陈荣久	
		吉林师管区司令部	司令	李寓春	长春团管区	司令	李树桂			
			副司令	方传进		副司令	陈烈新			
			参谋长	胡冠军	永吉团管区	司令	周振声			
					骑兵一旅	旅长	韩云五	1团	史振铨	
								2团	穆占鳌	
					骑兵二旅	旅长	杨友梅（兼）	1团	孙璞	
								2团	王魁武	

文獻來源

「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1）在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羅榮桓，1948 年 3 月 4 日，《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長春市志（軍事志），長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
（4）《採訪二十五年：大陸淪陷見聞錄》，于衡，《傳記文學》雜誌第 20 卷
（5）解放戰爭時期長春市黨的地下工作回憶，徐慎，《党在長春的地下鬥爭》，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1 年 6 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16 號
（6）林彪人生最大污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朗鈞，共識網，2014 年 8 月 16 日
（7）追憶：圍困長春，肖勁光拉著二胡醞釀作戰方案，肖凱，新民晚報，2009 年 9 月 26 日

蒼蠅的盛宴

1948 年 5 月 23 日
（1）《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2）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 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5 月 24 日
（1）《決勝東北的英雄讚歌》，瀋陽軍區政治部編研室，白山出版社，1998 年 9 月版
（2）困守長春始末，鄭洞國，《長春檔案史料》，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3) 孤城落日，尚傳道，《走向光明》，吉林省軍區政治部《長春國民黨軍投誠》編寫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4）炮四團在長春戰役中，張英，《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5 月 25 日
（1）獨六師在圍困長春前後，江學彬，《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5 月 29 日
（1）四野戰史編輯室存電，《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1948 年 5 月 30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日期不詳

（1）孤城落日，尚傳道，《走向光明》，吉林省軍區政治部《長春國民黨軍投誠》編寫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2）《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6 月 1 日

（1）中央軍委關於詢問長春作戰情況，中央軍委，《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長春周邊戰及正式攻長春的形勢分析致中央軍委電，中央軍委，《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3）（4）（5）（6）《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2 日

（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解放軍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版

（2）國民黨陸軍新編第七軍政工處，楊天挺，《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4）《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6 月 3 日

（1）朱德就攻打長春致毛澤東信，《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中央軍委關於請回答朱德對打長春所提意見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3）MP—— 插進敵人心臟的利劍，張正平，《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6 月 4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5 日

（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進攻或圍困長春方案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

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4）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編，《林總電報》，軍事科學院圖書館存件，《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5）《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羅元生，長城出版社，2013 年 6 月版
（6）《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日期不詳

（1）《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6 月 7 日

（1）中央軍委關於同意打長春第三個方案及攻城、阻殲援敵作戰方法等問題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6 月 8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長春市政府職員連保保結，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9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10 日

（1）《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金沖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版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4）（5）《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11 日

（1）（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6 月 12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4）《解放長春》，長春市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 9 月版

1948 年 6 月 15 日

（1）《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羅榮桓傳》，《羅榮桓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版

日期不詳

（1）獲取長春供水排水管線圖，王連馨，《崢嶸歲月》，長春市公安局，內部出版，1998 年版

（2）長春市自強學校生活片斷的回憶，裘素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92 年第 1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4）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5）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6）《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6 月 16 日

（1）《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1948 年 6 月 17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對封鎖長春市的決定，長春縣委會，《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3）《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日期不詳

（1）軍事觀點看長春，國民黨兵學研究會，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2）兵不血刃 和平解放長春，肖華，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1948 年 6 月 18 日 ~1948 年 6 月 20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3）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給長春市長尚傳道的電文，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4）（5）（6）《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21 日

（1）圍城戰鬥回憶，關志明，《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解放長春中的獨十師，趙東寰，《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22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收錄《長春市政府代電》長秘字第 2128 號，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3-94 號卷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4）《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6 月 23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24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3）（4）《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日期不詳

（1）《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2）《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6 月 25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投誠綜述，吉林省軍區政治部《長春國民黨投誠》編寫組，《走向光明》，吉林省軍區政治部《長春國民黨投誠》編寫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日期不詳

（1）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馬鴻新的人生歷程》（內部出版），長春《馬鴻新的人生歷程》編輯委員會，2001 年版
（5）《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6）《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6 月 26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肖華在圍城政工會上關於圍困封鎖長春的政治工作報告提綱，《圍城簡報》第一期，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1948 年
（3）（4）《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 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27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3）國民黨統治時期長春概況之四，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1948 年 6 月 28 日

（1）《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日期不詳

（1）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難忘的戰鬥歲月，王景春，《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6 月 29 日

（1）《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6 月 30 日

（1）《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日期不詳

（1）在鄭洞國蔣軍身邊，楊治興，《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困守孤城的點滴見聞，劉振坤，《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4）《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5）《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7 月 1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東北革命文化史料選編（第一輯）》（內部發行），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文化廳 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市文化局，1990 年版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7 月 2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國民黨陸軍新編第七軍司令部（代電），李鴻，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7 月 9 日

（1）《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7 月 10 日

（1）吉林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李文實 劉宇實，《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2002 年 5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出版物第 200201016 號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日期不詳

（1）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7 月 13 日

（1）《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7 月 14 日

（1）我逃出了長春，陶永芳，《觀察》第 5 卷第 7 期，1948 年 10 月 9 日

（2）《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7 月 16 日

（1）《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7 月 17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日期不詳

（1）《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在鄭洞國蔣軍身邊，楊治興，《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4）《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5）《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7 月 20 日

（1）東北軍區政治部聯絡部給各聯絡處及圍城部隊敵工部門的指示信，《圍城簡報》第二期，《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長春市南郊目前封鎖生產救災中幾個問題，馬鴻新，《長春解放》，長春市檔案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年 9 月版

（3）《決勝東北的英雄讚歌》，瀋陽軍區政治部編研室，白山出版社，1998 年 9 月版

（4）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宜南下作戰不宜攻長春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1948 年 7 月 21 日

（1）《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7 月 22 日

（1）《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金沖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版

（2）中央軍委關於向南作戰及速作各種準備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3）《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1948 年 7 月 24 日

我逃出了長春，陶永芳，《觀察》第 5 卷第 7 期，1948 年 10 月 9 日

日期不詳

（1）《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7 月 26 日

（1）《決勝東北的英雄讚歌》，瀋陽軍區政治部編研室，白山出版社，1998 年 9 月版

（2）長春市戰時糧食管制委員會沒收糧食處分書，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3）《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7 月 28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1995 年 8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1948 年 7 月 30 日

《毛澤東軍事文選》第四卷，《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1948 年 7 月 31 日

（1）《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日期不詳

（1）《東北革命文化史料選編（第一輯）》（內部發行），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文化廳 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市文化局，1990 年版

（2）《東北革命文化史料選編（第二輯）》（內部發行），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文化廳 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市文化局，1992 年版

（3）解放長春中的獨十師， 趙東寰，《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新七軍放下武器前後，姚鳳翔，《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5）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6）《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7）珍貴的歷史鏡頭，陳喜武，《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8 月 1 日

（1）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3-14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爬卡子

（1）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對周相匯老人的訪問
（2）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對張嘉鳴的訪問
（3）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對王會利的訪問
（4）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對李忠民老人的訪問
（5）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對王亞珍老人的訪問

1948 年 8 月 2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征編小組編，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89 號，1991 年 1 月 16 日

1948 年 8 月 3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年版

1948 年 8 月 4 日

（1）吉林省檔案館檔案政 72-6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日期不詳

（1）群眾組成的封鎖線，張守三，《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目擊長春圍城慘像，段克文，《四大戰役真相》，鄭義，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版
（3）在鄭洞國蔣軍身邊，楊治興，《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

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大江大海 1949》，龍應台，臺灣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8 月版

1948 年 8 月 7 日

（1）《兵臨城下的家書》，戚發祥 姜東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0 月版

日期不詳

（1）在長春西地區所見，岳英，《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目擊長春圍城慘像，段克文，《四大戰役真相》，鄭義，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版
（3）一場惡戰，侯諾青，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1948 年 8 月 10 日

（1）《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 年版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 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1948 年 8 月 11 日

（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南下作戰因糧食等困難時間難定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1948 年 8 月 12 日

（1）中央軍委關於對部隊南下無期等問題的批評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滿洲脫出》，武田英克，中央公論社，1985 年版

1948 年 8 月 13 日

（1）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給長春市長尚傳道的電文，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2）《滿洲脫出》，武田英克，中央公論社，1985 年版

1948 年 8 月 14 日

（1）關於處理長春周邊難民的決定，中共吉林省委，《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1948 年 8 月 15 日

（1）《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1948 年 8 月 16 日

（1）中央銀行長春分行關於長春市物品價格的報告，1948 年 8 月 16 日，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1948 年 8 月 17 日

（1）圍城中幾個問題 —— 唐天際同志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圍城簡報》第二期，《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2）爭取長春蔣匪地方武裝起義投誠的報告，東聯辦事處，《圍城簡報》第三期，《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1948 年 8 月 19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圍城指揮所關於政治攻勢突擊周的指示，《圍城簡報》第二期，《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4）《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日期不詳

（1）《採訪二十五年：大陸淪陷見聞錄》，于衡，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第 20 卷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目擊長春圍城慘像，段克文，《四大戰役真相》，鄭義，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版

（4）炮四團在長春戰役中，張英，《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5）《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6）《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7）《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8）我參加長春圍困戰的回憶，劉漢勤，《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9）《滿洲脫出》，武田英克，中央公論社，1985 年版

1948 年 8 月 20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1995 年 8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長春死城，那狄，《圍城簡報》第二期，《長春解放》，長春市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年 9 月版

（3）中共長春市淨月區工委關於半個月生產救災封鎖的報告，淨月區工委，《長春解放》，

長春市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年 9 月版
（4）《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5）《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8 月 21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群眾組成的封鎖線，張守三，《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日期不詳

（1）小成子之死：六十年前長春的一場劫難，劉季昌，2009 年 2 月 17 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0582.html
（2）《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1948 年 8 月 22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百年瑣記：我的回憶》，張德義，2012 年 3 月 22 日，http://bbs.yutian.gov.cn/thread-310773-2-1.html
（3）《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8 月 23 日

（1）《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日期不詳

（1）久困長圍中的獨八師，鄒衍，《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5）《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6）《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1948 年 8 月 24 日

《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8 月 28 日

《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8 月 29 日

（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史料選編》第 3 輯第 2 冊，《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2）《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8 月 30 日

（1）《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2）《滿洲脫出》，武田英克，中央公論社，1985 年版

1948 年 8 月 31 日

《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日期不詳

《周保中將軍傳》，趙素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版

1948 年 9 月 1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長春市志（軍事志），長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
（3）關於保衛秋收的指示，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5）《戦後の満洲四星霜》，梅震，ゆまに書房，2012 年版

1948 年 9 月 2 日

《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948 年 9 月 3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1948 年 9 月 6 日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隨時準備殲滅長春撤退之敵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日期不詳

（1）解放戰爭時期長春市黨的地下工作回憶，徐慎，《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2002 年 5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出版物第 200201016 號
（2）炮四團在長春戰役中，張英，《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國民黨統治時期長春概況之四，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4）《戦後の満洲四星霜》，梅震，ゆまに書房，2012 年版

1948 年 9 月 7 日

（1）關於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 9 月版

（2）《戦後の満洲四星霜》，梅震，ゆまに書房，2012 年版

日期不詳

（1）困守孤城的點滴見聞，劉振坤，《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獨九師圍困長春的回憶，廖中符，《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長春的被圍與解放，朱誠，吉林文史資料，第 13 輯，1987 年版，吉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48 年 9 月 9 日

（1）第一兵團司令部訓令，鄭洞國 曾澤生，《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

（3）《戦後の満洲四星霜》，梅震，ゆまに書房，2012 月版

日期不詳

《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1948 年 9 月 11 日

（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周桓關於長春難民出城的處置致肖勁光、肖華等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羅元生，長城出版社，2013 年 6 月版

（3）《戦後の満洲四星霜》，梅震，ゆまに書房，2012 年版

日期不詳

（1）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3-33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1995 年 8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1948 年 9 月 12 日

（1）《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2）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4-65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1948 年 9 月 13 日

（1）《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2）長春圍困戰逃難記，李謙，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ff0d20102v725.html

1948 年 9 月 14 日

（1）林彪、羅榮桓等關於防長春之敵突圍及保衛秋收致各縱各師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2）《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3） 長 春 圍 困 戰 逃 難 記， 李 謙，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ff0d20102v725.html

1948 年 9 月 15 日

（1） 長 春 圍 困 戰 逃 難 記， 李 謙，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ff0d20102v725.html

日期不詳

（1）《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第 1 輯，1988 年 7 月版，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孤城末日，陳運剛，《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4）《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5）難忘的戰鬥歲月，王景春，《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日期不詳

（1）《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3）我在兵團部特務團，彭雲鵬，《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9 月 16 日

（1）《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2） 長 春 圍 困 戰 逃 難 記， 李 謙，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ff0d20102v725.html

1948 年 9 月 17 日

（1）《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另根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2）長春圍困中的獨七師，程啟文，《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長久的思念，王玉樓，《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

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4）《採訪二十五年：大陸淪陷見聞錄》，于衡，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第 20 卷
（5）長春圍困戰逃難記，李謙，2009 年 1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ff0d20102v725.html

1948 年 9 月 18 日

（1）《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版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另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日期不詳

（1）《告六十軍書》，東北人民解放軍軍區政治部，《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2）《告長春蔣方人員》，東北人民解放軍軍區政治部，《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3）《告長春市民書》，東北解放軍、長春地區前線指揮部，《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下），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1948 年 9 月 19 日

（1）（2）《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征編小組編，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89 號，1991 年 1 月 16 日
（3）《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9 月 20 日

（1）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4-65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9 月 21 日

（1）《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9 月 22 日

（1）東北野戰軍一兵團政治部，《圍困長春綜合報告》，1948 年 9 月 22 日，《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人民出版社，2007 年 7 月版
（2）《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爬卡子

（1）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3）爬卡子，英子，《溫故》，第 1 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5 月版
（4）《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5）《卡子：出口なき大地》，遠藤譽，（東京）読売新聞社，1984 年版，向曉雲翻譯

1948 年 9 月 23 日

（1）三個月圍城軍事政治工作情況，肖勁光，《肖勁光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
（2）圍城敵工會議佈置對敵第二期政治攻勢，《圍城簡報》第 4 期，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線指揮所編印，1948 年 10 月 15 日
（3）三個月的政治攻勢總結及今後政治攻勢任務，唐天際，《圍城簡報》第 4 期，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線指揮所編印，1948 年 10 月 15 日
（4）《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日期不詳

《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另據 2015 年 8 月 8 日本書作者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1948 年 9 月 25 日

（1）我逃出了長春，陶永芳，《觀察》第 5 卷第 7 期，1948 年 10 月 9 日
（2）《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另據 2015 年 8 月 8 日本書作者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1948 年 9 月 27 日

（1）處理俘虜官兵幾項規定，第一兵團政治部，《圍城簡報》第 4 期，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線指揮所編印，1948 年 10 月 15 日
（2）《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征編小組編，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89 號，1991 年 1 月 16 日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9 月 28 日

（1）蔣介石、宋美齡給長春市長尚傳道的電文，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2）《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9 月 30 日

（1）《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2）《我們要活命 —— 長春 50 萬人民的控訴》，張高峰，上海《大公報》，1948 年 9 月 30 日

（3）《卡子：出口なき大地》，遠藤譽，（東京）読売新聞社，1984 年版，向曉雲翻譯

1948 年 10 月 2 日

（1）《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2）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攻錦州還是打長春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日期不詳

（1）《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2）東北魯迅文藝工作三團的戰鬥歷程，王淑華，《東北革命文化史料選編（第一輯）》（內部發行） 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文化廳 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市文化局，1990 年版

（3）困守孤城的新編新七軍，史說，《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10 月 3 日

長春敵軍繼續大批逃亡旬日投誠兩千余人，東北日報，《長春解放》，長春市檔案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 9 月版

1948 年 10 月 4 日

（1）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長春市檔案館檔案曆 23-4-65 號卷，《從淪陷到解放》，霍燎原 崔國璽，長春文史資料，第 47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 02-051 號

1948 年 10 月 5 日

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10 月 6 日

（1）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困守孤城的新編新七軍，史說，《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共和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戰傳》，羅元生，長城出版社，2013 年 6 月版

日期不詳

《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10 月 9 日

（1）中央銀行本票，張慶文 曹俊卿 王哲，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10 月 10 日

（1）《馬鴻新的人生歷程》（內部出版），《馬鴻新的人生歷程》編輯委員會，2001 年版
（2）《鐵骨丹心 —— 記老黨員曹瑛》，中共長沙市、長春市委黨史辦、中共湖南平江史志辦，長春出版社，1999 年版

1948 年 10 月 14 日

（1）《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1948 年 10 月 15 日

（1）蔣介石命鄭洞國等撤出長春的手令，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2）《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金沖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版
（3）《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征編小組編，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89 號，1991 年 1 月 16 日
（4）《圍城簡報》第 4 期，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前線指揮所編印，1948 年 10 月 15 日

1948 年 10 月 16 日

（1）《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2）《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金沖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版

1948 年 10 月 17 日

（1）在鄭洞國將軍身邊，楊治興，《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進駐『東光寮』前後，楊緒亮，《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3）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國民黨第六十軍已起義致中央軍委電，《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4）隨解方參謀長進城，楊尚峰，《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5）10 月 17 日 21 時 30 分 第一個由城南進入市區的部隊，羅兆雄，《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6）《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7）獨六師在圍困長春前後，江學彬，《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8）從圍困長春到衛戍長春，王效明，《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9）《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948 年 10 月 18 日

進駐『東光寮』前後，楊緒亮，《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

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10 月 19 日

（1）《卡子：出口なき大地》，遠藤譽，（東京）読売新聞社，1984 年版，向曉雲翻譯

（2）「困長春：倖存者的回憶」，陳喜文，2013 年 7 月 20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91aad1cf0101b0hu.html

（3）《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另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兵不血刃

1948 年 10 月 20 日

（1）中共中央電賀長春解放，新華社電訊，1948 年 10 月 20 日，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2）《鐵骨丹心 —— 記老黨員曹瑛》，中共長沙市 長春市委黨史辦 中共湖南平江史志辦，長春出版社，1999 年版

（3）長春的接管與改造，張樹範，《城市接管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年 9 月版

（4）從部隊到公安，李勤，《崢嶸歲月》（內部資料），長春市公安局，1998 年版

（5）兵火春秋：記國民黨由吉林撤退和困守長春，金永順，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1948 年 10 月 21 日

（1）珍貴的歷史鏡頭，陳喜武，《新七軍投誠》，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2）《遼瀋戰役》，遼寧美術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3）《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4）鄭洞國率部投降 我勝利收復長春，中共《東北日報》，《長春圍困戰》，張贊新 孫淑范 高英傑，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1996 年 6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9902048 號

（5）一槍未放的勝利 —— 解放長春的經過，中共《長春新報》，1948 年 10 月 30 日，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6）兵不血刃 和平解放長春，肖華，《解放戰爭長春英烈圖片展資料彙編》，長春市革命烈士研究會編，2008 年 10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性出版物第 200802011 號

救生埋死

（1）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對老人的訪問，他拒絕提供自己的名字

（2）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對周相匯老人的訪問

（3）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3 日對李忠民老人的訪問

（4）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5）關於慶祝長春解放應做好幾項工作的通知，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政府，1948 年 10 月 20 日，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6）《東北革命文化史料選編（第一輯）》（內部發行），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文化廳 瀋陽、

長春、哈爾濱、大連市文化局，1990 年版
（7）難忘的一九四八年，趙銘紳，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8 年第 5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8）搶運搶發緊急救濟 長市難胞紛紛得救，中共《長春新報》，1948 年 11 月 1 日，長春檔案史料，長春檔案館，1998 年 9 月版，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802032 號
（9）著名攝影師兼導演李光惠，呂任，長春文史資料，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7 年第 2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5 號
（10）《馬鴻新的人生歷程》（內部資料），《馬鴻新的人生歷程》編輯委員會，2001 年版
（11）我任長春特別市公安局長，于克，《崢嶸歲月》（內部資料），長春市公安局，1998 年版
（12）《歲月遺痕：長春被圍困的日子》，沙秀傑，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版
（13）《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14）《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遠藤譽，臺灣樂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6 月版
（15）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對周相匯老人的訪問
（16）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17）據本書作者在 2015 年 8 月 8 日對范傳華老人的訪問
（18）「記圍困長春時的幾個片斷」，王均平，《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征編小組編，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 9102089 號，1991 年 1 月 16 日

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1）全殲東北敵軍的政治動員令，1948 年 10 月 20 日，《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
（2）在東北野戰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48 年 11 月 19 日，《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
（3）《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版
（4）《肖勁光回憶錄》，肖勁光，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5 月版
（5）《我的童年》，范傳華，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9 年版
（6）公安幹校第一期，于興河，《崢嶸歲月》（內部資料），長春市公安局，1998 年版
（7）《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 9 月版
（8）《圍困長春》，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長春文史資料，1988 年第 1 輯，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 157 號

餓殍原子彈

（1）《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年 8 月版
（2）China Is Wordless on Traumas of Communists' Rise，Andrew Jacob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 2009

「國軍之攻取長春和堅守長春，本來是政治的意義大於軍事的意義。這話是怎樣講呢？我們知道，自日本投降抗戰結束以來，東北問題在本質上是主權的接收和保持的問題，具體一些說，中國政府是依據中蘇條約接收我們國家在東北的主權，而共匪之所謂『聯軍』，則阻撓國軍接收主權的工作，東北戰事的發生和發展，即以此為惟一的原因。我們國軍在這一接收主權和保持主權的民族戰爭中，長春是我們領土主權的象徵，必須攻取，也只有盡力保持，而其攻取和保持的意義，與其說是軍事的，毋寧說是政治的。」

——「長春之守」，天津《民國日報》社論，1948年10月23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
1947.11.4~1948.10.19／杜斌著.　--初版.--
臺中市：白象文化，2017.3
　面：　公分
ISBN　978-986-358-274-8（平裝）
857.7　　　　　　　　104024418

長春餓殍戰

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1947.11.4~1948.10.19

作　　者　杜斌
校　　對　杜斌
專案主編　徐錦淳
出版經紀　徐錦淳、林榮威、吳適意、林孟侃、陳逸儒、黃麗穎
設計創意　張禮南、何佳諠
經銷推廣　李莉吟、莊博亞、劉育姍、李如玉
營運管理　張輝潭、林金郎、曾千熏、黃姿虹
發 行 人　張輝潭
出版發行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02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392號
　　　　　出版、購書專線：（04）2265-2939
　　　　　傳真：（04）2265-1171
印　　刷　基盛印刷工場
初版一刷　2017年3月
初版二刷　2017年7月
初版三刷　2018年1月
定　　價　520元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歸作者所有，內容權責由作者自負

白象文化　印書小舖 PressStore 出版經紀　出版・經銷・宣傳・設計
www・ElephantWhite・com・tw　自費出版的領導者　購書 白象文化生活館

毛澤東欲奪取長春作為中共與中華民國政府對峙的首都，林彪以**人禁出**、**糧禁入**的餓殍戰術，圍困350天，一座至少63萬人的城市，僅剩下17萬人。

「參加圍困長春的共匪部隊，是由東北共匪國際部隊混合編成的。在長春西北方面……是蒙古騎兵，這些蒙騎部隊具有一種原始的殺人獸性……長春正南方向……是韓共的獨立師……經過一番共匪的民族離間的政治訓練，對於中國人民都持有偏頗的嫉仇觀念。……這些異族部隊，對於困死餓死中國人民的政策，執行的特別嚴厲，更特別徹底，任憑你怎樣的哀懇，是絲毫不會換來他們的同情的。」

——范叔寒，天津《益世報》，1948年9月16日

「八里堡便處在我軍陣地的前沿。我軍的火力控制了村莊的大部分，而在村莊的另一端即滿布著敵人的地堡工事……我走進了這個人間地獄。……每斤人肉賣價250萬元，是所有能吃的食物中最便宜的一種。許多父母吃了自己的孩子。」

——關寄晨，中共《東北日報》，1948年9月21日

「有一個男子在不聲不響地啃著人骨頭，眼珠注視著倒下的女子，一心一意地啃著骨頭，又長又大的骨頭。」

——日本倖存者遠藤譽

「長春解放的第二天，我坐著吉普車沿著長春市轉了一圈，我的車沒法起步了。走一走，我的通訊員就得跳下去，把死屍拖到一邊。再走走，再跳，把死屍拖到一邊。」

——圍城高級指揮員、中共東北野戰軍獨立第八師政委鄒衍

「我爹和我弟弟在幾個月前就餓死了，狗都把遺體叼走了。我媽享受的待遇是最好的了，她被國民黨軍埋起來了，到解放後，被解放軍扒出來，弄去燒了。」

——長春倖存者范傳華

ISBN 978-986-358-274-8

9 789863 582748 NT$520

想出書？找白象！